

湖湘文史丛谈

第四集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5561-0010-1

定价：88.00元

《湖南文史丛谈》

主　编　熊　健

副主编　陈伏球　熊治祁　陈书良

　　　　陈先枢　李治湘

湖湘文史丛谈

【第四集】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编

○HUXIANG WENSHI CONGTAN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湖湘文化研究

文史述往

三湘人物

序跋书评

民俗风情

HUXIANG WENHUA YANJIU

湖湘文化研究

长沙先秦历史初探

——兼论炭河里古文化

喻立新

长沙自秦汉以来就是湖湘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长沙的先秦史因史籍缺乏记载而不甚清晰，特别是在楚国势力进入长沙前，史书上认为今长沙地区是“蛮荒之地”。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长沙市所属的宁乡黄材及其周边一带发现了一大批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和铸造工艺精湛的商周青铜器。特别是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宁乡黄材炭河里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该处是一处西周时期的古城址。表明这一地区已出现了典型的阶级社会形态和组织，从而有力地证实了长沙地区在楚国势力进入前已非“蛮荒之地”。

一、黄材是蚩尤和蚩尤部落的发祥地

黄材位于长沙市宁乡县城西40多公里的湘江下游支流——沩水河畔，地处雪峰山脉东北麓，是沩水上游一个面积近千万平方米的山间盆地，中央地势平坦，三面高山环抱。沩水自西向东从盆地中间流过，炭河里商末西周的文化遗存（即炭河里遗址）就坐落在盆地西部的沩水北岸，隶属黄材镇栗山村。

探索黄材这一带的历史文化，首先应从它的源流说起。

湘中地区至今还存在一种神秘古朴的民间原始文明文化形态，即“梅山文化”。梅山文化地域是古梅山峒蛮居住地，据《宋史》云：“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即包括今天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怀化、娄底、邵阳等市2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全部或部分，宁乡黄材即在其中。著名民俗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子艾论证，古梅山峒区域是上古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

蚩尤是我国远古传说中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联盟首领之一，与黄帝、炎帝并称中华民族“三始祖”。关于蚩尤的传说，自东周以来多见于史籍。《龙鱼

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考证：“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

缪凤林《中国通史》云：“炎、黄之世，南有黎、苗，黎、苗处南服，大抵上古之时，江汉之区皆为黎境。”所谓“黎”，即“九黎”，依此说，蚩尤“九黎”分布范围应包括长江中游一带，即今天的湖北、湖南等地。远古时期，交通不便，九黎部落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应是以黄材为中心的蚩尤部落由南向北扩张，不断征服其他部落而形成的。

黄材西行15公里就是安化县，安化县与新化县接壤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大熊山，迄今保存有一块“蚩尤屋场”的清末民初石刻，相传蚩尤早期活动于这一带。据历史文献记载，蚩尤姓“姜”[1]，而“姜，从羊”，古时黄材周边有许多山水地名冠之以“羊”，康熙二十一年《宁乡县志》记载：“大沩界，县西160里南，有东西45里，南北30里的奇山，状若芙蓉，翳幽栈绝，下为青羊潭。”《元丰九域志》记载：“青羊山，有寺曰芙蓉寺……山下有青羊镇、青羊集。”现今黄材镇仍保存有上青羊村，下青羊村；在黄材相邻的老粮仓镇还有一个“羊角寨”。而黄材附近的河溪，一般只冠一个字，如湘水、塅溪，相传上古人们将流经黄材的这条河称为“羊水”，直到汉代才改称“沩水”。“而沩水见于《水经》意者，‘沩’字之始制与沩水之名立，皆在汉世”[2]。因此，今日之“沩水”即汉世之“羊水”。

《归藏·启筮》曰：“蚩尤出自羊水。”《路史》等书亦是如此记载。黄材镇石龙洞村有一座山叫云台山，山下有一个大坑，现隶属横市镇关圣殿村。坑内面积达30万平方米，四面高山环抱，峭壁悬崖，仅有一个不到20米宽的出入口。传说蚩尤降生于此。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所以称此坑为“天子坑”。

与“天子坑”相隔一座山，相距不到两公里的黄材崔坪有个“十三洞”（2005年改名为“千佛洞”），相传蚩尤曾住在这个山洞里，人们把它叫“蚩山洞”，宁乡口音“蚩”（chī）与“十”（shí）混淆，“山”与“三”不分，后来人们误认为此洞有13个洞相连，于是“蚩山洞”变成了“十三洞”。

黄材一带“姜”姓人特别多，现在宁乡还流传一句古话“黄材姜难呷”。据《宁乡县志》记载：“黄材姜姓最多，市侧大墓山有进士坊，为后唐进士姜流光立。

旧《志》：姜德厚，字流光，吉州太和人。后唐进士第，官大理寺评事。庄宗某年，衔诏移民，至黄材。”[3] 相传姜流光饱读史书，博古通今，知悉自己乃蚩尤之后裔，而宁乡黄材乃蚩尤之故里，于是请旨认祖归宗，举族移民于黄材。

蚩尤时代正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有着众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蚩尤长大后成为这块土地——今黄材一带的部落首领。

随着势力的强大，蚩尤部落走上了扩张的道路。他们沿“羊水”而下进入湘水，沿湘水而下到达长江武汉一带，逆汉水而北上。沿线部落或被他们消灭，或被他们兼并，从而形成了九黎部落联盟。

据范文澜先生考证：“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部落联盟进入中原后，与黄帝部落联盟在今河北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大战”。最后九黎部落联盟被打败，首领蚩尤也被擒杀。

综上所述，宁乡黄材是历史传说中蚩尤和蚩尤部落的发祥地，蚩尤部落由此北扩建立了九黎部落联盟。

二、黄材是三苗商末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

夏时长江中游一带生活着一个原始部族集团——三苗。

关于三苗的起源，《国语·楚语下》说“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其意是三苗复兴了“九黎”的事业和历史传统。韦昭注《国语》此句云：“三苗，九黎之后也。”即三苗是九黎的后裔。所以，九黎部落联盟在涿鹿战败之后，其势力退出了中原地区，又回到长江中游一带，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部族集团——三苗。

《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而禹放逐之。”“彭蠡”在今之江西鄱阳湖；“洞庭”，学者大多认为即今之湖南洞庭湖；“文山”是今何地，还无法确定，大致应在鄱阳、洞庭间靠南部的地方；“衡山”，据钱穆先生考证，是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4]。说明大禹之时三苗的范围大致包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和彭蠡之间的辽阔地域，即今天的河南南部、安徽西部，以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禹放逐之”就是大禹对三苗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

关于禹伐三苗的战争，先秦时期的文献有许多记载，仅就结果而言，《国语·周语下》说：“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逸周书·史记》篇说“外内相闲，下扰其民，民无所附，三苗以亡”。许多学者据此认为三苗从此就灭亡了。

但大禹讨伐后三苗就灭亡的观点另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夏图上就标有“三苗”。《逸周书·史记》篇说“三苗以亡”，亡也有逃亡之义。

尧舜禹时期，三苗的活动中心在江汉平原，其范围包括了长江以南的洞庭彭蠡之间的地域。据考古发现，在武汉市北部的黄陂盘龙城城垣基部和王家咀下层发现了二里头文化，这都应是夏王朝的国力范围已达江汉地区的考古学物证。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几乎遍布淮河上游地区，但在长江以南尚未发现。所以，夏代三苗存在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其势力应退出了长江以北。

谭其骧先生认为进入商代时三苗已不存在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商图就不见三苗之踪迹。笔者发现该图上标注有“宁乡”和“清江”。按其“图例”分析，应是在长江以南的湖南宁乡和江西清江（现樟树市）发现了商代的“考古遗址”，即炭河里商周遗址和吴城商代遗址，并在它们及其周边均出土许多商代青铜器，认为这些青铜器是商人铸造，所以，商王朝势力取代了三苗。

三苗在商代已不存在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大一部分具有与中原不同的特点。许多青铜器专家认为这些与中原文化不同的青铜器不是中原铸造，著名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唐兰先生明确指出：“解放后湖南省发现过许多相当于商代的青铜重器，如四羊方尊和人面纹方鼎，都有地方特点，不完全同于殷墟文化，看来这个地区的苗族文化，在商代还是在发展的。”[5] 所以不能以宁乡发现商周遗址和出土商周青铜器来证明三苗在商代已不存在。

黄材一带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总数达 300 余件，铸造年代为商末西周时期。在位置偏僻的黄材出现年代相近的古城和大批青铜重器，让人难以否认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所以炭河里古城的主人就是宁乡商周青铜器的使用者。

距黄材不到 20公里的老粮仓镇与枫木桥乡交界处有一座叫“师古寨”的山，山的西北面为老粮仓，东南面为枫木桥。1959年、1993年先后在此发现了 15件商代大铜铙。关于铙的用途，专家认为“可用于军旅，类似铜鼓，击鼓山顶，足以号召部队，指挥军阵，而且也可用祭祀宴享”[6]。师古寨是“师法古人”之地，也就是祭祀祖先的地方。这个祖先就是蚩尤，因为蚩尤姓“姜”，而“姜，从羊”，所以“师古寨”又名“羊角寨”[7]。师古寨与炭河里相距如此之近，应该就是炭河里城址的主人在此祭祀祖先蚩尤。炭河里城址的主人之所以选择师古寨祭祀蚩尤，是因为当时该山及其附近生长着许多枫树。《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至今湖南以及贵州等地的苗族一直崇尚祭“枫神”，崇拜枫树。炭河里城址的主人当为商

末西周时期生活在黄材一带的族群，这个族群是蚩尤后裔，而当地夏代生活的族群是三苗，所以炭河里城址的主人肯定是夏代三苗的后人。

《名义考》云："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三苗建国在长沙"说明三苗将都邑建立在长沙地区；"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说明三苗在长沙地区建国之时，其势力已退出长江之北，应是夏代或夏代以后。《名义考》成书于明代，当时的宁乡黄材属长沙府，明代长沙府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古方国城址唯有宁乡黄材炭河里。所以，三苗在长沙地区所建的都邑应就是炭河里古城址。这与《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也相吻合，"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黄材距南岳仅 150 公里。

据考古发掘，炭河里古城址运用于商末西周时期。人们通常把青铜器、文字、城址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也称为三大文明要素。以黄材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 2 公里范围内出土了许多有铭文的铜器。如"大禾"人面纹方鼎、"（[illegible]）父乙"窝纹罍、"癸"（[illegible]）卣、"戈"卣等。所以，三苗部落联盟不晚于商末西周时期变成了三苗方国。

黄材地理位置偏僻，三苗方国之所以在此建都邑，是因为从夏代开始，其部落联盟聚居中心就在此。禹伐三苗，三苗被迫迁徙，一部分三苗人在其首领带领下借道长江沿湘水而上，转"羊水"来到了蚩尤部落发祥地——宁乡黄材一带。

据考古发掘，炭河里遗址的年代最早到商代末期。在此之前三苗文化遗存很可能淹没在黄材水库。黄材水库（即青羊湖）距炭河里约一公里，修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水库大坝的左边就是"寨子山"，"寨子山"又名"得胜寨"，"经得胜寨，危峰拔地，突起道旁。前代土人尝据绝顶，筑垣避兵于其上，因以寨名山，径由此入"[8]。古籍之记载以及"寨子山"之名表明：在寨子山后的水库淹没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基地就是夏商早期三苗的聚居中心或都邑。

夏商早期三苗的聚居中心或都邑也不能排除在黄材附近的老粮仓一带。2001 年 9 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老粮仓的刘家湾—花草坪遗址发现了大量的 7000 多年前的绳纹、篮纹陶片，文化遗存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遗址不但面积巨大，达 2 万多平方米，而且保存良好，文化层相当清晰。

据考古发掘，炭河里古城废弃于西周晚期，在其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春秋时期的"越人墓"，表明三苗方国消亡于西周晚期。

综上所述，夏、商、西周时期，当今长沙地区属三苗，宁乡黄材是三苗的政治中心，炭河里古城址是"三苗"方国的都邑所在地。三苗方国先民创造了灿烂

的青铜文明。

三、黄材一带是虎方方国春秋中晚期的都邑所在地

西周晚期，三苗解体以后，今长沙地区的历史面貌在传世文献中几近空白，而考古方面也未发现城址一类的大型聚落。何人取代了三苗成为今长沙地区春秋时期的主人，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查考古资料，在今长沙地区（宁乡黄材，长沙金井、高桥、麻林）多处发现春秋早、中期以随葬铜器为主的越人墓。史学界认为楚人进入长沙地区大约是春秋晚期，在此之前当地生活的族群以越人为主。

社会是发展进步的，早在商周时期就进入了文明社会的今长沙地区，不可能再退回原始社会，所以当时当地的越人应也依附于一个自己的方国。这个方国就是虎方。

甲骨学家从甲骨文中考证出商代有一个方国叫虎方，是一个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氏族。关于商代虎方的地望，专家学者有三种意见，即淮水上游说[9]、汉南荆楚故地说[10]和古三苗聚居地区说[11]。《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商时期中心区域图》将"虎方"标注在淮水上游南岸，说明谭其骧先生是赞成淮水上游说的。

甲骨文中有关"虎方"的记载，只有一条卜辞[12]：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有"征伐"义[13]，举、望为族名。在商代，王师只有右、中、左三军，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是以王师为骨干，辅以用兵地附近的氏族军。据专家考证：举是居住于湖北汉水支流举水流域的一个氏族[14]；望位于亳南淮阴间，即今淮水上游北岸[15]，据此分析：商王武丁征伐虎方前，虎方离此不远。但淮水上游属于正统商文化区域[16]，虎方不可能在此。所以，汉南荆楚故地说是可信的，虎方当时应位于汉南。

如果虎方当时位于汉南符合史实，那么虎方也是三苗后人。禹伐三苗后，有部分三苗人脱离了三苗集团，其中留在长江以北的三苗人后裔到商代时已发展为"荆蛮"，这些"荆蛮"分许多氏族部落和方国，商王朝对其进行了征伐。据《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说的是商人的军队在攻占"有洛"（今河南洛河一带地区）之后，曾乘胜南下征伐"荆蛮"，一度迫使"荆蛮"归顺。又《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载："汤见祝网者置四面……汤收其三面……

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汉南”指汉水之南。商初，由于成汤“征伐”与“招抚”结合，四十个氏族部落和方国都归附于商朝，虎方就在其中。

商代中期，商王朝国力衰弱，虎方与其他“荆蛮”一起又背叛了商王朝。《毛诗正义》云：“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

商代末期，商王武丁大规模南征，虎方是主要征伐对象。甲骨文中关于“虎方”的这条卜辞，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这次战争，以商王胜利而告终。《诗·商颂·殷武》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

战败的虎方被迫迁徙到了江南。20世纪在江西新干发现属同一文化类别的两个商代遗址，即大洋洲商墓和牛头城商周遗址。1989年在大洋洲商墓出土了480多件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这批青铜器上的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张长寿先生据此认为：牛头城商周遗址居住族群很可能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17]。

西周金文安州六器《中方鼎》云：“唯王（周昭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艺王居。”意思是：周昭王命令南宫伐反虎方的那年，命令“中”先巡视南方诸侯国，建立昭王行宫。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周昭王讨伐过南方的虎方。这一点于2000年在山西晋侯墓内出土的韦支甗也可证实，其铭文中有“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二是讨伐虎方的原因是虎方反周。周昭王肯定是在长江之北讨伐虎方。据此分析，虎方反周实际是其势力于西周早期越过了长江，进入周王朝控制范围。说明西周早期虎方占领了鄂东南—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这一广阔地区。

彭适凡先生研究认定：鄂东南—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这一广阔地区表现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就是扬越文化。西周文献中开始出现的扬越，虽泛指一定地域即江汉地区的扬越族人，但当时扬越的地望不仅包括江汉地区，而且还分布在鄂东南以及江西的大片地区，其东界大体以鄱阳湖为界，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及赣江西岸[18]。所以，虎方占领之地所体现的文化面貌是扬越。

《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前885年—前878年）时，王室衰微，诸侯交相攻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扬粤，至于鄂。”西周中晚期之际，楚国兴兵征伐的扬粤，即扬越，古时“粤”通“越”，实际就是虎方。“至于鄂”，说的是楚国势力越过长江到达了鄂地（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东）。从此，虎方势力退回到长江以南。

长沙史称“扬越之地”，春秋中晚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扬越民族主导，在炭河里古城外西周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春秋时期的“越人墓”。但在株洲县白关镇团山村发现了西周晚期的越人墓[19]，据此分析：虎方应是在三苗方国消亡后，占领了其地域。

资水上游的邵阳县发现了双江口遗址，经专家鉴定为春秋时期古越人居住遗址。这表明当时当地已是扬越人的天下，虎方于春秋时期占领了整个资水流域。

春秋时期楚国势力迅速发展，在致力于北上争霸的同时，也积极南下扩张。楚国窥视虎方之地，分西、中、东三路南下扩张。

西路——楚国从洞庭湖西部南下向虎方渗透，控制了资水下游。两周之际，楚国势力到达湘西北地区。湘西北地区即洞庭湖西部、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这里北与今湖北松滋（古代兹方）、公安连成一体，隔江与楚郢都相望。在稳定上述地区的统治后，楚国势力继续南下。据考古发掘，在益阳发现的400多座楚墓，其年代上限为春秋中期，表明楚国于春秋中期开始控制了资水下游[20]。

中路——楚国从洞庭湖东部南下进入了今湖南岳阳和汨罗一带。楚国在洞庭湖东部建立移民国，据前人考证，目前所知主要有罗子国和麇子国。罗子国，系楚同姓国，约公元前7世纪初被楚武王所灭，其遗民南迁于郢都附近枝江一带。楚文王时，又将遗民南迁至今汨罗一带；麇子国系西周时期楚的附庸国，约公元前7世纪末或前6世纪初，被楚庄王所灭，其遗民迁至今岳阳市东30里的麇城[21]。

东路——楚国从鄂东南—赣西北大举南下进攻虎方。据《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前671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夷越”位于“尔（楚国）南方”，就是指虎方，虎方就是“扬越之国”。“楚地千里”说明春秋中期，楚国南下扩张，增加了很大土地，其南北纵深近千里。而楚国西、中两路南下扩张不广，只有东路可能南下扩张最广，占领了鄂东南—赣西北，甚至到了今南昌地区。《水经注》：“赣水又北经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又《元和郡县志》：“洪州（南昌），春秋时为楚东境也。”

由此可见，春秋中、晚期，虎方的地域仅留有湘水流域（除岳阳地区外）和资水中上游，虎方失去了长江中游的铜矿，从此走向衰落。

虎方都邑原在赣鄱平原，随着楚国春秋中期对赣鄱平原的进攻，虎方将都邑搬到了黄材一带，因为黄材曾是三苗方国的都邑所在地。况且炭河里周边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如离黄材不远的龙田镇出土的兽首云纹勾内戈和坝塘镇出土的越式鼎）。

黄材一带，包含从黄材沿沩水而下不到5公里的横市在内，古时横市可能延续了黄材的辉煌，春秋中晚期的虎方都邑也有可能在横市。

目前黄材周边发现的越人墓绝大多数是春秋中晚期的。横市北与桃江灰山港相邻，灰山港北去十公里就是桃谷山乡，在该乡腰子仑村发现了200多座春秋中晚期越人墓，出土了许多青铜器。

春秋晚期，“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传·哀公四年》），说明虎方方国于哀公四年（前491年）被楚国所灭亡。这与考古资料证实楚人是春秋晚期进入今长沙地区的结论相吻合。

公元前491年即楚昭王二十五年，相传楚昭王曾南征，沿湘水而上，过醴陵至江西萍乡。江西省萍乡县“因楚昭王渡江得萍，实于此而名”，现在还留有昭王台等遗迹及有关楚昭王南征至此的传说。长沙与湘潭交界处昭山下的湘水中有一个昭潭，《广舆记》谓因楚昭王南征至此而得名[22]。

今长沙地区并入楚国版图后，成为黔中郡的一部分。据清同治《长沙县志》云：“春秋晚期，长沙属楚国黔中郡。”[23]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当今长沙地区属虎方；宁乡黄材一带是虎方方国的都邑所在地。春秋晚期，长沙地区被楚国占领，成为了楚国黔中郡的一部分。

四、历史上的洞庭郡设在黄材一带（当时称“青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但司马迁并未将三十六郡的名称一一列出，致使后人众说纷纭。到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著的《秦郡新考》与《秦郡界址考》，不但确定了三十六郡的名称，还推测出秦代有四十六郡，并指出各郡的范围，《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秦图就是据此绘制的。然而2002年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中有“洞庭”与“苍梧”之名，专家分析系秦代两郡。这既不见于传世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

其实，洞庭郡始建于战国时期，系楚国所设。据《史记·苏秦列传》，苏秦云楚“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又《战国策·秦策一》称：“张仪说秦王……秦与荆人战，取洞庭、五渚（渚，或作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说明战国时期楚国确实存在“洞庭郡”。

战国初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吴起相悼王”之时，即约公元前388年至前382年期间。“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说明楚国占领了“蛮越之地”，即湘水中上游和资水中上游，设置了“洞庭郡”和“苍梧郡”。

楚国设置“洞庭”和“苍梧”两郡，洞庭郡应在今洞庭湖边。而苍梧郡据《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即今永州）属苍梧。据此分析：楚国应将今长沙地区和益阳地区从黔中郡析分出来，与新征服的资水流域上中游一起，设置了“洞庭郡”。其范围大致包括湘江下游（除岳阳地区外）和整个资水流域。“苍梧郡”大致包括现在湘江中上游流域。

楚洞庭郡治应设在黄材一带。

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城外西周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古墓；2006年在与黄材相邻的横市镇茅粟砖厂附近也发现了一个大型战国至西汉古墓群。2009年在沩水中游且离黄材不到20公里的大成桥镇发现了战国中晚期贵族古墓群。这表明在战国时的黄材一带仍然是楚国的重要地区。

战国时期的长沙地区是楚国的重要粮食基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长沙，楚之粟也”。相传楚国在距横市不到10公里的另一个盆地建立了粮食储备基地，粮食可通过流经这个盆地的一条河在横市进入沩水运往楚国的心腹地带，现在这个盆地就叫老粮仓，流经老粮仓直通楚国心腹地带的那条河叫楚江。老粮仓地理位置偏僻，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楚国的粮食储备基地，其原因应是楚洞庭郡的郡治在黄材一带，便于保护。

沩水的最大支流叫乌江，有东、西两源，其中西源出流沙河镇大田方上元团。翻过此处即可进入楚江，顺江而下就是老粮仓。为了保护老粮仓这个粮食储备基地，楚人在今枫木桥乡新风村（原塔山村）驻扎了军队，此地叫扎营坳。这里有一座桥，是通向楚洞庭郡（黄材一带）的主要通道，所以这地方叫洞庭桥，其地名沿用至今。

今长沙市区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楚墓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楚洞庭郡郡治是否在此？《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复雠、庞、长沙”和“竟陵”为楚国产粟和木材的“四邑”。“邑”为“县”的别称。由此可见，今长沙市区是长沙县治，楚洞庭郡治不在此。

《水经注·湘水》载：“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说的是公元前223年，秦国灭亡楚国后，设立了长沙郡，郡治就是青阳这个地方。但根据里耶秦简分析，许多专家认为秦代并没有长沙郡。周振鹤先生考证，长沙正式成为县以上的政区名称，是在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徙封吴芮为长沙王的时候。《史记·高祖本纪》载“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即今长沙）”，至此才有长沙国设置。此前，《史记·高祖本纪》虽有项羽“乃使徙义帝长沙郴县”的话，

但并不能据之以为汉元年就有长沙郡的证明。司马迁是西汉中期人，以后面的地名说前面的事情，不足为怪。除此之外，并无传世文献证明秦代有长沙郡之建置。直到班固著《汉书》，才在《地理志》“长沙国”下注：“秦郡，帝高祖五年为国”，于是后世误认为秦代有长沙郡。

《史记·秦本纪》记载：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前277年（秦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代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说明战国时期楚国有黔中郡和巫郡，后被秦国攻取，合并设置秦黔中郡。

但到了秦代，黔中郡是否存在并无确凿证据，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先生就不认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之中有黔中郡[24]，但他未指出今湘西之地属于何郡。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我们知道今湘西在秦代应为洞庭郡地。而秦代洞庭郡的地望，应与战国楚洞庭郡有一定关系，地域范围应有部分重叠。从里耶秦简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一句，可知秦代洞庭郡的邻郡有巴郡、南郡与苍梧郡。据此分析：秦国灭楚国后，楚洞庭郡就落入了秦国版图。秦始皇将秦黔中郡与楚洞庭郡合并，以青阳为郡治，设立新的秦洞庭郡。

关于青阳之地名，据史书记载，在战国秦汉时期赫赫有名。有的学者认为青阳即当今长沙市区，有的学者认为“长沙古无‘青阳’之称”，“青阳”具体何在，众说纷纭。其实，青阳之地，不是今日之长沙市区，应是黄材一带。黄材过去就叫“青羊镇”，现在黄材镇还有一个青羊村（古时“羊”与“阳”音相通）。史书记载，宁乡有一座古“青羊山”，又称“青阳山”，距离四羊方尊出土地不到一公里，比沩山还高[25]。三国时（257年），孙吴析益阳县南部之地置新阳县（今宁乡县）[26]，治所在今横市镇[27]。为什么叫“新阳县”？因为此地原来叫“青阳”，“新阳”即“新的青阳”。

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阳就在黄材一带，春秋时期的虎方都邑也在此，而炭河里古城使用至西周晚期就废弃了，那么此地至少还有一处古城遗址尚未发现。笔者认为：此城最有可能在沩山之下的沩水与楚江交汇所包围的范围内。

春秋时期，虎方面对北方的强邻——楚国，其都邑当然要选建在易守难攻的地方。黄材一带，最适合之处就在上述范围：此地后靠滩山，山高路陡，史书记载：明代以前，(滩山)“危径十里，不通车马，行者必缘石攀树”[28]。前面护城的两水——沩水和楚江，水深河宽。横市镇茅粟砖厂附近的战国至西汉古墓群距此地仅一河之隔，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有专家推测：“也许这附近还有更多的遗址存在，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1996年，在滩山村金塘组发现了一件商代提梁卣，之前

当地村民在此曾挖掘出铜戈、斧等残片，这个古文化遗址于2003年4月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滩山周边历史传说很多，名胜古迹不少，山下曾经有一个古城市[29]。这是否就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古城，有待考古发现。

《史记·高祖本纪》“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即今长沙）”，《水经注·湘水》云：“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说明公元前202年西汉设置长沙国时，其都邑在今长沙。从此长沙开始取代黄材（青阳）成为湖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综上所述，从战国到秦代，当今长沙地区均属洞庭郡，郡治在黄材一带。黄材一带是战国秦汉时期赫赫有名的“青阳”。

【参考文献】

[1] 罗泌：《路史·蚩尤传》。

[2]《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第8页。

[3]《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第11页。

[4] 转引：万建中《江西境内三苗氏史迹考述》，《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01期。

[5]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9年第7期。

[6] 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1984年。

[7]《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第26页。

[8] 清·陶汝鼐：《沩山游记》，《大沩山古密印寺志》，第189页。

[9]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虎氏·虎方》，中华书局1988年版；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第414页。

[10]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二期，江鸿系李学勤的笔名。

[11]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2]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6667）。

[13]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 彭明瀚、陈树详：《试论商王朝对南土方国的战争》。

[15] 岛邦南：《殷墟卜辞研究》，第278页。

[16] 参见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1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 张长寿：《记新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7日。

[18] 彭适凡：《论扬越、干越和于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杰出贡献》，《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9] 雷芬：《株洲白关西周晚期越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1999年。
[20] 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21] 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22] 清·罗汝怀：《昭潭考》，《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23]《同治长沙县志·序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4]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秦三十六郡考》。
[25]《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编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6]《康熙志校注·宁乡旧志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7]《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28]《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29]《民国志选编·宁乡旧志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作者单位：宁乡沩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紫鹊界梯田初垦于秦汉之前考

弘 征

新化紫鹊界梯田突然入选我省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一朝声名鹊起。专家们通过实地考察，一致认为气势恢宏，景观奇特，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杰作，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和游览价值。只是对其初垦年代“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这一论断，因为资料阙如，难以遽然认定，兹据史实从以下各方面进行论证。

一、古梅山峒历史悠久

新化古称梅山，《宋史》说“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是指在宋熙宁五年（1072）以前未置县以归宋室版图，并非此前就没有文明史。仅新中国成立后从圳上干家村等地发现的几处古遗址中，采集到有磨制的石锛，大量的夹砂褐陶、红陶、黑陶和碗、豆、罐、钵等，证实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先民频繁活动。战国时期的古墓群时有发现，出土的随葬物有铜斧、越式青铜剑和军乐器等等。梅山这一命名的来历，据《史记》等史志载，乃秦末番阳令吴芮率百越响应诸侯号召倒秦，被项羽立为衡山王（都今湖北黄州），其将梅功多亦封列侯。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徙芮为长沙王，梅从之，以今新化、安化一带为家，遂称梅山。时今新化既为梅所部的邑，当然不是“混沌初开”，而是农业已经比较发达，然而却遍是丘陵山岳，主要的耕地便只是大小、高低不一的梯田（昔日称为挂岭田、高岸田和坳垄田）。一直到宋熙宁五年置县时，朝廷派来的大员章惇作《开梅山》、《出梅山》歌。歌云：“人家迤逦见板屋，火烧硗确多畲田……白巾裹髻衣错结，野花山果青垂肩。”“班班幕府授简书……酋徭三万争贡输。”描绘出一幅当地百姓仍然是以畲田为生计的怡然自得的图画。

二、畲山为田与得天独厚的条件

农耕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在黄河流域以旱生作物为主，《诗·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离离。”种的是黄小米和高粱。南方湿润多雨，《楚辞·大招》：“五谷六仞，设菰粱只。”粮食作物占首位的便是粳稻。湖南是稻作文化最早的发源地，道县玉蟾岩已发现有距今12000年以前的稻粒，澧县城头山、

洪江高庙遗址发现有人工栽培的稻种皆属七八千年以前。《宋史·梅山峒传》云："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周围都是种植水稻极为悠久的地区，梅山种植水稻的年代亦自然很早。

自古称"畲山为田"。实际上烧荒后可"为田"的山多在南方。习惯是有田塍可蓄水种稻的才称田，无田塍种生物的皆称土。今新化一带的先民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在崇山峻岭中一边狩猎一边开垦，在许多地方由于缺水和土壤不佳，畲山便只能种苞谷、红薯一类的杂粮，垦不需要筑塍随时可撂荒的坡地，有的不久又还原为山林。而紫鹊界一带却得天独厚，崇山中的基岩裂隙孔隙水丰富，哪里有裂隙，水就从哪里冒出来，成为上母质为花岗岩风化物，地表为沙壤，疏松透水，虽海拔 1200 米以上的高山，大旱之年也从不干涸，因而从"畲山"一开始便能种植水稻并年年获得丰收。

三、紫鹊界在汉前农业即已相当发达

事实证明，新化一带虽自古称为"蛮峒"，但和荆楚皆被称为"南蛮"一样，早就进入了农业文明。《后汉书·南蛮传》载："永寿三年（157 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160 年）秋，遂抄掠郡界。"清代著名学者邓显鹤在所撰《道光宝庆府志·大政记》中云："唐宋梅山蛮峒，其地正在昭陵，益阳二县界中，二县皆属长沙，汉之长沙蛮，即唐宋时之梅山蛮，二者名异而实同耳。"因其时今新化、安化皆属长沙郡辖，故朝廷以"长沙蛮"称郡境内反抗的少数民族。同样，"屯益阳"也不是先到今益阳集中，而是当时今新化、安化皆属于益阳县的区划。这次反抗，虽然后来以失败而告终，但"梅山蛮"在当时既然能够组织起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远攻长沙郡城，且持续了数年，可见其冶铁技术（制造兵器）与农业生产（至少要提供初期给养）已相当发达。

其次，新化虽宋代才置县，而水车镇紫鹊界一带在三国吴宝鼎元年（266）曾置有高平县，县治就在与其相距不远的今隆回县石脚村。后废县，至民国时仍与紫鹊界属于同一团（乡），新中国成立后始划入隆回。当时既能为县治所在之区，必然是物产较丰，可为县中田赋税的支柱。而这一带至今农耕还是以梯田为主，亦可证其在 1700 年前就已经颇具规模。

四、瑶族是我国梯田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我省少数民族在过去被统称为苗、"猺"，实际皆不是从种族血缘上的区别，"猺"更是对山民的蔑称。瑶族最初因逃避强族的侵凌而深入山林，新化紫鹊界及周边的奉家山等（同是梯田区）正是我国瑶族的发源地之一。1994 年法国人类种族学者雅克·勒穆瓦纳博士来我国广西与湘南等地调查，所获史料均载当地瑶

族源出于新化梅山，雅克此后曾两次来新化水车、奉家等地搜集资料。然而，新化古代的瑶民因自汉代以来不断受到官军的征伐，战死和被杀戮与被迫纷纷逃走迁徙，加上自宋元以后从江西等地移民大举迁来，留下的也不敢承认自己是瑶族而逐渐与汉族同化。只是在紫鹊界一带留下了许多诸如瑶人冲、瑶人凼、瑶人峒、瑶人屋场等历史地名。现在在山中仍可找到新中国成立前与世隔绝的瑶人石屋遗址，与现在隆回虎形山瑶族乡尚保存的石屋完全一样。在我国现有瑶族的几十个分支中，隆回虎形山花瑶是唯一完全保持最古老风俗的一支。虎形山距紫鹊界只有数十公里，同样漫山都是梯田。

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最早著称于世的广西龙胜梯田，同样为当地瑶民所开垦。在由龙胜县民族局所编写的《龙胜红瑶》一书中，明确记载其祖先有一支是从湖南资江中游的梅山峒迁来，那里的梯田与紫鹊界亦完全相似。可知瑶族是我国最早开拓梯田的民族之一，他们在迁徙时，首先在崇山中要找与原住地条件基本相同的地方安家，开垦梯田的经验十分丰富。至于在新化紫鹊界最初开垦的先民，史籍上只记载汉称"长沙蛮"、隋称"莫徭"、唐宋称"梅山蛮"，是否即今瑶族的祖先尚难定论，但这一带梯田的初垦始于秦汉时期甚至更早乃是无可置疑的了。

附记：新化紫鹊界梯田已于 2006 年 1 月 12 日被公布为首批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全国共 13 处），并于同年 3 月 5 日在京举行命名授牌仪式。本文是省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管理协调领导小组编制申报材料中的附件。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梅山文化中一颗闪亮的明珠

——濒临湮没的隆中山歌

胡光曙

一

三湘之西，雪峰之麓的隆回，云山苍苍，辰水泱泱，风光如画，四季气候鲜明。隆回，是楚文化的重要派系——梅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虽属丘陵山区，却见田畴纵横，人烟稠密，是个风物繁华之地。以司门前古镇为中心的隆回北部一带，古称“隆中”。后来，“隆中”亦泛指“隆回八都”，即今隆回县所辖绝大部分地区。在这里，曾流传着一种新颖别致、风韵自然的民间歌谣，名曰隆中山歌。

半个多世纪以前，正是隆中山歌流传的鼎盛时期。

隆中山歌，世无刊本。能在隆中地区不胫而走，妇孺皆知，全赖口头流传。而通过传唱和传抄，实际上它的流传地域已远不止隆中一带了。在隆中乡村，田头耕作、山间采樵时信口唱它；暑夜纳凉、冬日围炉时也要唱它；堤上对歌、集市相会时往往唱它；长辈诫徒、家门训子时仍然唱它。特别奇特的是，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带的私塾先生开馆授徒，竟不约而同，往往采用隆中山歌作为教材，充当莘莘学子的启蒙读物。一日功课既毕，放学之前，老先生信口背出一首隆中山歌，用土纸写了，挂在案头，然后摇头晃脑，拖腔拉调地和学生一同诵唱。这种歌谣是《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书的一种辅助教材。因为它纯属民间口语，易唱易记，备受欢迎。早晚上学、放学路上，一路隆中山歌，此起彼落，你唱我和。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现在一些70岁以上的念过私塾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兴致仍浓。

隆中山歌之所以能如此盛极一时，是因为它的内容取自生活，说明事理，警策人心；它的语言源于民间，通俗易记，朗朗上口。隆中学子魏寅所著之《魏氏轶闻》一书中说隆中山歌“其中所收，为流传之格言俗语及歌谣等，而略加修饰润色，均有关事道之语也”[1]。

二

隆中山歌在群众中是如此易于传唱，听了一遍就牢牢记在心头，再也不会忘记，首先是因为它的内容来自民间生活，唱的是群众的心声。

隆中山歌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呢？从已发现的歌谣看来，起码有如下几类：

1. 抒发性情。这是一般的写景、状物、抒怀之作。运用口语抒唱真情实感，写得浅显明白，读来但觉荡气回肠。如：

太阳一出点点红，人乘骏马我骑龙。人乘骏马走天下，我今骑龙入海中。呀，八仙各自显神通。

2. 歌颂。这是采用赞美的语调讴歌民间美好的情操和事物的一类歌谣。诸如父母养育之恩，夫妻和睦之德，邻里团结之情，为人忠实之态等等皆是。它所表达的思想观点虽然往往打上时代和社会的烙印，却是大家所尊崇，所景仰的，它所表现的感情也是真切动人的。如这首：

夫唱妇随敬如宾，好个家和万事兴。好女解得金腰带，好夫不做浪荡人。呀，人有贤妻家不贫。

3. 说明事理。这是隆中山歌中内容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类。举凡耕作宜勤，持家宜俭，长辈应尊敬，后生勿轻视，为人贵诚实，遇事莫慌张等等，莫不涉及。如这首说明“做事莫怕难”的歌谣：

糍粑好吃磨难推，石榴好吃树难栽。杨梅好吃在深山，鲤鱼好吃在深潭。呀，思量好吃莫怕难。

又如这首数说旧社会“衙门”的歌谣：

两扇衙门大打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书差处处多需索，一场闲气把钱赔。呀，梦见官司要退财。

4. 告诫。这类歌谣占的数量也是相当多。人民群众按照民族的传统规范谆谆告诫后人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如：

爱人奉承吃人酒，被人穿鼻牵着走。手拿嫩草唤牛吃，牛未吃完已上圈。呀，怕你背上不遭鞭。

这首歌谣告诫好酒贪杯，上人圈套，被人利用。又如：

小小吃亏莫请中，谁人开口来评公！锅里肉烂汤有味，两边抬起鼓咚咚，就是中人也吃穷。

这是诫邻里间为小小矛盾请人“评公”，反被愚弄上当的。

5. 勉励。这是寓真善美于理想，寄希望于未来，和鼓励勤耕苦读、催人奋发的。如：

男儿十五拓父志，男儿二十已成人。撑起眉毛舞起须，士苦读来农苦耕。呀，少年正当惜光阴。

6. 感叹。这是感叹命运，惋惜遭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类歌谣。如这首《吹不叫的坏牛角》：

吹不叫的坏牛角，打不响的烂铜锣，粪坑稀泥扶不起，凭你好言劝许多。呀，就是圣人没奈何！

7. 嘲讽。这是用常见的形象、辛辣的语言组成的讽喻歌，颇似今天的讽刺诗。如这首《水里无鱼虾也捞》：

水里无鱼虾也捞，天上鸟过掠片毛，大斗进来小斗出，天公哪里肯相饶。呀，千日担柴一炉烧。

8. 幽默。这一类歌类似讽喻，嘲讽的对象却不那么具体、明确，且歌词总以极富幽默情趣的民间语言出之。如这首《师公屋里鬼唱歌》：

石猫儿撞得石老鼠，老鸦啄蚌壳，要得脱来不得脱！莫道人不敢，敢了又如何？呀，师公屋里鬼唱歌。

这类歌意蕴深沉，语言含蓄，且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是隆中山歌中相当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上所述，只是现在所见隆中山歌的一个大概分类。隆中山歌的全部内容，肯定更加广泛。因为创作这类山歌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某些特定的生活内容，山水风物肯定时有入歌者。至于运用这种形式来叙事、对歌，以至注入某些红白喜事的仪式内容，都是极有可能的了。

三

隆中山歌一经整理，立即不胫而走，广泛流传，且深为群众所爱好的原因，除了它的内容悉皆来自民间生活外，它在艺术上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并且相当突出的。

首先表现在这些歌谣的语言绝大多数均是民间口语，而且是那些已经经过提炼，去掉了杂质的口语。请看这首《水上葫瓢[2]总是浮》：

马无笼头撮不了，满顶扯篷不易收。一个钉子一个眼，踩得石壳打泡泅[3]。呀，水上葫瓢总是浮。

看似信手拈来，组合成篇，读后却不是那些"口水白话"，使人感到歌谣运用民间口语把为人处世宜踏实、忌漂浮的道理说绝了。而在艺术上，也让人得到了满足。

其次是隆中山歌音韵讲究，平仄对仗。诵读这些歌谣，直如倾听一道山泉，

一路奔泻而来，畅通无阻；而那跌宕迂回之处，却又发出叮咚悦耳的声音。这声音是如此纯朴、自然，浑然天成，叫人不能不陶醉。

令人惊叹的是，隆中山歌的平仄韵律，与旧体诗词往往惊人地相吻合。试读：

酒席筵前语莫多，衽席之上有干戈。人心更比江湖险，等闲平地起风波。呀，要说闲话做什么。

隆中山歌的格局大都如此。它们的节奏和顿数固然是民间的形体，但其顿与《词律》所载，多有一致。每首歌的主体组成部分是前面的七言四句，其平仄颇似一首相当规范的七言绝句，大体押的是古韵；大体也讲究"二四六分明"。而四句之后，再缀上一句收束。这一句往往阐明题意，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和民间的"五句头山歌"又颇相似。不同处是末句前面，均有语气词"呀"陪衬。这一声"呀"是方便传唱的，久之，也就成了隆中山歌的"格律"。在唱完连贯一气、节奏较为紧迫急促的四句之后，"呀"的一声，舒缓语气，再作收束，使一首短歌唱来有张有弛，听来轻松舒畅。不言而喻，这种形式与隆中山歌的易于传唱，是很有关系的了。

《隆中山歌》的格式也不完全一致，其中字数、形式亦有略为变异者，如：

山上说话鸟崽听，屋里说话老鼠闻。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只有罐子可封口。呀，人口何曾封得成！

这说明民间歌谣，是可以因情而异，根据具体的需要变通的，绝不因辞害意，千篇一律，拖住形式不放，死守一个格局。

隆中山歌在表现手法上也和其他民间文学作品一样，丰富、多样，调动了各种手段。它的形象无比生动，有声有色；它的比喻无比贴切，特别自然，多借物起兴，烘云托月，说明事理，深入浅出。时而夸张，展开理想的翅膀；时而实话实说，纯朴得如同促膝谈心。时而运用反语，寓深意于反衬之内；时而无比诙谐，隐含蓄于幽默之中……这一切手法，都运用得没有痕迹，是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无怪歌谣如此亲切动人了。"用最朴素的形式表达最朴素的感情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隆中山歌的另一种类，读后却使人想起我国历史上经过文人润色、仿作的竹枝词来。如这首《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少年子弟江湖老，班班辈出自非轻。呀，且把前头说后生。

这是多么接近那调门凄婉动人，笔触轻俏流丽的竹枝词呵！也许这就是民间歌谣曾经文人染指留下的痕迹吧。但从整体看来，隆中山歌却是比历代竹枝词更

为纯粹的民间创作，它之所以比竹枝词更易于民间口头流传，也许这是一个重要的缘故吧。

四

《隆中山歌》的收集整理者魏显达（1780—1844），是前清道光辛巳举人，隆回金潭乡人。金潭，位于隆中地区中心，是一个长形小小盆地。这里四围皆山，山形如髻，树木扶疏，金水贯流其间。这个风光秀丽，包括“二十四景”的山村，一度人才蔚起，文风丕振。名臣显宦，当年竟不知多少。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源，即诞生于此。魏显达和魏源是堂兄弟，先魏源一年中举，二人过从甚密，在思想、文学上互相影响是肯定的了。

关于魏显达的生平、行状，《魏源师友记》一书介绍说：

显达，字南杰，又字筠谷。举道光辛巳分试第二，与默深为再从兄弟。默深亦以壬午举顺天乡试第二，人以为难也。显达好学深思，为文回异恒流，诗发抒性情，五言犹有淡远之致。性朴质，能强记。尝与新化邓显鹤北归登泰山，车中诵工部齐鲁间诗殆遍，不遗一字。显鹤为赠诗云：“山川能说重当时，舍子多闻定语谁。敖具名嫌原不庋，绎蒙形似更无疑。眼中历历奚自颂，耳底琅琅杜老诗。试问牟嬴征五汶，《水经》、《地志》得重披。”其推挹如此。显达兼善医，所治甚众。生平精明浑厚，不以利禄婴心，布衣粝食，淡泊如也。卒年六十四。著有《筠谷未定草》。《默深清夜斋手录》诗稿有《春雨柬筠谷兄》一首，《古微堂诗集》中有《村居杂兴呈筠谷从兄》十四首，今不录。予避乱隆回时，其曾孙旭兰告我：“家中原藏默深公与显达公手札甚多，惜不幸房屋失火被焚。”真可惜哉[4]！

以上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没有中过进士的魏显达举人是一位“好学深思，为文回异恒流”的饱学之士。他不仅读书能强记，诗也作得很好，“五言犹有淡远之致”。

魏显达和魏源一样，都是享年64岁，他的中举时间也和魏源相仿（仅早一年），他和魏源是同时期的人了。我们设想魏显达搜集整理《隆中山歌》的时间大致在他中举（道光辛巳，即1821年）前后，距今也有180余年了。而《隆中山歌》诞生的年代当然还要早些。魏显达只是把早具雏形，已经流传开来的山歌搜集起来，去芜存精，略加整理而已。他的整理是成功的，颇合今日“三性”要求，群众的检验证明了这一点。整理后的《隆中山歌》更为群众所乐于接受，一时家喻户晓，人人传唱，隆中一带男女老少，莫不视《隆中山歌》为随身瑰宝。

魏显达整理《隆中山歌》的成功，因素很多。《魏氏轶闻》说他整理的山歌“殆本三百篇之遗旨，以立言者耳”[5]。《隆中山歌》最后一首也点明了他的本意：

听我歌来一条条，俗言浅近意深遥……呀，传与隆中作土讴。

这都说明，他搜集整理这些歌谣，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山歌无假戏无真”，他要将表达人民大众真情实感的这些歌谣整理得语言“浅近”，寓意“深遥”，用来警世，向人民大众灌输真、善、美的情操。他不是为了抒发闲情逸致，借民歌做点文字游戏。尽管他的思想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他的努力还是卓见成效的。其次，魏显达的为人也是不同于一般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他虽然乡试高中南元，却仍“不以利禄婴心”；他虽然不是贫苦的知识分子，却能“布衣粝食，淡如也”。说明他和人民大众，从思想感情到生活方式，还是相通的。这，不能不说是他成功整理隆中山歌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此外，显达老人学识渊博，精通韵律，旧体诗词写得文采斐然，无疑也是他整理成功的一个因素。

魏显达是清朝湖南一位重要的著者，湖南省图书馆藏《湖南著者及其著述简表》中有“魏显达”条。但一直未见其作品传世。《隆中山歌》的发现，对研究魏显达甚至研究魏源的思想和文学，也许是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资料吧。

考察一下魏显达当年致力于整理《隆中山歌》的情况，有很多引人深思的地方。文人文学要吸取民间文学的乳汁，到今天还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课题。唐代诗人刘禹锡、白居易溶民间“竹枝词”精髓于笔端，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当代诗人李季、阮章竞吸收“信天游”等民歌的养料，也创作出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叙事长诗。试想，魏显达要是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去选取大众关心的题材，运用隆中山歌的形式，说不定能创作出比《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更为脍炙人口的诗篇吧？——这是题外的话了。

隆中山歌自魏显达搜集整理以后，风靡了一百余年时间，不愧为梅山文化中一颗熠熠闪光的艺术明珠。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隆回设县，官僚争权，社会动乱，民不聊生，隆中山歌渐趋冷落。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终至失传，濒临淹没了。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中，几经辗转奔波，终于发现了《隆中山歌》仅存的手抄孤本。加上零星搜集所获，共得二百余首。曾经流传过的《隆中山歌》，肯定不止此数，但其本来面貌亦重现风采，相当可观了。现在展读这份珍贵的艺术遗产，令人喜不自禁！它似一颗出土的明珠，跨越了时代的烟云，透过岁月的尘封，而愈见其光泽！“大抵选他肌骨好，不搽红粉也风流！”从《隆中山歌》可以窥见一斑。我们的民间文学这块瑰宝所放出的奇光异彩是多么叫人惊叹啊！

【参考文献】
[1]《魏氏轶闻》（魏寅著，1944年唤民书局出版）卷二，第3页。
[2] 葫飘：方言中指水葫芦等。
[3]“踩得石壳打泡泅”：隆中方言。石壳：石头；打泡泅：游泳。
[4]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卷之一，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1页。
[5]《魏氏轶闻》卷二，第4页。

创新求变

——杜甫湖南诗歌的重要特色

熊治祁

杜甫从大历三年（768年）暮冬来到湖南，至大历五年（770年）秋冬之际病逝于潭岳之交，总共两年的时间，创作了100余首诗歌，为他的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这100多首诗歌一如诗人前期的作品，内容上关注现实，忧国忧民，艺术上运笔如椽，沉郁顿挫，是杜诗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本文不拟一一引述。我们要探讨的是，杜甫生命的最后两年，仍然在创作上努力追求创新，追求变化的具体实践。以下从五个方面略作论述。

第一，创七排拗体。

七言排律创自杜甫，诗人一生总共只写了四首，其中的《清明》二首是在湖南写的。七排确实不易写好：篇幅上要长于七律，而格律的限制又必须严格遵守。七古却可以不管这些，是否可以考虑把“七排”和“七古”两种体裁的一些特征结合起来写呢？杜甫在这方面作了尝试，他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便是一首这样的诗。题曰“行”，当然有别于“律”；谓之为歌行，又有严格的对仗；谓之为排律，在句法和行气方面，又具有歌行的特点。王嗣爽奇怪“类编者不入排律何耶”[1]，其实这是尊重杜甫自己的意见，理当不载于七排类编之中。因为此诗结合了两体的特长，又不讲究某些限制太死的要求，既能排比整齐，又显得挥洒自如，所以成为一种新的诗体。施鸿保说：“《岳麓山道林二寺》，亦此体（七排）拗者。”[2]即把它叫做拗体七排，后来仿作此体的人很多。《钱注杜诗・唱酬题咏》就收录了好几首这样的诗。苏轼也曾屡效此体，如《游博罗香积寺》，学此体可谓得其神似，可见此体有一定影响。

第二，对七古一体进行了新的试探。

七古这种形式，杜集中的名篇佳作极多，但他入湘以后所写的七古中，有两

首却与一般的七古不同，这就是《夜闻觱篥》和《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第一首只有八句，全用七言，起首四句是押仄韵，后四句用平韵，除首联外，全都对仗工整。诗的后半是："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这完全是用的仄起式首句入韵的七律体前四句格式，平仄相符，对仗基本相合。这样的七古确实是别开生面，是诗人努力进行新的探索的体现。第二首，题中有"率尔遣兴"的话，就是说写诗的时候没有过多地受拘束。诗人其他的七古，一般总是在诗意变换的时候就转换韵脚，使感情的变化和音节上的转换结合起来。这一首七古却不然，而是如仇兆鳌所说："用韵错综，有换意不换韵处，有换韵不换意处。"此诗依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划为四段：首段押入声屋韵；二段首四句亦押屋韵，以下押平声真韵；三段首四句亦押真韵，以下押仄声纸韵；四段首六句亦押纸韵，最后四句又换成平声韵。段与段之间都是意换而韵不换。除第一段之外，每段都转换一次韵脚，第一段是仄声，二段先仄后平，三段先平后仄，四段又先仄后平，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有错落。"晚节渐于诗律细"，洵非虚语也。

第三，以别具一格的诗风，为诗向词演变提供了过渡的情采。

如《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就具有纤浓绮丽之致。诗云：

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
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
吹花困懒傍舟楫，水光风力俱相怯。
赤憎轻薄遮入怀，珍重分明不来接。
湿久飞迟半欲高，萦沙惹草细如毛。
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劳。

此诗一般不太为人重视，但有些行家却高度评价其特点和意义。王嗣爽称它"纤巧浓艳，遂为后来词曲之祖"[3]。刘体仁谓其"词之神理备具，盖气韵所至，老杜亦忍俊不禁耳"[4]。将此诗分作三段来看，很像三首绝句，合在一起来看，又是一首七古。但诗人自己说是"戏为新句"，足见他没有视之为当时流行的一般诗体。既然有人说像词，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此诗哪些地方具有词的特点吧。

众所周知，词特别讲究体物的细微和精工。此诗的这一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所以浦起龙称赞诗人"体物微妙，毫端活泼，不虞老境擅此冶情"[5]。王嗣爽又说：此诗摹写物情，"皆从静中看出，都是虚景"[6]。这里提出的"静"字很重要，刘勰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7] 刘永济先生在论词时也说："刘君虚静之论，尤为扼要。"[8]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想见诗人静坐舟中，凝神视物，物我交融，

情兴顿生，故发而为诗。其间体物之微，可谓臻于化境。那春寒细雨中的疏篱，一江碧水中的桃影，那被春风倒吹而向上游缓缓移动的花瓣，还有那将要落入舟中的飞花，一齐摄入了诗人的生花妙笔之中。从"困懒"二字中，令人仿佛看到了飞花在阵阵春风中轻飘微荡的神态；从"湿久飞迟"中，又依稀看到那忽高忽下的飞花身上的雨痕。诗人简直不是在用眼观物，而是用心观物了。诗中"倒吹"、"困懒"、"飞迟"以及"萦沙惹草"等动态，皆为春风所致，又都是诗人"一一从舟中静看"的结果。透过诗人的"静看"，透过他渲染出来的闲静的画面，我们还会发现其中有"我"在。你看，"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不是象征着诗人的身世和遭遇吗？"赤憎轻薄遮入怀，珍重分明不来接"，不是比喻诗人高尚的情操吗？而最后两句，见出花当零落之时，终为物情所弃之意，不正是垂暮之年诗人的自身写照吗？"似花还似飞花"，直可移之以评此诗。张惠言说："词境以深静为至。"[9] 所谓"深"，就是境中有情，境中有我，使读者能透过诗人创造出来的意境，生出层层联想；所谓"静"，当是指静中体物的细微精巧。杜甫此诗所创造的意境，正是张惠言所说的"深静"的"词境"，也体现了王氏所说的"纤巧浓艳"的特点。"碧水"、"红花"，着色何等艳丽。诗中不用"生憎"而用"赤憎"，也可能与设色有关。碧水、红花与蜜蜂、蝴蝶、蜻蜓同时入画，以新颖别致之用语写其动态，构成了纤巧与浓艳相映成趣的美感，而这正是婉约派词人所追求的美的极致。

因此，王氏和刘氏称之"为后来词曲之祖"，"词之神理备具"，并非率意之论。我们切莫轻看"新句"二字。1400 多首杜诗，自谓"新句"者，仅此一首；写景状物之细腻，风格之纤巧绮丽，也仅此一首。这的确是杜诗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第四，以清新秀丽的笔调摹写自然山水。

杜甫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曾经有计划地写过两组以描写山水为主要内容的纪行诗一共二十四首，历来评论家对这两组纪行诗都赞不绝口，但于湘中纪行的诗却重视不够。其实，湘中纪行诗同样是绝妙的大自然的赞歌。不过秦蜀纪行诗具有"突兀宏肆"[10]、"雄奇崛壮"[11] 的特点，而湘中纪行诗却以清新秀丽的风格为主。试看其中之一的《祠南夕望》：

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
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诗人用一个"牵"字，很好地表现了视觉感受到的流动感。"江色"本来不

可以“牵”，但江水是流动的，诗人乘坐的小船在走，他的视线也在移动，所以觉得江色也被竹缆牵着在走。王船山很欣赏这个“牵”字，谓“牵字幻妙。然于理则幻，寓目则诚，苟无其诚然，幻不足立也”[12]。如果不是视觉有这种感受，如何想得出“牵”字来？诗中有碧绿色的江水，西斜的红日，还有云沙、春竹、暮花，这些形象共同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面对着眼前的美景，回望经过的湘夫人祠，诗人仿佛见到了屈原所咏唱的“山鬼”和“湘娥”。他随手拈出“迷”、“倚”二字，就把神话中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令人们又一次领略了《九歌》中“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和“搴芙蓉兮木末”，“搴汀洲兮杜若”的境界，使本已幽丽多姿的画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湘中纪行诗，与秦蜀纪行诗之所以风格不同，大概是受“湖南清绝地”、“秀色固异状”的影响吧。如：“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南征》），“回塘淡暮色，日没众星嘒”（《宿凿石浦》），“和风引桂楫，春日涨云岑”（《过津口》），“寒冰争倚薄，云月递微明”（《宿青草湖》），“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入乔口》），“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发潭州》）等，皆格调清秀，极有韵致。更重要的是诗人善于根据不同的审美对象，以另一种笔触刻画自然风光。杜诗的风格多样化每为人赞叹，湘中纪行诗是他晚年追求风格多变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第五，不求章法的严谨，而又未失前期的风采。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来讨论呢？因为人们在评论杜诗时，总喜欢用“接缩宕收”、“安顿有方”的话，来说明杜诗的章法严谨，布置得体。但诗人入湘以后的某些作品却是没有细究章法，“不烦绳削而自合”。如大历四年春，诗人写了一首《送重表侄王评事使南海》的五古。此诗矢口而发，挥洒淋漓，前半像一篇精彩的传记，从头至尾都没有去写依依惜别之情，叙事也很别致，没有讲求条理规矩。故《王直方诗话》说：“叙事如老杜，《送表侄王评事》诗云：‘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从头如此叙说，都无遗。其后忽云：‘秦王时在座，真气照（惊）户牖。’再论其事，他人不敢更如此道也。”[13] 钟惺则说它是“无端无委，无转无接，首尾不应，细大不伦”[14]。这说明它与布置严谨、章法井然的《奉赠韦左丞丈》、《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又如《岁晏行》，有人斥为“杂乱无次”[15]，原因就是没有讲究什么章法，必若求之起承转合之类，则如人海求仙，何处寻觅？还有《咏怀》二首，方东树说它“虽次第无端由，要见一种感慨叹惜之情，终非他人所及”[16]，也正好说出了此诗任意挥洒、不究章法的特点。其实，这些诗的妙处，全在自然真率，不假雕琢，而又具

有沉郁顿挫的风格和博大精深的内容。若绳之以章法，必难寻其草蛇灰线。这些诗为什么能够做到不究章法而又未失前期风采呢？因为一个作家，越到后来，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创作经验，艺术造诣也更高，当他运笔挥毫之时，虽不苦求章法，但他的艺术修养、写作技巧自然会涵蓄其中，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杜甫在湖南写的这些不求章法严谨的优秀篇章，乃是他艺术上更趋成熟的标志，也是他入湘以后的重要收获。

穷愁潦倒，年迈多病，仍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不懈地创新求变，这正是杜甫湖南诗歌之所以与前期之作同样不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3] [6]《杜臆》卷之十。
[2] 施鸿保《读杜诗说》卷二十二。
[4]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5]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之三。
[7]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8] 刘永济《词论》卷下。
[9] 张惠言《蕙风词话》卷一。
[10]《杜少陵集详注》卷九引江盈科《雪涛诗评》。
[11]《杜少陵集详注》卷九引周明辅注。
[12] 王船山 《唐诗评选》卷三。
[13]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第 278 条。
[14] 钟惺《唐诗归》卷十七。
[15]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八引刘辰翁语。
[16]《昭昧詹言》卷八。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元结与浯溪

杨仕衡

元结，字次山，生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闰七月。卒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夏四月，终年53岁。他是河南鲁山人，天宝十二年，34岁中进士，曾任尚书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节度判官，两任道州刺史，后调任广西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他是唐代古文运动（即文学革新）有力的先行者，又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功臣。他率性方直，秉性真纯，上忧国家，下恤百性，积极济世，奔走万里，而浯溪就是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

一、元结与浯溪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结对祖国山水之美非常热爱，足迹所至，必寻找山水林泉一游。在游览中，如山水林泉尚未定名，必就其形胜而命名，并留刻诗文极度赞美。这种情趣，在历代文人中，元结表现得最为突出。自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开始，元结两次出任道州刺史，五次舟过祁阳，发现湘江边上一条无名小溪与湘水汇合处，三峰崛起，怪石嶙峋，嘉木葱茏，清幽秀俊，就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又“因自爱之故”，以“吾”从“氵”、从“山”、从“广”，命溪曰“浯溪”，山曰“峿台”，建庼曰“㢈”，合称“三吾”。并自撰“浯溪”、“峿台”、“㢈庼”三篇铭文，请篆书家季康、瞿令问、袁滋，以“玉箸”、“悬针”、“钟鼎”三种不同的篆体分别摩刻在溪畔石上。元结这三篇铭文，写景、抒情、议论三结合，有人说是上继郦道元《水经注》，下开柳宗元山水记的典范，评价很高。元结对“三吾”的命名，立意非凡，影响深远。因“吾”是代词，虽元结说“旌吾独有”，而实为“人皆得而吾之”的“天下公之”的“山川之胜”。故“次山私之，谁曰不宜”（吴大澂《峿台铭》语）。祁阳县城原名“三吾镇”，现在还有“三吾大厦”、“三吾酒家”，就因此而得名。

二、元结在浯溪寄寓营造

元结对浯溪胜境的营造颇具匠心，全是在以自然山水为骨干的基础上，随形相势，适当摆布，展开各种不同意趣的景点，充满诗情画意。有住宅叫中堂，是

浯溪的中心（即现在的陈列馆），中堂坐南向北，以示不忘故土；有客房叫右堂，是浯溪风光最幽美的地方。从中堂出元家坊过石门，下摩崖渡口，成为中轴线。左以水胜，溪碧江清；右以石胜，或悬崖峭壁，或小峰如笋。亭台磴道，巧布其间；竹树藤萝，掩映其上。

左面浯溪，溪口有钓台石、龙珠石；湘滨有唐扇和螺旋磴道。溪北有溪园，溪上有石渠，溪两岸皆杨柳。

右面峿台，有百步阶梯直上；台上有窳尊，尊旁有帘尊亭；台南有曲屏，“之”字磴道蜿蜒其中；曲屏东有“峿台铭石”，西有“一品石”。四周小峰，形成盆地，清幽宜人。所有建筑皆为砖木结构或竹棚茅舍，简朴别致，充分体现了元结生活质朴，胸怀淡泊，忠和俭勤，端正高洁的品格特征。

三、元结为浯溪打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品牌

唐大历六年(771年)夏六月，元结将他十年前任尚书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节度判官，领兵镇守九江时所撰的雄文《大唐中兴颂》，与志同道合、交往甚洽的好朋友、大书法家颜真卿合议，增改，定稿，并以大字正书摹刻于峿台崖壁。元、颜二公合作撰书此颂，自是珠联璧合，又最具权威。碑面高3.1米，宽3.2米，直行，自左至右书刻，共21行，332字，字大直径15厘米。颂文以“安史之乱”为借鉴，痛唐玄宗重色昏庸，恨孽臣奸骄毒乱，赞肃宗盛德之兴，喜群生万福是膺，表元、颜忠肝义胆，可传千古，可寿名山。因文章、书法、摩崖之石都非常绝妙，世称“摩崖三绝”，享誉中外。吸引历代名人纷至沓来欣赏丰碑，都留有诗词书画摹刻崖壁，使浯溪遂成遍崖密布、琳琅满目的露天碑林。现在浯溪还保存了摩崖石刻505方，其中唐代17、宋代116、元代5、明代84、清代92、民国9，还有不明时代的182方。高则悬崖峭壁30米，字大直径2.3米，低则溪畔崖脚，字小如蝇头，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全。所书则以诗词为主（现有诗词400多首），赋、铭、题记、联语齐备。其作者有唐以来的历代名家，还有清代越南使者5人都留有诗刻。既是书法石刻宝库，又是文学艺术殿堂，堪称诗山、画山、文字山。元结为后人留下了镶嵌在潇湘边上的一颗璀璨的文物明珠，让这千年文脉凝聚浯溪，孕育祁阳，惠及华夏，确实对后世奉献很大，影响深远，而且硕果累累。

据考证，祁阳自三国吴建县（257年）至元结居浯溪（766年）计509年，在这期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事很少记载。但是，从元结来后，吸引历代文人云集，有了浯溪碑林，开了文化之花，至南宋末才513年，祁阳英才辈出。科举考试，单从进士一科来看，北宋举行殿试40届，祁阳有28届被录取进士36人，其中榜眼1人（路振）；南宋殿试46届，祁阳33届被录取进士69人。从此祁阳政治、

经济、文化与首府永州并驾齐驱。自宋以后至今，尤为灿烂辉煌。

四、元结在浯溪留下了美丽的传说

元结在浯溪留下的美丽传说很多很多，如“镜石含晖”、“浯溪漱玉”、“唐亭六厌”、“峿台晴旭”、“窳尊夜月”都能令人由悦耳、悦目升华到悦志、悦神的境界。其中尤以“石韵金音”更体现了元结的思想精华，发人深省，激人端正高洁，以民为本，开拓奋进。元结在右堂（即客房）旧址留下一块长 1.5米，宽 0.7米，厚 0.3米的船形巨石，这一胜景叫“石韵金音”。只要用小卵石往石面任何部位轻轻一敲，就会发出金属般的响声，还可按不同音阶敲出悦耳动听的乐曲来。相传元结曾在此自吟《清廉美曲》，引来百鸟鸣琴，松声为之和韵，浪声为之拍板，连韩湘子也来吹笛伴奏。为何有如此反响？全是因为歌词内容太美了。其实是指元结写的《自箴》（规劝自己，当然也包括他人），其主题思想是弘扬“忠、直、方、正”四个字。而元结写《自箴》的来历，是当时有一个所谓识时务的人教元结显身之道，他说“君欲求权，须曲须圆”；“君欲求贵，须奸须媚”。还说：“不能此为，穷贱勿辞。”这个人说的是为“求权、求贵”，必须做到“曲、圆、奸、媚”四个字。而元结怎么说？“不能此为，乃吾之心。”元结有针对性地驳斥那个人，提出“必忠必直”、“必方必正”。元结还说：“终生如此，方为君子。”元结坚守“全德”、“全行”，必须做到“忠、直、方、正”四个字，直说得那人瞠目结舌，无地自容。诚然，这“忠、直、方、正”和“曲、圆、奸、媚”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哲学，在任何朝代都会同时存在。就说当今，也有因“曲、圆、奸、媚”而得志的人，当然是极少数，而且是投机的。我们为人处世，还是坚持“忠、直、方、正”为好。

元结不但自己坚持“忠、直、方、正”，而且他给三个儿子也以此取名：长子以方字友直，次子以明字友正，季子以仁字友让，意思是“忠、直、方、正”和“仁让”。如此清白传家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在元结看来，人臣有两种：一为“社稷之臣”，一为“禄位之臣”。在这两者之中，元结是以社稷之臣自勉和传家的。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借鉴、继承和发扬。

（作者系祁阳县浯溪文物管理处干部）

略述南宋湖南的爱国诗词

陈书良

南宋时期，湖南境内干戈不止，先是金军侵入，继而溃兵为害，最后又遭蒙古铁骑践踏，其总的特点是局势动乱。尤其是天崩地坼的“靖康之变”，给宋朝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悲愤成为了时代文学的主旋律。应该说，这一大事变对于湖南文学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锦绣富庶的衡山湘水变成了金戈铁马的烽火疆场，朝廷的孱弱怯懦，民族的奇耻大辱，身家的颠沛流离，强烈地烧灼着这一时代文人的心灵。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湖南文坛活跃了起来，奏出了以王以宁、乐雷发为代表的时代最强音。

词到南宋，经过长期的发展，题材不断拓宽，技巧日益成熟，与诗歌、散文一样，已经成为文人惯用的文学体裁。而由于靖康之变的巨大冲击，文人的悲愤心态也同样反映到词的创作中来。湖南词坛也不例外，据《直斋书录解题》，存目有湘潭钟将之的《岫云词》一卷、衡阳廖行之的《省斋诗余》一卷、衡山侯延庆的《退斋词》一卷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湘潭王以宁的《王周士词》。

王以宁（一作以凝）（约 1090—约 1146），字周士，湘潭人，以太学生为鼎澧安抚使幕吏。宋靖康元年（1126）征天下兵援太原，王赴澧州请兵，并率师往解太原围，遂官宣抚使。以后做过枢密院编修、显谟阁学士一类官。不久降监台州酒税，又谪永州别驾。绍兴十年复右朝奉郎，知全州。其词《王周士词》一卷在南宋即已流行。

王以宁的一生颇富英雄传奇色彩，而其经历行藏又折射到其创作中，使词风狂放豪宕，一如其人。徽宗时乃父因言事落职，当时是太学生的王以宁抗章申冤，由是知名。后佐鼎澧帅幕。在帅幕期间，尝遇“溪蛮啸聚”，王以宁“单骑入贼巢，羁致其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可见其为人之英豪胆气。宣和五年冬，王以宁为发运司管勾文字，其间与陈与义、张元干酬唱交游。他在《念奴娇·淮上雪》写“淮口烟林如织”的雪景及“射雉归来，铁鳞十万，踏碎千山白”、“云重天低酣歌罢，胆壮乾坤犹窄”的豪情逸志；《虞美人·宿龟山晚登秋汉亭》

则抒写了"明月三千里，幽人独立瞰长淮"的寂寞怀抱。

宣和七年，金兵入寇。靖康元年，王以宁应召进京，曾上书新任御史中丞，爱国之忧溢于言表：

方今天下，有堪忧者五，请为阁下略言之：盗贼充斥，一可忧；奸雄跋扈，二可忧；夏人陆梁，三可忧；契丹复振，四可忧；金国旅拒，五可忧。

叙忧国之心，献治国之策，慷慨陈词，作金石声。后入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李纲帅幕为参谋官，深得李纲信任。他曾献策自请出奇兵袭击金营，焚劫金人粮草，以挫敌之锐气，故时以"知兵"名世。更值得称道的是，在此期间王以宁曾亲与敌兵搏斗，擒敌百余人，表现了非凡的胆略。后李纲罢帅，王以宁亦被贬，居长沙。他在游览长沙水陆洲时写下了"岁晚橘洲上，老叶舞愁红"，"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郭，猎猎酒帘风"的佳句（《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他还描述了有客过访，宾主"得意忘年，推诚投分，高论追元白"的"英标逸气"及"浪吟狂醉"的生活（《念奴娇》）。

建炎四年，王以宁又被起用，兼任京西制置使，转战两湖。在邓州知州饯别酒宴上，王以宁临席挥毫，写下《满庭芳·邓州席上》，说"醉高歌起舞，唤起人龙。我自人间漫浪，平生事，南北西东。辞公去，寒眸激电，曾识小安丰"。激昂慷慨，立懦惊顽。同年九月，王以宁统军至黄州，登栖霞楼，发出"千古黄州，雪堂奇胜，名与赤壁齐高"（《满庭芳》）的浩叹，英风直逼东坡。

绍兴元年以后，王以宁遭言者弹劾落职，后又一贬再贬，壮志消磨。时诗人刘子翚赠诗云"舌在壮怀犹未已，途穷俗眼少相知"，可想见其状况。到十年后重新起用，他曾作《满庭芳》抒怀，曰："随分村歌社舞，何须问，武宿文星。忘怀矣，未能忘酒，相与醉忘形。"暮年心态，已转颓唐了。

王以宁和辛弃疾都是军旅词人，有相同的经历。他的词以豪放风格著称。无论是其观照方式、宏大境界，还是流动的布局结构，甚至对典故的选择，都显示出他对辛词的有意效仿。他也用心向贺铸学习，不过，往往写来有草率和粗糙之嫌，遣词造句比方回逊色。《王周士词》的精华表现在一部分怀古感时及吟咏人生情怀的作品上。前一类以《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最为著名：

岁晚橘洲上，老叶舞愁红。西山光翠，依旧影落酒杯中。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郭，猎猎酒帘风。远水湛寒碧，独钓绿蓑翁。怀往事，追昨梦，转头空。

孙郎前日，豪健颐指五都雄。起拥奇才剑客，十万银戈赤帻，歌鼓壮军容。何似裴相国，谈道老圭峰。

此词上片再现了南宋时长沙古城的风貌，历历如画。下片叙及孙策、裴度等

历史人物，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表达了作者以英雄自许、追求个人生命辉煌的壮烈情怀。

在吟咏人生情怀的词作中，以《水调歌头·呈汉阳使君》和《念奴娇·淮上雪》最为出色，前一首如下：

大别我知友，突兀起西州。十年重见，依旧秀色照清眸。常记鲒埼狂客，邀我登楼雪霁，杖策拥羊裘。山吐月千仞，残夜水明楼。黄粱梦，未觉枕，几经秋。与君邂逅，相逐飞步碧山头。举酒一觞今古，叹息英雄骨冷，清泪不能收。鹦鹉更谁赋？遗恨满芳洲。

这是一首与朋友酬酢之作，作者一扫世俗之气，糅进了吊古伤今。起句写大别山极有气势，其他语句写得挺拔秀丽，有刚健之致。收尾几句着重写对祢衡的同情，并寄寓自己怀才不遇、"英雄骨冷"的"遗恨"。从词中可以明显看出辛弃疾一些长调壮词的痕迹，只是王以宁写得更粗豪一些，表现了强烈的追求壮大雄阔之美的倾向。《念奴娇·淮上雪》则是宣和年间，作者赴真州任发运司管勾文字时所作，写淮水舟中赏雪的情景，上片描绘、茫茫大雪中淮河岸边的景色，下片笔锋一转，遥想北国的友人在雪中行猎纵饮的情况：

遥想易水燕山，有人方醉赏，六花如席。云重天低酣歌罢，胆壮乾坤犹窄。射雉归来，铁鳞十万，踏碎千山白。紫箫声断，唤回春满南陌。

写友人冒雪射雉的壮游，实则是抒发自己"胆壮乾坤犹窄"的豪气。全词声情摇曳，雄伟奔放，回肠荡气，富有力度，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概。

王以宁还有一些短调，呈现出淡雅清新的韵味，如《临江仙·和子安》：

眼看西园红与紫，年来几度芳菲。吾生四十渐知非。祇思青篛笠，江上雨霏霏。饮酒但知寻夏季，不须远慕安期。丹成仙去是何时？龟藏何必学，春日正迟迟。

这类词作，又与贺铸近似。显然，这只是一时的忘情，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王以宁是南宋豪放派的重要词人，也是一位不为写词而写词的词人。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着王以宁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他的词与辛弃疾、张孝祥、陈亮等人的词作一样反映了当时的时艰国耻，寄托了一代士人的悲愤、追求和理想，奏响了南宋词坛的最强音。

乐雷发较王以宁晚出，王以宁工词，而乐雷发以诗闻。他们的共同点是豪放慷慨，各自以其作品擂响时代的战鼓。

乐雷发，字声远，宁远人，博学多闻，擅长诗赋。南宋宝祐元年（1235），门人姚勉以词赋擢为第一，上疏请求让给老师。理宗亲自考试乐雷发八事，对答切直，赐特科第一。后因数议时政，没有被采纳，竟不出仕，归隐雪矶，人称"雪

矶先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人品颇高”，其诗“风骨颇遒，调亦浏亮”。著有《雪矶丛稿》五卷，今存诗150多首。

乐雷发经理宗廷试八事而赐状元及第，从而赢得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这种出身对于他的人生理想很有影响，他始终关心时政。在廷试八事中，他对理宗恳切陈词：“苟有一语可裨时政，虽然不恨也。”这种时时想要参政治世的雄心壮志，在其诗歌中大量体现。如当时卖官严重，官场腐朽，兼之楮币发行过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乐雷发发出了“学校文章如画饼，朝廷官爵似呼卢。春吟应欠梅花在，时事曾言楮币无”（《寄吴茂远》）的讥讽。对于濒临崩溃的经济，他在《逃户》一诗中，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租帖名犹在，何人纳税钱？烧侵无主墓，地占没官田。边国干戈满，蛮州瘴疠偏。不知携老稚，何处就丰年？

诗人独具匠心，以“逃户”为题，以“逃户”为线索，在全诗中却未写一“逃”字，但诗人深沉的笔触已写出“逃户”的奔亡情景，已抨击了时政之弊端，揭示了南宋王朝内外交困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困苦。南宋时理学声势极盛，面对日益加剧的外来侵略，不少文人却空谈性理，不切实际。对此，乐雷发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写下了“励志发愤”的歌行《乌乌歌》：

莫读书，莫读书，惠施五车今何如？请君为我焚却《离骚赋》，我亦为君劈碎《太极图》。揭来相就饮斗酒，听我仰天歌乌乌：深衣大带讲唐虞，不如长缨系单于；吮毫搦管赋《子虚》，不如快鞭跃的卢。君不见，前年贼兵破巴渝，今年贼兵屠成都。风尘澒洞兮豺虎塞途，杀人如麻兮流血成湖。眉山书院嘶哨马，浣花草堂巢妖狐。何人笞中行？何人缚可汗？何人丸泥封函谷？何人三箭定天山？大冠若箕兮高剑拄颐，朝谈回轲兮夕讲濂伊。绶若若兮印累累，九州博大兮君今何之？有金须碎作仆姑，有铁须铸作蒺藜。我当赠君以湛卢青萍之剑，君当报我以太乙白鹊之旗。好杀贼奴取金印，何用区区章句为！死诸葛兮能走仲达，非孔子兮孰却莱夷？噫，歌乌乌兮使我心不怡。莫读书，成书痴！

“乌乌”即“呜呜”，可能是秦地的古歌曲名。乐雷发在这首诗中用跌宕生动的笔法在鞭挞无益国事的理学先生的同时，抒写了自己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以及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全诗显得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曹廷栋编辑的《宋百家诗存》说乐雷发诗“雄深老健，突兀自放，南渡后诗家罕此标格”，就是指的《乌乌歌》这类诗。

乐雷发主要生活在蒙古侵凌日厉的年代，南宋王朝的覆灭阴云已笼罩在江南上空。而对一部分民族自尊心尤其强烈的士大夫来说，收复失去的疆土，为国家

和民族洗雪耻辱，解救在金国和蒙古铁蹄下挣扎的同胞，是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会放弃的心愿。乐雷发通常受到抑制的激情，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当然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宣泄。在《胡料院出示车攻图仍索俚作》中，他从偶尔经眼的古代车攻图，想到了千里以外的幽燕失地：

……今朝朱幡富川头，绝江以北瞻神州。李纲政要讲车战，南渡勋业应可收。泾水黄，铁山碎，双轮快辗幽燕地。

他还从苦瘴待雨的农事中，联系到“且寻农耒耕湘雨，待看天戈洗鞑尘”（《归侍》）；在听友人谈论蜀中与蒙古军的拉锯战事后，他慨叹“鞑智岂应强兀术，蜀材正自欠吴璘。细吟猛虎长蛇句，空对西风泪满巾”（《听友人谈蜀道事》）；在读了友人北行的诗稿后，他止不住想到“书生亦有中原志，那得君王丈二殳”（《题钟尚书北征诗稿》）。总之，乐雷发的诗歌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声。

乐雷发一生郁郁不得志。先是在理宗即皇帝位的宝庆元年，宰相史弥远为压制知识分子的不满，一手制造了江湖诗案，而诗案又直接牵连到乐雷发。以后他及第后，刚踏足仕宦场中，又因数议时政，不被采纳，只得归隐雪矶。因此，他的一些诗中，常常融合了对于时代的衰颓没落和自己的怀才不遇的感触。他清楚地看到“汉廷用少臣今老，鲁俗皆冠我独髽”（《闲居自遣》其一），从而以“谁言荆楚多奇士，却笑乾坤一腐儒”（同上其二）自嘲。对于一些诽谤，他认为“事可语人甘受谤，诗能名世不嫌穷”（《呈姚雪篷使君》）。而急剧恶化的局势和自己的被冷落闲置，又令他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应有楼兰国，空锁吴钩到白头”（《寄许介之》）。

据乐雷发《雪矶丛稿自叙》说，他“好作诗。早游诸老之门，或谓可与言诗”。乐雷发从幼年起就酷爱文学，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从屈原的《离骚》，直到稍早于他的大诗人杨万里、陆游的作品，都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因为《雪矶丛稿》曾收入《江湖小集》，故有些人（如钱钟书）认为乐雷发仍落在江湖一派的圈里。其实这种看法是有片面之嫌的。从狭义上说，所谓“江湖诗派”，指的是南宋宁宗、理宗年间，杭州书商陈起以富商兼诗人的身份，出资陆续刻印了许多同时诗人的集子，合称《江湖诗集》，后又有“续集”、“后集”和“小集”，后人以江湖诸集内诗的风味相似，故称之为“江湖诗派”。从广义上说，所谓“江湖诗派”囊括了南宋中后期的整个诗坛。从诗集被刊入《江湖诗集》而本人与陈起等并无来往的姜夔到永嘉“四灵”，从名列集中的刘克庄、戴复古等中坚人物到并未名列集中的方岳等，人数众多，情况复杂。他们大多流宕江湖，对诗歌的抒情性比较重视，因而试图张扬晚唐诗风以反对江西派流弊，而提倡一

种清丽尖新的诗歌风格。其得失成败，见仁见智，因人而异。乐雷发虽名列《江湖小集》，但其诗风雄深老健，实在不同于江湖末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雷发人品颇高……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道，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应该说是中肯之论。

在艺术风格上，乐雷发的诗歌属于慷慨豪迈一派。他的那些感怀世变、苍凉悲愤的作品使人联想到杜诗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光彩。如“今日江山劳别梦，他年灯火课新功”（《发潭州怀雪篷姚使君》）；“如今世事漫头雪，破屋孤灯忍冻吟”（《赠吴季诗》）；“酒边豪气横荆楚，灯下清谈杂晋唐。天地每穷真俊杰，山林偏有好文章”（《许介之馆仆于东溪临发赠别》）……都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错综在一起，写得慷慨悲凉。特别是《送丁少卿自桂帅移镇西蜀》：

琼海收兵玉帐闲，又移斋舰泝涪湾。三边形势全凭蜀，四路封疆半是山。魏将旧闻侵剑阁，汉兵今欲卷函关。细倾瑞露论西事，想在元戎指顾间。

在有限的篇幅中成功地使用了双线条描写法：以丁少卿移帅西蜀为主，兼及宋室讲军三京，用天下大势衬托丁少卿治蜀，又以丁少卿治蜀推及天下大势，既配合得当，严密无间，又沉郁慷慨，荡气回肠。此诗写在金亡以后、元兵南下之前，代表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恢复中原的乐观情绪，因此诗篇意境开阔，情调昂扬，有一股掩抑不住的豪迈之气充溢于字里行间。

在乐雷发许多抒写日常生活情怀的诗篇中，则又常常可以看到既新颖精巧、又显得自然清丽的特点。如下面两首诗：

飞飞绿凤挂梅梢，犹记来时雪拥袍。今日归舟新淦路，檐头稚子卖樱桃。（《新淦偶成》）

儿童篱落带斜阳，豆荚姜芽社肉香。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蛉伴绿螳螂。（《秋日行村路》）

作者主要采用了白描手法，由事物本身显示其美，和美融洽、委婉含蓄地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这种从景物写出自己的心情，用意是深刻的，语言却很清新。这些都吸收了江西派之长，而避免了江湖派之短。

南宋时期，北方尽失，宋室疆域仅囿于江淮以南半壁河山，而湖南犹如一道雄伟的屏障。有不少名臣大将任职湖南，其中不乏著名文人，如向子諲、张孝祥、辛弃疾、周必大、朱熹、真德秀、魏了翁、张栻、文天祥等。他们不仅在湖南留下了卓绝的军政治绩，而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以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多样的艺术风格，把南宋的湖南文学引向更广阔更激荡的社会现实，因而他们在南宋湖南文坛享有崇高的声誉。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赘述了。

元代永州路儒学述略

汤 军

元代永州设路，在省道之下、府县之上，其官立学校称为路学。元代永州路的儒学建置，经始于元贞元年（1295），终于至顺二十七年（1356），历任守官前后相承，毫无懈怠，体现出蒙元对于教育的重视。永州路儒学的活动集中在大德、延祐及至正年间，与元代科举制兴废的时间相合，反映了当时教育与科举的联系。

元代永州路隶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岭北湖南道。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敕荆湖行中书省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人克潭州，屠衡州。阿里海牙传檄湖南，州郡相继悉降。二月，元人分命诸将镇之。阿里海牙遣使徇全、道、永、衡诸郡，其守臣皆率民来迎，曰：‘闻丞相体皇帝好生之德，所过秋毫无犯，今复见太平，各奉表来降。’”（道光《永州府志·事纪略》）是岁，元置永州安抚司。至元十四年（1277），改安抚司为总管府。

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江南各路儒学提举司。时江南诸县各置教谕二人，又用廷臣议，诸道各置提举司，设提举儒学二人，统诸路、府、州、县学祭祀钱粮之事。”（《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至元二十八年（1291）“春正月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

永州学校创始于唐代，大中年间韦宙刺永州，因潇西红蕖亭为夫子庙，后迁愚溪。宋至和间，知州柳拱辰移建学校于郡城东门内东山之麓。嘉定间知州赵善谧徙而下之，创讲堂、御书阁。绍兴间，知州王佐请于朝，乞诗书几千卷藏之御书阁，又于讲堂前列四斋，别立一斋于东以为宗子，西南为射圃。端平间，知州赵希棪复增广之，教授皮龙荣增刊文籍于御书阁，以文庙前有石如双凤，建双凤亭于台下。永嘉间，木天骏知永州，于学校立先贤祠。开庆间，元军自广西北上，学校书籍焚失。景定间，教授吴之道再增置之。（道光《永州府志·学校志》）以上为永州学校在元代以前的建置情况，入元后当多因其旧。

一、元初永州路儒学的建置

至元三十一年（1294），樊炳任永州路总管。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宣谕郡邑大修孔子庙”。至大德二年（1298），“宪佥哈散与樊守即万桂亭旧址筑杏坛，坛之上立燕居堂。于射圃基建亭曰思乐，复先贤堂于护学祠左，率诸生捐金市铜范铸祭器，更御书阁匾曰稽古。教授屈以伸重修礼殿，即讲堂左□正录位为教授厅”。（洪武《永州府志·学校》）时教授为黄霖龙。

关于范铸祭器一事，张山翁作《祭器记》以记其事。记中云：“樊明甫刺永之三年，毁淫祠，崇明祀，治教一机，顾礼器□窳，非阐正学以辟异端之具……侯募工于庐陵，市贡余于九牧，按博古款识□行考订，俾郡博士黄霖龙董其事。范尊罍豆洗□□簠簋二百四十有二，笾俎篚幕亦一新之，靡楮□二千五百缗有奇。”

同年十二月，张山翁另作有《杏坛记》，记中云：“岁在□□，樊明甫来合符，通值阴渗流行水失性，荡民田舍，侯发廪三万余斛，分命官吏拯救无昏垫之民。俗鬼□□，惟巫觋是听，虽竭产不悔。侯毁非祀典之祠八百余区，以觋代产，去者役无奇衺之民。侯曰：‘此吾政之当为尔！于教化乎何有？修学范金，幸有余力，命建杏坛，卜日兴功，基以文石，使士得阳明之具，以消阴浊之气。’”

樊炳所建思乐亭、燕居堂，教授黄霖龙作有《思乐亭记》以记之。记中云：“思而后好，好而后乐，此思乐之名所由立也。抑斯地也，旧云射圃，草莽榛棘三十余载。总管樊炳因杏坛告成，欲创一亭，为登临憩息之所而未得，环视四顾，即兹地而基之。躬图度，授成规，其用心亦至矣……又崇建燕居堂于杏坛，观瞻俨若，如在左右，斯文益光明而俊伟。旁植嘉树，侑以松竹，郁然而阴，灿然而荣。”

樊炳，字明甫，冠氏人，至元三十一年（1294）授怀远大将军、总管、府尹。笃志儒道，明于经史。自下车廉以律己，严以驭下，戢贪暴，锄豪强，拯民瘼。重修路学，铸造祭器，二邑庠悉主而新之。毁淫祠八百余区，驱淫巫以代民役，每劝农谆谆以崇孝弟、厚风俗为意。三年间，官无黠吏，乡无游民，庭无嚣讼，狱无留冤，一时湖湘号为良二千石。当途屡以五事实绩荐之于朝，任满除湖南道宣慰副使。（洪武《永州府志·元朝名宦》）

二、延祐间永州路儒学的重修与创设

延祐初，“教授阳禼重修学门两廊，更创棂星门。三年（1316），达鲁花赤遇龙子思、学正孙稹，修燕居堂、先贤堂、护学祠，创采藻亭，更祭器库于讲堂右。正大小学于两廊之斋，仍以今大学与旧祭器库对设为正录位，创文昌祠于杏坛之右”。（洪武《永州府志·学校》）

另据洪武《永州府志·学校·儒学文昌祠记》：延祐三年“二月三日神降之日，

路悴高隆礼、经历张翼率诸生有事祠□□□□□□隘浅陋。经历公乃集与议，于旧祠之后增建正殿，助集费用，以身率先，越明年正月告成。栋宇翚飞，牕门疏达，阶陛峻严，庭除轩豁，仍以家藏蜀本贞像易塑圣容，迁奉新宫”。

延祐六年（1319），总管毛伯帖木儿、教授徐思敬，率僚属诸生捐金俸置乐器。七年，即殿前剏亭台，以为奏乐之所，简弟子四十人习焉。（洪武《永州府志·学校》）郡人邓桂贤作《大成乐记》记其事。记中云：“延祐五年，谕天下郡学春秋飨祀，皆得用大成乐。时永□承达鲁花赤遇龙子思奉议首倡其议，既而府尹中大夫毛伯帖木儿下□□□事，即谓郡博士徐思敬作乐制器，实朝廷重典，所不容□相与会。学帑弗支，于是再捐俸为之先，僚属暨邦人士乐翰以为助者翕如也。明年春，遣府史夏侯辉、郡士冠桂翁，往长沙鸠工考度式范式模，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罔不殚备。秋八月访□士安普为之师，简弟子员四十人，集公堂，旦暮相授受，留之两月，而八音克谐。复搏费制士服冠弁，粲然一新，乃季秋吉旦，陈俎豆以落其成，登歌在宫。”（《湖广图经志书·永州》）

至治元年（1321）九月，吴文彬作有《大成乐台记》，记兴修大成乐台事。记中云：“大成乐，郡侯中大夫毛公之始作也。殿前地窄不容陈大祀之乐，因筑台以广之。延祐七年七月丁巳兴役，募良匠辇巨石，累趾而参差相承，迭缝而上下相制，以畚以筑，以坚以实，讫成不拔之基。台之上，覆之以亭，缭之以栏，布之以板，坦然平夷。登降步趋，厥礼孔崇；博拊戛击，厥序孔肃。翕绎之音克谐，对越之心如在，严素王之显祀，旷历代之所无。”（洪武《永州府志·学校》）

毛伯帖木耳，延祐己未（六年）以中大夫任。在任数年，政平讼理，民怀其德。修理学校，创立乐亭，置乐器，功绩居多焉。（洪武《永州府志·元朝名宦》）

三、元末永州路儒学的建设与恢复

至正戊子（八年，1348），同知野先海涯、教授邓天骥，自礼殿两庑、应门、讲堂、斋舍、燕居殿、文昌祠，思乐、采藻亭咸修葺焉。至正庚寅（十年，1350），总管牛中、教授黄雷孙，绘塑两庑从祀一百有五位。（洪武，《永州府志·学校》）

教授黄雷孙作有《重修儒学记》记其事，记中云：“雷孙适承之典教事，侯仍进师生询学业，程课艺，勉励谆至。既又环视其山川瑰伟之势，栋宇壮观之盛，心窃喜之。俄而周旋庭庑，复见从祀先贤，绘容于壁，岁久尘涴，怃然曰：‘学制如是，而先贤未有像设，甚非所以崇明祀，妥神灵也。’访诸耆旧，咸以宫规逼窄为辞。先是通守野先海牙奉议增修黉宇，亦以从祀位像未备为慊。未几从事周兴，照磨雷炳联署幕职长，二宾僚皆一时文学之士，佥议允协，乃度地宜，定位置，东西序各为二列，累块为基，埏埴为像，辨服章以施采色，被冕旒而执圭璋，

侑食于列计一百有五位。学校士子之好义者，各助赀帑以相庸费，复于礼殿增饬四国公暨十哲先师神像，又于先贤祠别塑濂洛道学五贤。赓称工给，凡数阅月，厥绩用成。”

野先海涯，以阿里海涯丞相之孙，至正戊子（八年，1348）以奉议大夫任永州同知。在任多有政绩，修理学校，绘塑从祀。（洪武《永州府志·元朝名宦》）

至正甲午（十四年，1354），遭值兵荒饥馑，民多流亡，田粮失收，生徒教养亦废。若教授厅、米廪、会食堂、燕居、杏坛、天祥、思乐、采藻诸亭，颓圮不存。庚子（二十年，1360）之秋，祭器、乐器、礼服，又皆悉荡于兵，学田硗基，文典亦皆荡失。丁未（二十七年，1367）之春，湖广平章阿斯兰，从教授胡鉴之请，委学正刘積同宣使赵□率各处将帅，题助金谷，撤撤明伦堂、稽古阁新之。（洪武《永州府志·学校》）

教授胡鉴作有《修学重建明伦堂记》，记中云：“至正壬辰（十二年，1352）。红巾寇起，人民转徙，田土荒芜，租赋失收，教养无措，庙宇损坏弗称，□仰时无文翁、常衮之流，往往承宣者，视为迂缓不急之务，曾莫加省焉。庚子秋，今鄂省平章荣禄芳斋公，旬宣江汉，驻兵湘浒，阅武之暇，祗谒先圣，顾瞻殿宇罅漏，惕然于怀，乃捐己力，命工撤盖礼殿一新。其从祀两庑、棂星、应门、讲堂、斋舍、先贤祠宇，公虽有志修理，时以寇贼未宁，军用日繁，固弗遑暇。又六年丙午，鉴适承乏典教事，谨以学事为请，公慨然以为己任。丁未春，乃捐金出粟，命永郡同知那失儿汪承务董其役，经始于三月初吉，鸠工集材，撤讲堂重阁新之，轮奂雄伟，视旧有加。至于殿门斋庑，颠者扶之，罅者补之，墟者立之，瓦甓、黝垩、丹漆，靡不中厥度。俾学者讲肄有所，诚一郡之大观，一时之盛事也。是役之兴，凡所经费一出于公，固不可以缕数，而诸将帅又有慕义而乐助之者，工用亦甚博矣！在泮之士，莫不鼓舞感悦，咸请勒珉以纪盛绩。”

四、元代永州路儒学的布局

在元代，永州路儒学所创设和修复的建筑有棂星门、应门、文庙、大成乐台、大成殿、杏坛、燕居堂、文昌祠、明伦堂、稽古阁、先贤堂、护学祠、礼殿、教授厅、讲舍、斋舍学门两廊、思乐亭、采藻亭、祭器库等。然而元代永州路儒学的布局如何，现已难以考证。不过明洪武十六年（1383）所纂《永州府志·图》中有《永州路儒学图》。

据洪武《永州府志·学校》：“圣朝开国之初，诏天下府州县，成建学立师格，集生徒训诲。洪武辛亥（四年，1371），知府刘泰重修礼殿、应门、斋舍，甃砌泮池，翼以栏槛。戊午（十一年，1378）之夏，佥宪曹□建□辟天梯亭之故基，

中创堂屋三间，以为教授宅，匾曰登贤。左右翼以斋舍一十间，以为生徒归宿之所，仍辟射圃即思乐亭之址，改创为观德亭，复立文昌祠。壬戌（十五年，1382）之岁……于时重新置造祭器，创米廪于棂星门右之高阜，创祭器库于西庑之后，创公厨三间于东斋之后，宰牲房三间于厨房之前。”

由此可见，在入明后，至洪武十六年（1383）永州儒学创设无多，其建筑布局当多因旧制。况且元代永州儒学最后一次的修复始于至顺二十七年（1367）三月，次年即为洪武元年（1368），同年四月杨璟克永州。此时主持修复的胡鉴在入明后又继续任永州府儒学训导，所以《永州府儒学图》或可反映元代永州路儒学布局的情况。

元代永州路儒学的建置，从现有文献来看，其始于元贞元年，终于至顺二十七年，历任守官前后相承，毫无懈怠。特别是教授胡鉴，虽处末世，烽火四起，犹四处奔告，以兴学为务。另外，永州路儒学的建置集中在大德前后、延祐年间及至正年间。然而在大德前后儒学的建置，多因樊炳一人之倡而兴。延祐年间与至正年间的建置，则体现了一种延续性，这固然关乎守官之贤否，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元代科举制的兴废。元初世祖至元间，耶律楚材、史天泽、许衡等皆请行科举制，而事皆不果。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诏行科举，次年改元“延祐”。顺帝至元元年（1335），诏罢科举，至元六年（1340）又复行科举，次年改元“至正”。在元代，一方面科举的实行时断时续，另一方面其铨选多途，所以多认为教育与科举的关系相对松散。但由此来看，元代的教育与科举还是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明]虞自铭：《（洪武）永州府志》，洪武十六年刻本。

[2] [明]薛纲：《（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嘉靖原刻，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版。

[3] [清]宗绩辰：《（道光）永州府志》，道光原刻，同治重校，岳麓书社影印本，2008年版。

[4] [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

[5] 李治安、王晓欣：《元史学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船山后裔与船山遗著的刊刻传播

彭大成

王氏家族从明初迁居衡阳，至王船山已是第十一代。王船山兄弟三人，长兄王介之，次兄王参之，老三是王夫之，即王船山。王船山生有四个儿子，依次为王勿药、王攽、王勿幕、王敔，其中勿药、勿幕早逝。

王攽（1644—？），字曷功，王船山次子，系王船山元配陶孺人所生，“与弟敔齐名，著有《诗经释略》，诗不多见”[1]。王攽生有6个儿子：王夏，早逝；王生若，考取岁贡生；王生兹；王生苍，考取邑庠生，册名文园；王生蘧，考取邑庠生，册名大树；王生万，早逝。

王敔（1656—1730），字虎止，王船山第四子，系王船山继配郑孺人所生。据罗正钧《船山师友记》介绍：“虎止禀承庭训，学问渊博，操履高洁，时艺尤有盛名。年三十方应童试，与邵阳车无咎补旃、王元复能愚、攸县陈之駓桃文，称楚南四家。又有称楚南三王者，谓虎止与能愚及汉阳王戬伯谷也。潘书原先生宗洛视学楚南时，延之入幕，襄校试卷。与宜兴储大文六雅友善。《船山遗书》得入史馆，立传儒林，皆潘、储左右之力也。晚筑湘西草堂，学者多从之游。著有《蕉畦字朔》、《蕉畦存稿》、《芨云草》诸书，学者称蕉畦先生。雍正庚戌聘修邑志，力疾成数帙，归草堂而卒。”[2] 从以上简介中可以看到，王敔在清初湖南已有颇大的名气，曾与车无咎、王元复、陈之駓四人被并称为“楚南四家”，又与王元复、王伯谷三人并称为“楚南三王”。王敔也能根据全国已经统一、形势基本稳定的大势，对清政府不再采取敌对的态度，而是采取顺应与配合的态度，于30岁时参加童试，取得了岁贡生的初级功名，并加入了湖广学政潘宗洛的幕府，这就为宣传与推广父亲王船山的学术创造了最初的条件。如果不是王敔在船山逝世的最初一二十年就及时地将船山的部分著作推行于世，而是长期束之高阁，按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很难长期保存下来的。

正因为王敔的道德学问与士林名气取得了湖广学政潘宗洛的尊敬与信任，王敔又能审时度势有选择地进呈与时政无碍的部分船山遗著给潘宗洛及其后任学政阅览，引起了他们对船山学术的高度重视，并向朝廷大力推荐，因而使王船山得以列入清朝国史馆编纂的《儒林传》，成为清朝《儒林传》立传的第一人。而潘宗洛则是以省级政府高官（学政）为王船山作传的第一人。他在《船山先生传》中说：“先生子二人，曰攽，曰敔。敔字虎止，游于吾门，盖能绍先生之家学者。余不及见先生，慕先生之高节，欲尽读其书。敔曰：‘先人家贫，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书成，因以授之，藏于家者无几焉。’余所得见于敔者，《思问录》、《正蒙注》、《楚辞通释》而已。”[3] 潘宗洛在《传》中简要介绍了王船山艰苦卓绝的一生及《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宋论》、《春秋世论》、《春秋家说》、《张子正蒙注》等20多部著作，高度评价王船山是“故明之遗臣，我朝之逸民也”。这就为清朝国史馆为船山立传定下了基调，为船山思想的初步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罗正钧在《船山师友记》中说：“《船山遗书》得入史馆，立传儒林，皆潘、储左右之力也。”这与王敔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潘宗洛也十分支持与鼓励王敔回到家乡专门传承与光大其父的学问。王敔回到家乡后，通过授徒讲学、注释、刊刻船山部分遗著，以及自己著书撰文等各种方式来传播与弘扬父亲的学术思想。在他60岁的时候，先后从学的学生已有数十人。正是这些学生凑钱为他做了60寿诞，而且这笔寿金还够他重修湘西草堂，使他晚年有一个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来研究与整理父亲的遗著。也正是这批学生及亲友中较有经济实力的人捐资刊刻了部分船山遗著。据道光年间邹汉勋《致邓湘皋学博书》中说，在王船山逝世十余年之后，“虎止先生已刊行十余种于湘西草堂”。另据刘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谱》中的按语所记：“按《张子正蒙注》有虎止附注，《老子衍》有虎止纂注，《庄子解》有虎止增注，此外稿本，亦虎止辑录者居多，非独谨守遗书，不坠先绪也。”[4] 在王敔70岁的时候，他的门生们“复醵金如旧”，并为他刊刻了《小草》百篇。王敔对父亲思想的发扬光大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在感怀诗中说：“穆惟我先公，六经发蒙昧。子史析微芒，诗骚树宏帜。传书待其人，函井心无既。抚族慨凋零，综纬示苗裔。洪源谁嗣流，集木怀枝瘁。吉人深属望，世代传支系。物恒守家训，诵读培元气。四海皆兄弟，恭礼实连缀。一树紫荆花，忍使分荣悴。孟晋以逮群，仁者继其志。徒倚瞻山云，临风振凉袂。”[5] 王敔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作为船山之后的第一代传人，为船山学术思想的保存与初步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船山后裔中，另一个对刊刻《船山遗书》、传播船山学术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船山六世孙王承佺。清初康熙年间，王敔虽然刊刻了船山的10多种著作，但流传并不很广，特别是船山那些强烈反抗异族入侵、主张“夷夏之大防”的著作根

本不可能出版。在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高潮中，船山的著述还遭到多次查禁、销毁。船山的著述只能在衡西的穷乡僻壤中，在船山的后裔及亲友门生当中秘密流传，像不熄的火种等待着星火燎原的那一天。这种情况，终于在清朝道光年间出现了新的变化。

经过一百多年的民族融合，至清朝道光年间，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已有所缓和，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也已弛禁，随着湖南的一批精英人物开始崛起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为船山思想的公开传播，创造了良好时机。当时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贺长龄、太常寺卿唐鉴、湖北学政贺熙龄等一大批湖南政治上层人物，都十分提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他们的周围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学者名流。他们不仅自己著书立说，也十分注意搜集、整理、出版湖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如贺长龄就曾委托魏源主编《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挚友、新化著名学者邓显鹤尤热衷于湖南文献的搜集、整理，曾主编出版过《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等大量湖南历代名人的诗文。邓显鹤对王船山也十分敬仰，“尝慨然发愤，思购求（船山）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6]。正当他为找不到船山著述而十分苦恼的时候，在道光十九年（1839）情况出现了转机。他当时正在长沙编辑《沅湘耆旧集》，需要征求王船山的遗诗。一天，王船山的七世裔孙、家住湘潭的王世全与其友欧阳兆熊一同来访，不仅送来了船山诗集，还告诉邓显鹤船山六世孙王承佺家中藏有大量船山遗书，他可以想办法动员王承佺把遗书交出来刻印，邓显鹤“大喜过望”。由于王承佺献出了大量船山遗书，于是在第二年即1840年春天，开始在长沙大量开印《船山遗书》。这是中国历史上《船山遗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刊刻，为《船山遗书》“流遍海内”，特别是影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彭玉麟等一大批湘军人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次《船山遗书》的刊刻，王承佺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在后来王之春编撰的《船山公年谱》介绍船山后裔的名单中，在王承佺的名下特别注明：“搜公遗书，备尽心力。”[7] 高度肯定了王承佺对保存、搜集船山遗书的巨大贡献。这次刊刻《船山遗书》不仅规格高，而且动员的社会力量也很广泛。邓显鹤不仅亲自担任这次刊刻《船山遗书》（世称“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的主编，撰写《船山著述目录》、《王夫之传》，为了取得高层政治人物的支持与筹措刊书经费，他还亲赴金陵（南京）说动两江总督陶澍出面给予大力支持，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正是在邓显鹤的活动下，陶澍不仅为湘西草堂题写了“衡岳仰止”的匾额与楹联“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他还在《跋》中说：“衡阳王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谊介特，足立顽懦。新化邓学博来金

陵节署，言其后嗣谋梓遗书，喜贤者之后，克绍家声，因体额以寄。”[8]

不仅如此，邓显鹤还组织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编校班子。其“审阅姓氏”是：新化邓显鹤湘皋、鄞县沈道宽栗仲、道州何绍基子贞、长沙毛国翰青垣、湘潭吴淞半江。“编校姓氏”是：新化邹汉勋叔绩、湘阴左宗植仲基、善化汤彝幼尊、湘潭马敬之悔初、湘潭欧阳兆熊晓岑、湘阴左宗棠季高、湘潭罗汝怀研生、湘潭袁芳英漱六。“校字姓氏”：湘潭张凤佐子、衡阳蒋春恒笑山、衡阳王政仁山、六世孙承佺方渥、七世孙世全半溪、七世孙心田、七世孙世孝克顺、七世孙世熊梦祥。“督刊”：八世孙德润心广[9]。从上列名单可以看出，参加这次《船山遗书》编辑、刊刻的人员都是湖南当时的著名学者，且大多与未来的湘军领袖人物曾国藩有着十分密切的亲友渊源关系。

首先是主编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号湘皋，湖南新化人，他不仅与湖南近代第一代人才群体陶澍、唐鉴、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也受到曾国藩的敬重。曾国藩曾于同治二年亲撰《邓湘皋先生墓表》，对他整理刊刻湖南文献、弘扬湖湘文化的巨大贡献给予了热烈赞颂与高度评价。

担任“审阅”的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同样是湖南著名学者、近代大书法家，曾与魏源、邹汉勋并称为“湘中三杰”。何绍基于道光十六年中进士，历任武英殿主校、国史馆提调、四川学政，后任济南东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山长。何绍基不仅是魏源的挚友，也是曾国藩密友，与曾氏交谊达30余年之久。他参与审阅、编校船山遗著，无疑大大增加了这次刊刻《船山遗书》的声势。

“编校”邹汉勋（1804—1854），字叔绩，一字绩父，湖南新化人，系此次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的主要助手，是实际上的副主编，他亦因此而一举成名。邹汉勋于道光三十年（1850）中举，曾入云贵总督贺长龄幕4年，并于咸丰三年（1853）加入湘军，组织团练赴江西，帮助罗泽南解江忠源南昌之困（其胞弟邹汉章此时亦困于南昌城中），以功授知县，旋升同知直隶知州，是年十二月守庐州，城陷身亡。邹汉勋正是在1839年至1842年在长沙刊刻《船山遗书》期间，与左宗植、左宗棠兄弟密切交往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仅为船山遗著的编校、刊刻与左氏兄弟进行详细的磋商，还致信左宗棠，请左宗棠从藏书甚丰的陶澍家中寻找船山的《稗疏》四种寄给他。信中说：“向岁西归，吾兄南返，依黯之情，倍于畴昔，直以剪灯夜语，深聆衷表，钦迟不已，溯回弥切也。勋受船山后人之聘，校刊遗书，不为荒业，更可饫心，但一室块然，殊寂寂耳……陶文毅家闻有船山先生所著四种《稗疏》，恳因便借寄。”[10] 另据邹汉勋的儿子邹世繇所撰《显考叔绩府君行述》说

“（道光）二十年，应湘潭王氏聘，校衡阳二王遗书；二王者，贞献介之、船山夫之兄弟也。府君既校刊船山遗书经类廿有一部、史类三部、子类十有七部、集类十部，共五十有一部，都为三百十有一卷；又校贞献书五种。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仿朱竹垞《经义考》及《直斋书录解题》之例，勒为目录三卷。”[11] 可以说，邹汉勋是中国最早全面阅读并系统编辑船山著作的第一人。他为《船山遗书》的刊刻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辛劳。邹汉勋自己的著述也十分丰富，遗著达四百余卷，大半散佚。光绪年间，邹汉勋的儿子邹世繇“督其子代钧蒐辑甚勤，仅存什一”，编为《邹叔子遗书》，在时任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资助下，公开刊刻问世。左宗棠还亲自为《邹叔子遗书》作序，序中说：“先友邹君叔绩，读书好为深思。居高平山中，穷年兀兀，日对一编，不与世俗接，亦少朋侪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湖外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东南诸儒亦鲜足知之。晚举于乡，从江忠烈公守城杀贼，卒殉难庐州，死事甚烈，遗骸不可觅。余与曾文正公饬其孤世繇奉衣冠葬之……余持节度陇，代钧负其遗书视余肃州军次。余喜甚，畀以剞劂之资，饬代钧还山校刊。讫事，代钧仍以父命奉遗书来金陵，乞余为叙。”[12] 序中首先介绍了邹汉勋早年刻苦求学、自甘寂寞、穷年兀兀、孜孜不倦的高尚品德与可贵精神；也表彰了邹汉勋作为湘军烈士“殉难庐州，死事甚烈，遗骸不可觅”的悲壮事迹；还说明了是在他的大力资助下（“畀以剞劂之资”）使《邹叔子遗书》得以刊刻问世。序中最后满怀深情地追思：“回忆四十年前，碧湘宫畔，更阑烛灺，雨声断续，尊酒对谈时，仿佛如昨也。”[13] 而这段时间正是邓显鹤、邹汉勋开始编校《船山遗书》之时，也是左宗棠寄居在其兄左宗植长沙碧湘宫旧宅之时。当时邓、邹二人“皆与公兄弟交好，其时亦同寓居于此也”[14]。正因为邹汉勋与湘军领袖人物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与友谊，所以他的后人也颇受他们的关照与提携，他的孙子邹代钧，在光绪初年就被左宗棠保举为县丞；后又被两江总督曾国荃推荐为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的随员，精研西欧的地理学，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

“编校”左宗植（1804—？），字仲基，一字景乔，湖南湘阴人，湘军二号领袖人物左宗棠的二哥。道光五年（1825）拔贡，道光十二年（1832）中解元（湖南乡试举人第一名），选授桂东教谕，后改内阁中书。早年“以诗古文自豪”，曾与邵阳魏源、益阳汤鹏、郴州陈起诗并称为“湖南四杰”。他是最早预见并推重曾国藩历史作用的人：“宗植任内阁中书，祁文端公隽藻掌军机，深信其言。大学士赛尚阿视师广西，宗植独以为非宜，而言曾国藩足当大任，江忠源朴干任军旅，其后皆以功名显，由宗植发其端也。”[15] 左宗植为刊刻船山遗著同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邹汉勋致他的信中可以看到，船山数十近百万言的皇皇巨著《周易内传》就是经他复校的。信中说：“重九前接奉手书，并掷还复校《周易内传》，极为详密，已如示督解。”信中不仅详细报告了其他数种船山遗著搜集、刊刻的进展情况，而且特别提到他与欧阳晓岑为《读通鉴论》、《宋论》编校人选发生分歧的情况：“晓岑怂恿半溪，欲其陆续付梓。勋恐其不能为力，又身在局中，不便赞成。如何如何？”焦急请教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又“续寄上《礼记章句》一部，望拨冗校之”[16]。可见左宗植作为此次《船山遗书》刊刻的“编校”，是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的。

“编校”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懂医道。1840 年曾国藩在北京重病垂危期间，他曾精心治疗护理曾国藩达一个多月之久，救了曾的一条性命，二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他是道光年间邓显鹤主编《船山遗书》的重要参加者，也是船山后裔王承佺、王世全与邓显鹤之间的牵线人，相当于此次刊刻《船山遗书》的第二副主编，其实际作用仅次于邹汉勋。此次刊刻船山遗著，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也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船山思想与人格的伟大。所以，他早在咸丰元年（1851）就曾致信曾国藩，请曾出面上奏朝廷让船山从祀孔庙，被曾婉拒。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他又赠送曾国藩一套船山的《读通鉴论》，引起曾的极大兴趣，从而使曾国藩产生了刊刻船山全部遗著的心愿。可以说，正是在欧阳兆熊的精心筹划与大力推动下，才有了同治年间更大规模的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刊刻。据他在《重刊船山遗书凡例》中说：“《船山遗书》旧刻于道光二十二年，共成百八十卷，新化邹叔绩汉勋实司其役，兆熊时亦与校雠之事，流传未广，旋罹兵燹。幸先生裔孙在衡阳者，能守遗经。因请于勋伯中丞湘乡曾公（国荃——引者），出资重刊，广为搜辑，合以邹氏旧刻，计经类二十部、史类四部、子类十部、集类二十四部，都二百八十八卷。惟《四书训义》为先生口授讲章，姑从缓刻。”[17] 欧阳兆熊为刊刻金陵版《船山遗书》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始终将其作为一生中的最大事业全力以赴地加以完成。正如他自己所说：“此书开雕于同治甲子（1864），未及三载而事已竣。由安庆而金陵而扬州而长沙，俱以书局自随。一时江介名宿，分任审阅编校之役。卷帙既繁，事多急就，亥豕鲁鱼之弊，恐尚不免，阅者幸有以见教焉。”[18] 由于此次刊刻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全力支持，出版经费有充分保障，再加上有欧阳兆熊、刘毓崧、张文虎等一批学者名流的精心编校，此次刊刻的金陵版《船山遗书》无论在印刷的精美上，还是在刊刻的数量与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道光年间邓显鹤、邹汉勋刊刻的那套《船山遗书》，仅从遗书的内容方面看，就从当年的 180 卷增加到 320 卷，几近增加一倍，

从而使船山学说成为“流遍海内”的一时之“显学”。

“编校”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又字朴存，号亮白，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与其兄左宗植同时中举，后以耕读、教书为生，自称“湘上农人”。太平军起，先后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璋幕，主掌湖南军政实权，为曾国藩的湘军筹措军饷，保证了湘军的后勤供应。后自领一军，征战赣、皖、浙、闽、粤诸省，为剿平太平天国立了大功，于咸丰十一年（1861）授浙江巡抚，同治三年（1864）升闽浙总督，同治五年（1866）调任陕甘总督，先后剿平捻军与西北回民起义，后又消灭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并以武力为后盾协助曾纪泽从俄国手里讨回伊犁。1881年升任军机大臣，旋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885年逝世于福建抗法前线，系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领袖人物。1840年刊刻《船山遗书》期间，左宗棠虽只有举人身份，是陶澍家的私塾先生，但由于他得到陶澍的赏识，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而且还得到贺长龄、贺熙龄、林则徐等人的推重，成为名震三湘的当代“国士”。左宗棠名列此次编校之列，无疑大大增强了此次《船山遗书》编校的阵容与声势。

“编校”罗汝怀（1804—1880），本名汝槐，字廿孙，后改名汝怀，字研生，号梅根，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廷试不第，返湘主讲醴陵渌江书院。他是左宗棠青年时代的挚友，与邓显鹤、邹汉勋亦相交甚深，故能名列道光年间“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编校之列。他在书赠邹汉勋的《喜迁莺》一词前注明：“柬邹叔绩，时寓王半溪宅校刻《船山遗书》。”词中一段云：“时事关心，前尘回首，都是六州金错。可是遗书勘罢，更有伤春新句？谅犹记，趁寒鸦几点，城南闲步。”[19]表达了他对邹汉勋的真挚友情及其对《船山遗书》刊刻的关心。

“编校”袁芳英，字漱六，湖南湘潭人，道光进士，官至松江知府，在太平军围攻松江时城陷被杀。袁芳英与曾国藩交谊甚深，并结为儿女亲家，其子袁秉桢系曾的长女婿。他家境殷实，又与船山六世孙王承佺同居湘潭，很可能为遗书刊刻捐赠了资金。作为当时的社会名流，又是曾国藩的亲家，他名列编校之列，不仅增加了《船山遗书》刊刻的声势，也为日后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增加了亲近感。

除了上述有史可考的名流大家，参加此次《船山遗书》刊刻的还有船山后裔六世孙王承佺，七世孙王世全、王心、王世孝、王世梦（担任校字），八世孙王德润（担任督刊），共六人。说明船山后裔始终在为祖先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尽最大的心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船山著述在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专制统治特别是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的摧残之下，能够保存、流传达两百多年之久，绝大

多数著作都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天，与船山子孙世代相继、顽强不屈、机智巧妙的精心呵护是分不开的。

“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刊刻于1840—1842年，这正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也是中国从古代封建社会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空前深重的民族灾难呼唤着拯救中华民族新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民主启蒙思想的《船山遗书》恰于此时刊刻问世，也许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偶然巧合，但却适应了中华民族外抗强敌入侵、内求政治变革的时代需要。虽然这套《船山遗书》“流传未广，旋罹兵燹”，但却在湖南的社会精英中得到颇为深入的传播，影响与熏陶了陶澍、唐鉴、贺长龄、贺熙龄、邓显鹤、魏源、邹汉勋、左宗植、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等一大批人，在其后不久湘军的军政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就为曾国藩在同治年间再次更大规模地刊刻《船山遗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做好了先期准备。

在船山后裔中，为出版船山遗著、宣传船山家世与生平事迹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王船山的八世从孙王之春（1842—1906）。王之春不是船山的嫡系子孙，他的十四世祖公王统与王船山的七世祖公王纲是同胞兄弟，前面提到的王世全，是他的同支叔伯辈，都是王氏家族的后裔。王之春是王氏后裔中官阶最高的，曾历任山西、安徽、广西巡抚。王之春字爵棠，又字椒生，湖南清泉（衡阳）人。他于1862年20岁时以诸生入湘军，是彭玉麟的部下，后以军功逐渐升迁，1890年任湖北布政使，1891年著《国朝柔远记》，得慈禧太后欢心，奉命出使日、俄，遂著《瀛海卮言》及《使俄草》。1902年在广西巡抚任内镇压同盟会起义，向法国侵略者求援，激起国内拒法运动，次年被解职。1904年冬曾遭到革命党人万福华的暗杀，但刺杀未果。这说明王之春在晚清已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政治人物。王之春宣传船山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又字松崖，江苏仪征人，曾入曾国藩幕，后入金陵书局）协助欧阳兆熊刊刻金陵版《船山遗书》，“专司校书，厥功最伟”[20]）编撰的《王船山先生年谱》的基础上，重新编撰了一部更为详细的《船山公年谱》。据王之春在《年谱》“凡例”中说：“公旧有《年谱》，系仪征刘毓崧编。其间详略互见，挂漏讹舛，如己丑二月服阕、辛丑侨寓祁阳、丙申暂住兴宁之类，未为完本。是编全据公集及《家谱》等书裒辑而成，逐条引注，倍期详审，不厌复烦，非欲突过前贤，实冀传信后学。”[21]这就为后人研究船山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发展轨迹提供了更加丰富、翔实、准确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迎来了船山学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从1962年到2002年，在湖南衡阳王船山的家乡举行全国性（1962年、

1982年）和国际性（1992年、2002年）纪念王船山的学术讨论会达四次之多；20世纪50、60至70年代，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多次出版发行过船山著作的单行本，如《读通鉴论》、《宋论》、《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诗广传》、《思问录·俟解》、《尚书引义》等，80—90年代，岳麓书社集众多专家学者，积十年之功出版了收集最为完备、印刷精美的《船山全书》16大册；近年湖南推出的巨大文化工程《湖湘文库》，再次收录出版了《船山全书》及有关船山的评传与家世介绍。自1982年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至今，海内外专家学者公开出版研究王船山的各种评传、专著达数十上百种之多，而研究船山思想的学术论文更是达数千篇之多。内容涉及船山的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史学、军事、教育、文学、美学、诗歌、民族、宗教、音乐、文字、训诂等各个领域，空前深入地发掘了船山无限丰富、无比珍贵的思想宝藏，弘扬与传播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湖湘文化。

王船山的后裔现在大多聚居于衡阳县曲兰乡，他们世代恪守祖先的家教、家训，大多勤朴务农。据王船山十二世嫡孙王鹏先生《船山公故居及其后裔概况》一文介绍："自船山公而下，无官绅豪富，皆为寒素。在旧社会里，有穷到要饭卖子的。那时，船山公后裔受尽了封建大族的压迫和剥削，受尽了地头蛇的欺凌，读书的很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由无地到有地，由少有人读书，而今适龄儿童都上了学，我们的生活不断地改善。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各项政策，农业生产实行了责任制，连年获得丰收，去年亩产双千斤的只少数，今年则成为多数。家家仓廪实，户户猪满栏……我们作为船山公的后裔，一定继往开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22] 王鹏所述，确是实情。当时作为偏僻乡村曲兰中学教师的王鹏，可算得上船山后裔中最有文化的人，其他聚居于船山故居周围的船山后裔大都是老实巴交、世代辛勤耕作的农民。正是这位中学教师王鹏，积极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南大力弘扬船山思想的学术活动。1981年初，湖南学界吴立民、王兴国、陈远宁诸先生，力倡恢复重建船山学社，筹办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于会后恢复创办了《船山学报》。王鹏先生为会议召开献计献策，搜寻船山遗文、遗墨，为《船山学报》积极撰文投稿，为宣传祖先学术思想而尽心尽力。正是在这一系列学术活动中，我有幸结识了王鹏老师。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在撰写《从王船山到毛泽东》（正式出版时更名为《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书中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观点是：王船山的哲学、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哲学、军事思想的形成有过重要影响。当时学术界对船山哲学思想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基本上没有争议；但对船山的军事思想则尚未深

入挖掘，更遑论其对后世有什么重要影响。我在此书中认为：船山的军事思想是通过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践活动而影响后来的蔡锷及毛泽东的。尽管我当时已经收集了很多间接证据并做了充分的逻辑推演与对比研究，但苦于找不到直接证据。在船山学社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省里的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我的这一观点，认为王船山只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并不是一个军事家，船山一生也从未指挥过一场大的战役，对曾国藩及湘军的军事胜利没什么影响。当时王鹏先生明确表示支持我的观点，并表示可以从他家藏的《邗江王氏五修族谱》中找到直接证据。他回去不久就给我寄来了从《族谱》中抄来的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拟请（船山）从祀文庙折》中的一段话："至（船山——引者）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治乱兴衰，严尊攘，斥党援，深切著明，使读者悚然引为法戒，更以之师千百世而有余。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备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辨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为我的上述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直接证据。所以，我在拙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的初版与再版中，有关这条语录的注释，都明确注明是"据王船山后裔王鹏提供的《邗江王氏五修族谱》"。

作为王船山的热烈崇拜者与宣传者，我曾多次拜谒过王船山的坟墓与故居湘西草堂。1987年元旦，我第二次参观船山故居，王鹏老师一直相陪导游。因日暮下雨，我未赶上回衡阳的班车，就在王鹏老师的家中留居一晚，当时粗茶淡饭、围炉促膝长谈的情景，犹在眼前。没想到此别不久，王鹏先生就已作古，此次相聚，竟成永诀，令我惆怅不已。当年的《船山学报》第1期，为悼念王鹏先生的逝世，连登了他的两篇遗作。一篇是《清朝为什么尊重船山公？》，此文就引述了上述孔祥麟奏折中的这段话，说明清朝为什么尊重船山公。另一篇是《浪淘沙·春归梦圆》词一首。词前的按语是："此是笔者读船山公遗书有感而作。船山公自题门联：'他生杜宇唤春归'；自题画像：'梦未圆时莫浪猜'。笔者有感于今日中国之社会主义社会蒸蒸日上，深知船山公当年所唤之春已归，而其所期之梦已圆矣。"敬录此词正文于下：

败叶想当年，情迫心煎，人间苦恼满胸填。进退萦怀何处是，铁砚磨穿。

得丧探因缘，理究人天，孤灯绝笔听啼鹃。喜见芳春今日到，旧梦方圆。[23]

作为王船山的十二世裔孙，王鹏先生像他的祖先王敔、王承佺、王世全等人一样，为传承、弘扬船山思想竭尽了自己的心力。他的这首《浪淘沙·春归梦圆》，准确地揭示了王船山终生耕耘、著书立说所追求的一个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王鹏先生以躬逢中华民族正在复兴腾飞的历史见证人，深情填词告慰先祖船山公的在天之灵。宋朝大诗人陆游《示儿诗》有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王船山"他生杜宇唤春归"的历史之梦，一直等待了近三百年才得以实现：中华民族不仅已经巨人般地站立在地球的东方，而且正在昂首阔步、一往无前地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1][2][4][5]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76、177-178、179、179页。

[3][6][7][9][10][11][16][17][18][19][20][21]：《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9、409~410、384、415~416、415、412、414~415、420、421、551、137、279页。

[8]《船山学报》1985年第1期，第128页。

[12][13]《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71、271页。

[14][15]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7、2页。

[22] 王鹏：《船山公故居及其后裔概况》，《船山学报》1984年第2期，第139页。

[23] 王鹏：《浪淘沙·春归梦圆》，《船山学报》1987年第1期，第75页。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显鹤与清道咸湖南人才群和湘学复兴

弘 征

"湘学"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名词，与"湘军"一样，皆始于近代。随着湖湘文化热的兴起，每见有论者将其与"湖湘学派"、"湖湘文化"并为一谈。实则，昔称"湖湘学派"是指自福建崇安胡安国、胡宏父子来湘聚徒讲学所形成的一个二程理学支派，仅可归入儒家哲学范畴，不能替指"湖湘文化"。湘学则与湖湘文化有继承发展关系，近代之被称为"湘学"声名鹊起，正是湖湘文化的最辉煌灿烂时期。

湖湘文化堪称源远流长。但在历史长河中于清季中叶以前很少出现知名人物。林增平在《近代湖湘文化试探》中提到："检索一部近年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鸦片战争前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只占同期全国名人的0.77%，而上述辞典的近代部分共收录750人，其中湘籍的85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11.33%。"虽然，各种辞典对名人的认同标准各有异同，但亦不会有大的出入。

湖南人才群的涌现是自清季道光中期以后，亦即是世称"湘学"之始盛时期。因之，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政江标发刊了一张《湘学报》。与此同时，梁启超受聘来湘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后来在《说方志》一文中，称"邓湘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一再提及，如"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

人才之盛并见于以思想文化为核心的学术之昌盛，湖南人才群的涌现与湘学的复兴尤其是同步的。从清道光中期始，湖南自陶澍以下官至督抚、尚书者达三十余人，署理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员则不可胜数，以及一大批位虽不显但声名卓著如何绍基、魏源、汤鹏、邹汉勋等大名家，更有这位虽仅是一个县的学官和书院山长，但"游客四方，所至倾动"（见《清史稿》本传），"凡海内荐绅大夫、才俊士，多慕与为友"（见《国朝先正事略》本传）的大学者邓显鹤（湘

皋）。在20世纪编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已见异彩纷呈。在湖南，以岳麓书社为主，亦自《船山全书》之后，相继出版了邓显鹤（湘皋）编纂的《沅湘耆旧集》和所著《南村草堂诗抄》、《南村草堂文抄》，同时还有《陶澍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胡林翼全集》、《魏源全集》、《郭嵩焘诗文集》、《何绍基诗文集》……展示了这一湘学人才群体如璀璨群星。本文即从概述邓显鹤（湘皋）与这一群体的关系，来探讨梁启超所说的湘学复兴。

群体中与邓湘皋关系最深的当首推陶澍。两人是少年知交，陶澍在道光六年（1826）为《南村草堂诗抄》（以下简称《诗抄》）所写的序中第一句话就是“余与湘皋交二十余年矣”。而邓又与陶父必铨于嘉庆六年（1801）同会试于锁院，成为两代厚交。然陶澍于嘉庆七年即登进士第，而邓却于嘉庆九年才中举，后来“年五十矣，犹为选人”。但两人无论相聚还是异地书信频通，不仅是谈诗论文，更是参同擘画政务的知友。在道光五年陶澍任安徽巡抚时，便请邓去主修《安敏通志·艺文志》。在两江总督任上推行河、瑁、盐、海诸大政时，也要远道函询邓的意见和请他出谋划策，每见记于《诗抄》与《文抄》中。道光十六年秋回安化省墓时，以封疆大吏之尊，陶澍还专程去宁乡学署造访这位小学官，并在署中留宿了一晚。更值得一提的是，邓湘皋由于对王船山极为敬仰，谋求刊刻遗书与建祠祭祀，乃言之陶澍，陶即为之题匾曰“衡岳仰止”。跋云：“衡阳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谊介特，足立顽懦。新化邓学博来金陵节署，言其后嗣谋梓遗书。喜贤者之克绍家声，因题额以寄。道光十八年四月望总督两江使者前翰林院编修安化陶澍敬题。”又撰联云：“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这是清代第一位封疆大臣对王船山的公开表彰，也是对邓湘皋将要进行的大规模首刊《船山遗书》的热情支持和赞美。在《沅湘耆旧集》刊行时陶澍已经身故，其子陶桄乃出赀助刊者之一。前此之《资江耆旧集》则全部由陶澍捐廉在南京雕版。

何凌汉比邓湘皋大五岁，两人是嘉庆九年乡举同年。何在次年即点了探花。后来任过工部、吏部、户部尚书，但两人的交情始终极好。按邓湘皋的自叙，他在赴京会试逗留期间，因“余性拙，不惯谄人，于同乡京朝官惟何文安公以同年谊时一往。馀少结识者”。连陶澍也是因其“闻余至，辄先枉顾，故踪迹稍密”。从后来邓的三位子侄在京国子监读书多承照拂，特别是长子琳在京病故，又主要是由何及在京朝官之雅故者，奔抹治丧，含殓如礼，厚赙旅榇回乡，交谊之深更可想而知了。何凌汉亦长于诗文、书法，史称凡当日朝廷重大训诰册文，多出其手。但在今天，其名气远没有他的儿子何绍基大，而何绍基又正是邓自少观其成长起

来的。从《诗抄》卷十七的“何子贞绍基试举人于长沙，余时方权郡博，朝夕过从，叩其所学，邃如也。既落解归省京兆，作两诗留别，有‘苍然吾丈人，古心澄不骄’之句，余感其意，重愧其言，即用为韵作十诗送之行，兼呈尊甫汉槎京尹”即可知道。在何绍基的诗集中，《留别邓湘皋丈》等诗亦不下十余首。道光十六年何绍基在京登进士第，选授翰林院编修，适逢邓六十大寿，即寄来长诗《邓湘皋丈六十寿诗》祝嘏。道光二十四年赴黔典试返京途中，又专程去邓任山长的常德朗江书院盘桓数日，出《使黔诗草》乞题。在《南村耦耕图，为湘皋丈作》中的结句便是“相从暂借南村住，愿为弟子勤把耙与耰”。每归长沙，凡邓湘皋所参与的文事活动他无不相从，邓对他的诗文、书法亦极为赞许。在邓湘皋主持审校刊刻《船山遗书》那段时间，他正在长沙守制，以曾充武英殿总纂的名翰林，受邀参与为邓湘皋领衔的五位审阅者之一列名卷首。

另有一对父子是唐仲冕和唐鉴。唐仲冕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曾三权陕西巡抚，年长于邓。两人于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相遇于邗上，“互出诗集属题，往返谈宴无虚日”。时陶澍亦视漕南来，三人朝夕过从，唐、陶且“交以《湖南诗征》相勉”。“后十年，余客皖城，先生归湘，泊舟大观亭下，匆匆一晤，旋解缆去。逾年复会于淮阳。时先生为孝廉堂主讲，长公镜海太常鉴，季子竹泉刺史镬皆侍，朝夕过从，撰杖侍屦，穷日夕不倦，而先生年已笃老矣。生平欲辑《湖南诗征》未成；临别谆谆属余，且曰：‘将待此以瞑目。’”（见邓显鹤撰《沅湘耆旧集·唐布政仲冕小传》）在《诗抄》中，邓赠唐的诗不少，而唐仲冕赠邓的诗亦多，如在《松堂读书图赞》中云：“嘉庆乙亥秋，与湘皋同客扬州，晨夕聚首，每相与称述两家先世之美。”可见其交谊之深。

唐鉴是唐仲冕的儿子，比邓显鹤只小一岁。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曾一度代行过两江总督事，后任江宁布政使，入京召对，升太常寺卿。曾国藩终生师事之，曾国藩之后来转习理学，就是受他的影响。在所作《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曾自谓今“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问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唐鉴与邓年纪相近，在邓与其父晨夕聚首时，两人更是成为好朋友了。在《诗抄》中，亦时见邓有诗相寄。在《南村草堂图咏》中，他与其父一样，也是一题再题。如在《题松荫堂读书图》中云：“南来日与朋旧疏，与君握手情不孤……君传祖砚知君贤，清风四壁徒简编。我欲努力同磨研，立身当在万仞颠。”在《题听雨山房图》四首之一有云：“千古能逢几道州？先生应亦为民谋。却知孝友关天性，不独东坡忆子由。”首句将邓比喻为周敦颐，乃当今儒者之师，第二句谓邓遵兄言不愿为

县令事。当邓湘皋在长沙主持校刊《船山遗书》时，唐正在京任太常寺卿，以弹劾赴广州钦差大臣琦善和广州将军耆英，直声震天下；应邓之请写了一篇《王而农先生全集叙》，是书中除邓自撰《船山著述目录》外唯一的一篇序言。在所著《国朝学案小识》中，有一篇《王而农先生》与《顾亭林先生》同列于卷三，亟称“先生学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与邓湘皋一样对王船山不胜敬仰。

曾国藩比邓湘皋要小 34 岁，他于道光十四年（1834）到长沙岳麓书院求学，于是年中举，赴京会试至十八年成进士，随即又做了京官，难得与邓湘皋有较密的交往。按他在邓逝世后致邓的侄子邓瑶的信中所云：“湘皋先生道德文章，私心淑慕者二十年矣，不得追陪杖履，上下言论，窃以为憾。犹幸于黄正甫家一接光仪，而吾友如郭筠仙、彭晓杭、江岷樵、宗香海兄、袁漱六、左景侨、杨性农诸君子，每见未尝不亟称先生，以是尤敬仰。去岁闻哲人云萎，乡里之官京师者，盖莫不哽咽长叹。”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邓的崇拜者外，他与邓瑶早有厚交，当道光二十四年邓瑶在京会试罢归，曾作《送邓伯昭兼简家伯醇秀才三首》之二有云：“君家老痴叔，海内久词宗。（谓湘皋广文——作者原注）岁晚餐幽菊，空山依冷筇。我今方速谤，兹味亦非浓。他日庞公榻，来寻物外踪。”极道了仰慕之情。证以邓瑶在邓湘皋逝后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所云：“而先叔父文章学术，孝友志节，又夙为阁下称说……念先叔父于阁下，踪迹虽疏，神交实笃。昨者读公四月二十六日封事，辄形咏歌，虽感叹出于不容已，抑若凄然有身后之托者。”这里所说的“咏歌”，是指邓湘皋逝世前不久所作的《阅邸抄见曾侍郎封事》，诗云：“事关君父谁能说，迹涉嫌疑敢易论。圣代本无庸谏草，清时讵可废昌言。一封能使朝廷重，片语兼令阃外尊。闻说姚严皆特简，敕书先已出宫门。”乃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逝世，遗诏中有无庸郊配、庙祔两条，文宗（咸丰）嗣位后向朝臣咨询，曾上了一篇《遵议大礼疏》，在奉遗诏还是遵例之间找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替文宗解决了一大难题。接着他又上了一个关于培养、甄别、超擢人才的奏折，语多切直，别人皆虑其获谴，不料竟得到了文宗的表扬。不久，文宗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的罪名把道光时的重臣穆彰阿罢黜了，一批谪臣被重新启用。“姚严”指姚莹和严正基，两人皆是邓湘皋的好友，邓同时还写了一首《闻姚严两君子新授广西按察使、右江道之命》。诗的第二句系指穆彰阿本是曾国藩中进士时的座师，故上疏时下笔十分不易。邓写这首诗时不过是有感而发，并没有寄给曾国藩，不过的确可看出他对曾的关心和十分赞赏。曾国藩对邓之深怀敬仰之情，

尤其可见的是那篇《邓湘皋先生墓表》，此文分四日才写成，在其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是年作文也仅此一篇，的确写得钩深致远，文情并茂，在其古文中亦属上乘。因之，曾国藩研究者胡卫平在《曾国藩与〈船山遗书〉》中称曾之于邓，“可谓私淑弟子……邓显鹤当初欲将《船山遗书》刻成全集，未果，只刻了经部诸作，后又板毁无存。金陵本仍冠《船山遗书》名，予以重刻。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有继其师完成其夙愿之意”，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两人之先后刊刻《船山遗书》，是一件发扬光大湖湘文化有关湘学复兴的大事。如果没有邓的首刊，王夫之不仅“邦人罕举其姓名”，饱学如曾国藩因未得读其书，亦不得知其学。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中所说的：“先生殁后，巨儒迭兴……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即本自邓湘皋《船山遗书目录》中之“当代经师，后先生而起者，无虑数百家。所言皆有根柢……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曾序中又叙二者成书的始末云：“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岑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兆熊经理。”

这位欧阳兆熊堪称是一位奇人。他于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不独工诗古文辞，且为人仗义疏财，豪爽喜任事。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在京病危，全仗他精心护持治愈。虽曾参加过会试，却不醉心科举，致力讲求经世之学，与同县罗汝怀引为同志，经常来长沙访邓从游。当得知邓深慕王船山，亟“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时，他从湘潭王船山七世孙世全处得知船山六世孙承佺藏有各种遗稿于家，就带领世全来长沙访邓，邓闻之“大喜过望，次年春，遂开雕于长沙”。这也便是他后来在《榾柮谈屑》中所记的：“邑人王半溪，为先生族孙，藏其遗书，不敢出以问世。道光十九年，余与邓湘皋年丈捐赀怂恿付梓。”后来板被焚毁，时邓湘皋已故，他乃极力鼓动曾国藩兄弟出赀重刊。此时曾国藩已读过王船山的部分著作了，深怀敬仰之情，兼之又是所深慕的邓先生未竟之业，身居高位，醵赀重刊自然不是问题。曾国藩本来是一位具有经世之志的人，倒也不是如章太炎站在反清革命者的立场上所论的：“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检论杂志》）

欧阳兆熊原来即是邓刊《遗书》的编校者之一，兹又鼓动曾刊，“开雕于同治甲子，未及三载而事已竣，由安庆而金陵而扬州而长沙，俱以书局自随”（见欧阳兆熊：《重刊船山遗书凡例》），成为两次《遗书》刻刊的经事者。由于他与曾国藩交称莫逆，曾国藩屡思以官禄酬他，他皆未受。逝世后，曾纪泽有挽联云：“平生甚似鲁仲连，而非游说纵横之客；地下若逢先太傅，仍为布家昆弟之交。”

左宗棠比邓湘皋要小35岁，当他19岁至长沙从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问学、又得以从丁忧回籍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家借书阅读时，邓湘皋已回到湖南，是贺氏兄弟极为佩服的大学者了。又因为其兄左宗植的关系，得以认识邓湘皋，比曾国藩的仅是早年“一接光仪”，其后只是“私心淑慕”要深得多。从《诗抄》中就可以见到邓写赠他兄弟俩的诗不少。如约作于他们中举同年的《书左仲基宗植襄阳诗卷后，即示令弟季高宗棠》二首中有句云：“昆龙季虎俱无敌，看放骅骝晓日边。”邓在“己亥（1939）弃官归去时，复往来（长沙）其间，至则寻所谓天心阁下城南旧巢者而依栖焉”（《后长沙秋感十首序》）。这里所说的“旧巢”，就是左宗植在碧湘街的住宅。在这个组诗之六有句云：“载酒每过杨子宅（谓杨紫卿、性农诸君——原注）。谈天一过左家关（谓左景乔、季高兄弟，时景乔方刻《三垣图》，季高则为《舆地考》，人谓左氏一谈天，一说地——原注）。”之八又有句云：“客中知我思儿苦，永夕相将共榻眠。”句下亦有原注云：“己亥得琳儿都中恶耗，栗仲同青垣、景乔三人更番来寓值宿，共卧起者两阅月。”更可见与左氏兄弟相交之厚。《诗抄》卷二十四还有邓逝世前一年写的《寄左季高湘阴》（闻有书见寄未到，甚惆怅也——原注）诗云：“不见左思又八年，湘阴深处自耕田。尺书寄我落谁手，世事如今休问天。我已甘为无口瓠，君须勉学结跏禅。宵占贯索晨占彗，何日馀生得晏然？”“结跏”即蟠足而坐，以喻这位“今亮”正在研究安邦治国之道。贯索和彗都是星宿名，古人常以夜观星象来卜天下凶吉。从诗中可看出邓对左宗棠的经世之才的赞赏和期望，此后不到两年，左宗棠便出山了。

左氏兄弟皆是邓刊《船山遗书》的主要校刊者。从《邹叔子遗书》中所存邹汉勋《致左景乔舍人书》与《致左季高孝廉书》，即可知其皆悉心投入和用力之勤。

在此还有一个颇为值得一探的问题，即世传道光十七年（1837），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乞假顺道回乡省墓，道出醴陵，见行馆有一副为迎接他而新挂的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十分赞赏。一问原来是新任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撰的，急命延见，并特地多留了一天；于次年在金陵相见时又主动提出与这位比自己小了33岁的落第举人结为儿女亲家，颇带点传奇色彩。此事固然可见陶澍爱才，但恐怕不仅是凭一副对联便引发出来的故事，必定是此前就有陶最信任的人向他提到过这位家乡青年才俊，诸如本有姻娅之谊的贺长龄及女婿胡林翼，还有相交甚密的邓显鹤。但邓显鹤很容易被今天的研究者忽略，原因是在罗正钧所撰的《左宗棠年谱》中称：“道光十九年己亥，公二十八岁。春初，来长沙，居左景侨先生碧湘宫宅，晤新化邓湘皋、邹叔绩汉勋。”其他编年谱及撰传者亦均采此说。而罗谱此条所据的却是左宗棠

在邓显鹤逝世后给其侄邓瑶的《与邓小芸书》（《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忆己亥之春，先生与宗棠同住碧湘宫仲氏宅。一日，忽语及《明史·文苑》，去取皆不足信。此时史局多吴越人，而湖外老宿遂鲜甄录，尤深为不平。先生笑曰：‘吾辈亦大可虑，不能无望于后死者耳。’言犹如昨，不谓事已至矣。”《年谱》并未言及晤时所论，令人以为若初识然。那么，在前两年就推荐左自然不可能了。前已述及，《诗抄》中已见约作于道光十二年的赠左氏兄弟诗，相识则自然更早。左宗植于道光六年以拔贡入都朝考列二等，寻选新化训导，而新化正是邓显鹤的家乡，邓亦已于次年春即回到长沙。在刻于道光十一年的《蔡忠烈遗集序》中就已言及：“忽于友人左仲基家废簏中，得其先世手抄《忠烈公行状》残本。”可知其与左氏兄弟之交更早在他们中举之前。又陶澍乞假回安化修墓是道光十六年丙申九月，其间还专程去宁乡学署探访邓湘皋并留宿了一晚，现《左宗棠年谱》与传记皆言陶是十七年“道出醴陵”，于时间亦不合，此是为了迁就左于是年才任渌江山长。且陶澍当年是自萍乡由水路入湘，十九日抵安化，于十月二十日即由籍启程经湖北乘舟东下江宁。若绕道出湘，而左又于年前提早到院视事，在陶也是回程。因知邓必告知他留宿醴陵行馆时，现正任渌江书院山长的左宗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没有那副对联陶亦必延一见了。

左宗棠之对邓显鹤极为崇敬，只要一读前引的那封《与邓小芸书》就可知。此书开篇即云：“湘丈之殁，湖山黯然，邵州人奉栗主于东山讲舍，以是为先生神之所栖，允矣。然先生文采风流，照耀一世，内行醇笃，与人交有始终，尤非寻常文人所有，岂仅一邑一乡之典型云尔哉！”因格于非一二品大员不能立传（惟忠义可例外），他和郭嵩焘、罗汝槐等在长沙商量须请史馆破例为邓先生立传，左云：“此议曾为子贞言之，涤生、光伯诸君想有同志。此事亦须有气力者主之，不尽恃公论也。寿阳相国、芝农太傅处，诸君子当有为言之者。”为之费尽了苦心。他有一副为人传诵的挽邓联云：“著作甚勤，四海声名今北斗；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曾国藩写的那篇《邓湘皋先生墓表》，就是由邓湘皋之长孙光黼携赴兰州陕甘总督府，由左宗棠亲笔书写并篆额的，这也是曾左二人唯一一件联手的作品。

胡林翼比邓显鹤亦小35岁，因为是陶澍的女婿，在邓的面前就只能自称小辈，虽然应该很熟悉，但《诗抄》中未见有酬答唱和。只是在《文抄》中的《与陶云汀制府书》得见有“顷快婿胡蕴芝同蔡君枉过，以公子墓志属为商酌”。那是道光十一年十一月，陶子慧寿刚十岁以喉疾殇，最了解儿时情况的自然只有其师蔡用锡了，但文辞则未必很出色，胡林翼便领他来到宁乡学署请邓给予修改。邓阅

后觉“原文太繁碎，于金石例不合”，写信告诉陶澍“已僭为改定”。并“拟作一哀辞附存私集，冀他日有所考”，这便是《文抄》中的那篇《陶公子慧寿哀辞》。胡林翼自道光十六年中进士旋任翰林院编修，后又去黔任知府，自然不得参与《船山遗书》的编校，只是在《沅湘耆旧集》的“搜访姓氏”中列有名字。其父胡达源乃嘉庆二十四年（1819）探花，曾典试云南，视学贵州，以整饬士风，培育人才为己任。致仕归乡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邓每来长沙，寓居处即一为碧湘宫左宅，一为城南书院。在《沅湘耆旧集》卷一三九所撰的《胡詹事达源小传》之末有云：“余闻公归道山，已掇其两诗刊入集中矣。比公子林翼蕴之编修以公状及诗抄来，属为采录作传，因重编次而识其略如此。”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试论杨恩寿的传奇戏剧及其戏曲理论

周柳燕

在湖南近代戏曲史上，杨恩寿以其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探索而颇具影响。但由于他的作品多立意于封建教化，带有表彰忠义节烈的传统道德思想倾向，长期以来，各种文学史对他的生平及作品，特别是对他的戏曲理论疏于介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杨恩寿（1835—1891），字鹤俦，号蓬海、朋海，别号蓬道人，湖南长沙人。少年早慧，七岁即能赋诗，十五岁始应童试，十七岁得秀才，二十四岁中优贡生，直到同治九年（1870）才举应天乡试，时三十五岁。困守场屋的十余年中，奔走于湖南、广西等地，或课读，或做幕宾。光绪初授湖北都转运盐使司运使，升湖北候补知府。光绪三年（1877）以候补知府充湖北护贡使，曾迎送越南贡使。后因官缺过紧，辞任远赴云南等地做幕宾。一生漂泊四方，沉沦下僚，抱负无以施展。他性情旷达，酷爱戏曲，曾在《坦园日记》中说：“忆自十余年来，颇有戏癖。在家闲住，行止自如，路无论远近，时不分寒暑，天不问晴雨，戏不拘昆乱，笙歌岁月，粉黛年华，虽曰荒嬉，聊以适志。”他创作了不少剧作和戏曲论著，有传奇《姽婳封》、《麻滩驿》、《桂枝香》、《桃花源》、《理灵坡》、《再来人》、《鸳鸯带》等七种，除《鸳鸯带》散佚外，其余六种合刊为《坦园六种曲》流传后世。另有戏曲理论专著《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除此之外，还有《坦园日记》手稿八卷，记载了许多湖南演剧的史料，包括所观演的剧目及演出的演员、班社等，是研究近代中国戏曲史，尤其是近代湖南戏曲史的重要资料。

对于自己的创作，杨恩寿于《坦园日记》中这样自评：“吾半生所造，以曲子为最，诗次之，古赋、四六又次之，其余不足观也。”可见他对戏曲创作甚为重视。但后世对他的戏曲作品却评价不高，如吴梅《顾曲麈谈》言：“杨坦园之六种曲，亦学藏园，而远不如黄韵珊……《麻滩驿》、《理灵坡》表彰忠谊，不如《芝龛记》远矣。”随着花部地方戏的勃兴，晚清文人的杂剧和传奇创作走向衰落，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家士子和睿智的戏曲理论家，杨恩寿站在传统儒家

的立场上创作传奇，反映时代动乱，关心民生疾苦，真实再现封建末世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人生价值，其剧作虽掺杂着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姽婳封》、《理灵坡》、《麻滩驿》三部剧作贯穿着同样的主题，即歌颂忠肝义胆的节烈之士，期待人们携起手来，共同抗击外国列强的侵略。《姽婳封》取材于林四娘的传说故事，实际上主要是根据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姽婳词》扩充改写而成。剧本讲述山寨大王寇魁与苟军师用金钱贿赂青州绅士，引诱恒王出城招抚，然后里应外合，在途中将恒王杀死。林四娘闻讯后出城劫寨，结果战败自刎。后靖逆将军与孔有徵联合，杀死了寇魁及苟军师，并为恒王和林四娘建忠烈祠，以志纪念。作品歌颂了恒王及林四娘"尽忠报国"的忠烈精神。《理灵坡》取材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攻陷长沙时，司理蔡道宪为守城而死的故事。剧情依据蔡道宪所著遗集及附刻《行状》中的有关轶事，写张献忠率军攻破武昌后进攻湖南，占领岳阳，逼近长沙。长沙知府堵胤锡入京朝觐，把政事委托给时任长沙司理的蔡道宪。蔡道宪向巡抚王聚奎提出战守方略，王不仅不采纳，反而诱导明朝宗室吉王弃城逃往湘潭，湖广总督尹先民开长沙城门投降。蔡道宪率本部士卒迎战张献忠，失败后被俘，因不肯屈服，惨遭杀害。长沙司理衙门中的幕僚凌国俊等六人与蔡道宪志同道合，他们收殓了蔡道宪的尸体，埋葬在理灵坡，之后一同自杀。作品旨在歌颂蔡道宪在时局危急时刻"成仁取义"的精神和凌国俊等六人慷慨赴死的忠义气节，与当时不少明朝官员荒淫无耻、临阵脱逃的卑劣行径构成鲜明对比。《麻滩驿》是《理灵坡》的姊妹篇，也取材于明末历史，以对抗张献忠农民起义为背景，故事发生地也在湖南。所不同的是，该剧根据毛奇龄《沈云英本传》及徐岳《琼枝曼仙记》，写崇祯末年浙江萧山人沈至绪任湖南道州守备，其女云英嫁四川人贾万策为妻。贾万策任职湖广荆州大巢营都司，在与张献忠的对抗中殉职，云英随父在道州。张献忠攻占长沙后，派降将尹先民进攻道州，沈至绪率部迎战，杀尹先民，但在进兵麻滩驿时中箭身亡，尸体落入敌手，沈云英率女兵夜劫敌营，夺回父亲遗体，后朝廷封其为游击将军并任道州守备。作品热情歌颂了沈至绪父女尽忠职守、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桃花源》剧取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谨依《桃花源记》诗序，写武陵渔人乘船沿桃花溪逆流而上，至溪流尽处弃船上岸发现桃花源的经过，以及到了桃花源受到那里的百姓热情接待的情形和渔人思亲念故、不恋桃花源的情绪。其创作意图当然很明显，即以世外人的身份评论当世兴亡，发泄内心对现实的不满。第一出《渔唱》中有一首［南泣颜回］，借东晋抗击北方氐族入侵中原的重大

战役——淝水之战揭露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其中的"强奴欺人太甚，有此一战，亦可雪朝廷之愤，伸中国之威矣"，呼吁人们奋起抵御列强，保卫家国，表达了对民族命运的深重忧虑和反抗侵略的强烈情感。

杨恩寿热衷科举，虽得中举人，又一度入仕为官，但亦饱尝屡试不第的辛酸和志向难以伸展的痛苦，对封建科举制度的黑暗有较深刻的认识。《再来人》记叙福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儒生陈仲英虽博学善文，但屡试不第，最终郁郁而死。然而他的投胎再生者季毓英却状元及第，飞黄腾达。作者的旨意在于痛斥科举制度的残酷，同时又假借荒诞离奇的故事来寄托自己的幻想。作者揭示了陈仲英一生功名难成的原因，即"时文风气坏"、"应试之作，愈庸愈妙"。通过描写孙福桐花钱买到"举人"、钱成铭抄写陈文骗来"进士"，辛辣地讽刺了封建末世腐败不堪的科场，清醒地意识到"读书人到此地步，不独为衣冠之玷，抑且有风俗之忧"，表达了作者"文运如此，国运可知"的愤慨和忧心。

《桂枝香》也表现了作者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该剧写于杨恩寿中举后不久，取材于小说《品花宝鉴》中田春航与李桂芳的爱情故事，叙写年轻士子田春航与京城名旦苏惠芳相恋，因会试落第，时刻以爱情相激励，终于中了状元。剧作旨在歌颂男女爱情的美好和力量，也是作者对自己科场失意心态的一种虚幻寄托。这种虚幻寄托与《再来人》中描写季毓英的状元及第、享尽荣华传达出的意味相似，与作者透露的对科举制度的失望和批判相异。其实，这正说明作者未能勘破现实，在科举上患得患失，为进身报国之路感到迷惘；同时，也真实再现了处于科举腐朽时期士人们的矛盾心理。

总之，杨恩寿的大部分剧作都较为贴近社会现实，重在反映社会问题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客观上也展示了封建末世文人的心路历程。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作者封建统治阶级或封建士人的立场。当他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时，对被压迫的农民阶级不免谩骂和讽刺；而当他站在封建失意士人的立场上时，虽有不少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但大多是发泄个人情绪，很少理性的分析。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在思想上一般难以得到后人的接受和肯定。

杨恩寿的戏曲创作在艺术上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运用，尤其是人物性格的刻画等方面，基本上达到了"传奇诱人"的艺术效果。如《理灵坡》中对蔡道宪性格的刻画。剧本一开始就写他少时很有胆气，甚至猛虎被他大喝一声也要急忙避开，这为下文描写他的肝胆埋下了精彩的伏笔。又如《桂枝香》中对女主角苏惠芳的心理描写。第五出《憨侦》写苏惠芳去通州索债途中，在外夜宿时想象自己的恋人田春航考试的情况："金银眯了青盲眼，教人何处代鸣冤。

文章自古不操权，刖夫曾立荆山下。心牵，惹旁人一般宵不眠。叹霎时得失升沈判，怕春风孤负三年，看人赴曲江宴。倘若春航失意，就枉费我一片柔情了。同沦落天涯恨，应难免青衫泪溅。若这样文字，尚落孙山，免不得刘蜕埋文哭向天。我也不干这生涯了，抛却舞扇歌裙旧翠钿。”撇开主人公热衷功名富贵的封建思想不说，单就人物的心理刻画而言，这段文字无疑是极其成功的。一个为了自己的恋人能够科场及第而不惜外出索债的弱女子，当她联想到恋人可能落选的境况时，那种沮丧、失望和哀怨的心情是何等强烈，读来令人心动。《麻滩驿》则塑造了一个侠骨柔情的女将形象。当得知父亲战死沙场，尸骨无归时，沈云英当即趁夜率女兵，入敌营，夺父尸。《夺尸》一出描写劫营夺尸，刻画了沈云英丰满的性格特征。且看［小桃红］、［下山虎］两支曲子：

（旦）恰才的长虹一剑斩妖魔。说甚么风雨重围合也，实指望净洗甲兵，壮士齐挽天河。那管他急点滂沱，却不道陷泥沼，困山坡，泥滑滑马蹄折也，奈妨主的卢何。更禁不起鬼箭利，黑暗里射人多。

准备著飞蛾扑火，那怕他地网天罗……须知道百年易过，纵然是致命沙场，大古里香销玉堕，这忠孝声名永不磨。再休提女孩儿生来弱也，抵得铁铮铮男儿一个……睢阳厉鬼能为祸，闪灵旗，杀贼提戈。难道甲马云中，轻轻饶过他。

天色阴昏、狂风大作、急雨滂沱、道路泥泞、马蹄折陷，夜战场的景象可谓惊心动魄。但种种艰难险阻动摇不了沈云英奔赴敌营的决心，此一行，哪怕是“飞蛾扑火”、“地网天罗”，也将义无反顾，天生柔弱的女孩儿在战场上定要胜过那铮铮男儿。这些充满豪情的唱词活化出沈云英勇武豪爽、藐视强敌的气概。而想着亲人的尸骨，她又痛不欲生，“娘子军中泣翠娥”、“泪痕如雨同时落”、“遍山城野哭声多”，女儿柔情似水的一面生动自然地呈现出来了。杨恩寿的同窗、戏曲作家曾传钧在今存刊本《麻滩驿·夺尸》中有眉评云：“意气周备，词旨朴茂，直逼元人”，“一字一珠，一字一泪”。

越南贡使斐文禩在《词余丛话序》中曾称赞杨恩寿的作品“诙谐杂出，耳目一新”；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认为杨恩寿的戏曲作品在“词采”方面虽不及黄燮清，“但其排场与宾白之技巧反过之”。这些都是对杨恩寿艺术成就的如实肯定。《姽婳封》是杨恩寿《坦园六种曲》中艺术表现最具功力的剧作，其中的排场之佳、曲藻之美均可称道。如第一出《花阵》，写林四娘在御园操练女兵、接受恒王检阅的情景：姽婳女将军“亭亭玉立天人样，剑佩珠冠趋彩仗”，靓丽而威严的形象跃然纸上。“粉黛三千娇滴滴”的娘子军，军阵齐整，刀枪闪亮，鼓声震天，气势雄壮，博得了恒王的大加赞许：“叹赏，昔日吴宫，

阿谁教战，尚须孙武苦推详。输与金闺杰，绣阁韬钤细讲。休让，锦伞风高，金山鼓急，壮心不为粉脂降。”这支训练有素的娘子军比得上春秋时吴国宫中教演女兵的孙武子，胜过了宋代在黄天荡大战金兵、亲自击鼓的梁红玉。美艳英武的女将军一身戎装，大展武艺，令人目不暇接：舞短刀，“刀光掩映娇模样”；挥长枪，“鸿翩鱼漾，这玉腕银枪，舞的似梨花月上”；拉弓射箭，“雁簇初号，雕弓细响，纤杨穿处巧相当……雉翎锦散，飞丸疾赴不提防”；单身破阵，“短兵猝接，角声乍咽，鼓声忽壮。这牌委实的难破也，铁垒更铜墙……还凝望，万花飞舞从天降”。这场阅兵式的场面被写得如此精彩，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尚属罕见。此剧今存刊本有魏式曾的评点，此出的眉评是：“慧舌娇喉，语妙天下”、“组织精工，花交绮错”，确为的评。

杨恩寿不仅爱观剧、写剧，更在观剧、写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戏曲理论。他撰写的《词余丛话》就是清末较有影响的戏剧理论著作，书中讨论了戏曲的本源、戏曲创作的目的和功能等问题，还对许多剧目进行了评论。这些戏曲理论虽不免有对前人成就的承袭，但也有自己新的发展。总的看来，其戏曲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关于戏曲的本源及其与诗、词的关系。杨恩寿认为，诗、词、曲三者“异流同源”，没有高、卑之分。他在《词余丛话》中说：“昔人谓：诗变为词，词变为曲，体愈变则愈卑。是说甚谬。不知诗、词、曲三而一也，何高卑之有？……诗、词、曲界限愈严，本真愈失。”他还在该书引用张度西的一段话：“词曲之源，出自乐府……亦是天地间一种文字。”其意在于纠正视戏曲为文坛附属物的错误观点，提高戏曲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应有的地位。他的戏曲创作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他戏曲非“小道”，并非“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主张。此论本身并没有错，但他从而强调诗、词、曲三者合一，却又否定了文艺体裁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戏曲创作本身有别于诗、词创作的特殊规律。

其二，关于戏曲创作的目的和功效。杨恩寿多沿引前人的叙述来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引张九钺之说：“以宫商爨演，寓垂世立教之意，在文人学士，勿为男女媟亵之辞，扫其芜杂，归于正音，庶见倚语真面目耳。”又如引王阳明的观点：“取今之戏本，将妖淫词调删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晓，无意中感发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再如引刘念台《人谱类记》中陶石梁之说：“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观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百倍……盗、杀、淫、妄，

不觉自化；而好生乐善之念，油然而生矣。”这些引述，表明了杨恩寿以戏曲创作服务于封建统治的立场，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非常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其三，对各种地方剧种兼容并蓄的态度。杨恩寿对花、雅两部不存偏见，除就传奇和昆腔格律等正规剧种发表自己的见解外，对各种地方剧种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坦园日记》既谈昆剧，又谈湘剧和粤剧，表现了对湖南各地弹腔戏的充分肯定以及对其他民间小戏的重视。这种对各种地方剧种的兼容并蓄态度，较之抱残守缺者自然前进了一步，对地方戏研究的开创性工作做出了贡献。

其四，对前代戏曲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这是杨恩寿戏曲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对王夫之《龙舟会》、董恒岩《芝龛记》、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对“南洪北孔”的两部作品的评价，更显出了作者独到的眼力。在杨恩寿之前，很多论者或将董恒岩的《芝龛记》与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相提并论，或干脆将《芝龛记》的成就吹捧为在《桃花扇》之上，如沈廷芳、张香都持这种观点。但杨恩寿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指出了《芝龛记》情节结构的重大缺陷，充分肯定了《桃花扇》、《长生殿》的艺术成就和地位，这是难能可贵的。杨恩寿在评价他人剧作时，还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批评标准，诸如作品应“气味深厚”，即内容丰富、情感强烈；须“神情合”、“排场佳”，即讲究情景创作、结构安排；“审题真，措辞确”，即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等。

魏源《老子本义》与湖湘文化精神

余明光

魏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上承王夫之“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下受教于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经世致用”是他一生著述的座右铭，“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贯穿在他的撰著和实践活动中。

《老子》一书，字数不多，历史悠久；注释千家，讲解百万，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魏氏以“经世致用”为思想利器，以救民救国为宗旨，网罗百家之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力破陈说，创立新知，写成《老子本义》一书。

《老子本义》不但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老子》，而且从其中也显示出湖湘文化的新精神。

一、《老子》非老子所作

关于《老子》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清末以前，学者大多遵从《史记》，认为《老子》为老子所作。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老子一节只有四百多字，而且大部分文字今天看起来都是属于传闻。而司马迁自己也使用一些存疑的文字，如“或曰”、“或言”、“盖”、“世莫知其然否”，等等，这些都给后世以莫大的想象空间，直到1922年梁启超撰文认为《老子》出于战国末期才引起学术界一场大辩论。但最后也没有定论。当时以张煦和胡适为首的一派是坚决反对梁氏之说的，认为《老子》一书为老子所作[1]。

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大辩论，主要针对的还是《老子》一书的年代问题，而作者是否就是老子并未重点涉及。而明确提出《老子》非老子所作乃是清代晚期的魏源。

魏氏在《老子本义·序》中说：“黄老之学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礼家之言、兵家之言。”

在《论老子》中，魏氏又说：“老子道，太古道；书，太古书也。何征乎？征诸柱下史也。国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故左史在楚，能读《坟》、《索》，尼山适周，亦问老聃。今考《老子》书‘谷神不死’章，列子引为黄帝书，而或以五千言皆

容成氏书，至经中称‘古之所谓’，称‘建言有之’，称‘圣人云’，称‘用兵有言’。故班固谓道家出于古史官，庄周亦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征哉！”

魏源所论有两点值得注意：

1.《老子》为太古书，并非老子本人所作。

2.《老子》是老子述而不作的产品。

魏氏所论是否正确，是否有据，笔者认为魏氏所论是有依据的，绝非臆想空断之言。

老子生于春秋末世。那时尚无纸笔墨砚之类的文化工具。文字载体，用得最多的是竹简、木牍，但也局限于贵族诸侯，直到战国时代才大量普遍使用竹简、丝帛等文字载体。所以《史记》上说老子过关“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老子口授关尹五千言，并非为关尹写了一本上下篇《老子》。

在古代因无便利的文化载体，那么文化又是怎样传承的呢？从文献上考察，文化的传承一般都是靠口头传授，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使文化不绝于流，所以像孔子、老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都是典型的“述而不作”的大学者。如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2]

孔子虽是大学问家，但在那个时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古代文化他也只能口述传授给弟子，他自己是“不作”的，也就是没有用著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学说。现在我们读到的《论语》正是孔子的弟子们对孔子口授的记录。而老子年长于孔子，更不可能著书立说，在《老子》中，我们也读到这样的话：“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诗讽刺《老子》为老子所作时说：“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可见他的五千言也只能是他口述上古文化的证明。

这种文化的口头传承方式，一直到秦汉之际有的地方还在继续使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尚书》的传授。《汉书·艺文志·序》言：“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但一直到汉文帝时，天下还没有一人能通晓传授《尚书》的。此时只听说济南伏生是秦时的博士，能够讲说《尚书》。汉文帝很高兴，想请他到京师来传授这门学问。但后来了解到这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不能到京城来，汉文帝只好命令太常使掌故晁错去伏生家中学习。据《经典释文》说，伏生家中的藏书，经过秦汉之际的大乱，都已经亡佚了。伏生只好全凭对《尚书》

的记忆，口诵了二十九篇经文，传授给了晁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今文尚书》。

用口授传承传统文化的现象不仅限于中国古代，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可以找到例证。如古罗马时代的《荷马史诗》，以及当今国内各少数民族流传的英雄史诗等，大多都是口耳传承下来的。所以老子口授五千言《道德经》，也就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了。

以上分析足可证明魏源所论《老子》乃上古书，所述道乃“太古之道”，而《老子》书是老子所口述的上古文化，并非老子本人所作。

但《老子》成书，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那是到战国末年才逐渐形成的，我们从湖北郭店出土的楚国《老子》简牍，到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帛书就可看到道家的学者对这部书不断地增补、编纂并使之完善的过程[3]。

二、“无为”并非“无用”

历代研究《老子》的人多不胜数，而留下的著作也不下千百万字，而真正能通老子之道懂得真谛的却凤毛麟角。魏源叹息地说：“解老自韩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复生，谁定之？彼皆执其一言而阂诸五千言者也。”又说：“泥其一而诬其全，则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

这是说千百家研究《老子》的人，越研究越糊涂，越研究越搞得《老子》面目全非。为什么会这样糟糕呢？魏氏解释说：“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以寻声逐景于其末，岂易知易行？”

这就是说很多研究《老子》的人，并没有抓住《老子》的主要精神，而是寻声逐影于皮毛末节，不知道抓根本。所谓“言之宗，事之君”指的就是读书研究要抓住要旨，只有抓住根本才能提纲挈领地领会《老子》书的精神实质，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走入歧途。魏源举例说：“无为之道，必自无欲始也。诸子不能无欲，而第慕其无为，于是阴静坚忍，适以深其机而济其欲。”更有人提出“无为”乃“枯坐拱手”而已，于教化无益，“不足以治天下”。

“无为”与“无为之治”是《老子》中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可是很多读《老子》的人，却以偏概全，执其一而不及其余。这就是魏氏所说的“泥其一而诬其全”。“无为”与“无为之治”果真如一些人所说是无用之学吗？魏氏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指出庄周、魏晋之士和刑名者之流这三种人皆不能体会“无为”的精旨，故其行为偏弊，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庄周玩世，厌礼法而盗圣人”，“魏晋之士其无欲又不及庄周，不知‘无为治天下’为何物？以为拱手不事事而可治”，结果是王纲解纽而万事瓦裂。“刑名者流”，只知万事皆依法而治，自己就可清静无为。而在执法过程中又“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结果是“仁义退而凉薄之

道德进”，社会永远不得安宁稳定。所以魏源指出，要做到“无为”首先自己要做到“无欲”，可是“后人以急功利之心以求无欲之体”，那又怎能做得到无为呢？那是永远都做不到的。

无为真是无用吗？真是不足以治天下吗？魏源列举历史上采用无为而治取得成功的范例力证无为治国的功效，他说：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后，则惟诊治调息以养复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浓腹削之剂。如西汉承周末文胜七国嬴秦汤火之后，当天下生民大灾患大痈瘵之时，故留侯师黄石，佐高祖，约法三章，盖革苛政酷刑；曹相师盖公，辅齐汉，不扰狱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睹太古焉。此黄老无为可治天下。后世如东汉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遗意，是古无为而治，非不可用于世，明矣。

魏源所举我国古代历史上无为而治的这些范例，确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汉初无为而治的卓越成效。西汉初年在“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上层统治者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国情民意的具体政策，从汉高祖的约法三章开始，逐渐拨乱反正，发展生产，在汉初前三十年已初见成效，而后四十年便大见成效。特别是通过“文景之治”，经济繁荣已超过战国。到汉武帝初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4]。人民与国家都富了起来，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盛世局面，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黄老无为而治在政治上的成效，无疑是显著的[5]。

后世的统治者，一些明智的君主也多效法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采用无为而治的方略，使国家达到中兴、富足和稳定。如东汉的汉光武帝、孝明帝，北魏的孝文帝和后来的宋仁宗和金世宗。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放宽政策，缓和阶级矛盾，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社会秩序得到相对的稳定，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就是《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三、《老子本义》所显现的湖湘文化精神

魏源研究《老子》并非无的放矢。

魏源在学术理论上与龚自珍同属“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他生活在国难当头的年代，清政府的腐朽、鸦片战争的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危亡已在旦夕。作为有血性有抱负的湖南士人怎么能不义愤填膺地站出来，承担起拯救危亡的民族重任，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追求真理是为了救亡，真理从哪里来？一是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二是从火热的斗争实践中总结。魏源勤于读书，善于研究，长于总结，善于运用。他生长在湖南，从小就接受湖湘文化的教育，继承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又迅速地与当时的经世思潮相结合，使他成为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旗帜。

在务实求真的道路上，魏源认为“不关军国要务，无视民族危亡”、“泥古不切时务”的陈腐学风，适足以祸国殃民而不能救弊维新，必须坚决扫除。他要把学术研究引导到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上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引导大家救国救民，挽救危亡。所以他以经世济民的宽广胸怀，写出了《老子本义》。

《老子本义》是魏源早年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审慎的眼光对《老子》来了一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大审视，使湖湘文化精神从中得以发扬光大。

（一）实事求是评价《老子》。自汉以后，到魏晋之时，士大夫崇尚清谈，《老子》遂成为玄学谈资。一方面军阀连年混战，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又不断入侵，统治集团的内讧有增无减。魏晋的名士们面对政治上混乱的局面，面对朝不保夕的无情杀戮，却毫无对策，只好利用《老子》中所讲自然无为的思想，祖尚虚浮，寻找心灵上的慰藉。以虚代实，借以避祸。而国事却与日俱非，最后弄得国破家亡。后人以此为据，认为《老子》无治国之效，而有空谈误国之弊。魏源检阅历史典籍，列举历史上无为治国的有效案例，认为《老子》中的理论，只有根据各个时代的国情民意，对症下药才能救弊。非不可用于世，而是可以治理天下的。魏源感叹地说：“呜呼！甘、酸、辛、苦味不同，蕲适于口；药无偏性，对症为功，在人用之而已。”（《论老子》）所以对《老子》运用正确，即可治国治民，运用不当，流于清谈，则祸国殃民。这就是对古代文化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的甄别精神。

（二）务实求真，敢于创新。魏源在研究《老子》书时，针对历史上的种种论说（包括权威学者的论断），敢于置疑，决不泥古。例如，他经过认真的检阅与考证，证明《老子》非老子所作，老子只不过是口述上古之文而已。这就把包括太史公在内的种种旧有的传统说法给否定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就是务实求真的态度，也是学术上的创新精神。

（三）广汇百家，博采众长。这也是《老子本义》所具有的特点。魏氏在撰著此书时，观其引用书目及采录观点不下百家，把兵家、道家、墨家、儒家有关《老子》的评述，皆择其要加以引用和佐证。这显示了湖南人胸怀宽广、包容天下的伟大情怀。此书合众家之长，博采群秀，扬长避短，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体现了湖湘文化博采众长的包容性。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务实求真，博采众长，创新求治是魏源撰写《老子本义》所体现出来的湖湘文化精神。魏源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发愤图治，笔耕不已。他后来陆续撰写出《墨子章句》、《孙子集句》、《董氏春秋发微》以及经世致用的代表作《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军事，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理想，为中国传统文化向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开端时期的领军人物。

【参考文献】

[1] 参见中华书局：《古史辩》第四、第六册。

[2]《论语·述而》。

[3] 参见拙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第78页。

[4]《汉书·食货志》。

[5] 参见《黄老无为而治与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重建》，载《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24卷第5期。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略论王闿运的诗文创作

周柳燕

近代湖湘之地出现了一个以王闿运为领袖，包括蔡毓春、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及陈锐、曾广钧等人在内的重要诗歌流派——汉魏六朝诗派。王闿运以其惊人的创作实践、较为完整的诗学理论，以及主盟诗坛数十年的声望，使“汉魏六朝诗派”在中国近代诗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该派后期诗人，如陈锐、曾广钧等湘绮门弟子，后出转精，拓宽了诗学宗趣，推动了文学的进步。

王闿运对其诗最为自负，《湘绮楼诗文集》[1]录存湘绮诗1600多首。其诗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2]，从太平军起义到辛亥革命，他一生所历重大事件均在诗作中有所反映，足备史阙。其中，30余首诗关涉太平天国运动，较著者如《喜闻官军收复九江，寄胡巡抚》、《建昌军中，夜月感事作。赠曾侍郎，时有三河之败》、《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寄曾总督国藩，兼呈同行诸君子》、《独行谣，三十章，四百四十八韵，凡四千四百八十五字，感赠邓辅纶》、《马将军歌》、《铜关行，寄章寿麟，题感旧图》等。《独行谣……》是记述太平天国运动最完整的鸿篇巨制，诗前小序云：“盖明于得失之迹，达于事变，怀其旧俗，国史之志也。故综述时贤，详记大政，俟后世贤人君子。”作者有意记录亲身经历的一段史实，让人们获得思想启迪和艺术感受。组诗其五描述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时的场面：

余时至乐平，千里一肩舆。平行至城根，不见官贼徒。夜投渔舟宿，烹菘肥似膏。明晨告府主，帖下架鹿卢。将相共出入，吾亦縋我腰。犹蒙丘嫂嘲，哑哑笑悬猪……城中尚欢笑，仕女纵娱游。虽闻地雷鸣，不敌瞿邓刀。如何洋炮威，近欲欺中华。厉阶蚩尤兵，矢石更磺硝。兵火终自焚，利器岂防躯。

把农民运动的威力、大小官吏的狼狈、城中市民的优游写得生动传神，而在鲜明的对比中，战争胜负也不点自明。描绘下层百姓苦难生活的诗更多，如太平天国时期湘潭农村石泥塘的荒凉景象：“我来投宿无所投，荒村寥落经深秋。此乡先氏旧卜宅，良田华屋皆虚丘……其中男妇坐丛杂，数日已见厨无烟。”[3]衣

食无着的寒士军中求生的无奈情景："白羽腰雕弓，朝夕夹道驰。仆本郡国士，非是羽林儿。无家迫衣食，应募赴征期……刀剑各在手，不知当向谁。"[4] 经历战乱的湖南百姓复遭严重蝗灾的情况："彭郎亲夺小姑回，楚尾吴头战鼓催。独向荒村沽浊酒，飞蝗如雨渡江来。"[5] 尽现战争和社会动乱中民生凋敝的景况。

王闿运在词章与意境方面取裁于古，却使诗作切近现实社会问题，并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如《拟焦仲卿诗一首，李清照妻墓下作》，自诗前小序到开篇以至结尾，虽着力模仿，但内容却与原作大不相同，对一对佣人夫妻被主人逼迫而死寄予深切同情，且篇中不乏佳句：

……红白左右靥，不用粉与珠。斜肩若垂玉，回腰带轻襦。素手出广袖，青绣缘领裾……激我义烈情，吐我心郁快。长号啼向天，哽咽涕盈眶。举手谢夫子，相见待泉壤……南坡秋草长，墓上青松垂。子规过之啼，秋去春复深。生是连枝木，死是双飞禽……

诗中写民妇之容貌与装束，赴死之刚烈与凄凉以及墓旁之秋草无语、子规声声，皆真意饱满，恰到好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我们也注意到，王闿运反映时事的诗作也有晦涩朦胧、令人费解之弊。如《甲午游仙五首》其一：

湘瑟秋清懒更弹，只言骑虎胜骖鸾。东华旧吏犹簪笔，南岳真妃肯降坛。叔夜倘凭金换骨，陈平何用玉为冠。淮王自许能骄贵，却被人呼作下官。

此诗乍看似为恍惚迷离的游戏之作，要理解其中意味深长的幽愤之情，一则需了解诗歌的写作背景：甲午战起，湖南巡抚吴大澂亲自率湘军赴援，湘军旧将余虎恩自请随行，战争中抗命误事，吴大澂大言误国，一战而溃。这组"游仙"诗便是由此生发。再则需弄懂诗中"东华旧吏"、"南岳真妃"，以及"换骨"、"淮王"皆隐有所指，这一点幸而有诗人自注可供参阅，否则读者确实不好揣摩。王闿运弟子杨钧就此常感困惑："湘绮书札，喜用当时语，故读者多不能解。余尝约伯谅（王代功——笔者注）为湘绮楼诗文笺注，以非伯谅不能知也。而伯谅成《年谱》后，即作古人，余一人不能胜任，其不可解者，终不得解矣。"[6]

王闿运为人处世恬淡洒脱，一生交友甚广，与亲友酬唱应和及思亲念友的诗数量最多，其中哀婉伤悼之作较为感人。如：

初月无端入王棂，露痕如白又如青。不成眉样依明镜，遥想啼痕染素馨。自是长愁甘解脱，未应多慧语娉婷。文姬死后知音少，吟尽伤心只自听。

（《重悼师芳》）

萼绿华来定有双，每随阿母在瑶窗。俱题玉篆留三岛，并结明珠到九江。风过只余花袅袅，月移谁见影幢幢。五年梦醒头成雪，愁对黄英照碧缸。

（《盼女新逝，再作吊之》）

这些都是情真意切的和泪之作，也是王闿运最初专攻七言近体，后将未曾留稿的七律编次为《杜若集》中的佳作。

王闿运性好远游，大半生奔走江湖，足迹遍及长江上下、大河南北，与山水名胜结下不解之缘，创作了较具特色的山水诗。他早年曾编纂《唐十家诗钞》十六卷，选取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韦应物、储光羲、钱起、常建十人诗作，加以鉴赏品评，其中多为山水田园诗，可见王闿运早期的诗学审美情趣。此类作品，诸体皆佳，多于山水名胜的沉醉中营造出令人神往的意境。如：

众青不断色，远响惊清秋。朱陵竦孤厓，飞泉束崩流。素湍照白日，玄涧映愈幽。青天静无声，翠壁俯寒湫。空雨忽破碎，高云偶迟留。宛宛雌蜺蜷，荒荒烈飙休。

（《朱陵洞瀑》）

轻寒万里春无迹，碧海平波芳草色。万斛舟浮一叶来，素浪惊斜如鹭翼。重三上巳接清明，令节良游旷荡情。流杯本自通天汉，钻火还应就柳星。成山一发横烟雾，岸外斜阳光若曙。却惜秦皇不遇时，鞭桥怅望蓬莱路。天际故人从鄮来，当年鸣炮海波开。喜接新莺入丹禁，共出樊笼览九垓。沧溟蠢蠢千年晦，不及江湖有灵怪。飙轮坐运恣汪洋，始翔六合通无外。迟日春华澜漫游，潮声随月更西流。明朝好折潞沽柳，绿满兰皋啸紫骝。

（《三月三日泛海作，赠薛叔芸福成》）

前者状写朱陵洞飞瀑奇景，由远而近，动静兼生，声色俱全，辞采绚烂，奇气盘郁；后者描绘乘舟出海所见景观，用语雄浑，境界阔大，衬托出满怀豪情。其山水七绝，则情致芊绵，意境幽远，自然工丽：

龙池璧水漾轻澌，正午风微日渐迟。杨柳未黄萱未绿，嫩春先转碧桃枝。

（《春近四绝句》其一）

猎猎南风拂驿亭，五更牵缆上空泠。惯行不解愁风水，涧瀑滩雷只卧听。

（《泊昭灵滩下，早行，南风甚壮，船人殊不顾也。得诗一首》）

弯桥已过九华兴，樟树青葱到诞登。大坨漫漫连累石，新开盆岭入南城。

（《还长沙，北风，顾役加班，径由陆行》）

脍炙人口的《圆明园词》于景色描摹中着眼民生疾苦，大胆讥评时事，虽系模仿之作，但自出新意，写得酣畅淋漓，忧愤沉痛，文采斐然：

……十八篱门随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斋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殷勤无逸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玉泉悲咽

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当时仓卒动铃驼，守宫上直余嫔娥。芦笳短吹随秋月，豆粥长饥望热河……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谓之"韵律调新，风情宛然。乃学唐元稹之《连昌宫词》，不为高古，于《湘绮楼》为变格"。此诗一出，都城人士争相传写，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誉。此外，如《泰山诗孟冬宿日登山作》、《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重游虎丘》诸作，无不取法于古而又自出真意；《论诗绝句》十四首亦如此，形式上仿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实则基于其诗学观评骘诗人，议论允当，自出新见，确实可以并美。

王闿运中年以后，始从事于词。虽早在1852年就曾到南昌问词于孙月坡先生，但对词一直不甚措意，曾云："湘人质实，宜不能词，故先辈遂无词家。"[7]光绪二十三年（1897）评点张炎词，编纂《湘绮楼词选》三卷，并作序。序云："往者，孙月坡工填词，为陈希唐师。同在南昌，与邓辛眉日相唱和。余弱冠，方抗意汉魏诗文，未屑屑也，亦实不解其妙处。及还长沙，闻李伯元及希唐并殉国守，独对所题燕子图，吟想悲凄，始作小令。长慢虽不工，于月坡所言门径固识之矣。"语甚谦逊，却又自认为词多"精华名篇"。如《归国谣·为俞廙仙题彭雪琴画梅》：

姑射貌[8]。旧日酒边曾索笑。春风吹醒人年少。花开花落情多少。明蟾照，人间只有西湖好。

王闿运吟罢自赏，称"笔有仙气"，"亦值千金"。又如《琵琶仙·孔东塘所藏韩滉小忽雷叶东卿拓本，今在陶斋，乙巳上元日感题》：

马上胡笳，更安史乱后，琵琶凄切。谁道经画江淮，繁华未销歇。檀槽手制，几回看，柳花如雪。元相征歌，李謩擫笛，长自呜咽。　想秦蜀，流落千年，又新染，桃花扇边血。多少玉颜漂泊，叹腥膻宫阙。只一曲，逊逻沙尘，把古今，积恨弹彻。说甚叶氏韩家，那时喧热。

此词本是端方嘱请题诗，且称"好诗题"，而王闿运谓为词题，作毕复自赞叹，以为"悲壮空灵，词中上乘"。张德瀛《词征》称"王壬秋词，如崇冈建楼，危言陡立"。王先谦辑《六家词钞》，选录王闿运诗16首，则多非作者所自许者。

王闿运"年垂五十……间及填词，稍稍为之"[9]，应者寥寥，词作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无法与诗歌比肩，其风采气韵但可一观。他的词基本不涉及社会政治问题。有的词含蓄委婉，借物抒怀。如《辘卢金井·废圃寻春，见樱桃花，感赋》："玉窗长别，分今生、不见泪痕弹粉。春梦潜窥，蓦相逢傍晚，亭亭细问。背人处，

倩妆谁认？朝雨香残，斜门烟弹，耐他思忖。常时上林芳讯。见玉妃侵晓，撩乱双鬟。妒杀妖桃，占东风不稳。如今瘦损，悔前度、挂心提恨。"通过描写风雨"妒杀"下，"妖桃"瘦损香残，表现对佳人抑或命运的深切惋惜之情，钱仲联以为此词"亦可谓从有寄托入，从无寄托出"[10]，叶恭绰将其收入《全清词钞》。有的词慷慨悲凉，直抒胸臆。如《摸鱼儿·庚午题岳阳楼，用稼轩韵》："问汀洲，几多芳草，青青远黏天去。少年儿女春闺意，又对流光重数。留不住。烟波恨，逡巡踏破湖边路。凭栏不语。待更不伤心，此心仍似，一点未飞絮。人间似，离合悲欢总误。无情犹有痴妒。愁来漫写《登楼赋》，不遇解人谁诉？梁燕舞。还只恐、洞庭也化桑田土。当年战苦。休更说周郎，风流尽在，千古浪淘处。"登临忆旧，抒千古之恨意难平；步前人韵，承悲壮之风开新境。《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闿运才气纵横，不可羁束，然其所为词，不逞才性，而能敛以南宋词人之矩度，故颇具清刚之气，自为词家一作手。"[11]还有的词描述生活，天然清朗。如《玉漏迟·滋摘蚕豆寄窕，为作一词，索才女和》："好春蚕事早。竹外篱边，豆花香了。自挈筠笼，摘得绿珠圆小。城里新开菜市，应不比、家园风调。樱笋较。甘芳略胜，点盐刚好。曾闻峡口逢仙，说姊妹相携，世尘难到。二兄、四姊于巫山逢仙女数人岸旁摘蚕豆。近日相煎，怕被豆根诗恼。寄与尝新一笑。想念我、晨妆眉埽。风露晓。园中芥茎将老。"道家常，抒亲情，秉持自然蕴天趣，绝去雕饰显真心，此景此情，令人向往不已。

王闿运的文章，师法魏晋，骈散兼善，新意迭现。最著者当推《湘军志》，虽然其作志立场不足为道，但一意步司马迁、陈寿、范晔后尘，直言无隐，据实将清军之暴虐扰民、钩心斗角、贪财劫抢，以及义军之英勇气概、赫赫声威再现笔端，以致书成之后章寿麟欲饱以老拳，曾国荃扬言灭杀，郭嵩焘勒令毁版，王定安另撰《湘军记》。但《湘军志》仍不胫而走，不久重版，广行于世，赢得嘉誉。"咸丰二年冬，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杀。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则奸人倡伪议谋通贼"[12]。"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镃货尽入军中"[13]。"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14]。"寇兴四年，而湖北军五溃。杨霈之败也，实未见寇，乱民一呼，而万众瓦解"[15]。上引诸段不虚美、不隐恶，确为客观的史家笔法，体现了作者特立独行的品性。《湘军志》的艺术价值亦皎然可睹，如文辞华美流畅，谋篇雅洁有法，史料繁简精当，笔锋蕴含褒贬，皆达到较高的审美境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此书"文辞高健，为唐后良史第一"。

其次为碑、诔、传、行状、墓志等文体，尤以传记和墓志擅名。王闿运传记作品巧于立意，精于取材，人物栩栩如生，李仁元、陈景雍、丁锐义、严咸等，令人过目不忘。又擅长通过传主事迹，折射社会现实。如《今烈女传·辨通》记叙咸丰九年真实事件，满洲“女童”直斥召选总管和皇帝：“朝廷立事，各有其时。今四方兵寇，京饷不给。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无见粮，父子不相保。未闻选用将相，召见贤士。今日选妃，明日挑女。吾闻古有无道昏主，今其是邪？”此言于短文中重复两次，义正词严，锋芒毕露，旁者因之“流汗咋舌，不敢卒听”，“女童”的个性与胆识却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显现无遗，让人慨叹不止。王闿运文体意识清醒，善于根据文体特点选材结篇，其为彭玉麟所撰行状与墓志铭，写法迥异。前者以散体为主，下笔万言，依时序记死者生平事迹，叙事详尽，考证具体，语言平实，为典型的历史类散文笔法；后者不足千字，除“铭”外仅三百余字，骈散兼行，选材独特，对亡者的盖世功业及显赫声名，只以两句概之，高度凝练，笔墨着眼于其痛苦遭际，突出其非凡人格，是极具个性的文章写法。杨钧云：“湘绮之文，墓志第一。数千年来，碑、志未分，凡为一体。湘绮崛起，体格判然，峭妙轻灵，难于踪迹。余闻之湘绮曰：‘作墓志，须叙其生平不得意事，以别传记。’……文思大进，深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之法。”[16]

王闿运最淳雅的美文当是以写景状物、抒写性情为主的篇章。27 岁作《秋醒词序》，其辞曰：

嗟乎！镜非辞照，真性在不照之间；川无舍流，静因有不流之体。然则屡照足以疲镜，长流足以损川，推移之时，微乎其难测也。且齐有穿石之水，吴有风磨之铜，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坠而颖秃，积渐之势也。笋一旬而成竹，松百年而参天，迟速之效也。人或以百年为促，而不知积损之已久；或以耄期为寿，而不悟佚我之无多。是犹夏虫之疑冰，冬鹖之忌雪矣。一年以来，偶有斯觉，未觉之顷，相习为安。况同景异情，觉而仍梦。庸得不即机自警，依影冥心者哉？于斯时也，从静得感，从感生空，意御列风之是非，乘轩云而升降，接卢遨之汗漫，入李叟之有无，犹陈思之登鱼山，茂陵之叹敝屣也。

选用典故和比喻，深婉细腻地抒发独特的人生感悟，文采风流，直逼六朝，同时作家，很少有能达到如此水平者。当时桐城文派占据文坛，一般人多随声附和方、姚义法，不免有矮人观戏之弊，而王闿运却不随人热，另辟蹊径，所以能够卓然自立。其他作品，如《思归引序》、《哀江南赋》、《愁霖赋》、《吊旧赋》、《到广州与妇书》等，单复并用，相得益彰，满纸清逸，读来心旷神怡。

历来论者，大多以“摹拟论”、“复古主义”甚至“假古董”看待王闿运诗文创作及其主张，如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绮五言古体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言，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盖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云：“后人喜为汉魏六朝之诗，有辞无意，触目皆是。此以古人之情感与意境为情感、意境……王闿运五言律学杜陵，古体诗学魏晋六朝，亦坐此病。”柳亚子《论诗六绝句》更以“古色斓斑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加以訾议……其实，他们的评论多有不察其详之弊。综观上述诸论，以为王闿运的诗作与诗论全无可取处，恐不尽然。

王闿运高龄长寿，著述甚丰，从学者益众，一生以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不应低估。李肖聃《湘绮遗书跋》说：“翁以文若之逸才，勤伯业之老学，复治申培之经术，享伏胜之大年，卓然大成，迥绝百代。此即离居异域，生不同时，犹或闻声而相思，观文而遥契；而况乡里后进，追随杖履，晋接音尘，亲读丛书，叩闻口说者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夏寿田、易顺鼎、曾广钧等均得教益于王闿运，其影响及乎全国。钱仲联为毛谷风编《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撰序亦云：“二十世纪之诗词，其成就果如何可乎？……王闿运为首之湖湘派，馀晖远霭，犹照一方。”湖湘诗派起自清末，降至二十世纪，“馀晖远霭”，光彩照人，其影响可谓深远矣。

【参考文献】

[1]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 1996 年版。

[2] 陈衍：《石遗室诗话》。

[3]《石泥塘是高曾旧居。道光卅年，闿运入县学，始诣宅访诸父兄弟。宗门衰弱，多不能自存者。耳目闻见，为此篇》。

[4]《从军诗》。

[5]《戊午七夕词》。

[6] 杨钧：《草堂之灵》。

[7]《张雨珊词序》。

[8]“貌”字当作“藐”。《庄子·逍遥游》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王词即本此。

[9]《湘绮楼词选》自序。

[10] 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

[11]《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集部第七六五。

[12] [13] [14] [15]《湘军志》之《曾军篇》、《曾军后篇》、《营制篇》、《湖北篇》。

[16] 杨钧：《草堂之灵》。

清代湖湘名儒胡达源及其名著《弟子箴言》

胡渐逵

清代湖湘名儒胡达源（1777—1841），字清甫，号云阁，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乡长冈村（今属益阳市赫山区）人。他六岁发蒙，幼随祖父襟江公读书。稍长，其父律臣公（秀才）授诗书经史。二十岁入岳麓书院读书十年，为院长罗典弟子。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科，胡达源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俗称探花）。旋入翰林院，授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编修，晋国子监司业。胡达源又曾主讲于长沙城南书院，任云南乡试主考官及贵州学政，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充日讲起居注官，实录馆纂修。嘉庆帝赏其书法，命为提调官，总领馆事。湖南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湖南省志·人物志》说，胡达源“视学贵州时，黔中有大定武举吴甲父子，为当地恶霸，党羽遍郡县，曾屡辱学官，大吏不敢问。达源尽揭其奸恶上奏，置之以法，一郡称快。任满还朝，授学士。时逢大饥，京师设粥厂，达源以学士领厂事。人给五日粮，男女分途领取，升斗筹票，亲为验发，帝甚嘉奖”。胡达源待人宽厚，律己甚严，为官多年，敬上爱下，清正勤谨。他一生饱读诗书，熟谙经史，学宗宋儒，崇奉理学。其著作最著名者为《弟子箴言》，此外，还有《闻妙香轩诗文集》。其子林翼，道光进士，湘军著名首领，官至湖北巡抚，名满天下。《弟子箴言》今已收入《湖湘文库》，正拟整理出版。那么，以书名而论，《弟子箴言》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弟子这个词有好几个意思，或指子侄，或指学生，或指年轻人。这里所指的弟子，究竟指哪种人呢？我以为应该包括以上三者。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该书的箴言，对以上三者都是颇有教益的。那么，箴言是什么意思？箴即古针字，针可以治疗疾病，因此，这里的箴言，就是规诫之言的意思。胡达源为何写《弟子箴言》？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程子曰：‘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使皆盈耳充腹。若固有之后，虽有谗说谣惑，不能人也。’然则教弟子者，岂可以不豫哉？”由此表明，胡达源于箴言对弟子的教育，必须从思想尚未定型的幼时做起，认识是深刻的。《礼记·中庸》说：“凡事豫则立。”信哉斯言！关于箴言对教育弟子的重要作用，胡达源在《弟子箴言》

的自序中谈了自己的深刻体会。他说：

达源方六岁，先祖襟江公教之读书，于古人嘉言善行，随时指授，辄有所感触于心。稍长，侍家大人讲席，督策益严。凡掖之使进于善，杜之使远于恶者，引据古今，旁通互证，津津焉不倦于口……通籍（此指进士初及第）后，益得闻绪论于大人长者之前。盖其提撕警觉，莫不精微洞透，劝戒炯然，此达源所夙夜秉承，而不敢放逸怠惰。以自暴弃者也。

胡达源因自幼至长，“备承父师之教”[1]，获益于古之格言善行者甚多，故他推己而及于弟子：“独不思推衍绪馀，为弟子诲乎？”[2]仁者胡达源既萌此善心，亦即付诸行动。于是执笔撮举旧闻，曲喻其情，引申其义。“或援经以明得失之机，或证史以立是非之鉴”[3]。从而寓箴规、劝善、惩恶、防邪之意。

综观以上所述可知，胡达源著《弟子箴言》，是因为他深知，“今日之弟子，异日之成材也”[4]。也就是说，他是为国育才而著此书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在该书自序的末尾恳切地说：他对弟子乐其贤而虑其恶，他希望弟子“奋发果毅，笃实践履。毋好奇，毋自是，毋畏难苟安”[5]。学圣贤，讲道德，“时敏日新”[6]，德崇业广，从而使该书为“弟子成材之助”[7]。

《弟子箴言》全书共十六卷，每卷一个内容，兹略举其例，简介于下。

胡达源说：“士莫先于奋志气”[8]，因此，他将“奋志气”置于《弟子箴言》卷首。该卷激励弟子奋发向上之言六十则，其中如：“学者立志，必要做第一等事，必要做第一等人。”又如：“志如大将，气如三军。大将指挥，三军雷动，未有志奋而力不足者。”均可作弟子的座右铭。

胡达源说：“学问则择执（择善事而执著行之。语出《礼记·中庸》：‘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之功”[9]，故卷二为“勤学问”。该卷勉励弟子勤学之言四十二则，其中如：“圣人论学曰‘日新’，无一日之可旷也；曰‘时习’，无一时之不勉也，可不儆哉！”又如：“工夫只要一个熟字。经籍纷纶，名言至论，须令胸中烂熟，则心与理一矣。”均为警策之言。

胡达源说：士“莫切于正身心”[10]，故卷三为“正身心”。该卷劝告弟子务须正身心之言六十八则，其中如：“身心若要勤紧收拾，须将整、齐、严、肃四字时悬于心目之间。”又如：“虽至鄙至陋处，皆当存谨畏之心而不可忽。工夫愈精密，身心愈谨严。”确为正身心之至理。

胡达源说：“言语则荣辱之主”[11]，故卷四为“慎言语”。该卷告诫弟子慎言语之言四十九则，其中如：“人之招祸，惟言为甚，密于言语，则是非不形，而祸可免矣。”又如：“人可以毁誉加于我，我不可以毁誉加于人。”均为金玉

良言。

胡达源主张“修其彝伦族党之谊”[12]。故卷五为“笃伦纪”。该卷教育弟子“笃伦纪”之言五十一则，其中如：“孝莫大于守身，守身莫要于敬事。一事不敬，小则辱亲，大则祸亲，敢不敬乎？”又如：“菽水承欢，不必三牲之奉养。椎牛致祭，不如鸡黍之亲尝。故‘孝子爱日’。”均系嘉言。

卷六为“睦族邻”，共四十六则，其中援引其祖父襟江公《宗族约言》八条，又书所居里仁桥美俗六条，均为睦族邻的有效措施。

卷七为“亲君子”，共三十六则，其中引先哲时贤亲君子故事甚多，对弟子很有教育意义。

卷八为“远小人”，共四十六则，其中如：“道义中有全交，势利中无完友，质直敢言者为诤友，善柔顺意者非良朋。”明确提出了交友的基本原则。又如：“以浮躁为才，则必偾事。以沉静为拙，则必失人。”明确指出了用人的基本原则。

卷九为“明礼教”，共四十五则，其中多为引《礼记》及理学家语而谈自己的心得之言。

卷十为“辨义利”，共四十五则，其中如：“居乡而为乡愿，居官而为鄙夫，总是‘利’字上打不破。”又如：“精于义者眼界大，心地平；徇于利者眼界小，心地险。”真是一针见血之言。

胡达源说：“谦让节俭，善之修也。”[13]故卷十一为“崇谦让”，卷十二为“尚节俭”。卷十一共三十九则，其中如：“‘并坐不横肱’，学者须识得此意，更须能推广此意。”表明胡氏认为，弟子遇事均须谦让。卷十二共四十八则，其中如：“一人之俭，能化导于一家，其家长可敬。一家之俭，皆禀命于一人，其家众可爱。”堪作治家格言。

胡达源说：“骄惰奢侈，恶之戒也。”[14]故卷十三为“儆骄惰”，卷十四为“戒奢侈”。卷十三共六十则，其中如：“有一分谦退，便有一分受益处。有一分矜张，便有一分挫折来。”通过对比，将谦、骄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显现出来。卷十四共四十四则，其中如：“位过其德，禄过其才，任过其力，言过其行，此奢侈之大也。”这些话充分表明，胡氏认为，戒奢侈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方面。

卷十五为“扩才识”，卷十六为“裕经济”。胡氏为何将这两项放在该书之末呢？他在《自序》中说：“德备而才全，体明而用适，故以扩才识、裕经济终焉。”卷十五共四十三则，其中如：“可与守经，可与达权，可与安常，可与应变，方见才识之大。”表明知人才识大否，须从何处观察。卷十六共四十则，其中多为论述先哲前贤经国济民的故事。

该书告诫弟子的箴言共七百六十二则，以上所举之例，仅为鼎中一脔。本文因限于篇幅，故书中许多嘉言美事不能备举。全书叙事简洁，析理深刻，比喻生动，行文流畅，语言明快。

《弟子箴言》曾由著者胡达源之子胡林翼校勘，此次收入《湖湘文库》出版，由著者的六世孙胡渐逵据清道光乙未（1835）闻妙香轩存版本点校。在校勘中，校者发现该本偶有极个别的千虑之失。如卷七有一则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这话引自《孟子·离娄上》，该篇下句作"政不足与间也"，从而与上句相对。据此，故于下句"足"字后补一"与"字，并出校说明。又如卷十二有一则说："……《周》赞《羔羊》，表委蛇之有度。"但《羔羊》乃《诗·召南》之诗，故据以改《周》为《召》，并出校说明。又如卷十四有一则说："《旅獒》之贡，召公戒之，谓方物之献，'惟服饰器用之常耳……'"但"服饰"之"饰"，《书·旅獒》作"食"，故据以改"饰"为"食"，并出校说明。

《弟子箴言》在清代出版后，流传甚广，颇获好评。时人评论说，该书能融会先儒诸说，参以己意，语皆心得，而有裨世教。晚清著名学者吴大澂任湖南巡抚时，于1893年冬至次年春，阅读了《弟子箴言》，作眉批四百三十九条，其析理透彻，语多警策，对该书评价甚高。

《弟子箴言》使胡林翼受益匪浅，这正如吴大澂在该书《睦族邻》的眉批中说的："有教化而后有人才。从胡文忠（胡林翼谥号）之才，而家教如此积之厚者，其发之也必盛，夫岂偶然哉？"

《弟子箴言》是清代中叶一部教育弟子的名著，书中所灌输的，自然是封建思想意识，对此，我们当然应该予以剔除批判。然而这又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其中不乏我中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良传统美德，对此，我们当然应该予以继承发扬。读此书者，望能细察明辨，领悟深思。

【参考文献】

[1] 至 [14] 均引自胡达源《弟子箴言》自序。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由一封彭玉麟佚札引出的曾国华一身两尸案

于 蕾

曾国华，原字谦斋，派名传谦，曾国藩二弟，出抚叔父曾毓驷。据1946年《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载："毓驷抚子传谦，本生系毓济三子，名国华，号温甫，一号深斋，行宽六。清太学生，立功历保尽先选用同知，赏戴蓝翎，统带湖南兵勇，追赠道员，照道员例从优议恤，加赠太常寺卿，追赠通议大夫，入祀京师昭忠祠及本籍阵亡地方府城昭忠祠。国史馆立传，御赐葬银，赐祭一坛，赏骑都尉世职。予谥愍烈，赠资政大夫。清道光二年壬午五月二十六日子时生，年三十七岁。咸丰八年戊午十月初十日戌时在安徽三河镇阵亡。旋葬衡阳十六都上峰庵山后左钳窝癸山丁向兼丑未。"

曾国华于清道光二十六年乡试落第后，从此英气消磨，功课荒毁，常做出许多荒唐之事。后纳得一监生。洪杨事起后，奉兄令在乡办团练，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江西连破八府五十余州县，曾国藩坐困南昌，数月音讯全无。曾国华赴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发兵五千交曾国华统帅驰援。从未带过兵的曾国华连克数县，为南昌解围发挥了重要作用，擢同知，赏戴花翎。时曾毓济去世，曾国藩、曾国华兄弟丁忧回籍。由于曾国华已过继叔父，只需守制一年，遂于翌年由其儿女亲家湘军大将李续宾（字迪庵）奏调复出，襄理军务。咸丰八年十月初十，李续宾部在安徽庐州三河镇遭太平军陈玉成部合围，部卒六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李续宾及曾国华皆死于乱军之中。三河之役是湘军成军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史载其时湘乡"家家悬幡，户户哀声"。曾国藩悲恸填膺，减食数日，泣血写道："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收到噩耗后，曾国藩致曾国璜、曾国荃、曾国葆诸弟家书中称："温弟少时性情高傲，未就温和，故吾以温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见，则喜其性格之大变，相亲相友，欢欣和畅。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闳，辞

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长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自去冬今春以来，吾喜温弟之言论风旨洞达时事，综括机要。出门以后，至兰溪相见，相亲相友，和畅如在江西瑞州之时，八九月后，屡次来信，亦皆和平稳惬，无躁无矜。方意渠与迪庵相处，所依得人，必得名位俱进，不料祸如是之惨。迪公一军，所向无前，立于不败之地，不特余以为然，即数省官绅军民，人人皆以为然。此次大变，迪庵与温弟皆不得收葬遗骨，伤心曷极。”战后曾国藩委托湖北巡抚胡林翼及部属彭玉麟等设法寻觅曾国华尸身。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胡达源子。陶澍婿。清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二十六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在黔八年，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春，出黔抗击太平军，升四川按察使，仍驻防岳州。9月调任湖北按察使，赴援九江。五年升湖北布政使，署湖北巡抚。同治元年因过劳呕血而死。谥文忠。彭玉麟（1816—1890），号雪琴。湖南衡阳人。清咸丰三年随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七年授水师提督，历功累官授兵部右侍郎，加太子少保。光绪七年署两江总督，九年授兵部尚书，十年中法战争期间，受命赴广东办防务，十四年巡阅长江，后以病开缺回籍。卒赠太子太保，谥刚直。

在曾国藩日记及信札中，也曾多次提及遣人寻觅曾国华尸身事。如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彭玉麟札称：“吾于舍弟之逝，尚非酷痛，惟遗骨莫收，极为伤心。若能如天之福，提师再至三河，收寻迪庵与舍弟遗骸，庶可稍慰吾亲于地下。”十二月十九日致胡林翼、李续宜札称：“迪公与筱石遗骸均已寻得，大快大快。温甫舍弟遗蜕，荷蒙希庵亲家多方购觅，不惜重资，感谢曷胜？惟无人认识，终恐难辨。兹派杨名声、杨镇南、张吟三人，并朱副将营内之自贼中来投者二人前往寻觅，敬求希庵亲家致书霍山王令，务祈购一妙线，带此五人中之一二，亲赴三河故垒寻认，以期有得。”

次年正月二十七曾国藩收到胡林翼札，言已寻获曾国华无首尸身。次日曾氏致胡林翼札称：“正月二十七日专丁到，接奉十九惠书，得知舍弟温甫遗蜕仰仗大力，业经寻获，舍家世世，永感厚泽，舍温弟亦九原衔感，结草图报矣。先轸丧元，又幸事中之一大不幸。然少得归骨，慰情聊胜……杨名声、杨镇南、张吟三弁，祈即饬令妥送灵榇回至湘乡，霍山王明府处、刘步瀛处，共用去银若干？并求查明示知，以便速寄。”同日致杨名声等三人札称：“二十七夜接来禀，知舍弟温甫遗骸业经寻得，三位辛苦跋涉，为功甚大，感谢，感谢。比来谅至黄州矣。”同日致曾国璜诸弟家书称：“二十七日亥刻接胡润公专丁来信，知温甫弟忠骸业经寻获，是犹不幸中之一幸。惟先轸丧元，又幸中之一大不幸。”胡林翼

咸丰九年正月十九日致李元度札称：“温公之忠骨已得，系湖广督标马兵刘步瀛之力。去年觅迪公与小石之忠骸，亦此人也。”又正月某日致曾国藩札称：“温公忠骸近日可到，当善为护送，敬慰德念。”又正月某日致李元度札称：“温公忠骨近日可到黄州，先轸丧元，肖形同葬，此刘步瀛一人之力也。”由此可知，刘步瀛找到的仅是曾国华无首之身，便雕刻一木头人首与尸身同殓。刘步瀛事迹不详，当为胡林翼部属。三月初三，胡林翼派员护送曾国华棺椋自湖北黄州启程回湘，曾国藩乃令曾国荃晋省迎接，并亲自护送回湘乡原籍安葬。三月初十棺抵湘乡。曾国藩亦于二月二十七日通告彭玉麟毋庸再觅，札称：“舍弟温甫忠骨业经寻得，初三日自黄州还湘，荷垂格外关垂，感激何极。李秉苑所雇之姜姓，望饬令无庸再觅。”而此前彭已遣人前往仍属太平军控制的三河镇，一时无法召回。直至四月底，彭氏遣出之人返回，称已找到曾国华之尸，这让彭玉麟左右为难，又不得不据实禀报。乃于清咸丰九年五月十五日作一长函，报告觅尸经过。于五月二十四日函抵曾国藩处。

札称：“十二日奉到初六日手谕……春间麟往黄州，口李秉苑觅石牌监生姜瀛往三河寻六世叔忠体遗骸，在湖口请路票护送前往。嗣后王令由霍山送归忠骸，奉钧示饬姜瀛不必前往。而维时该监生已由水路绕巢湖往三河去矣，无从追回。今十五，该监生来湖口，据称觅得六世叔全副忠骨确实不误。言渠到三河，觅有伪官李起传。据李起传称，迪庵偕六世叔等到三河，连破贼营多处，乃李起传之子李贤明带路作向导，其在大营见过六世叔，是以认得。因大营被陷，贼擒李，胁充伪司帅，故得出入贼中，而于港内得六世叔尸，浅埋之。该监生始信真，同与葬处起出，买通贼卡，至大通投红单船李德麟镇军处，衣冠、公服、棺木，皆李镇军代办，尽善尽美，颇丰厚。其一切用费皆李镇答允代之。刻下灵柩在李镇营次。该监生言，除其用去一百七八十花钞外，李镇亦用不少。该监生留人守之，因必由皖城下过，恐为贼搜出，不敢载来，必须黄石矶出大队至安庆，知会红单船李镇，派船护送，彼此交替，始得灵柩至皖。李镇特遣姜瀛先赴上游，言明所以之故，定夺。麟思此事出于两岐，前后孰真孰假，皆莫可辨。前次无元，此次有首，且据姜瀛所述李起传觅得遗骸所在，恰与去冬逃出各勇所言六世叔尽忠之处相符。且阅该监生呈李起传所开向导，同我军破贼垒日期相符，似乎应识六世叔，亦未可知。麟细细盘诘，该监生语言动静又皆诚谨，非似妄为之人。且受李秉苑深托，慨然携带货物，并同避难一家老小前往虎口。半载以来，颇遭艰险。初至三河，被贼擒抬轿，头受刀伤，淹留数日，始又逃出贼营，方行觅得李起传，暗办此事。又据该监生禀称，红单船李镇军初见其觅得六世叔忠骸为喜，故事事照料周备。

因于本月初四得厚庵信，言六世叔忠骨已归梓里，此恐不实，故李镇亦如入冰窖，且将责姜瀛之妄，欲办之，扣留姜瀛老小家室□□并货物于大通，使其来上游请命，以候信息。今姜瀛进退维谷，不特不欲功赏，且恳求再四免累。麟亦未敢作主，特专跑夫同该监生来抚，求夫子定夺，作何办法。且祈面询姜瀛一切底细、得尸缘由。据姜瀛言，棺木尚未钉封，原留以沥血、辨认真假耳。以麟之愚见，纵非六世叔，亦必是一具忠骸，但不知谁何耳。当作何安置办理，求训示遵行。恭请慈安，伏乞钧鉴。受业玉麟谨禀。十五夜。”

曾国藩阅后于信端批示“不复，归密卷第二”，又有“二十六复”字样。复函已收入《曾文正公全集》，函称：“二十三日得专夫赍到惠缄，敬悉一切。去年三河一案，今岁寻得者，未敢信其必真，然希庵所派之朱弁去舍间仅二里许，从舍弟已历二年，敝处所派之杨、张二弁亦向系相识，三人同往辨，似尚可信。姜瀛所述情节，颇多支离，李起传所开初九破营之说，日期亦不符合，所称认识之语，尤难凭信。惟姜瀛曾受李秉苑之托，李秉苑曾奉鄙人之批，并非无因而至。前者且所陈情状，必是三河同殉之忠骸，应请阁下以公牍私缄知照李镇军，即将前项棺具，由大通载至湖口，择地安厝，俾姜瀛得释目前之累，鄙人不食前批之言。而此项忠骸亦得永妥异域之灵。”

其实胡林翼所觅之尸无首，彭氏所获有头，稍一查验便知孰是孰非。然而此时曾国藩却武断地以为前次所得为真，且通知彭玉麟将所觅之尸就地掩埋。愚意曾氏所为实亦不得已，是彭则非胡，是胡则非彭，而曾于胡氏为同僚，于彭氏为统属，且胡氏虽年龄逊于曾氏，但出身较曾氏为早，又为世胄子，故曾致胡林翼书信，皆尊称“润芝宫保老前辈”，致彭玉麟书札则称“雪琴仁弟”。胡林翼所觅，虽曾国藩派亲兵协同寻找，但所觅无首，何以知其必为曾国华。彭玉麟所觅有元，但曾国藩并不派员查验，而武断地认定其不真。此事曾、彭之间应有多次往复，而观此间金陵刻本《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家书、书札部分，竟无过多之记载，可见曾集刊刻时于此事已作删芟。若非彭氏此札尚存湖南图书馆，今人又何以知道历史上尚有此曾国华一身二尸之谜案。

清光绪十七年《彭刚直公集》刻板时，仅有《奏稿》八卷、《诗集》八卷。2003 年岳麓书社编辑《彭玉麟集》时，自他书及各图书馆、博物馆辑得书信仅200 余篇，其中致曾国藩者 50 余篇，此札亦因得以收入岳麓版中。

晚清长沙园林文化掠影

陈览月

湖湘历史上的园林，按其属性划分，包括自然风景区、邑郊园林、寺庙园林、官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五类。而作为住宅来说，主要是指私家园林，因为它主要供居住之用，故亦称园林式住宅。园林式住宅其实是一种上等的庭院式住宅，或者说是庭院式住宅向自然的进一步延伸。它常见的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在一个大的住宅范围内布置“庭园”；再一种是在住宅旁另辟园地构成“宅园”；第三种是在风景幽雅而又清静之地营造“别墅”。不论哪一种形式，都免不了要有山石树木花草、楼台水榭亭阁之类，既可供居住、休养，又可供游览、玩乐。

园林式住宅在长沙历史上早已有之。据考证，西汉时期留传下来的长沙贾谊故宅和定王台蓼园，可以说是湖南园林式住宅的发轫。但西汉以后的近两千年间，湖南的私家园林却屈指可数，一直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湖南经济实力薄弱，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建造私家园林的人实在太少。晚清以后，这种状况有了较迅速的改变。一方面，湘学经世派的崛起，使一大批湖南人士跻身于全国军政要员的行列；而后来湘军的裁撤，又使更多的中下级军官衣锦还乡，充实了湖南绅士阶层的队伍。其间积累了不少财富，使他们有财力和闲暇来营造自家的宅园。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工矿业的兴起，湖南也陆续涌现了一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企业主、金融家等。这些达官、富商在暴富之后，大多不惜巨资，或者在省城长沙，或者在家乡，营造庞大的住宅、园林，修建宗祠、家庙，当他们死后，还要集资为他们修建专祠等。从而，使全省园林式住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盛极一时。以省城长沙为例，在城区和郊区就先后建有各类带庭园的大型住宅，以及宅园、别墅、专祠等达数十处，较著名的有：陶澍的印心石屋、罗汝怀的荷花池精舍、何绍基的磻石山房、汤鹏的柚村、李星沅的芋园和李家花园、郭松林的郭家花园、胡兴仁的旷寄园、黄冕的宛园、熊少牧的洞泉草堂、王先谦的葵园、王闿运的湘绮楼、彭于蕃的怡园、黄月厍的晚香山馆、张自牧的絜园、陈泿的舫泊、周达武的蜕园、朱昌琳的馀园（朱家花园）、周寿

昌的听橘园，以及曾文正祠（浩园）、左文襄祠、席少保祠等等。这些私家园林和专祠，规模庞大，布局精巧，富丽堂皇，表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和高雅的审美情趣。

清文学家杨彝珍（1807—1898）写有一篇《柚村记》，记录了道光年间洋务思想家汤鹏（1801—1844）在长沙利用一处废园所筑园林的情致与风韵："长沙城北隅有废园焉，其大可数十亩，居氓艺豆菽其中，四周有垣，其高过修人有半。内有井，芳洌可饮，有塘径数百步，雨潦至，其流涓涓然。汤子（汤鹏）出厚值货焉，日以余力增治之。于塘之北，种柚十余本，冬时黄实累然，因名曰柚村。又杂植桂、梅、桃、李、石榴、芙蓉、海棠各数本。折而左，聚怪石为小阜隆然。上植纤竹数百挺，覆亭其内，曰苍莨亭。循亭而南，以篱障隙地，外艺蔬焉。旁有阁，曰晚菘阁。跨塘为桥，上踞以亭。亭之下，右别为南塘，水深及膂，蓄鱼百许头，日布影藻荇。间宾至，可叉得之……有楼翼然，曰归云楼。天高气清，白云流影，舒与夷犹，低拂檐际。飘尔忽冥，仍返高素，若与人意相远。汤子顾而怡之，将谢荣欸遂幽栖，浩浩乎肆于永归。"

清代两江总督、湘阴人李星沅（1791—1851）归隐长沙时，辟水月林其地为"芋园"，以作归田怡养之所。其后代在同光年间继续经营着这片园林。芋园占地两万平方米，水面占半，西部以黄山石叠为山，乔木荫翳，东部筑水角凉亭，风光漪涟。园中遍植白榆、乌桕、梧桐、黑松，穿插紫薇、绣球、桂树、腊梅，循季盛开。同治之初，李星沅次子李概复修芋园和寺院，"径前增以回廊，栏楣蜿蜒，因曲势作小亭，取苏子之语意，以'知水月'名之寺"。月夜游芋园，别有一番风味，清文学家瞿元钧《水月林记》载："好月初上，清光透林隙，射水中，明灭不定。游鱼潜跃，宿鸟惊呼，凉风翕习入襟袂，此心欣欣若有所得。已而星稀云敛，皓魄当中，水色空明，淳泓晃漾，数声鹤唳与寺中钟磬相和，令人有高世远举之思，自以为古之辋川、平泉恐不足过也。"

同治年间，长沙城内另一处著名的私家园林为蜕园，传说原是唐代湖南"破天荒"进士、长沙人刘蜕的读书故地。咸丰年间，浙江巡抚胡兴仁将此地买下来，精心营造出一个别致优雅的园林，乃名"蜕园"。同治年间，蜕园转售给流寓湘中的直隶名士杨翰。但杨经营不善，以致园景颓败。光绪年间，湘军将领、甘肃提督、宁乡人周达武（1828—1895）将其买下，加以精心的修治和扩建，几年时间，就建成为一处面积达 80 多亩的园林胜地。当时的蜕园是何模样，无从可考。但《长沙老照片丛书》收录了清末蜕园"思源桥"和"大木桥"等照片。老照片上的蜕园亭阁回环，池塘萦绕，假山嶙峋，异木争妍，奇花斗艳，间有乔木高耸，绿竹荫浓，

风景十分绮丽。周达武每逢回乡，居住于此，招引名人文士饮宴赏景，怡然自得。周达武去世后，他的儿子周家纯（后改名朱剑凡）在此办起了近代长沙城内第一所女子学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周南中学。

长沙市今存"朱家花园"之地名。朱家花园又称馀园，旧址在长沙市德雅路丝茅冲一带。馀园系咸丰十年（1860 年）大实业家朱昌琳（1822—1912）为休养馀年而建，故名"馀园"。园址占地 400 余亩，园内兰堂、宜春馆、一笠亭、去寮亭、延眺轩、众绿轩等亭台楼阁，回环错列；池塘环绕，假山嶙峋；奇花斗彩，乔木高参，风景宜人。亭台内悬挂联匾均出自郑板桥、何绍基、左宗棠、王文治、黄自元、曾熙等名家手笔。光绪年间朱昌琳曾用 48 株罗汉松扎成七层大园景，并置多种名花异木，免费供游客观览。

光绪元年（1875 年）落成的、为纪念湘军首领曾国藩而建立的曾文正祠，位于今中山东路至局关祠一带，"纵七十八丈，横四十八丈，中建崇祠凡四重，上下亭各一，为门三，门首牌楼一，东西序称是。又西为思贤讲舍。计堂、室、庭、营、厢、笤、庖共一百七十有八间。有池，广袤十数亩。为桥一、楼一、亭五、台二。池畔垒石为山，杂莳花木，翼以回廊，缭以崇垣，垣周二百六十丈。糜白金四万有奇"。祠内有园，名浩园，有"存朴亭"、"听雨轩"等胜迹。浩园也是清末省城名流的雅集之所。光绪六年（1880 年）春，以病辞归的郭嵩焘即与刘坤一、彭玉麟、朱昌琳、李元度、李概、张自牧、邓弥之等 11 人会觞于浩园，每人作画一幅，刊于祠壁，以志湖湘韵事。郭嵩焘有《浩园雅集图记》曰："穿石步池上，循水榭，凭栏展坐，纵论天下得失。俯清池，桥亭水竹，映带左右，怡然有丘壑之思。"光绪七年（1881 年）郭嵩焘借曾祠西隅辟为思贤讲舍，即今船山学社的前身。

同光年间长沙官家园林也得到全面修复，这得归功于一位勤政廉洁的官员——夏献云。夏献云（1824—1888），字裔臣，号芝岑，江西新建人。道光贡生，后入京，历任军机章京等职。同治九年（1870 年）以道员分发湖南，1872 年授粮储道，晋按察使衔。在任期间，他整饬漕弊，清理狱讼，颇著政绩；又以"端风善俗"为己任，而不遗余力。省城贾谊祠、定王台"均荒圮"，夏献云乃"以一忠一孝、风教所关，捐廉重葺"，又修复岳麓山白鹤泉亭等处古迹，对长沙名胜园林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汉至清末两千多年来，贾谊故居毁建相继。南朝刘宋时盛宏之所撰《荆州记》载："湘州南寺之东有贾谊宅，宅之中有井，井旁有局脚石床。"唐时毁，宋复建贾谊祠，成了一座官家园林。明万历八年（1580 年）兵备道李天植于祠内增祀屈原，故又有屈贾祠之名。清康熙、乾隆年间两度重修；嘉庆年间巡抚左辅再度

修建贾祠，旋废。光绪元年（1875 年）巡抚王文韶另辟地建屈祠，夏献云则主持扩修贾祠，增建清湘别墅、怀忠书屋、古雅楼、大观楼等，又叠石造池，形成典雅园林建筑群，一度享有“园林池馆之胜”的美誉。

次年贾祠落成，夏献云又倡修定王台。“官绅俱有同志，立斥白金二千有奇，不日蒇事，焕然一新”。夏献云《重修定王台碑记》载：修缮后的定王台“窗牖洞开，风景殊胜。隙地复蓼园旧迹，台侧得泉曰古涧泉。泉旁为东涧草堂，迤南为望云山馆。有池有亭，杂植花竹，足以备流连，志景慕已”。

夏献云还把自己供职的粮道衙门营建成一处官署园林，名宜园。宜园位于今坡子街至道门口一线。粮道衙门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驿盐粮储道赵廷标所建。宜园则位于衙门的西部，初时景色一般。同治十二年（1873 年），经粮道夏献云精心创构，形成一个布局严谨、颇具规模、风景宜人、气象万千的衙署园林。宜园的构思，意在突出一个“秋”字。所谓“宜园”，“宜者，宜秋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其秋与粮道十分贴切，故宜园内的亭馆多以“秋”命名。听秋声馆、延秋亭与桐桂山馆、澄怀轩、望岳楼等园林建筑装点于山石池水、花草竹木之间，为粮道衙门的官员营造了一种十分惬意的、返归自然、亲近自然的休闲活动场所。

位于今青少年宫的湖南抚署花园“又一村”，光绪年间也进行了全面修缮，建于乾隆至道光年间的双清亭、丰乐亭、澄湘亭修饰一新。三亭呈倒品字形布局，依山势而筑，居中的丰乐亭最大，丰乐亭后退两侧的高台上立着较小的双清亭和澄湘亭，三亭以小道、台阶相勾连，四周遍植郁郁葱葱的香樟，形成一处小型园林美景。三亭至今犹存，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辛亥革命失败论”商榷

刘泱泱

在谈到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时，我也注意到，尽管人们一般并不否定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创立民国、发展经济、传播民主等项重大胜利，但往往又持另一种说法：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细究其所持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领导集团犯了错误，向袁世凯妥协让位，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其二，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待进一步商榷。

先说第一点：孙、黄妥协让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孙、黄妥协，这确是事实。但他们并不是向革命敌对方清政府妥协，而是向第三势力袁世凯集团妥协，是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正，分化孤立主要敌人，以求得革命的速胜。其妥协的主要条件是：推倒清朝政府；主张共和政体。而且这种妥协，并不是孙、黄个人的错误，而是当时多数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掌握各地实权的军政府、咨议局的普遍主张。孙、黄确是让位了，这是革命民主势力在袁世凯集团强大压力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当然也可以说是一次重大挫折，但并不就此意味着革命成果的完全丧失和辛亥革命的失败。细考中外历史，革命民主运动中领导集团变换是常有的事，并不都意味着运动的失败，关键得看领导集团变化后国家政策、路线的变化，看其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袁世凯上台后，尽管他在中期因在政争党争中暗杀宋教仁而激发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后期又搞过一段帝制复辟闹剧而自食其果，但是应该承认，在其初期，他基本上还是按照议和条件和孙中山所颁布的《临时约法》办事的，如逼迫清皇室逊位，宣布承认共和，按照三权分立原则组建政府，进行国会选举，允许政党活动等，一时新闻出版也较为开放、活跃。特别是在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做了一些实事，如：颁布《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一系列法令，保护和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颁布《权度条例》，统一全国度量衡；发布《通令保惠侨民》，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开办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参加国际博览会等。他中后期因倒行逆施而最终覆亡，也正标志着民主革命潮

流不可阻挡。继他之后，国家尽管又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政权频频更迭，呈现出“乱哄哄”的景象，但基本上还是沿着辛亥革命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总体看来，民国初的八年间，经济上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政治上民主体制、政党政治起步，思想文化上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为五四运动做了准备，就说明了这点。而其实，这一段时间的乱，除了反映革命胜利后新与旧、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外（这是必然的），也反映了旧传统的破坏，新思想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方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至于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似亦可商榷。他应属于基于实力的巧取豪夺，而不是“窃取”。袁世凯是一代枭雄，在南北议和过程中，他依恃手中掌控的雄厚政治军事实力，一方面拉拢立宪派，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又以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党要求共和势不可当，压迫清皇室逊位，以攫取国家最高权位。通过反复“和谈”，他终于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如下交易：确定共和政体；倾覆清政府；优待清皇室；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在此过程中，黎元洪、黄兴、孙中山等均先后对此表示支持或同意。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后，又多次表示：清帝退位，共和既定，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以后的历史时间表就是：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溥仪颁布诏书，宣告退位，清王朝覆亡；次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同时提出推荐袁世凯继任咨文；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些都是谈判桌上的、公开的内容，并且是通过法律手续确定的，怎么能说是“窃取”呢？

再说第二点：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考察和讨论，即：一、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如何确定的？二、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或革命目标究竟是什么？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阶级状况等进行具体分析后，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认为：近代中国是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革命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有两大任务，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主义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1]；这个

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本结束，共达110年，其间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其中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属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以后属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论断当然是科学的，而且经过革命实践和近代历史发展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由此也看到：第一，这一历史任务的确定，已是辛亥革命过后十多年、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既没有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如何能将这一历史任务写在自己的旗帜和纲领上呢？第二，这一历史任务明明是整个近代时期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为达此目的，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革命发展阶段，才能最后达到胜利。而且，毛泽东还曾明确指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革命各阶段也因而表现出不同形式的任务，或者是国内各阶级“暂时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或者是“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等等[2]。辛亥革命只是其中一个发展阶段，为什么就要求它完成整个近代时期的历史任务呢？如果硬要求每个大小阶段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毕其功于一役，那将无异于否定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发展史，甚至整个中国近代史。

那么，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或者革命目标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政治上和经济上异常软弱，无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刚开始零星传入，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根据当时中国国情为自己所制定的革命任务或者目标，就体现在《同盟会总章》所规定的宗旨上：“本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稍后，孙中山将这一宗旨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概言之，就是要推翻满族贵族统治的清政府，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逐步解决民生等社会问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通告各国书》中，对外宣示此次革命之目的为：“推翻恶劣之政府，驱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国；与各友邦共结厚谊，使世界享和平之幸福，而人类跻于太平之境域。”[4]又于《在巴黎的谈话》中说：“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5]可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一个发展阶段，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至于改善民生，则是革命成功后逐步而长期的任务。以此去衡量辛亥革命的成败，应该说胜利了，而不是失败了，它的胜利甚至某些挫折与不足，都为下一阶段的革命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

路。就像我们今天高度评价同样作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一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取得“彻底胜利载入史册”，“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6]。我们并不要求抗日战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又怎能要求三十余年前的辛亥革命去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呢？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4 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522 页。

[2] 毛泽东：《矛盾论》（1937 年 8 月），《毛泽东选集》4 卷合订本，第 295~296 页。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 页。

[4]《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45 页。

[5]《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63 页。

[6] 胡锦涛：《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5 年 9 月 3 日）。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辛亥革命后长沙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文化的探索

杨锡贵

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当王闿运、叶德辉、刘人熙等人探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来解决民国初年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同时，长沙的另一部分知识精英则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挽救时艰的武器。

辛亥革命后，长沙一批新文化知识分子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他们或翻译、介绍西方著述和种种思潮，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或坚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或主张对国民思想进行改造，或提出了极具建设性和操作性的立国指导思想。

一、宏文图书编译社同人对西方著述和思潮的翻译介绍

宏文图书编译社成立于 1914 年初，1919 年冬因经费短缺停业。社址初设长沙黄泥街余肇康公馆，后迁浏阳门正街李星沅公馆。创办人李实对于文化事业颇有雄心，自设印刷局从事书籍出版。在他的礼聘下，省内文教界名流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刘宗向、刘汉良、曾运乾、陈天倪、黄锡卣等一时云集该社。社内成立编译部，由黎锦熙负责。编译社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和“翻译东西著述”，编有初中国文读本（刘宗向、刘汉良合编），农业教科书（方维夏编），小学教科书（由徐特立、黄锡卣合编），师范教科书（包括教育史、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杨昌济编。未正式出版，一师曾采用作讲义）。同年 10 月，该社又创办《松言》杂志，声言将“选译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现“刷新社会”这一“救亡至计”[1]。该社“开设期间虽短，实为湖南文化的先锋”[2]。

二、长沙《大公报》编辑部同仁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斗争

民国建立，旧的封建统治结束，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异常激烈，此消彼长，政局动荡，强有力的权威的中央政府没有建立起来，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社会处于由专制向共和的转型时期，人们纷纷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

的看法和主张，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并存并且彼此展开争论，思想和学术呈现出极为活跃的局面。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新闻出版受到鼓励和保护，报刊通讯社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长沙也出现了一个办报高潮。长沙《大公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促使长沙《大公报》创办的直接原因是：汤芗铭督湘后，《湖南公报》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一改之前持论尚属公正的立场，转而拥护袁世凯，并要求该报人员一律加入进步党。在此情况下，贝允昕、任凯南、龙兼公、张平子等人旋即以辞职相抗议。他们脱离《湖南公报》后，即另行筹备创办了长沙《大公报》。之所以将所办新报定名为《大公报》，是“因为我们本是《湖南公报》成员，现在更加恢宏光大，故于公报之上加一‘大’字”。一是表示不忘原来的公报，一是表达持论要比原来的公报更加公正的宗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长沙《大公报》于1915年9月1日正式创刊。这是一份独立的民营报纸，“决定为商办，以公司名义，向商会注册，向党部及政府立案，以示不依附政党、军人之意”。“本报所恃以为收入者，仅售报所得值及广告刊资”。“人是一切事业的中心，人的思想作为，决定一个事业的风格与荣枯”。长沙《大公报》能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方报刊中极有影响的一份民营大报，与该报团队成员的价值观念、知识储备、道德状况等有着极大的关系。“《大公报》记者诸君，以董马纪事之笔，写屈贾忧时之怀，必翔必实，不激不随，不偏于党系，不屈于势力，勤勤恳恳，以牖我湘人。”[3]

《大公报》的创始人、第一任社长刘人熙在学术思想上尊崇王船山，有着一股强烈的爱国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刘人熙主张进行“大震动、大改革”。他热情歌颂新建立的民国，“满蒙回藏成民国”，“民国革命为先河，民国建设为宗匠”。《大公报》创办之时，正值中国反日怒潮高涨，刘人熙作为社长把握时代主题，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他在发刊词中以“贿鬻”、“感情”、“浅识”、“听荧”四事相诫，宣称：“凡我报界，同尊天职，乞求声应，爱国爱民”[4]，将民族主义思想融入办报当中。《大公报》创办之时，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帝制活动，刘人熙高举维护共和的旗帜，立场坚定地反对帝制，“先生手纂发刊辞，以拥护共和、掊击帝制为帜志”[5]，体现了坚持民主共和的思想立场。

贝允昕（1865—1929），字元徵，浏阳人。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教育，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法制院院长、政报处处长，1912年6月被推举为新成立的湖南报界联合会干事，1915年9月参与创办《大公报》，为第一任协理，不久继任总理。在《大公报》创办初期，主要从事反帝宣传，深受省内外人士欢迎。

李抱一（1887—1936），原名缨，字华翰，后取名景侨，字嗣循，笔名抱一、矢、盾、莳竹等。新化人。曾就读新化大同学堂及省城高等学堂。1912年，与贝允昕等在省城先后创办湖南编译社、《湖南公报》、湖南通讯社。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为该报两位分总编辑之一。他推崇墨家学说，把墨家的平等精神贯穿到《大公报》中，所撰社论时评，多抨击军阀政治，主张平等、民主，关注下层民众疾苦，提倡节俭和劳动。

张平子（1885—1972），字启汉，别号平生，湘潭人。肄业于长沙私立经正中学和湖南高等专门学校预科，加入同盟会。1911年任《湖南公报》记者，1914年参加《公言》杂志编辑工作。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与龙兼公一起任主笔，先后主办现代思想、杂荟等栏目，思想上较为进步。时人称其“一生不入仕途，以新闻、教育事业终其身，对旧时的权贵们报以嬉笑怒骂的态度”[6]。

龙兼公（1888—1951），原名彝，字经傲，笔名兼公。湘潭人。湖南法政学堂毕业后，入《湖南公报》。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和张平子一起共同担任主笔兼编辑。长于宪政理论和制度研究，与李抱一负责调查、研究栏目，对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人在加入《大公报》之前，均担任过其他报纸的编辑或主笔，既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又有坚定的职业操守，矢志以办报为终生职业，以监督政府指导社会作为报纸的天职。他们既受过传统教育，又受过近代新式教育，新旧学问兼备。一方面传承了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精神；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兼容并包、崇尚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办报团队，勇立民初共和思潮的浪头。

民主共和与实业救国是民国初年的两大社会思潮，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实行专制独裁是当时政争中最为激烈的问题。长沙《大公报》诸同仁在这场政争中，旗帜鲜明地将拥护共和作为第一主旨。该刊创刊宣言称：“当此强邻生心，鲁难未已之秋，岂容发为动摇国本之谈，以希冀个人不可靠之宝贵，而酿国家之祸？……本报则断断不附和之，唯知以维护共和，巩固国家为职志。”[7]

《大公报》在创刊之日即刊登大量反对复辟帝制的文章，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文告、接受帝位之前，发表关于国体问题（政体问题在当时被误认为是国体问题）的文章达80余篇。除直接对筹安会及其主张进行批驳外，还对全国舆论界尤其是京、津、沪报刊对国体问题的态度进行及时报道。在立宪问题上，长沙《大公报》与筹安会的观点差异不大，都认为立宪是必要的。不同点是采用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筹安会提出君主立宪，长沙《大公报》极力驳斥筹安会

的观点，主张共和立宪。筹安会鼓吹变更国体的目的，是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其背后的指使者也是袁世凯。但在袁世凯公开宣布复辟之前，《大公报》对袁世凯还抱有一丝幻想，因而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筹安会而非袁世凯，认为鼓吹国体变更是筹安会所为。

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公开接受帝位，到 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凯发布撤销帝制令），长沙《大公报》对国体问题的议论明显减少，社论和时评极少涉及国体问题，只在国内要闻和本省新闻中如实报道帝制实行之筹备情况，论说重点转向司法制度，以期用法律约束帝王权力。

从取消帝制到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去世，长沙《大公报》秉承一贯的立场，围绕惩办帝制祸首、逼袁退位、各省独立、南北议和等主题展开讨论。“帝制撤销，全国之观念一变，言论界、思想界顿呈异彩，民主立宪之声，洋洋然充塞于宇内。”[8]袁死后，长沙《大公报》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以重建共和为主旨，围绕护国军的去留、各省独立与取消独立、约法恢复、国会召集等问题展开讨论，积极为民国及湖南建设建言献策。

长沙《大公报》是一份政论色彩十分浓厚的报纸。它一以贯之的反袁称帝立场，在同时代的报刊中极其少见；通过舆论鼓吹，推动了反对帝制斗争的发展；对共和立宪的宣传，促进了读者和公众对民主、共和、宪政的了解，有利于促进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大公报》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传，没有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结合起来”[9]，尽管它与《新青年》杂志是同年同月创刊。

三、杨昌济对旧道德的批判与改造国民思想和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

杨昌济（1871—1920），辈名宏菉，字怀中，号华生，册名昌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人。杨昌济在家乡和岳麓书院学习期间，研读过大量儒家经典、宋明理学和曾国藩的著作，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的浸染陶冶。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使杨昌济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0]，这是他后来积极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和经常出席南学会主办的讲演会等维新活动的思想基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杨昌济认识到必须开民智，“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11]，即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1903—1913 年，杨昌济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并曾到德国考察教育。在此期间，杨昌济主攻教育学、哲学和伦理学，探求做人的道理，成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著名学者。回国后，杨昌济于 1913—1918 年间，先后或同时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分别讲授哲学、伦理学（修身）、教育学、

心理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除教书育人外，还关心政治，营救过革命党人杨德邻，反对袁世凯独裁和复辟活动，抗议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投身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他还撰写了大量论文、讲义，翻译了许多外文著作，从事着艰苦的理论探索。

作为我国近代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知名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杨昌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和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贡献主要有三，即：最早全面而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伦理、哲学、教育和心理学说；最早指出在向西方学习时不能搞“全盘西化”，而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因革，有所取舍；最早总结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精神科学，实际上是在呼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他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二，即：深入探讨了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现代转换[12]。

1915 年《青年杂志》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此之前，杨昌济即已在长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利用讲台开始了对旧道德的批判工作，斗争的主要锋芒直指“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礼教的核心。他在 1914 年出版的《论语类钞》中说：“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13]并指驸马为公主服丧三年、夫杀妇减死、妇人傲荡者沉江等种种恶习，其弊端与中世纪欧洲教会焚杀异教徒相同，“此皆过重伦理而轻视民命，不可为典要者”[14]。这与其后不久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在对待礼法、旧伦理上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昌济还对封建家庭主义加以揭露和批判，认为家庭制度是封建君主统治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而家庭主义又是族权、夫权和家长制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对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诸如欺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打牌赌博、不讲卫生等等，杨昌济也曾进行过尖锐的抨击。

在批判和否定旧道德和旧的社会恶习的同时，杨昌济主张对农业文明社会形态下的国民思想进行改造。1914 年，他在《公言》杂志上发表了《劝学篇》一文，指出：“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15]“唤起国民之自觉”，就在于以民主、科学启蒙民智。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哲学在改造国民思想中的作用，是因为“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

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16]。为此，杨昌济通过讲课、写文章、翻译西方的有关著作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哲学伦理，以期实现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

杨昌济同时也看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性，不主张完全照搬他国。“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置于他国”。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对待，“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17]。极力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文明一炉而冶之”。事实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是一往情深的，“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18]。尽管有人称他是在搞“折中主义”，但在当时对东西方文化普遍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之际，杨昌济的这种文化观是十分难得的理智之声，而且也直接而深远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因而有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之誉。

新文化运动揭幕后，杨昌济热烈欢迎《新青年》的出版，是《新青年》在湖南最早的宣传者。他除自己认真阅览外，还积极向友人和学生推荐，并出资购买分赠一些学生。他一面大量阅读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著作，予以翻译和评价；一面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力求“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旧学”。并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治生篇》、《结婚篇》等论著和译文。他提倡和宣传新文化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杨昌济以其渊博的学识，崇高的人格，对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而成为长沙及湖南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觉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于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19]

四、易白沙对封建文化的批判

易白沙（1886—1921），本名坤，号越村，后因其家所在地在长沙白沙井附近，又因他仰慕明代学者陈白沙（字献章）之为人，乃更名白沙。易白沙少年聪颖，勤奋好学，熟读经史百家，尤喜墨家学说，才华横溢。16岁时曾被延主永绥师范学校；随又赴安徽，先后担任安徽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还曾在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短期任教。同时，他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斗争：辛亥革命中，他参加安徽光复工作；二次革命期间奔走湘、皖之间，力劝当事者武装反袁；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参与《甲寅》杂志创办工作。洪宪帝制败亡后，易白沙回国。1921年，愤于军阀统治、革命者屡遭屠杀，他只身去北京，伺机行刺北洋军阀头目，未果。而后南下广州，在前往他所一向尊崇的陈白沙家乡陈村的途中蹈海自杀。易白沙还撰写了许多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文章与专著。他流亡日本后，即在《甲寅》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教育与卫西琴》、《广尚同》、《铁血之文明》、《平和》等论文。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后，易白沙积极撰稿，先后在该刊发表了《述墨》、《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我》、《战云中之青年》等论文。1916年编写了《帝王春秋》一书。

易白沙在行动上是民主革命的斗士，在思想上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早岁读郑思肖《心史》及黎洲、船山、亭林、密之遗书，恍然种族之恫，亟思摈满”[20]。到了安徽后，他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派的要人，如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人，因而其思想更加激进。其后，他高举“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旗帜，在其所撰写的论文和编写的专著中，“以文献解读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大胆地怀疑和批判陈腐的观念和学说，深刻地揭露和痛斥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罪行，竭力宣扬和提倡民主、共和、法治等近代价值观念及近代政治制度，体现出救世救国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在为《甲寅》杂志所写的文章中，易白沙极力推崇墨子的“尚同”思想，称其为“中国的民约论”。认为“同”的标准应该是“天”、“仁”和“民”，其落脚点是要“同于民”，以“民为主”，即应该遵循平等、公平、正义、宽容、法治等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准则，以此反对一切“独裁于君”；并指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总统专制的中国，“其政同于总统而止”[21]。“这样，易白沙巧妙地把墨子的尚同主张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融合起来，成为其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武器”[22]。易白沙又从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出发，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指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德、意、奥、俄、法、英六大强国以及日本“扩充军实，惟恐后人”，“朝野上下，除厉兵秣马而外，几无他事”；战争的性质是为了掠夺更多的殖民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俄且试其侵略之旧图焉，法且洗其前耻焉，英且藉杀其势以莫予毒焉，日本且雪其责还辽东之愤焉”，“群之相攻，国之相伐，亦遵此尽量、均求、赡欲而行者也”；帝国主义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九天之上，九渊之下，尽杀人之战场也”，英、法、日本这些自诩为文明之邦的国家，“犹草木鸟兽，啖之饮之，封之剖之，炙之剔之，从心所欲而已”，

"残忍险恶，至于此极"，"战之过去，工商凋残，疮痍载道"，"两败俱伤，暴骨盈野"[23]。

易白沙既然推崇尚同于民的墨学，宣扬民为主的民主思想，必然会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学进行批判。他在《青年杂志》亦即后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进行了初步清理，尤其是针对尊孔逆流，在《孔子平议》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孔学的看法和认识。他一方面指出：孔子当春秋之世，"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有其适应和代表所处时代之要求的一面，对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孔子在春秋之时，"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从汉武帝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的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后历代专制君主、独夫民贼、野心家"皆傀儡孔子"。这就是两千年来尊孔的大秘密，从而揭去了孔学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也与孔子学说自身存在的弊端有极大关系，并具体指出和分析了孔子之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易白沙强调指出：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正统儒学区分开来，"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在文章中，易白沙还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考察，揭示文明的产生是人们集体创造的结果，如果要"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各家的贡献，不能归美于一家，更不能统一于一家，学术、政治均是如此，由此提出了"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响亮口号[24]。《孔子平议》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评价孔子的论文，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和批判，"不仅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孔子学说固有的主要弊端，而且由此较为深刻地揭示出孔子之道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将对政治问题的考察深入到了对文化问题的考察"；"破解了中国两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为改造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提供了历史依据"；呼吁发扬学术民主，鼓动思想自由。对当时那些长期被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人们破除旧观念和旧思想，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对反击尊孔复古的政治势力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他在批孔的同时，对孔子所具有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必要的肯定"，这也是难能可贵的[25]。

在《帝王春秋》一书中，易白沙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揭示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淫，将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等十二个方面的罪恶一一罗列出来，以求"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并指出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与封建帝王无异，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历代帝王的种种罪恶，必须将专制主义的余毒和专制帝王的近代继承者彻底推翻。该书在易白沙逝世的当年出版，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流传甚广，名扬一时。易白沙也以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斗士而名垂青史。

五、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及其对公民自由的关注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县人。20岁以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次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任《苏报》主笔，1904年加入华兴会，后留学日本、英国。1911年回国任《民立报》主编，1914年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1917年后在北京任职，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参政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政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央文史馆任职。章士钊虽出生长沙，却长期在外奔波。享年92岁，一生多姿多彩。他在思想领域的耕耘，最应为后人所称道。此处主要介绍他1910—1919年间的主要思想言论[26]。

辛亥革命前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激进的革命者，言辞、情绪和思想取向都很极端，"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27]。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立即回国，重端报人饭碗，先是任《民立报》主编，对临时政府的一些错误措施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因其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另办《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和主编《甲寅》杂志，在冷静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调和立国"论的思想主张。

章士钊认为，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是"强人之同与己也"，"故专制者，兽欲也"。[28]章士钊也严肃地批评了革命党人的激进主义错误，"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排挤，语若村妪，行同无赖"[29]。章士钊并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曾出现过极端的例子，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章士钊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做出相应的转变，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首先，章士钊认为，"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克异以存同则退"，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尊孔而吃了大亏，所以抛弃好同恶异的专制思维，树立化同以迎异的观念。这是根本前提。

不好同恶异、化同以迎异的关键，是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30]。这是正义的基础，也是调和立国的基础。

章士钊认为，最能体现对抗力的制度是政党政治。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凡国家能获政党之福音，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仅两大党，政纲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党，当以今之政府为对立党，对于彼等之失策，尽力以攻之……彼而倾跌，我乃代之”[31]。又说“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恃者，已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32]。所以必须设法保护反对党。“愚之所谓有容，乃在使异者各守其异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诱致异者使同于我”。“总之，愚为政本，只论同异而不论是非。若以同为是，以异为非，即是好同恶异”[33]。只论同异，不论是非，这是两党政治的根本，只有如此，才能使立国之道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章士钊以其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入了解和深刻领悟，总结民国初年中国政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从而提出调和立国论的重要思想，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令中国知识阶层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言论和财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这一时期的章士钊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暂行报律》，因于言论自由有障碍，章士钊主张“根本的取消”，并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认为应“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34]。当民国元年，湖北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没收汉冶萍公司时，章士钊立即撰文反对，他指出：这是商人资产，不可没收。因为“近世生产之发达实为资本凝集之结果；苟资本动摇，则生计状态将立见退步也”，并进而指出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使以后所有商业微，有资者相戒裹足不敢焉，此不谓自杀之愚计可得矣！”[35]要保证这些自由，章世钊认为必须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并成为他毕生所坚持的信念。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后，长沙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著书立说，翻译、介绍西方著述和种种思潮，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或坚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或主张对国民思想进行改造，或提出了极具建设性和操作性的立国指导思想。以此表达政见，启蒙民众，不仅在当时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其中的一些主张和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公言》杂志启事，载《湖南教育杂志》第3年第1期（1914年1月）。

[2] 吴起鹤：《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3] 参见湖南师大喻春梅博士博士学位论文：《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

[4] 刘人熙：《本报发刊辞》。转引自喻春梅：《刘人熙与湖南〈大公报〉》，载《周末文汇学术导报》，2006年第1期。

[5] 抱一：《悼刘蔚庐先生》，转引自喻春梅博士论文：《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

[6] 田翠竹：《忆张平子先生二三事》，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188页。

[7] 张平子：《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后的湖南报界》，载《湖南文史资料》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8] 兼公：《司法独立问题》，长沙《大公报》，1916年5月3号。

[9] 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98页。

[10]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11] 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12] 见王兴国所编注的《杨昌济集》前言。

[13]《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254页。

[14]《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59页。

[15]《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16] 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1版，第85页。

[17]《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18]《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7页。

[19] 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杨昌济集》（二），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第1281页。

[20] 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陈先初编《易白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以下关于易白沙言论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21] 易白沙：《广尚同》（1914年8月10日）。

[22] 王兴国：《"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易白沙》。《求索》1983年第2期。

[23] 易白沙：《铁血之文明》（1914年11月）。

[24] 易白沙：《孔子平议》（1916年2月、9月）。

[25] 陈先初：《易白沙集》前言。

[26] 章士钊此一时期的思想言论详细论述，请参阅袁伟时：《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家——章士钊》一文。

[27]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28] 章士钊：《政本》，《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9] 章士钊：《政本》，《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30] 章士钊：《札斯惕斯》，《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页。

[31] 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83页。

[32] 章士钊：《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章士钊全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33] 章士钊：《论政本》，《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47页。

[34] 章士钊：《论报律》，《章士钊全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68、70页。

[35] 章士钊：《论湖北省议会议决没收汉冶萍公司事》，《章士钊全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392页。

（作者系长沙市开福区教科培训中心研究员）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

王兴国

湖湘文化历来具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特征，到了近代尤盛。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些简略的分析。

一

有的学者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不能将它视为湖湘文化的特点，当然也就不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点[1]。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诚然，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表现是有程度不同之区别的。例如，清代汉学盛行时，在某些省份，经世致用思想是不被重视的，但是在湖南却是始终一贯的，到了近代则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汉学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时期，湖南学者仍坚持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

我们知道，汉学是比较偏重于文献和文字的考证训诂，而不重视经世致用的。这既与汉学兴起的历史环境有关，即清代残酷的"文字狱"迫使学者只好钻故纸堆；但也与汉学的学风只求实证于书本，而不求实证于现实也是分不开的。对此，魏源在《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一文中有过批评。他说："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视国初崑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2] 对于魏源的这一批评，近代著名汉学家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又予以反驳。他说："魏默深为《李申耆传》，称乾隆中叶，惠定宇、戴东原、程易畴、江叔澐、段若膺、王怀祖、钱晓徵、孙渊如及臧在东兄弟，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慧为无用。包世臣慎伯则言东原终身任馆职，然揣其必能从政。二者交歧。繇今验之，魏源则信矣。"这表明，章太炎是承认魏源对汉学"无用"的批评是对的。但是他又说："吾特未知其言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衒其术略，出则

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罗网周密，虞候枷互，执羽籥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3] 这就是说，在章太炎看来，经世致用首先要解决一个“为何主”的问题。章氏是一个民主革命家，他站在反清的立场，当然反对为清王朝而用。不过他的这段话还是说明了汉学之“无用”，是有其政治原因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汉学兴盛之际，尽管湖南的一些学者也钻研汉学，但却始终能继承湖湘学派的知行统一和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这里，我们仅以清代全盛时期岳麓书院的几位山长的言论加以说明。李文炤（1672—1735）在《岳麓书院学规》中说：“学者欲通世务，必须看史”；“《书》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为士而徒以诗文自负，何以自别于凡民乎？故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也。”易宗涓（1682—1771）则在《岳麓书院记》中告诫诸生：“读书其中者，当知其所重，不徒以工文词、弋科名为能事。务求隆德茂业，以仰窥天人性命之微，坐言起行，出而赞襄文治，人伦明而王道成，盛莫盛于此矣。”王文清（1688—1779）虽以考据名家，但却坚持经世致用。在他所拟的《岳麓书院学规》中，要求生徒“通晓时务物理”。旷敏本（1699—1782）主张史学经世。他在《鉴撮序》中说：“士诚不自菲薄，凡所以检身检心经邦经世者，俱将于是乎取焉。”欧阳正焕在《重修自卑亭记》中主张“远观诸物，近取诸身，平心以察之，实力以践之[4]”。正是这种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激发了近代湖湘学者在中国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

其二，嘉道年间，陶澍和贺长龄等人在全国首倡经世之学。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在其《明清史讲义》对此有明确的说明：“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5]

陶澍（1778—1839），曾官至两江总督。他生当汉学盛行之时，其汉学造诣很深，但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汉学的弊端与晚明理学相似，即流于空疏烦琐。他尝言：“汉《易》之复兴，盖无有盛于今日者。然如帝乙高宗性命德行百姓等象，一字一卦，支离破碎，反不若（王）弼说之为愈也。”烦琐哲学必然脱离实际，趋向空虚，所以他批评当时治《易》者“相寻于虚也，久矣”。有鉴于此，陶澍利用他的政治地位，突出地强调经世致用之实学。他说：“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以中无所有之人，即幸邀有司一日之知，责其实用，难矣哉！”陶澍提倡的这种务实学风，不仅影响了湖南的一代人才，而且对全国人才的兴起也起了重要作用。对此，张佩纶曾记张之洞

的一段评论。他在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二十一日记中记载：“过孝达（张之洞字），辑《先哲录》。饭后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为三派：讲求史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耕（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这就清楚地说明，陶澍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着大江大河的源头作用。

贺长龄（1784—1848）是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他在江苏布政使任内，请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此书广泛收集自清顺治至道光初年各种有补经世致用的论著 2014 篇（段），分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等十二大项，共 120 卷，300 万字，于道光七年（1827）首次印出。此书一出，海内风行。自道光七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 60 年间，翻刻七八次，日本亦有选本流传，成为当时士人必读之书，“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以后还有各种续编本踵出[6]。

其三，咸丰年间，曾国藩将“经济”列入学术纲领。

曾国藩不仅是陶澍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积极践行者，而且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从而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纲领。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曾国藩将“经济”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提出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适应时代的需要，把理学经世派的经世主张系统化了。曾国藩在上述文章中就反复强调经济与义理之学的统一。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7] 其次，如果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主要是一个“为文”之方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明确指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并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理论纲领。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不仅影响了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一代人才群体，而且影响到了后世。例如青年毛泽东在 1915 年 9 月 6 日致肖子升的信中在谈到掌握“国学常识”的重要性时说：

“为学最忌一陋字……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8]毛泽东不仅对曾国藩的这个理学纲领十分熟悉，而且在其青年时代一度按照其要求进行学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近代湖湘文化继古代湖湘文化之后，不仅一贯坚持经世致用，而且在全国范围之内，首倡经世致用之风，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学术纲领，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经世致用作为近代湖湘文化的特征。

二

经世致用虽然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征之一，但是在近代湖南主张经世致用的又不止一派，而是至少有三个学派。

首先，是理学经世派。所谓“理学”又称为“道学”。它认为“理”或“道”是宇宙的本体，人们只有把握了这个本体，才能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这就叫做“明体以达用”。正是这个“明体以达用”，为理学家的经世致用奠定了哲学基础。例如，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宏就曾明确指出：“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9]这里讲的井田、封建、学校、军制，就是古人讲的经世致用内容的一些主要方面。自从湖湘学派奠定了经世致用这个优良学风之后，它始终影响着整个湖湘文化的发展。而到了近代之后，以陶澍和曾国藩为代表，便形成理学经世派。关于陶澍和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我们已经在上节做过介绍，这里再简要介绍近代湖南理学经世派的另两位健将，即胡林翼和左宗棠。

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是陶澍的女婿。他的理学经世思想，不仅受到陶澍的影响，而且受到他的老师蔡用锡的影响。蔡氏治学，不只是讲儒家经典，同时对一些有用之学，如兵法、吏治，都悉心介绍。在他的影响下，胡林翼喜欢读历代史书，尤其喜欢研究军事学和政治学，并且专门修习了舆地学。对此，其年谱有记载：“公既长，聪明豪迈，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危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10]正是通过这种努力，奠定了他日后经世致用的扎实基础。胡氏经世思想的学术成就，集中地表现在由他主持编辑的《读史兵略》和《读史兵略续编》。胡氏尝言：“兵事乃学人之事，司封疆而不明兵略，则可危孰甚！”又说：“万事可谦，兵事不可谦。太谦则怯，太谦亦近伪。”“天下无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与机势耳”[11]。于是他在任湖北巡抚期间，于咸丰九年至十年（1859—1860）组织一些士人编撰了《读史兵略》和《读史兵略续编》。此书“皆取古人之节义忠贞、娴于经略者，自春秋以至有明，与绩学之儒”，节录而成，其中有不少地方还加上了胡林翼的按语。此书出版之后，“一时四海风行，不胫而走”[12]。后来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就摘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为陶澍的儿女亲家。他在青年时代曾在长沙城南书院从学于贺熙龄，并继承了贺氏“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其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说：“时山长善化贺侍御熙龄，宿学名儒，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于府君尤加器异。后府君《上贺公书》有‘十年从学’之语，盖从游最久也。”[13]左氏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他重视地理学，其中包括历史地理。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尝为《舆地图说》，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条列历代兵事。可惜此书后来散佚。其二是他重视农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氏买田湘阴东乡柳庄。此后几年，他不仅精研近人有关著述，而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还在湘阴开首倡种茶之风。他还以其所得，著之为书，名曰《朴存阅农书》。对此书，他自己颇为得意。在其致友人的信中说：“近人著书，多简择易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仆近阅新书，殆不啻万卷，赏心者不过数种已耳。学问之敝，人才之衰，此可概见。仆近因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而古近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圃。志此者数年矣，因尚未得成，卷帙不过十数篇，精力想尚可及，晤时当详告之，亦人世不可少之书也。”[14]正是由于胡林翼和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所以才奠定了他们日后的经世事功。

其次，是今文经学经世派。所谓今文经学，是产生于西汉时期的一个研究儒家经典的派别。此派学者将儒家经典视为政治学著作，并力图从中刺取其微言大义，以为当前的政治现实服务。今文经学自汉代中绝之后，直到清代后期，才由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将它复兴起来。魏源就是直接受了刘逢禄的影响而治今文经学的。魏氏曾明确提出要“以经术为治术”。他说：“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魏源所说的这种“以经术为治术”的方法，最为典型地表达了今文经学家们的治经方法。接着，魏源批评了古文经学者的否定经世致用。他说：“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训诂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乌乎！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学校，今亦此学校；宾宾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谓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国家何？”[15]如果说，

章太炎批评魏源的经世致用没有解决“为何主用”的话，那么这里所说“如国家何”，就不是为某一“主”或某一个王朝所用，而是强调要为民族国家所用，所以还是有其历史价值的。

近代湖南治今文经学者还有两个大家，其一是皮锡瑞，其二是王闿运。皮锡瑞（1850—1908），湖南长沙人。他在《经学历史》中曾说明清经学“凡三变”，清初，以宋学为根底；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生）、董（仲舒）之遗文，寻武（汉武帝）、宣（汉宣帝）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这就是说，今文经学的兴起，是清代经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并且是“至道”的阶段。接着，皮氏针对戊戌时期疑经思潮说：“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而以孔教为可废哉！”[16] 皮锡瑞的这些观点，与魏源的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此意，他在日记中说得更明确：“通经所以致用，汉人治经，皆切于时用，故经学莫盛于汉。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以《洪范五行传》警人主，此皆汉儒微意。若谓谈经学不必及时事，则五经真同刍狗，而经义可废矣。”[17] 皮锡瑞曾经积极参加过戊戌时期的湖南变法活动，但他在经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撰著《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他特别强调以《春秋》为经世致用的指南。尝言：“治经致用，莫切《春秋》，非谓其政法多也。多为其法者，《周官》是也；不立一法者，《春秋》是也。”[18] 他不满于空谈义理和溺于考据词章，曾说：“行与学分，由士君子不能辨学故也。六经兴于孔子，九流生于六艺，质性有偏，宗主各异，要之九家皆通经之人。而汉后治经者初不得经之用，训诂、词章、性理、考据、经义、演说，等级自有高下，其无关经学一也。而取士者以为权衡，求进者以为羔雁，所学虽极博通，了不关其行事，茫茫昧昧，一任身世之遭逢而已。”[19] 王氏曾掌教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培养出一个著名的今文学家廖平，廖平的今文经学思想又直接影响了康有为，康氏以今文经学为理论武器，领导了戊戌变法。所以王闿运在中国近代今文经学发展的历史上是应该有其独特的地位的。

其三，是霸王经世之略。也就是浙东学派陈亮的事功之学。陈亮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他认为将“王”与“霸”、“义”与“利”割裂开来与对立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他主张将二者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注重事功的经世致用思想。早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的另一个重

要代表陈傅良就曾经在湖南传播其事功之学。到了近代，谭嗣同和唐才常都十分推崇永嘉之学。谭嗣同在1896年致唐才常的信中说：“来书盛称永嘉，以为可资经世，善哉言乎。往者嗣同请业蔚庐（刘人熙），勉以尽性知天之学，而于永嘉则讥其浅中弱植，用是遂束阁焉。后以遭逢世患，深知揖让不可以退萑苻，空言不可以弭祸乱，则于师训窃有疑焉。夫浙东诸儒，伤社稷阽危，蒸民涂炭，乃蹶然而起，不顾瞀儒曲士之訾短，极言空谈道德性命无补于事，而以崇功利为天下倡。揆其意，盖欲外御胡虏，内除秕政耳。使其道行，则偏安之宋，庶有豸乎。今之时势，不变法则必步宋之后尘，故嗣同于来书之盛称永嘉，深为叹服，亦见足下与我同心也。”[20] 这段话说明，谭嗣同在早年就已经接触浙东学派的功利之学，只是由于其老师刘人熙的批评，他才一度放弃此学。但是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实践，目睹国家危弱气象，开始怀疑刘人熙的批评，重新认识永嘉功利思想的现实价值。所以，他充分肯定唐才常的“盛称永嘉”，是与自己“同心”。正是因为谭氏对于永嘉学派的重视，所以他在《仁学·自序》中将永嘉归之于墨学中的“任侠”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21]

以上我们是从学派的角度，简要地分析了影响近代湖南经世致用思想的几个学术派别。但是必须指出，这不过是就其大体而言，如果具体到一些近代湖南学者的身上，他们往往并不是纯乎某一派，恰恰相反，可能是几派的思想兼而有之。对此，章太炎曾有过评论。例如他认为“魏源不得附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如说《诗》多出三家之外（以《小雅》‘念彼共人’为厉王既放，共和摄位时作），说《书》不能守欧阳、夏侯（以黄道周三易洞玑说《洪范》），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在谈到王闿运时，他又说：“王闿运亦非常州学派，其说经虽简，而亦兼采古今，且笺《周官》（庄氏亦讲《周官》，刘氏兼说《书·序》，是知当时只攻左氏，犹未尽攻‘古文’也。逮邵懿辰始书攻‘古文’耳。王氏生于邵后，独兼古今，且笺《周官》，则亦不得云常州派也）。此但于惠、戴二派外独树一帜，而亦不肯服从常州也（王少年尝至广州，为陈澧所诃，不肯服惠、戴；又与邵懿辰意见不合，故不肯步常州后尘）。”[22] 章太炎的评论，是完全站在纯学派的立场立论的，所以不免对魏、王的“不纯”有所批评。但是近代湖南学者的提倡经世致用，并不完全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民，所以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什么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所以，即使是湖南的一些汉学家，也是如前所述，主张经世致用。

三

经世致用思想对于近代湖湘文化的作用，既有其积极的方面，又有其消极的

方面。其积极的方面，主要表现在它为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学风环境。

岳麓书院的大门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其实，湖南人才之盛，是近代才有的。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鸦片战争以前，湖南人才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而在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八十年的时间里，湖南涌现出的人才则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十左右。自唐代至鸦片战争之间的一千年之间，湖南出现的人才群体只有四个；而在这八十年间，就先后出现了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五个。人们在探讨近代湖南的这种人才辈出的原因时，一般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南北分闱”。在清代康熙三年（1664）之前，湖南与湖北是一个省，即湖广行省。那时，湖南地区的秀才要考举人，必须冒着风险渡过洞庭湖，到省会武昌赴考。洞庭湖风大浪急，往往有舟覆人亡的危险，所以不少士人为之裹足。康熙三年，分湖广右布政使驻长沙，为湖南建省之始。但这时，两省的科举考试还没有分开。于是一些有远见的湖南士人和地方官，反复向朝廷请求将湖南与湖北的科举考试分别举行（即所谓“南北分闱”），此请终于得以于雍正元年（1723）实现。郭嵩焘曾记述这一过程：“自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闱省试，成之者李公发甲；而前此请定南北中额，有赵公申乔；始请分闱，有潘公宗络；同时又有吕公谦恒，典试湖广，屡以分闱请，迄今无能举其名矣。四公者，皆有惠于楚人士。”[23]自从湖南和湖北两省乡试（省试）分别举行之后，湖南的举人数就逐渐增多。据有关资料统计，自明代景泰四年（1453）后，湖南士人参加63次乡试，共中举人1944人，同期湖广举额85人，共5525人，湖南只占湖广行省举人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南北分闱”之后，湖南、湖北的举额大体相当（湖北中式50名，副榜10名；湖南中式49名，副榜9名；武举各25名），这就为湖南人才的涌现创造了可能性。所以杨昌济说：“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鹗横秋’之匾。风气闭塞，人才寥落，可想而知。及南北分闱，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闱之效也。”[24]我们之所以说，南北分闱还只是为湖南人才辈出创造了“可能性”，是因为省试的便利还只是为湖南士人的升迁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这些士人能否成为人才，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否则，为什么从雍正元年湖南单独举行省试后，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人才辈出的现象呢？

其二，是时势造英雄。鸦片战争以来，湖南是中国近代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地区之一。太平天国出省作战，首先就进入湖南。太平天国利用湖南的天地会，

充分扩展了自己的队伍。而以曾、左、彭、胡为统领的湘军，则成为太平军的死对头。随着外国势力进入湖南，士绅的反洋教宣传和群众性的反教斗争，也是很有特色的。随着湘军的遣散，原来流传于四川、贵州等省的哥老会也开始在湖南发展，因而成为近代湖南许多民众起事的社会基础。到了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既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也是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一省。在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又是革命势力十分活跃的地方，起义和风潮不断。民国建立之后，湖南又是南北军阀斗争的激烈战场。这种复杂的、尖锐的民族的和阶级的斗争，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

其三，是经世致用的学风。以上两个方面的条件，还只是为湖南的人才辈出提供了客观条件，即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正确的学风这个主观条件，要使可能变成现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经世致用的学风，使湖南士人不仅十分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且积极投身到现实的社会政治活动之中。郭嵩焘在《冯树堂六十寿序》一文中，曾记述他与一位友人的对话：“兴国陈秋门给谏尝语嵩焘：‘楚北（湖北）人才不足与比方楚以南（湖南），有由然矣。南士游京师者，类能任事，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人心习尚如此，欲无兴，得乎？’”[25]所谓“能任事”、“务实行”，正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郭嵩焘在咸丰八年七月初九日的日记中，曾记载他与恽世临（次山）的一次谈话内容：“次翁言：近日楚才之盛，无能及者。予谓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次翁言：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26]所谓“笨干”，正是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干实事的务实精神，它与那种“字颠、画迂、诗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杨昌济在谈到“南北分闱”导致“咸同以还，人才辈出”的效果之后，接着说：“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27]杨氏将近代湖南人才之盛，归结为“学风所播”，可谓把握了根本。从学风之优导致近代湖南人才之盛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可以证明，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的确是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当然，我们强调经世致用的学风是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完满无缺的方法。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学风，与我们讲的“理论联系实际”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它更多的是强调理论要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所以它的功利性特别强。强调理论的功利性的好处是，使理论能与现实的政治紧密结合，更好地发挥其战斗作用。但其缺点也有不少：首先，它往往容易使人只注意理论的针对性，而忽视理论的系统性。就是说，注重经世致用的人，他们在讲理论时往往

是就事论事，而不注重自身理论的系统建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近代湖湘文化中，而且也表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之中，我们很少能在中国找到像西方的黑格尔、康德那样的体系完整的哲学著作。即使像王夫之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也是有所为而发，而不去注意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后人在研究其哲学体系时，往往歧见较多。其次，由于是要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所以随着政治斗争重点的转移，理论也就必然随之相应改变。这样，我们往往可以在同一个作者的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发现，他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可能是前后矛盾的。这就说明，坚持经世致用的传统，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层面上，而必须深入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为人们提供方法论的指导。第三，近代湖南是一个政治斗争激烈的战场，所以许多近代湖南的志士，更多注意的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这些突出问题，而对于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相对次要的问题则注意不够。尽管这些方面的问题也是经世致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时代迫切要求，人们不得不把它们暂时放在一边了。所以，我们看到，近代湖南虽然人才辈出，但多为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而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人才，虽然也有不少杰出者，但相对政治军事人才而言，就相形见绌了。

【参考文献】

[1] 参见郑大华：《如何深化湖湘文化研究》，《光明日报》2004年3月9日。

[2][15]《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8~359、24页。

[3]《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2页。

[4][6] 参见《湖湘文化大观》，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528、529~530页。

[5]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8页。

[7]《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443页。

[8]《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9]《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1页。

[10][11] 《胡林翼年谱》，载《湘军人物年谱》，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01、307页。

[12] 俞樾：《读史岳略续编序》，《胡林翼全集》（五），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页。

[13][14] 《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23页。

[16]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342页。

[17]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七日。

[18][19] 《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04、527~528页。

[20][21]《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9、289页。

[22]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章太炎先生论订书》，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页。

[23][25]《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13~514、266~267页。

[24][27]《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351页。

[26]《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138页。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青年毛泽东所读的商业学校考

许　康

青年毛泽东进入“湖南全省师范学校”（按：后来由教育行政部门“按各校开办顺序”改名第四师范，一年后并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以前，在长沙还选择过几所学校“试读”，此事凡阅读了斯诺的《毛泽东自传》（或全本《西行漫记》）的人均有印象[1]。其中长沙市第一中学的《校史》已证实毛泽东曾在该校“普通科”读过一学期[2]。那么毛泽东另外曾入读的商业学校情况如何？这个问题对商学教育史和毛泽东生平研究应当并非毫无价值。

本文作者在1949年就看过《毛泽东自传》，又由于祖父及张干等前辈都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教师，1951年前后仍在与第一师范相邻的妙高峰中学执教，作者当时有幸受教，这一渊源导致笔者也想对毛泽东的商科学习经历做点考证。

一、毛泽东进入商业学校的过程

本文关心的商业学校，流行的毛泽东传记的中译本一般译为“高等商业公立学校”（见《毛泽东自传》第二章），即“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称，校名为“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3]。

此前，毛泽东的学历是就读湘乡“东山学堂”，不少书刊或称其为“东山小学”、“东山高等小学”等。然后在1911年年初到长沙，进入“驻省湘乡中学”（有的书称“湘乡驻省中学”），读了不满一年，发生辛亥革命，辍学投军。解甲之后，他如何能一步跳入“高等”学校，其后又自动降入“中等”师范？粗知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人不至于感到奇怪，因为1905年才废除科举制度，全国虽大办新式学堂，师资、生源大成问题，不得不有大批士人留学日本之举，多数人采取“速成科”的途径，一两年便回国办学任教。办的小学中学固然如雨后春笋，学生们取得毕业资格又得七八年时间。所以毛泽东1912年在长沙继续“考学”，考生中基础知识超过他的人不会很多，何况他的天资加上“东山”那样的模范新式高小毕业的程度（按：“东山”开办于戊戌变法时期，舒新城编的权威性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就将该校作为全国最早新式小学的标本，收入了该校有关史料），

加上中学的一段学历，以及18岁的年龄，在当年的入学报名和考试时常可以借“同等学力”（相当于中学毕业程度）上下驰骋，左右逢源。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先被法政学校（按：废科举之后才兴起，被视为入仕的捷径，高于一般中学）吸引，但“……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4]

本文的兴趣集中在，这所“高等商业学校”是否即是1926年合并为湖南大学的三所专门学校（工专、商专、法专）之一的“湖南商业专门学校”？

迄今全国、全省还没有一部商学教育史（志）书，也没有任何探讨商学教育源流的文章论证过这方面的问题。最直接解说湖南大学商科传承演变具体关系的，乃是《湖南大学校史（976—2000）》中的第十章[5]。然而《湖南大学校史》和《毛泽东自传》两书中“商校”校名、史实都未完全吻合。

毛泽东入读“高等商业学校”应是1912年春末，因为他在辛亥革命时大约当了半年兵，退伍准备升学已到仲春。而又不能再迟于4月，因为他从“高商”退学必须马上考入“一中”，未在社会上再呆一个学期。既然长沙市一中校史肯定他是1912年入校，而且《湖南省长沙一中大事记》明确记载“1912年4月，学校开办，定名为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5月12日正式开课”[6]。据他自述，“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则1912年就过去了，接着毛泽东到定王台湖南图书馆自学了一年（1913），1914年春考入湖南全省师范学校（即第四师范），1918年6月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7]。

这样可以确定，毛泽东入读商校时间为1912年3月—1912年4月；校名为“湖南高等公立商业学校”；毛泽东报考前的信息来源：（1）报纸上的招生广告，（2）“听说”（该校教员好）。

我们只需同样查阅一下那几个月长沙地区出版的报纸的广告，应该就可解决这个疑难。

二、唯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招生广告

由于事隔九十六年，湖南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特别是多次战乱和大火，当年的报纸已经只存有寥寥几种，而且都是断简残篇。笔者努力查阅，1912年春夏商科学校的招生广告仅见《长沙日报》有如下几条：

①"明德学校中等商业甲乙丙三班学生鉴"（1912.3.3，第8版），内容是告知现在"开办高等专门部"，原该校在辛亥革命前几年设立的"中等商业（科）即时停办"、其"甲乙两班……自可提升高等"，但丙班学生只得转读中学；

②"明德学校添银行专修科招学广告"（1912.4.12，第1版）；

③"湖南公立第一中等商业体育专修学校广告"（1912.4.28，第8版），该校因辛亥革命停顿，现还没有恢复，只是向老同学发个公告，未有具体安排。

由于办学的延续性和招生的周期性，不妨再查下一年《长沙日报》的广告：

①"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续招学生广告"（1913.3.9，第5版）；

②"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续招学生试期通告"（1913.3.18—3.21），连续刊登，公告考试日期为21—23日三天；

③"明德大学添招预科广告"（1913.3.18），内容是该校已在北京开办，本科有文、法、商三科，此次招收一班预科生。

从这些片断的招生广告（或通告）信息，可知，长沙确实有这样的"高等商业学校"，而且"公立"的仅此一家。要知道，那个年代社会剧烈动荡，经年兵荒马乱，政府财力万分紧张，各级"公立"学校少而又少，区区长沙何能容下几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

三、"高等商业学校"为何又称"中等商业学校"

但《湖南大学校史》第10章的湖南大学商科"前史"（书中示以图），为何是经历"湖南商业教员养成所"（1911—1912，荷花池），"湖南中等商业学校"（1912—1913，三公祠），"湖南商业专科学校"（1913—1914，三公祠），"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3—1917，荷花池）演进成"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1914—1926；荷花池1916—1917，落星田1917—1926）？显然这里的时间、校址有几处不衔接。（按：据校史正文可更正，"甲种"1914—1916，"商专"1916—1926）据查，该章原始材料采自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左宗濂（已故，湖南省参事室参事；最近经我们请教省参事室人事处，知他的生卒年为1900—1985，长沙人，1919—1923年间在湖南商专学习，后任省财政厅科长、县银行行长、县长、少将高参等）的一篇回忆文章《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沿革》[8]。这类孤证不能尽信，因为他写回忆录时手头未必有全部权威的原始史料，而我们从毛泽东口述且经报

纸广告查对的校名，应是可靠的。

左宗濂原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湖南的公立（官立，即省立）"商校—商专"串连成一条线（只此一条，别无分支），一直到（与工专、法专合为）湖南大学。最初的"商业教员养成所"是宣统三年（1911）办的，如全国一样，采用"速成"教学形式，加之发生辛亥革命，当即结束。民国元年"旋又改办湖南中等商业学校"，"政府又以名义之未当也，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1914年始定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不过，这又是他的一面之词，所述校史时间跨度为1911—1926，不可能都是他亲见亲历，记忆难免有误，而《湖南大学校史》综合这篇史料时，对文句的理解和综述行文（含笔误）有点偏差（衔接不准确）。

我们认为他说的"旋又"和"名称未当"之后的各半句话，很值得玩味，《湖南大学校史》分别照录了，即"改办湖南中等商业学校"和"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这两个关键校名和这两段重要"史实"。但后面这个"湖南商业专科学校"校名，照他所说，是"政府又以名义之未当也"而特别指令改正的，怎么仍不符合规范（详本文下面两段）？以及我们查到的报纸，1912—1913年间长沙也未见这个学校名。所以合理的解释，应是：第一步（1912年）"旋又改办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即毛泽东所述的且符合我们查对报纸广告的校名），而不是左宗濂原文的"旋又改办湖南中等商业学校"，两者仅有"高"误为"中"这一字之差，与其断言左宗濂"记错"，莫如怀疑他"写错"（笔误）或"印错"（排版校对出错）；第二步（1913年下半年或更后），省政府（教育司）认为"高等（商业）学校"之名不妥，指令"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第三步，过了一段时间，严格对照教育部新学制，"专科学校"之名也不准存在了，衡量实际办学招生水平（程度），又达不到"商业专门学校"的标准，（省教育司再指令）"1914年始定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这是因为："壬子癸丑学制"将学程分为三大段，即小学（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3年不分科，本科4年分科，其上还有大学院即研究生3年）。与中学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如甲种商业学校），与大学平行的有高等师范学校本科和（实业类的）专门学校本科；另有专修科与选科，只相当于大学预科。请注意："高等"一词只能用于"师范学校"。

所以，严格按这个学制，学校名称既无"（商业）专科学校"，又无"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例外）。不过，由于全国是逐渐推行的，"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到1916年才达到部颁那个程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专科乃至本科水平），才有那个（"专门学校"）名义。何况，毛泽东是"壬子"（1912）春入学，据《中

华民国教育史》[9]，该学制关于“专门学校”（学制 3—4年）名称和规定颁布于1912年10月22日，此前社会上各种“高等学校”名称，尚不违法，但有鱼目混珠（钻空子，打擦边球）之嫌：似乎比“中等学校”高，实际上有的只比“（高等）小学校”高，即“中等学校”水平。因而开初湖南省教育司才令其“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因为该校最早（清末，1911）是有“高等”程度的（速成培养中等“商业教员”），比那些冒牌高等学校不可同日而语。据左宗濂文，当时该校还有“专科生”，即是“高等”（相当于“专门”）的反映。至于一度（1914—1916）降为“甲种商业学校”（与中学平行），乃因专科生毕业，陆续招收中等两年级四个班，根源于袁世凯派汤芗铭祸湘，“学校被汤之爪牙施文尧摧残，仅存一息”。到1916年袁死汤逃，才又升为“专门学校”。

如果有人问，毛泽东进入“高商”前不是还有“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之事吗？我们说，这是另一个有力的旁证，说明我们坐实的“高商”（湖大前身之一）绝非他去注了册又不读的“中商”。试想，按左宗濂所言，一所本来培养中等商业教员的学校（“商业教员养成所”，即湖南大学商科的最早形态），在湖南商业教育界肯定是最高层次了，怎么会放着“老大”（“高等”）不当去当“小弟”（“中等”）呢？

我们这样分析一番，便清楚了，左宗濂自己是1919—1923年在读，他比毛泽东小七岁，入学也恰好迟七年（1919），让他讲述12~13岁时尚未进入的（1912—1913）湖南公立“高等”商科学校的事，误为“中等”商校，可以原谅。何况据他的履历，毕业后也并无从事商科教学或其他教育行政工作的经过，但《湖南大学校史》信以为真，以讹传讹，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史实，我们应加以纠正。

四、再提五条旁证

第一，民国将“学堂”改称“学校”；“实业学堂”改称“工业学校”（或“商业学校”）。我们在那两年的《长沙日报》上多次看到“湖南公立高等工业学校”校名，该校在清末是“湖南省官立高等实业学堂”，1914—1926年叫“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简称“工专”），即湖大工科的前身。那么作为它的兄弟院校的“商专”，其校名变化应当基本同步、相互对称（“高工”对“高商”，然后“工专”对“商专”）。但“高等实业学堂”建校早、水平高，故早两年改“工专”。

第二，当年很多学校是“三学期制”（按：据教育部1912年的《学校学年学期及修业日期规程》，十分明确，三个学期时段划分是8月1日—12月31日；1月1日—3月31日；4月1日—7月31日），所以毛泽东得以在一年内既当兵，又试读了两所学校（高商和一中）“热身”。而且那时一个学年并不是都从秋季始业（按：《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记载，毛泽东考入第四师范学校，便是春季始业[10]。因此毛泽东进入这些学校并非插班或中途转学，乃是正常的考入和开学）。另外，当年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若是4月1日开学，毛泽东读书一个月，退出来，正好从容进入一中（5月12日开课），没有任何不便之处。

请参看本文后的附件1和附件2，虽然是毛泽东入学该校一年后对下一届新生的招生广告，由于办学的周期性，完全吻合我们考证的上一年毛泽东的活动日程：3月份看到报纸（广告），去报名，20几号考试，连考三天，大约4月1日开课（按：广告原文为“三月内开学”，“四月”“开学时缴齐学费”）……

第三，“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的校址，据附件1“广告”词，在“戥子桥”；而左宗濂文及湖大校史写的是“三公祠”及“荷花池”，这矛盾如何解决？不难，“三公祠”旁即“三公里”（按：“里”是“里巷”之意，不是“长度单位”；原是长沙市立第一医院南边的小街，现已被延拓的营盘路“覆盖”），三公里拐弯即“戥子桥”，都是很短的小道（约100~200米）。左宗濂称“祠”（建筑群、院落），不关涉“街名”，而是强调“地点”，它周围有“三公里”和“戥子桥”等街巷，随便用哪边街名都对。至于“荷花池”，那是前后学校搬迁的地址（按：当时很多学校规模小、办学时间短，还没有永久性校址，“赁民宅开学”，随招生数、租金、合同等原因而变动租赁的房舍，所以广告中有“暂定”一语），无关本文讨论毛泽东入学那年的事；何况，“池”也是地点（按：荷花池在现在的湖南日报社大院与原长沙师范学校一带），现在的“荷花池”已没有“池”，而是指其南边的一条“街”，离前两条小街稍远一点（约200—300米）。

第四，工、商、法三专学生中都有早期的共产党员（如何孟雄、袁任远、龚饮冰等），但以商专的易礼容、彭璜、谢觉哉等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密切（尽管入学上下差几届），似也反映毛改入师范之后因与商校的渊源而比较容易联络。

第五，《毛泽东自传》对民国初年他在长沙读过的三所学校的评价：

1.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

2. “（第一师范）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

3. “（高商）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

毛泽东考一中取第一，考四师一顶三，考高商无夸词；对“高商”并非“不喜欢”或“不同意”，而是感到“困难”。这都说明“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确实水平最高，像个“准大学”的样子，毛泽东觉得自己的英语适应不了。

试问：当年除了只好办到北京（1919年搬到汉口）的“（私立）明德大学”，

长沙究竟容得下几所具有这种水平的“高等商业学校”（而且是“公立”）？

回答是：“没有了！”

五、结论

于是，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毛泽东1912年第一次学业上的“冒险”，确实是入读“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该校几经改名，1916—1926定为“湖南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与“工专”、“法专”合并组成“湖南大学”，所以，毛泽东真正是湖南大学（前身湖南商专）的校友，尽管在校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附带指出，他没能“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虽然湖南一师也开设“商业”课，其水准距离“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甚远，以后的经济知识纯靠自学得来，这未尝不是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方针政策产生失误的根源之一。

【参考文献】

[1] 斯诺著，汪衡译：《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湖南省长沙一中编：《湖南省长沙一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5] 湖南大学校史编委会编：《湖南大学校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编写组编：《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7] 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8] 左宗濂：《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沿革》，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2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附件】

1.《长沙日报》1913年3月9日，内容摘录：

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续招学生广告

主旨　本校以施商业之高等教育造商业上高等人才为主旨

分科　本校设预科本科

年限　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资格　凡年龄满17岁以上，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具左（下）列资格，经考试试验合格者得入预科

甲　中学校卒业生

乙　中等商业学校卒业生

丙　具有中学卒业同等之学力者

学额　名，临时定夺

学费本校预科本科每一学年征收学费12元，分三期缴纳，须于每学年正月、四月、九月开学时缴齐学费额度，方准登校

食宿　本校预备建筑校舍便于寄宿，但目前由本校认定相当处所为寄宿舍，招人承办，膳费一切由学生自备

服装　制服制帽均须学生自办，但式样宜从校定

用品　全归自办

报名　3月5号—3月15号考生亲来戥子桥高等商业学校内填写履历书报名并将相关文凭交存本校

试验科目　国文　历史　地理　算术　代数　物理　化学　英语

入学凡……

1913年3月内开学，校址暂定戥子桥

2.《长沙日报》1913年3月18日，内容摘录：

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续招学生试期通告

本校续招学额，其报名期限展至本月十九号截止，定期二十一二三号分别举行试验。二十一号试验国文历史地理，二十二号试验算术代数英语，二十三号试验物理化学，所有投考诸生届期务于午前九时来校受验，其初次报名未考者亦应先期呈缴相片文凭以便一体考试此布

附记：本文承张世秦副教授帮同构思立意和查找史料，由作者行文定稿，特此说明。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黎锦光：中国 20 世纪 40 年代流行乐坛上的歌王

彭文忠

黎锦光（1907—1993），字履�，湘潭石潭坝菱角村长塘人；湖南近现代著名的人才群“黎氏八俊”之一。笔名甚多，如巾光、金刚、金玉谷、李七牛等，其中最常使用的笔名是李七牛，黎、李谐音，七者锦光在家排行老七，牛者乃其属相也。金钢、巾光，意即锦光也。以流行歌曲创作知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写作了大量的流行歌曲，曾为上海中华电影公司写作电影歌曲，在当时上海滩与姚敏、陈歌辛、梁乐音、严工上一起被称为流行歌曲“中国五人帮”。1949 年后任职上海唱片公司。遗作数百首，如《夜来香》、《香格里拉》、《真心相印》、《爱神的箭》、《春之晨》、《五月的风》、《白兰香》、《葬花》、《采槟榔》、《满场飞》等，而以《夜来香》最为脍炙人口。《夜来香》为当年的日本歌星李香兰演绎后，不但风靡全国，多年后流传到海外，世界各国出版此曲的唱片版本多达八十个以上。

黎锦光在黎氏兄弟中排行第七，他比二哥黎锦晖小 16 岁。黎锦光在哥哥黎锦晖的影响下学习并开始从事流行歌曲创作。从中国流行歌曲的风格来看，黎氏两兄弟分别代表了流行歌曲的两个时段：黎锦晖属于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流行歌曲的开拓者，而黎锦光则是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高峰期的代表作曲家。

黎锦光从小喜欢乡间的花鼓戏。他在自传《我的追求》中回忆道：“六岁进自家办的私塾。私塾老师张慰如会吹笛子。我受老师和家风熏陶，自幼便喜欢吹笛子、拉二胡。对家乡的花鼓戏，更是着迷到如痴如醉的地步。国民党时期把花鼓戏视为‘淫戏’，不准演出。农民只好深夜开锣演出，三更半夜我也要瞒着家人去看‘草台戏’，一直到鸡叫天明才回家。”

黎锦光 9 岁时随大哥黎锦熙到北平上小学，15 岁随二哥黎锦晖到上海，在黎锦晖任校长的国语专修学校附属小学上学。16 岁回长沙，1923 年先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办的暑期补习班，后来考取湖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入湖南大学土木系。1926 年曾考入黄埔军校，在广州、武汉等地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宣传工作。

黎锦光的音乐艺术生涯，是在其二哥黎锦晖的帮带下起步的。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黎锦光到上海，进入二哥黎锦晖任团长的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团”的前身，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他一直跟随黎锦晖到南洋和国内的许多地方巡回演出，直至歌舞团停办。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黎锦光学会了演奏小号、单簧管、萨克斯和钢琴等乐器，又随黎锦晖学习一些作曲、配乐的基本知识，并开始创作、改编了一些歌曲。最早改编的作品有湖南民歌《闹五更》，粤曲《昭君怨》等，创作歌曲有《叮咛》、《探情》等。他在歌舞团的经历除了使他能接触到民间小调外，也能较深入地了解西洋流行歌曲。于中西融会贯通中，黎锦光遂成为“黎派”歌曲最重要的传人。

1939 年初，黎锦光进百代唱片公司做音乐编辑，开始大力投入流行音乐的创作、编配。这年年底黎锦光采用湖南花鼓戏的“双川调”改编了歌曲《采槟榔》，由周璇灌制唱片后极受欢迎。接着又创作了带有湖南民歌音调风格的《五月的风》（陈歌辛词）。黎锦光有着强烈多变的创作生命力，他写曲又快又多又好。20 世纪 30 年代，李香兰唱的《夜来香》，周璇唱的《钟山春》、《凯旋歌》、《少年的我》、《春之晨》、《晚曲》、《香格里拉》、《好时光》等，风靡全国，脍炙人口。这些歌曲均出自黎锦光之手。

中国电影业的有声片时代，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黎锦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编辑后，开始为上海各电影公司作曲，时间达 10 年之久。1943 年，汪伪政权的中央宣传部将新华、艺华、国华公司予以合并，总称中华电影公司，从 1943 年到 1946 年三年多的时间中，中华电影公司共制片四百余部。上海沦陷时期，电影界无法拍制反映抗日现实题材的作品，乃大量摄制取材于历史通俗故事的古装影片，每部影片中皆有大量的歌曲，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所谓古装爱情歌唱片。这些歌唱片的插曲有许多就是黎锦光的作品，如周璇主演的《西厢记》。其中最知名的《拷红》一曲的词曲皆为黎锦光创作。另如《三笑》、《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隐身女侠》、《啼笑姻缘》、《落金扇》、《李阿毛与东方朔》等古装片中之插曲，如《相思曲》、《夜来香》、《香格里拉》、《拷红》、《叮咛》、《慈母心》、《疯狂世界》、《真心相印》、《相见不恨晚》等歌曲，量多质高，脍炙人口，亦皆黎锦光所作。他总共为上海很多名演员写过百数十首歌曲，在当时都颇为流行。连早期的作品如《满场飞》、《清流映明月》、《针线本相连》等，也都成为流行名曲。

黎锦光的流行歌曲的民族风格非常鲜明，他重视收集民众喜爱的民间传统曲

词，这是他创作的源泉。除了经常采用他所熟悉的湖南民间音调之外（如《采槟榔》是据湘潭花鼓戏双川调改编的），他也常常采用江苏、广东、河北、陕西的民歌小调（如《采茶歌》、《卖杂货》是广东梅县民歌的基调），还从京剧、京韵大鼓等民间艺术中吸取音乐创作的营养，所以他的歌曲在风格上比较丰富多彩，意境上比较开阔，也具有较强的艺术性。伴奏方面经常从“探戈”、“伦巴”等舞曲以及爵士音乐吸取营养，大胆借鉴了欧美40年代流行音乐的语言和创作经验（如《夜来香》、《香格里拉》等）。他毕生没有进过专业音乐院校，没有专门学过音乐创作，但是因为他天才的创造力和不懈的努力，他成为了其时我国最有名的作曲家，使我国40年代的流行歌曲创作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他的作品从内容上说，或有深刻寄托、有所嘲骂、讽刺和调侃，亦有些是花前月下的浅吟低唱；当然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也有一些是颓废、哀怨的格调不高的小曲。繁华浮躁的流行音乐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辩证地加以对待。应当说这些歌曲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市民生活的多样性，属于海派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0年代的上海在现代经济繁荣的支撑下，流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兴盛局面，黎锦光正是这一时期都市流行歌曲创作的“歌王”级人物，他的流行歌曲是当时大众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对一些老歌迷来说，这些作品成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忆和一种文化的标志，让他们无法忘怀；而对于新歌迷来说，黎锦光作品多姿多彩的风格，如《拷红》、《采槟榔》浓郁的民歌风味，《夜来香》和《香格里拉》的现代风尚，亦使他们流连忘返。故而黎锦光的作品流传海内外，至今仍在传唱不衰。其中《夜来香》（词曲均出自黎锦光之手）是最具魅力的歌曲之一：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夜莺啼声凄怆
月下的花儿都入梦
只有那夜来香
吐露着芬芳

我爱这夜色茫茫
也爱这夜莺歌唱
爱那花一般的梦
拥抱着夜来香
吻着夜来香

夜来香
我为你歌唱
夜来香
我为你思量
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思量

清凉的晚风、皎洁的月光，千万朵夜来香吐露着馥郁的花香；欧美的优雅浪漫的伦巴节奏，配上华贵典雅的中国式旋律，就像一位二八女郎身着绣凤旗袍，端丽而活泼，仪态万方。

由于此曲音域宽、华彩多，令试唱的好几位歌手望而止步。“金嗓子”周璇过目后亦未有表示，终为李香兰（山口淑子）识得并演绎。据传1945年6月李香兰在上海的“大光明”连开六场独唱音乐会，均以此歌曲作为大轴曲目，获得空前的成功。《夜来香》是整个音乐会的高潮，也成为李香兰歌艺的高潮。李香兰的首唱版本美声特点很突出，从容、优雅、舒展、大气，配器尤其是中间的鼓声也相当精彩。在李香兰首唱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她所赋予这首歌曲的影响力已经逐渐消退，尽管也有层出不穷的歌手不时翻唱，但没有一个人的翻唱能超越当年的李香兰，直到邓丽君再度演绎了这首歌曲，使其再度传遍中华大地，传遍全世界。

李香兰在一九八一年时曾邀黎锦光访问日本，由于李香兰曾任日本国会议员，他的到访因而受到如同国宾一般的礼遇。

此曲还深受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的激赏，将歌词译成日文，流行于扶桑。我国之流行歌曲流行至国外者，除了黎锦光的这首《夜来香》（《春江遗恨》插曲）之外，尚有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三星伴月》插曲），再就是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天涯歌女》插曲）及姚敏的《第二春》（《恋之火》插曲）。《夜来香》是继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之后，在国外最有影响的作品。黎锦光与陈歌辛是中国现代流行乐坛成熟期的两个最杰出的代表，分别被誉为“歌王”与“歌仙”。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黎锦光仍然在上海从事电影音乐和流行音乐创作，此后他的比较重要的流行歌曲有：《哪个不多情》（1945年）、《香格里拉》（电影《莺飞人间》插曲，1946年）、《少年的我》（1946年）、《心灵的窗》（电影《苦恋》插曲，1946年）、《黄叶舞秋风》（电影《长相思》插曲，1947年）、《人人都说西湖好》（电影《忆江南》插曲，1947年）等。其中《香格里拉》（陈蝶飞词）

影响最广。传说和幻想中的“香格里拉”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是美丽无比的瑶池仙境，这首歌曲就是对这一神奇梦幻仙境的热情赞美。

新中国成立以后，黎锦光长期在上海中国唱片厂（前身即百代公司）工作，默默无闻地担着“音响导演”的担子，直到1970年退休。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创作基本上已经停止，1958年他根据新疆民歌编配的轻音乐《送我一支玫瑰花》，采用了探戈——波列那的节奏，成为50年代广泛流行的轻音乐舞曲。由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写过大量的“黄色音乐”，在中国国内那时的政治气候里，晚年境遇不佳，“文革”等历次运动均受冲击，生活比较贫困。他还曾以“巾光”笔名，把曲子寄给在香港的后辈姚敏，希望能赚点生活费。黎锦光退休十多年之后，1984年又应邀回中国唱片厂，利用30、40年代百代公司的录音模板，重新编辑、出版流行歌星周璇、白虹等人的音乐专辑多种，受到了众多的怀念老歌的听众的喜爱。1993年黎锦光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去世。

四大作家返湘始末

彭仲夏　谭士珍

一

20世纪60年代初，湖南文坛比较沉寂，而周边各省文坛却相当活跃，如湖北有姚雪垠、徐迟，广东有欧阳山、秦牧、陈残云，广西有韦其麟，四川有沙汀、马识途等等。湖南虽然有著名作家周立波、蒋牧良分别担任省文联主席、副主席，但他们实际是荣誉职务，户口都在北京，都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对于湖南文坛也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

有鉴于此，中央及湖南各级领导对于湖南文坛的窘迫甚为关注。1962年秋，毛泽东主席对周立波说，湖南文坛时下很不景气，没有一个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么多名家为什么不回去几个，把湖南撑起来？于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指示新上任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给回湖南来的作家创造一个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留住人才，结出硕果。张平化当即表态：作家们回湘后，分别享受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的待遇。

周立波不失时机，立即从湖南籍作家中物色人选：丁玲，因被划为右派尚在黑龙江一个农场里劳动；张天翼时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动不了；只有康濯、蒋牧良、柯蓝三人，无论资历名望、道德文章，在全国都是一流的。于是由周立波牵头，分别去联系这三位作家。周立波，湖南益阳人，原名周绍仪、周凤翔，曾在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读书，1932年加入“左联”，主要从事报社编辑工作，1939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50年代后期出版的《山乡巨变》，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感人的艺术力量，深受人们的好评。

康濯，原名毛季常，湖南湘阴人，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2年后发表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短篇小说，诸如《我的两家房东》、《腊梅花》等，除了著有长篇《黑石坡煤窑演义》、《水滴石穿》外，1949年后主要从事文艺界的

领导工作。康濯当时在石家庄，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他比周立波小12岁，敬重周立波如同师长，周邀他回湖南那是没得说的。

蒋牧良比周立波大7岁，是资深小说家。原名蒋希仲，湘乡人，30年代初参加“左联”，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年》、《夜工》、《强行军》和长篇小说《湖边风雨》等。

柯蓝，原名唐正，湖南长沙人，与康濯同龄。湖南省立一中肄业，16岁参加革命，1937年到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边区群众报社工作，期间创作了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其后出版长篇小说《不死的王孝和》、《暴动》、《风满潇湘》和电影文学剧本《铁窗烈火》等。他此时在上海从事专业创作。

二

四大作家先后回到长沙，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于1962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32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金明亲临指导，寄予厚望；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剧协、音协派遣知名作家曹靖华、赵树理、田汉、安娥、郑君里、周贻白、江定山等前来祝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书记周礼出席大会，听汇报，作指示，致贺词，盛况空前。

大会选出省三届文联委员94人，主席团委员20人，主席周立波，副主席蒋牧良、康濯、胡青波、铁可、魏东明、蒋燕、周季平，秘书长谷曼，副秘书长王剑清、王之宪。文联党组书记周立波，党组副书记康濯。

省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后，省文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组建文艺湘军、多出佳作、反映现实、为工农兵服务等问题。四位作家并进行明确分工：周立波身先士卒，扎根农村体验生活，笔耕不辍，谱写华章。省文联日常事务行政工作，全权委托康濯主持，要求《湖南文学》杂志每期要有一两个新面孔，每年要从来势好的新苗中培养两三个青年作家。蒋牧良身为作协主席，暂时放下手中的写作，全力辅导驻衡阳47军作家张行修改长篇小说《武陵山下》。他对这部书的每一个章节，有时要写下上万字的修改意见，有时还要补充和提供自己熟悉的素材和细节。柯蓝除了致力写作，同时兼任省文化局副局长，以便对其他艺术门类协调指导。

当时省文联与省文化局虽然已分开办公，但省文联的家底非常薄弱，办公在长沙喧嚣的五一路闹市中心——原中苏友好馆楼上，更没像样的生活区，住房十分拥挤狭窄。周立波扎根家乡益阳农村，住在他哥哥家里，开会或研究工作来长沙只在宾馆住几天。康濯举家迁来长沙，他爱人王勉思从北京《工人日报》调来

任《湖南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一家人没有住房，只好暂住湖南宾馆。蒋牧良、柯蓝也是如此。

不久，遵照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指示：为了留住人才，给四位作家创造一个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于是，在八一路省公安厅对面划出一块地皮，拨出一笔专款，给四位作家每人修建一幢别墅。其设计十分超前，当时在长沙是第一流的：不仅卧室、厨房、餐厅、贮藏室、卫生间、书房、办公室、会客厅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小花坛。每幢住房的面积有四百多平方米。另外还配备了一间锅炉房专供这四幢房子的热水和暖气。

经过四位作家近一年的惨淡经营，湖南文坛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湖南文学》发表了《竹楼夜话》（柯蓝）、《山村激浪》（彭仲夏）、《迎冰曲》（肖育轩）和《烘房飘香》（彭伦乎）等多篇优秀小说。

1963年10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专程来湖南考察。省文联以《湖南文学》编辑部的名义举办了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聚集全省专业作家未央、王以平、谢璞、刘勇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张行、古华、彭仲夏、彭伦乎、肖育轩、叶蔚林、胡英、王金山、衣冠履、谢鹤林、郭明、李绿森、熊春祜等近二十人。座谈会由王勉思主持，大家畅谈写作感受，制订创作规划。

张天翼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专题讲话。他虽然也是湘乡人，却能讲一口好听的普通话；乡音未改的蒋牧良用湘乡话作了一个报告，说话声音洪亮，尽管还用力打着手势，在座的都还听不大懂。

座谈会快结束时，康濯作了一个带总结性的发言，提出省文联的长远规划：除了《湖南文学》编辑部每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还打算从1964年起，文联组织在座的作家开读书会，读几部经典名著，时间一个月，不仅通读，而且要精读，读得滚瓜烂熟，这就叫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文联要下大本钱，组织山区的作家到湖区去游一游；湖区的作家到山区去看一看；城里的到农村去体验一下生活；农村的到工厂去增长一点见识。会上还决定，《湖南文学》每年要发一至两期小说专辑。

三

好梦易醒。

原定《湖南文学》1964年2月刊发小说专辑，以周立波的小说《卜春秀》领衔，另有康濯的《代理人》、刘勇的《文化的主人》和彭仲夏的《卖箢记》等四篇小说。岂料全国政治气温陡降，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传达后（即

后来所说的“双十二批示”），这期专辑不敢出了。

待到年底，“作家之家”四幢房子（两幢平房，两幢楼房，面积一样大）业已建成。周立波那幢楼下还种植了名贵的龙爪槐、宝塔松。可是这时四位作家宁肯露宿街头，也不愿当养尊处优的“老修”。

既然房子修成了，又让它白白空着，大家又没有住处，这事岂不荒唐？经省委再三做工作，又采取两项缓冲措施：一是“作家之家”每幢另搬进一户，变独居为双户；二是从原专款中拨出一笔钱，修一栋可住近20户人家的三层楼宿舍，以缓解文联的房荒。

就这样，四大作家才搬进了新居。

可是，“反修”“防修”风声越来越紧。1964年，根据“最高指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同年9月5日，省会文艺界举行了大型学术讨论会（实为“声讨会”），对电影《北国江南》所涉及的理论和学术创作上一系列问题开展讨论，更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斗争。

1965年大连会议，批判“写中间人物”论，被点名批判的有林默涵、邵荃麟、康濯和方纪。1965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省会文艺界连续举行座谈会，批判田汉的剧本《谢瑶环》。1966年4月，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湖南日报》点名批判康濯。1967年8月24日，省会文艺界举行批斗周立波大会，省文联被“彻底砸烂”……

从此，作家们惶惶不可终日。蒋牧良在1973年去世……

粉碎“四人帮”以后，康濯复出，成了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湖南文学界涌现了一批实力作家，如谢璞、王以平、谭士珍、谭谈、孙健忠、肖育轩、古华、叶蔚林、彭伦乎、莫应丰、张扬、韩少功等等（根据《湖南省老·文艺志》排名），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和《将军吟》，两部作品的作者古华、莫应丰都曾受益于康濯。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康濯等四位大作家返湘后的影响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WENSHI SHUWANG

文史述往

湖南最早以诗名家的作者阴铿

刘 娟

阴铿，字子坚，南朝梁、陈之际著名诗人，澧州作唐（今湖南安乡）人。阴铿祖籍武威姑臧，据《梁书·阴子春传》：“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高祖南迁，至南平，因家焉。”子春乃阴铿之父，阴袭则为其高祖，阴铿祖父阴智伯、父亲阴子春曾官梁、秦二州刺史并逝于湖北江陵，阴家自阴袭传至阴铿，已在南平定居五世之久，因此湖南为阴铿家乡当无可疑。阴铿少年聪慧，五岁能诵诗赋，日及千言，强于记忆。及长，博涉史传，才思敏捷。初仕梁官湘东王萧绎法曹参军；入陈为始兴王陈伯茂府中录事参军，以文才为陈文帝所赞赏，累迁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约在陈文帝天嘉末年去世。

阴铿是南朝著名诗人，也是湖南文学史上最早以诗名家的作者。梁陈之际，宫体诗大为盛行，情调流于轻艳，诗风偏于淫靡，其内容多为宫廷生活与男女私情，而形式则讲究辞藻秾丽、堆砌用典。然而阴铿的诗歌却“神采新澈，辞精意切”，使人耳目一新，“被当时所重”（《南史·阴子春传附阴铿传》）。由于都讲究字斟句酌且诗风相近，阴铿与何逊齐名，史上并称为“阴何”。杜甫曾有“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的诗句。阴铿的诗长于写景，诗风清丽，言辞精警，匠心独具。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价其诗作“如春风披扇，时花弄色，好鸟斗声；娟秀鲜柔，一景百媚”。在阴铿的作品中，无论是湖光春色，江渚寒夜，还是离愁别绪，思乡怀古，无一不用尽其细腻的笔触牵扯读者的思绪，使人向往，让人回味。

《陈书》记载阴铿“尤善五言诗”，阴铿流传于世的作品三十余首，全部都是五言律诗，虽然为数不多，但不乏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又以写景咏物和思乡怀古见长。阴铿的写景名篇颇多，如《开善寺》一诗，写开善寺明媚的春光，色彩明媚，动静相宜，仿若一幅生动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鹫岭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临情不极，萧散趣无穷。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栋里归云白，窗外落晖红。古石何年卧，枯树几春空？淹留惜未及，幽桂在芳丛。

这首诗是作者在春日游览开善寺时所作，开善寺在南京钟山独龙阜上，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时钟山多佛寺，开善寺风景独胜。全诗以工笔写景，从“登临情不极”说起，以“淹留惜未及”结尾，中间部分是景色描写，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风光的迷恋之情。鹫岭，即灵鹫山，本为中印度佛教圣地，如来曾在此地讲经，因开善寺亦为佛门禅院，所以此处借指钟山。开篇四句，着眼钟山全景，写开善寺春光遍野，诗人游兴盎然。“莺随入户树”四句是全诗的精华部分，意象精妙，用词洗练，是历代传诵的写景名句。诗句以莺、花、云、晖四景点泼写出一幅静幽美丽的山寺图：树随风动，风吹花落，黄莺被树枝带入了窗户，花朵与清风共舞；白云悠悠归来，落霞洒落窗外。作者用“随”、“逐”、“归”、“落”几个动词来刻画景物的形态，动中有静，以动衬静，更渲染出山寺古刹特有的宁静。“古石”二句，以山寺周围景物加以点缀，进一步描绘山寺的古老悠远。末尾两句用“何年卧”、“几春空”的设问为古老的山寺平添了几分神秘幽深的气氛。诗人借用《淮南小山·招隐士》中的“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等句子，表达了诗人不能久留于此，辜负美景，深以为憾的情绪。

阴铿曾为湘东王法曹参军、故鄣县令，又曾逃往江陵，任镇南司马、始兴王府录事参军、晋陵太守，经常辗转奔走在长江中下游沿岸，他常行舟水上，甚至夜宿水洲，因此对水十分亲近，他的诗中对水景的描写颇多。如《渡青草湖》，诗曰：

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行舟逗远树，度鸟息桅樯。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

这首诗是阴铿的代表作之一，写作者在渡湖时所见到的青草湖春天浩渺的风光，境界阔大远人神思。青草湖，亦名巴丘湖，在湖南岳阳西南，据《方舆纪要》载“青草湖北连洞庭，南接潇湘，东纳汨罗”，湖南岸有青草山，故名。每逢春水泛涨，洞庭、青草二湖合二为一，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湖水进入长江，西通巫峡，东流入海。诗人在开端两句即点明渡湖季节，以“满”字和“平”字勾勒出湖泊春水潋滟的全景。“沅水”以下四句不仅描写洞庭湖的水势，更糅入了与之相关的动人传说，使得诗的意蕴更加丰富，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沅水是湖南西部的一条江流，入洞庭，桃源县在其左岸。“桃花色”三字让人联想起陶渊明笔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楚辞》中《湘君》和《湘夫人》篇有“采芳洲兮杜若”、“搴汀洲兮杜若”之句。因此“杜若香”使人想起娥皇、女英溺于湘水的传说及屈原笔下的湘君、湘夫人；“茅山”即句曲山，是中国道

教名山，在江苏省句容县东南。山有华阳洞，相传汉代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在此得道成仙；而巫峡则留有巫山神女的传说。因此此四句诗不仅写出自然风物，更使诗歌具有了一种迷奇神幻的色彩。“带天”四句写洞庭湖的幽远之景：一叶扁舟，数只飞鸟，飞鸟越湖力怯，栖息在高高的桅杆之上，烟波浩渺的湖面，宽不可测，遥不可及，相形之下，大者愈见其大，小者愈见其小。于是诗人很自然地发出因旅途劳顿、世途艰险的感慨：“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这首诗写景层次分明，远近交错，色调明快，笔墨酣畅。

又如《晚出新亭》诗，是写江上景色的代表性作品，写景以抒情，情景交融：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

新亭在建康（今南京市）境内，是朝士们游宴之所。诗的起势不凡，首句写景，次句写情。江水浩荡而去，离愁却袭上心来，真是几重波浪几重悲啊！此诗的发端与谢脁《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中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正同，开首两句即点出“离悲”的主题。以下四句具体写江景：尽管江上潮势已经低落，但汹涌翻滚的波涛仍然犹如高张的车盖；水面之上云雾沉沉，无有峰峦之状。戍鼓之声从远处隐隐传来，顿添几分肃杀之气；远眺江岸，唯有寒山老松，满目萧索。“潮落”二句以潮落云昏暗示诗人心潮不平，“远戍”二句则通过戍鼓、寒松进一步渲染悲愁的气氛。在这荒寒萧条，满目凄凉的时刻，诗人却不得不孤舟远征，艰难独行，最后两句自然而然地直抒情怀，感叹征程艰难，归程无期。

此诗语言洗练，写景抒情，皆出于自然，将落潮、昏云、戍鼓、寒松等景物组合成一幅《孤舟远行图》，形象鲜明，意境幽远。

诗人生活在泽国水乡，对舟楫行旅生活体验深刻，他的许多作品都描摹水景，生动清新。如《晚泊五洲》：

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戍楼因堪险，村路入江穷。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五洲位于湖北浠水县西兰溪西大江中，此诗作于阴铿自建康赴江陵的路途之中，描绘了江行晚泊，暮色如画的图景。“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二句，描写山、水、云、日，色彩浓艳，引人入胜。

《五洲夜发》也是此类作品：

夜江雾里阔，新月迥中明。溜船惟识火，惊凫但听声。劳者时歌榜，愁人数问更。

此诗写江舟夜行的情景。开头句写诗人所见：宽阔的江面上夜雾迷蒙，一弯

新月高高挂在夜空，江面上闪烁着点点灯火，只有从灯火的移动，才能觉察船只在行驶。然后写所闻：江面上不时传来一两声鸟叫，那是为行船所惊醒的夜栖的水鸟，发出嘎嘎的叫声飞向远处。最后两句由写景转为写人。为减轻夜行的劳顿，船夫一边摇橹，一边唱起悠扬的歌；而在这幽静清寂的夜里，对于行舟水上，急于赶路的诗人来说，却是愁苦难耐，难以安眠，亟待早早天明。作者描绘了一系列景物，雾霭、新月、渔火、惊鸟，直到最后才点出“愁人”，这些景物为“愁人”所观览，他们便也带着愁情了。全诗以“夜发”为线索，首尾呼应，一气呵成，语言凝练而生动，充满了生活气息。

“爱别离”是佛家所说的人生八苦之一，正因如此，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南朝诗歌中，就有不少以送别为题材的作品。沈约的《别范安成》、何逊的《与胡兴安夜别》便是众口传诵的佳作。阴铿的作品中，送别诗也颇具特色，情景交融、委婉动人。如他的名篇《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依然临送渚，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晚钓欲收纶。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

此诗写渡口送行，因迟到未及与友人相见的惆怅心情。诗人赶到江边，船已经启航，只好引颈远望，久久伫立，目送航船远去。开船的鼓声已绝，征帆渐渐靠近了天边的白云，船停泊的地方只剩下鸟儿的身影，送别的亭子早已空无一人，天色将暮，落叶飘零，垂钓者归去。“鼓声”二句将诗人依依不舍、不胜惆怅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唐李白的千古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可谓深得其妙。“泊处”四句则表达了诗人孤独、怅然的情绪。末尾两句，君去江汉，我归城闉，何其远哉！整首诗以景写情，渲染离愁别绪，令人不胜感伤。

又如《和傅郎岁暮还湘洲诗》：

苍落岁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棠枯绛叶尽，芦冻白花轻。戍人寒不望，沙禽迥未惊。湘波各深浅，空轸念归情。

傅郎，即傅縡，北地灵州人。梁末，为王琳记室。王琳败后入陈，除撰史学士，历任司空记室参军，迁骠骑安成王中记室、镇南始兴王谘议参军等职。后主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湘洲，即今长沙。夜幕降临，朋友欲远行，表面看平静的江面实则波涛暗涌，江边干枯的野棠花红叶已落，冰冷的芦花在风中轻摇。天寒地冻，不见行人，连鸟的踪迹也难觅了，只有傅郎的一叶小舟啊在这寒冷的江上独行。想到傅郎即将行舟湘水之上，思归之情油然而生，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家乡呢。同样是伤感，这一首诗歌所伤之事却与前面一首有所不同，送别刘光禄是一种离愁别恨，送别傅郎却引人思乡；作者通过写景以抒情，二诗的

景自然有别，前一首以鼓声息、征帆去、人已散等情景表现的是怅然若失的情怀；而后一首描写江浪、孤舟、棠叶、芦花、戍人、沙禽，透出的却是一种身在异乡的孤独。

阴铿的诗中还有一类行旅诗，诗人久宦在外，长期流离漂泊，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旧之情。比较有名的作品如《和侯司空登楼望乡》、《和登百花亭怀荆楚》：

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

江陵一柱观，浔阳千里潮。风烟望似接，川路恨成遥。落花轻未下，飞丝断易飘。藤长还依格，荷生不避桥。阳台可忆处，唯有暮将朝。

前一首诗由登临“霞观”，被眼前的景物“云”、“柳”、“田”“日”所感，从而引起对家乡的怀念；后一首诗写作者对荆楚的怀念，充满了无限的感伤。

阴铿流传下来的三十多首五言诗中，八句的格式占了十六首之多。这些五言诗歌的创作讲求声律，对仗较为工整，除去部分平仄欠协调以外，从形式上来看已经非常接近唐代五言律诗，可以说，阴铿的五言诗成为了汉魏乐府五言诗过渡到唐代五言律诗的重要桥梁。南朝文人注重四声八病，齐朝周颙著有《四声切韵》，梁代沈约撰《四声谱》，王斌著《四声调》都是在声调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后来诗歌朝着既要押韵，又讲求平仄的律诗的出现做了音韵学方面的准备。而阴铿也正是注意到四声八病，并付诸创作实践的南朝诗人。他的很多诗歌都体现出对仗工整、平仄相调的特点，如“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海上春云杂，天际晚帆孤。离舟对零雨，别渚望飞凫。”（《广陵岸送北使》）“丝垂遥溅水，饵下暗通流。歌声时断续，楫影乍横浮。”（《观钓》）“巴水萦非字，楚山断类书。荒城高仞落，古柳细条疏。”（《登武昌岸望》）这些诗句与后来的唐代律诗已经相差无几了。其他一些如《雪里梅花》、《秋闺怨》、《西游咸阳中》、《经丰城剑池》、《晚泊五洲》等诗歌，也与唐五律十分相近了。无怪乎清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六朝介于古近体之间，风格相承，神爽变换，中有至理。不尽心于此，则作律不由古诗而入，自多俚率凡近，乏于温厚之音。故梁、陈之诗，不可不读。读梁、陈之诗，尤当识其正宗，则子坚集其称首也。更且无论前后古律，脱胎所由，就此一体，亦有妙境，乌容不详！今俊逸如子坚，高亮如子坚，诗至是可以止矣。”沈德潜也指出：“五言律，阴铿、何逊、庾信、徐陵已开其体，唐人研揣声音，顺稳体势，其制乃备。”可见，阴铿之诗已开五律之先河。

阴铿诗歌开唐宋近体诗歌之风，尤其对唐代诗人创作影响深远。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李白的山水诗风格清新，确与阴铿十分相似。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就与阴铿的“帆势与云邻”如出一辙。清陈仅《竹林答问》曰：“太白《宫中行乐词》诸作，绝似阴铿。”其所指诗句如“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之二），“绣户香风暖，纱窗曙色新”、“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之五），“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之七），这些句子清丽美妙，宋代王明清《挥尘录》云：“‘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阴铿诗也，李太白取用之。”而南宋姚宽却认为此“乃阴铿诗”（《西溪丛语》）。可见，李白从阴铿诗歌中汲取其精华并加以发扬。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对于阴铿亦极其欣赏，这在他的诗歌之中多有体现，如《解闷十二首》中，有“陶冶性灵存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杜甫在谈及创作经验时认为写诗可以陶冶性灵，而得来好诗除了要像二谢一般具有才情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习阴铿、何逊刻苦的精神，用心写诗。《读杜心解》云：“自言攻苦如此。”《石洲诗话》云：“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可见杜甫对阴铿推崇备至，自身亦在不断向其学习。宋龚颐正撰《芥隐笔记》中有过相关论述，认为杜甫诗歌中有许多句子取自于阴铿，并加以发扬。他说：阴铿诗有“天际晚帆孤”、“天边看远树”、“大江静犹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静犹涌”、“云中辨烟树”。铿有“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杜诗有“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铿有“中川闻棹讴”，杜有“中流闻棹讴”。铿有“花逐下山风”，杜有“云逐度溪风”。祖述有自，青出于蓝也。其他诗人如唐王维，北宋柳永等都对阴铿诗歌有所继承。

阴铿诗集原有三卷行世，至隋而散佚，今存《阴常侍集》一卷，《六朝诗集》本，又名《阴常侍诗集》。有《二酉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收录诗歌三十六首。

天下谁识吕衡州

甘建华

一

在唐代灿若星辰的诗人中，吕温并不是特别有名，不在一线之列，但是他有些诗作确实写得很不错，一直为后世所推崇。今日湖南精神的表述语之一“敢为人先”就出自他的诗：“忠躯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英雄诛董卓，长沙弟子最先来。”吕温的诗词文意浅直，平白自然，多悯民怜友之作，纪游记事，抒发情感，《全唐诗》收其诗二卷百余首，今人数种唐代名家诗选中也载有他的佳作。

吕温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年），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人。吕家是一个书香官宦人家，祖父吕延之，官越州刺史、浙江东道节度使。父吕渭，举进士，官至礼部侍郎。祖与父俱有盛名。吕温的外祖父柳识、外祖叔柳浑皆为诗人，有令名。吕温兄弟四人皆俊才，父子兄弟以文学并称，为世所美。由于他的业绩主要在衡州刺史任上，故世称“吕衡州”。

吕温幼学从父，20岁从著名学者陆贽治《春秋》，从梁肃学文章，其文俊拔赡逸，颇有文采。刘禹锡说他“始学左氏书，故其文微为富艳”（《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旧唐书·吕温传》亦称其文有“左丘明、班固之风”。他擅长铭赞，如《成皋铭》、《三受降城碑铭》、《凌烟阁勋臣颂》、《张荆州画赞》等，“时有奇逸之气”（王士稹《香祖笔记》），为世所称。又善政论，如《功臣恕死议》、《三不欺先后论》、《诸葛武侯庙纪》，皆见识卓异。清代李慈铭说：“和叔之文，当时拟以左丘、班固，诚非其伦。然根底深厚，自不在同时刘梦得（禹锡）、张文昌（籍）之下。”又称其铭赞诸文，“置之韩、柳集中，亦为高作”，“其气势格律，皆出于学问，自非李元宾（观）辈所可及也”（《越缦堂读书记》）。他逝世后，刘禹锡将其诗文辑为《吕衡州集》二十卷，后有《吕和叔文集》行世。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吕温应河南府试，为贡士之冠。十四年（798年）进士及第，次年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十九年（803年）擢左拾遗，次年与张荐出使吐蕃，历官户部员外郎、司封员外郎、刑部郎中兼侍御史。

擢左拾遗后的数年，是吕温在政治上的活跃时期。他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当时只有30多岁，为少壮之士，锋芒初露，为王叔文所倚重，是革新派重要成员。史籍所载王叔文党，吕温名字排列靠前。他行事不肯苟且从俗，有志气，有抱负，谈史论政，极富热情。令人深感惋惜的是，著名的“永贞改革”（805年），仅仅只有146天便夭折了，吕温的政治主张当然失去了付诸实践的机会。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翌年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吕温因外使得免，否则就会成为“九司马”。

元和三年（808年）秋，吕温因与御史中丞窦群、监察御史羊士谔等弹劾宰相李吉甫勾结术士惑乱朝政，被贬为道州刺史。五年（810年）徙衡州，六年（811年）八月病卒于衡州刺史任上，终年40岁。

吕温不仅是诗人，也是封建时代非常难得的一位开明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他的法制思想基本上承袭了封建正统，在倡导明刑立威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德主刑辅”，即刑罚的施行应服务于“德”，只有“导之以德”，才能使人“迁善远罪”。这有他的《道州将赴衡州酬别江华毛令》一诗为证：

布帛精粗任土宜，疲人识信每先期。

明朝别后无他嘱，虽是蒲鞭也莫施。

蒲鞭是用很轻的蒲草编成的鞭子，有何用？打屁股，惩恶罚过。以蒲草为鞭，常用以表示刑罚宽仁。而吕温离任时于属下江华县令没有别的嘱咐，只是要求他宽待百姓，就连蒲鞭这类小小的刑罚也莫轻易施用。

吕温是一位颇有仁人之心的官员，忧民生，悯农事。据《云溪友议》载，李绅著名的《悯农》诗，就是为吕温激赏而盛传于世的。元和五年（810）十月十七日，衡州府城西郊柘里渡百姓苏升、陈演、李宽泰、陈甫、鲁余五人，“知余诚信，力输公税，争赴先期。溪涧阻深，潦水暴至。不忍欺我，忘其险艰”，结果死于洪水之中。这事本来与吕温没有多大的干系，但他听说后，心情非常沉重，“遣故衙前虞候何防，以豚酒蔬果致祭”，并作《祭柘里渡溺死百姓文》，自责道：“州令未明，津渡不谨，致此沦逝，咎由使君。”还拿自己的俸钱抚恤死者家属，代其纳税。清代同治《衡阳县志》称：“览和叔之情词，可谓催科之良牧也。”

衡州府城北石鼓山，蒸水环其左，湘水挹其右，耒水横其前，三面临水，前有深潭，一峰特起，悬崖峭壁，如大石屹立江心，形势壮丽。上有合江亭，是唐贞元初衡州刺史齐映所建，文人士子每每呼朋唤友，登临览胜。贞元二十年（804

年）九月初旬，韩愈在《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中，形容此处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吕温也常来此处极目骋怀，吟咏寄兴，并鸠工庀材，增葺观舍。他写有两首有关合江亭的诗作，其一曰《衡州岁前游合江亭，见山樱蕊未坼，因赋含彩吝惊春》：

山樱先春发，红蕊满霜枝。

幽处竟谁见，芳心空自知。

似夺朝日照，疑畏暖风吹。

欲问含彩意，恐惊轻薄儿。

此诗借景抒怀，用含蕊未发的山樱，含蓄地抒发了宦海浮沉、洁身自爱的感慨。其二曰《合江亭槛前多高竹，不见远岸花，客命翦之，感而成咏》，写看花剪竹、得不偿失的感怀：

吉凶岂前卜，人事何翻覆。

缘看数日花，却翦凌霜竹。

常方契君操，今乃妨众目。

自古病当门，谁言出幽独。

幽静而清雅的石鼓山，实为儒家士大夫读书养性、相聚讲学、吟诗论文的绝佳场所。其时，秀才李宽（一作李宽中）在此结庐读书，创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是谓石鼓书院之始建。吕温公务之余“常往访之”，与李宽及诸生“游宴觞咏，风雅称盛”，写下了著名的《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

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

微风但觉杉香满，列日方知竹气寒。

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

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

吕温“以文学饬吏治”，对于后来石鼓书院的发展确有“提携”之功。至唐末，大批读书人来此读书学习。宋至道三年（997 年），李秀才七世裔孙李士真请于郡守，重建石鼓书院。景祐三年（1035 年），宋仁宗钦敕“石鼓书院”匾额，并赐予学田，石鼓书院遂与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称为全国四大书院。

吕温与文人士子交往甚密，与佛门道家也结下了胜缘，有不少方外之友。他与南岳衡岳寺诗僧灵澈切磋佛理，研习经典，诗酬唱和，写有《戏赠灵澈上人》一诗：

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

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

这首诗把和尚与春兴、春波、花枝、花影之类联系在一起，可谓亵佛大胆至极，

亦可见吕温、灵澈友情甚笃，均是有趣之人。

吕温撰有《南岳大师承远公碑》，对承远师徒草创祝圣寺事迹记述至详。他与南岳九真观道士田良逸、蒋含宏、欧阳平友善，乐道参玄。三仙同时尸解（道家认为修道者死后，留下形骸，魂魄散去成仙），他入山殓之。他还曾奉敕祭告南岳，写下《奉敕祭南岳十四韵》，诗尾写道：“所愿风雨时，回首瞻南极。”

三

衡阳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素有“寰中佳丽”之美誉。从道州那个蛮荒之地，转迁相对繁华的衡州，毕竟离长安又近了一步，所以吕温的心情相对舒畅一些，这可从《自江华之衡阳途中作》一诗看得出来：

孤棹迟迟怅有违，沿湘数日逗晴晖。

人生随分为忧喜，回雁峰南是北归。

元和六年（811 年）早春，面对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美丽景致，吕温悒郁多年的心境，似乎也有欣欣向荣之象，他作《早春偶游黄溪口》：

偶寻黄溪日欲没，早梅未尽山樱发。

无事江城闲此身，不得坐待花间月。

另作《衡州早春二首》：

碧水何逶迤，东风吹沙草。

烟波千万曲，不辨嵩阳道。

病肺不饮酒，伤心不看花。

惟惊望乡处，犹自隔长沙。

可惜，吕温的还乡之愿最终未能实现。

吕温为人敦厚，待人真诚，推心置腹，世所钦敬。他在《衡州送李十一兵曹赴浙东》一诗中写道：

慷慨视别剑，凄清泛离琴。

前程楚塞断，此恨洞庭深。

文字已久废，循良非所任。

期君碧云上，千里一扬音。

虽然对自身的前程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他期望属下李十一兵曹能在浙东任内青云直上，为国竭尽绵薄之力。对待同僚，他也谦和有礼，一派君子风范，这在《衡州登楼望南馆临水花，呈房戴段李诸公》诗中有云：

夭桃临方塘，暮色堪秋思。

插根岂求润，照影非自媚。
胃挂青柳丝，零落绿钱地。
佳期竟何许，时有幽禽至。

虽然政治失意、生活困顿，吕温却迎来了人生一个璀璨的时期，也为衡州诗坛带来了一缕清新之风。在京城为官时，他原本与著名诗人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窦巩、段弘古、李景俭等相友善，柳宗元等人先后贬放南方蛮夷之地，路经衡州，吕温自然竭尽地主之谊，诗酒酬唱，佳话流传。虽然他们各奔任所，但都会关注衡州，诗文往来，交流信息，扩大了衡州的文化氛围，无形中提高了衡州的知名度。

吕温在衡期间所作诗词，多以“衡州”为题，世称“吕衡州”。他经常深入乡村郊野，询问农事，督导耕种，教以德行，风化淳俗。正当有所作为，为善一方，不料只过了一年稍多一点时间，便因病卒于任上。他留在衡阳的绝笔是《衡州夜后把火看花留客》，透露了无穷的辛酸与悲凉：

红芳暗落碧池头，把火遥看且少留。
半夜忽然风更起，明朝不复上南楼。

东风无力，落英缤纷，南楼一望，情何以堪，这首诗居然成了他最后的谶语。

四

担任衡州刺史期间，吕温大力推行压抑地方豪强兼并，调整租税、劳役负担，奖励农桑，救济穷苦等措施。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他一举查出逃避赋役的“隐户”（亦称逃户）万余户，愤慨奸吏压榨隐户的遭遇，请示朝廷不增加“疲民”的赋额。他在奏疏中说：“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审定赋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伏缘圣恩，擢授大郡，令抚伤残。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设法固定，获隐户约万余。州县虽不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民。臣请作此方圆，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枯，上不缺供。”上敕有司付所司，照准，民赖以安（《历代寓湘人物传略》）。

吕温恪尽职守，政绩颇著，上下焕然一新，百姓爱戴如父母。但他的身体一直多病，这与改革不成、宏图难施而郁结胸臆不无关系。据清康熙《衡州府志》载，吕温殁后，“廪不余食，藏无积帛”，“僮无凶服，葬非旧陌”，“民哀之逾月”。另据《湖南通志》载：“其卒也，湖南人上戊重社，去乐废酒，哭于神所而归。”

闻悉吕温英年早逝，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窦巩等中唐才子名士都赋诗表示哀悼，可谓盛况空前。柳宗元与他是中表之亲，感情一向很好，写有《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
只今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元稹写有《哭吕衡州六首》其中第五首：

回雁峰前雁，春回尽却回。
联行四人去，同葬一人来。
铙吹临江返，城池隔雾开。
满船深夜哭，风棹楚猿哀。

刘禹锡《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诗云：

一夜霜风凋玉芝，苍生望绝士林悲。
空怀济世安邦略，不见男婚女嫁时。
遗草一函归太史，旅坟三尺近要离。
朔方徙岁行当满，欲为君刊第二碑。

窦巩《哭吕衡州八郎中》诗云：

今朝血泪问苍天，不分先悲旅馆丧。
人送剑来归陇上，雁飞书去叫衡阳。
还家路远儿童小，埋玉泉深昼夜长。
望尽素车秋草外，欲将身赎返魂香。

这些诗极尽悼念故人之情，可谓字字见泪。

吕温的逝世对柳宗元的打击相当大，他在《祭吕衡州文》中说：“海内甚广，知者几人？自朋友凋丧，志业殆绝。唯望化光，伸其宠略，震耀昌大，兴行于时，使斯人徒，知我所立。”可惜这个美好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3年后，柳宗元写下《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曰：“交侣平生意最亲，衡阳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见三行字，拭泪相看是故人。”看见故人的字迹，堂堂七尺男儿顿时泪如雨下，这是怎样深厚的友情啊！

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刘禹锡说：“温年益壮，志益大，遂拔去文字，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每与其徒讲疑考要皇王霸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间，诋诃角逐，叠发连注。”这一段话，当是对吕温一生人格、处世、追求的极好概括。

（作者单位：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

陶澍与安化黑茶

陈先枢　汤青峰

一、陶澍故里与黑茶故里相融合的一颗明珠——小淹

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清长沙府安化县小淹镇陶家湾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嘉庆七年（1782）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

小淹位于安化县境东北部的资江南岸石峰山下，为安化古镇之一，亦为著名的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相传南宋嘉定十七年（1244），理宗由邵州（今邵阳）诣京师（今杭州）继位过此，忽值石门潭伏涨，淹留竟日，故名“小淹”。陶澍祖先居住在小淹镇对河约十华里的发榜村。大约陶澍高祖时，举家迁居陶家湾，即陶澍出生之地。陶家湾在资江北岸，隔江与小淹镇相对，自然景观优美，地沃物丰，盛产黑茶。陶澍说：“陶子生长资江之滨，其山：大屏、桦香、石峰、香炉、紫云、芙蓉、乌云；稍西：神山、梅山；稍东：九岗、浮邱。其水：茱萸、石潭、善溪、伊水，与夫上游之七十二滩，下游之二十四港，皆岞嵬磅礴，湍洄清冷，实宇宙之奥区，冠盖所不至，红尘所不入。”陶澍记述茶马古道时说：“小淹地当要冲，有市集，行旅往来与夫牵缆而上者赓续不绝，实为必问之途。自城墙崖上距淹市，计路四里有奇，险者夷，阻者通，其泥洼低陷之处，则甃之以石，俾坚固而平，所谓道如砥，直如矢者，洵足以当之。”而捐资修缮古道者正是陶澍的伯父羡周公。

资水流至小淹和陶家湾，为大山所阻，形成深潭，即石门潭。陶澍诗云：“石门潭下水盈盈，石门潭上石如城。”潭边岩石“壁立万仞”，如城墙，称城墙崖。崖长55米，高22.5米，崖巅有巨石昂翘似龟，故俗称乌龟崖。后陶澍将御书“印心石屋”四字摹刻于壁，共长9尺多，每个字高1.6尺，故又称御书崖。陶澍诗曰：

地讶金壶迥，山疑玉笋排。

鳌图何处负，天近御书崖。

与御书崖相对，有石如墙。高四五丈，自山顶逶迤而下，伸入江心，谓之“石龙渡江”。石门潭北面即资江北岸，高山围绕，绿树成林，文澜塔矗立江边。道光十一年（1831）此塔由陶澍捐资建成。塔分7层，高21米，八方内实，青石砌成。塔前有深潭，云气江声交汇，蔚为壮观。陶澍有联题小淹石门潭文澜塔：

云气空中接；江声足底哗。

塔下有水月庵，为陶澍幼年读书之所。陶澍后来回忆说：“庵俯石门潭，距居宅三里许，两岸石壁，插江如门，水绿净，窈然而深，渔歌榜曲，有濠梁间意。”水月庵背靠青山，面临资水，江下约百步，有石突出，方正若印，即陶澍所称之“印心石”。以印心石为中心，潭、崖、塔、庵隔江相望，景色雄伟壮丽。陶澍有联题水月庵：

静院谈诗，香生玉薤；晴窗挥翰，彩映金蕉。

这一山清水秀之地正是安化黑茶的发源之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所谓“长沙之铁色”就是指长沙府所辖安化县小淹等地所产蒸压制的黑色毛茶，为当时远销西北地区的大宗商品。有关安化黑茶的文字记载比此更早。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说：潭州茶中有益阳团茶和渠江薄片……“以多为贵”。唐代渠江地域今属安化县小淹一带。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色如铁”正是黑茶的特征之一。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从唐及五代学者对“渠江薄片”的连续记载及“其色如铁”、“烹之无滓”、“一斤八十枚”等描述看，“渠江薄片”即“长沙铁色”，是安化开发最早、销售最畅的黑茶品种之一，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万历十三年（1585），“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可见当时西北茶商多越境至湖南私运黑茶边销。御史李楠以妨碍茶马法政，请求朝廷禁止。经户部批示，自后西北官引茶以汉中、四川茶为主，湖南茶为辅。价廉的安化黑茶从此部分打通了直销西北的官营渠道。因此，明代成为安化黑茶的兴盛时期。那时湖南贩运到西北地区的黑茶多产于安化小淹一带，而从长沙集中转运到陕西泾阳，再加工成砖茶销往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同时，汉（湖北）茶与湘茶相比，西北番人（少数民族）更偏爱湘茶，如《明史·食货志》所说：“汉茶味甘而薄，湖（南）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利番”成为安化黑茶畅销西北的重要原因。

清代是安化黑茶的又一兴盛期。道光元年（1820）以前，陕西商人驻长沙府益阳县委托行栈汇款到安化定购黑茶，或以羊毛、皮袄换购，因资金较少进货不多，人称“滚包商”。受托行栈雇人下乡采办茶叶原料，踩捆成包，叫“澧河茶”，随后又改为“百两茶”，踩成小圆柱形。清同治年间，晋商“三和公”茶号在“百两茶”

的基础上选用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与篾捆压而成花卷，每支净重1000两（16两老秤合37.27公斤），所以又称“千两茶”，圆柱长5尺（166.5厘米），圆周1.7尺（56厘米）。小淹等地为其主要产地，踩制工艺独特，花卷做工精良，曾有茶商用水试浸，经七年茶心不湿。这种茶主要是晋商经营，又以籍贯不同分为“祁州卷”和“绛州卷”。“祁州卷”系祁县、榆次等地茶商经营，每支重1000两，产量较多；“绛州卷”为绛州茶商经营，每支重1100两，数量较少。最盛时期，在安化经营花卷茶的商号有30多家，年产3万至4万支，主销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河北及察哈尔、绥远一带。今日小淹镇白沙溪茶厂是花卷茶生产工艺的主要传承者之一。不过脚踩已改为机械压制，卷形已改为长方砖形，称之为花砖。

陶澍的诗见证了家乡黑茶生产的盛况。陶澍出生在资水河边的小淹，从小就是采茶能手，每到采茶时节，黎明即起，背筐挎篓结伴上山采茶。他的两首《芙蓉江竹枝词》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诗云：

身背竹篓上山冈，白云深处歌声昂；

十指尖尖采茶叶，笑语阵阵比情郎。

才交谷雨见旗枪，安排火坑打包箱。

芙蓉山顶多女伴，采得仙茶带雾香。

陶澍自嘉庆七年（1802）25岁赴京参加壬戌科会试，走上官宦生涯后，一生中三次回小淹，第一次是嘉庆十年（1805）归家奔丧，第二次是嘉庆十三年（1808）回家纳小，第三次是道光十六年（1836）59岁时回乡省亲，并编修陶氏族谱。他每次回乡，都不忘游览茶园，考察茶场，造访茶农，品味乡茶，并应邀为家乡的茶场、茶亭题联题诗，为小淹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茶文化遗产。

二、陶澍以尝“内府新茶”而始的亦政亦茶生涯

清嘉庆七年（1802）四月二十一日陶澍参加保和殿策试，最令他受到感动的是尝到了“内府新茶”。他在《保和殿策试恭记》一诗中写道：

内府新茶次第分，阶前五色绕仙云。

草茅十载书生事，三策天人答圣君。

从此，陶澍忠心报效朝廷，也更钟爱茶，品茶成为他为官之余的一大嗜好。陶澍的父亲陶必铨是岳麓书院学生。陶澍从小随父读书，也深受岳麓传统学风的影响，为学以程朱为宗，好谈义理，又注重经世，倡言“通经学古而诸致用”，“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在巡抚、总督任上，陶澍将自己一贯强调的“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主张付诸实践。他大力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整治河工，主禁鸦片，倡导文教，改革盐政漕运，推行银本位制，经世功绩卓越，成为一代名

臣。他在道光四年（1824）洪泽湖决口，运河漕运受阻影响京师粮食供应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力排阻力启用海运，不仅节约了巨额运费，又避免了人员伤亡，为清政府改漕运为海运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他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就是设立局厂收税，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销盐，从而废除了盐业专商，即纲商，将官营改为商营，使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得到了保障，开创了中国盐政的新局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陶澍位高名重，是当时湖南经世派的领袖与核心。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长达14年之久，二人友谊极深。以后的湘军首领胡林翼是他家塾师，后成为其女婿；左宗棠曾替他理家教子8年，并结为儿女亲家。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难怪后来臧否人物十分苛刻的张佩纶，也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任两江总督已六载，始入京乞假，回湘探亲。道光帝嘉其功高，曾召见14次，宠锡愈恒，并手书“印心石屋”四大字赐之。陶澍对御书珍爱有加，将其摹刻在汉白玉上，制成石匾，嵌在长沙岳麓山白鹤泉上方、登云麓峰石径旁的山墙上，至今保存完好。石匾高94厘米，宽288厘米，中刻御笔楷书“印心石屋”四大字，每字高约45厘米，端庄朴雅，笔力遒劲。匾左刻“道光乙未秋”，匾右刻“御笔”，“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臣陶澍恭摹”，并刻有御玺“道光之宝”。陶澍自题《岳麓印心石屋图》云：

麓山好泉石，印取心如玉。

上有禹碑亭，中堪结茅屋。

官场免不了应酬，但陶澍的应酬之法十分简便，也十分文雅，即品茶与赠茶。从《董琴南编修以事未与品茶之会，翼日诗先成，且索茶为赠，辄致头纲一饼，次原韵奉酬》一诗中可看出，陶澍赠予董琴南编修的茶是茶饼，而压成饼状正是清代安化黑茶的主要形态之一。品安化黑茶是十分惬意的，“人从一口分，趣比字题酪。差堪润喉吻，未足劳辅腭”，似乎忘记了是在应酬。诗云：

我茶君未尝，和诗独先作。妙语出清新，评骘精且确。

笔迅电飞腾，辞成珠错落。固知胸怀间，自具有丘壑。

著纸即烟云，一字不须酌。拜贶岂寻常，翻觉琼瑶薄。

忆昨煮茗时，刚趁春雪渥。人从一口分，趣比字题酪。

差堪润喉吻，未足劳辅腭。坐中六七豪，意气殊脱略。

颇怪君未来，或者借辞托。我意当不然，知君耽直谔。

朝来得君诗，洗我胸中恶。余甘姓氏稀，顿令侯封廓。

茶芽如有神，开笼芳香擢。一饼暂相酬，聊佐胡卢杓。

诗简来往飞，知君烦吐握。

陶澍从政之余，稍有闲暇，最大的爱好就是“试泉”与“煮茶”，每次“试泉”与“煮茶”之后多以诗记之，因而有很多茶诗流传下来，仅录二首如下：

游慧山寺试第二泉

慧山山下慧山寺，寺里泉留第二名。
每怪唐人夸水递，只宜坡老拣茶烹。
濛濛雾向竹中出，淅淅涛从松外鸣。
不用风前张两腋，梅花一路看春生。

松顶煮茶

心泉只合夷齐饮，舌本曾闻陆羽尝。
何处车声煎不断？松花风里水初香。

三、陶澍诗联中的安化黑茶

陶澍的诗，或感时纪事、咏史怀古，或言志抒怀、唱和酬答，都显得感情朴实、器识宏远、思力深厚，具有一种既豪迈又平实的风格。林则徐赞之“直以雄才凌屈宋，还将余事压曹刘”。如《长沙竹枝词》：

霏霏谷雨满江乡，君山顶上露旗枪。
唤个相于采茶去，湘妃祠下默烧香。

陶澍生在茶乡，喝着家乡的茶走向全国，自是念念不忘家乡茶和茶人之辛苦，因此就有意为之推广。嘉庆二十年（1815）春节，他邀请在京的“消闲诗社”诸好友到自己家里畅饮安化茶，并率先吟诵了《印心石屋试安化茶成诗四首》以助茶兴：

（一）

今岁足衎乐，春来事云适。长安诸故人，颇能盛筵席。
席设每见招，终日但为客。今朝客忽来，例我具肴核。
冷盘三五阵，下箸无所获。匪徒少羊羔，亦乃乏鸡跖。
斗酒兴未阑，四座欢弥剧。旋闻蟹眼鸣，中有云腴碧。
我家茱萸江，乡物旧所积。虽无甘露兄，犹足清两腋。
煮茗况家风，庭前余雪白。

（二）

芙蓉插霞标，香炉渺云阙。自我来京华，久与此山别。
尚忆茶始犁，时维六七月。山民历悬崖，挥汗走蹩躠。
培根阅冬初，摘叶及春发。冻雷一夜鸣，蓓蕾颖欲脱。

是名雨前香，采之日一撮。未几渐蒙茸，卓立针抽铁。
是名谷雨尖，香气弥勃勃。毛尖如鹤氅，挨尖类雀舌。
黄茶号晚出，味厚亦非劣。方其摘取时，监筐偏山岊。
晨穿苦雾深，晚焙新火烈。茶成与商人，粗者留自啜。
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我本山中人，言之遂凄切。

（三）

宁吃安化草，不吃新化好。宋时有此语，至今犹能道。
斯由地气殊，匪籍人工巧。迩来地利尽，所产日以少。
变化及荃茅，夹杂或茶蓼。遂令东家施，貌作西邻姣。
时俗但骛名，讵易初终保。臭味慎差池，我谓茶犹小。

（四）

茶品喜轻新，安茶独严冷。古光郁深黑，入口殊生梗。
有如汲黯戆，大似宽饶猛。俗子诩茶经，略置不加省。
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气能盐卤澄，力足回邪屏。
所以西北部，嗜之逾珍鼎。性命系此物，有欲不敢逞。
我闻虞夏时，三邦列荆境。包匦旅青茅，厥贡名即茗。
著号材所长，自昔功已迥。历久用弥彰，暗然思尚褧。
因知君子交，味淡情斯永。

上述四首诗，详细介绍了安化毛尖茶、边销黑茶的特点，产茶的历史，茶农生计的艰辛，以及安化茶与其他茶的异同，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乡情爱意，也是安化茶史的珍贵资料。

四诗虽同咏安化茶，但主题各有侧重，其一写印心石屋试安化茶之况，其二写自己对家乡茶的回忆，其三写安化茶之现状，其四以安化茶之茶品写为人为官之道，认为安化黑茶茶品之严冷“有如汲黯戆，大似宽饶猛”。作者以汲黯之戆和宽饶之猛比喻安化茶品，揭示“因知君子交，味淡情斯永”的人生哲理。陶澍从小生活在茶乡，和茶农共同劳动过，从茶苗的种植培育、生长，到茶叶的采摘、烘烤、制造的全过程，曾亲自体验过。对茶树的生长环境，茶叶的品种、质量，也有丰富的知识。正是在这些生活的基础上，陶澍写出了“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的千古绝唱，与唐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诗史上，曾有过不少描写茶叶和茶农的诗歌，但未见有如此体贴同情茶农者。由于作者情真意切，又渗透着一种“哀民生之多艰”的爱民情怀，因此感染力极强，和诗纷纷，安化黑茶从此誉满京城，进一步销售到西北以外的全国许多地方，直至日、德、俄、

朝和东南亚诸国。安化黑茶从边销茶发展到五湖四海普遍饮用的保健茶，陶澍功不可没。

安化不少茶场主纷纷请陶澍题联，陶总是有求必应。如题安化东坪柳溪茶场：

春共山中采；香宜竹里煎。

又如题安化小淹茶场：

采臼雨前，烹宜竹里；经翻陆羽，歌记卢仝。

这些茶联不仅融汇了安化黑茶的制茶工艺、风俗和安化地方乡里风采，而且把茶事典故顺手拈来，体现了陶澍深厚的桑梓之情和茶文化底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些茶联都成为推广安化黑茶不是广告的广告。

陶澍还为家乡茶亭题有楹联，如题杉树亭联。至今犹存的杉树亭有茶亭活化石之称，它坐落于安化县冷市、小淹两地等距的高芭、石沙村交界处杉树岭，建于清嘉庆年间，是往昔新化、溆浦、梅城通往常德、桃源等县的要道。岭高海拔约600米，地形险要，素有"南北十里一关山"之称，茶亭为全木质结构，建筑呈新月形，亭长15米，宽4米，共5间，占地90余平方米，呈"L"形，东侧设条凳、茶缸，供行人停歇饮用，西侧两间横屋，供守亭人居住。亭东原建有梅山菩萨孟公祠，亭北有参天古树四棵，现已无存。亭南北现各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蜿蜒登山陡道，似天梯直插亭中。亭下郁郁竹海、杉林，近边弯弯资水，似玉带缠绕，远处与文澜塔、印心石遥相呼应。陶澍所撰楹联镌刻在茶亭廊柱上，联云：

茶后行者行，莫愁劳燕分飞，放眼光明路正远；

亭前过客过，若访雪鸿遗迹，印心名胜景尤佳。

上联的"劳燕分飞"出自《乐府诗集·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寓意离别。下联的"雪鸿遗迹"语出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比喻人过后所留下的痕迹。此联措辞典雅，对仗工稳，是历来茶亭联的上品之作。

嘉庆湖南学政徐松被参始末

龚笃清

嘉庆湖南学政徐松被参一事现在已差不多无人知晓了，但在两百年前的湖南政坛可算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地位与巡抚并列的湖南学政徐松被强悍的湖南人以几桩小事告倒，革职并遣戍新疆，一时震惊全国。

之所以会造成轰动，不仅徐松位高，还在于徐松是个才子、是受皇帝赏识的大名士。徐松字星伯，号孟品，原籍浙江上虞，幼随父宦游北京，遂入顺天大兴（今属北京）籍。徐松自幼聪慧，熟读经史，苦习八股文，故科场顺利，十九岁即中举人，嘉庆十年（1805年）二十五岁参加会试，中二甲一名进士，即殿试第四名，俗称传胪，仅次于状元、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这在当时也是了不得的事，其文名立即传驰天下，并受命入值南书房。

南书房在大内乾清宫西南，原为康熙皇帝之书房，后为翰林等侍从官员入大内值班处，在这里工作的称南书房行走。这些人除自己撰述外，还秉帝旨起草诏书，一度成政令的发布处，权势显赫。雍正时成立军机处，南书房各官不再参与机密，改司文词书画等事，替皇帝代笔写写画画，一般称为南斋。南书房行走官员不限品级，从六部尚书到翰林院编修皆可充任，但必须是翰林院出身，且擅长写作者。

徐松平生研治经籍，尤精史事，少年时即以博学文采，名重一时。南书房又有大量宋元秘籍可读，上班事情不多，时间又充裕，到这里可算得上如鱼得水，干得十分出色。"时总司书房者大学士董诰，以松淹雅俊才，心重之，一切应奉文字皆出松手"（《畿辅通志·徐松传》）。很快，徐松就得到嘉庆皇帝的赏识，许多编编写写的事都交给他去办，他也真正干了几桩在中国学术史上可以留名的事。

他好读新旧《唐书》与唐人小说，嘉庆十四年（1809年），奉诏纂辑《全唐文》，便遍寻四库未见书及《永乐大典》，以其博闻广见，旁搜博采，很快将《全唐文》纂辑成功，皇帝颇为欣赏，十五年（1810年）任命他为文颖馆总撰官，主持编纂

收录清朝历朝皇帝与朝臣之作的《皇清文颖续编》。他精力充沛，在这期间，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稿》三百六十六卷，写作了《唐两京城坊考》五卷、《唐登科记考》三十卷、《宋三司条例考》一卷、《明氏实录校补》等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徐松才二十多岁，即干出这么多他人一辈子也干不出的业绩，其才气学识及孜孜学术的精神自然令人注目，嘉庆皇帝便于嘉庆十五年底（1811 年初）任命他为湖南学政。这时他还未满三十岁。

以编修出任一省学政，这是一种擢拔，是一件很为荣耀的事。

为加强对全国各级学校和乡试、童子试的领导，明代在各省设提督学道。清代则更为重视，叫“钦命提督某省学政”，简称为学政，尊称为学台，其官衙称为学院。一般由翰林院学士或是由翰林出身的京官如各部侍郎、副都御史担任，由从五品的编修充任的颇少，徐松以编修当学政，是破格重用。且学政是“钦命”的，也即是代表天子到各省主持学务，选拔人才的，本身官品虽不高，翰林学士只不过四品，可到了地方，官职就仅次于总督、巡抚，其地位与督抚平行，知府以下官员均顺执属员礼，参见要跪拜。

学政任期一届三年。三年中要两次遍巡省内各府和直隶州、厅，进行两种考试：一为岁试，即将一府或直隶州、厅境内所有已获生员即秀才资格的学生召来出题考试，检验他们在三年中是否荒废了学业。名列前茅者有奖赏，成绩差者受责罚，直至革去生员资格。二为科试，即选拔参加乡试的生员，这种考试凡不想应乡试者可以不参加，而岁试是每个生员都必须参加的。岁试与科试在不同的年份进行。

在进行岁试或科试的同时，还会进行一种考试，即选择秀才的童试。

明、清两代的科举为“三三八”制。第一个“三”即由中央的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城乡的社学、义学、私塾三级学校教育。第二个“三”包括两个三级考试，即由县、府、院（道）三级秀才选拔考试，和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试。“八”即八股文，所有的考试均以八股文的好坏为最主要的选录标准。明、清制度规定：非学校出身者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要进入学校必先经过童试考中秀才，只有秀才方能参加乡试考举人；只有举人才能参加会试考进士；只有举人、进士及以秀才出贡到国子监的贡生才能当官。考不考得上，全看八股文写得怎么样。“三三八”制便构成一个科举制的系统工程。

在科举制度中，学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读书人要想入学成为秀才都须经过他最后考选，他有一锤定音的权力；所有秀才要参加乡试去争取举人功名，必须经过“录科”，即由学政在科试之后保送；秀才是否合格以及他们能否当上

享受助学金的廪膳生员和出贡当贡生也要由学政来决定；省内各地教官的功过勤惰考核也由学政来掌管。乡试虽另有朝廷任命的主考官阅卷，但整个乡试要由学政来组织。总之，读书人能否迈出功名的第一步，决定权在学政。学政操持着全省读书人和生员的科举前途，也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权力。而正是这种权力的运用，决定了徐松在湖南的命运。

徐松少年得志，风风光光地走马上任了。尊师为中国历代的传统美德，徐松离京前，朝廷还按规矩送来四色礼物，其名不叫“赐”，而叫“送”，这是因为学政是一省读书人之师，身负为国求贤之责，师是受尊敬的，朝廷要带头尊师。不仅对学政，连府、州、县学的教授、学正、教谕、训导，虽品级很低，有的还不入流，但他们是“师”，故也受尊重，他们见了上司甚至公卿，也不下跪而只长揖，这也是尊师的表现。

嘉庆十六年（1811 年）初，徐松到了湖南，立即履行其职责，一边处理全省有关文化教育的各种事务，小事可直接令州、县办，大事与巡抚会衔处理；一边出巡各府，进行岁试，检查生员学业，在岁试后进行三级童试中的最后一级的院试，从通过了县试和府试、获取了童生资格的考生中选拔生员。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徐松喜滋滋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一切乐趣。

没想到好景不长，还不到一年，只巡考了六个府三个州，他就被湖南武陵（今常德）人，时任礼科给事中的赵慎畛罗列他在湖南学政任上贪赃枉法的罪行，参了他一本。著名史学大师，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依赵慎畛原折将所参徐松的罪行归纳为九条：

一、乘轿进文庙的棂星门；二、重价发卖诗文；三、叫优等生员交钱；四、加增红案陋规；五、滥取佾生向其索费；六、家丁凌辱士子；七、在考场卖给熟食索高价；八、在考武生员时强取弓箭发卖；九、出八股文考题割裂经文。

注重监察，纠劾不法，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大特点。到清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体系。清代继承明代制度，设都察院专管对一切官员进行监察，其权责与今天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点类似。主官为左都御史和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和副都御史则为各地总督和巡抚的兼衔，不管院事。都察院下设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为“科道”。科指“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按部分科称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制度类似今天中央各部委的纪检组。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叫“科参”，又叫驳正。而皇帝下给六部之旨和内阁票拟的批示，均由各部的给事中监督执行。如果发现有不当之处或错误，给事中有权封好退回，这叫封还。封还与驳正是给事中的两项权力，统称为“封驳”事。给

事中在清初为正七品，雍正后为正五品。御史则监察地方官员和事务，他们是按省分道，当时全国有十五省，则分十五道。如湖南道御史专管湖南一省公文的监察事务和有关官员的弹劾。

六科给事中和各道御史作为“天子耳目”，很受皇帝重视。虽然他们官品不高，但权力很大。他们享有“风闻奏事”之特权，颇为屁股不干净的官员所畏忌。所谓“风闻奏事”，就是给事中和御史们从各方面得到甚至是听到的贪赃枉法的情况，不必去核实，也可以不说明材料的来源和提供者的姓名，以“风闻”之名上奏朝廷，请求查处。“风闻”一词，出自南朝萧齐时沈约弹奏王源时的奏章：“风闻东海王源……”清代顺治时规定凡听到官员有贪赃枉法事，监察官员必须奏报，即使错了也不追究责任。相反，若知情不举，便要严究。既有这项规定，凡给事中和御史有揭发材料送来，皇帝必批示去调查，查出问题依法处理，没有问题也不扣诬告的帽子，来个一风吹。这项制度令朝中和地方官员对监察官员侧目三分。更何况按制度他们还有批评皇帝的权力。即便直言惹怒了皇帝，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也不敢轻易处分他们。因为杀掉或处分了批评皇帝的这些官员，这有违制度规定，还会使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极不好的名声。除少数皇帝外，大多数皇帝还是爱惜自己的名声的。而有的负有言责的监察官员有意去批评皇帝，想激怒皇帝让皇帝处分他，他便可以在社会上和青史上留名，这就是所谓的“卖直”。

嘉庆皇帝看了赵慎畛的参折后，立即下令由工部左侍郎初彭龄会同湖南巡抚彻查。为防走漏风声，初彭龄以奉旨到广东办事的名义兼程南下。一到长沙，突然住下，宣布查案，马上将徐松召来，宣布圣旨，依规进行调查。

具体的查案过程今天已无法弄清了，但从军机处的有关档案材料中可找到徐松的亲供对赵慎畛参奏的九条罪款，一一做出了回答。

一、乘轿进棂星门一事是对孔子的大不敬。他的亲供是：是日下雨，轿夫不从下马碑住轿。我因轿帘放下，未经查知，直至角门外檐下住轿，始行知悉，即将轿夫呵斥。

二、对他重价发卖诗文的亲供是：我有律诗数十首，对偶工稳，兼寓劝惩之意，并近科乡试中经文数十篇，词义醇正，我想将此刊刻卖给赴考生童，可以启迪后进，就令工匠刊就，陆续发交各学教官散给生童，每册约银三钱六分，吩咐教官听任生童自愿领买。计刊六千册，考过六府三州，发出四千零十册，交还一千六百三十册，实卖出二千三百八十册，除去工本费，得余利银四百七十六两。

三、关于叫岁试考得优等的生员交费一事，徐松说：我原要将优等生员试卷刊刻，供生童学习。每人交刻价银二百文，计收三万七千八百文。已买刻版，尚未发刻，其钱由家丁刘贵及承差周琪经手，并未侵用。如刊刻，其钱尚不够数。

四、关于加增红案陋规一事。所谓红案陋规即是当时的潜规则，凡院试取录为生员的童生，出榜即所谓的红案公布后必须向考官送点钱。钱的数目多少是约定俗成的，虽是陋规，但可以收，在今天叫灰色收入，收了不合理但不违法。徐松对指责他加增红案陋规的罪名作如是回答：我曾吩咐门丁、书役不许向新进童生复试时索取喜钱。家丁刘贵如何串通书役、承差，欲图加增红案陋规，我并不知情，请问教官与廪生们。

五、关于滥取佾生索费之事。所谓佾生，即是文庙春秋丁祭时的乐舞生，因孔子重视舞八佾，故后来祭孔时必用佾舞。各省的府、州、县学例设文庙，故备有佾舞生，通常由府、县会同教官从未考中秀才的童生中选优报学政批准后充任，每学额设三十六名。佾生有顶戴，社会地位略同于监生，但不能直接参加乡试，需捐监后方得参加。徐松在回答这一罪款时说：我见佾生不足额数，就从童生预备卷中挑选数人，传令到学报名交费，原要验看本童，以防假冒顶替，并非希图索费，惟不遵例由州、县会同教官考送，是我错处。

六、关于家丁凌辱士子事。徐松亲供说：我因教官与生童平素熟识，为防止考场作弊，不许监考，专派家丁监察。如有生童交头接耳或离座行走，即行禀明罚跪之事是有，并不敢纵容家丁凌辱士子或斥为“苗子”。至于在永州府考试时出“子曰苗”之题目，实属无心，并非有意。

七、关于在考场卖熟食索钱事，徐松如是说：家丁刘贵向教官送熟食点心，接受赏银一二钱不等。茶房吴八、刘六向考生卖熟食点心，虽较寻常买价稍高，但为数不多。

八、关于向武童生强取弓箭发卖事，徐松交代说：轿夫张勇见武童射箭时，箭支落靶，随同监考人员拾拣，武童多有用钱赎了，每支七八文不等，并未抢弓。

九、关于出八股文考题割裂经文事，徐松的供词是：我为防文童抄袭旧文以取巧，出考题中有“取饰”、“室车”、“至于犬”、“不畜牛”、“驷不及舍至虎”、“南宫适出至东里子产”等，细思实属割裂句读，有乖文体。

徐松最后说：“我蒙皇上恩典，简放学政，不知检束，出题割裂文义，违例滥准佾生，不派教官监场，又失察家人、书役、轿夫藉端需索，已无可辞咎，况又冒昧令优等生员出钱刊刷考卷，并将自己书籍散卖，实属辜负天恩，只求将我从重治罪。”（见《军机处档案》）

将赵慎畛的参折和徐松的供词做综合探究，可知赵慎畛所参与徐松所供的事情大体相符，只不过参折上纲上线，而徐松所犯实属违规之举，有些事是其情可悯。

按规定，文武百官入文庙，到下马碑前文官要下轿，武官应下马，然后徒步入庙，这是表示对孔夫子的尊敬。徐松坐轿到了棂星门，的确是错误，但那天下雨，轿帘放下，徐松没看到下马碑。而轿夫为讨好主人，怕他淋雨，将轿抬到棂星门，是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其主要责任在轿夫，何况徐松发现后还骂了轿夫，虽有错，但其情可悯。

家丁在考场卖熟食赚钱，这是利用徐松的权力谋私，也是不应该的，但古往今来，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明清两代小试考秀才，每场考一天，中间不许出去。考生要吃饭，去卖点吃食于理是允许的，你总不能叫他们饿着肚子考一天吧。如果叫外人到考场去发卖，又怕他们与考生沟通舞弊，徐松当然只好让家丁去卖，也让他们赚点外快。这属于首长身边人谋私，但这种私利只有那么多，给教官送熟食，给了赏银一二钱，给考生卖的“虽较寻常买价稍高，但为数不多”，算不了什么大事。徐松的责任在于对身边人员管教不严，甚至有纵容之嫌。

第四款和第八款，家丁刘贵串通书役、承差向新进童生增收红案陋规，轿夫张勇随同监考人员捡收脱靶之箭然后叫武童生用钱去赎，每支七八文。虽确有其事，但徐松并不知情，且事先还吩咐过手下人不得在复试时索取喜钱。但他们不听，是他们利用首长权势谋私利，而徐松事先未采取防范措施，钱虽不多，但他应负失察之过。

第六款是他为防止考场教官与相熟生童勾结舞弊，而叫家丁入场监考，虽出发点是好的，因清代自乾隆之后，教官与考生通同作弊之事屡见不鲜，应采取防范措施，但他把教官撇在一边，叫家丁去监考，这是违反规定的。虽然并未纵容家丁凌辱士子或骂他们为“苗子”，也属违规行为，徐松应负一定责任。至于他在永州府考试时出了个“子曰苗”的八股文试题便说他有意骂苗族人，则是无限上纲。

第五款他不按佾生应由州县会同教官取录的规定，自己做主取录了数人，并传令他们到学校去报名交费，尽管他申明这是为了防止假冒顶替，并非希图索费，但这种申明是没有说服力的。你既违规，又收了费，这就属以权谋私，虽然钱数不会很多，佾生地位不高，就算卖这个衔头也值不了几个钱，但性质恶劣。

徐松刊刻自己的诗文交给各学教官卖给生童，获利四百七十六两银子，看来事情很大，其实并未犯法。因徐松的诗对生童学习试帖诗有好处。那些经文是近科乡试的优秀之作，词义醇正，刊刻出来对考生揣摩学习有好处。这些东西在今天属考试复习资料或考试指南，徐松是才子，弄出的东西应当是有水平的。他又吩咐过教官听任生童自愿领买，并未强行摊派，且于生童考试有帮助，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故算不上大问题，何况这种事在当时和今天屡见不鲜。至于选刊优秀生童试卷刊刻，这在当时更是流行做法，今天我们仍可在文物市场看见不少的这种选本。这种东西对有文选入者来说是一种荣耀，对旁人来说，提供了一种学习的范本。尽管他预收了刊刻费，但尚不够成本费，故未发刻，钱也未侵用，应不算问题。

至于割裂经文出八股文试题就更算不上问题。八股文的题目规定只能由“四书”、“五经”中摘取字、句、节来承担。因“四书”、“五经”这个试题库容量太小，到明代中叶以后，可供出题的整句、整节经文无不在各种考试中出尽，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每个题目的范文都有刻本流传。于是，猜题抄袭之风大炽。一些投机者只要下功夫背上几百篇范文，下到考场，如题目猜中，只需将背熟之文照录就有可能考上。为防止猜题抄袭，从明代中叶起，就创制出一种截头去尾，任意截搭的所谓小题，这种题目割裂了经文，使得语义不完整，破坏了八股文的载道功能，开始统治者是禁止的。但它对防止猜题抄袭确有用处，且又能强化思维训练，故屡禁而不止，到后来就默认其存在了。只要题目割裂得不太出格，便让其在乡试、岁科二试中存在。但太荒谬了则不行。如大学者俞樾任学政时从《孟子》中“王速出令，反其旄倪”进行截搭，出了个“王速出令反”的题目，考生们都作成王快出命令叫人造反，成了笑柄。他还将《论语·季氏》中的末句“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与下章《阳货》的首句“阳货欲见孔子”进行隔章截搭，成了“君夫人阳货欲”这样有淫秽意味的题目，结果俞樾受到查处，被革了职。但徐松所出之题在内容上并无荒谬之处，清代中叶以后，抄袭旧文之风更盛，他“为防文童抄袭旧文以取巧”，出小题是允许的，赵慎畛以此来做罪行参揭，他是不服的。故他在供词中以春秋笔法说“细思实属割裂经文，有乖文体”。

经过详尽的调查取证，事情真相已明，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十九，初彭龄上奏本提出处理意见：“此案学政徐松，除出题割裂文义，违例滥取佾生，不派教官监考，及失察家人、书役、轿夫勒索喜钱，散卖熟食，抢拾箭支，并令优等生员出钱刊刷试卷各款，或咎止降罚，或赃非入己，均属罪轻不议外，将其书籍分派教官，转令生童购买，除去工本银外，计得余利银四百七十六两，应依监临官挟势将自己物货散与部民多取价者，计赃银不枉法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该学政卖书渔利，种种失察，又复任意令家人查号，割裂命题，以致士议沸腾，实属猥鄙不职。徐松前已请旨革职，应请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应当说，这份处分意见对徐松问题的认定大部分还是实事求是的，与徐松亲供相符，但对刻印自己的诗文发卖一事在性质的认定上上纲过高。此案后二十五年，

户部右侍郎祁隽藻出任江苏学政，也将自己的有韵之文大量刻卖，不仅未受揭控，反大受江苏学界称颂，还仕途风顺，官至大学士。以致光绪十六年（1890 年）的湖南学政江标为徐松大为抱屈，他作诗说："公有奇才吾可知，公耽奇癖吾非之。寻常一样刊书卖，一负宏名一罪私。"他注释曰："公使湘中，以所刻书勒诸生买读，被议去官。而祁文端（祁死后谥文端）使吴，亦刻书命诸生买读，而至今人颂之，何耶？"官场的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定要寻找原因，只能说徐松命不好，碰上了能风闻奏事的给事中。也许查案的初彭龄也不愿给徐松过重的处分，从他将对徐松的大部分指控都以"罪轻不议"化解掉便可知其心迹。但对赵慎畛的指控又不能来个一风吹，这样会弄得这个给事中脸上无光，得罪了他，怕以后没好果子吃，便将刻书谋私的过错上升为罪行将其重处。从此事可以看出清代的监察制度是严密而有效的。何况徐松也在一系列问题上确实犯有错误，对身边人管束不严，放纵了他们去以自己的权势谋私，应负责任。

嘉庆皇帝对自己赏识破格提拔之人并未袒护，他带头守法，维护给事中风闻奏事的制度。当赵慎畛上参折时，他即批示："伊既如此狂妄，恐平日所著文有悖谬之处亦未可定。将来定案时，当一并叙述，核拟具奏。"初彭龄查清了案件之后，他又在奏折上朱批："刑部议奏。"（《军机处档案》）由此也可知当时监察制度的有效性。

徐松被发往伊犁军台去效力了。虽处分过重，但也不算太冤枉。何况他在湖南出偏题，又不许考官监试，使一些人无从作弊得罪了不少人，以湖南人好走极端，不弄个鱼死网破便不放手的强悍性格和湘人赵慎畛的制度性权威，他受些委曲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谁让他恃才傲物忘乎所以，不遵守法规呢？

但徐松的确是个高智商的人，他没有对这种过重的处分心怀不满而颓废，也没有因北纬风沙遍天、冰雪满地的严酷生活环境所吓倒。他吸取了经验教训，在边疆奋力工作，并开展了西北边疆学研究。他四处奔走，实地考证，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写下了图文并茂的《西域水道记》。其书综括古今，纲目明晰，把西域每条河流的源流，主、支流的经纬度、河道走向，流域的地理地貌，历史概况，人文胜迹，驻军屯垦，风物特产，民情风俗记得清清楚楚，文笔生动并附有水道图，成为一部最准确、最详尽的西北边疆地理历史著作。《清史稿·徐松传》中说他"拟《水经》复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

他还增纂了《西陲总统事略》，此书资料翔实，叙述明晰，于新疆的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为新疆重要通志之一。道光即位，伊犁将军松筠奏进其书，道光帝十分欣赏，赐名《北纬事略》，特旨赐还，并亲制序言付武英殿刊行。

徐松施展才华，以优美华丽的辞藻，写作了二卷《新疆南北路赋》，史传称其"综贯古今，包举巨细，尤足与和宁《西藏赋》后先辉映"。此外还著有《汉书西域传补注》、《新斠注地理志集释》等地理学著作。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由祁韵士奠基，经徐松的大力开拓，其后龚自珍、魏源，徐松学生沈尧、张穆与何秋涛等人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显学，中间贯穿了务实救弊的爱国主义精神。徐松为亲历边疆实地考证的第一人，功不可没，其好友龚自珍赠诗称颂他："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属公。"（龚自珍《己亥杂诗》）

道光元年（1821 年），徐松被召还，授内阁中书，他三十岁出关，四十一岁释还，因他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成就而为学界尊崇。学界名流李兆洛、俞正燮、龚自珍，后辈沈尧、张穆、何秋涛等经常到顺治门（今宣武门）大街他的住所"绿荫轩"与他"烹羊炊饼，置酒大嚼，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谈"。有意思的是湖南人何凌汉、何绍基父子和魏源都是座上客，何绍基还拜倒在其门下为学生，称他为"丈人"。可见湖南人心中还是有杆秤，并不视他为罪人。

徐松后历官礼部员外郎、江西道御史、延榆兵备道。大学者缪荃孙评价他"学识宏通，撰著精博，负重望者三十年"。又"性好钟鼎碑碣文字，谓足资考证"，曾于敦煌搜得唐索勋及李氏修功德二碑，皆历来著录家所无。徐松接受教训，虽吃过不少苦头，但干出如此成就，获如此赞誉，可谓不虚此生了。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清末上海道台袁树勋与“苏报案”

康化夷

袁树勋（1847—1915），字海观，湘潭县易俗河山塘村人。同治四年（1865）投入湘军，征讨捻军起义，因办粮饷有功，升任上海县知县。后以知府衔候补江西，又因处理赣东北上饶贵溪教案有功，诏授顺天府尹。内大臣奕匡索五十万金，遭袁拒绝，遂羁留不令赴任。后迁任天津知府。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西太后挟持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袁树勋率五营绿营兵，日夜奔驰前往护驾。西太后曾赞赏说：“小小的一个知府，如此忠心，实在难得。”

作为清末地方官员的袁树勋，一生政治活动影响全国者，莫过于主政上海道五年（1901—1906）期间。他履任时，正值上海开埠半个世纪，此时上海已由“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洋人凭借强势或扩大租界，或欺凌华人，诸多华洋间的纠纷、争讼多集中于道府管辖范围。袁树勋殚虑竭诚，从容应对，力为华民排难，其举措广为称道。他支持本国绅商成立总工程局，让他们参与市政，或修建或改建道路、桥梁、驳岸、码头；他整顿市容、交通、卫生；他设立巡警所、裁批所，处理民刑诉讼案件；他努力维护国家主权，阻止洋人越界筑路，拒绝租界当局参与黄浦江疏浚工程。对于这些爱国行动，国人赞之颂之。据《湘潭县志》记载，上海绅商士民感其政绩，立《湘潭袁去思碑》云：“（袁）博采众议，设立总工程局，举南市马路、电灯及城厢内外警察事宜，一委诸绅。官绅商民团体日固，向之沉黑幽滞，积数十年而不得行者，一旦豁然、坦然，无所阻步。公之于吾民，维之护之，瀒之恤之，赞之助之。罔不所其、所欲而止，美政厚惠，其何能忘，是用陈其政绩，勒之丰碑。”对于袁树勋奉旨办理关涉章太炎、邹容等的“苏报案”，镇压反清爱国志士，则贬之谪之。

光绪二十五年(1901)，袁树勋调任苏淞太道道员(后称上海道台)，驻地上海县。此间恰逢近代史上有名的“苏报案”发生，清廷军机处责令案发地官员上海道台袁树勋办理。

《苏报》于 1898 年 6 月创刊于上海公共租界。1900 年底衡阳人陈范购得后力

图改革，彰显特色，将其办成一个开放、自由的公共论坛。1903 年 4 月从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学生章士钊率 40 余名同学来到上海，加入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苏报》与该社约定，每天为报纸写论说稿一篇，报馆每月资助学社 100 元报酬。于是鼓吹革命的文章便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苏报》俨然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陈范非常赏识年仅 22 岁的章士钊的文笔和识见，便正式聘其为《苏报》主笔，还全权委托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忌。”[1] 年轻气盛的章士钊更胆大妄为了，以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公民的“神圣特权”，“凡人可以自由发表其意见，不受国家之检阅也”，“无论何人可以任意出版，无需国家之特许也”[2]。他主张新闻应该“督责执政”，“社论栏有领导社会政治之职”。尤其“秕政塞途时，报纸讥弹则犹同司直”[3]，更应大胆地将“劣官裨政时见表暴，民间疾苦勤为宣泄”[4]。从 1903 年 5 月 27 日接编《苏报》，至 7 月 7 日报社被封的四十余天里，章士钊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将该报推向了一个光辉的巅峰。这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有慷慨激昂、鼓吹革命的文章发表：6 月 1 日刊出《康有为》一文，一方面肯定了康有为发起戊戌维新之功；一方面指出其保皇立场“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6 月 5 日刊出《密谕严拿留学生》消息：“顷由密友来访，云严拿留学生之密谕。内言东京留学生蓝天蔚等若干人，编集数军，希图革命。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后，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6 月 22 日发表章太炎署名文章《杀人主义》，直呼“不斩楼兰死不休”，“杀尽胡儿（满族）才罢手”。此年 4 月，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邹容写了一部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自言信奉卢梭、华盛顿诸欧美思想大哲，力主推翻清朝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6 月 9 日章士钊以笔名发表《读〈革命军〉》一文，盛赞邹容的《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云：“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满族特权、复一切压制之者乎？”并于同日“新书栏”刊出《革命军》出版广告，直言该书“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华。其笔极锐利，语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6 月 10 日又全文刊出章太炎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云：“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容之署革命军马前卒，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异族而已矣！”由于章士钊在《苏报》连续宣传，这本小册子辗转翻印，销量逾百万，创下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纪录。对此“谋反”言论，慈禧、光绪雷霆震怒，必欲除之而后快。

6 月 26 日，上海道台袁树勋奉命会同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查禁爱国学社，处理《苏

报》事件。因租界有“治外法权”，明文规定“中国官员不能入租界捕人，如需入则要经英领事加签方可”。袁树勋只好向驻上海英、美领事发出照会，要求逮捕蔡元培、陈范、章太炎、邹容等，公共租界工部局以“言论、出版自由”予以拒绝。尽管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在工部局的“你们（指《苏报》办报人和撰稿人）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军火么？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5]，以及租界巡捕房长官兰博森的“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6]的许诺下，《苏报》的反清言论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了。6月27日、28日，《苏报》连续发表悼念蹈海自杀、自号“仇满生”的青年陈海鲲的文章。6月29日，《苏报》头版又刊出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帝为“载湉小丑”[7]。此文一出，上海市民人人争购。29日当天，袁树勋即向“工部局”提出严重抗议，租界当局在清廷维护国家安全的外交交涉下，终于于次日发出拘票。蔡元培、陈范临时走避，章太炎、邹容却自动到四马路老巡捕房投案。

在《苏报》老板陈范出亡东瀛，蔡元培远走青岛，章太炎、邹容收监的危难时刻，章士钊仍“不惜身家性命”继续出报，发表反清言论。7月6日刊发了章太炎的《狱中答新闻记者书》，该文坦承：“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对四万万同胞矣。”全文弥漫着一股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在袁树勋“切商各国领事，务将该馆立即封闭”的压力下，7月7日《苏报》终被查禁，爱国学社也被解散。按西方法律规定，被捕者须会审后方能确定是否有罪，有罪方可实施治裁。所以7月9日、10日，英文《上海泰晤士报》连续发表社论，反对工部局“未断案而先封报”的违法行径，并要求工部局“设法阻止中国官员在租界妄行其权”。

在享有绝对皇权的清廷看来，对朝廷的任何批评都是大逆不道，章太炎、邹容等那样激烈的言论更该千刀万剐。而与工部局平行的审判机关“会审公廨”则不如此认为，其与上海道台议定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规定：会审时，由外国领事“主审”，任其从母国法律中选择裁判条文。

为置章、邹于死地，上海道台袁树勋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手段，与租界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外交活动。首先是要求引渡。清政府派袁树勋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频频活动，为达到引渡目的，甚至以不惜出卖沪宁铁路筑路权为条件。但在工部局看来，发表言论反对政府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有证据证明有罪，也属“国事犯”（即当今世界通称的政治犯），按保护“国事犯”的国际条例，也不应予以引渡。至于呼光绪为“载湉小丑”，按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根本构不成杀头罪，

顶多算是一种诽谤。英国蓝斯唐侯爵在英上议院说：拘捕章、邹已是“受上海道（袁树勋）之促迫，不得已而出此”，现绝对不能移交。美国外交部甚至“将主张引渡之上海领事古纳调任”[8]。

袁树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即采取古老的劫法场的办法。7月15日，租界会审公廨进行第一次会审，袁于街巷隘口埋伏清兵五百，企图途中将章、邹劫持。殊不知工部局早已做了严密防范：从巡捕房提人到会审公廨，“每一人（犯）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数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以不得发”[9]。《申报》于次日发表了长篇报道《初讯革命党》，详细介绍了初审情况：原告律师宣读《控告苏报条款》，控告《苏报》馆和章、邹等人“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章太炎回答讯问说：“所指文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一语，‘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无他意。”[10]邹容只承认“《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11]，其他什么都不屑作答。庭审完毕，章、邹仍“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咽，（章士钊）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12]。

7月21日第二次会审。“会审公廨”全为英、美法官主持，袁树勋派来的上诉官员被晾在一边，尴尬至极。被告律师质问清廷官员：“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朝廷耶？抑上海道台袁树勋耶？本律师无从知悉。”[13]逼使对方承认是“奉旨”办事，矛头直指皇上和慈禧。被告律师嘲笑说：“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裁判乎？”[14]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上海道台袁树勋说：“无俟上海道之干预也。”法庭上，清廷官员“觳觫殊甚”、丑态百出，在大义凛然的被告面前，或云“公等速说，我与公等无仇无怨而已”；或云“本分府惟有遵奉上宪札谕行事而已”[15]。

8月5日，英国首相向驻华公使发出“苏报馆之人，不能交与华官审判”的训令。袁树勋企图对章太炎、邹容引渡、劫法场，次而要求租界会审公廨判处死刑的三个方案相继失败后，担心旷日持久而夜长梦多，被迫答应从宽结案。

12月7日，代表袁树勋参加会审的上海县令单方拟定章、邹“永远监禁”的判决，公使团对此也持以异议。双方僵持三个月后，1904年2月公使团方面表示，如再不结案，就要将章、邹释放。由于公使团的坚持，5月21日会审公廨终于做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为了章、邹的安全，防止刑满释放后“重遭（袁树勋）正常或非正常逮捕”，工部局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工部局董事会指示：到时（刑满），租界“将护送羁押犯登上驶往香港或日本的轮船，随他们意愿”[16]去往其他国家。果然，除邹容病

死狱中外，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当天就登上赴日的轮船。

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何当时主持《苏报》笔政的章士钊竟未被列入拘捕名单而独能逍遥法外？主要原因是江苏后补道俞明震的袒护。俞是鲁迅在《朝花夕拾》中称为“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的“新党”，时兼江南陆师学堂总办，而章士钊则是南京水师学堂的学生，与主张革命的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素有交往，章也深受俞的赏识。由于袒护章士钊，所以在清廷令俞明震会同袁树勋查办“苏报案”后的当年7月6日，湖广总督端方私下嘱咐袁树勋对俞明震要“随时留心”，“不可不防”[17]。

1903年12月，《警钟日报》的前身《俄事警闻》又在上海租界创办。1904年4月26日发表了孙中山寄自檀香山的一封信，孙在介绍他在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的经过中，第一次向国内公布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革命纲领。1905年春又揭载了德国侵占山东的黑幕。这一切引起了清廷的极大不满。因为事发上海，职责攸关，身为上海道台的袁树勋遂以“所载之事任意毁谤，淆惑人心”为由，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与租界当局进行外交斡旋。租界通过法律程序将该报查封，印报机器全部没收，个别人判了6个月或1年徒刑[18]。

袁树勋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查封进步报刊，镇压革命志士，此为职责攸关而为。但在与西方长期的打交道中，他深感列强的贪婪暴虐、颐指气使，国人的卑下受辱、任遭宰割。因此他在处理江西贵溪教案、上海租界事件和抗击庚子入侵中，能坚持民族爱国的立场，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国家的利益。

他长期在受西方资本主义浸染的天津、上海为官，还是多多少少接受了一些维新改良思想，在其任所内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一些“新政”。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7），为山东巡抚，即首开咨议局，裁汰冗员，整顿吏治。宣统元年（1909）调任两广总督，严申赌禁，奏请设广东大学，又奏请改革盐税，停征赌饷，并建议召开国会。他还关心家乡的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曾捐银1.6万两开办湘潭师范学堂，以万两银捐赠长沙明德中学，对湘潭育婴堂、保节堂也多有捐助。民国建立，袁世凯拟任其为直隶总督，袁树勋坚辞不就。民国四年（1915）逝于上海。

时人于袁树勋早有不良评价，除上述处理“苏报案”外，还说其贪色贪财，非正人也。并作联讽刺道：

树立无存，但知藏污纳垢，细流同归于海；

勋功何在，除却贪财好色，其余皆不足观。

其名“树勋”及字“海观”悉数刊入联中，好倒是好，妙倒是妙，但也有不顾史实，一棒子打倒之嫌。

【参考文献】

[1] 刘陔：《致“甲寅”杂志记者函》，《章士钊全集》（3），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2] [4]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1），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页。

[3] 陈蘧：《致甲寅杂志记者函》，《章士钊全集》（3），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5] 马定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6] 冯自由：《革命逸史》（3），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6页。

[7] [9]《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4页。

[8] [10] [12] [14]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4、377、383、380页。

[11] [1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7页。

[15] 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页。

[16] 叶再生：《中国近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页。

[17]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18]《警钟报案结》，刊于1905年4月7日《申报》。

（作者系湖南商学院中文系教授）

清同光年间长沙商业的发展与转口贸易的兴盛

陈先枢

清同治初年，太平军事息，长江航路逐渐恢复正常，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的知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彦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开始产生许多驰名字号。如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下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宝庆（今邵阳市）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雨鞋钉等。还为湘军生产营造船只所需的大量铁钉，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同治初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到光绪年间，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

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1880年（光绪六年）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生意颇为兴隆。今解放西路登隆街口至柑子园当时称"青石桥"。同光年间，青石桥街已成为省城商业繁华之区，街上名店鳞次栉比，名产驰誉遐迩。爵禄斋的帽子、马恒记的鞋子、裕源绸缎庄的绸子、徐元吉斋的元宵坨子、徐长兴的鸭子、德馨斋的金钩鲜肉饼子、陈家铺子的益阳篹子、钱清汉楼"双妹子"牌香粉，以及和善记的老板王胖子、饶道生屠坊砍肉的饶妹子等10个带"子"的产品或经营者被誉为"桥上十子"，为人津津乐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年间长沙省城的蔬菜市场就粗具规模。那时的长沙城郊多为菜地，蔬菜四季常青，农民自产自销。善化"城厢内外"菜园，"铺管都管五里之处，约有百十余家"。为了抑制欺行霸市的行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订立有"菜园条规"。长沙城内菜市渐兴，据清末《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载，"行路小卖"中常见"挑菜"小贩，以"圃家四时所种蔬笋之属，瓜芋之类隔夜采拾，黎明入市"。同时，长沙的屠宰业和猪行、蛋行、鱼行也相继出现。光绪年间长沙的屠宰户就有了"公庙"组织，名曰"三圣殿"，奉张飞为祖师，公推大户任总管、值年，管理会务及公产。长沙屠宰业订有"屠业条规"10条。条规规定，每4个路摊分销一头猪需隔店铺码头上七下八家，不准停留摆设、撞门喊卖，肉价只准低于行市4文。可见，当时长沙城内猪肉供大于求，自给有余。因而出现了从事说合买卖的猪行，到清末长沙已形成较大的生猪集散市场，外运生猪主销汉口。

这时长沙城的牙行大多集中于今五一大道西端、湘江大道旁的下河街。牙行是中国旧时从事贸易中介，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收取佣金的商行。具体说来，长沙牙行以说合买卖为主，兼营代储代购代销业务。因湘江水运之便，长沙牙行多分布在沿河一带。下河街及附近的牙行以土果行、杂货行和玉兰片行为主。1875年（光绪元年），"保太和"、"惠然"开业，是长沙较早领有牙帖的土果行。次年又添"公和"、"镇昌"、"恒泰"等土果行。土果行经营本地及外地的土果土产，如梨、桃、板栗、荸荠、生姜、蒜子等。杂货行由土果行衍生而来，有"同康"、"恒大"等10余家，经营范围扩大到木耳、香菇、食糖、面粉、湘莲等，川、粤、闽、赣、苏、浙等地的土特产均在经营之列。玉兰片行实营玉兰片、苎麻、毛茶、土纸四大类商品，有"福生祥"、"源昌祥"、"春和祥"等，号称"三祥"。

牙行客户广泛，只要客商将货运来，在"任客投行"的规定下，牙商取得客户认可，即可代为推销，从中抽取佣金。有的牙行间或也自行采购，以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牟取厚利，因而兼有"号"的性质。牙行里的经纪人熟客路，通官府，

神通广大。据记载，名经纪年薪可高达3000银元，并需隔年预聘。当时买卖双方对经纪人都很信赖，买方只认经纪，不认卖方。至清末，绵延数里的下河街一时成为湖南全省南杂土果货的重要集散地，而牙商则是这条商业街上最活跃的分子。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育婴街至苏家巷一段）、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荒货集散藩城堤等。这些都是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同光年间长沙商业的发展还表现在转口贸易的兴盛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迅速增加到了34个城市，几乎遍布沿海、沿边各省，并深入到了邻近长沙的城市，如汉口、九江等。外国商品通过这些口岸向长沙及湖南纵深腹地辐射和渗透，传统的湘潭至广州转口的商路逐渐衰落。湘潭的商贸大不如前。不仅湘潭如此，就连靠近广州的湘南重镇郴州，这种衰落趋势也十分明显。据1906年《郴州乡土志·贸易》记载：“道（光）咸（丰）之世，海舶未通，南货运北，北货运南，悉由此过。故沿河一带，大店、栈房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要冲也。”“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究其所以，盖因商路北移之故，湖南中外贸易的转口之地主要转移到了上海和汉口。特别是汉口，由于紧靠湖南，水路交通便捷，转口输入湖南的外国商品最多。而长沙又比湘潭更靠近汉口，清初就成为全国著名的米市，湘江航运发达，牙人活动不逊于湘潭，加之自康熙年间起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会。湖南省的转口贸易中心自然转移到了“省城”。外国进口的棉纱、棉布等商品自汉口经民船运载来长，再销往各地。湖南的大米、茶叶、鞭炮等则从长沙源源不断运往汉口，转口出洋。一时间湘江河道、洞庭湖面，商船往来如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1858年（咸丰八年）汉口开埠后，外国的棉布、棉纱、颜料、煤油、食糖及煤、铁等商品大量涌入长沙，对长沙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起着破

坏作用，同时又迫使长沙手工业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洋纱、洋布输入长沙后，长沙土布产量顿减，原已较发达的家庭棉纺织业迅速瓦解。因为洋纱质地纤细、柔软、损耗少、织布多；进口棉布幅门较阔，品质亦细，亦为原有大布所不及。长沙农村原已开采的煤、铁矿也“日见其衰”，盖因“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之煤、铁不能销出境外，其利为洋人所占”。（张之洞：《劝开湖南煤矿示》）

外国人在向湖南内地大量输出商品的同时，又需要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和农副土特产品，这就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的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及转口贸易的兴盛。而长沙是湖南最主要的转口城市，长沙转口贸易的商品尤以茶叶、大米、鞭炮、棉花为盛。

茶叶：由于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量很大，长沙府安化等地茶农都改制红茶；浏阳的很多麻农也改种茶叶，“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辄抵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谭嗣同：《浏阳麻利述》）当时湖南航路两岸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正如刘家传《辰溪县志》卷二十一所云，“洋商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长沙就是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由于受左宗棠等人整顿茶务一系列措施的影响，这时湖南的茶叶流通体制有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以前，清政府对茶叶一直实行专卖制度，湘茶贸易为秦、晋官商所垄断，商民贩运受到限制。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他奏定章程变原有的“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无论何省商人均可来湘领票运销，使阻滞的茶叶流通渠道变得畅通。原来的茶商分为“东柜”（陕西、山西）和“西柜”（陕甘宁回商），左宗棠则添设“南柜”，起用长沙早期民族资本家朱昌琳为“南柜”总商，专门经营湘茶的贩运。湘茶变官营为私营，起到了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又促进湘茶发展的双重效用。当时长沙湘茶转口的线路基本上有3条。一是从汉口转运，打开销往东南的通道，实行与浙盐互贸，以便从苏浙沿海出口。至光绪年间湘茶运汉口外销年达90万箱（每箱约30公斤），银1000多万两。二是由位于俄中边境（今俄蒙边境）的恰克图销于俄国；三是由香港销英美。湘茶销俄与销英美的比例开始是70 ∶ 30，嗣后香港商路开通，转为60 ∶ 40，但销俄比例仍是最大的。

大米：随着粮食特别是谷米商品化的发展，湖南境内逐步形成了繁盛的谷米集散市场，俗称米市。早期的湖南米市，主要有三：一为长沙府湘潭县的易俗河。位于涓水与湘江汇合处，为湘中、湘南谷米最大的集散地。据张人价《湖南之谷米》云“往年易俗河最负盛名，当时销路，远如沪、粤，近如武汉，仓库栉比，米袋

塞途，米业之盛，一时无比”。二为长沙县的靖港（今属望城区），位于沩水与湘江汇合处。主要聚集宁乡及西湖之谷米，运销汉口、上海等地。最盛时年运销谷米达三四十万石。因米质加工优良，靖港米旧时在沪、汉颇负盛名。长沙及铁罐嘴米市发达后，靖港米业的地位相对低落。三为汉寿的沧港。原当沧水、浪水、沅水汇合处，为滨湖谷米集散市场。后因河流改道，运输受阻，米业顿形衰落，不复被人注意。到光绪后期，湖南米市除易俗河、靖港仍保留一定的运销量外，主要转移到了长沙、湘潭、渌口、安乡、沅江等地。当时这些地方均属长沙府。其中特别是长沙，一跃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常年运销谷米约 50 万石上下，最多时可达百万石。

鞭炮：长沙的鞭炮制造业，始于唐代，主要产地为长沙府的浏阳、醴陵等地。至清嘉庆年间，浏阳爆竹业已相当发达，成为农村主要副业之一，号称“十家九炮”。同治年间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行业，爆竹作坊和炮庄纷纷设立，产销两旺。除本省销售外，南自广东，北至鲁、晋，各帮客商多有来浏阳贩运者。随着生产的发展，浏阳爆竹作坊和炮庄逐步集中于城镇，主要是县城和金刚头、大瑶埠、文家市、杨家湾等地，制作益精，产量益增。光绪后，湖南商人将浏阳爆竹试销于上海、南洋，甚受欢迎。汉口、新堤商人见有利可图，竞将浏阳爆竹向外洋推销，于是开创了湖南鞭炮外贸出口之先河，促进了浏阳爆竹业的空前发展与繁荣。1885 年（光绪十一年），浏阳县城培德厚炮庄首先在广州设庄，进入洋庄贸易，称广庄；继后百绥永丰、谦达和、瑞华等炮庄在汉口设庄，称汉庄，专营鞭炮出口。至清末，浏阳从事鞭炮生产的达 30 万人，年装箱运出鞭炮 14 万箱（每箱 30 万响），约为湘西、湘南所产鞭炮的总和。大约也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邻近浏阳的醴陵、平江等县，鞭炮业也发展很快，醴陵并迅速成为省内仅次于浏阳的另一个鞭炮生产基地。该县东乡从事鞭炮业的约在万户以上，总人数达六七万人。但醴陵鞭炮历来由庄客贩往浏阳进行封装成箱，贴上“浏阳鞭炮”商标，再转售外埠。因此，市场上只有浏阳鞭炮，而不知有醴陵鞭炮。至清末，浏阳、醴陵两县年销出“浏阳鞭炮”合计在 20 万箱左右，其中省内约销 1 万箱，90%以上销往省外以至国外，包括西北、东南沿海各埠，南洋和远东各国。

棉花：在洋布涌入的刺激下，国内机器棉纺织业也逐步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棉花生产在光绪以后有较大的发展，棉花商品化程度有着前所未有的提高。据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所述，湖南在清季初年，仅津市附近及宝庆桃花坪诸地产棉。前者产于湖地，名曰湖花；后者种植山地，名曰山花。二者仅足当地人民衣食之资，鲜有运销市场者。全省所需，仍取给于鄂属公安、孝感、黄石

港等地。每年棉花上市，本省商人前往贩运，以应商场一时之需，但交易数量不大。迨至光绪中叶，通州花商运花来湘，数量较大，品质亦佳，长沙、常德以交通便利之关系，遂为全省棉花集散之中心。自是以后，本省产棉大增，交易数量亦巨，自给之外，尚有转运出口者。各地商贾辗转贩运，凡产棉区域附近之交通商埠，棉花市场蔚然并起矣。湖南棉花的集散市场大抵在产区附近和交通便捷的市镇，而主要在津市、长沙两地。洞庭湖滨各县所产多集中于津市，湘东、湘南、湘中各地所产则多集中于长沙，再分运各地。初以省内销售为主，至清末，出口量逐渐增多，成为省内重要的出口物质之一。据记载，清末 1903、1904 两年，共出口棉花值 2 万余关平两。

（作者系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曾启球

一、“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出身举人。清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他任黔阳训导，曾上书言兵事，为曾所赏识，遂招之入幕。初期综理全军文案。他文才出众，却弃文就武，于咸丰五年自请领兵打仗；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保举他为皖南道道员。

八月，李元度率所募平江新勇3000人抵达祁门大营。适逢徽州有事，曾国藩命他率领所部驻守徽州，越9天，徽州失守，李元度败不回营。曾国藩要参劾他，众僚属纷纷谏阻。李鸿章甚至因谏劝不从，拂袖而去，曾仍坚持严参。

众人之所以劝阻，主要是因为李元度过去有功，与曾交情深厚。他入湘军幕早于李鸿章5年，早于左宗棠7年。在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元度募勇成军，力撑危局，领兵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半。湖口战役，他救过曾国藩的性命。咸丰七年（1860），曾氏丁忧乡居期间，给李元度写的信最多，其中尤以“三不忘”一信，最能说明李元度的功劳及他们之间的情谊。“自维即戎数载……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意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二人”。给别人的信中也说：“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曾国藩的日记，几乎无月不有与李元度书信来往或“长谈”、“鬯谈”的记载。总而言之，在失守徽州以前，李元度的形象是一个文武兼备，与曾国藩患难相随，至交至契的人。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又要严参李元度呢？

二、曾国藩严参李元度

有人认为，清廷在答徽州失守折的上谕中，批评了曾国藩而褒扬了李元度，曾遂迁怒于李，予以参劾，以曲折地表达对批评的不满。这种揣测之词，不合逻辑。在《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曾自认“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清廷答谕说：“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按：指宁国和徽州），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划未密。着即振作军心，再接再厉。万勿一挫之后，即损军威。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深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曾自请议处，“上谕”先替他说出连失两郡的原因在于饷绌兵单，然后轻点“筹划未密”，接着鼓励他振作军心，再接再厉，“筹划未密”较之“调度无方”轻。褒扬李元度，出于估计他已殉职。答谕的弦外之音，是概不追究徽州失守的责任。它发出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一日，严参李元度的奏折发于九月十六日，参折先发，签谕后发后到，绝非“迁怒”，毫无疑义。曾国藩之所以不念李元度的功绩，不顾往日交情，不受众人劝阻，断然严参，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急转直下的皖南战局有关，与风云突变的时局有关，与曾、李军事上的分歧有关，还与曾的法纪观念、儒家思想和李的操守、修养有密切关系。

1. 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兼顾皖南防务，正值“江南糜烂”，全局被动，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全局方针是：江北同攻安庆，迫敌决战；江南布兵三支，进图吴浙。他自任中路，驻皖南的祁门，其余两支暂时还无兵可布。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十二日，宁国府失守，守将周天受阵亡；二十五日，徽州失守。至此，皖南四府一州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在皖南几无立足之地。恰恰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六日），曾接上谕，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命他派鲍超率兵三千兼程北援。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八月这个多事之秋，是曾国藩思想负担最重，精神最苦恼，情绪烦躁不安的时候。李元度在这个时候失守徽州，火上浇油，使曾难以承受心理压力。

2. 徽州是皖南通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大门洞开，使湘军统帅部处于敌人直接攻击的威胁之下。李失徽州，颇像《三国演义》的马谡失街亭。太平军攻取徽州、休宁后，因见急援徽州而未能赶上的鲍超、张运兰两军分驻渔亭、黟县，便放弃了直扑祁门的计划，转由婺源进江西，使曾国藩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后，李秀成十万众攻占黟县，距祁门大营60里，再现失街亭险象。曾国藩写下遗嘱，帐悬佩刀，准备一死，幸鲍超赶到解危。这虽是参劾李元度之后的事，但它更能说明失徽州在军事上的关系之大。

3. 曾、李在军事上意见相左。徽州之役，曾主守，要求李元度深沟高垒，坚

守不出，李不听，忽视湘军最为重视的扎营、筑垒，反而随时向敌迎战。从这段时期曾给李的几封信，可以看出他俩在战守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如：八月二十日信：

阁下好分兵。吾向以分兵为大戒，新募之勇，尤不宜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辰刻信：

二十二夜接二十一日惠函，具悉一切。是日出队至临溪，实为轻举妄动，殊不可解……前日派童、单二营至丛山关，已属轻躁，此二十一日之举则更躁矣。不意阁下在戎行六年，而心不入理如此！

八月二十三日巳刻信：

来信前云派两营同礼河出扎，后又云派三营同礼河出扎，鄙意只可派二营或一营出扎，余皆令其守城。平江勇轻进轻退，旧习未改，宜切戒之！

八月二十四日信：

扎营是第一根本事。平江营十六到，十七八九不令扎营；礼河二十到，二十一二不令扎营，何也？闻皆散乱于沙洲之上，何以御敌？宜绅民之不以为然也。

八月二十六日午初信：

二十六日巳刻接二十五日辰刻信，辩前函躁字之责。二十一二三连三日出队，非躁而何？守城尤贵于静，务思沉几渺虑。鲍营已五次飞催，并嘱孔旭日长跪乞师，兵不行不起。拔队入岭之后，却须谨慎，不可太躁。阁下勿再以二十日催礼河营之法催之。霆营者稍有疏失，则他无可望矣。关系极大，阁下切勿信笔乱写。

曾国藩在书信中对部下如此严切指责，似不见二例。显然，李元度不听指示，轻举妄动，还自以为是。这可能又成为李元度兵败负气出走的原因。曾深感局势严重，两天之内，六次飞调王牌军鲍超霆营驰援。却不料徽州府城只一昼夜就失守了！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写道："夜二更闻徽州于二十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次日又记道："是日，平江各营败勇俱至祁门，未得次青实在下落，殊为凄咽……是日思次青之败，由于自是。"他料想李元度已死，不胜伤感；而于李元度之败，则认为不能原谅。九月初六日，他接到李元度自街口所发之信，认为"犹多怙过饰非之辞。咸丰六年平江勇烧杀辰勇二百余人，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九月十二日与陈作梅"畅谈次青在徽误事之情，日内心中恼怒殊甚"。

4. 儒家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清廷对于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无不优予抚恤。其中不乏封疆大吏，如黄州兵败投水的湖广总督吴文镕，庐州城破投塘的安徽巡抚江忠源，三河阵亡的安徽巡抚李续宾等。而于作战不力，兵败出逃的

文官武将，则视情节轻重，予以惩罚。咸丰十年（1860 年），两江总督何桂清苏州兵败，逃往上海，被革职拿问，后在京师正法，是典型的事例。曾国藩先后在靖港、湖口两次兵败自杀，论者或以为出于忧愤，或讥以羞愧，而忽略了这位儒教信徒杀身成仁的选择。李元度既是带兵统领，更是皖南道道员，曾国藩未尝不以他失徽州不殉节为憾。前几天宁国失守，"江宁巡道福咸所署皖南道缺业已另放有人，犹复同守危城，效死弗去"，李元度岂能偷生他去？曾国藩九月初七日《致沅弟、季弟》信说："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曾并非"太上忘情"欲李死，而是儒家传统思想使然。不死，则失地有罪，受法纪制裁，理所当然。曾治军赏罚严明，断不能徇私庇护。他在家书中说："次青事须渠来营一次，乃可定案。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纪不可全废，如普（按指普承尧）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并无以服普之心。""薄惩"既考虑了失徽州的客观原因，也顾及李往日的功劳，既重法纪，又有几分人情味。

5. 平心而论，李守徽州的兵力不单薄。除平江勇 3000 人外，曾调拨增援的礼河四营所有 2300 人，原徽防闹饷哗变留下的还有 1600 人，合计近 7000 人。在此之前，湘军大将大都不过统领数千人，李续宾名闻天下，手下仅 6000 人，鲍超所向披靡，所带不过 5000 人，左宗棠以新募的 5000 之众，把守景德镇，与太平军骁将黄金文、李世贤两部十多倍的兵力周旋数月，确保祁门大营的后门。李元度若能按曾国藩的指示坚守，徽州可保无事。他这支兵大都是没有见过战阵的新勇，曾是知道的，所以只要求他守六天，续有后援。正因为不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兵，李更应知道不可疏于扎营筑垒而随便出战。至于城垣坍毁，不是无法补救的困难。按《天岳山馆文钞》李元度追悼守徽阵亡的同事杨萃耕的《哀辞》说，杨催他修缮城墙，修葺三昼夜，完成三分之二，李世贤大军来了……按李世贤兵临徽州城下是八月二十四日，李元度率部到达徽州是八月十六日，七天时间，为什么不早修？护城不扎营、修垒、挖沟，守城不早修城墙，李元度满以为可以一战克敌，无须乎"守"！难怪曾恼怒不已。

6. 李元度轻躁自是，失守徽州，贻误大局，责无旁贷。他却使出骄气来，仗着往日的功劳和交情，认为曾国藩不会把他怎么样，竟然败不归营（当时曾还不知他去另投靠山）。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法也没有了曾，在曾的心头之火上，再浇一瓢油。应该说，严参是李元度自讨的。

有这许多原因，无怪乎曾国藩坚持参劾李无度。九月十六日，曾上奏："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

责无可贷”，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廷谕照准。

三、李元度东山再起，又被参倒

李元度徽州出走后，在浙赣边境逗留21天，九月十六日回到祁门大营，索还欠饷，回平江募勇去了。曾国藩日记：“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这时曾还不知他已另有高就。

清廷批准将李元度革职拿问，曾国藩并没有拿问，等他自动回营结案。然而李元度一去不返，浙江巡抚王有龄为他撑开了保护伞，步步升迁，曾容忍一年多，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奏片说：

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丰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内，经臣奏奉谕旨，革职拿问。该员并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与候补道邓辅纶往返函商，求巡抚王有龄奏调赴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已革徽宁池太广道（按即皖南道）李元度，着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其应得罪名，仍着曾国藩查办。钦此。”李元度并不具禀请示，即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军。旋于义宁案内，经官文奏奉谕旨：“李元度着赏还按察使原衔，其失守一案，仍着曾国藩讯明，分别办理。等因。钦此。”又于奉新、瑞州案内，经毓科奏奉上谕：“李元度着赏加布政使衔，其徽州失守之案，应否免其查办，仍着曾国藩酌核具奏。等因。钦此。”

清廷赏识李元度人才难得，又值需人孔急之际，只需曾国藩圆转奏复，徽案本可一笔勾销。李元度也太高傲了，毫无悔过表示，曾岂能容得，奏片继续道：

“查义宁、奉新、瑞州皆臣所统辖之地，系贼先自退出，李元度并无打仗克城之事……屡报克复，冒禀邀功，实出情理之外。本年正月十四日，皇上弃瑕录用，补授该员盐运使，兹又擢授浙江按察使……臣查该员李元度，徽州获咎以后，不候讯结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禀而径自赴浙，于共见共闻之地，并未见仗，而冒禀克复。种种悖谬，莫解其故……乃李元度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广信，九月抵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救援。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所有该员补授浙江盐运使、按察使及开复原衔、加衔之处，均请饬敕注销，仍行革职。姑念其从军多年，积劳已久，免其治罪，交左宗棠差遣。

该员……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安越军八千人，臣当与左宗棠熟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地二三千人令其守城，俟立有功劳，再由左宗棠奏请开复。”

这个奏片，毫不留情，连官文等督抚大员的保举都彻底否定了。李元度自失检点，再次跌入深谷。片中说“后又负王有龄”，指李元度终未赴援杭州。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入杭州、瑞昌，王有龄同时殉城。

王有龄既死，李元度失去靠山，因见曾国藩在两个多月内接连有升奖，于是向曾上一道贺禀，意在弥合裂痕，修复旧好。曾收到这个贺禀，觉“文辞极工”，与幕友“言及前此奏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然而，贺禀虽引起曾一时的感情冲动，却未能使其心上的阴影完全消失。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曾参劾见异思迁、私行远扬的鲍超部将陈由立时，举郑魁士、李元度二人为例说：“此二人者，郑魁士之罪重，李元度之情轻，而其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则一也。”后因曾国荃、曾国葆对此有看法，才使曾国藩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回信称：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太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六年后，他在这份奏稿后面批道：“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余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同治）七年八月国藩批。”

四、曾国藩拜恩怀旧密陈录用李元度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加官晋爵，拜恩怀旧，于八月十三日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称：“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他申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他率军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再则“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他“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两次严参，一次陪参，又密陈录用，真还需要一股勇气。这篇密奏，情文并茂，清廷当即催令左宗棠查复。

李元度于同治元年（1862）第二次被参后，回家闭门著书，深自敛抑。“安越军”已被裁撤，左宗棠的复奏未能使他开复。同治五年（1866），贵州多事，巡抚张亮基奏调李元度入黔，自领一军，屡屡见功。从此雨过天晴，朝廷陆续赏还原衔、顶戴，授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攒来晚晴好景。

五、“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变化，曲折动人。李元度饱经忧患，如何看待曾国藩

呢？李原不是曾的门生，向来以弟子自居。曾去世后，李作《哭师》五律十二首，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其第九首云："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前两句勾勒了他们以往的关系、情感，接着自认为有负于曾而将曾的严参（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一例看成对他的爱护（春风）。同治十三年，李还在一首步曾原韵的诗中写道："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把挫折归咎于自作自受。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难能可贵；与前期的骄、娇对照，判若两人。大致多年闭门思过，大有悔悟。

当年曾、李风雨同舟，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后因李元度获咎中止。同治十年，李元度旧事重提，欲将第四女许配曾纪泽抚子广铨，曾国藩在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李元度《哭师》诗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是："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故事，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心情沉痛，催人泪下。光绪十三年（1887），李元度病故，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等"再生"就来到一起了。

贾谊故居与辛亥革命

吴松庚　曾文荟

1911年及其前几年，千年古宅贾谊故居由于其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成了湖南辛亥革命的中心。

一、众多革命团体在贾谊故居成立和办公

辛亥革命的组织准备阶段，湖南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组织了大大小小众多的反清团体，机关设在贾谊故居的就有三个。

湖南体育会由吴作霖、焦达峰等组织。招收学生四十多人，表面上培养体育人才，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联络同志和训练军事干部的一个组织，其训练军事干部的方法是以日本振武学校为榜样。1906年7月，焦达峰从海外回到长沙，时年二十余，仅携带几件简单衣物，即住在贾谊故居体育会内，"常聚诸豪杰议"，开始紧张的革命策动工作。

铁路协赞会1909年，为反对清政府以向外国银行团借款方式重新拍卖粤汉、川汉铁路权，长江中上游保路运动蓬勃兴起并进入高潮，湖南士绅组织了此会，李达璋任会长。铁路协赞会成立后，依托贾谊故居，组织了一系列对抗清政府的活动。到1911年春季，已发展到"通省人士奔走呼号"、"舆情激昂、万众一致"的地步。5月14日，铁路协赞会组织湖南各界万余人在省教育总会召开大会，宣布了清廷二十六大罪状。5月16日，又组织长沙株洲段铁路筑路工人一万余人罢工进城，声援保路运动，并且号召罢市、罢课。反抗风潮迅速从省会扩展到全省各地，社会各阶层都在积累愤怒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源泉的策划中心正是贾谊故居。

辛亥俱乐部湖南分会由长沙人罗杰负责组织，暗中联络、发动革命，澧县人王汝楫作为干事常驻贾谊故居。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将组织机关纷纷设立于贾谊故居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自光绪二年（1876）湖南巡抚王文韶、粮道夏献云倡修贾谊故居之后，贾谊故居的面积已扩至十多亩，内有大观楼、沧浪馆、寻秋草堂、佩秋亭、补柑精舍等大量房产，且有白银基金及众多田产为经营后盾。这些组织机构均有公开

的合法身份，设在贾谊故居便于办公，也能解决部分财务问题。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使贾谊故居传承两千多年后，在中华民族前进的关键时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辛亥革命的发动阶段，长沙另外三个革命组织机关虽不设在贾谊故居，但与贾谊故居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共进会　1909年8月湖南革命党人领袖焦达峰从汉口回到长沙，在太平街马家巷同福公栈设立共进会湖南总机关。马家巷就在贾谊故居大门外斜对面。这是一座具有典型长沙地方特征的天井四合院，四周木制护栏楼阁油漆虽已斑驳，但构制仍很完整。焦达峰就在这里往来于体育会和共进会之间，后与湖北的共进会和文学社联络，组织"两湖会盟"，策划"两湖起义"。

四正社　1911年7月焦达峰又和焦达人、彭友胜等在贾谊故居附近设立"四正社"，办公地点在贾谊故居大门外斜对面的另一条小巷——孚家巷，其工作人员及相关活动与贾谊故居内的秘密组织密切相连，作为领导湖南洪江会的核心，焦达峰担负着运动、组织、发动的责任，往来于体育会和四正社之间。长沙起义时，附近各县开到长沙的武装人员达1.8万人，都是响应焦达峰号召而来的四正社社员。

长沙地方自治会　其成员多系省咨议局议员，该组织为立宪党人的机关，而其干事全由铁路协赞会干事兼任，故其实际办公地点也在贾谊故居，自治公所仅仅是为便于掩护挂个牌而已。

二、革命的过程与贾谊故居紧密相连

1910年10月24日，湖南绅、学两界90余人在贾太傅祠开会，会议决定选派4人赴京，作为国会请愿代表，要求收回路权。结果请愿碰壁，至此，湖南保路运动中的立宪党人对清政府终于彻底失去信心，开始与革命党人紧密合作。1911年4月14日，长沙各界代表齐集贾谊故居，反对铁路国有。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湖北革命党人迅速派蓝综、庞光志到达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直扑贾谊故居联络，当时焦达峰外出运动新军不在，由正在体育会办公的阎鸿飞陪同，迅速联络了长沙各革命党人，进行了及时的宣传、鼓动。当时，长沙各革命党人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熊熊的烈火很快就将燃烧。

1911年10月18日，焦达峰、陈作新召集长沙各界人士一百多人，于贾谊故居召开扩大会议，商议共同发难的办法。在会上，焦达峰慷慨陈词："惟以清室铁桶江山不易破坏，仍主张采庚戌饥变（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之手段。"焦达峰等革命党人的激进主张使心理准备不足的立宪党人惊恐不安，他们力劝"勿乱秩序，至于流涕"。经过反复的争论，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会上，还当场报告了武昌起义情况，易乘钧也报告了由武昌运来的手枪和子弹已密藏城陵矶，会议

一致决定于21日晚发难。

会后，革命党人又制定了具体的起义办法：由黄镇在富训学堂放火，由易宗羲在贾谊故居放火，以火为号，再由新军炮火营李金山举火为号，新军各营见火烟即同时响应，攻打巡抚衙门。

10月22日，湖南反清起义全面开始，新军集结完毕，原议定在城中两地同时以放火为信号，关键时刻却出了点意外：一是放火者贪图便宜煤油，舍近求远，竟跑到大西门买放火用煤油，结果拖延了时间，富训学堂的火没能及时点燃；而贾谊故居的纵火者，又由于太过保密，连故居内部工作人员也不知就里，火被点燃后，被工友郭冬生发现，即奋力扑救，火没能烧起来。幸亏革命志士随机应变，见城中久未点火，赶紧将城北的一处民房点燃，起义才不至耽误。

鲁迅曾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百年辛亥，我们默想沉思，千年古宅，在中华文明进步的历程中折射了它的光芒。

（作者单位：长沙贾谊故居管理处）

芋园、芋园主人与芋园文化

李崧峻

抗日战争前，长沙有一座占地约两万平方米、气度不凡的古典私宅园林——芋园。几经战乱，它已经完全从长沙消失了，然而芋园主人公们所培植的芋园文化奇葩和他们的故事却隐约而又朦胧地存留于历史的迷雾之中。作为芋园主人李星沅的五世孙，我有责任将我所知道的关于芋园及其三代主人的相关信息整理出来，公之于世，使之不致湮没。

一

长沙在大规模旧城改造前还存在"芋园"、"芋园巷"、"水月林"、"柑子园"等街名。这些地名均与芋园有关。芋园是李星沅宅院李家花园的一部分，坐落于旧长沙城东南定王台畔，即柑子园、东庆街至浏正街一带，始建于1843年，是一座湖泊型园林。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祖籍湖南湘阴，乾隆年间，其祖父李世亮（玉屏公）举家迁到长沙。李星沅的父亲名李畴（1774—1814），字锡九，号寿田，县学生，嘉庆甲子科优贡考一等第一名，授武英殿校录，桂东县训导。嘉庆十三年（1808），李星沅12岁应童子试。17岁丧父后，因家贫李星沅还曾借读于小庙——水月禅林。嘉庆二十二年（1817），李星沅以郡试第一补弟子员成了一名秀才。次年，受聘任教于城南书院。道光五年（1825），李星沅考中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从此步入仕途。历官四川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陕西等省按察使、江苏布政使、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等。被道光皇帝召见八次，曾降朱批："朕看汝年富才明学优品正，甚有厚望于汝，谅汝必能体朕用人之苦衷也，钦此。"道光二十七年（1847），调任两江总督，兼署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九年（1849），因病辞官回籍养病。但一年半后又被刚刚继位的咸丰皇帝起用，任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剿太平军。李星沅带病赴任，四个月后即殁于广西军中，谥文恭。李星沅为官清廉、谦和，事母至孝。曾国藩作挽联悼曰："八洲作督，一笑还山，寸草心头春日永；五岭出师，三冬别母，断藤峡外大星沉。"

李星沅遗有《李文恭公全集》、《李星沅日记》、《李文恭公诗文集》等著作。李星沅以文人从政，从青年时代以秀才入陶澍幕始，其诗文已誉满湖湘。据专家研究，在《李文恭公诗文集》中收入有序跋、表志、奏章、军书、骈文等，其中更以骈体文22篇著称。这些文章均清丽典雅、辞采焕发，气势纵横。又诗文集中收诗1300余首，另《梧笙唱和初集》还收其诗数十首。对于诗歌，李星沅有他自己的追求，他作有《论诗》诗五首，较完整地表达了他的诗歌创作主张。先贤熊少牧于同治年间刊刻的《李文恭公诗文集序》中云："吾乡官江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之美者三君子：一湘潭陈恪勤公沧洲，一安化陶文毅公云汀，一湘阴李文恭公石梧也。"可见，李星沅的诗文青年时代就很受赞誉了。这些诗文是湖湘文化宝库的一部分。

二

湖南省文史馆馆员陈先枢在2002年出版的《长沙地名古迹览胜》一书中所载"芋园和水月林"条说："水月林在芙蓉区定王台附近。据清代瞿元钧《水月林记》载，水月林原为寺名，寺凡三楹，左右皆菜圃。清代两江总督、湘阴人李星沅为诸生时曾在此攻读。道光二十七年（1847）寺废，李星沅辟其地为芋园，拟作归田怡养之所。芋园占地两万平方米，水面占半，西部以黄山石叠为山，乔木荫翳，东部筑水角凉亭，风光旖旎。园中遍植白榆、乌柏、梧桐、黑松，穿插紫薇、绣球、桂树、腊梅，循季盛开。又过14年，李星沅次子李概复修芋园和寺院，径前增以回廊，栏循蜿蜒，因曲势作小亭，取苏子之语意，以'知水月'名之寺。1918年，李星沅四世孙李青崖曾将芋园部分房舍借予新民学会开办'留法预备班'。1938年'文夕大火'中，芋园及寺庙仅剩的一点残迹，也为断瓦残垣所掩埋，但芋园和水月林的地名却诗意般留至20世纪90年代。"其"柑子园"条又说："柑子园清嘉庆间即为私家园林。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这里再度成为私家园林，这一年任两江总督兼署河道总督的李星沅因病奏请开缺回籍，在柑子园筑李家花园，广植花木，堆砌假山，修建亭栏，以为暮年颐养之地。在此之前，李星沅已筑芋园。名为'芋园'的小巷离柑子园口仅几十米远，很可能李家花园就是芋园的延扩。"在陈先枢1999年所著《长沙老街》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陈先枢辑注的《长沙名胜楹联选》中还录有李星沅的《自署芋园联》："阅世倏中年，辛苦功名都历尽；娱亲偕小隐，读书耕种总陶然。"

看到家乡有学者这样关注和研究芋园，甚感欣慰。陈先生的记载与我搜集的芋园资料基本吻合，可相互印证。

芋园南北长约170米，东西宽约120米，其中主体水面积约占全园面积的三

分之二，湖中筑有南北走向的长廊将水面划分为东西两荷花池塘。以此为界，整个芋园可分为东西两半部。按中国古典园林的布局，围绕芋园又形成好几个大小不一的住宅建筑群，其主体建筑相对集中于西半部。芋园之正西为沿东庆街而建的住宅建筑群，名曰柑子园，此为芋园中的核心住宅建筑，即正屋，设有门厅、轿厅、大厅、祖先堂及多进厅院，有屋百余间。芋园正北的建筑群名曰芭蕉厅；西北为包括芋香山馆在内的怀庐建筑群。芭蕉厅及怀庐均有大门开向园北的浏阳门正街。芋园的南面有家庵“水月禅林”，此即为李星沅少时读书之处，后购之改建成家庵，作为家人祈福之所，类似于《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栊翠庵。民国十年（1921）李氏后人将其改建为长沙李氏祠堂，因有别于祖籍湘阴高华冲之李氏祠堂，故名曰支祠。在《支祠记》一文中，点明了芋园的命名出自“邺侯明瓒故事”之典故。

水月禅林西侧在光绪末年新建一幢二层楼房，也以“水月林”为楼名。相邻的街道从此也叫“水月林”。各建筑群除有大门与临街相通之外，均各有园门与芋园相通。从柑子园正屋走过园门进入芋园即步入积土为山并以黄石叠砌成廊桥状建筑，称之为小蓬莱，其北面有取名为自在香的假山包，山顶有小亭为全园的最高点，站在上面全园景色尽收眼底。山上遍栽腊梅、紫荆、桃花、桂花等花木，每当盛花期，景色明媚，花香扑鼻，故名之。小蓬莱山下有伸向西荷花池的堤坝及青石桥名憩鹤桥，将西荷花池腰束为南北两池。小蓬莱周围及湖边植有高大乔木如乌柏、梧桐、桂树、黑松并穿插栽有紫薇、腊梅等，放眼望去，郁郁葱葱，颇有山林幽深之感。环西荷花池的长廊由小蓬莱向南北方向伸展并与湖中心南北的长廊相连接，以此为链，形成环湖的镜澜小榭、小瀛洲、知水月亭、梧笙联吟馆、漱石枕流之阁等22处亭馆景点。环湖长廊靠西侧的南北两段倚墙而筑，廊壁上嵌有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所书大字道因碑刻及其他碑刻总数有百余方之多。何绍基系李星沅之儿女亲家，何绍基碑刻原件因战乱存世极少，现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据《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何绍基条目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为姻亲李仲云（即李星沅次子李概）写小楷《黄庭内景经》3250字，拟刻石刊于芋园，刻者以笔画细不容刀，乃再索《黄庭经》1223字，刻之，现两册完好如新。”芋园的东半部，有沿园墙而铺的小径，但无长廊。水月禅林（后改建为支祠）即在芋园东半部的南侧，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古典式园林——芋园。

三

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李星沅在云贵总督任上奉调任两江总督，在去南京就任前请假10天，转道长沙看望老母，此时芋园已粗具规模，柑子园正屋、藏书楼宝韦斋等建筑也已开建，李星沅的母亲陈太夫人及李星沅的兄弟各家均一

起入住了。

李星沅以文人从政、外吏19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除了政务之外，以文会友也是他人生轨迹的重要部分。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李星沅因病辞去两江总督职务，带太子太保衔回到长沙入住芋园之怀庐，其书房“芋香山馆”即在怀庐内。

此时的芋园由于李星沅本身的文才、书生本色以及他的社会地位，很自然地成为当时长沙社会文化名流聚会的中心之处。他们聚在一起或吟诗填词，或议论古今。当时名为“潇湘雅集”，用现在的语言表述，芋园似可喻为当时长沙“湖湘文化沙龙”。而李星沅恩师陶澍、裕泰以及好友何凌汉、祁寓藻、贺长龄、林则徐、邓廷桢、梁章钜、汤鹏、罗绕典（苏溪）、劳崇光（辛皆）、彭舒萼（棣楼）、宗稷辰（涤楼）等人中的湘籍友人或已凋零或正宦游他乡。此时与李星沅、李星溶、李星渔兄弟同聚芋园，目前能见之于文字手迹记载的尚有何绍基、熊少牧、邓显鹤（湘皋）、魏源、陈本钦、杨紫卿、罗汝怀、王闿运等人的诗文。

李星沅故世后，芋园的文脉并未中断，李星沅的三弟李星渔顶起了大梁。李星渔，字季眉，他虽然出身秀才，却七次应举不第，遂弃仕途而寄情山水文翰，又“专心力于利民济物”，侍奉老母。故李星渔就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内芋园文化沙龙的领军人物。遗有《观香室遗稿》四卷，诗三百余首。书中载有长沙著名画家张名倬绘制的李星渔六十九岁小像，熊少牧篆书像赞云：“怀淡于水，意行似天。亦儒亦侠，非佛非仙。时闻妙香，中有真诠。”

李星沅共有五子，长子李杭、次子李概、三子李桓、四子李榛、五子李梡。当李星沅、李星渔兄弟开创的“芋园文化沙龙”在道光末年进入鼎盛时期时，芋园李家第二代文化人已崭露头角。这里首推李星沅的长子李杭。李杭（1821—1848），字孟龙，号梅生，5岁能诗，幼年随父赴京，得父执何绍基、汤鹏的真传（何、汤均为李星沅的亲家，李星沅长女李榍嫁何绍基长子何庆涵为室，汤鹏的长女嫁李星沅次子李概为妻，三家关系极为密切），其诗风深受汤鹏影响。李杭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任编修，一时李星沅、李杭父子翰林，声震湖湘，传为佳话。连谪戍伊犁的林则徐也三度叠韵赋诗向李星沅祝贺。其中有“青锁家声鳌背接，红绫关宴马蹄催。笋班却共双松茂，夕秀朝华识楚才”之句，可见林公对李杭之器重。但可惜的是李杭于1848年病故，享年仅28岁，只留下著作《小芋香山馆遗集》12卷。该集为咸丰元年（1850）刻本，存诗400余首，赋37篇。

此时除李杭已故之外，四子李榛、五子李梡尚年幼，而次子李概（字仲云）、

三子李桓、李星溶的次子李桢（字介生，号贻香，又号逭华主人，著有《六书系韵》、《逭华庐诗稿》存世）、李星沅的外甥张恩准（字绳生），外甥女张恩泳的丈夫陈戊（号闠町室主人）等人均有文才，在上述众人中李星沅的三子李桓尤为出色。李星沅于咸丰元年（1851）殁于广西军中后，咸丰三年（1853）李概、李桓守孝期满，可以出门为国效力了。咸丰五年（1855）正月因高祖母陈太夫人年高体弱，李概留家侍奉老人，李桓则奉旨拣发江西出任九南兵备道，开始他与太平军十年苦斗的军旅生涯。

李桓（1827—1892），字叔虎，号黻堂。他任九南兵备道兼署按察使之后，又任江西粮道兼署厘金局总监。由于李桓这些年为稳定江西大局，在指挥地方治安作战，筹措粮饷，减轻百姓负担等方面，不恤劳瘁，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所作所为深得江西百姓和地方正派官员及毓科、曾国藩、沈葆桢等人的高度赞许。咸丰十一年（1861）冬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李桓卸粮道，升任江西布政使（藩台）并署江西巡抚。但到了同治元年（1862），由于新任江西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截留原供应湘军的厘金、漕折用于江西本土的休养生息，遭曾国藩强烈反对，从而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曾、沈为争夺江西厘金的激烈冲突。李桓作为分管江西地方财政、行政的布政使，在调解曾、沈之争无效的情况下，做出了支持沈葆桢，参与截留江西厘金、漕折的行动；并与曾国藩发生严重的龃龉，这就大大地得罪了曾国藩，并遭到曾国藩的打击报复。同治二年（1863）在调任陕西布政使，率自己组建的“楚军义胜营”开赴陕南处理军务的途中，于武昌鲇鱼套码头中风，不得不病退还乡，从此脱离官场，成为一介布衣。

李桓不顾个人安危，支持沈葆桢，其高尚品德、才干和学问不但赢得了江西官绅的一片赞扬，也得到了曾国藩幕府中的正派人士和湘军高级领导人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字次青）、彭玉麟、杨岳斌等人的高度赞扬，并成为终生好友。李桓病退返湘后弃武就文，首先与众兄弟一起辑成《李文恭公全集》（共四十六卷三十八册）。又将自己做外吏十年中与各方官员、友人、统筹全局协调共事的信函（其中江右六年就得尺牍一千一百多封）、官书、奏疏等以及自己自甲寅（咸丰四年，1854）服官始至癸亥（同治二年，1863）病退还湘为止之历历往事写成的回忆录——《甲癸梦痕记》合编成书，命名为《宝韦斋类稿》。百卷《宝韦斋类稿》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是李桓外吏十年的真实写照，也是咸丰同治年间江西历史的一面镜子。他见“国朝人物无专书”，乃动手写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计720卷，随后又辑成附录《国朝贤媛》12卷。两书自同治六年（丁卯1867）动笔，至光绪九年（癸未，1883）方告成。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刊刻出齐，历时20年，耗费了毕生精力。台湾民族图书馆于1984年依清光绪庚寅年（1890）湘阴李氏藏版影印出版了《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李桓幼时出天花祸及眼部，10年后开始发作，中年后加剧，渐次失明。到光绪九年（1883）终不能视物了，故该书是在李桓双目完全失明之后才最后完成的，其毅力令人钦敬。据清史学专家王钟翰先生研究，目前流行于世的《清史列传》大部分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从咸丰元年到光绪二十年前后的数十年，芋园在李概主持经营之下，成为一座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式大花园，而且随着“同治中兴”的来到，芋园的人文环境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这里不但有李星渔、李桓、李桢等人的文史创作，而且芋园李家第三代接班人也成长起来了，其代表人物为李桓的长子李辅燿。

李辅燿（1848—1916），字补孝，号和定，因李星沅长子李杭无后，李辅燿被过继给大房李杭为嗣，故又自号幼梅。李辅燿自幼聪慧好学，十八岁（同治五年）成为秀才，同治九年（1870）赴京会试，得庚午科优贡。先后任安仁县教谕、临武县训导、内阁中书等职。后又至浙江先后任海塘工程局督办、杭嘉湖道台、宁绍台道台、省防军局总办等职。李辅燿为人谦和儒雅，为官务实认真，任海塘工程局督办后著有记录工程技术的《石塘图说》一书。由于家学渊源，他有较好的文学艺术修养，不仅诗书、金石无所不精，尤擅汉隶，是长沙名书法家之一。他还著有《李桓事略》、《还魂词》、《玩止水斋诗草》等。浙江杭州著名的文化社团“西泠印社”的创办发展与他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是分不开的。李辅燿的外孙唐醉石更是参与了“西泠印社”的筹创事宜，是“西泠印社”的第一批社员之一。

李辅燿思想开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将长孙李青崖送入法国教会办的上海震旦学院读书；又将孙媳吴琴清（作家吴祖光的姑妈）送入苏州景海女中学习。1907年，又送李青崖赴比利时国列日大学学习地质矿业。李青崖后来成为著名的教授、文学家、翻译家；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文献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在光绪年间李辅燿是芋园内承上启下的一位核心人物。

在这几十年中，在芋园与李桓、李辅燿父子交往深厚的湖湘文化人士，目前能见之诗文、书札手迹者有王闿运、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许瑶光、张自牧、彭玉麟、何庆涵、何维朴、何维棣、徐树钧、瞿鸿禨、张百熙、谭钟麟、谭延闿、朱昌琳、王先谦、陈三立等（其中多人为亲戚）。此外，还有柯劭忞、俞樾、陆润庠、胡鑁、方鼎锐、吴庆坻、许增、王福庵、丁仁等非湘籍文化名人。

芋园还出了一支湖湘闺秀诗人。李星沅之妻郭润玉善诗，惜于道光十八年（1838）去世。生前刊刻有《簪花阁诗集》、《梧笙联吟初辑》（与李星沅酬唱诗集），

殁后李星沅为之辑有《簪花阁遗稿》，共存诗300余首。李星沅的妹妹李星池（字淑仪，著有《澹香阁诗钞》）和李星沅的长女李楣（字月裳，著有《浣月楼遗诗》）均善诗。光绪元年（1875），王闿运为李星沅的妹妹李星池诗集《澹香阁诗钞》作序，曰："道光中湘楚闺咏莫盛于潭，潭女能诗郭氏尤著，余姑适郭，郭之姻亚皆习诗礼相酬和，一门之中人人有集，余姑夫兄女（注：王闿运的姑夫的哥哥郭云麓是李星沅的岳父，郭润玉夫人的父亲）适湘阴李氏者，才思清绮欲冠同时所谓笙愉夫人、太子太保文恭公之妻也。"

四

芋园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数十年的经营，到光绪中叶已形成为一座人文荟萃、意境幽雅、亭台水榭错落有致、美轮美奂的古典式园林，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但到了光绪十七年（1890），李桓去世以后，老一代亲友也先后相继凋零。李辅燿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远赴浙江杭州为官。此时，芋园中以李星沅的四子李榛辈分最高，但随着社会动荡加剧，芋园内上百人口的子孙各家自立门户，聚族而居已名存实亡。故李榛独木难支，芋园也开始走向衰落。辛亥革命以后，李辅燿于民国二年（1913）回到长沙芋园，眼看芋园已残败荒芜，物是人非。终于在当年秋，李星沅名下五房进行了第一次分家。在随后的第二次分家时，芭蕉厅分给了李辅燿的长子李相钧（李青崖的父亲）；怀庐分给了李辅燿的次子李相纶（又名李庸，字子扉，书法家，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水月林分给了李辅燿的三子李相慈（又名亦怀，本文作者李崧峻的父亲），三年后李辅燿去世。

分家时李辅燿的长孙李青崖已从比利时留学回国，任职于长沙高等商业学校，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兼课，与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曾运乾等人同事。他们知芋园的怀庐空房较多（此时怀庐的主人是李青崖的叔叔李庸，李庸是长沙著名的实业家朱昌琳的女婿，他常年住在朱昌琳的老家棠坡），遂请李青崖向李庸商借芋园中怀庐的一个院落作为第一师范的教师宿舍，杨昌济一家也住在这里（怀庐是一个大建筑群，有多个院落，其中一较大的院落，此前已办了一所衡萃女子学校）。他们还在怀庐办起了"宏文图书社"（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是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及《公言》杂志。这期间（1914—1915）第一师范的学生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李维汉等人经常来芋园怀庐拜访他们的老师，讨教学问，纵论时事，师生关系十分密切。不久他们师生又向李青崖借用了与怀庐一墙之隔的东邻建筑群——芭蕉厅（这是李青崖自己的产业）部分空闲房屋作为他们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的学习活动场所。其中的一间还成为他们留法预备班的教室，有学生五十余人，李青崖亲自为他们讲授法语课。

当时社会比较动荡，生计困顿，李氏后人对维护芋园已力不从心。李辅燿对芋园的前途有所预感，他于民国四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中写道："版制芋园笺十二种，后芋园笺十种，三年以来议将芋园出售，虽无成说，然将来易主势所必至，存以亭馆之名，以为子孙之纪念耳，请王维季作各种篆书。"王维季即王福庵，著名书法家、金石篆刻家，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李辅燿在浙江任职时的至交好友。此时王福庵正在长沙探视病中的好友李辅燿，应诺承办。在王福庵题签的22种芋园亭馆景点名录信笺中，分"芋园笺"12种和"后芋园笺"10种。前12种名录为文恭公李星沅所命名；后10种则为文恭公去世以后李概、李桓所命名（其中有一些亭馆还是他们两人经手所新建），水月林（建在水月禅林之一侧）住宅是李辅燿于光绪末年所建之住宅，故不在名录中，李辅燿于民国二年还湘后即入住水月林。这是芋园中最后建成的住宅建筑。

1919年五四运动完全更新了大家庭的旧观念。因此到了1921年时，年近九旬的李榛眼见芋园李家要"散架"了，但聚族而居的旧观念促使他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家庙——水月禅林改建为祠堂，一年中的各种祭祀活动经费由各支的小家庭分担，想以此来维系李家的聚族而居，于是将庙中的佛像移到城北的开福寺。为了有别于祖籍湘阴高华冲之宗祠，遂将芋园中的祠堂命名为"支祠"，命李概之子李祥霖（字佛翼）作《李氏支祠记》一文，并由李辅燿的次子李相纶（即李庸）书丹，以昭示后人。

1930年7月27日，红军攻进长沙，捣毁并放火焚烧了国民党长沙党、政、军、警机关等建筑。芋园被当成"反动地主官僚宅第"遭到了部分损毁。除了李庸、李亦怀、李青崖几家在早年分家后带出的部分先人遗墨等文物之外；留住在芋园内李星沅家族子孙手中的大量祖先各种著作、诗词手迹及众多文化名人的墨宝、书札和其他各种文物，均遭受严重损毁。

1938年冬，日军逼近长沙，11月13日凌晨长沙发生了著名的"文夕大火"，千年古城毁于一旦。芋园未能幸免，柑子园及其他住宅院落、海粟楼的全部藏书以及存放在支祠堂内的数千块各种著作的木刻版及残存碑刻、牌匾等一起化为灰烬。战后的芋园一片断垣残壁，1947年李氏后人在柑子园大门外两旁尚见到各立有一块"李芋香堂"石碑，墙上嵌有"芋园"搪瓷牌。残存的房屋曾作为浏正街小学校舍。斗转星移，如今，芋园已无迹可寻了。

（作者系民盟烟台市委副主委）

明德学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陶旅枫

清朝末期，国运维艰，一批志士仁人痛感清政府腐败无能，纷纷走上了教育救国和革命救国的道路。这其中尤以大批留日学生的觉醒和活动特别活跃，为日后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3 年 3 月 29 日，留日学生胡元倓在士绅龙湛霖、龙璋的支持下在长沙城北的西园创办了湖南最早的私立新式学堂。日后，这所学堂管理规范，师资阵容强大，办学成绩突出，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我国近代三大私立名校之一。胡元倓一生办教育，为实现教育救国之办学初衷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胡元倓虽一介毕生办学、不谋一官半职的教育家，生前言语鲜见其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但其思想开明，对各种革命仁人包容性极强。学校创办之初，即邀请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黄兴来校任教。这时候的黄兴一心革命，正好想寻找一份差事和一个落脚点，来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黄兴在明德学堂主持速成师范班，教习体育、地理、博物等课程。黄兴的到来，使得本来开明，并旨在"非兴学无以救亡"、实行"军国民教育"、"养成中等社会人才"的校园，带上了浓厚的革命色彩。当时的明德学堂成为国内极其重要的革命阵地，为日后的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德学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聚贤纳士，重要的革命大本营

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在办学体制、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打上了日本教育烙印，尤其是得留日学生之便利，师资方面有很多都有留日背景。而黄兴从事"反清复国，创建共和"活动所依赖的中坚力量主要也是具有留日背景的军学界人员，尤其以学界人士为多。这一时期明德学堂聚集了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志士。其中主要是留日学生，在此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如黄兴、吴禄贞、张继、秦毓鎏、陈天华、苏曼殊、易宗夔、陈介、柳聘农、陈润霖（未参加华兴会）、傅熊湘等。

还有一批在国内已经成长起来的革命志士都先后在这一时期来过明德从事革命活动，如：

周震鳞：早年与黄兴在两湖书院同学，毕业后在宁乡、长沙办学，从事革命。1903 年任明德地理教员，参与创立华兴会，成为职业革命家。

黎尚雯：明德早期教师。曾与唐才常、梁启超创办时务学堂，主张变法，后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有明显的革命倾向。

宋教仁：1903 年 8 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参与华兴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武昌科学补习所的创办人。

杨德麟：1903 年明德教师，先主张变法，后鼓吹革命，撰有《新湖南》。参加华兴会成立会，策应长沙起义。

而胡元倓、龙璋、龙绂瑞、黄吉亭等一批社会名流则极力掩护黄兴等人在明德从事革命活动。

二、培养志士，重要的革命大学堂

当时的明德学堂，除聚集了一批本身有革命倾向的志士仁人外，还以此为熔炉，培养了一大批日后对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坚力量。

王正廷：1903 年至 1904 年明德学堂英语教员，受黄兴等人的革命主张影响，倾向革命，参与华兴会。1905 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姚宏业：1903 年入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第一班，就学于黄兴、张继门下，深受其革命影响，参加华兴会。1904 年留日，加入同盟会。

宁调元：1903 年入明德速成师范班，入华兴会，后留学日本，入同盟会。回国后参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活动，参加萍浏醴起义。

魏宗铨：明德学堂第一班学生，受黄兴等的影响，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参加华兴会，发动萍浏醴起义。

陈嘉会：早期教师，后留学日本，1911 年回国，随黄兴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陈方度：明德初期教师，参加华兴会，1905 年留日入东京陆军学校，入同盟会，回国参加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

文斐 明德早期教师，1905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

赵声：明德早期教师，留日后回国策动兵变，入同盟会，与黄兴一道领导黄花岗起义。

欧阳予倩：明德经正第一班学生，1905 年留日，倡导新剧。

胡瑛：明德经正第一班学生，华兴会重要成员，策划长沙起义，参加武昌起义。

李燮和：明德经正一班学生，加入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泄密后逃上海，入光复会。1905 年留日，由黄兴介绍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

阎鸿飞：明德小学1904年学生，参加华兴会、同盟会。武昌起义，起兵岳阳。

黄一欧：明德小学学生，黄兴长子，华兴会会员。1905年随父至日本。14岁入同盟会，是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回国参加黄花岗起义。

陈嘉佑：明德第一班学生，入华兴会。1905年留日，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

曾杰：明德理化专科学生，入华兴会，策划宝庆、新化起义，事败流亡日本，1905年入同盟会。

彭允彝：1903年肄业于明德速成师范班，1904年留学日本，后参加“二次革命”和护国反袁斗争。

章裕昆：明德第一班学生。后参加湖北新军，武昌起义时参加光复荆襄地区战斗。

李发群：明德速成师范班第二期学生。1906年留日，入弘文学院，加入同盟会，同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

彭国钧：明德速成师范第一班毕业，后加入同盟会。

张平子：明德第一班学生。加入华兴会、同盟会。著名报人。

周邦柱：明德第一班学生。1905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郭子奇：早年入读明德经正学堂，1904年留日，1906年由黄兴介绍入同盟会。

三、鼓吹革命，重要的革命宣传阵地

黄兴认为“鼓吹革命，人心易激”，“运动革命，非有言论鼓吹不足以动人”。黄兴等一批志士仁人来到明德后，在课堂内外，“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讲述天下大势和列强侵略中国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唯有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等事实和主张，“恒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教育学生”。黄兴、陈天华等就在明德学堂大量印发《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血泪书》等革命书刊，面向全省、全国传发。黄兴就连给明德食堂题写的对联“劝诸君努力加餐，每饭莫忘天下事；看先贤画齑断粥，立身端在秀才时”，都带有浓厚的革命渗透。一时明德学堂革命氛围大增，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开演讲会、讨论会，抒发爱国激情、鼓动革命。学生宁调元等常在课堂内外发表革命倾向的演说，成为学术界领袖。一时间，明德学堂成为革命思想的摇篮。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评述“光绪末年的明德学堂……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竟相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清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

四、创华兴会，重要的革命活动策划地

华兴会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对日后同盟会的成立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产生了直接影响。1903年11月4日，从不做生日的黄兴突然邀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吴禄贞、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周震鳞、翁巩、章士钊等聚会，给自己30岁做生日。实际上这是一次革命盛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04年2月15日在学堂旁边的明德董事龙璋的住宅，举行了华兴会成立大会。到会100余人，其中明德师生黄兴、吴禄贞、张继、秦毓鎏、翁巩、周震鳞、陈天华、华龙、王正廷、柳聘农、郑宪成、李步青、熊子玉、傅熊湘、沈迪民、陈介、张平子、宁调元、欧阳予倩等达40余人。会上，黄兴发表了著名的“一省起义，各省响应”的革命演说。

会上决定以明德为基地，分派成员赴各地联络，立即行动起义。会后，宋教仁至常德、桃源，陈天华至江西，姚宏业至上海，宁调元至醴陵，魏宗铨至萍乡，胡瑛至武昌，分途联络。刘揆一等抓紧与会党首领马福益联系，决定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时发动长沙起义。黄兴则在明德学堂组织人员，制造炸弹。

后因泄密，起义没有成功。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华兴会的成员在明德学堂的掩护下，多数逃脱，保存了革命力量；同时，华兴会亮出了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口号，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唤醒了更多的民众起来投入革命。后来，在黄兴的带领下，很多明德师生，与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起义，最后终于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系长沙市明德中学副校长）

“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

——忆一代宗师印顺长老

圣 辉

印顺长老（1906—2005），当代著名高僧，是以智慧深广、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学优行粹，为海内外佛子所同钦”的近代中国最有成就的佛教思想家。1973年日本大正大学因长老《中国禅宗史》一书的独特创见而授予他博士学位，被国际佛教界誉为当代“佛学泰斗”和中国佛教界“划时代的博士比丘”。半个世纪以来，印顺长老甘于寂寞，潜心著述研究，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军人物，振锡海内外，广作狮子吼，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长老继承了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思想，回归佛陀“以人为本”的精神，形成了系统的“人间佛教”思想，并身体力行地弘扬，使大乘佛教更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更好地利益一切众生。印顺长老与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有着不解之缘，作为后学，为了深切怀念印顺长老——这位“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以自己毕生的心智奉献于“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代宗师，谨撰文表达深深的敬意，使后来者见贤思齐。

一、印顺长老生平

印顺长老，俗姓张，名鹿芹，浙江省海宁县人，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商之家。其学佛因缘，颇类似于明代高僧智旭大师。走的是由求真而入佛门的路子。长老6岁进私塾学习，7岁入小学读书，13岁完成高等小学堂的学业。长老聪慧过人，先学中医三年，对于医道和仙学有浓厚兴趣。在16岁时就在教会附设的私立小学任教了。在学校的9年当中，印顺长老的学习从丹经、术数转到老庄，又转而研读《圣经》及佛经。可见，长老在出家前学养深厚。在20岁时因读冯梦祯的《庄子序》：“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引起了他探究佛法的兴趣。在印顺长老23—2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叔祖父、父亲相继逝世。印顺长老由此深感人生无常，毅然出家修行。他于1930年在普陀山福泉庵由礼清念老和尚剃度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同年10月底，长老到宁波天童寺依圆瑛老和尚受具足戒。受戒第二年（即1931年）2月，印顺长老来到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求学，时院长为太虚大师。由于这一因缘，此后印顺长老的佛学思想受到太虚的深刻影响。印顺长老在闽南佛学院仅学习了四个月，就奉大醒法师之命往鼓山佛学院教课。后又回到闽南佛学院授课，讲《十二门论》。1932年初秋，印顺长老往佛顶山慧济寺阅藏三年。1936年，受太虚大师之命，到武昌佛学院为研究生指导“三论”的研究。

抗战期间，印顺长老入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达八年之久，奠定了他一生佛学的根基。1947年太虚大师往生。印顺长老即被推选主编《太虚大师全书》，1948年5月于雪窦寺编辑完成。1949年，长老在厦门安住下来，并办了一所“大觉讲社”，宣讲《佛法概论》。6月，长老前往香港，在香港的三年中，出版了《佛法概论》、《太虚大师年谱》等15本书。1952年秋赴台，从此定居宝岛。1953年9月，长老在台湾新竹观音坪创建了福严精舍，成立独立学团。1957年初秋，长老开始推动台湾女众佛学教育，在福严精舍山脚下的“壹同寺”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1961年早春，长老在台北创建了以宣讲佛典为主的慧日讲堂。1964年5月至1965年5月，长老在台湾嘉义妙云兰若闭关潜修。广阅南传佛教经典，整理了原始佛教的资料。1969年冬，长老开始了《妙云集》的编辑工作，将毕生著作分类整理，至1973年秋末，经四年而全部出版，全集共二十四册。1970年，长老以二十八万字写成了《中国禅宗史》，用大量的佛教史料考证出《六祖坛经》确实是慧能所作。因圣严法师的推荐，由日本大正大学的讲师牛场真玄译成日文，并送到大正大学申请博士学位。1973年，他因著《中国禅宗史》的学术贡献而被日本大正大学授予“文学博士”的学位，成为中国出家众生中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比丘。1993年，长老将以往之部分著作结集成《华雨集》出版。1994年9月6日至29日，长老以89岁的高龄，终于完成了回大陆礼拜祖庭的心愿。长老省亲期间，一路上经厦门南普陀寺，宁波天童寺、雪窦寺、普陀山，游历阔别了多年的受戒地、学习地、阅藏地，才安然返台。2005年6月4日，一代宗师因心脏功能衰竭，于正念寂静中安详示寂。据当时台湾《佛教弘誓电子报》第114—116期报道：“2005年6月4日上午10时7分，印顺长老于台湾花莲慈济医院安详示寂，世寿一百零一岁，僧腊七十五年，戒腊七十四夏。6月5日法体在台湾慈济追思堂，大众瞻仰。6月6日移灵返回台湾新竹福严精舍。6月9日入殓。6月11日举行追思赞颂大典与荼毗大典。6月12日奉安于福慧塔院。”报道中褒扬说：“长老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一代大德的高风典范，以及七百余万言的智能财产，即是不动不坏的常住法身。虔诚祝愿‘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印顺长老，

早日乘愿再入娑婆，作狮子吼，续转法轮！”

二、印顺长老的著作

印顺长老以其卓绝超人的智慧，以其“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心，心系佛法正见的建立，“著作等身”而闻名佛教界。更以其对“佛学的深入和广博之超宗派、超地域、超时代”，而无愧于被尊为古往今来的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卓越的思想家的盛誉。长老一生病缘不断，却笔耕不辍，撰有各种著作41部，共有700余万字，内容涉及大小乘佛教，以及中印佛教的各个宗派。

其著作主要有：[1]《妙云集》24册，分为三编：上编是经与论的讲记，共7册；中编是十万字以上而独立成书的作品，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共6册；下编是将各种短篇论文依性质不同的类集，共11册。[2]《华雨集》5册；[3]佛学专著10余种，如《佛法概论》、《印度之佛教》、《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唯识学探源》、《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空之探究》、《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等。此外，他还主编《太虚大师全书》64册、《杂阿含经条编》3册以及《法海微波》等。

三、印顺长老“人间佛教”思想的现实意义

印顺长老继承了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思想，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的深厚内涵和实践的方向。长老从深研大量的经论当中发掘出具有自利利他的菩萨行，提出“三宝在人间”的理论。他说：“佛法无边，实不外乎三宝。”长老认为，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成佛也在人间；佛陀是由人开始修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就佛道的。可见，只有生在人间，才能受持佛法，体悟真理，而最终得到正觉的自在解脱，所以人世间是最好的修学佛法的场所，人类是最容易通过修行而成就佛道的。大乘佛教一直是主张“自利与利他的合一”，菩萨的自利，主要是从利他中得来的，一切与利他相应。长老认为：“人间佛教的人，入菩萨行离不开慧与福，慧行是使人理解佛法，得到内心的净化；福行不仅是办活动及慈济而已，是使人从事行中得到身心利益……在利他中要先站稳脚跟，要求自身在佛法中得到充实，否则将佛法的真义淡化，并引起佛教的不良副作用。”由此，揭示了“佛出人间”——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的真实含义。

印顺长老作为“人间佛教”的倡导者、领航者，他一生致力于佛教义学，其信念是“为佛法而学”，他做到了“信仰与学术的统一”，这正是他“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心。

他身体力行实践佛法，言行一致。他发愿说：“我的身体老了，而我的心却永远不离佛教少壮时代佛教的喜悦！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音而献身！”长老为实现自己的人间佛教理想，深入经藏，净治身心，弘扬正法利济有情，续佛慧命，为我们后学佛弟子树立了实践菩萨行的典范！

四、印顺长老与闽院的因缘

从印顺长老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长老的佛学修养的建立部分来自于在闽院修学的关系。共有四个因缘时段：

1. 长老在宁波天童寺受戒后的第二年（1931年）2月，得到剃度恩师清念上人的慈允和帮助，进入当时由太虚大师任院长的厦门市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读书，插入甲班（第二学期）。也正是由于这一因缘，印顺长老此后的佛学思想受到了太虚大师的深刻影响。印顺长老在闽南佛学院仅学习了四个月，就奉大醒法师之命往鼓山佛学院教课兼养病静修。

2. 1932年春，长老返回闽院，大醒法师请他为同班同学讲述《十二门论》。在教课之余，长老做了深刻的反省，觉得自己是来求学的，还是自求充实为好。于是，他离开闽院，回到普陀山。以自修的方式研究佛法，求法阅藏，并且开始了他一生的著书弘法的修学道路。

3. 1948年，南普陀寺传戒，印顺长老被礼请为尊证师。并在厦门随缘创办了“大觉讲社”，为僧人和信众宣讲《佛法概论》，为后来的《佛法概论》一书的写作和出版奠定了基础。

4. 1994年9月6日，已经89岁高龄的长老故土难忘，遂与厚观法师、性滢法师、明圣法师、达闻法师一行五人从台湾出发，在香港转机，当晚到达了厦门。9月7日，长老终于在阔别了四十五年之后重返母校——闽南佛学院，时任南普陀寺方丈和闽院院长的妙湛老和尚亲自到山门迎接。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的全体僧众、师生搭衣、击鼓、鸣钟、排班，以非常隆重的仪式欢迎印顺长老重回母校。印老和妙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对全寺僧众做了精彩的开示。长老看到闽院复办后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年轻学僧渴求佛法的至诚，感慨万分，临别时，长老赠言母校：“重游旧地，见一片光明。”妙老圆寂后，1997年我继任南普陀寺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两年后的1999年，我带团参加第二届两岸禅学研讨会，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得知长老生病住院，研讨会一结束，带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和祝福赶到花莲慈济医院，在医院听随侍在身边的居士讲，长老热切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曾告诫自己的徒众：凡谈台独者，非我弟子！听说我们是大陆来的，特别亲，所以长老不顾法体四大欠调，当下就在病室会见了我们，在接受了我们的问候，给

了我们开示后，还坚持与我们合影留念。医院这一见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长老，每当忆及，就有一种“乍读慈容在，长吟故我非”的怀念，在心中久久回荡，带着无尽的怀念，祝愿长老，乘愿再来，继续度众生。

五、结语

印顺长老的人间佛教思想，对现代修行者立足现实的人间生活，关爱他人，关爱社会，自利利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这种“人间佛教”思想，不仅让人关注追求最终身心的自在解脱的同时，更要关注当下现世的生存状态，从而将人类生活的这个世间建设成佛国净土。现在，海峡两岸的有识之士，以及人间佛教思想的承继者们也正在以各种方式积极地实践着太虚大师、赵朴初大居士和印顺长老的人间佛教的理念，正在以其广泛的人世精神，本着“关怀社会、回报社会、利乐有情、庄严国土”的精神主旨，以开办教育、著书立说、开展慈善事业、环保救灾、道德净化等运动和活动为载体，积极地实践着人间佛教思想，使这一理念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发挥着佛教对现实社会服务净化的积极作用，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社会和谐重要思想的内容。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民国湖湘教育界轶闻琐记

——兼记彭国钧、刘岳厚“甲、乙两派之争”

曹利利

“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

往事如烟，有几位早已作古的先辈，他们庆幸自己熬过了十年“文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聚闲聊，笑谈古今。本文所记述的便是他们在抗战前的二三十年代，所经历过的一些人和事。

20世纪初，清廷废科举兴学堂，现代正规教育初起，湖南的中等教育事业领先于全国，至民国二三十年代，一批名师涌现，各校争先相聘，兼职现象成风。据知，在湖南大学任教的先生中，就有数学系的吴树基，化学系的曹止真，中文系的熊知白、李肖聃，外文系的彭沛民和王舒（清末文豪王闿运之孙），以及土木系的莫若荣等教授，他们都在省城中等学校兼过课。当年先公王惟声教授在湖南机械厂主事，也应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先生之邀请兼授几何课，至于像劳启祥等那样的名师，身兼多校教职，就不胜枚举了。

那时代的中学校长本身就是真才实学的教育家，为聘名师而不惜礼数，尊重有加，多不便强求责任心问题。传闻名师傅君剑先生，古文教得呱呱叫，因兼课太多，批改作业不得不请人代劳。当年妙高峰中学校长方克刚先生要求严格，凡遇学生作业批改出现问题，只好自己亲笔加以改正，傅先生闻之后很不好意思。

名冠省城的国文教员汪根甲先生，系前清解元，名登金榜，其学问声誉在湖南教育界无人不知，可惜现今所编的《湖南教育史》，此君的大名却不见踪影。汪先生那时是个大忙人，由于兼课太多，顾此失彼，常常轮流缺课。他上课讲书要口嚼西洋参以提气。他古文烂熟，背诵如流，讲课典故多，不时穿插笑料。流传在先辈口中的就确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位字画收藏家，好不容易得了幅名画，可惜画中无诗，故诚请一饱学名家题字，汪先生酒足饭饱后，欣然提笔疾书：“东边一棵树，西边一棵树，南边一棵树，北边一棵树。”当时收藏家站在一旁观看，

惊出一身冷汗，以为他把这幅名画给糟蹋了，然而汪先生却不慌不忙继续写下去："树、树、树，系不得离人住，前山啼鹧鸪，后山唤杜宇；鹧鸪啼，行不得也哥哥；杜宇唤，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到此时他才转忧为喜，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连忙付了润笔费，恭送出门。

1926—1929年间，省城长沙连续几次发生了湘中筑路风潮，史书上很少有记载，估计是被当时的农民运动、马日事变以及"清乡剿共"之事给掩盖了。

1926年初，省长赵恒惕在长沙主持全省筑路会议，湘中各县派人作为路务代表参加。会议确定以"官督民办"形式修筑全省公路，选举十余人为常驻委员成立筑路常驻委员会，常驻委员均系社会名流，其中教育界人士就有余先励、王季范、王惟声、谭嵩、方克刚等人，教界名师刘宗向、谢祖尧作为路务代表参与其事。常委会掌管各县缴来的路款，负有推举汽车路局负责人及监理路务的责权，是筑路核心权力机构。赵恒惕下台后，省政府欲收路权为官办，因此发生了几次所谓的"官民之争"。由于时局动荡变化多端，官方在争斗中并未取胜。1928年教育界著名人士彭国钧（曾任修业、长郡校长）被常驻委员们选为湘中汽车路局局长，到1929年何键主湘，花大力气收路权归省府，成立以刘岳厚为局长的湖南公路局，"官民之争"方告结束。不管怎样，当时一些教育界人士，在开拓湖南早期公路建设事业中，确是尽了一分力的。不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20世纪30年代却上演了一场以彭国钧为首的教育界人士和与以刘岳厚为首的公路系统人士之间的所谓国民党甲乙两派之争。

关于湖南国民党两派之争，史书史料均有记载，然而史家之评述，难说不是站在某种观点立场上做文章，其实当年的参与者对此还是有不同看法的，当时双方都是在意气用事。

何键主湘时期，省城有过两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一是兴办国术馆，搞武术比赛，什么平江不肖生，大侠杜心武的徒弟，湘军建武术队以及柳森严打擂台等等，成为茶楼酒馆、街头巷尾、野鸡小报的小道新闻；二是所谓湖南省党部甲乙两派的斗争，也是人们挂在嘴边议论的话题。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期以来由彭国钧、张炯、李毓尧、王凤喈等教育界人士控制。彭国钧（1877—1952）长期担任修业学校（含小学、农业学校）校长，曾是长郡中学校长，又是明德中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等几所学校的校董，在湖南教育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炯（1879—1959）曾在常德创办过莲湖中学，任过省立第二师范的校长，当过省教育厅长；李毓尧（1894—1966）系英国皇家学院地质科毕业，历任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教授，当过湖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

的研究员，与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共过事，一起署名发表过很有价值的论文；王凤喈（1896—1965）历任明德中学、省立第一师范教员，中央大学等校的教授，亦任过省教育厅长等职。由于明德中学有国民党中央党部陈果夫这样的校友关系，校长胡元倓又是湖南教育界说一不二的人物，教育界不少头面人物大都惟胡老九马首是瞻，该校几成彭国钧等国民党省党部要员的基地，他们不但在省教育界影响力特大，且掌控着省党部的实权。

何键主湘时期，头几年只掌握了军政大权，对党权却无法插足染指，每当省党部开会议事，何键只有被指责被骂被讥讽的份儿，这种局面令他深感头痛，几次欲夺党权而不可得，皆因彭国钧这一派背后有陈立夫、陈果夫的支持。彭国钧集团的基础在各县的教育系统，几次换届选举，始终未能动摇彭国钧等甲派掌权的根基。令何键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同乡刘岳厚无意中替他夺得了党权，而他实在不是乙派的后台，因为他从未刻意去暗中支持过乙派。

刘岳厚（1892—1970）毕业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湖大前身）土木科，是位能干的工程师，是我先祖曹典球的学生，据其子刘笃平先生（杜心武传记作者）说，刘岳厚与彭国钧也有教育上的关系。1929年11月湖南公路局成立，刘首任局长，所聘总工及土木、机械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均系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及省立湖大的毕业生，其中不乏彭国钧的学生。刘岳厚常在局内议论甲派在省党部的所作所为，称其表现不可一世，令人十分反感。局内有人向他建议利用全省道路协会的名义，在各通公路的县站设立国民党特别党部道协支部，扩大力量发展抗衡甲派的势力。此招果然非常奏效，这一派力量得以猛增，引起甲派的关注，即形成了新闻报道的所谓"乙派"。

1933年，省党部执监委任期届满，要举行新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考虑到选举彭国钧甲派没有制胜的绝对把握，于七月初亲临长沙筹划，通知刘岳厚到曹典球（省府委员）家里去会面谈话。陈立夫当面指责刘岳厚发展乙派势力是非法行为，要求他取消全省各地的道协支部。刘岳厚毫不示弱，拍桌反驳，声称道协支部隶属于道协国民党特别党部，是合法的，双方僵持不下，令曹典球左右为难。陈立夫回南京后行文要刘向中央认错，要求他解散道协支部，刘虽被迫向中央认错，但强硬表示决不取消道协支部。

1934年4月，第四届湖南省党部执监委选举，结果乙派大获全胜，何键获选任执行委员会常委，军长刘建绪任监委会常委，省党部三常委占其二，从此何键掌握了党权。因何键和刘建绪有军务在身，执行委员会之权责由刘岳厚代理，监察委员会由乙派的刘宝书（园艺农学校）代理，至此乙派取代甲派掌控了省党部

权力。

甲派毕竟属于中央派系，是CC（二陈）系在湖南的主要力量，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支持。几年后，刘岳厚受到打压被迫辞去公路局长等本兼各职，何键也被蒋介石调离湖南，甲派复掌了党权。刘岳厚最终参加了1949年程潜的和平起义。

刘岳厚先生为人正直，善恶分明，敢于任事，与先公王惟声教授系忘年之交，他首任公路局长时即聘先公担任机械工程师主管公路局修理总厂（湖南第二大机械厂家）厂长，后省政府任命刘岳厚以公路局长兼湖南机械厂厂长，刘将厂长一职交王惟声代理，从不过问厂务，任其独立代行。

彭国钧先生毕竟是位教育家，办学很有一套，他办的修业农业学校享誉全省。他亲自下实验田劳作，成为佳话。该校所创“修农一号”、“修农二号”改良稻种曾获好评。20世纪50年代初，修业农林专科学校成为湖南农学院的组成部分，其中专部即是长沙农校前身。彭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本可以去台湾的，但他选择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不幸的是，王季范先生（毛泽东的表兄）怀疑其独子被军统特务所害之事与彭国钧有关，致使彭国钧被捕，后虽查明真相，却将他押送回安化原籍。在押送途中，在途经资江时彭国钧投水自溺身亡。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原中共地下工作者刘乐扬在《湖南文史》第48辑署名发文，称当年中共特科指示湖南工作站“设法加深湖南甲、乙两派的矛盾，利用乙派去打击甲派CC”。“组织上规定我的基本任务仍是挑拨甲派和乙派的关系，扩大加深CC及蒋介石与何键的矛盾”。采取以甲派的口吻写文章攻击乙派，又以乙派口吻攻击甲派，把水搅浑，使之矛盾加深。而当年参与争斗的两派，都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历史早已翻过这一页，往事灰飞烟灭。

（作者系湖南中医药大学退休职工）

湖南第一师范师生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

孙海林　王沛清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伟大功绩在于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湖南第一师范是1903年在长沙城南书院的基础上直接建立起来的，正处在这一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从城南书院到湖南第一师范，经历了湖南师范馆、湖南全省师范学堂和中路师范学堂三个阶段。湘中大儒王先谦，既是城南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又是湖南一师第一任校长。1903年2月湖南师范馆正式开学，王先谦为馆长，聘皮锡瑞、周震鳞等为教习。12月，湖南师范馆扩展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11月，又改湖南全省师范学堂为中路师范学堂。其历任监督王先谦、陈树藩、谭延闿、刘人熙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教职员都是当时卓有声誉的教授，如皮锡瑞、马邻翼、陈嘉会、李元植、黎尚雯、仇毅等。在他们的精心治理和教导下，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很多人都参与了辛亥时期的革命运动或立宪运动。1912年，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在城南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师范学校进入了全面实行民主主义教育的历史阶段。开创者是两度任一师校长的孔昭绶。

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叶的一百年里，湖南一师及其前身城南书院、湖南师范馆、湖南全省师范学堂、中路师范学堂，和着时代的节拍与近代湖南前进的步伐，形成了与湖南相一致的6个人才群体，即以贺长龄、贺熙龄、胡林翼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洋务派，以张百熙、戴展诚、皮锡瑞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上述9位代表人物，除左、皮为举人，其他7位均为进士），以黄兴、陈天华、周震鳞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以谭延闿、刘人熙、黎尚雯为代表的立宪派（谭、刘亦为进士），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这些代表人物不仅是湖南一师及其前身城南书院、湖南师范馆、湖南全省师范学堂、中路师范学堂的校长、教员和学生（本文将他们统称为湖南一师和湖南一师师生），而且是近代湖南6个人才群体中的骨干力量，特别是湘军洋务派和新民学会派中的领袖人物。本文专题论述湖南一师师生对辛

亥革命的重要贡献。

一、从华兴会到同盟会的贡献

湖南一师师生曾勇立潮头，积极组织华兴会和同盟会，为辛亥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

黄兴从小受湖湘文化熏陶，亦喜爱武术，22 岁中秀才。他于 19 世纪 90 年代两度在城南书院藏修，旋入武昌两湖书院。1902 年赴日留学，创办《游学译编》，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翌年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1904 年在长沙邀集陈天华、周震鳞等组织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志业口号，筹划长沙起义而未成。1905 年在日本将华兴会与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等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任总理，黄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随即发展革命分子，举行武装起义。

陈天华家境贫寒，但好学不辍，尤酷爱民间说唱弹词。1903 年毕业于湖南师范馆速成第一班，因品学兼优，获官费赴日留学。旋即加入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撰写《猛回头》、《警世钟》两书，用血泪之声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以唤醒国人，奋起救国。鉴于列强喧嚷瓜分中国情势，又啮指血作书数通，寄示湘中学子，要求国人准备死战。血书到湘后，湖南一师师生立志从我做起，培植尚武精神。附小一个 11 岁的小学生亦愤于国难，集合同学进行演说，表达赤忱的爱国之心。长沙各校学生“至以武备为性命”，全省士气激昂。陈天华于 1903 年底回湘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并积极从事演说、著书，其文字多散见于长沙《俚语日报》。因湘中劣绅构陷，《俚语日报》被封，1904 年春陈天华被迫赴日。同年夏，返湘投身华兴会的革命活动，曾往江西策动巡防营反正。长沙起义事泄，脱险转赴上海，与黄兴等合组启明译书局，作为再次起义的秘密机关。又因清政府查禁《猛回头》、《警世钟》甚急，乃于年底第三次渡海赴日。革命屡遭挫折，加之日俄战争爆发，祖国危机严重，陈天华忧心如焚，但反清革命立场更加坚定。1905 年参与建立同盟会，为会章起草人，被选为同盟会本部书记。同盟会创办《民报》，他担任经理兼编辑，曾发表《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政论和时评。在通俗小说《狮子吼》中描绘了“民权村”，为中国未来绘制了一幅美好蓝图。是年冬，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日媒体还对中国留学生进行诋毁攻击，陈天华极为愤慨，于 12 月 8 日在横滨海湾投海自沉，留下《绝命书》，激励同志誓死救国。

除了黄兴、陈天华以外，湖南一师师生加入华兴会和同盟会并进行革命活动的还有周震鳞、颜昌峣、黎尚雯、文斐、文怀亮、石蕴山、杨端六、李剑农、张秉文、周鲠生、傅安经、吉光勋、刘策成、汤增璧、李六如、易培基、彭一湖、黎锦熙等。其中周震鳞不仅是华兴会创始人之一，而且转入同盟会后，一直跟随孙中山、黄兴在广州、上海、湖南、安徽、武昌军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是辛亥革命元老。汤增璧亦与孙中山、黄兴交谊甚笃，1907 年春，他代孙中山吟书《挽刘道一》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黎尚雯于 1907 年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支部，1909 年任湖南咨议局议员，成为立宪派的一员。文斐继于 1910 年在长沙重组同盟会湖南支部，先后被推为会长。

二、从武装起义到民国成立的贡献

湖南一师师生曾前仆后继，为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和民国成立浴血奋战。

1907 年 9 月，黄兴在广西先后发动并指挥了钦州、防州起义，12 月举行了镇南关起义。1908 年 3 月，率领 200 余人在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两万清军周旋月余，激战数十回，大破清军，后弹尽粮绝，以 4 人而御 600 敌军，机智从容地退到越南河内。之后，又发动云南河口等起义，均遭失败。1910 年春，在广州新军中策划起义，再次失败。1911 年 4 月，又在广州发动起义，担任副总指挥，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这次起义牺牲惨重，事后收殓殉难者遗体有 72 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对此，石蕴山愤书一联直抒胸臆：“鲁仲连，义不帝秦，君不爱民民爱国；屈大夫，魂游列楚，生者如死死如生。”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 28 日赶到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在汉口、汉阳苦战 20 余日，退至武昌。接着赶往南京指挥战事，于 12 月 2 日一举攻下南京城。在上海、苏州、杭州相继光复后，被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先后推举为大元帅和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均辞而未赴任。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3 年 7 月，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旋赴美国，但仍积极策动讨袁，与孙中山遥相呼应。1916 年，袁世凯死后回到上海，不久，因积劳成疾，食道与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而逝世。在追悼会上，章太炎所送挽联写道：“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湖南一师师生除了跟随黄兴出生入死者外，还有直接参加武昌起义的陶峙岳（湖南一师附小第一届毕业生，后为解放军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易培基、李六如、周介祹、李钊农、张秉文、傅安经等。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黎尚雯任参议院议员，陈嘉会任陆军部军法局局长、南京留守府秘书长，马邻翼、曹典球分别任教育部首席参事和主事，王达任南京留守府秘书，杨端六任海军陆

战队秘书等。杨端六旋与李钊农、周鲠生、彭一湖等在汉口主办《民国日报》，杨任经理，李所撰写的《武汉革命始末论》于武昌起义后 40 天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热情歌颂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反动。在湖南都督府成立时，谭延闿任省参议院院长（时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后三度主湘，官至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徐特立任省议会副议长，贝允昕任法制院院长，刘人熙任民政司司长（亦为立宪派人物，曾一度主湘，后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陈润霖任学务司司长，周震鳞任筹饷局局长，熊崇煦任图书编译局局长，傅安经任财政厅理财科科长等。特别是易白沙，武昌起义爆发后，安徽宣布独立，因革命武装力量不强，旧军人和流氓乘机捣乱，他组织学生青年军，任一大队军监，率领青年军击毙乱军头目，平息了动乱。旋赴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回国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批孔文章。1919 年著《帝王春秋》一书，孙中山称之"从历史事实，唤起知识阶级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于斧钺矣！"1921 年 2 月，孙中山两次致函谓："弟甚欲得一能文者与共昕夕，以素所怀抱主义政策，见之文章，勒为条教，不审能助我否？"他未遽应。4 月间，只身赴北京，身怀短炮，数日徘徊于新华门前，誓谋杀北京政府首要而未成，他感到绝望，遂于端午节那天在广州蹈海。毛泽东以一师校友会会长身份主持召开了易白沙烈士追悼会，并亲自撰写了大会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三、从"二次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贡献

湖南一师师生曾奋斗不止，从二次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一直践履着孙中山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直接参加"二次革命"即讨袁战役的湖南一师师生有黄兴、周震鳞、易白沙、王达、陈嘉会、黎尚雯等。1913 年 3 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7 月 8 日，孙中山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15 日，黄兴动员江苏都督宣布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蔡锷在云南起义，石蕴山佐刘人熙联桂应滇以反袁，刘派次子仲迈给桂军陆荣廷送信，劝其出兵，与湘军会师武汉。文斐与程潜（早年藏修于城南书院，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也起兵讨袁。王达则按照黄兴的要求，从南京返回长沙，赴各县宣传袁氏叛国罪行，纠合同志起义。易白沙往来于湘皖之间，力劝当政者讨袁。"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因黎元洪依附袁，易培基辞去黎之秘书职务；贝允昕辞去熊希龄政府政治会议议员职务；陈嘉会则推辞袁世凯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自辛亥革命起，孙中山屡经失败，陷入困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给了他

新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列宁的帮助下，他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此期间，陈嘉会投身护国、护法斗争，以护法议员身份，游说湖南都督谭延闿发兵驱逐旧桂系军阀陈炯明，劝说其堂弟陈嘉祐率部进驻韶关，联合粤军，一举击败旧桂系军阀，为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扫除了障碍。唐星于 1921 年任大元帅府第三教导团团长，后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少将副部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五路总指挥部中将参谋长兼独立师师长。马良骥随孙中山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上尉副官、粤军第一师师部上尉副官。

论及辛亥革命，必然要写到毛泽东。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非常高兴，决定退出学校，投笔从戎，立即报名参加了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新军，编入湖南新军第 25 混成协（旅）第 50 标（团）第 1 营左队。1912 年春末，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和议，南北实现"统一"，南京临时政府解散，毛泽东退出新军，继续求学。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与同盟会元老、国文教员汤增璧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36 年他在延安对斯诺回忆说："在这时期中，我的政治观点也开始形成了。一位姓唐的教员（注：应为"汤"，即汤增璧）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1915 年 5 月 7 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长沙，湖南一师全校师生义愤填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声讨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的运动。校长孔昭绶十分同情和支持师生的正义斗争。同盟会元老、国文教员石蕴山赶写了《中日贸易出入额之比较》《救国刍言》等揭露袁氏与日本相勾结、出卖祖国的滔天罪行的文章。毛泽东将石蕴山和其他老师的爱国文章编印成《明耻篇》一书，并在封面上挥笔直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还将汤化农、康有为、梁启超不满时局的文章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书，在校内外赠送。1924 年，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部长兼《政治周报》总编辑。此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继承并完成了孙中山的未竟事业，胜利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发展。

（作者孙海林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王沛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长沙第一次握手

黄祖琳

1922年春，刚满23岁的刘少奇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提前结束学业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经中共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安排，他一方面在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担任理论教员，一方面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等12人。毛泽东在中共建党后即担任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5月改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本应代表湖南出席大会，据说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所以没有出席。刘少奇除了参加大会的服务工作，有时也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的小组会，讨论大会提出的有关决议案。大会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还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会提出了"组织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响亮口号。

这次大会继上年中共成立后再次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大会闭幕以后，陈独秀立即召见了刘少奇。一年前，是陈独秀亲自把刘少奇等人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如今见到刘少奇回来了，而且发现刘少奇等到过莫斯科学习和活动的青年对马克思学说有了深刻的实际的了解，他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股朝气勃勃的活力，所以他很高兴。

由于湖南地区在全国工人运动及党的发展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陈独秀告诉刘少奇，中央决定派他回湖南去，并且指定他参加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工作。接着，陈又把中共二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和其他文件交给刘少奇，让他带给毛泽东。

7月底，刘少奇收拾了行装，背着大捆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书籍和中共二大有关文件，满怀信心地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故乡湖南长沙。他没顾得上回家去看看自已惦记已久的母亲及家中亲友，径直来到位于小吴门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清水塘。他在这里会见了毛泽东。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

了一起。

这是以后在中国的一场伟大变革中携手合作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两位湖南同乡。一个宁乡花明楼人，一个湘潭韶山冲人。两地相距不到30公里——他们原是紧挨着的乡邻。

毛泽东与刘少奇这两位同乡，真是一见如故，刚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毛泽东向刘少奇仔细介绍了湖南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刘少奇也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详情。并且把陈独秀交给他带回湖南的二大文件亲手转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这时不到30岁，比刘少奇大5岁，已经在湖南学生运动中及中共党内小有名气。但是刘少奇却因为不同的奋斗经历，未能在此之前结识这位老兄。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发起成立当时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先进团体——新民学会，这时刘少奇正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后因护法战争爆发，南北军在长沙交战，讲武堂被打散，他不得不独自回家中自学去了。

1919年冬，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了北京，刘少奇也为寻求救国之路在五四运动爆发时比毛泽东早几个月奔向了北京，因此，没有能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也没有参加毛泽东等人在湖南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以后，经勤工俭学的倡导人李石曾等介绍，去了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

但是，1920年夏天，刘少奇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受阻，因而改变为赴俄学习去了，并且在莫科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这一曲折地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1920年在长沙致力于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推动赴俄学习的毛泽东竟然未与所闻！

毛泽东惊异地问："你是怎么去俄国学习的？"

刘少奇回答："我从保定回长沙后，是经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先生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经贺民范介绍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陈独秀和上海外国语学校校长杨明斋，在外国语学校学习了半年，1921年春又通过杨明斋介绍，去了苏俄。"

毛泽东说："那时贺民范已不听话，直到把贺民范从船山学社赶走，我们才能利用船山学社，以后将它改成自修大学。"

原来，贺民范也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1920年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都得到了贺的支持。贺民范当时在

湖南是一位有声望的长者，他历任县知事、省咨议局议员和船山学社社长。俄罗斯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是毛泽东、彭璜。但是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得到各界支持，当时是以贺民范等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挂名的。

船山学社是为纪念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先生而设立的，其宗旨主要是研究和宣讲王夫之的学术思想。王夫之在抗清失败后隐居湖南衡阳老家著书立说达40年之久。其著作达100多种，涉及政法、经济、哲学、文学诸多范围。由后人编成《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358卷。因其隐居地为衡阳石船山，故后人又称其为船山先生。

贺民范这位老先生，既研究船山学术思想，也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前后，他在湖南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青年学生开展反对军阀的斗争。他热情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且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同时在湖南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发展团员的工作。

同时，贺民范与陈独秀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通过陈，他能及时了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共产国际的一些活动，他对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建立等，都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刘少奇等一批青年并没有通过毛泽东而是通过贺民范直接与上海联系去了苏俄。

毛泽东所说的“那时贺已不听话”，是指贺民范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位发起人之间有了分歧，他没能跟上革命的形势的事。但是，1921年8月，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时，贺民范是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同意以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校址，贺也担任了自修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这样，在湖南建党初期经济困难时，能得以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和每年从湖南省政府划拨的400元光洋的经费，并且利用贺的名望，使学校得到社会上的重视，为培养湖南的革命骨干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春，贺民范由于与中共湖南支部的分歧加深，离开自修大学回宝庆当教育局长去了。毛泽东后来聘请自上海回湘的李达担任自修大学校长。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湖南自修大学既是湖南党组织的一个宣传文化阵地，培养党团干部力量的摇篮，也是掩护党组织开展秘密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当时湖南党组织派到各地去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都是自修大学的教职员或学生。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其主要成员及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市学联的负责人都住在这里。毛泽东与杨开慧便是在自修大学结婚的，后来才到清水塘居住。

1922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一批从各地投奔革命的有志青年进

入这里学习，如衡阳三师被无理开除的女生张琼、何宝珍等就是补习班的学员，她们以后都参加了革命。刘少奇与何宝珍就是在这里相识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还当了他俩的结婚介绍人。

中共湘区委员会主要的办公地点，就是自修大学、文化书社和清水塘22号租用的一所房子。书记毛泽东来往于这三个办公地点。何叔衡任自修大学补习班主事；易礼容任文化书社经理；李立三、郭亮主要负责工人运动，不常住长沙。

刘少奇从上海来到长沙，正是贺民范离开自修大学不久，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刚刚创办的时候。刘少奇既参加中共湘区区委的领导工作，同时，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成员。分部主任是毛泽东。不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与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无分开办事的机构，是两套班子合在一起的。这与上海中共中央的情况不同。

这时候，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属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主要在一部分著名的中等学校和部分工厂有所发展。如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高等专科学校、衡阳的第三师范等；工矿业中有粤汉路新河车站、常宁水口山铅锌矿、长沙泥木工厂等，共几十个中共党员。此外，在江西省的萍乡安源煤矿也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十多人。

萍乡矿地处湘赣边境，与湖南株洲相距很近，而江西尚未建立共产党的区委会。所以安源也归属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而且是这个地区党员发展最多的一个基层党的组织。毛泽东曾于1921—1922年9月，四次到安源调查研究和开展党的工作。随着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以后安源不但在湘区范围，而且在全国工人运动发展中都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时候，安源党组织的工作主要由李立三具体负责。

湖南省并非工业发达、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主要有集中于省会长沙的纺织业工人，集中于岳阳、长沙、株洲的粤汉铁路工人，以及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新化锡矿山工人和与江西邻界的萍乡安源煤矿工人，合计约4万多人。由于湖南的共产党、青年团及其他爱国团体发展得早，这里的工人很快觉醒起来，罢工斗争此起彼伏。

眼看着湖南的工人运动如同一堆干柴，即将熊熊燃烧起来，毛泽东正愁缺少领导力量，中共中央把刘少奇这位刚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马列新秀派回湖南，毛泽东真是喜出望外。

以后，刘少奇又多次在清水塘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会议。何叔衡、李六如、李立三、郭亮、易礼容等湖南党组织及工运领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形成了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下属几个分部中最强有力的领导工运的阵营。湖南

的工人运动也就在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享有了显著的地位。

毛泽东安排刘少奇在湖南自修大学住下，刘少奇匆匆赶回老家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一趟后，便全身心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工运，协助毛泽东领导在长沙几乎全面爆发起来的工人罢工斗争。

自1922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与李立三、刘少奇、郭亮、何叔衡等携手合作，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岳阳3000余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长沙1500多织造业工人罢工，6000多名泥木工人的罢工和安源路矿17000余煤矿工人大罢工。毛泽东坐镇长沙指挥，郭亮、何叔衡赴岳阳，李立三、刘少奇赴安源，一时湖南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最耀眼的地方，也是全国工运领袖产生最多的地方。刘少奇这位24岁的青年，就是在领导安源大罢工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并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鲜为人知的《中央日报》“芷江版”

蒋国经　蔡新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原驻芷江的国民党陆军第15师王东原部奉命开赴战场，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1938年武汉紧张，航空第九总站与航空机械修理第二工厂迁来芷江。武汉沦陷不久，长沙大火，又有一些国民党中央机关陆续迁来芷江。一时间，驻芷江的党、政、军、学校等机构达60余个，县城人口达10余万人。地处湘西边陲的芷江，竟成为抗日大后方的军事、政治、文化重镇，于是芷江镇被人们称为“小南京”。

1939年的中秋节，芷江县怀化乡（今怀化市泸阳镇一带）发生了一起规模较大的农民暴动事件，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对农民暴动进行了血腥镇压。贵阳《中央日报》记者房沧浪专程赶来芷江，亲赴榆树湾对仅存的几十名参加暴动的农民进行所谓训话，极力诋毁暴动农民的义举，颂扬宪兵之功德，并把现场拍成照片，由房沧浪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通讯报道，连同照片刊于贵阳《中央日报》，以此邀宠于谷正伦。是时，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绥靖公署已经成立，谷正伦兼主任，而谷正伦采取的这一切措施正需报纸为之宣传。房沧浪原系《武汉日报》记者。武汉沦陷，房落敌手，后辗转逃至香港，写了一本《倭营历险记》付梓，广泛发行。因而房沧浪在国内新闻界颇有名声，跻入范长江、孟秋江、徐盈、彭子冈之列。谷正伦自然需要这样的人为他卖力。于是两人沆瀣一气在芷江设立贵阳《中央日报》芷江分社，出版《中央日报》“芷江版”（以下简称“芷江版”）对开报纸一大张，于1940年2月2日正式创刊。

这张报纸分四大版：第一大版为刊头，其余部分全登广告；第二版是国内新闻、社论或专论；第三版上半刊国际电讯，下半为四省边区各县新闻；第四版上半为副刊，下半是其他专栏。国内外新闻采用中央通讯社电讯，社论和专论大都用总社或重庆《中央日报》稿。省县通讯除特约稿外，其余均由各地通讯员采访编写。整张报纸全部都是在国民党中央的统一口径的指导下，在蒋介石极力鼓吹的“国家至上”的意蕴支配下的官样文章，没有丝毫开明进步的气味。正因如此，

从1942年艾从接编副刊起，却出了一个意外。

“芷江版”副刊《新路》为日刊，平常登载的是一些所谓堂堂正正、粉饰太平或攻讦异端、造谣欺骗的文章。艾从接编后，立意要从这儿打开一扇窗口，放进一些新鲜自由的空气。一年时间里，《新路》中的文章，除艾从自己经常撰写灼热精辟、针砭时事的精短杂文外，其他稿件多是一些心灵的投影、人品的流露。有诗歌、有散文，间或也有篇幅较长的通讯报道，风格一如当时桂林《力报》聂绀弩负责的副刊。这些作品决非仅凭技巧或手法可以造作出来的。每半月出刊的文学园地也扩大到了一个整版，无论是小说、戏剧或者诗歌，有苦难的倾诉，有悲愤的叫号；或嬉笑怒骂，或婉曲臧否，均是刻骨镂心之作。曾有不少针对御用文人王平陵、报痞罗心冰，以及沅陵《国民日报》副刊歪曲鲁迅先生，贬低进步的抗战文学，提倡写风花雪月，吹捧汉奸文学《野玫瑰》等等荒谬言论，约定专人写稿，辟专栏刊出，对其痛加驳斥。由于真理在手，因而所战皆捷。同时不定期地刊出儿童文学、妇女问题、诗歌、抗战戏剧等专栏，深受读者欢迎。有人曾说：“想不到荒凉的沙漠里出现了一片绿洲！”

“芷江版”副刊编出了特色，自然归功于艾从和他团结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报业人士，如任荩、依明、静飞、汉平、张英等，而这些人又都是“芷江版”编辑部所属各部门的骨干。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明，不谋私利，不图发迹，有着“新闻从业者应该是一个清高的人”的信念。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中央社播发了长篇新闻，诬蔑新四军为“叛逆”、“误国”，把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军队的“围剿”冠冕堂皇地说成是“讨逆”，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电台收到这份分量不轻的电讯稿已是凌晨4点，新闻编辑张英看完后，唯一感觉是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按这张报纸性质，这份电讯应发头条，用特号字标题，并撰写社论，阐述国民党中央的主张。然而，张英没有这样处理，他首先不让总编辑知道，拟好标题后立即发排，于报纸二版左下角仅用四栏位置刊出。次日房沧浪见报后，暴跳如雷，拍桌打椅，追查责任。结果由总编辑出面一肩扛过了事。

御用的《中央日报》“芷江版”允许出现上述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房沧浪依附谷正伦创办了这张报纸，根本意图是借此作为进身之阶。宪兵司令部西迁重庆后不久，谷正伦调任甘肃省主席，四省边署主任一职由毛炳文接管。毛既庸碌，又吝钱财，对“芷江版”不再予以经济支持。而贵阳总社除经费稍有补贴外，平时也很少过问“芷江版”。此时的房沧浪已转而投向湖南省主席薛岳，其精力早已不放在“芷江版”上。第二，房沧浪创办这张报纸，仅经理李某是其

小同乡兼有私谊，其余人员纯系东拼西凑。编辑部（包括资料室，外勤组）仅10人左右。房沧浪能控制的只有总编辑一人，其余均不听他的话。这张报纸的出版，而且能立足于社会，编辑部人员掌握着左右权。他们地位不高，待遇菲薄，但心甘情愿。房沧浪对待这些人怀柔唯恐不及，岂敢开罪他们。因为房沧浪的口袋里再也掏不出钱来找一些像样的人来。第三，总编个人的打算是：紧跟房沧浪出头之日不多，作为《中央日报》的总编，算是二号人物，要想坐稳这张金交椅，必须依靠手下的一班人马。一张报纸办得怎么样，副刊发挥着特殊作用。报纸出了名，首先是总编脸上有光，在当时博得进步名声，也是一种殊荣。因此他对编辑人员也是依赖得多，干预得极少。每逢新闻的编排，副刊文章的违禁，总编大致能在房沧浪面前为之说项，使大事化小，正因为如此，艾从才能在夹缝中以文会友，利用副刊《新路》结识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形成一个较为进步的文化圈，为抗日战争做了一定的宣传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国民党军政的窳败。这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1942年总社社长王亚明来芷江视察，不能不在全社人员大会上含混地指出某些人的报风不正，不能为党国效力；认为今后凡是《中央日报》任职人员，必须是国民党员，否则解职。

在那万马齐喑的年月，虽说“芷江版”副刊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便是二厂砸报社。整个过程是：

航空机械修理第二工厂（以下简称“二厂”）从武汉迁芷江后，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每逢星期天上演京剧。1942年，学习戏剧的张慧负责执导演出了不少好的话剧，在观众中起到一定的影响。此时，恰好贵阳总社派来一名记者贾亦棣，是国立戏剧专科毕业生。贾为了显示自己比张慧高一筹，对二厂公演的话剧进行百般挑剔，利用他在“芷江版”编的戏剧月刊专栏，撰文对二厂的公演评头品足，因而生隙。当时编辑部同仁如能及时发觉这样做实不利于抗战大纛下团结大多数，制止感情用事，不被贾所利用，情况或许要好些。无奈认识短浅，大家都不明确这个道理，反而跟贾一道投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斗争：当二厂上演某一剧目时，同意贾用出专刊的办法，组织人员从剧本内容、演出技巧、灯光布景到服装道具等进行挑剔式的批评，几乎是对演出持否定态度，于是激怒了对方，加上该厂政治指导员孔庆桐原是青皮出身，不学无术，以往他多次撰写自我吹嘘的文章，均被编辑部拒绝刊登，因此记恨在心，借此机会，孔瞒过厂长，率领几个打手冲进报社，捣毁会议厅陈设，殴伤记者依明。报社因而停刊三天，以示抗议。后在两湖监察使苗培成的调解下，孔被记过了事。

“芷江版”出刊至1943年秋，任荩、艾从、汉平、静飞等人先后离开，副刊《新

路》质量迅速下降，报社的经济情况也拮据异常。这张报纸于房沧浪而言成了“鸡肋”。他曾奔赴兰州，另谋蹊径未果。“芷江版”勉强拖到1944年1月，房沧浪从总社拿到一笔遣散费，宣告《中央日报》“芷江版”于1月底停刊。

出版了整4年的“芷江版”，于临近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于湘桂线激战前夜急需鼓励士气的时刻竟然消失了。

（作者单位：芷江县政协文史委）

湖南大学在辰溪

张必津　欧维湘

湖南大学素有“千年学府”之称。学校建校以来，校址设在长沙河西风景如画的岳麓山，她的前身就是北宋开宝九年（976）创办的“岳麓书院”，“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从书院到高等学府，这里学脉绵延，弦歌不辍。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大学及云麓中学，奉令搬迁边远的湘西辰溪，在辰溪对河龙头垴办学近八年时间。日机轰炸迫使湖南大学尽早西迁。虽然辰溪分校校舍尚未修建，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但湖大师生不得不仓促就道。

一

1938年7月，日寇侵华的战火已逼近湖南，省会长沙机关学校纷纷搬迁，湖南大学奉令迁辰溪，校本部组织迁校委员会，主持学校西迁事宜。该年9月，时任该校教务长的任凯南和唐艺青、蔺传新两教授赴辰溪筹建。任教务长等到辰后，在辰溪县城租房设办事处，马不停蹄地进行紧张的筹建工作：于县城对河龙头垴购买大片土地和民房，为迁校奠定基础；派员到洪江采购木材，聘请工匠开始校舍建设。短短的时间，名不见经传的辰溪龙头垴，成为抗战时期后方的大学城，鱼鳞式的木板房，成为辰溪一道风景。湖南大学和云麓中学西迁辰溪后，使封闭落后的山城辰溪一度繁荣，并萌发了生机。龙头垴还建了一条商业街，有南杂店，有饮食店，有肉案，每天行人不断，生意兴隆，节假日沅江中的小舟载着湖大师生，来往于大路口和中南门码头。湖大在辰溪办校给辰溪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12月，湖南大学在辰溪城对河龙头垴正式开课。龙头垴有山、有水、有树、有宽阔的平地，依山傍水，山水兼美的地理环境十分理想，是办学的好地方。湖大在辰溪期间，皮宗石、胡庶华、李毓尧先后任校长。在日机轰炸声中，湖大师生历尽艰辛，西迁辰溪，但始终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执着前进。西迁时湖大有教授46人、讲师17人、助教19人、体育军训教师5人、学生535人。加上职员、工人及家属，学校总人数超过1000人。湖大西迁非常艰辛，师生坐着大帆船，告别岳麓山，告别省会长沙，风餐露宿，一路颠簸，一路歌唱，显示在

国家和民族危难中，大学生的高昂斗志与爱国情怀。辰溪籍学生向绍彦、田盛德、杨长耀、米西成、张邦英、刘润林、肖守训、刘中流、米仁治、赵志、刘景先、谢申复等，就是湖大在辰溪期间先后入学的。湖大迁辰之后，有较大的发展，师生员工都有增加，到 1945 年 3 月，湖大师生员工及家属达两千多人。

湖大辰溪分校，至 1941 年 3 月，建成大教室两栋，乙种小教室 1 栋，丙种教室 3 栋，学生宿舍 7 栋，教职员工宿舍 21 栋，工人宿舍 4 栋，心理试验室 1 栋，化学试验室 3 栋，无线电试验室 2 栋，机械陈列室 1 栋，机械储藏室 1 栋，翻砂厂 1 栋，煤气室 1 栋，材料试验室 1 栋，厨房 1 栋，教师食堂 1 栋，学生食堂 1 栋，行政办公室 1 栋，大礼堂 1 栋……总计建成各种用房 104 栋。

1939 年 10 月和 1940 年 10 月，日机出动飞机 9 架，侵入龙头垴上空，投弹轰炸，炸毁校区部分建筑，炸死著名体育教授王润生。学校为使师生在日机侵袭下，保证生命安全，为此大力进行防空设备的建设。学校挖掘能容五百余人的大隧道一座；又挖筑防空洞二十余个。这些防空洞都修造得非常坚固，这些防空洞，现在已成为辰溪的抗战文物。学校为防图书受损，还在距校本部三华里之锦滨乡蛇会建书库四栋。四栋书库建在蛇会山谷丛林中，有苍松翠柏的掩隐，日机无法发现目标，书库平安无事。

湖大修建的体育场，建在开塘坪，占地 18 亩。此处土地肥沃，是当地人的棉花地，为支持湖大建校，当地人无条件卖给学校。湖大体育场内有 300 米跑道和 200 米直道，并建有 8 个篮球场，建有排球场，还有十余个沙坑。湖大在辰溪所建的体育场，在旧时代是罕见的。1943 年辰溪县第三届体育运动会在湖大体育场举行，在湖南大学校长和体育主任的支持下，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平，振奋了民族精神。运动会期间，真是人如潮，旗如海，运动员有成人，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观众上万人，盛况空前。在民国时期辰溪和大湘西，举办这样大型的体育运动会，是史无前例的。

二

湖南大学是中国知名大学之一，集聚了中华民族的精英，有一批热血爱国青年，因而成为辰溪抗日救亡的龙头。湖大在西迁辰溪前，已建立中共党的支部，直接领导抗日救亡的民族先锋队。这个组织是秘密活动，对外不公开。学校还成立了公开的“明日社”组织，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把抗日救亡活动推向高潮。湖大迁辰后，“明日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数已有四五十人，其负责人为向光连、陶承鞠、汪亚青，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湖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民族先锋队的具体组织下，湖大抗日救亡活动

搞得有声有色。湖大的抗日救亡活动，让辰溪广大民众了解了抗战形势，让他们清楚知道，一个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是没有世外桃源的，守土卫国，人人有责。1940 年，原中共中央青委委员胡乔木在中共湘西工委负责人的陪同下，秘密视察了湖南大学。胡乔木在湖大感受到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对湖大抗日救亡活动，给予较高评价。

湖大学生在校学生会的组织和领导下，于 1939 年元旦举行劳军活动，为抗日士兵代写书信，女学生还为抗日士兵们缝补军衣。1940 年 1 月，学校师生为前方抗日将士征募寒衣，汇出 1000 元；女同学也在城乡募捐及宣传防空知识，受到农民的欢迎，她们募捐来 500 元，用来救济难民。同学们经常到学校附近村庄，宣传抗日救亡，他们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用抗日的严峻形势告诉人民，坐井观天之人是不能成大事的。辰溪锦滨乡龙头垴、花塘坪等地的老人，常回忆湖大在辰溪时期湖大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湖大学生自治会抗敌后援会为响应献机运动，举办“青年号献机”募捐，在校内募得 470 多元，如数交校会计室上缴。政治系同学绘制了国家形势图及湘北会战图，张贴于辰溪街道各要冲处，让闭塞的辰溪人民清醒地知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44 年 10 月，湖南大学一批爱国学生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走上抗日前线。

湖大学生自治会组织歌咏戏剧队，排练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古城怒吼》、《重逢》、《苗可秀》、《凤凰城》……抗日戏剧把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勇敢机智场面再现在大后方的舞台上。这些抗日话剧，于 1941 年，先后在辰溪和沅陵县城公演。抗日宣传鼓民心，戏剧演出留美名。一首歌、一出戏，莫不表达湖大学生赤诚的爱国之心。由于演出的节目，文艺性和思想性都很强，故演出时观众如云。湖大学生演出大型话剧《雷雨》，公演所得之款，除去开支，尚余 2000 多元，均邮汇征募总会，做慰问前方将士之用。湖大的抗日救亡活动，照亮了山区人民的眼睛，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湖大在辰溪和湘西的抗日救亡活动，功不可没，千秋难忘。

三

湖大在辰溪期间，曾爆发一场大的学潮，并且震惊重庆国民党中枢，因而国民党动用了驻辰宪兵和军队进行武装弹压。1940 年 9 月，皮宗石校长辞职，由胡庶华再返湖大接任校长。皮宗石在师生中口碑颇佳，为人开明，学识渊博，在校礼延诸师，关怀学生，治校业绩卓著，声誉远扬。胡庶华为我国著名钢铁博士，他主校以昌明学术，兴起人才为指针，因而湖大一片生气，办出了成绩。1943 年

8月，胡庶华辞去校长职务，教育部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毓尧继任湖大校长。

李毓尧其人，湖大师生是非常清楚的，他曾任湖大工学院院长，在任期内就在师生中留下不好的印象，离任后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要人，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在长沙曾经弹压过学生运动，学生对他恨之入骨。胡庶华辞职不久，当一宣布李毓尧接任湖大校长后，立即遭到湖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自发地掀起了“驱李护校”运动。1944年1月5日，工学院率先发出声讨李毓尧檄文，檄文义正词严，语言犀利。两天后的1月7日，群情激愤，全校响应，并召开了“国立湖南大学驱李护校同学大会”，决定即日起“请假待命”（罢课）。为扩大影响，大会还印发了“驱李护校”快邮代电，飞向全国各地。湖大的学潮，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的谈资。

同年1月28日，教育部令督学黄龙先偕李毓尧赴辰溪处理湖大学潮。李毓尧害怕湖大声势浩大的学潮，不敢贸然进入湖大，住在辰溪县城，督学黄龙先无奈只好自己过河进校。黄龙先到湖大后诡称李毓尧已辞职，骗取学生“即日销假上课”，但此招不灵，无功而返。为弹压湖大学潮，让李毓尧顺利到职，国民党重庆中央政府令驻辰独立第三十二旅、宪兵十团官兵百余，荷枪实弹两次武装护送李毓尧进校，并传讯“驱李护校”负责人，校方并对吴子佩等34名学生分别给予停学处分。

5月7日，特务学生刘胜涛等5人纵火烧了注册组和一间教室，并嫁祸于“驱李护校”的学生。5月24日，沅陵区警备司令王敬斋，独立第三十二旅旅长袁德胜，率荷枪实弹武装队伍开到湖大，当众公布蒋介石手令：“查湖大风潮，延续数月，近更变本加厉，绑架同学，纵火烧屋，捣毁仪器……”国民党当局，把纵火罪强加给学生。随之命令77名学生到三十二旅旅部接受审讯，与此同时，学校宣布对76位同学分别给予开除、退学、停学处分。李毓尧再次进校后，解聘4位教授，即：矿冶所主任周则岳、法律系主任李祖荫、矿冶系主任黄国瀛、政治系主任伍薏农；勒令82位同学限期离校，此举，使湖南大学充满恐怖。

在独立第三十二旅受审讯的77名学生，先后释放了29人，其余48人被押送至芷江，由宪兵第十团看守。在看守所期间，周桢、廖谦英因疾病和受折磨而死。湖南大学同学于该年8月底，为周、廖两同学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追悼会，附近部分农民也赶来参加，表达对湖大“驱李护校”的支持。在芷江看守期间，另有10名同学保外就医，其余36位同学于9月转送洪江“战时青年训练团”受训。周桢、廖谦英两位同学就安葬在龙头垴的小丘，现在他俩的坟茔尚存。

湖大“驱李护校”风暴，尽管受到武装弹压和政治威胁，学生并没有被吓倒，

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对此国民党军政当局也无可奈何。1944年8月，李毓尧被迫离职，不久受湖大师生爱戴的胡庶华再度接任校长。1945年1月，胡庶华郑重宣布，因“驱李护校”受到各种处分的同学全部回校复课。被关押在洪江“战时青年训练团”的同学，亦于当年3月返校。至此宣告湖大“驱李护校”运动的胜利。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无线电波传到辰溪山城，传到龙头垴大学城，两地鞭炮声真是惊天动地，数里可闻。同年9月2日，湖大校长胡庶华赴重庆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复员善后会议，部署抗战胜利后大学善后工作，会议决定湖大即行迁返省会长沙市岳麓山。胡庶华返校后立即成立学校复员委员会，由辰溪籍教授向绍轩任主任委员，钟伯谦、熊正理、唐艺青等14人为委员，负责复员迁校工作。向绍轩先生办事认真，胡庶华曾评价向先生“高树标格于时贤”，因而学校把复员返校这一重任交给他。

湖大复员迁校工作，从1945年10月开始，由于交通不便，运输任务重，故到1946年1月才全部搬迁完成，历时5个月时间。整个搬迁，共迁运公物约1500吨，私人行李1567吨；迁回教职员工214人，家属726人。在辰溪生活几年时间，湖大师生自然对这片土地有了感情，离开时也是依依不舍，这里有他们的艰辛，有他们的欢乐，有他们的斗争。

（作者系辰溪县政协文史委委员）

白鹤泉与白鹤泉碑

胡滔滔

白鹤泉位于岳麓山麓山寺观音阁右侧的岩石下，此处系清风峡口至响鼓岭峰顶这一大裂隙的中段。因山上树木茂盛，丰富的地下水经沙岩滤泄至此涌出，源源不断，清澈透明，甘甜清凉，无论冬夏从不枯竭。明代《岳麓书院志》说："泉出石中，甘洁不涸。"又说："常有白鹤飞止石巅。"清代《新修岳麓书院志》也说："泉出石中，甘冽绝伦，尝有白鹤守之，刻石记其上。"故称为白鹤泉。古人称此泉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缩经旱潦不异"，意思是说泉水温度随冬夏而变化，夏凉冬暖；而水的流量不因旱季和雨季而发生影响，保持均衡。所以古人称白鹤泉为岳麓山第一芳泉，当地老百姓称它为"灵水"。因泉水味佳，历代麓山寺僧都以它为饮用水，市人旅者来此品饮者也不少。而文人墨客，在饮水之余有感于泉水之妙，又多以诗词记之。其中较有名的有北宋赵忭的《白鹤泉》、南宋张栻的《和石通判酌白鹤泉》、清代张九镒的《白鹤泉》等。

历代人士对白鹤泉爱护有加，精心修筑泉台，加以呵护。清光绪三年（1877），湖南粮道夏献云，在泉台上筑亭，并竖白鹤泉碑，上刻张栻《和石通判酌白鹤泉》、《清风峡》、《兰涧》、《石濑》，朱熹诗《兰涧》、《石濑》及夏献云跋文，书者为杨翰。抗日战争中亭被炸毁，今亭为1956年重修，碧瓦朱楹，清丽雅致，亭内绘有白鹤图，倒影水中，仿佛真的一般。石碑仍位于泉台上，诗文均清晰可辨。此碑高二米二，宽零点八四米，碑额"白鹤泉碑"四字为隶书，诗句和题跋为直行楷书，十四行，三百六十八字：

谈天终日口澜翻，来乞清泉醒舌根。满座松声间金石（《岳麓志》作开节奏），微澜鹤影漾瑶琨。淡中知味谁三咽，妙处相期岂一樽。有本自应来不竭，滥觞端可验龙门。（张栻和石通判酌白鹤泉诗）

扶疏古木矗危梯，开始如今几摄提。还有石桥容客座，仰看兰若与云齐。风生阴壑方鸣籁，日烈尘寰正望霓。从此上山君努力，瘦藤今日得同携。（张子憩清风峡诗）

艺兰北涧侧，涧曲风纡徐，愿言植根固，芬芳常慰予。（张栻兰涧诗）

流泉自清泻，触石短长鸣，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张栻石濑诗）

光风浮碧涧，兰杜日猗猗，竟岁无人采，含薰只自知。（朱熹和兰涧诗）

疏此竹下渠，濑彼涧中石，春馆绕寒声，秋空动澄碧。（朱熹和石濑诗）

岳麓志白鹤泉出清风峡，甘冽冬夏不竭，宋儒张子有酌白鹤泉、憩清风峡诗，又与朱子城南唱和，有兰涧石濑诗，献云筑亭其上，爰录二夫子诗镌于石，非但备名山胜事，亦欲使游者景仰前贤云。

光绪三年岁在丁丑仲秋月。

兼署湖南提刑按察使督理粮储道新建夏献云谨跋。

前湖南辰永沅靖兵备道翰林院编修新城杨翰谨书。

"白鹤泉碑"的"鹤"少了一个"鸟"，这是书法艺术的一种表现，却附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原来白鹤泉的泉水之所以如此甘甜清凉，喝了可以延年益寿，是因为有两只仙鹤日夜守护在泉旁。当时长沙王把它当成长寿的神水，每日派遣侍从渡江背水，供其饮用。一日背水侍从舟到江中，突遇狂风暴雨，装水的水罐被打翻，泉水点滴无存。侍从十分着急，恐怕误了长沙王饮水的时间，便取了湘江的水回宫复命。长沙王在喝水时不见白鹤飞舞，欲以欺君之罪杀害侍从。仙鹤得知此事，感愤暴君的残忍，飞走了。从此，白鹤泉旁不再有双鹤守候，泉水也没有以前那么灵验了。后人在立碑的时候有意将"鹤"字少写了个"鸟"，以示"鸟"飞走了。

白鹤泉另有一石刻，系吴大澂在湖南巡抚任内留题。

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为避清穆宗讳改名，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白云山樵、愙斋、郑龛、白云病叟。江苏吴县人。任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左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官。

吴大澂在湖南巡抚任内，留题石刻最多，光绪十八年（1892）莅任，是年重九，登岳麓山，访白鹤泉，作经名刻石，此碑为篆文，原物已不存，1985年由武汉古籍出版社加以影印，作为篆文结帖存世。

吴氏篆书《白鹤泉铭》是吴氏留湘石刻的第一件。碑文如下：

光绪十有八年，岁在壬辰，九月九日，抚湘使者吴县吴大澂率同僚来登岳麓访白鹤泉饮之而甘，乃为铭曰：

在山饮山泉，出山饮湘水。水自山中来，云自山中起。白云挟飞泉，化作满江雨，雨天下，从此始。

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几次湖南之行

钟启河　姚晓菲

第一次来湖南（1938.10.25—1938.11.30）

1938 年 10 月 24 日晚，武汉沦陷的前夕，蒋介石、宋美龄及随从人员乘专机由汉口飞衡阳，但飞机起飞不久就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折回汉口。25 日晨（当日下午日军即进入武汉），专机再向南飞，旋在衡阳降落。蒋、宋改乘汽车到南岳，住磨镜台（蒋的临时统帅部官邸）。

在武汉期间，宋美龄除了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外，还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会长、“全国妇女慰劳前方将士总会”会长、“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会”指导长诸多头衔。但当时她最重要的工作是救护“难童”和培训妇女干部。日军侵华后，从各沦陷区逃到武汉的难童成千上万计，宋美龄整天为难童的衣、食、住等事务张罗。后来，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蒋夫人组织一个妇女委员会从各战区收容了一火车一火车饿得半死、破衣烂衫的孤儿，让他们吃得饱饱，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整洁的蓝衣服，排着队登上船，撤向后方。”要办事，办好事，就要有得力干部，宋美龄的“妇指会”吸收了不少进步人士参加工作，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任指导会联络委员会主任；“救国会”女领袖之一、《妇女生活》杂志编辑沈兹九任文化组长；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刘清扬（她曾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指导会训练组组长、儿童保育会常任理事等。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兼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对宋美龄说：刘清扬是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按：大革命失败后，因种种原因，刘脱离了组织生活，但仍积极从事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不能让她来训练干部。可是宋美龄没有听陈立夫的话，她委派刘清扬在武汉开办了两期战时妇女干部培训班，学员大部分是武汉的小学教员及从沦陷区逃亡来的女知识青年。刘受命后吸收了一批由平、津各大学南下，曾领导“一二·九”运动的优秀学生干部担任教职员，把培训班办得有声有色。宋美龄甚为满意，对刘清扬也很信任[1]。

武汉撤退时，这两期培训班学员（第 1 期 47 人，第 2 期 77 人，共 124 人）及教职员，根据宋美龄的指示，先期乘船到长沙，宋美龄抵长沙后，把她们分派到常德、沅陵、芷江、衡山、衡阳、祁阳、零陵、东安等县实习（学员要实习及格才能毕业）。培训班教员及学员均由指导会战地服务组组长陈逸云（广东东莞人，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先后任上海市妇运会主席、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和刘清扬负责领导。有一次陈逸云对宋美龄说，教员郭见恩（清华大学文学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的名字叫郭建，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在零陵对外宣传时领头唱《国际歌》，又说郭见恩是共产党员。宋美龄乃派她的英籍顾问牧恩波赴零陵调查，牧恩波到零陵后向教会中的外国人及群众了解情况，都反映郭见恩吃苦耐劳，率领学员积极宣传抗日爱国思想，鼓励人民生产、学习，搞好卫生，带好孩子，很受群众欢迎。由此，零陵群众对蒋夫人也更加敬佩了。牧恩波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宋美龄汇报。宋美龄对陈逸云的欠实之词，不予理会，对刘清扬、郭见恩等信任依旧[2]。1938 年 11 月 7 日，蒋介石由南岳官邸赴长沙主持高级将领会议，宋美龄随行。翌日，日本飞机猛烈轰炸衡山，炸死炸伤居民数百人（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都驻在南岳、衡阳、衡山一带，故日机常来轰炸）。宋美龄派往衡山实习的培训班学员 14 人正在衡山钟楼旁的一间屋子里开会，遭遇日机轰炸。学员胡鸣福、陶依云、吕纯及国民党衡山县党部的熊总干事被炸死。消息传到长沙，宋美龄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紧急会议，决定派牧恩波和指导委员会的杨秘书长及刘清扬三人前往衡山办理善后事宜。当晚 8 时，三人同乘一部红十字会的卡车从长沙出发，半夜 2 时到达衡山。翌晨，他们雇人将 4 位殉难者遗体葬于衡山城南外的君子峰下，然后率领在衡山的全体学员到墓地为殉难者举行告别仪式。随后又顺便收容了一批前日被日机炸伤仍未得到救护的人，随车带回长沙医治，连夜赶回长沙向宋美龄复命[3]。这不仅说明宋美龄对她的学员是十分重视的，而且也说明在宋美龄影响下，她身边的干部对苦难的普通老百姓也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

11 月 11 日，蒋介石由长沙乘火车赴韶关视察，宋美龄随行。12 日晨，火车抵郴州，蒋、宋下车巡视郴州城，下午蒋、宋由郴州乘汽车经良田、宜章至坪石，再改乘火车至韶关。13、14 两日，蒋介石在韶关召集余汉谋、吴铁城、白崇禧指示机宜，决定以第四战区序列，阻遏日军打通粤汉铁路的企图。13 日韶关与长沙电话终日不通。翌日据报长沙发生大火，蒋、宋遂于 15 日下午急忙由韶关起程返湘。16 日上午抵南岳官邸，急忙召集有关军政人员询问有关长沙大火情况，初步确定了对长沙大火肇事人员的处理。下午 5 时又由南岳乘汽车赶赴长沙。蒋介石

在长沙巡视一周，目睹长沙大火后的惨状，乃下令组织军法会审，以“渎职殃民”罪，判处大火直接责任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市警察局局长文重孚、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死刑。酆悌被拘捕后曾写信向宋美龄求援（因酆系黄埔一期毕业生，曾任力行社书记，侍从室组长，为蒋得意的学生，与宋美龄关系亦良好），但对这起严重事件，宋亦未徇私情而有所表示。20日下午蒋、宋由长沙返南岳官邸。11月25—28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有江南各战区军政长官出席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抗战第一期作战得失，拟订第二期作战方针。会议结束后，蒋、宋于30日下午，由南岳乘汽车至衡阳，改乘火车至桂林，再从桂林乘飞机去重庆。大本营遂由南岳迁往重庆。

自武汉沦陷宋美龄随蒋介石来湘，至11月30日离南岳去重庆，共在湖南停留36天。在湘期间，宋美龄的主要工作是到各处伤兵医院视察并慰问伤员，向伤员详细询问对院方在治疗和服务方面的意见，然后向院方提出改进意见。另外就是指导“难童”安置。在南岳期间，曾陪同蒋介石游览了南岳名胜麻姑桥、半山庵、祝融峰、南台寺、三生塔、圣经学校、藏经殿等处。

1939年9月18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首先在赣西北和湘北新墙河一带展开激烈战斗。至9月下旬，会战进入紧要关头，日军前锋已分别挺进至长沙外围的桥头驿、上杉市、永安市等处，长沙告急。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赴渌口（今株洲县城）协助薛岳指挥。陈、白到渌口后根据蒋介石的意见，一夜间九次电话劝薛岳从长沙撤退。薛岳认为日军在赣西和新墙河已遭到重大消耗，进到长沙近郊又遭我军伏击，湘北道路已被我军民破坏，日军已成为无补给的部队，必不能持久。我军虽被迫撤退，但士气仍然旺盛，故必须坚守长沙，迫使日军撤退。宋美龄获悉薛岳与陈诚、白崇禧意见有分歧，即于当日（9月25日）深夜自重庆挂长途电话给薛岳，详细询问情况，薛岳向宋美龄汇报不退出长沙的五点理由，通话近1小时。宋美龄向蒋介石转达薛岳的意见，蒋乃同意薛坚守长沙的意见。9月30日，日军因孤军深入，粮弹不继，仓皇撤退。薛岳乘胜追击，会战取得胜利。宋美龄参与军略，一时传为佳话。

第二次来湖南（1939.10.29—1939.11.05）

为检讨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得失，蒋介石决定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10月28日，蒋介石、宋美龄由重庆飞桂林，转乘火车至衡阳，于29日晨至南岳。10月29日下午至11月5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宋美龄则于11月2日和3日，分别前往衡阳和邵阳各医院慰劳负伤官兵，按宋美龄的说法是，她与蒋“各有分工”。11月5日上午10时，蒋介石、宋美龄由南岳去衡阳乘火车

去桂林，行至祁阳境内，因日机轰炸祁阳城，蒋、宋乃在黎家坪下车，蒋入城视察了解祁阳被炸情况，宋则在附近医院慰劳伤病员。当蒋获悉祁阳虽遭日机轰炸，但损失轻微，乃偕宋美龄等登车去桂林飞重庆。

第三次来湖南（1941.10.07—1941.10.22）

1941年9月17日至10月8日，中日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因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作战指导不当，战事前期节节失利，第九战区几支精锐部队，如第10军、第74军、第26军遭到惨重损失。幸第六战区大举反攻宜昌，威胁武汉，迫使进攻长沙的日军仓皇北撤，薛岳组织追击，转败为胜。蒋介石对薛岳的作战指挥极不满意，故不待会战完全结束，即于10月4日，匆匆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桂林，于7日晨抵南岳，准备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严重失误。10月16日至21日，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举行，对指挥失误和作战不力的人员进行了比较严厉的处分。

在会议期间，宋美龄则积极开展慰劳负伤官兵的活动（因第二次长沙会战规模比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战斗更惨烈，负伤官兵更多）。10月10日，宋美龄电重庆“中国妇女慰劳前方将士总会”总干事唐国桢（原籍衡山）、委员张蔼真、干事吴淑贞携款30万元赴湘。唐国桢等于13日下午即赶到南岳。宋美龄乃组成“中国妇女慰劳团”，自任团长，亲自率领团员赴各伤兵医院慰问负伤官兵，慰劳病伤员金额为20万元，另10万元分赠前方将士。负伤将官每名发慰劳金10元，士兵5元，另每名发食品费5元[4]。采购方便的地方，宋美龄将食品费交给医院购买食品，并将食品当即发给负伤官兵。宋美龄亲眼看到不少医院将煮得很好的红烧猪肉送到伤员手中，感到很满意。宋美龄亲率慰劳团成员，不辞辛劳，或乘汽车或乘火车，或乘人力车、竹轿、舢板甚至步行到偏远地区各伤兵医院慰劳。负伤官兵看到宋美龄率团亲临医院慰劳，心情十分振奋，凡能站立起来的都立即站立起来，高呼“抗战胜利万岁！”等口号。宋美龄对湖南各伤兵医院的医疗服务条件比两年前她视察时有所改善（如有的医院有血浆供应），流露出满意的表情，对邵阳第144医院的印象尤佳，因该医院设立了洗澡室、灭虱站等设施。当她发现各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和医务人员不足，病伤员衣服单薄后，她立即采取了两项措施：一、电重庆“妇慰总会”立即派一个医疗队来湘服务（中旬末医疗队便到达衡阳，并开始了工作）；二、向衡阳等处军服厂订制军棉衣4万件，限5周内全部发到负伤官兵手中。宋美龄率团慰劳负伤官兵历时一周，视察了驻湘大部分伤兵医院，被慰劳的官兵达8万余人，被慰劳的负伤官兵有1.3万余人。

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宋美龄于10月22日由南岳经衡阳返重庆，

此次在湘停留共16天。宋美龄返重庆后写了《从湘北前线归来》一文，记述她这次慰劳活动的经过和观感，重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于11月下旬均刊载了此文。总干事唐国桢也写了《随蒋夫人赴湘北慰劳前方将士及各地伤兵医院的经过》一文，刊于重庆《中央日报》[5]。宋美龄鉴于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军进攻香港和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当地美、英、荷守军稍战便纷纷投降（如香港总督杨慕琦和英军司令玛尔特比，在香港本岛只坚持了7天，便宣布投降；荷兰在爪哇的守军只坚持了9天，也宣布投降；驻守菲律宾哥黎希律岛的美国指挥官温赖特，战斗没几天就投降了；最丢脸的是英国驻新加坡的新任远东军总司令珀西瓦尔中将，在日军由马来西亚向其进攻，仅7天就宣布投降），她援引第三次长沙会战杨森第27集团军第20军（川军）营长王超奎防守新墙河傅家桥阵地，日军以大炮猛轰其阵地，工事全毁，但王营长领导全营屹然不退，坚守阵地，由辰时战至下午5时，全营全部壮烈牺牲的事例，撰写《如是我观》一文，刊于1942年4月19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以鼓舞盟军士气。当时宋美龄远在重庆，这也说明她对湖南战场的关注和了解[6]。

第四次来湖南（1944.2.5—1944.2.15）

1943年11月1日至12月17日，中日举行“常德会战”，日军先胜后败。为总结常德会战的经验教训，蒋介石于1944年2月10日至14日在南岳召开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2月5日下午，蒋介石、宋美龄由重庆抵达衡阳。薛岳偕夫人方少文至衡阳迎接，一同乘汽车至南岳圣经学校。2月8日为元宵节，蒋介石偕宋美龄及外甥孔令伟由南岳赴当时被称为大后方第三大城市的衡阳（有人口50余万人，仅次于重庆和昆明）城观看元宵灯火。当晚蒋、宋乘车回南岳。在蒋介石开军事会议期间，宋美龄在官邸整理她1942年11月至1943年6月访问美国期间发表的大量演说文稿。2月13日为“中国空军节”，宋美龄特偕航委会主任周至柔由南岳赴衡阳慰劳中、美空军人员（当时衡阳为盟军重要空军基地），在市郊举行盛大慰劳大会，宋美龄亲自将“纪念章”别在美国空军人员的胸前，这些美国空军人员因受到中国第一夫人亲赠“纪念章”而十分兴奋。2月15日下午，宋美龄随蒋介石由南岳启程返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四度来湘，合计在湘71天，她风尘仆仆，不辞艰辛，为湖南抗日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她的爱国精神和亲民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参考文献】

[1] [2] [3] 参见刘清扬：《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文史资料选集》第85辑）。

[4] 唐国桢：《随蒋夫人赴湘北慰劳前方将士及各地伤兵医院的经过》《中央日报》1941年11月25日。

[5]《从湘北前线归来》一文，刊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1月29、30日；《新华日报》11月30日。

[6] 转引自第九战区长官部战史室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

一位“精神不死”的著名教育家

——缅怀湖南私立广益中学任邦柱校长

刘 磊

从“千里驹”到“任三角”

任邦柱，男，字佩琨。1889 年出生于湖南省今汨罗市弼时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任弼时的堂伯父，曾配合党的地下组织成功地营救过他的这位侄儿。他自幼聪颖过人，启蒙于乡办序贤族校，“恒以启迪民智，改良社会为职志”[1]，有“教育救国”思想。他好读书，“夜深而不寐，遍读家中藏书，乃辗转借之于亲朋戚友，恐逾借期失信于人，以故攻之愈勤。乡人咸相语曰：‘此乃满爹（乡人对其父之尊称）之千里驹也。’”[2]。1901 年入长沙师范学堂，1911 年毕业于前清湖南高等学堂（今湖南大学前身）理科。曾任大麓中学教务主任。1913 年 2 月，应聘担任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 1905 年创办的湖南私立广益中学（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专任数学教师，同时先后在湖南大学预科班及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农业专科学校、长沙市一中等校兼教数学。由于他精通数学，尤长“三角”，教学有方，一丝不苟，教学成绩显著，又视学生如子弟，严慈相济，诲人不倦，故备受校方和学生欢迎，一时名噪长沙教育界，享有“任三角”之美誉。

治校九年成绩斐然

任邦柱到广益中学任教不出数年就被推为该校董事会董事。1927 年“马日事变”后，长沙市城内的中学除明德、周南两校外，其他均遭封闭。1928 年初，反动当局迫于社会各界舆论之压力，不得不允许各校陆续复课。经广益中学校董事会反复酝酿，以“校运维艰，非君莫图”，一致推选任先生出任校长，主持复课。他为了继承先烈遗志，为国育才，不惜辞去其他各校优厚待遇之聘约，“遂慨然以维持本校为己任”[3]，一心扑在广益中学的重建上。

当时，广益的校址在长沙市北门外熙宁街，曾驻军九个月，所存几间校舍已难蔽风雨，教具和其他设施几乎荡然无存。任校长发扬广益艰苦办学传统，千方百计通过校友及社会热心教育人士的捐助和向银行贷款，修复校舍，添置校（教）具，四处奔走，选聘教师。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学校粗具规模。1928 年秋，招收乡村师范班一班（仅此一班）。到次年上期，初中部有 5 个班，小学部（1916 年办，后称附小）有 6 个班，学生由原来的 120 多人发展到 518 人，教职员 47 人，复课初见成效。

由于社会动荡，1929 年又遭两次火灾，校舍烧毁近半，校（教）具损失惨重。任校长矢志不移，苦心孤诣，历尽艰辛，依靠自力更生，添建了一栋两层的楼房，上层为大礼堂兼作室内篮、排球场，下层为四间教室；又添建了一栋能容纳 500 人就餐的食堂。为了扩充运动场地，在学校附近购得一块土地，修建了一条 200 多公尺的跑道，建了一个足球场和几个篮、排、网球场。同时，发动师生尽量利用校内空坪隙地和庭院，种植花木，陈设盆景，致使校园绿树成荫，花香扑鼻，环境之优美，在当时长沙市的各中学中颇为少见。1930 年秋，招收高中普通科第一班，连初中、小学在内共计 13 个班、学生 600 人。不到几年，他就把一所气息奄奄的旧制中学建设成为了一所朝气蓬勃的完全中学。

任校长深知要办好一所中学，特别是像广益这样缺乏政治背景的私立中学，非有一支稳定的、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不可。于是他慎选良师，尊师重道。据当时的英文教师陈克劲、体育教师闫家笃回忆：“任校长最大的特点是善于选择教师，又善于团结教师，他对待教师很尊敬，常常迎进送出，赤诚相待。”任校长说过：“良师者，生之师表也，余之益友也，焉得不敬。”因此，当时省会一些著名的教师如魏先朴、彭昺、黎赞唐、喻子贤、文士员、沈望三、郭德垂、黄培心、郑际旦、李百葵、喻盈科、张煦秋、杨笔钧、左复等，均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放弃其他学校的优厚待遇而纷纷应聘来广益中学任教。

在名师的谆谆教导下，广益学生刻苦学习蔚然成风，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据任校长于 1935 年撰写的《广益校史纪略》中说：“第三届会考（注：指 1933 年湖南省第三届毕业会考），全省高、初中冠军皆为本校学生所获（注：分别为高一班彭肇藩和初十八班文海云）；第五届会考高中亚军蒋季青为本校高二班学生，获得大陆银行储蓄奖金 800 元；第六届会考高三班学生胡骐、张前逮成绩优良，经省教育厅保送湖南盐务稽核处服务。高中第一班毕业于民国二十二年（即 1933 年）秋季，11 人报考湖大，录取 10 人，胡校长春藻（注：即胡庶华）极为称赞；同时 4 人报考武大，亦取 3 名。高中第二班毕业生二十三年（即 1934 年）秋季升学，考中央政校录取 4 人，经外省报纸披露，占全国各高中取录最高百分率。”[4] 从此，“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广益中学的学生不仅文化成绩好，参加省、市各种体育竞赛的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篮球队拥有丁子骙（当时公认的长沙市“球王”）等一批健将，先后两次夺得全省冠军，名震三湘。其他如文化、艺术社团活动，无不开展得有声有色。学校组织了舞雩、黄林文艺社，敬业学术研究社，欣欣口琴社等；学生自治会成立了校刊社，举办《广益半月刊》（后改为《广益旬刊》）；或自编出版刊物，或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丰富多彩，深受师生好评。1935 年 5 月，湖南省无线广播台播送了广益学生的 8 个音乐节目，“效果极好，尤以《Red Rose》、《连环套》和《抗敌歌》为最”。这些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的广泛开展，大大有益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任校长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认为“此乃做人之根本”。他经常在周会上以禹之谟烈士的业绩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启发学生爱国家、爱民族的热忱，教育学生坚持真理。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华，他在一次周会上义愤填膺，慷慨陈词，揭露日寇侵华野心，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学生学好杀敌本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使在座学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还组织学生自编自演活报剧《爱国血》和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等。他对学生要求严格，纪律严明；又像慈母一样关心爱护学生，每夜亲自查寝室，为学生盖被、驱蚊（扎好蚊帐），学生患病，亲送汤药。甚至连一些做父母的都难于启齿的话也不厌其烦地向学生嘱咐。老校友何吉荪回忆说：“在每学期放寒、暑假以前，学校总要开一次大会，由任校长作临别赠言。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除就学习、生活做一般布置交代外，总有句老旬要反复嘱咐。即‘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当时我是初中生听不懂，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是对高中部那些年龄偏大、已经结婚的外县同学说的，真可谓关怀备至，爱生如子。”

任校长不幸患食道癌于 1936 年 12 月去世，他主持学校工作的九年，是广益中学的鼎盛时期。1933 年 4 月 23 日，省教育厅颁布视察省垣各公私立学校的报告，指出广益中学“办理认真，成绩卓著”，通令嘉奖。1935 年校庆时，省政府以广益中学“办学有方”，发给奖金一万元。其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都成立了广益中学校友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办学经验弥足珍贵

任邦柱先生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位中学教育界的实干家，其事迹收入了《长沙教育志》（1840—1990）的“人物传略”，为所列 150 年间 77 位教育名人之一。他治校有方，归纳起来为艰苦奋斗、慎选良师、从严治校、注重学生全面发展。这也是他继承和发扬了广益中学自创办以来的优良传统。

一、艰苦奋斗。他出任广益中学校长时，先后因兵灾、火灾，校舍破坏严重，教学设备所剩无几，他面对困难，坚忍不拔，勉励同仁说：“积土可以成山，积腋可以成裘，深望同仁诸君，同心同德，一致向前，为振兴广益而团结奋斗。”毅然拒绝当时省政府主席何键以出任广益中学董事长为条件的 10 万元银洋捐赠，认为不能让他利用贪赃枉法攫取的民膏民脂来玷污革命先烈创办的这所学校。他一方面向社会和校友募捐（包括义演、义卖等），向银行借贷；另一方面发动师生自力更生，精打细算，艰苦建校。经过几年的努力，广益中学的校舍规模和教学环境，成为当时长沙市各中学中所少有的。

二、慎选良师。他千方百计选聘好教师，如当他得知杨炎和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时，便在杨毕业前与他约定毕业后来广益任教，并事先在学生中宣传他。后来杨老师果终成了教师中的骨干之一，还被推选为学校董事会的董事。他选聘的教师，资历都比较高，据保存的名册记载，1928 年至 1936 年先后选聘的 44 名教师中，北大、清华等大学毕业的 18 人，上海体专、上海美专毕业的 7 人，湖南、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 9 人，加上前清举人、贡生共计 36 人，占 82%。这样的教师队伍，也是当时长沙市各中学所少有的。

三、从严治校。任校长对学校管理严格，无论是上课、早晚自习、就寝、用餐、早操、课余锻炼，乃至学生的仪表、着装、礼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违者要受到纪律处分。考试舞弊者，除试卷记 0 分外，区别不同情况记大过、退学或开除学籍。操行成绩不及格者不准毕业。门卫制度很严，校门有两进，前门为传达室，有工人守门；二门要经过校办公室，由校长或值日教师坐镇，学生不到下午课后不能出校门。当然，也很注意奖励优秀学生，如初中毕业生每个班的前三名可免试升高中，每学期各班的前三名可免学费；各种竞赛也发奖品、奖状等。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格，在聘约上均有详细规定。因此，广益中学的校风很好，教学秩序井然。

四、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他重视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不仅按规定开设必修课，还设选修课，数、理、化用中、英文两种课本；不仅开英语还开日语、德语。他重视思想品德教育，有革命传统教育，又有爱国主义教育；1929 年制定了“公勤仁勇”的校训；还勉励学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好学近智，知耻近勇，力行近仁”；甚至在遗嘱中叮嘱学生：“务宜勤学守规，造出优良之人才，以为国用。”他既重视体育，又广泛开展课外活动。总之，注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鞠躬尽瘁精神不死

任校长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以“育天下英才为至乐”，克己奉公，每月只支工薪 40 元，是当时长沙市中学校长中最低的。并说：“我不拿高薪办广益，

这就是我的事业。”他安贫乐道，不谋私利，一件布棉袄穿十年，虽补丁加补丁也不肯更新。并常曰：“笑烂不笑补。”他的“夫人朱佩卿出身贫寒，以童养媳嫁先生，甘苦与共，数十年如一日，生四女二子，一家八口生活维持不易，有时竟断炊。但任校长不向学校左借分文，也不肯接受学校的补贴”[5]。其长女回忆说“每天吃萝卜、白菜、豆腐，顶多有点小鱼虾，只有家里人过生日才吃点肉。”他全家挤住在学校一套旧房内，任校长命名曰“康庄”，“取虽贫犹健，居窄心康之意也”[6]。“康庄”前门临街，后门通校，常将后门上锁，不让家属子女出入学校，以避嫌隙。他以校为家，每天早晨6时起床即到校办公室，至晚上10时俟全体学生就寝、职员出室才回家。他主持全校工作，又长期兼教“三角”，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由于当时的政府长期嫉视富有革命传统的广益中学，津贴远远少于明德、周南等校；而广益收取的学费又低于他们；同时“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以来，有班次而政府无补助者，截至现在（注：指1935年）欠领津贴达二万一千余元。故经费至为支绌……积欠达四万有奇”[7]。是故任校长操心过度，积劳成疾。1936年10月11日送湘雅医院治疗，诊断为食道癌晚期，27日动手术，同学们自动为他输血，师生员工和亲友积极捐赠医药费。11月28日，任校长出院，移养私寓，每隔一日仍令工友用藤椅抬至他的办公室，并计划学校行政事宜。直到临终前几天，还要家属用睡椅抬着巡视学校一周，对侍随的师生说：“我病已不治，再不能来校工作了，望全体师生念先烈创校之艰难，励精图治，使学校发扬光大。”语重心长，感人肺腑。12月10日，他立下遗嘱，除丧葬务宜简单、感谢众人对他治病的关心等外，还寄厚望于学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次日凌晨4时溘然长逝，年仅48岁。全校停课一天，在大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师生们悲痛不已。“湖南教育界陨落一颗巨星”，各地唁电如雪片飞来，广大同仁为失去一位忠诚的教育家而惋惜！

任校长于12月26日出葬，“执绋者千数百人，途为之塞”。老校友赵旺初回忆说“出殡队伍很长，头排有一大横幅，白布黑字写着‘精神不死’。这天正好是‘西安事变’放回蒋介石的第二天，那时长沙的街道窄，出殡队伍占了半边街，街上看热闹的还未看到后面的棺材，就以为我们是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游行队伍。有的市民相互发问道：‘不是放回南京没有死吗？怎么打‘精神不死’的横幅呢？’我走在队伍的前几排，听到了这样的对话。”可见影响之大。纵观任邦柱先生的一生，终生从事教育事业，教学有方，爱生如子。他担任广益中学校长的九年，是公认的该校鼎盛时期；其艰苦奋斗、慎选良师、从严治校和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办学经验，一直为如今享誉国内外的、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母校——湖南师

大附中所继承和发扬，对今后其他治校者也有启迪意义。他为人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一生劳累，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范，更值得世人学习和敬仰。任邦柱校长离开我们虽已71年，但其精神仍然不死。

【参考文献】

[1] [3] [4] [7] 见任邦柱1935年所撰《广益校史纪略》。
[2] [5] [6] 见任邦柱之子任培根所撰《任邦柱先生传略》。

（作者系湖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

略谈黎烈文与《申报·自由谈》的革新

康化夷

《申报》是我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报纸。“九一八”事变后，总经理史量才极思改革，刷新内容。因史量才是黎烈文的世交长辈，黎留法期间又一直任《申报》的特约撰稿。史见黎思想进步、文思敏捷，又未曾加入任何党派、团体，正符合“自由谈”编辑的人选。

20世纪30年代初，黎烈文主持了《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全面革新。其革新经历了“妄谈大事”、“多谈风月”、“萧规曹随”三个时期，成就了鲁迅杂文和五四以来报纸副刊的辉煌；同时也给报纸副刊编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坚忍耐劳、以质量取稿和依靠中坚、培养青年、团结广泛的精神等等。

一、《自由谈》革新的三个时期

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以进取的锐气和改革的胆识接编《自由谈》。原《自由谈》主笔为报界老人周瘦鹃，他认为报纸副刊应以供市民茶余饭后的消遣读资为宗旨。针对这种“奇闻异事猎奇”、“茶余酒后消遣”的趣味主义和“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的黄色倾向，他在《幕前致辞》中声称将“牢牢站定进步的和现代的立足点”，宣扬民主、科学，反对专制、黑暗。这一时期的《自由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议长论短，妄谈大事”时期。当时有哪些“大事”要谈呢？一是日寇入侵，强敌压境，而国民政府消极退让；二是内战连年不休，人民流离失所，困苦不堪。

1932年1月30日，《自由谈》首刊鲁迅揭露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杂文《逃的辩护》，黎烈文不仅加上一圈花边，还特意刊出编辑启事云：

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鲁迅）先生玄（茅盾）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的生疏的缘故，错过“奇闻共欣赏”的机会！

过了两天，茅盾见了鲁迅便说：“黎烈文这人看起来还有点勇气，你那篇文章相当尖锐，他也敢登出来。”鲁迅十分高兴地答道：“是呀，我们应该支持他。”

接着又不无遗憾地说：“我向来不在名牌大报上写文章的，所以这次我取了一个新笔名，原想遮蔽一下，现在黎烈文登了‘广告’，这就成为‘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不过，随他去吧！”[1]

《自由谈》上尖锐的时政杂文，引起了当局的不满。有人公然指出《自由谈》已成为左翼作家刊物：“《申报·自由谈》的编辑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尤多，署名为‘何家干’，沈雁冰署名为‘玄’。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2] 有人更耸人听闻地说《自由谈》要组织团体了，说“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经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3]。

由于对立刊物的恶意构陷，更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而忌谈时局，《自由谈》明显地“犯禁”了。《申报》本为“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的报纸，史量才尽管思想开明，但宣传赤化的帽子还是怕戴的。他不得不叮嘱黎烈文小心谨慎，并叫其写出检讨刊出来应付。1933年5月25日，黎烈文于《自由谈》刊出启事云：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区区苦衷，伏乞矜鉴！

从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发表《幕前致辞》，到1933年5月25日发表启事期间，是《自由谈》改革的黄金时代。

从1933年5月25日发表启事，到1934年5月9日被迫辞职，用黎烈文的话来说，是“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时期，其实《自由谈》仍然在为民主自由、抗战建国继续呼喊。鲁迅曾说：“想从一个题目上限制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鲁迅：《伪自由谈·后记》）

曹聚仁说黎烈文“是湖南人，有一股牛劲儿，依旧是一个湖南人。湖南人不信邪，谁同他拗的话，他会跟你拗到底”。在国民政府、御用文人和形形色色落后势力的压迫和围攻下，黎烈文虽然发表了“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但那并不是由衷之言。在文禁如网、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他煞费苦心改变策略，在貌似平和的字里行间抒发一些发人深省的内容，以避开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耳目。鲁迅、茅盾也继续支持，或将文章写得更为隐晦曲折，或频繁地更换笔名。

茅盾说："关于改笔名，是鲁迅和我同黎烈文商量好的，既然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使国民党方面如此不安，他们就从此退出了《自由谈》。"尽管国民党当局只准谈风月，不准谈政治，然而《自由谈》上的许多文章仍使国民党当局大伤脑筋。例如，这年5月间，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时，派亲日派黄郛北上交涉。当黄郛专车抵达天津时，国民党特务故意向列车投掷炸弹，随即逮捕了一名路过的童工，诬称他"受日人指示"，次日就将之枭首示众。他们这一行动的目的，就是企图以此暗示日本似乎是反对《塘沽协定》的，从而混淆视听。为此，鲁迅写了《保留》、《再谈保留》两文，无比愤慨地喊出要"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并断言"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贼！"黎烈文也及时将两文刊出，揭露了事实的真相。

在这一时期，黎烈文为"民主"、"自由"、"抗战"而继续奔走、呼号，是情真意切的。鲁迅却清醒地认识到在国民党专制下，根本不可能真正"民主"、"自由"。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说："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好朋友的交情，一则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

对于黎烈文的"顽固"、不"改悔"，国民党当局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一面利用御用刊物诽谤攻击，一面向《申报》老板横加压力。果然史量才顶了一阵子，终于顶不住了，只好同意撤去黎烈文的职务。史深知黎是《自由谈》新局面开创的"有功之臣"，不忍心当面说出，只好托黎烈文的堂妹夫商务印书馆编辑黄子健出面，请黎暂时"避一避"，并转送银元五百，以示"安慰和关心"。终于，黎烈文在1934年5月9日《自由谈》上，刊出辞职的启事：

烈文现因事忙，对于本刊编辑事务无暇兼顾，自即日起，关于本刊一切事项，由张梓生先生主持。

张梓生与鲁迅、与黎烈文本来是极相熟、极相好的，思想也趋向进步。他接编后的《自由谈》，在编辑方针上与黎基本一致，我们称之为"萧规曹随"的时期。黎烈文虽然离开了《自由谈》这块阵地，但鲁迅仍继续给《自由谈》供稿，积极支持张梓生的工作。他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我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后来编辑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可见即使黎烈文离开了《自由谈》，鲁迅先生的继续支持是与黎烈文分不开的。

黎烈文倡导的震动3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始于1932年12月1日，终结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蓝衣社特务杀害，前后刚好两年。《自由谈》的革新，由于黎烈文的主持、组织，在两年中发表了大量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二、《自由谈》革新的宝贵经验

黎烈文接编《自由谈》后的一个多月，其妻严冰之就因"产褥热"去世。婴儿的拖累，《自由谈》改革的内部人事纠纷和社会阻力使他疲于应付。这些家庭的困难和改革的阻力不待说，组稿、尤其组优稿就更难了。他一方面以刻苦耐劳、坚忍不拔和公平公正、"以质量取稿"的精神，每天"早上去报馆，晚上也去报馆，到深夜回来还得履行母亲的职责照顾好儿子"[6]；一方面诚恳地向老编辑请教，多次刊出编辑启事，广泛征询读者和作者的意见。针对过去"所编刊物的文章，总是几个来带里的人物"[7]，他严正声明："《自由谈》广收外稿，凡是合用的稿件，不问作者为谁，决定刊载；凡不合用的稿件，就是最好的朋友的作品，也断然割爱。"[8]综观他日后的编辑工作，是实践了这个"以质量取稿"，而不"以人定文"的诺言的。

黎烈文深知有经验、有威望的老辈作家，是社会的文化精英，也是办好刊物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办好刊物有着"振臂一呼，群山响应"的作用，便频频地向鲁迅、茅盾等约稿。从黎烈文主持《自由谈》的1932年12月1日，至1934年5月被迫辞职的一年半时间里，鲁迅倾全力支持，给《自由谈》投稿125篇。由于国民党新闻检查处的查禁，"没有能够刊出"的10篇，实发表115篇，全部收入其思想最辉煌、影响最巨大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个杂文集[9]。从此，黎烈文、鲁迅之间由编辑与作者关系，一跃而成心心相印的忘年之交。

《自由谈》上尖锐的时政杂文，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对立势力的围攻和上海市特别党部的压逼下，1933年5月黎烈文被迫发表了"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为防黎烈文在反对势力压迫下泄气，鲁迅马上致信黎烈文，以宽其心，以解其虑。为支持黎烈文，鲁迅更加关心《自由谈》，抱病为之写出更多、更好的杂文。在《鲁迅日记》中，常常载有一边是"发热，倦怠"、"胃痛"、"热38度5"、"夜咳嗽颇剧"、"须藤（日本医生）会诊，并衡体重为37.46磅"、"夜失眠"、"抽肋膜间积水约200格兰"等等，一边却是"得烈文信，即复"、"烈文来谈"、"访烈文"、"烈文招饮于寓，傍晚赴之"、"注射后作《女吊》一篇，三千字"等等。鲁迅对黎烈文工作的支持，真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了。

以兼容并包的襟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这也是黎烈文办刊的开放、民主精神。鲁迅、茅盾等针砭时弊的杂文写作，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当时，"左联"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也大力支持。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和周建人等都写了许多杂文；从事创作的人，

如老舍、巴金、沈从文、张天翼等都寄出了很多作品；连并非新文艺的作者，如章太炎、吴稚晖等也为《自由谈》写了一些文章。这就使得《自由谈》的内容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杂感之外还有小说、散文、游记和速写，还有随笔、读书笔记、文艺评论，还有小考证、科学小品和外国作品的翻译等等。而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每天一篇针对时局形势、社会陋俗和不良风尚而写的议论性的杂感。唐弢在《〈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中写道："我甚至觉得，《自由谈》其实是五四以来最讲究广泛团结，真正做到'兼容并包'的刊物。"

《自由谈》改革的成功，还在于大胆、放手地起用青年作者。唐弢说："《自由谈》的革新，从黎烈文到张梓生，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杂感，是散文，是探讨文艺原理的短论，都像野草一样在磐石底下曲折生长，涌现了一批新人。即以创作为例，已经成名的靳以、芦焚、欧阳山、陈白尘、徐盈等暂且不说，新起的如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柯灵、黑丁、荒煤、罗淑等，也大都发硎于此，在这里试练过他们的笔墨。"[10] 徐懋庸在回忆他怎样走上文坛时，动情地说："那时我刚刚20岁，只身漂泊上海，毫无生活来源，便写了两篇短文，寄给《自由谈》编辑部。不过试一试而已……不料几天以后，《自由谈》竟发表了那两篇东西，编辑黎烈文在寄稿费的同时，还写了封信给我，说是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我再写。"[11]

办刊，尤其要办好刊，难免会因为摆不平各方面的作者或各方面的势力，而招来怨恨、攻击，这就需要忍劲和韧劲。这就是鲁迅1933年7月14日《致黎烈文》信中说的："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如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因留学海外6年归来，于国内文坛不熟，接编《自由谈》后黎烈文便约创造社早期成员张资平写稿。20世纪30年代善写三角、多角恋爱小说的张资平，便写下了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在《自由谈》上连载了4个多月后，黎烈文见作品中内容猥亵琐屑、格调低下，与他干预时政、明快犀利的改革精神不符合，便下决心停刊该作。1933年4月22日，黎烈文在《自由谈》上刊出编辑部启事云："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起将（张资平）《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上海滩以卖文为生的作家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报，对《自由谈》的改革及左翼文化的兴起抢占了他们的地盘，本就早生不满，此时正好利用停刊张资平作品的机会，兴风作浪。

张资平在小报鼓噪下，遂于1933年7月6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刊出《张资平启事》，诬蔑黎烈文仗势欺人，是因为有"资本家"史量才做"后援"，还有"妹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社会背景。次日，即7月7日，黎烈文同样在《青光》上刊出针对张资平的启事的启事云：

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未置回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蔑，其中有"又无姐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姐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遗憾（没有姐妹嫁做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另一种病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鲁迅于张资平《启事》后的第二天即致信黎烈文，告之对付张资平这类文人的"战法"：一是"戒愤怒"，"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彼等用"粪帚"攻击，对这类人也不要太忠厚，可同样用"粪帚"反驳。1933年7月8日鲁迅《致黎烈文》信云：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十余年，颇觉得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资平之战法，实亦此类也。看《自由谈》所发表的几篇批评（包括黎烈文声明的绝无"姐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文章），皆太忠厚。

鲁迅于1933年7月14日又《致黎烈文》信云：

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略为平和，本亦一法。然而仍不免攻击，因为攻击之来，与内容其实是无甚关系的。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故脾气甚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者又加以贪滑，认真编辑，必苦于应付。我在北京见一编辑，亦新文化人，积稿盈筐，未尝一看。骂信猬集，亦不为奇，久而久之，投稿者无法可想，遂皆大败。怨恨之极，但寄一信，内画生殖器，上题此公之名而已。此种战法，虽皆神奇，但我辈恐不能学也。

改革以前的《自由谈》时评，常被人讽刺为不伤脾胃的"太上感应篇"。既不应"时"，又很少有"评"，只是一些远离现实的格言或插科打诨的闲语。改

革后的时评联系实际，尖锐泼辣。特别是淞沪抗战以后，抓住时局的症结，敢言人所不敢言，或揭露日寇野心，或抨击当局不抵抗，或要求民主自由、开放党禁，或支持学生运动，呼吁救亡图存，深受读者欢迎。文风上一改过去四平八稳和文白夹杂的现象，或慷慨激昂、感情充沛，或侃侃而叙、阐明哲理。《自由谈》遂成为白色恐怖下的一块绿洲，成为冲破“文化围剿”的进步文化力量的一个重要阵地。于是，《自由谈》声誉剧增，读者广泛欢迎，《申报》的订户猛然增长。

从1932年底至1934年夏，黎烈文全力以赴，编辑中国最有影响、最有名气的副刊《申报·自由谈》，加上与黎烈文同调的后继者张梓生仍守开放改革、干预时政的办刊方针，便成就了五四以来中国杂文最辉煌的时期。茅盾回忆道：“《自由谈》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黎烈文在革新《自由谈》上的这份功劳。”[12]用曹聚仁有些过誉的话来说：“《自由谈》在陈蝶仙主编时期，有其一种作风，到了周瘦鹃先生主编，又有一种作风。到了黎烈文兄来主编，好像继承了《北晨》副刊《觉悟》、《学灯》这一传统，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灯塔。”[13]“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应当大书一笔”[14]。自然在“大书”之时，是不能忘记黎烈文个人所起的作用的。

【参考文献】

[1][5][12][14]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2]逸：《黎烈文未入文总》，《社会新闻》1933年3月24日第2卷第28期。

[3]农：《鲁迅、沈雁冰的宏图》，《社会新闻》1933年5月6日第3卷第12期。

[4][7][13]曹聚仁：《黎烈文与自由谈》，《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6]黎烈师：《怀念长兄黎烈文》，[美]《源流》1984年5月创刊号。

[8]黎烈文：《编者启事》，《申报彂自由谈》1932年12月12日。

[9]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0]唐弢《〈申报彂自由谈〉影印本序》。

[11]《徐懋庸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长沙大火善后

尹任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入侵，步步向内地进逼。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陷武汉，觊觎湖南，省会长沙顿呈战时景象。为了应变，省政府一面将各机关迁往沅陵，一面加紧疏散市民。同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城发生大火，市区十之八九化为废墟，数千人葬身火海，数万人沦为灾民，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对此惨祸，举国震惊，群情激愤。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因失职而被处决，省主席张治中也因用人失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当时，善后救灾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这本是民政部门的分内工作，责无旁贷。然而民政厅长陶履谦，深知此次救灾非同寻常，任务艰巨，风险极大，稍有失误，后果堪虞，竟不肯出来领导救灾工作。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刚受处分，处境困窘，对陶的渎职逃避行为，也无力管束。于是找我商量，恳请我来主持赈灾。我当即接受此任，并报告他说，省财政厅尚有数十万元现款，可用作救灾，使他大得宽慰。

大火后十天，11月22日，成立了“长沙市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主持一切救济事宜。我是主任委员。著名剧作家田汉和长沙市长席楚霖为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中有教育厅长朱经农、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等人。下设总务、救济等八个组。救济总额五十万元，其中省府筹集三十万元，中央拨款二十万元。办公地点设在财政厅内。

为使灾民能在隆冬季节尽快得到救济金，救济委员会决定直接发款给灾民。这种赈灾方式，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全无先例可资借鉴，工作的难度极大。委员会还决定救济对象须先登记并领取长沙市发给的难民证，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每人领款五元，发款日期为12月1日。

发款那天清早，成千上万的凄苦灾民，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涌向指定地点。发款时间未到，场内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后因发现，不少原来已去外地投亲靠友的人，也闻讯赶回，却未领难民证。只好临时改变规定：另发救济金兑换券，按上指印，凭券取款。这样，不仅实际人数将大大超过预计，而且也很难杜

绝重复领款或并非难民之人前来冒领。由于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发款进度缓慢；一些迟到的灾民又继续不断入场，时至傍晚，待赈的灾民依然众多，使原定一天结束的工作欲罢不能。但若继续发放下去，又有谁敢担保靠这有限的救济款能圆满地收场呢？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工作人员均不知所措，纷纷前来请示。

思之再三，我决定次日上午继续发款给待赈的灾民。开始时人群争领的情形一如昨日，然而奇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款的人数竟自然而然地减少下来。及至夜幕降临，所有灾民全都领款离去，再无一人滞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救灾活动，便这样平静顺利地宣告结束，工作人员个个如释重负，额手称庆。

赈灾结束的当晚，领款人数尚未统计完毕，中央社记者即根据原先登记的人数，以《长沙大火，灾民六万》为题，迅速作了如下的报道：

【中央社长沙二日电】本市火灾灾民登记业已结束。统计住所者二二五〇名，不住所者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一名，此外收容孤儿一〇名，连同湘潭萍乡等处登记者，预计总数在六万左右。昨今两日发给灾民贷款证及疏散费，灾民已开始向选定之县份出发。

事后点清按有指印的兑换券九万余张，发款总数四十余万元，两数相符；超出领取难民证的人数达三万之多。尽管如此，一切前来申请救济的人还是都领到了赈款，但又没有突破五十万元的总额，并略有结余。恰似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以后，尚有十二篮零碎。张以藩先生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发放了九万人的救济费，把钱直接送到灾民手中，不出差错，简直是神迹！”当时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在实地视察后，也对这次救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此次长沙火灾临时救济工作中，虽尚未完全避免灾民之冒领、重领等事，而赈款均能用之于灾民，办事人员之不中饱，则予各方面以极良好之印象，而为过去赈济之所未有。”

救灾结束了，灾民散去了，各方对省主席张治中的怨恨和指责也逐渐平息下去。张先生深为感激地对我说，这次赈灾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你会毫不犹豫地承担这风险很大的分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战争年代，日本大军压境的危急时刻，地方财政非但没有赤字，而且还拿得出数十万元来赈灾；三是想不到赈灾工作竟进行得如此顺利。自此以后，我们成了挚友。

不久湖南省政府改组，1939 年 2 月 1 日，薛岳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调任中央侍从室主任，我也奉调到财政部工作，离开了湖南去重庆就任新职。

章士钊撰《孙、黄遗札密诠》的由来

黄伟民

2010 年，我收到上海友人寄来章士钊先生生前撰写《孙、黄遗札密诠》一文，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先父一欧为保管这些孙、黄来往信函的情景，历历在目。

1961 年，北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党和国家对纪念活动十分重视，9 月底，先父受邀参加系列纪念活动。10 月 1 日，北京举行隆重国庆大典和盛大游行，受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的部分代表登上国庆观礼台并参加国庆宴会。先父一欧是黄兴的长子，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亲身经历了黄花岗之役，上海、南京之役，故受到中共中央的特殊礼遇，先后得到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与接见。从接见的谈话中，先父了解到国家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十分重视，而且多方收集有关文物，增添博物馆的馆藏，以提供历史学者们研究参考资料。章士钊和吴弱男都劝我父亲要消除顾虑，不要怕不了解历史的人攻击，公开孙、黄 1914 年的来往书信。先父考虑许久，觉得历史毕竟是过去了的事，而且史实是不能掩盖和更改的，同时史学家们研究也需要真实的史实资料依据。另一方面，国家保存比自己保存，条件要有保证，故先父向大会组委会表示，愿意将自己保存了几十年的“1914 年孙中山、黄兴来往信函”无条件捐给国家，由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并提供给史学家们在编写近代史时参考。

1961 年 10 月下旬，先父从北京返回长沙后，他老人家向我们一家人讲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情况，也谈及参加国庆活动的盛况和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系列活动的感想及收获。当然更多地谈及了与老友李书城、章士钊、吴玉章、周震鳞、龙伯坚、仇鳌等人的欢聚情形，他们有的十多年不曾见面。辛亥革命时期，出生入死在一起参加为建立共和国的战斗，这种情谊是难以忘怀的。

50 年过去了，今天我仍记忆犹新的是，父亲当年亲切地将我叫到身边，非常慎重地对我说：“你祖父与孙中山先生 1914 年的几封来往书信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不仅记录了你祖父与中山先生对当时多变而复杂的革命局面的不同认识与不同处理事态的态度和方法。特别是‘宋案’发生后，二次革命遭到失败，革

命党内思想较乱。这几封来往信件，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和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具体意见，也表达了中山先生当时有许多想讲而没有表达出来的话。同时，中山先生要求你祖父离开两年，不过问政事。无奈，你祖父去了美国。”后来，我才知道这几封信是父亲为了维护中山先生在党内的威信，也为了珍惜先祖父和中山先生的友谊，始终不愿公开。当时有许多人闻知先父手中保存这几封信，都想亲眼一见，而父亲总是婉言谢绝。由于中山先生是先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也因为先祖父和中山先生的友谊，父亲曾立愿“只保存不公开”。父亲和孙科曾是极好的朋友，抗日战争期间孙科向先父问及这几封信，父亲婉言谢绝了。后来孙科托人向我父亲索购这几封来往信函，出价高达五万银元。父亲无法，只好宣称信函并不由他保管，而且他也无法找到保存的线索，力求减轻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保护中山先生的威信和国民党内的团结。

在与父亲的谈话中，我曾好奇地问他：“您保存这几封信，有没有给其他人看过？”父亲告知我基本没有，只有一个人特殊，那就是章士钊先生，他曾任过先祖父的秘书，是知内情的人，章老向他问起这几封信，他无法回避，只得让章老阅读。父亲了解章老的为人，相信章老绝不会做出有损孙、黄关系的事，故应允将书信送章老一阅。这就是章士钊所撰《孙、黄遗札密诠》一文的由来。

父亲还告知我这几封信的历史价值非同一般，史实的记录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先祖父的为人处世和对待多变革命局面的态度。

先父保存的这几封信函伴随他辗转日本、美国等国家和上海、南京、重庆、长沙等城市，经历了抗日的战火，不敢有一点疏漏，目的就是要保存这一段历史，珍藏这一段友谊。父亲还要我理解他捐出信函给国家保存一事，还教导我说：“我们家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怎么也不能忘了祖训，更不能出卖历史和友谊。”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他一生为社会求民主，为民生谋福祉。湖南和平解放前，国民党方面三次送票让我们全家去台湾，他都未予理会。程潜先生主湘后，他即向程潜先生提出了“走不得、打不得、只和得”九字方针，迎接湖南和平解放的建议。

父亲的一生可谓沧海桑田，备尝艰辛，赤诚报国，矢志不渝。现撰写本文以纪念这位保存和守护孙、黄来往信函的老人，告慰他在天之灵。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章士钊与张恨水的恩恩怨怨

丁仕原

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比章士钊小 14 岁，按常理相差一代，不应产生矛盾。章士钊个性分明，敢作敢为，一直是时代的弄潮儿，经常引起各方面人士的不满。作为新闻报人张恨水也不例外，在小说中把章士钊列为反面典型进行描述。但他们又都是坦荡君子，矛盾是有，但真情仍在。当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打官司时，章士钊又挺身而出。晚年他们相聚在中央文史馆，度过了一段十分愉悦的时光。

章士钊被写入《春明外史》

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春明外史》，为张恨水早年力作，书中写了许多京城知名人物，也惹来不少麻烦。这部书连载于《世界晚报》，当时读者把它当作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非常大，不少人花钱买这张报纸，就是为了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张学良为此书专门找过张恨水。张恨水的儿子张伍曾说：“父亲没想到的是，《春明外史》竟使他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的还成了几十年的知交，仅举两例。当《春明外史》在报上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看了《春明外史》，十分倾倒，非常欣赏父亲的文采，竟自己找到父亲的寓所，做了不速之客，交谈甚欢，后经常来看父亲，再后来便想拉父亲去做官，给他帮忙。父亲本来厌恶官场，自然不会答应，就开玩笑地说：‘我们本来是朋友，做了官，岂不成了你的僚属。我不是做官的，还是当朋友的好。’后张将军几次敦劝，父亲都不同意，也就作罢。”张伍所说另一例则是因《春明外史》一书促成了一桩婚姻。[1]

而作为当时知名人士的章士钊被张恨水写入《春明外史》，则是另一种情况。书中的金士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章士钊。张恨水笔下的金士章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正式写金士章之前，作者在第 41 回里进行了一番铺垫。作者写道：

这堂下来，是一堂国文课。这教国文的教员，是这里牛校长特聘。牛校长所以特聘，又是金总长推荐的，所以不能不另眼相看。这位教员的国文程度，不能说坏。他是前清的一个老举人，现在又在公府里当清客。不过他不知道什么叫教授法，

在《古文观止》、《文选》、《东莱博议》几部书上选几篇文章出来，叫学校里书记一抄，油印一印，这就算讲义。上堂的时候，也照着讲义念一遍，就算完事。然后对学生说道："诸位有不懂的，可以来问。"说毕，端把椅子放在讲台上，默默地坐着。学生真要去问他时，也是不能了解。譬如人家问道："大块假我以文章'，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大块者，宇宙也。假者，予也。"说完他一双大眼睛，在大框老花眼镜里，往上一翻，对人说道："懂了吗？"学生问也是白问。后来念完了，索性由他去坐着。学生呢，看小说的看小说，投稿的写稿子。

刚要出门，顶头遇见一个穿西装的汉子，左手拿着一根溜光的手杖，向地下一戳一戳的走着。右手挽着一个妇人，长裙，短褂，革履，蓬头，打扮似乎姨太太女学生之间。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这一系的主任教员马攀龙先生。那一个呢当然是师母，不过毕波丽是知道的，马先生并没有太太，家里只有一个寄住的姨侄女杨花女士，这大概就是杨花女士吧？……到了书店里，马攀龙叫伙计把韩昌黎、柳宗元、苏东坡这些人的文集，都搬了出来，一部一部的翻着看，随挑了五六部……马攀龙道："我要回去了，密斯脱毕，要不要到我那里去谈谈？"毕波丽道："先生不是要回去做文章吗？我不去打搅了。但不知马先生又要做一篇什么大文章，拿到报上去发表吗？"马攀龙道："不发表的，是一封公函呢。"说出这句话，马攀龙才觉得有些失于检点，所幸毕波丽也没有往下再问，就这样含糊过去了。

接下来在第42回《彻夜搜枯肠文章有价，因时辟利薮名士无虚》则以近一半的篇幅专门写章士钊了。小说中写马攀龙"蒙牛参事介绍我和金士章总长只见了两回面，他就那样和我亲近，真是难得的事，这两天索薪既索不到，杨女士又和我提出要求，赶做夏季衣服，不是人家前天送三百块津贴，眼前我真要不得了。昨天我那封感谢的信，虽然做了三个钟头，只有一百多个字，实在不能畅所欲言。这样一比，我才知道人家真有本事，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把古文写出来。我拿着《劝学赋》这样一个大题目，会凑不上一千字，糟糕不糟糕"。

马攀龙是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也就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者。章士钊是一个顽固的反对新文化，坚守旧文化的人。马为了金钱名利，想方设法投其所好。由于文化的不同，马攀龙折腾了大半夜，一篇文章也没有写成。到了第二天下午，"他打听得金士章到贾维新家里去了。他连忙在书架上翻了一本《墨子》，带在身边，坐了车到贾宅来。到了门口，他果然看见停着一辆汽车。马攀龙这里原是常来的，门房就认得，说道：'金总长在这呢。'那意思阻止马攀龙进去。马攀龙会意，笑道：'不要紧，我和金总长也是熟人。'说着，他径直就往客厅里走。一进门，

看见贾维新和金士章各躺在一第沙发上抽着雪茄说闲话，看见他进门，都站了起来，笑着点头。马攀龙也在一张沙发椅子上坐下，却把手上那本书，放在面前小圆桌上。金士章道：'马君勤学得了不得，出门都带书，可谓手不释卷。'说时，将那书翻着一看，原来是本《墨子》。又道：'马君也喜欢研究墨学吗？子书里面，我只爱这一部书。'马攀龙笑道：'那里什么勤学啦，带在车上看看罢了。我是个穷忙的人，向来这样打经济算盘的，总长说好笑不好笑？'金士章道：'这有什么好笑？我们正应该如此啦。马君给我做的赋，得了没有，我的月报，等着发稿子呢。'马攀龙道：'实在对不住金总长。'金士章错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不敢发文言的文章。笑道：'你们这些当教员的，真是给学生管服了，将来连自己每餐吃多少饭，还得学生的同意呢。'马攀龙巴不得如此说，他好借雨倒台，装着很踌躇的样子，然后又笑道：'总长办报，人家想登稿子还登不上，那里会少我一篇稿子？这一期登的头一篇是总统的《问心篇》，真是千古不磨之论，我一念就把我一篇腹稿吓忘了，这篇东西，有人说是总长代总统拟的，我就……'说时，眼睛望着金士章。金士章道：'大意是总统拟的，文字却是我仿造的。'马攀龙道：'是呀，那篇文字炉火纯青，我一看就断定是总长的笔墨，难怪外面说是总长代拟的。'金士章道：'这是我们自己人说话，可不要对外人说，而且意思实在是总统的意思。'马攀龙道：'总长本是兼总统的秘书，总长和总统代拟，好像和总统自己做一样。'说时，他一眼看见金士章的雪茄灭了，正要找火柴。自己便在雪茄盒子里拿了一根，衔在嘴里，在袋里取出一个铜匣子自来火，将机关一捺，火就燃着了。他借这个缘故，站起身来，隔着桌子，伸过火去给金士章燃着了烟，然后才坐下来，将自己抽的雪茄点着。"

接着又写了学生闹事与牛校长以学校公款做公债的事。正在三方都谈得很不愉快时，小说写道——

马攀龙不料今日这样不会说话，动辄得咎，也是默然。于是三个人，都躲在沙发上抽烟。只有把两只腿来摇曳着。还是金士章会转身，拿起马攀龙放在桌子上的《墨子》看了一看，然后笑着说："这部书，现在研究的倒还多。其实是几个哲学教员，对这部书说了几句好话，所以都要看看。若说对这个真能研究一点学问出来，哪有几个呢？起居饮食，要讲究时髦，读书未尝不要讲时髦。"马攀龙道："正是这样，从前我是最爱看子书的，自从这些青年后生之辈，研究哲学，以为时髦，我也懒看得这些书了。却是有一样书，大家看我也看，而且我还要先睹为快。"说到这里便问贾维新道："你猜是什么书？"贾维新猜了几样，马攀龙都说不对。金士章也说了几部书，也没有猜着，倒是马攀龙自己说出来了，就

是金士章的《古道杂志》。说出来又问贾维新道："维新兄，你想除了金总长编的《古道杂志》，还有那部书，配说风行一时呢？文章呢，那还是人家能够模仿的。只有他那大公无我的主张，和独具只眼的见识，真是淑世的良药。"贾维新道："这话极对，我无论走到那一位朋友家去，总可以在他的书桌上，看见《古道杂志》。说起我还想起一个笑话，我们有一个同乡，除了和朋友告贷以外，就是当当过日子。有一天他和人家借了一毛钱，他想买几个馒头，充一顿午饭，后来一想，今天是《古道》出版的日子，他就饿了一餐，省了钱来买了《古道杂志》。我这时才知道总长这一支笔，可真让群生颠倒。"这一篇话，说得金总长心痒难抓，快活极了。这才把做公债的那一段公案，被贾维新盖了过去。[2]

小说到这里金士章才离开。有关金士章的写作也至此结束。

张恨水的老朋友张友鸾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中说："《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引的……作家诅詈那个时代，摘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3]而当代研究张恨水的人，则明确提出金士章是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作者在小说中还以'北师大事件'为原形，描绘了北京教育界的黑暗情景"[4]。

从上面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到，小说中的金士章与当时章士钊的实际情况相差无几。章士钊当时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编有《甲寅周刊》，反对白话文，主张坚守文言。在他的刊物上也确实发表过当时最高领导者段祺瑞执政的文章。他爱好《墨子》，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对当时发生的女师大风波处理不够慎重，并不合情理地将鲁迅开除公职，引起人们的公愤。小说中与之同时出现的几个人中，张恨水着笔最多的是新文学作家、新文化的倡导者马攀龙。张恨水对新文化没有好感，一生坚持章回小说的写作。因此，他笔下的马攀龙是一个不学无术，只会溜须拍马，而且道德低下，与自己姨侄女鬼混的人。小说中也的确有"太过"的地方，明眼人一看破就十分清楚，怪不得连他的老朋友张友鸾也指出这一不足。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他大多来自于道听途说，不能与实际等同起来。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与不足，章士钊本人也确实存在不少让人非议的地方。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即使如作者自己，也有自己的不足。在刘半农女儿的回忆书中，附有刘半农的日记。在1934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牧野云，恨水即将西北旅行，因有一妻三妾，难乎为其夫，故不得不暂往他处以避烦恼，估他日归来，旧账仍当总算，不悉将何以为计，此所谓自讨苦吃，局外人不能赘一词。"[5]这里的牧野，

正是张恨水的弟弟。

与张学良不同的是，章士钊本人对这部小说似乎从不知晓。以他的个性来看，以他对待"三一八惨案"与《世界晚报》的争辩看，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是会辩解的。更何况，这部小说就刊登在与之打官司的《世界晚报》上。当然，张恨水对此事心知肚明，这也是小说家的无可奈何。这段公案，如果推究起来，其意义与当年同鲁迅打官司相去不会太远，可惜无人提起，也很少有人知道。

章士钊替《啼笑因缘》做律师

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在《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曾提到，"章士钊先生三十年代为《啼笑因缘》电影的拍摄官司当过明星公司的律师"[6]一事。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发表后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鲁迅就曾多次到书店为他的母亲购买张恨水的小说，这在鲁迅与他母亲的通信中可见[7]。《啼笑因缘》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喜爱，也为新引进的传播形式电影所看重。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了该书的摄制权，由严独鹤编成电影剧本，并在报上公布了《啼笑因缘》电影摄制权已属该公司所有，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公告。但大华公司的顾无为因与明星公司有矛盾，就同他的后台老板、上海闻人黄金荣相勾结，想尽办法进行捣乱。他们先是在内政部注册了《啼笑因缘》电影摄制权，随即用高薪把明星公司的演员挖过来。如饰演刘将军的谭远志原来只有100元一月，顾出300元将他挖来，并预付定金一个月。用这个方法，顾把明星公司《啼笑因缘》的大多数演员都挖了过来。只有主角胡蝶不为所动。于是顾迁怒于胡蝶，无中生有地进行造谣，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证明"九一八"之夜，胡与张学良在跳舞行乐，不抵抗日寇侵略的谣言。其实，在这之前，胡蝶与张学良并不认识，刊登他们二人跳舞的假消息是日本同盟社发出的。但顾造谣惑众的《不爱江山爱美人》在演出时，戏院内发现了定时炸弹，才不得不停止演出。1932年明星公司拍的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电影在南京大戏院上映，上映时，戏院满座。顾弄到一个法院的"假处分"后又去捣乱，要查封影片。明星公司忙了半天，向法院交了三万元后，才撤销这个假处分，电影到下午五点钟才开始放映。对此黄金荣并不甘心，他指使顾到内政部活动，指令明星公司暂时不得放映《啼笑因缘》。为此，明星公司不得不找黄金荣的盟兄，同为上海闻人的杜月笙出面疏通，并按杜的意见，聘请章士钊为法律顾问。最后由黄杜调停，敲了明星公司10万元竹杠，双方才和解。章士钊作为明星公司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重映《啼笑因缘》电影的巨制广告刊载在《新闻报》和《申报》上，启事写道：

据委托人声请，前以《啼笑因缘》制版摄制专有权与大华电影社发生争执，

经双方尊重知友调节，并为发展国产影片业，团结实力起见，成立和息条约，合同呈请行政司法公署销案，永断葛藤。

正如张恨水的女儿所说，这份启事令人啼笑皆非[8]。

抗战期间，章张二人不约而同地到了陪都重庆。作为报人的张恨水仍以写作为生，为了配合抗战，他创作了小说《水浒新传》。章士钊在重庆担任参政会参议员，基本上没有多少事做。除整理原来在大学的讲稿，出版《逻辑指要》外，也到处走动，了解民间疾苦，浏览祖国山河。当他看到张恨水的这部小说后，写了一首诗相赠。后来在中央文史馆，旧事重提，章士钊又重写了这首诗。这首七律，已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丢失，但我们从与他同时代的陈寅恪《读水浒新传后所赋诗》中可见一斑。陈诗是：

谁谛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9]

欢聚在中央文史馆

关于晚年在中央文史馆事，张恨水的子女在《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文中说：“父亲和许多馆员都有过多年的友谊，如章士钊、叶恭绰、陈云诰、邢端、陈半丁等先生，旧雨重聚，格外愉快。章士钊先生四十年代在重庆读了父亲的《水浒新传》后，写了一首七律送给父亲，1961年旧话重提，章先生又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父亲，父亲对我们说：章先生的字还是写得那样好。1962年初夏，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文史馆老人的情况，作了新闻简报，片名似是《老人的青春》，其中有三个个人镜头：章士钊先生在研究古典文史，康同璧先生（女）在工作，父亲伏案写作的情况。那一天，老人们不约而同地穿上了新衣服，精神矍铄地参加拍片，陈云诰、谢无量等当场挥毫，彭八百、孙诵诏等铺纸作画，十分精彩。”[10]后来，他的小儿子张伍在他著的《我的父亲张恨水》中重复了这件事，但表述上有所差异。他说：“中央文史馆设在北海的‘养心斋’，这里原是清朝皇帝修身养性的地方。有假山流泉，环境优雅，堪称是别有洞天的胜地，馆里更是人才济济……进馆老人须是六十以上，父亲六十四岁进馆，还是最年轻的‘小弟弟’。”对于拍摄纪录片，则说是1963年，并补充说：“原定父亲的是在我家拍摄，但电影厂的人看后，认为我家窄仄，‘不宜入画面’，所以改在文史馆拍摄。那天是我陪父亲去的，真是大开眼界，可以引为平生极大的幸事。老人们都穿上了‘盛装’，这些盛装起码压了四十年的箱底，都是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团花长袍之类，

我觉得几乎置身于上个世纪，不辨人间岁月了。”[11]

从这些回忆的材料来看，他们在中央文史馆度过的晚年是十分幸福的。但好景不长，1966年就开始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好在1967年张恨水以古稀之年病逝，没有受罪。章士钊虽然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1973年，章士钊以93岁的高龄出访香港，为祖国统一大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最终客死香江，为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令人遗憾的是，“文革”这场浩劫夺去了他们友谊的象征——章士钊为张恨水所题《水浒新传》诗的书法条幅，不能不叫人扼腕长叹。

【参考文献】

[1] [11] 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 张恨水：《春明外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3] [10]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 袁进：《张恨水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5] 刘小惠：《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 [8] 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7] 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44页，内容为：“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收到。”第619页：“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三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以早到了。”第633页：“张恨水的小说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以对折，其实是不贵的。”

[9] 陈寅恪：《寒柳堂·诗存》，三联书店2003年版。

湖南境内的兵工厂对抗战械弹供应的贡献

隋涤秋

一、前言

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在湖南境内与日军对抗，形成拉锯战就有七年的时间；有名的会战就有七次，如长沙会战三次，衡阳会战一次，常德会战一次，常衡会战一次，湘粤赣边区会战一次，都给日军迎头打击，奠定了抗战胜利基础。

这七次会战中，我军战士的忠勇战斗，及各级长官的指挥周宜，以及全湘民众同仇敌忾力量固不可没，但是七年中之武器弹药的供应，则为制胜重大要素。打仗最重要的工具，为武器弹药，尤其是长期抗战，倭寇以优越的武器装备，深入我国境内，而我军之补给，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然处于劣势，故武器弹药之供应补给与修复，更为重要。全国虽然有几十个兵工厂，供应各战区已感不足，凡近接战地区，却仍有一个兵工厂——第十一兵工厂，就在战火下从事生产，美国罗斯福总统称它为最前线的兵工厂。它的厂址就在崇山峻岭、山峦耸翠的辰溪县属的花塘坪、刘家坪、茅棚冲、桐湾溪和潭湾，及沅陵县属的宋家坪、孝坪、求莱等山涧之间。它制造的各种武器弹药，供应第九战区之需，第六、七、三战区，间或亦有。

二、湖南境内之战斗部队

当时湖南境内的战斗部队，概括如后：

在湘北方面，廿八年（1939年）九月十四日长沙第一次会战，日寇曾以十余万兵力，越岳阳新墙河向我猛扑，我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十五集团军（关麟征）、廿七集团军（杨森）及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等部队共十五万余人，激战二十三昼夜，至十月六日将日寇驱回麻布大山。

第二次长沙会战，起于三十年（1941年）九月，日军以二十万余众攻我，我军有二十万兵力应战，以第四军（欧震）、三十七军（陈沛）、九十九军（傅仲芳）、第十军（李玉堂）、七十九军（夏楚中）正面诱敌，主力西移，潜伏于洞庭湖畔，复有五十八军（孙渡）、二十七军（杨汉域）、二十六军（萧芝楚）、七十四军（王

耀武）等由赣北驰往湘东侧击日寇，以铁道双轨战术，围歼来犯之敌。

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日寇又聚集七万余众，以陆地、空中、水道三路进逼长沙。杨汉域军顺新墙河一线布阵，挫折其锋后，化整为零潜伏大云山至鹿角一带丘陵里；陈沛、孙渡两个军则横置于汨罗江以阻其进路，然后隐于浯口、新市、归义、栗桥、福林铺东之山地中；李玉堂、夏楚中、萧芝楚、欧震四个军沿浏阳至黄土岭，保卫长沙；彭位仁军则在湘江西岸阻击日军水师。动员十四万兵力，造成长沙第三次会战大捷。

常德会战发生于三十二年（1943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下旬，鄂北、长江下游、洞庭湖北岸之敌计二十万，倾巢而出，自沙市、黄金口、藕池、华容直下常德。我军王瓒绪集团军，沿松滋、公安至南县，与吴奇伟之江防军合力阻敌于第一线，再以孙敬文集团军、王耀武集团军及李玉堂集团军等作兜网式围住常德，第十军方先觉死守德山，我军动员二十余万，敌不能得逞，十二月二十日将敌全部驱退。

长衡会战自三十三年（1944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八日，日军调集精锐部队十七万余，分水、陆两路顺粤汉铁路东西两线逾越长沙直逼衡阳。第九战区薛岳司令官部署兵力达三十余万，经两月又半之拉锯战，衡阳城内守军苦战四十八日，被敌攻陷，是役毙敌六万六千余人。

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九日至六月二日日寇深陷泥淖，作困兽之斗，遂选择湘桂、粤汉两路之中段，发动攻击，动员兵力八万余人，向我新宁、武冈、桃花坪、洋溪桥等线进攻。守军四四师（何修仁）、五四师（蔡仁杰）、一九三师（萧重生）极力抵抗。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指挥十八军（胡琏）、三十七军（彭位仁）、七十四军（施中诚）、一〇〇军（李天霞）在辰溪、沅陵、榆树湾、芷江一带向东猛击；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从湘南及黔桂边境以二十七集团军（李玉堂）、九十四军（牟廷芳）、二十六军（丁治磐）、九十二军（侯镜如）等向北猛攻，形成包围，是役毙敌二万八千余人，此为湘西新宁会战是也。

另外还有一次湘粤赣边境战斗。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十一日日军十万余众，在湖南蓝山、粤北乐昌蠢动，向北进攻，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再东进夺取江西遂川及赣州机场，第九战区以九个军分在粤汉两侧阻击之，第七战区及第三战区亦出兵堵截，是役毙敌两万余人，于二月十四日结束。

三、驻军超过五十万

七年期间，计有七次大规模的会战，猛烈战二百八十昼夜之外，还有在新墙河对峙之前哨小战斗，每日夜都有（笔者于三十年秋返原籍岳阳新墙河南岸荣家

湾奔父丧时，抵家初夜，即闻距离仅一公里许之守军以火炮及机枪封锁新墙河各渡口，彻夜不停，直到天亮。日军亦以枪炮还射），七年中两千余次，我军在湖南境有作战部队三十余万人，另有卫戍守备及后勤等十余万人，合计五十多万。武器弹药之补给，全赖当时在辰溪之第十一兵工厂制造供应；贡献之大，其功之丰，可能不为一般人所知悉。

四、省境内唯一的兵工厂

辰溪第十一兵工厂，系巩县兵工厂，中日战争发生，由河南孝义搬到湖南长沙，编列番号为军政部第十一兵工厂，以资保密，对外通讯称巩固商行。七七事变后，日寇以优势兵力进攻，陷战城池，以空中飞机袭我，对经济市场、工厂、矿场、交通要点、船舶码头等，滥施轰炸。二十六年（1937 年）十月巩县兵工厂被炸，枪厂及炮弹厂中弹；兵工署长俞大维先生，为了保持国家元气，奠定长期抗战基础，乃下令将华北、华中的兵工厂南迁。厂长李伯芹博士，率领员工在三个月内迁到湖南长沙，就在北门外之高工学校、黄泥岭、朱家花园、朱家别墅、朱氏墓庐、丝茅冲、龟塘、南湖港等处设厂生产。二十七年（1938 年）秋因时局再迁安化烟溪，一部分迁入四川铜关驿及广西桂林。二十九年（1940 年）春准备将全厂迁铜关驿，由李才福上校负责联系，运输船队三百余艘，行抵沙市，正值日寇发动鄂北战斗，日机在长江连日轰炸，并布下水雷，不能前进，危急万分；厂长即令警卫大队长简立上校（来台后任联勤总部参谋长、中正理工学院院长），设法抢救。简即征集十余艘轮船，日夜拖运，脱离敌区，至洞庭湖南边，进入沅水，转道迁往辰溪、沅陵。

五、机器设备人才属第一流

十一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具规模的兵工厂，除第二十兵工厂（在重庆）外，其机器、设备、技术、人才皆属一流，其主管人员简列如后：

厂长李待琛（字伯芹），日本帝大造兵系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冶金系博士。

主任秘书朱骥，留日。

动力厂主任施宇亮，留德。

机器厂主任王建民，留德，迁辰溪后为鲍庆恩，留日。

枪厂主任孙非，留日。

炮弹厂主任周有庭，留德。

机枪厂主任曾令典，兵专。

子弹厂主任文湘屏，兵专。

引信厂主任吴宝书，留德。

火工厂主任王钺，从师德国工程师。

熔铜炼钢厂主任马千里，留德。

防毒面具厂迁四川后拨交他厂。

审检处处长宋建寅，留比利时。

材料室主任李神哉，留日。

技工学校主任李步黄，留日。

运输处主任张骏，留日。

主任工程师朱彦群，留日。

工程师田赓尧，留日。

卢师仝，留德。

刘世英，留法。

杨从先，留法。

注：上述人员系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状况，二十九年以后所变更者未列。

六、主要产品及产量

上述当时人员皆系一时之选，饱学之士，技术精良，属第一流。而其设备、机器，也是上乘，故其产品良好。兹将主要产品及月产量概列如后：

品名月产量

中正式步（骑）枪一万支

中正式刺刀一万支

三十节重机枪一百挺

捷克式轻机枪三百挺

转轮式手枪一百支

哈其开式手提花机关枪（后改名冲锋枪）一百支

信号枪五十支

步弹及机枪弹二百万发

卜福司七五炮弹

司来得七五炮弹

三八式七五炮弹

十年式七五炮弹

哈衣合开式七五炮弹

克虏伯七五炮弹

自来德七五炮弹

克式七五炮弹

以上八种山炮、野炮弹共一万二千发

一五〇迫击炮弹一千发

炮弹引信一万五千发

木柄手榴弹二十万颗

地雷二百颗

信号弹（各种颜色）　　三万颗

八二迫炮弹二千发

防毒面具（迁四川后拨交他厂）

另外整修之武器弹药含飞机炸弹，接受部队送修，故无固定数量。

以上所列数字，系每日八小时单班产量，若急需或上令增产时，则加班赶制，双班制加产一倍，三一班（廿四小时）制则加产两倍。加班赶产只制需要的产品，并非全部加班，但有四五种产品，多在全年加班中。

七、制造材料之自炼

制造武器材料，非一般钢铁金属，乃特种金属，当时外货源断，无有供应，按计划自爆材料制造成品，供应军需，至今忆及，真是奇迹！

八、品质管制

兵工厂的产品，必须合乎规格，方可使用；制造中每一阶段，皆有检验（即今日之品管），成件检查，成品试验，由兵工署派员驻厂监督执行；任何零件（单独一件）或成件（部分组合）皆有样板量具，符合规格后，才可算数，成品经试射检验合格后，才包装封箱出厂。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容易发生偏差，造成意外。早在八十年前就已实行品管制度，当今在台之品管名家为解晋、李玉森、潘德纯、饶鸿章、金元善、张玉田、曹健民、宋文襄等先生，皆是当时的品管的推行者。

九、战地游修队

我军武器装备，大半是抗战以前的产品，尤其火炮购自日本或德国，多年下来，磨损过度，部队里没有维护，使用者不知保养，不但缺件、生锈，甚至枪管弯曲，瞄准具变形，弹药更是发霉长锈，凸凹歪扁，部队又不能全部送修，影响战力至大。李厂长有鉴及此，叹为可惜，认为修护重于制造，整废物为有用，为当前可行有效之策。于是以技工学校学生，施以特种训练，组成游修队，派至部队中去做保养修护，顿时把部队中之械弹，整修一新，精度恢复，战力陡增。

十、运输补给

十一厂为了补给送运，编组一个运输组，有两个人力大队：一个船舶大队、

一个汽车队，将产品运交战线上的补给机构，有时径交使用单位，以应急需。船舶大队和汽车队，都是日夜行驶，络绎不绝。运输的效率很高；历次的迁移搬厂，运输组发挥很大力量，大型机器重达几百吨，体积又庞大，如此笨重的机器，没有吊车，也没有堆高机，能够很快地搬运及安装，实在是苦干蛮干而成的。于今说起来，真叫人不敢相信。

十一、不怕轰炸

越艰苦越奋斗，越压制越坚强，是中华民族的特性，日本飞机来轰炸，不但未稍慑服，反而更加努力。二十八年（1939 年）日机几次飞到辰溪，因厂房分散，加上伪装，连道路桥梁都看不出来，电线埋在地下，不用电杆，免露目标，日机找不到目标，就在辰溪街上投下炸弹，我高射炮营（营长张星源，来台后任防空学校校长及防空高炮司令）即猛烈射击，敌机仓皇逃逸；街尾之办公室被延及燃烧，在办公室后之防空洞里三十余人统统被烟呛死，实在凄惨。追悼时高炮营挽联有云：“愧我射手无能，致使诸君遭浩劫；誓死固保领空，莫教倭寇逞凶狂。”二十七年（1938 年）兵工厂搬到长沙，敌机屡来轰炸，因为伪装得宜（许多留德、留法的主管对防空很有认识，故重视伪装），找不着目标，只在长沙城市乱投炸弹滥施轰炸。廿七年（1938 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九时，长沙朱家花园手榴弹制造场不慎引起爆炸，全场火药殉爆，火灾遍及朱家别墅及朱氏墓庐，燃烧三昼夜，主任王钺在几天后收拾场地，恢复生产。直至十一月十三日长沙大火，才迁往桂林。日机追随轰炸桂林，工厂设在甲山村山洞里，炸弹投在山上，毫无损失，生产亦未受阻。二十九年底工厂搬至辰溪、沅陵，日机就来轰炸，辰溪工厂中弹，因厂房分散，损失不大；孝坪工厂有两个大山洞，里面可通汽车，长约四公里，生产部门都设在洞内，发电厂亦在洞内，敌机每次临空侦察，找不到目标，被我高射炮打得逃窜。三十二年（1943 年）第四方面军王耀武司令官进驻辰溪，其官舍就借用兵工厂孝坪公园内的招待所。遇警报时即进入山洞，十分安全。兵工厂在每遭轰炸后；很快就修整复工，从未因被炸而耽误生产，或稍气馁，反而更加强员工同仇敌忾的意志，努力制造，以应军队之需。

十二、精神鼓舞

十一厂不但科技工程人员属第一流，就是一般人才也是很出众，如彭麟、彭一湖、谭瀛、简立、曹湘泽等先生，都是一时之秀，高才之士，国学之师。处在战乱时期中，常遭敌机轰炸，厂址搬迁不定，当时又没有适当的新闻报道，处此消息闭塞的环境，谣诼纷起，员工惶惶。心存阴影，厂长即命简立先生兼任《青年报》主长，由彭麟、文节和、谭瀛、赵兰坪、徐亚三、杨克勋、陈浩、傅梦长等先生

负责编辑，除报道新闻外，并做厂政宣导。员工有此精神食粮，对士气鼓励很大。在当时物质条件奇缺之下，又处在距敌不到一百公里的接战地区，仍能坚定沉着，克难增产，达成械弹补给的任务。因为李厂长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曾任第四十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对政治工作很有经验，重视精神教育，复于二十九年（1940年）冬，又令简立先生筹办党员训员班，挑选两千多员工，分为三期施训，收效很大，对搬迁后之建厂复工，及协助大后方之肃奸工作，具有很大的作用。

十三、结论

简立先生写了一首“第十一兵工厂厂歌”，歌词如下：

“努力！努力！第十一兵工厂的同志，握紧着钢锤，奋起着铁臂；在三民主义旗帜下，来创造伟大的时代，制枪炮打敌人，伸张人类的正义；要同心挽救祖国的危亡，要合力铲除前途的障碍；平复累累的创伤，偿还重要的血债；建立本厂殊荣，担当国防重寄……”以此厂歌，作为本文的结论。

接管旧政府　建立新政权

——回忆长沙市人民政府成立初期几件事

刘约三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湖南和平解放60周年，也是我南下干部进入湖南长沙，接管国民党的省市旧政府、建立新的人民政府60周年，回忆往事，一些旧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1949年8月中旬，我们一批南下干部，奉命进驻长沙市城东区藩正街4号的一个大院中，这个院中的主要建筑是一幢被称为“民主大厦”的三层红砖琉璃瓦楼房，是国民党“省参议会”新建的办公楼。该楼的设计颇具匠心，楼门正面入口处有两根大圆柱，大概是模仿外国议会圆柱大厅的样式，但规格太小了。进楼门是一间80多平方米的过厅。过厅两侧有两个通道通向东、西两边的10多间办公室。从过厅正面上三级台阶，迎面有两个门。进门就是一个礼堂，楼上楼下共可坐600人左右。这就是议员们开会议事的大厅了。在礼堂讲台上正面左、右框柱和上框上，有白色的古钟形浮雕，这是寓意“民主之声”的象征。可叹它还未敲起“民主”的钟声，国民党政权的丧钟就敲响了。当时这栋楼房才建成不久，院内还未清理干净，到处是灰石砖瓦，杂草丛生。后院还有拆迁遗留的残垣断壁。我们把它彻底加以清除，把围墙和大门门楼整理好，挂上“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就在大楼内办起公来。我们第一任市长闫子祥和他的接管班子设在二楼，行政管理和警卫人员驻一楼，三楼是一间大会议室。我们一些南下干部临时住在礼堂内。长沙市人民政府即将从这里诞生。

一

党中央真是高瞻远瞩。早在1949年2月3日（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结束之时），就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局、华北局、东北局、中原局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毛泽东主席在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向全党发出号召：为迎接全国的

解放，要从各解放区抽调五六万甚至更多的干部随军前进，建立人民政权。3月中旬即在天津组成以黄克诚、王首道、高文华等为首的南下湖南省委（含省政府）。5月南下湖南省委到达河南省开封市。在中原局的领导下，从晋中、冀南、冀东等解放区，北平、天津两市以及东北地区随军南下的干部均先后集结到开封附近，集中学习整编。初步确定了接收湖南省党政部门和长沙市及各地区的领导班子。如确定周小舟为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曹瑛为长沙市委书记，闫子祥为长沙市市长，田光涛为组织部部长，武光为长沙地委书记（后改名为湘潭地委）等等。6月初又从开封中原大学抽调约300名毕业学员（中原大学是1948年8月在河南宝丰县经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由陈毅同志亲手创办的革命大学。1948年底迁入开封市原河南大学的校园内）。这几部分人员会合后，分两路南下，一路由曹瑛、闫子祥率领沿平汉铁路南行到汉口（火车已不通，只能乘汽车或步行，有的绕道襄樊转武汉），另一路则乘火车南下到南京，在原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大礼堂内，召开干部大会。金明同志（后来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在会上宣布，这支干部队伍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湘江部队105部”，由他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05部下设五个大队，都是随军进入湖南省及各地区的干部。6月下旬这支队伍到达武汉，在这里庆祝建党28周年，学习毛泽东主席为纪念七一发表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7月上旬正式宣布曹瑛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闫子祥任长沙市市长、毛远耀任副市长，长沙市级各部、局、处的负责人也宣布下来。因此可以说，长沙市人民政府的班子是在开封初定，在武汉基本组成。7月16日这支队伍从武昌出发，经咸宁、崇阳、通城于7月26日到达湖南平江。这时候湖南地方政府程潜、陈明仁将军派出的和谈代表同我方的代表在平江谈判。7月30日双方初步达成湖南和平解放协议。31日我们各大队人员即前进到长沙县春华山、槊梨镇一线待命。8月4日宣布湖南和平解放。8月5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受到长沙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接收省市政府的先遣人员也随之进入长沙城区。8月中旬“湘江部队105部”各大队人员陆续进入市内，开始了对省市旧政府的全面接管工作。

据事后统计，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先后进入长沙市属党、政工、团系统的南下人员共有649人，其中男563人，女86人。在这些人员中，来自晋中区党委的14人（如闫子祥、吴国厚等同志）；冀南的4人（如田光涛、张惠民等同志）；冀东的13人（如张春旭、刘喜贵等同志）；北京市的50人（如周世华、王甸彬、李佐军等同志）；天津市的177人（如陆锦、王志强、温樾、青峰、刘波等同志）；平津学生南下工作团的16人（如张理元、谢纲谊等同志）；中原大学46人（如邓永宁、马宗骥、赵昌绪、黄振东等同志）；华北大学9人（如马玉牒、何绍勋等同志）；华北革大6人（如丁履亭、乔广浩等同志）；东北军区及四野转业到长沙的37人（如苏明、石华峰等同志）；从其他地区南下的49人（如王汉平、郑顺等同志）。还有中原军区警卫团164人（大多数为战士），大部转为长沙市公安大队，后来有许多人调到市级机关和企业工作（如刘克顺、刘汉杰等同志）。另外还有东北军需四局五局共64人（大多为工人），一进入长沙后都在军需203厂即后来的湖南橡胶厂工作，以后有一些同志调到省市机关工作，如李文玺、孙寿良等同志（以上数据参阅省党史办所编《南下入湘干部名录》）。

二

由于湖南是和平解放，长沙是和平接管，因此它与接管天津的彻底摧毁旧政权，重新建立新政权有不同特点。省市领导都强调要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城市政策，执行和平协议，还要求特别注意统战工作和对旧政府人员的安置。和平解放有许多有利条件，如原有机构、人员、档案资料都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特别是地下党组织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对各方面情况较为熟悉。所以在同地下党会合后，接管工作就更加顺利了。1949年8月25日，国民党长沙市政府最后一任市长吴博夫，乘坐美式吉普车、带着秘书和卫兵来拜会我们第一任市长闫子祥，商谈新旧政府交接事宜。经商定后，我们即分部门对口接交。我当时在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人事科，就协助科长吴云（以后曾任民政局局长），将旧市政府人事室所管的200多名职员名册（包括勤务人员）和人事档案接收过来（国民党时期的警察局、国税局不属市政府编制，所以政府机关人员较少）。按照当时对旧政府人员的政策，除少数有罪恶、有劣迹对我怀有疑惧而要求辞职的或者家在外地，要求回家乡的以外，大部分人员都留用下来。我们对要求回家的都发给路费、生活费和返乡证明。对留用下来的集中到市人民政府“行政人员训练班”（由民政局主办）进行短期学习后，根据表现和专长量才录用，分配适当工作。他们中没有负担的，也要求同南下干部一样实行供给制，对有家庭负担的实行工薪制。即按新担任职务（和家庭负担）每月发给150斤～500斤大米的薪水（因为当时大米价格高、物价变动大，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资，所以每月按大米牌价折合人民币发薪水，能有效保证生活质量）。这批人员多数工作较好，有的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有的还担任了科长、厂长、区长、局长等领导职务。

三

1949年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新政府的机构设置，据我当时在民政局人事科的了解（当时全市政府系统的人事调配和机构设置的具体工作都划归民政局人事科具体办理，到1951年4月成

立人事局后，民政局人事科则主管各区的人事工作）。主要是参考旧政府的民、财、建、教四大厅局的模式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机构设置的经验，在南下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长沙市人民政府机构设置的雏形。如民政局、财政局、工商局、公安局等部门在武汉时已定下主要领导人和接收班子。进入长沙，又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机构。所以在宣告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即陆续挂牌成立了长沙市人民政府秘书处、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1950 年 1 月改称文教局）、工商局。在接收司门口“省会警察局”的大院内成立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接管国民党财政部长沙国税稽征局和长沙税捐稽征处的旧址上成立市人民政府税务局。9 月在旧政府工务局的基础上成立市人民政府建设局。10 月成立市人民政府劳动局。11 月在市公共房屋管理处基础上成立长沙市房地管理局。12 月成立长沙市合作总社（1951 年改为市合作事业管理局）。1950 年 1 月成立市人民政府卫生局。

除以上市人民政府的直属局处外，1949 年 8 月接管旧长沙地方法院（在藩后街法院巷），于 9 月正式成立长沙市人民法院。在 8 月接管旧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在长沙的分支机构后，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都归市人民政府领导。

对市人民政府各局处的第一任首长的配备，在南下过程中，初步确定了一个名单，进入长沙后又做了一些调整，正式任命下来。据我当时在民政局人事科所表列的名册。大致情况是：

长沙市人民政府

市长闫子祥（1949 年 8 月—1953 年 1 月）

副市长毛远耀（1949 年 9 月即调任衡阳市市长）

副市长程萍（1950 年 2 月任命，8 月调走）

代理秘书长陆锦（兼职，1949 年 8 月—1950 年 1 月）

秘书长彭少彭（1950 年 1 月—1952 年 10 月）

市人民政府秘书处

副处长王蔚琛（1949 年 8 月任职，1951 年 1 月升任处长，以后曾任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民政局局长陆锦（1949 年 8 月任职，1953 年升任副市长）

财政局局长尚子锦（兼职，1953 年升任市长）

财政局副局长胡为乐（1949 年 8 月—1950 年 5 月）

建设局局长潘基硕（1949 年 9 月任职，1980 年后任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建设局副局长杨如彭（1949 年 9 月任职，以后曾任副市长，省外事办主任）

教育局局长汤菊中（1949 年 8 月任职，后改文教局，萧敏颂兼局长）

教育局副局长魏泽馨（1949 年 8 月任职，1955 年 1 月升任局长）

公安局局长程萍（1950 年 2 月—8 月任副市长兼局长）

公安局副局长王丕敏（1949 年 8 月任职，1951 年 12 月升任局长）

工商局局长尚子锦（1949 年 8 月任职，1951 年 6 月任副市长兼局长）

税务局局长杨展云（1949 年 8 月任职，后曾任省农业银行行长）

税务局副局长吴国厚（1949 年 9 月任职，后曾任市财办副主任）

劳动局局长闫子祥（市长兼局长）

卫生局局长郑琼（1950 年 1 月任职，后曾任省卫生厅副厅长）

卫生局副局长周善同（1950 年 1 月任职）

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

局长肖规（1949 年 11 月任职）

长沙市合作社主任

成煌衡（1949 年 12 月任职）

长沙市人民法院院长

易锚（1949 年 9 月任职）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经理

牛牧野（1949 年 12 月并入省分行营业部）

当时我党很重视民主人士的作用，在上述局长中：萧敏颂是民盟成员，萧规是民革成员，潘基硕参加过党的地下外围组织，以后加入民革，魏泽馨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周善同是社会名流、民主人士。

四

市人民政府各局处相继成立后，对区以下政权，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造和组建。当年长沙市管辖东、南、西、北四个市区和文艺、金盆、会春、岳麓四个郊区。都设有区公所，作为旧市政府的派出机构。1949 年 8 月市人民政府向各区派出工作组接管旧政府区公所，成立市人民政府各区区公所。对各区区长的配备，我们遵照毛泽东主席说的外来干部要与当地干部相结合的原则，优化组合。如东区区长毛庚平（地下党）、副区长张春旭（南下干部）；南区区长熊飞（地下党）、副区长高殿阳（南下干部）、王子英（地下党），西区区长李芝（南下干部）、副区长马魁（地下党）；北区区长郭顺祥（南下干部）、副区长周世华（南下干部）、副区长曾繁瑛（地下党）。四个郊区的第一任区长是：文艺区区长赵国忠（南下干部）、副区长陈光烈（地下党）；金盆区区长郑昌明（南下干部）、副区长朱中立（地下党）；

会春区区长陈玉田（南下干部）；岳麓区区长郑顺（南下干部）、副区长周人中（地下干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区公所以下实行保甲制度。按街道里巷设立保甲，大约30户左右为一甲，30甲左右为一保，由区公所任命保甲长，对居民进行统治，在成立市人民政府区公所后，为废除保甲制，先在南区试点，探讨新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参考天津市民主建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南区的实践，确定了在全市各区下设街道办事处，在办事处下设居民委员会，在居委会下设居民小组。委员和组长采取民主选举或推举办法产生。从此新的人民政权从基层建立起来了，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

五

新的基层政权建立后，面临着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的大问题，也即是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的问题。为此市人民政府对民政工作，突出抓了三件事：一是开展生产自救。当时长沙市的贫民失业工人老弱妇孺，约占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极为困难。为开展自救，由民政局领导成立军鞋加工厂、各区成立军鞋加工分厂，组织街道劳动力生产军鞋（主要是街道妇女）。这一方面支援解放战争（当时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省尚未解放）；另一方面居民有加工费收入，可供养家庭。同时组织男民工挑土修路，以工代赈。二是发展生产，办好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先是遵照政务院的统一布置，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长沙市分会，统筹全市社会救济工作，后又在民政局领导下，成立“长沙市生产教养院”（由工商界民主人士陈芸田任院长，陈院长后来曾担任省市工商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该院利用国家拨给的救济款项，开办了“华新织染厂”（即后来的长沙纺织印染厂的前身）、“华新火柴厂”、“华新砖窑厂”、“华新米厂”、“华新湘粉厂”、“烈军属制衣厂”、“纽扣厂”等企业。这些社会福利工厂收容了大批社会劳动力，安置了社会残疾人员和烈军属，以及改造好的妓女流民。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大作用。三是强制集中收容城市乞丐游民和妓女，有病的治病，无病的安排生产劳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丧失劳动力的送“残老教养院”养老，对无家无养的少年儿童，送入“儿童教养院”养育起来。这样把乞丐游民收容改造了，对旧社会遗留的妓女改造的改造，有性病的治病，愿嫁人的嫁人，使传染很广的性病一扫而光，人民无不拍手称赞。很多老长沙居民无不感慨地说：“长沙数十年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只有在人民政府治理下，才能安居乐业。”

六十年过去了，长沙市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们追昔抚今，面对今

天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发展，真有无限感慨无数思考。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党全国团结一致，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毫不动摇地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综合国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系河南镇平县人。1949年随军南下，解放长沙后，曾参加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毯子湾的回忆

程不吾

1949年，程潜的侄子、我的父亲程炯，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我们家在长沙市南门外南大十字路南二里牌的毯子湾，这是一座很不起眼的院子。1949年的7月30日至8月5日，湖南和平起义最为关键最为紧张的几天，程潜只身来到毯子湾“隐居”了6天。这里成了他躲避白崇禧追杀的最后隐身场所，成了他领导湖南和平起义做最后的部署，以及和中共领导人进行最后协商并达成一致行动的地下指挥中心，当然，也就成了以后蒋介石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毯子湾和它的主人程炯

程潜有三兄弟，程潜排行老三。我的父亲是他大哥最小的三儿子。父亲由叔叔程潜送到德国留学，1932年从德国学成后回国。先后出任汉阳火药厂工程师、津浦铁路浦口、济南材料厂厂长及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厂长等职。

1946年5月，父亲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他在长沙市南门外的毯子湾建了一座私宅，围起了约五亩地的一个院子，围墙里种了不少树和草。院内都是平房，房屋布局是分别以大客厅、小客厅为中心的既可通开，又可间开使用的两套独立住房系统，所以即便有客常住，相互间也没有不便之感。房后面是厨房、厕所、杂屋和工人的住房等。周围只有几户种菜的农民，西南边有一口塘，后面是一个小山，完全是一幅田园山庄的景象。汽车可从公路开到大门口，大门旁就是汽车库。总之，这是一户外观并不奢华，但生活设施俱全，十分安全和隐蔽的住处。

1949年7月，家里突然被一股紧张的空气笼罩着，平添了几分战争的色彩。一是院子里突然挖了个一人多深，十多米长，三四米宽的防空壕，壕顶是用树枝和青草铺的一层掩蔽层，在里面可透过树枝看见点点星空；二是突然由在省公路局任职的表哥朱子义，悄然无声地带进来了十几名“路警”，他们身着制服，持枪荷弹，分别住进了汽车库和杂屋，对我们家实行严密的巡逻守卫。后来才知道，这都是父亲秉承叔叔程潜的意思，暗中布下的用于紧急关头救命的最后一步棋，没曾想还真的成了制胜全局的一大妙着。

程潜与白崇禧的生死游戏

程潜出生于1882年，16岁考取秀才，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授陆军一级上将衔，足智多谋，素有儒将之称。

白崇禧比程潜小11岁，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官至国防部长一职，授陆军一级上将衔，被誉为“小诸葛”。这两个人在1949年的湖南进行过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其最后的收官处就在毯子湾，程潜以棋高一着制胜。

这场搏斗在一些回忆录和程潜的传记中都有记述，但可惜的是他们均没能写到故事的结尾。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48年7月24日，程潜由武汉回湖南就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以华中剿匪副司令兼一兵团司令的身份，率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来长沙编训，给程、陈联手创造了一个“天赐良机”。

1949年5月16日，蒋军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令白崇禧率几十万大军退守湖南，一方面作困兽犹斗状，另一方面监视程潜的一举一动，防其有变。而此时程、陈密谋起义已进入关键时期。

白崇禧的大本营设在衡阳市，除在长沙布置了大量特务密探紧盯程潜不放以外，他本人还不断穿梭飞行于长沙和衡阳之间，插手湖南的政务、人事，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对程施加压力。

程潜则为了摆脱白的监视，制定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7月21日上午8点，程潜假借去邵阳视察，率20余辆汽车，从省政府门前出发，白崇禧亲自送行，目睹车队启程，才放心地飞往衡阳。一到衡阳驻地便立即打电话给邵阳专员兼保安司令魏镇，询问程的动向。问得非常仔细：在何处吃的中饭，晚上住何人家中等，所有细节都一一问清楚。

程潜在邵阳的活动一直曝光在媒体之下，起到了麻痹白崇禧的作用。28日，程潜调动车马，扬言去芷江视察。29日凌晨4点，程突然率警卫大队一部分人乘20辆卡车急返长沙，其余卫队乘另外20辆卡车延后两小时出发，以防不测。当第一批车队到达湘潭后，程潜仅带部分随员悄然脱离车队，下到早已准备好的一艘停靠在湘江边升火待发的汽轮上，改由水路飞奔长沙，汽车大队则仍沿公路返长。

汽轮并没有抵靠长沙市区，而是径直开到水陆洲靠岸。程潜一行下船，住进了长沙音乐专科学校。几经辗转来到此处后，程潜心情大好，竟对随员说：“小诸葛这次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上了。”几乎所有的回忆录和传记写到此处，便戛然而止了，但实际上游戏还远没有结束。

当程潜的汽车进入湘潭时，他专车的号牌即被交通检查站的特务发现，并立即报告给了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军：“程潜座驾于下午三时通过黄土岭回长。”毛即报告陈明仁。陈明仁其实早已知道此事，而且程回长正是应陈明仁密电请求回长共商起义大计。为防不测，陈明仁故作镇静，以车回并不能肯定人已回长为由，试图加以掩饰。但毕竟消息已经走漏，白崇禧立即布置在长沙城内外四处找人。

果不其然，程潜在水陆洲才待了一天，30日，特务就发现了程潜的踪影，并报告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见程潜不辞而别，判断必有他图，准备派飞机轰炸水陆洲。陈明仁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程潜。程潜当机立断，使出最后一手，于30日当晚乘小船过江，单车简从直驶毯子湾，只身来到我们家中，从此闭门不出，在毯子湾里秘密从事率部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完全摆脱了白崇禧的监视。

程潜与陈明仁生死相托

程潜又一次从白崇禧的视线中消失，白崇禧知大事不好，急报蒋介石。蒋介石听后极为恐慌，于是他痛下决心，于8月1日命黄杰、邓文仪由衡阳飞抵长沙，转达他给陈明仁的密令：“弟一生革命历史，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

据陈明仁贴身秘书陈臧仲回忆，陈明仁待黄、邓走后，仅拉上陈臧仲一人，急忙登车，陈明仁坐在副驾驶位上，不发一语，亲自扳动方向指示器，指挥着汽车急速前进。汽车由省政府出门，经又一村、先锋厅、八角亭、南门口转南大十字路，直奔毯子湾，入得院子，陈明仁便和程潜两人独处一室密谈。

陈臧仲坐在小客厅待命，突然屋内传出程潜的一声大吼：“这个大流氓！”原来陈明仁将蒋介石的电文抄件给程潜看了。这份抄件是写在印有“雪冰用笺”的信纸上的。“雪冰”是邓文仪之号，邓文仪亲手交陈明仁的，确凿无疑，铁证如山，故程潜怒不可遏。

陈臧仲是程潜的侄女婿，我的亲姑父。他的儿子后来告诉我，说当年陈明仁曾对程潜说过一句发自肺腑的话：颂公（程潜字颂云），当年在学校里是我不懂事，对不起您老人家。这次我一定拼命保您成功。

陈明仁不仅和程潜是醴陵老乡，而且他们有师生之谊。当年作为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兼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程潜破例招收陈明仁进了讲武学堂学习，让他从此走上了尚武之道，陈明仁一直感恩在心。但后来陈明仁等一批学生吵着要转学黄埔军校，反对过校长程潜，因此陈又一直心怀愧疚，故有此言。

8月1日，就在知晓蒋介石密令的这一天，程潜即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并向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发出了呼吁和平的通电，历数蒋介石之罪行。接着程潜和有关人员在毯子湾里一连开了三天的紧急会议，研究起草和平起义的相关文件，和中共代表商讨起义细节问题，并在这里签署了和平起义通电的最后文稿。据我母亲朱启畴回忆，和谈代表有方叔章、李明灏等人。他们每次来家都受到我家的热情接待，有时错过了就餐时间，母亲就叫工友赶快煮几碗面让他们填饱肚子再工作。而他们进出毯子湾，都是坐着父亲的小汽车，谁也想不到公路局长的车上坐的竟是中共的代表。

8月3日，程潜以个人名义致电“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邓政委：潜等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潜与子良兄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绝不阻碍接管最关紧要之军事行动……”据我母亲回忆，这里还有一段令大家紧张的插曲。那就是这些电报稿都是由我的母亲秘密带出毯子湾，通过长沙市电信局一个地下电台发出去的。第一次向北平的中共中央发报时，因使用密码有误，北平收到后不知所云，紧急来电追询。遭此意外，大家吓得不知所措，几经折腾，才又调整密码再度发出对接成功，方让大家舒了一口长气。

8月4日下午，程潜走出隐身之地，通过广播电台、报纸，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名义领衔正式通电起义，历史就此揭开新的一页。

8月5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程潜：“……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溥海同钦。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同日晚十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进入长沙城，湖南得以和平解放。

8月4日至7日，自程潜宣布起义后，气急败坏的白崇禧从衡阳派飞机飞临长沙，轰炸省政府和南门外的毯子湾程潜住地。这时我们家的防空壕派上了用场，一有警报，大家便蜂拥着钻进防空壕中，记得程潜叔祖父大人也和我们小孩子一起“躲飞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立即对程潜毯子湾住处加强了保护，第二天我们家后面的小山上就架起了几门高射炮，记得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时，这些高射炮还开过火。当时那份紧张的气氛和妈妈护着我轻声叨念着“观音菩萨保佑”的声音至今仍记忆犹新。

毯子湾就这样上演了它的传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完成了它的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变迁史拾遗

秦旭卿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教授在“百家讲坛”讲了国歌的变迁历史，使我受益匪浅。但我觉得还须补充几点史实。

一

作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它的原版歌词是这样来的：

1934年秋末，田汉写作了电影故事《风云儿女》。交给夏衍后，有一天他突然文思喷发，随手抓起一张香烟盒的衬纸，在上面写了主题歌的一段歌词：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

前进！

当时，这歌词命名为《军歌》。写好后，就交给正在编写电影剧本的夏衍。田汉本来还打算写几段的，但在1935年2月19日，他被国民党政府以“宣传赤化”罪逮捕入狱，就未续写了。

聂耳听了这首歌词以后，激动不已，便主动请缨，要求承担谱曲任务。他拿到歌词后，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构思，仅用两个晚上的工夫就谱成了乐谱的初稿，后来带到日本修改完成后寄回祖国。令人悲痛的是，人民音乐家聂耳这一次在日本游泳时不幸葬身大海，竟看不到他的乐曲在神州大地广为传唱的盛大场面了。当时他年仅23岁。

特别要指出的是，聂耳在谱曲的过程中，还对歌词作了推敲、加工、润色，比如把“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修改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把“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修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尤其是在“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聂耳添上了“起来！起来！起来”，三个词重叠，增加了无限的激情和号召力。歌词的后部加了两个“前进”，结尾用一个“进”字，好像火山爆发，雷霆万钧，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啊！这样，这首歌就更加铿锵有力了！

聂耳又把《军歌》改为《进行曲》，最后才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沿用至今。

还有一件事也该在这里提一笔。1949年春天，中国代表团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也是唱这首歌，只是郭沫若先生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后来还一直被争议，但是用居安思危的观点把它保护下来了。

二

抗日战争时期，《义勇军进行曲》流行很广。国民革命军二〇〇师师长、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戴安澜将军，还把它定为二〇〇这个师的军歌，用它来鼓舞士气。

在学生中还有英文版流行。其歌词如下：

Arise!

You who refuse to be slaves,

with our very flesh and blood build up our new Great Wall.

China masses have met the day of all danger;

Indignation fill the hearts of our countrymen .

Arise !

arise ! !

arise ! ! !

Many hearts with one mind , beat the enemy’ s bonfire,

march on,

march on,

march on,

on !

此英语歌词译得很好，水平甚高，但译者及出处、年代均不详，后来也不见出版，看来已经失传了。有一次我在加拿大看台北出的《世界日报》北美版，见一位台湾老人能清晰地记忆出来，并且能笔之于书，写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英文歌词就是我从当时剪存的报纸（2001年10月13日）上照抄下来的。

三

“文化大革命”中，大革文化命，这首国歌，也难免劫难。因为歌词作者是田汉，他是“四条汉子”之一，屡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至于1968年12月10日被迫害致死。哪能把他的作品作为国歌来唱呢？所以开大会的时候，往往只奏《国际歌》或《东方红》，只在非用国歌不可时，比如在外交场合，才奏聂耳谱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奏田汉创作的歌词。

“四人帮”倒台以后的一段时间又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支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田汉作的歌词删掉，另填新词。据说新词的作者是李焕之，却署作“集体填词”。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邮政”出了纪念邮票，编次为4-45（1—1），面额为人民币8分。现将歌词照录于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聂耳曲

进行曲速度集体填词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

前进！

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中国人民邮政4-45（1—11）1979

对新写的歌词，一出世就存在不同的意见。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废除新词，恢复《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貌，定为国歌。“中国人民邮政”又出了纪念邮票，票面人民币20分，编号J22（2—2）。现将歌词照录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词

聂耳曲

进行曲速度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中国人民邮政J22（2—2））

到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写入宪法。宪法的第四章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法定的正式的国歌了。

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和谱曲者聂耳两位先生也当含笑于九泉了！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与长沙交通银行

黄新华

1994年10月22日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大师诞生100周年。1993年盛夏的一天，笔者慕名来到长沙梨园界老人黄曾甫住宅，同行的有我父亲黄志中的同事李芸菁先生。当晚辈的我向黄老等说明拜访的来意并向两位老前辈求教，主题是关于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首次到长沙演出的情况。

黄老喝了一口茶，精明地拉开了话匣子说道："那时梨园界有南欧（欧阳予倩）北梅（梅兰芳）之说，长沙先后有京剧生角言菊朋、马连良，旦角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徐碧云等先后来演出，只有梅兰芳未来过长沙。因此，当时长沙戏院经理萧石朋经多方努力，邀请梅兰芳。梅兰芳于1937年3月16日从汉口乘快车于当日上午九时抵达长沙。梅剧团抵长时，各界人士前往车站迎接，梅兰芳与欢迎人们答礼后，下榻长沙交通银行。"黄曾甫老人吸了一口烟，精神抖擞地说："那时我负责编印《长沙戏剧小报》，梅首次来长，我们即为梅洗尘。请客吃饭，当时使用的长筷子、大调羹（长沙俗语，即汤匙）。梅先生对此不解地问我，我当即答道：'这是长沙人客气，给客人敬菜用的。'梅当时送我两件珍贵礼物：一是他自绘的梅花屏条，二是梅兰芳本人40岁时的照片（可惜此照片在"文革"期间已被人抄走）。"

对于与梅先生当时的接触交往，黄老深有感慨地说："梅兰芳为人谦和，客气得很。"

"梅兰芳当时为什么选择长沙交通银行为住处呢，有以下几个因素：1. 梅兰芳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股东、董事成员；2. 长沙交行有麻石（即花岗岩）屋，既结实又安全；3. 银行有行警持枪守卫；4. 有地下室、防空洞设施；5. 有小汽车，交通工具使用方便（当时长沙全市仅有3台小车）。当时是由交通银行长沙支行经理魏云千为主接待梅兰芳的，说明梅兰芳与京、沪等地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也都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

黄老和李老两人继续回忆，向我介绍说："那时长沙戏院是用扇子形木棚架作临时剧场，位置即现在长沙市小瀛洲空坪、银行宿舍。当时由杨七爷在长沙青石桥碧云轩纸铺负责卖票，票价单位为银圆：特座四元八角，优座三元六角，雅座二元六角，厢座二元二角，楼座一元六角，后楼一元二角，正座（站票）一元；创湖南省戏曲团体演出门票价格的最高纪录，而买票者拥挤，盛况空前。演出期间，警方为维护场内场外秩序，还发布了《处置车辆办法》的告示，如人力车概不准驶入丰瀛里及小瀛洲、吉庆巷内等。"两位梨园老人又继续回忆梅剧团当时为长沙市民演出的节目单，扳着手指头说："3月18日晚上在小瀛洲长沙戏院开演，首场演出《宇宙锋》，至31日的十四天中，先后演出《探母回令》、前部《西施》、《凤还巢》、《武家坡》、《银空山》、《大登殿》、《洛神》、《枪挑穆天王》、《宝莲灯》、《木兰从军》、双出《法门寺》、《奇双会》、《廉锦枫》、《太真外传》（三、四本）、《春秋配》、《水涌金山寺》、全本《三娘教子》等十余个剧目。"

因天气炎热，黄曾甫、李芸菁两位老人年岁已高，不便细谈，我便告辞了他们，带着满足的心情踏上归途。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长沙分行）

我在湘西剿匪

郑　波

渡江入湘

1949年7月，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发动了宜（昌）沙（市）渡江战役。我团所属的47军负责攻取宜昌。我当时在47军141师422团任团长。7月16日占领宜昌。守敌宋希濂部退守湘江鄂西及川东。我军顺利渡过长江。因北方部队不适应南方气候，部队产生大量病号。于是过江后就在宜都休整了一个月。8月湖南长沙和平解放。47军就在9月中旬南下，到湘北的常德、慈利、石门地区，接受了经营湘西的任务。所谓经营湘西，就是要剿灭百年匪患，建立新政权。当时正值四野发动衡（阳）宝（庆，即现邵阳）战役。47军作为战役右翼，负责歼灭驻宝庆、大庸的国民党守军，然后进入湘西。139师与140师一部负责攻歼大庸之敌，141师负责攻占桑植县城。10月14日战斗打响，16日全歼大庸守敌122军，141师421团同日也攻占桑植城。我422团接着进军永顺，19日解放永顺县城。师部命令我团暂驻龙家寨。421团继续向龙山前进，准备解放龙山县。但进至洗车河即被命令停止行动。因为当时第二野战军正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准备在进军过程中，歼灭防守在湘鄂西及川东的国民党军队宋希濂部。如果我421团过早攻占龙山，就可能引起宋部警觉而撤退逃跑。在我军解放大庸、桑植、永顺等地的威慑下，湘西永顺地区的土匪开始动摇，有的投降（如聂鹏升等），有的则分散隐藏（如师兴周、张平等）。

入川作战

10月底，47军受命以军部率139师及141师两个师参加二野发动的川东战役。我422团于11月1日由招头寨出发，经冯家坝到郁山镇，途中收缴散敌两百余。逼近彭水县城，发现二野部队已有8个团被堵在乌江前，我师即退回10里路，北渡乌江，从右侧迂回敌人，我团11月19日在土地坳追上了正在中咀南渡乌江的敌243师，歼其800余人。421团攻破敌二峰关防线，423团又南渡乌江，在白马截击了宋希濂的指挥机关，使敌乌江防线崩溃。我军继续追击，直逼重庆，为防止重庆敌向北撤退，我师于11月29日晚在河口、木家坝北渡长江。423团在渡江后西进时，发现江面上停有几艘民生公司的火轮船。他们就乘坐这几艘轮船，于30日黄昏进入朝天门码头，解决了敌江防舰队并进入重庆市。我422团11月30日急行军120里经火炉铺当晚到达重庆北的两路口，切断了重庆向北的公路，歼敌200余。为防敌由水上北逃，我团当晚又派出了一个加强营，急行30里攻占嘉陵江畔的悦来场。天明后又截获由水上北逃的敌船数十只，歼敌3000余，内有敌副军长一名。至此川东战役结束。在这一个月的追歼战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四川民谚：“养儿不怕娇，酉、秀、黔、彭走一遭”的含义。什么“十八盘”、“四十八拐”、“摩天岭”、“南天门”等，光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多么险峻难行了。北方带来的高头大马，面对这样的山路，根本不敢走，上到半山，四腿发抖，就滚到山沟里摔死了。我的坐骑就是这样驮着我的行李摔下山去的。这使我在返回湘西时，只剩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了。在追击中，我连脚上穿的鞋子都没有，穿着布袜子走了两天。后来捡到一双烂胶鞋才勉强保住了脚。

返湘剿匪

在重庆休整总结了半个月，12月下旬，坐船回返。当大军入川后，湘西分散潜藏的土匪，又复聚积起来，向我留守部队袭击。我团下船后于12月31日进到湖北利川县城。第二天是1950年元旦，我原打算部队休息三天，让大家过个新年，结果当晚即接到师部的电报说，龙山的里耶镇，聚积各路土匪万余人，正在开会，你团迅速南下，歼灭该敌。这样我们就没敢休息，第二天继续行军，经来凤县城到了龙山县城。这里有421团的留守人员，我向他们了解里耶匪情，他们因距离远，也说不清楚。当时我想，里耶有土匪万余，我们团只有1600人，而且有一半还是穿黄军衣的新兵。（当时第四野战军的军衣是墨绿色，国民党军的军衣为黄色。我们入川追歼战中，部队伤亡、行军掉队和产生病号等减员很多。于是就将抓到的国民党军俘虏兵，挑选好的随时补入连队。所以穿黄衣服的兵就占一半。）这个仗该怎么打，应认真考虑。从龙山城到里耶要走招头寨、明溪、二所、内夕棚，这都是土匪的老窝，我们的行动企图很容易被土匪发现。我决定走到保靖去的路，麻痹敌人。于是我团于1月10日从龙山县城出发，经洛塔、洗车河、苗儿滩，于12日到达隆头，隆头往南到保靖，向西60里到里耶。当晚我们一方面公开找向导宣扬到保靖去，同时秘密找到里耶的向导，准备第二天给里耶土匪一个突然袭击。但是事后才知道，我们的行动企图，早已被假投降的贾奇才报告给他的舅舅师兴周了。贾奇才是师兴周的外甥，师派他跟随保靖的聂鹏升当差，当我大军压境聂鹏升投降时，贾奇才也跟着投降了。但他是假投降，利用接触解放军的机会，搞

情报向师兴周报告，后来他又反水为匪了。我团第二天以第三营在酉水以南，团主力一、二营在酉水以北，分两路沿酉水两岸经比耳向里耶前进。到下午 4 时，在里耶以东的岩冲与预先在那里布防的瞿波平匪部接触，我团即展开进攻。师兴周、陈子贤等匪首凭借他们的兵力优势，认为解放军只有千余人的一个团，完全可以对付。所以就兴致勃勃地跑到里耶村子东头观战。没料想正面防守的瞿波平匪部，被我团一、二营一个突击就击垮向北撤退了。第二营又攻占里耶河南并乘船过河攻入里耶镇。师兴周、陈子贤等见势不妙，来不及回住所收拾东西，连手杖都没拿，即随大队向西、北方向逃跑了。我团仅俘获数十人。

攻打八面山

占领里耶后，才从群众口中知道，土匪在这里已经驻扎半个多月了，并在八面山脚下的小村岩克莱洛开了会议，成立了所谓“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师兴周为总司令，瞿波平为前敌总指挥。群众纷纷议论说：“土匪又上八面山了。”对于八面山，我们最初以为就是一座山。但看群众议论的表情与听他们的口气，都很沉闷与无奈。后来经详细了解才知道，八面山是一个大的山区台地。东西长十余里，南北宽二三十里。最高处标高 1000 多米，周围是悬崖绝壁。山上有数十村庄，分编两个保。西壁岭保公所是土匪常住的地方。群众上下山，只能走人工修的梯阶小路，人称岩口。这种岩口小路当地群众说有 23 条，只有西侧通四川方向的一条叫牛路口的比较平缓，人畜都可以行走。群众说，龙山土匪以八面山作为根据地，已有百年的历史了。山上有个燕子洞，是他们的司令部，里面储存了不少粮食弹药。据说洞很深，里面有暗河，可以通到四川。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上八面山。民国三十五年，国民党的一个师都没攻上八面山。后来上了山，也打不开燕子洞。对群众的这些反映，我虽有怀疑，但确实引起了我的警惕。这时师里派侦察科长陈志孝带着投降的聂鹏升来到里耶，原打算争取师兴周的。我询问聂关于八面山的情况，他说群众说的都是实情，但是他没有去过八面山。1 月 16 日收到师部的电报，说 421 团即日从龙山县城南下，要我们两个团于 18 日攻打八面山。421 团从八面山东北侧的西眉峡、望乡台的两个岩口进攻；我们 422 团从八面山南面的大、小岩门两个岩口进攻。这时我团都在分散搜剿散敌，要收拢来再开到八面山脚下，时间来不及，所以我向师部提议推后到 1 月 20 日再打，师里同意了。

根据群众反映的八面山地形特点和土匪情况，我很担心部队会因轻敌麻痹大意而吃亏。所以在部队的动员大会上，我反复强调要从入川追歼作战胜利的喜悦中解放出来，对土匪作战不轻敌，不大意，不要在小河沟里翻船。我组织连营长，

都换上便衣，伪装成砍柴、采药的老乡，逼近到八面山脚下侦察地形与敌情。当时又了解到大、小岩门这两个岩口，各有三四十个土匪把守，都住在崖口除垢宾草棚子里，人数虽然不多，但上山的路十分难走，特别是接近山顶的悬崖处，路狭窄而陡峭。土匪在那里设了路障，修了柴门，他们自己人通过时就撑起，过后又放下。对这一段路，土匪不仅可以用火力控制，而且土匪在山上准备了大量石块，仅用石头砸，外人就很难攀登上这段路。当时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山上的土匪一旦失利，就会从牛路口向四川方向逃跑。根据现地进一步了解到的这些情况，我觉得用正规的进攻打法，先用炮火轰击，然后支援步兵突击，会伤亡大又很难成功。但匪兵都是些没经过训练的老百姓，战斗力并不强。而且这样的地形，我们进攻也不可能展开很多兵力。所以我决定全团三个营分三路，采用夜间偷袭，然后强攻的打法，这样总会有一路成功。

具体部署是：一营从小岩门进攻，若登山成功，就直插山上保公所西壁岭，并派一部到大岩门接应二营；三营于 19 日黄昏后出发，沿八面山南麓绕到牛路口，堵截可能向四川逃跑的土匪。一旦一、二营都进攻失利，就从牛路口上八面山，从背后袭击土匪，接应一、二营；二营在大岩门为团的主攻点，于 19 日晚 12 点出发，利用暗夜掩护和土匪正在熟睡的时机，秘密接近土匪设在岩口下的柴门障碍，用爆破方法破除它，并迅速突上去，消灭草棚的敌人。一旦突击成功，就派一个连去封锁燕子洞匪司令部，不使敌进洞与逃跑。若发现一营突击未成功，就派一部从山上去接应一营；团迫击炮连在二营突击的大岩门下方选择阵地，射击目标为匪睡觉的草棚，再延伸 200 米。各路突击成功时，打绿色信号弹三发。各路突击开始时间都以二营大岩门的爆破声为准。二营爆破时间为 20 日 3 时整。

我下达完命令后，团炮连连长问我：“为什么不打草棚，还要延伸 200 米？”我告诉他：“我们是夜间作战，观察不便，事先所测的射击距离不一定准确。而部队在我们爆破后就冲上去了，延伸远一点，可避免伤到自己人。常言道，新兵怕炮，老兵怕机枪。对这些缺乏训练的土匪兵，炮弹即使落在他们后方，他也是害怕的。假若土匪向后逃跑，也是一种拦截射击。”在我和炮兵连长谈话时，二营营长狄进喜也在给各连交代任务。他决定五连担任突击连，六连为第二突击连，四连为预备队。当要给四连交代任务时，发现四连连长杨宝山正在向山下走，营长将他喊回批评：“正在分配任务，你乱跑什么？”杨很不高兴地说：“没有我们的任务，我听什么？”“怎么没有的任务？你们四连为预备队……”营长还没说完，杨宝山大声喊道：“我不当预备队，我要当突击连！”我发现杨宝山这种积极求战精神很可贵，就插话说：“那你们五连、六连哪个与四连换换？”这时

五连连长赵汝斌、六连连长姜孟顺纷纷笑着骂杨宝山："你这小子耍阴谋，想抢我们的突击任务呀？"杨宝山也笑笑说："谁的任务我也不抢，如果要我攻，我就从这里上去。"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是大岩门与小岩门之间一处悬崖不连接的地方。地势很陡没有道路，但杂草很密，也间有几株灌木丛。我想既然没有道路，土匪就不会设防，如果真要能有个小部队从那里攀上去，倒真可出敌不意。我看看狄营长，他也在微笑着点头。于是我对杨宝山说："你们连可以从那里进攻。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在大、小岩门两个岩口没有打响之前，你们的行动要肃静，不要石滚、人喊，惊动两个岩口的敌人。二是你们上去后，若大、小岩门都没打上去，你们兵分两路去接应他们。"这样矛盾都解决了。

20日3时二营按计划开始爆破柴门路障。接着迫击炮弹在山上爆炸。我让团的司号长吹号——全团总攻击。虽然我知道一、三营听不到，但可以给二营助助威、激励一下士气。大约20分钟后，大岩门口上方出现了三发绿色信号弹。五连突击成功了。半小时后，小岩门一营方向，四连方向也都冉冉地升起了绿色信号弹。各部队上山后，按计划展开行动，五连包围了燕子洞。副团长刘继民随一营上山后，发现土匪纷纷向西逃，他指挥一营一直追到牛路口，见土匪已逃下山。这时三营也到了牛路口山下，截获一匹骡子。得知土匪已逃下山，即跟踪追击，追过一个山头，发现一两百土匪正在集合讲话。三营一阵冲打，土匪向四川方向散逃，只抓到十余人。下午两点左右，各营都先后来到大岩门口燕子洞附近，都说没有见到421团的部队，但听到东北方向有隐约的枪炮声。我让刘副团长带上四连去联络一下。结果发现西眉峡、望乡台两个岩口的土匪，仍在搬石头、打枪阻挡421团的进攻。四连部队从后面突然袭击，消灭了两个岩口的敌人，才将421团接上山。原来421的团部设在内夕棚师兴周的家里，内夕棚的村长表面上很热情殷勤地招待他们，暗地里把他们的情况天天送到山上。加上他们是白天进攻，所以被阻在悬崖的梯阶路段，怎么攻都上不去。

我团集中到燕子洞附近后，我看了燕子洞的地形，那是在一段不到200米长的悬崖上并排的四个山洞。从两边山上进洞，沿悬崖向下走一段阶梯小路。据俘虏讲，洞内是相通的。四个洞口外有人工凿成的约一米宽的小路相连接。下面是悬崖深渊，土匪只要用火力封锁住两头上下山的阶梯小路，任何人都很难进洞。这时天气阴暗，虽然是下午3点左右，但暗得像黄昏。我考虑攻打燕子洞要用火炮，只能白天打，现在天已昏暗，部队从昨日下午饭后，至今尚未吃饭，不利行动，且师里曾派聂鹏升来争取师兴周投降，我们何不也争取他一下。若他不投降，明天再打。反正两头的进出路我们都已占领，他也跑不了。于是就给师兴周写了一封劝降信，找了一个年纪大的俘虏，他自称是放牛的，送进洞去。我们部队就在附近村子休息做饭吃了。入晚以后，五连的战士怕土匪逃跑看不见，就找了许多树枝柴草在两头的路口燃起了篝火。但后来天下雨把火淋熄了。土匪也怕我们夜间进攻，就在每个洞口用大碗桐油点燃照明。五连的哨兵又用枪把这些桐油灯打熄。所以燕子洞周围一片漆黑。天快亮时，一营的哨兵抓到一个土匪，说是从燕子洞跑出来的。我急忙打电话问五连连长赵汝斌，他说不可能。我让他马上准备进攻。我当即赶到五连，天已大亮，部队攻入洞后，发现除了昨晚送信的那个土匪外，已空无一人了。这个送信的土匪就是师兴周的马夫。据他说："师兴周平时是住在洞里，19日晚上他到西壁岭保公所吃喜酒、抽大烟没回洞。半夜听到大小岩门有炮声，他急忙起身要回洞，没走多远又看到许多绿色信号弹。他又下命令走牛路口向四川跑。我牵的骡子也跑丢了。我正在找就被你们俘虏了。洞里有四五十人，都是他的卫队和随从人员，我送信进去，把情况一说，他们都很害怕，就在半夜趁着下雨，大家找来绳索又把腰带、头帕子连接起来，一个一个地从中间那个洞口吊下去逃跑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失误。我看地形只看到洞口上下都是悬崖，没有发现悬崖下方，已被积年累月的碎石、垃圾堆积成一个缓坡了。后来让这个俘虏看了三营缴获的骡子，他说那就是师兴周的坐骑。这样，三营打散的那一帮土匪，就是师兴周了。我们在洞子里搜索收缴了师兴周的电台、电报稿、数十支枪和一些弹药、几千斤大米、几百斤食盐、茶油和腊肉。这次八面山战斗，没有大股消灭敌人，但摧毁了师兴周的老巢，使土匪后来再也不敢进燕子洞了。

古丈剿灭张平匪部

部队在八面山周围清剿了几天，没发现大的匪情。2月16日是农历新年，我团在里耶附近过了春节。2月25日奉命到古丈县去参加军里组织的围剿张平的战斗。古丈也是422团负责经营的县。

张平又名张大治，是古丈县李家洞人。自幼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尽干坏事，16岁即玩枪拖队，自任民防团局长，当过县警察局局长，县长也得听他的，否则就将县长赶跑，他自任县长。当县长后，横征暴敛，什么人头税、火坑税、大烟税、碉堡税、机枪捐、子弹捐等等名目繁多，老百姓交不出，就重罚坐牢，甚至杀头。他杀人如麻，而且是一杀就杀全家。他奸淫他的婶娘，有人讲他，就全家被杀。据粗略统计，他杀的人有300之多。所以古丈民谣曰："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水见张平，混浊不清。人见张平，九死一生。"他为了扩充实力，强迫各户买枪。到我们围剿他时，已有两千多人枪，以乡为单位编为支队，

乡长即为支队长，共六个支队，另有两个直属支队。他的头衔为暂编第11师师长兼古丈县县长。

军里的围剿部署分三路：东南沅陵方向由军直警卫营及其他部队组成；西南方向由139师416团两个营，向古丈县城围攻；我们422团从北面直捣张平老家李家洞。当我们于25日由里耶出发向永顺以南酉水边的王村开拔途中，师里又将我团一营调去参加423团进攻五连洞的战斗。所以当我团到达王村时就只有两个营了。军里计划的战斗发起时间是3月3日。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在王村了解到的情况是：古丈是个山区县，全县只有4万人口。从王村渡酉水后到李家洞有七八十里路，中途要越过一个1000多米高的大山——高望界。那里有匪兵四五十人防守，是张平的一个前哨。从高望界到李家洞，张平设了三道防线。防守的部队都是他的嫡系，武器装备都是较强的。当时我想，在这种地形上对付这样的敌人，如果大白天一个一个山头地攻，那会增大伤亡与弹药消耗，也会延误时间。所以我决定采用夜间突然袭击，夺占高望界，然后急进直追打法。3月2日是农历正月十四日，天虽然阴着，但上半夜能见度仍很好。黄昏后，我们秘密渡过酉水，经罗依溪于3日2时进到高望界大山的半腰。部队停下原地休息，吃干粮喝水，排除大小便。3时半，月色逐渐转暗，也正是土匪麻痹熟睡之时。二营事先组织的突击队（36人，全部带冲锋枪）从正面、左右两翼分三路向山顶摸去。大队随后跟进。果然山上土匪大部在酣睡，少数在烤火取暖。突击排一阵冲锋枪猛扫，除毙伤10余人外，其余则惊慌逃散。我们于3日拂晓占领了高望界。从高望界向东向南观看，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北面是蜿蜒向东的酉水，东面就是通向李家洞的大路。李家洞通古丈的大路，就在山下交接。事先就听说张平在这条路上的险要处布置了三道防线，但是在大路以南的广大山区，他不可能处处都摆上兵。所以我就将两个营分开，团部带二营沿大路直奔李家洞。当时副团长参谋长都不在，我就派作战股长杨国栋指挥第三营，从南面走山地小路迂回夹击李家洞。事后了解到，张平那天本是准备晚上闹元宵的。没想到高望界一下就丢掉了，又听到高望界跑回去的兵惊慌万状的报告，各关卡防守的匪兵也都慌了神，张平虽下命令坚决抵抗，但当我二营的突击队在团的炮火支援下猛打猛冲时，各关卡的防线也都很快土崩瓦解了。下午3时许，二、三营在李家洞会合，张平率匪部仓皇逃匿。我们团部就设在张平家里。这时村子的老百姓全跑光了，只有两个老年病人躺在床上，问他们什么都不说话。各单位都反映找不到房东，筹不到粮食，找不到做饭的锅，在院子地下找出的带泥土的谷子，不能吃。我们知道这是张平用空舍清野的伎俩，想把我们饿跑。但群众这样做都是被迫的。第二天，

我们一方面组织骡马去王村运粮，一方面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将群众家的院落打扫干净，没有带走的鸡、猪、牛、羊，帮他们照管喂养好。到附近山上帮群众看病，动员群众回家。开始群众不敢接触我们，不敢回家。但两三天后，群众在山上待不住就陆陆续续回来了。在我军严明军纪的感召下，群众开始向我们提供情况了。3月7日得悉张平聚集在西边二三十里的山沟里，这时已从王村驮回大批粮食。于是3月8日，就以二、三两营从李家洞出发，分南北两路奔袭夹击张匪。但赶到那里后扑了空，张匪已转移。到哪里去了，群众说不清，只说向南走了。我们决定跟踪搜索追击。3月10日在追击途中，遇到一个挑箩筐的老乡，盘问之下，说是给住在李家寨的张平匪部送粮的。有了确实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决定连夜追击，袭击李家寨。当夜下雨，部队冒雨行军，半夜冲入李家寨。土匪大乱，四处星散逃窜。但三营因避雨没有按时到位形成包围，以致大部分土匪都跑了，只抓到百来个，也多数说是老百姓。张平的兵本来就是民匪一体的，所以也就大部释放了。部队分开在附近搜剿了几天，收获甚微。

我们回到李家洞张平家里，发现牲口厩里多了一匹骡子，找老乡一问，说这是张平骑的骡子。我们分析可能是那天晚上慌忙逃跑，把骡子丢了，骡子后来自己跑回家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张平的大股土匪已被击散，匪兵都跑回家了。我们将情况上报后，军里决定军直属部队及416团均各返原驻地归建。古丈县就只留422团继续剿匪建政。这时上级派来了县委书记、县长及一批地方干部，于是我们团部移到古丈县城，正式建立起人民政权，我们部队则分开进入各区乡，与地方干部一起按照军区关于剿匪完成任务三条标准（匪官兵全部归案、枪支收缴净、人民群众初步发动）的要求，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清匪、挤枪、反恶霸斗争。因为张平的乡保长就是支队长大队长，我们就用县政府名义，召开乡保长会议，要求他们与张平划清界限，交出各支队、大队、中队的花名册，按花名册的人员，向政府登记自首，并交出枪支弹药及其他武器。这样到4月上旬即登记土匪两千余，收缴各种枪支两千余支。各支队长、大队长及班排长也都归案了。唯独张平和他的亲信头目尚未找到。据事后了解，张平在李家寨被打散后，身边只剩十来个人，隐藏了几天，见我军清剿甚急，又听说龙山的瞿波平把解放军从县城赶跑了，就想去取取经。他到龙山后，正是瞿波平攻龙山败退回来时，不仅没得到瞿的支持，反而碰了一鼻子灰。待他5月初返回古丈后，古丈的群众已初步发动。他还想用杀人的手段报复群众，但他一露面，就有群众报告，所以屡屡受到打击。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他独自一人在李家洞附近的山上躲藏。7月10日他在小里溪的山上，饥饿难耐，又犯了鸦片烟瘾，看见张高升的小儿子张学意独自一人

在地里劳动，就走到跟前要他回家取点吃的和鸦片烟来。张学意回到家和父亲一说，张高升要儿子稳住张平，自己则马上向区政府报告。当地驻军和区政府工作人员立即出动包围擒拿，张平见状仓皇逃跑，被群众乱枪打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人生。是年他 44 岁。

调回龙山剿匪

当 422 团离开龙山开往古丈后，龙山就只剩 421 团了。龙山分散潜藏的土匪又聚集起来闹事了。杀害接近解放军的群众，伏击解放军过往的小分队和零散人员。已经投降的贾奇才匪部，又反水为匪，攻打我新建立的里耶区政府，4 月 22 日又围攻我驻守该乡的一个连队。匪首瞿波平也打出了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旗号，要大干一场。这时又适逢我军改变剿匪办法……暂时放弃边缘区，先集中兵力在中心区剿匪建政。龙山县城到里耶一线，均属边缘区，421 团团部和县党政机关均于 4 月中旬迁移至苗儿滩。在转移过程中，一路都遭到土匪打枪骚扰，掉队的病号也被土匪捉去杀掉。到达苗儿滩后，也天天有土匪在周围山上打枪恫吓，并放出谣言要攻打苗儿滩。群众人心惶惶。这时县城只留了一个连与县公安局的人防守。瞿波平就带领土匪攻打县城，后被击退。正当这时，421 团的谢团长奉调去军事学院学习。上级命令调我到 421 团任团长。我原本在 421 团任副团长，1949 年部队由平津地区南下时，才调任 422 团团长，现时隔一年再回 421 团，在人事上都比较熟悉。当我 5 月份到达苗儿滩团部时，大家纷纷向我讲述土匪猖狂的情况，有人甚至提出调点部队来保卫军政机关。我向大家说，先集中兵力清剿中心区土匪，是军区总结了前一段剿匪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是全省的统一部署，我们不能随便调动部队。现在龙山这些土匪的猖獗活动，是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认为我们暂时放弃一些地方，是被他们赶跑了。不要过很久，他们就知道厉害了。现在的土匪，就像一群狗围着一个陌生人，你站着不动，它就围着你狂吠。你若害怕躲避，它就会扑上来撕咬你。你若弯腰摸石头要打它，它就夹起尾巴跑了。对于现在土匪的猖獗活动，首先是我们要沉着应付，不要惊慌。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了干部会，进行动员安定民心。并将收缴来的土匪的枪支，挑选好的分发给各单位，所有干部战士，不论通信员、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饲养员、炮手、医生、卫生员等都人手一枪。区分了各单位在苗儿滩四周的防守地段，并挖掘工事，设置哨卡，规定了几种情况的行动方案。苗儿滩每 5 天一次墟场，在墟场那天我们在小学门口的操场上开了个军人大会。三四百人枪把个小操场快坐满了。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当然也有土匪的暗探。我亲自上台讲话，我说："我们这个部队打了八年抗战，把日本鬼子赶跑了。又从东北一直打到江南，打了许多大仗、

硬仗，前一段又追击宋希濂到四川，解放了重庆，可说是无往而不胜。但是到这湘西剿匪，却有点'张飞抓苍蝇——有劲使不上'。我们集中去打他，他就分散藏起来了，我们一分散，他又集中起来闹事，使我们很恼火。现在土匪放出话来，说要来攻打苗儿滩，这可是个大好事。我们找都找不到他们，现在他送上门来让我们打，这还不好嘛！大家把我们的作战方案好好练一练，土匪从西边来怎么打，从南面来怎么打，四面都来又怎么打。坚决打他个有来无回。"我刚讲到这里，团宣传队长马上站起来，高举手里步枪，领着大家喊口号："做好准备！""坚决消灭土匪！"大家都跟着喊。我马上大声制止："千万别喊！千万别喊！你这一喊，土匪还能来吗？他不来，我们怎么消灭他呀！要做好准备，但要保密。"这次大会开过后，打冷枪的现象没有了，进攻苗儿滩的谣言也没有了。

稳住了苗儿滩后，我们了解到瞿波平在招头寨一带集中了几百人，在抢收鸦片烟。6 月初我们组织一营几个驻守点的部队，对他来了一次多路奔袭合围。他逃向四川，遭到四川方面的打击。逃向湖北来凤一带，又遭到那里部队的打击。无奈又回到龙山他的家乡明溪、二所一带分散隐蔽起来了。大股土匪消失后，我们部队也相对分散配置，宣传发动群众，一旦发现匪情，即组织突袭。

6 月下旬在他砂乡清剿的二营，得到群众报告，匪旅长田高年带数十土匪隐藏在牛栏洞里。于是就让二营组织攻歼。田高年是龙山他砂乡信地村人，大地主后代。是个张平式的人物，自幼为非作歹，当过警察、乡长，杀人无数，杀过红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前是曹子西匪部旅长。我大军南下入湘西时，他假意投降，我军入川后，他又与另一股土匪魏金万勾结反水为匪。我军从四川返回湘西剿匪，他见势不妙，就囤积大批粮食弹药于牛栏洞，等待变天。他向当地群众宣称："我田高年不是好惹的。谁要向解放军说出我这牛栏洞，我杀他个鸡犬不留。牛栏洞就是小台湾，解放军休想攻得开。"

据群众介绍，牛栏洞是田高年所在的他砂乡、云峰村附近大山中的一个山洞。此地两山对峙，山高谷深，树木茂密，谷底是一条名叫梭多河的河流。沿着河流向里走约一里路，再向上攀援百余米，就到了牛栏洞的洞口。洞口外有百十平方米一个草坪，是匪徒们放风活动的地方。洞口不大，但进洞几十米后，即向上形成一个夹缝，名曰天洞。天洞直通洞口上方，像嘴巴上方的鼻孔一样，可监视控制洞口外的一切活动。从天洞再向里向上走，通过一段狭窄的通道，此地叫天门。过了天门就是风洞，一年四季都是刺骨的阴风森森，吹个不停。风洞向下是水洞，水洞周围是大大小小的干洞，这就是土匪们休息的地方。这样的地形，在十恶不赦的土匪防守下，确实是易守难攻的。但他只要钻进去，就是死路一条。我们采

用减少伤亡，长期围困，首先政治争取，然后发挥火力优势加以攻歼的打法。王副团长原是二营营长，由他带领团里的战防炮去加强指挥。他们首先在远距离将土匪赶入洞内，然后用火力封锁住洞口，掩护部队接近洞口，用炸药包炸毁天洞。然后用柴火烟熏，炸药包轰炸。在政治争取下，魏金万及少数土匪出来投降了。但田高年胁迫多数土匪仍拒不投降。在僵持20多天后，二营决定用大量炸药包连续爆破，歼灭敌人。战士们纷纷争当爆破手，文化教员丛世林五次进洞爆破，立了大功。战后清查土匪尸体数，与战前掌握的土匪数大体一致，但是没有田高年的尸体。当时认为他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了，也有可能被压埋在碎石堆里了。部队就撤离了现场，只留下一些刚组织的民兵看守洞口，处理土匪尸体。后来证明，田高年当时并没被炸死。在部队撤离后，他乘机跑了出来。被群众发现，在追捕中才被乱枪打死了。在这段时间里，三营在永顺以北与桑植交界的地方，消灭了向阳和侯耀南匪部。

常言道："树倒猢狲散。"龙山的剿匪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登记自首的匪兵有数百名，收缴散枪数百支，但师兴周、瞿波平这两个大匪首没有归案，许多小头目与匪兵仍在观望，广大群众仍不放心。这时适逢141师师长兼永顺分区司令员叶建民来龙山视察，我向他提出上述看法，并建议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大对师、瞿的压力，他很赞成。后来在9月份，422团从古丈调回龙山的里耶地区，专门对付师兴周匪部。我团原在里耶的第一营，则北移到八面山以北的明溪、二所及招头寨地区，专门对付瞿波平匪部。为此，我421团团部和龙山县党政机关，也从苗儿滩北移到洗车河。原在洗车河地区的第三营则东移到红岩溪、马蹄寨及以北地区剿匪。这样，剿匪的兵力密度就相对增大了。

边缘区剿匪于10月15日开始，以湘、鄂、川、黔四省边联合会剿的形式进行。实际上，在前一段的清剿打击后，大股的土匪都已分散潜藏了，只有几十个人一股的小股匪徒，仍在流窜作案。我团第三营进到红岩溪后，发现惯匪彭善炳带领数十人隐藏在遥山坪的山洞里，经常利用夜间外出抢劫。三营就在10月底的一个夜间，远距离奔袭，突然包围了山洞。第二天由团的炮兵先摧毁洞口工事，然后步兵接近，用炸药包、手榴弹攻破山洞，毙伤俘匪30余人。然后将部队分开住到各村，大村一个排，小村一个班，宣传我军剿匪政策，发动群众控诉土匪的罪行，动员匪属劝匪投降自首。对拒不投案自首仍在流窜的土匪，一经发现即派出飞行小队，日夜跟踪追击消灭之。很快就将彭善炳的几百人枪，全部剿清了。

在明溪、二所、招头寨地区清剿瞿波平的第一营，在团参谋长范朝运指挥下，几次拉网搜山，夜间则处处设卡堵查。瞿波平部下的支队长向静海、彭雨清隐藏

不住出来投降了。我们派他们去找瞿波平出来投降，过了几天，他们回来说："瞿波平藏在靠近四川的一个山洞里，找了好多天才找到。瞿波平说，要投降可以。但他的部队原是程潜收编的，现在要程潜写封信来，听听他的意见。我们虽然知道他这是推托之词，但还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里了。过了几天，师里果然转来了程潜给瞿波平的信。我看过，大意是："波平兄：现新中国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听说你还在湘西与人民对抗，因为我与你哥哥的关系，我希望你认清大局，将武器交给当地驻军，来长沙见我。"最后是程潜的签名盖章。我当即将此信送给范参谋长，由他那里交向静海转给瞿波平。但瞿波平收到程潜的信后，并没有马上出来投降。据事后了解，他怕程潜的信是假的，是我们冒用程潜名义写信骗他投降，所以犹豫不决。他本人不识字，让别人把信念给他听，他在几天之内，无数次地念了听，听了想，又打听到我们并没有到四川边的山洞里搜剿他，逐渐认识到信不是假的。加上我军日夜搜剿甚急，一天早晨，搜剿小分队远远看到山上有一个人，但一晃又不见了。搜索了半天也找不到。实际上瞿波平并没有到四川边界，就藏在离一营营部不远、路边山坎上的一个小洞里。搜剿分队发现的人，正是他的勤务兵。搜剿分队的行动和议论他们都能看到和听到。这时他认为被解放军发现了，如果再不出去，一旦被搜到就被动了。这样他才在11月中旬出来投降了。投降后，他急着要见程潜。我们将他送到永顺师部，师部又将他转送到长沙。

这里我顺便把422团在里耶清剿师兴周的情况说说。他们9月到里耶地区，边缘区剿匪开始后，10月21日打死了由四川流窜过来的"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臣，又招降了师兴周的外甥贾奇才。后得知师兴周有个小儿子叫师文禹，在永顺师范学校读书，报告师部后，师部用永顺分区司令员的名义，给师兴周写了一封劝降信，动员师文禹给他父亲送去。在各方压力下，师兴周在11月中旬出来投降了。422团团部当时住在里耶，师兴周被送到团部后，团部将他的吃住都安排得很好。他为了炫耀自己，威慑群众，就每天在里耶街上招摇过市。群众又恨又怕，纷纷向部队提意见，说解放军宽大无边，坚决要求杀掉师兴周，以除后患。后来团里将情况反映到上级，经批准将师兴周逮捕镇压了。这虽然是顺应了民意，但却违反了我军不杀投降人员的政策。后来在改革开放后，又为师兴周平反落实政策，改为投诚人员待遇。

在师兴周、瞿波平两大匪首归案后，龙山县的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剿匪建政工作开展顺利。清匪挤枪，减租减息反霸，建立了各级新的人民政权。农会、工会、妇救会、民兵组织等，也普遍建立起来。长期被土匪欺压的群众被发动、组织起来后，就纷纷控诉土匪的罪行，并指名道姓要求镇压罪大恶极的土匪。在群众这种强烈

要求下，上级批准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大小土匪头目。与此同时，广大觉悟了的青年农民及匪兵，纷纷要求参军，掌握革命武装。我们按上级的要求，在农村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县里成立了武装中队或大队，区政府成立了武装中队或小队。部队也吸取了大批新战士，师里组建了一个补充团。这批湘西兵，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多数都表现得英勇顽强，许多人入了党，立了功，提了干。

过了1951年元旦，当部队正在总结经验，组织群众追捕散匪，收缴余枪，巩固新的人民政权时，1月底接到了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我团紧急收拢部队，在保靖县城集中，2月中旬我背着瞿波平的手枪，拿着师兴周的手杖，骑着张平的骡子，离开湘西奔向抗美援朝的战场。

（作者系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

杨卓新先生的一篇书面检查

谭绪缵

杨卓新先生，湖南新化人，教育界耆宿，是湖南大学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数理教授，长期在该校任教，任职过理学院院长，代理过湖大校长。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杨先生由湖大调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大）任教，1963年故世。

杨先生早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入色拉格斯大学攻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故人多以杨博士称之。新中国成立初，我在湖大社科院史学系任助教时，住胜利斋教工宿舍，杨先生住静一斋（今岳麓书院左侧），相距一墙之隔，时常见面。当年大家喜谈杨先生的话题，不外二事：一是关于他的虔诚信佛。所住书斋，常在书案上置一木鱼。杨先生课余之暇，常闭户正襟危坐，口诵经文，默念阿陀，手敲木鱼，声达户外，人多闻之。二是关于他喜爱跳舞。当年湖大工会，每逢周末，必组织教工派对，以今岳麓书院正厅之忠、孝、廉、洁堂为舞厅，举行舞会，一时学校青年男女教工踊跃参加。杨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跳舞兴趣不减当年，每次每场必到。值此“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的氛围中，杨先生闻曲起舞，既少翩翩之姿，颇显龙钟之态，以致人多捧腹，可杨先生一概置之不理，不到曲终人散，决不退位。杨先生为人随和，与世无争，虽是名教授、名教育家，没有架子，人易接近，深得同事同学们的敬重。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蓬勃开展，声势浩大。湖大是老牌名校，为高级知识分子集中之地，学校对这次运动非常重视，特别对那些具有影响、有名气、有学术权威并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授的思想改造，更为注意，因此动员这部分对象，必须认真思考，对待运动，要以脱胎换骨的精神，分析批判自我，要面向全校师生做出深刻的检查，与旧我划清界限，通过群众意见，决定能否“过关”。杨先生经过一番思考，面向群众做出了下面的一篇检查，曾刊登在1952年5月《人民湖大》校报上（按：该原件已失）。今特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余家新化，数世耕读，幼习诗书，颇思搏一科名，以光祖德。值科举废，乃改习新学，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适湖南考选官费留学生，幸获录取；

知交日广，期望尤殷，整装之日，家有慈和之母，糟糠之妻，勉抑私怀，奔驰方外。彼时情绪，难以言宣。乘风万里，远渡重洋，入美国色拉格斯大学，后获哲学博士学位。嗣又修工程学，获电机工程师学位。数年用力潜修，成绩恒冠多士，获荣誉奖多次。时欧战结束，乃以数年中节余之款，回溯哥伦布航行之路，凡七月而抵英伦。旋赴柏林，适爱因斯坦讲学其间。高风宏论，屡受启发。惟大战数年，遍地疮痍，百物腾贵，私衷戚然伤之。惟默祷上苍，消尽杀机，佑吾下民。目睹德人克苦耐劳，共渡难关，上下一心，人无怨言，预卜其国之必昌也。1927年返国，自马赛启航，经苏伊士运河、亚丁、锡兰、西贡、香港，沿途所睹，奇风异俗，难以阐述。忆自锡兰停轮登岸，游一展览馆，睹一白玉卧佛，长丙丈余，相貌庄严，瞑目静息，游客顶礼膜拜，默诵阿陀，余乃惕然有感。嗣后与佛为缘，实此游以启我心；遂心逐淡泊，不求闻达。归国后，乃从事于教育。旧日知交，多任显宦，劝余出仕，漠然置之，坐守寒毡四十余年矣。本人于苏联情况，初不甚了解，后知其于十月革命后，各项建设，突飞猛进，大有超轶资本主义国家之势，始心向往之。至于共产党造福人类，实属空前。惟因扫除障碍，不得已采取斗争形式。闻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乃视为畏途，误矣。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所至，偶有令人惮之者，屡经艰难奋战，日益修明军纪，所至秋毫无犯，百姓箪食壶浆以迎，遂能荡平宇内，措民衽席，余安得不欢欣鼓舞，改弦更张，以图服务于人民乎！

这篇用文言文书写的检查，曾刊登在当年湖大校报上，是颇具特色的文字。因杨先生虽具封建守旧之习，亦有崇洋媚外之嫌，终因先生出身耕读的寒族，门既不显，祚亦微薄，且经历简单，长期从事教学，固守讲台。而其为人又能洁身自好，行己有耻。故顺利"过关"，未受到激烈的批斗。他和当年土木系教授名家曾昭权先生对比，曾先生因出身名门豪族，在运动中受激进者的批斗受辱（要求批判其祖曾国藩），跳楼自杀，酿成惨剧，真不可同日而语矣。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吕振羽风雅拾零

伏家芬

吕振羽（1900—1980），原名柳岗，邵阳市隆回县人，1926年毕业于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同年参加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任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赴延安。曾历任中共华中局编审委员，刘少奇政治秘书与学习秘书。1938年受湖南省委委派在武冈塘田寺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后曾任大连大学校长、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之一。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等数十种。其诗作大多散佚，兹根据手头资料摘编部分，以飨读者。

《偕友游东塔访古》云："危立江滨一塔斜[1]，层层浮级接云霞。成群宿鸟翔高下，倒影江山舞参差。千载咸称鲁班术[2]，万民同造新中华。鳌山三载郊游遍，每访农家话桑麻。"《城南法相岩访古》云："古迹城南法相岩，摩崖历劫多宋唐。书存佳品诗非俗，中确精华可掘扬。""明亡进士说于君[3]，遁世当年入洞冥。遗著于今无散帙，穷为独善抑仇清。"

《访城南二邓先生祠》云："二邓祠堂[4]武城南，古迹淋漓法相岩。未向科场求仕进，名高两潘誉逸才[5]。遗著'云山'研读苦，'白香''藻川'格调古。衡论宋学门户扃[6]，谆谆汉学偏训诂。似未穷根论周程，尚欠王黄根底闳[7]。论史独尊汉司马，言诗多称杜少陵。两湖庠苑盈桃李，盗名窃雕真假横[8]。能非汉宋非小节，我岂泥古仰先生。岂无哲嗣邓□弥[9]，大癫能诗著星城[10]。省宪颁日钱散雨，骂尽天下爱钱人[11]。"《一九三九年春受林拔萃约为统战由塘田去武冈道中过盆溪抗金名将杨再兴故里》（并序）云："夜宿武冈城东四十华里之龙头桥，闻故老言小云山东南谷口，即宋抗金名将杨再兴故里盆溪。一九六二年偕江明访武冈，故老亦传杨再兴故里为县之盆溪。旋查《宝庆府志》、《武冈州志》，亦有此记述。予旧所见《湖南掌故考》等书均仅称杨为湖南武冈人。但亦有人谓盆

溪在今新宁境。按宋时新宁属武冈，此说亦有可能，待考。”诗曰：“将军故里古盆溪，未及探访意有遗。农民义战起宝永[12]，奋发抗金战功奇。威震河岳风雷陡，长胜驱金犬羊走。身御顽寇制全胜，血战创伤镞满斗。桧构[13]甘作金儿臣，乞和遗臭万年丑。英雄地下恨无穷，大军欲饮黄龙酒。”《一九三八年八月偕时真[14]溯资水夫夷由邵阳赴塘田途中与之唱和》：“八月夫夷泛客舟，江水迎船向北流。节劲古木夹横岸，山穷不是水尽头。”又《过曙山唱和二首》：“曙山真像桃源洞，夫夷几处似曙山。秀山奇水萦回转，笼村古木透朱丹。”《晨操偕全院人员练跑至平石潭联句》：“清澈潭水深十丈，峭壁危崖画不成。陡石西峙成合璧，沿滩东耸柱高坪。三千民校俊男女，五百黉墙铁甲兵[15]。河伯蜿蜒系苗岭，夫夷回旋入沧瀛。”

又据中国社科院秋韵诗社所编之《秋韵诗词选》（1998年版）有诗若干首。摘如下：《风雨频袭之一小楼[16]》（1934年作），其一云：“风雨频袭一小楼，新书万卷钻无休。墙内及门多志士，门前追迹有鹜鹜。日著万言书贾胖，夜过三鼓思维周。教授队中年最少，每从虎口拔同仇[17]。”其二云：“古木裱荫掩小楼，箧中禁帙点圈稠。疾世总嫌人喋喋，夜眠时惕鬼啾啾。邻居相护多贫乏，灶下常愁缺米油。事业等闲付逝水，情怀岁岁系神州。”《南京谈判中和周小舟同志》（1936年作）：“潜踪南渡到石城，艰危未计死和生。为挽狂澜联吴策，残篇断简续亡秦。”附：周小舟诗“片衫片履到都门，伫足三年悟死生。拟向荆卿求匕首，雨花台畔刺嬴秦。”按：1935年冬，吕振羽、周小舟奉中国共产党委派去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共同抗日问题。又：《过邵阳登双清亭[18]》三首选二（1938年作）其一：“春申沦陷东南倾，又报寇骑迫洞庭。为保湘山同扣楫，身衔成命过昭城。”其二：“片衫相携入野深，瘴风雾雨惕人心。名园萧落人犹壮，回首同袍泪暗涔。”《荒村探兄[19]》：“兄弟半生阔别长，荒村来探喜洋洋。贪污群中能自爱，夜昏道上须灯光。即精技术为民族，应有豪情共国殇。一日情怀吐不尽，沁人最是新文章。”返延安途中（组诗选二[20]）《过津浦线》：“月拥繁星夜二鼓，风驰电闪过津浦。沟深垒险锁不住，为有斗星照前途。”《太行山怀古》：“太行形势天削成，联宋抗金八字兵。抗日义旗满敌后，山原人海胜长城。”《林西怀古[21]》（1946冬）“辽都遗址古林西，衰草萋萋没马蹄。头下军州奴隶泪[22]，古塔宿鸟结群飞。”《过武昌念李鹤鸣师[23]》（1963年春）：“今过武昌未停车，心事拳拳系珞珈[24]。立雪当年蒙解惑，担簦一帙走天涯[25]。”《甲辰元旦试笔》（1964年2月作）其一云：“脑力衰颓羡岁华，倔强犹欲看谁花。近今史事须雕续，往旧哦吟待梳爬。民族馀编胸有数，哲人补述尚多家[26]。卅年假我殷勤学，夫妇同窗愿不赊。”其

二云：“如矢驹光痛逝波，川流不再奈谁何。五洲革局途不远，万类究穷体更多。人事班班相永续，文明段段会长河。高于共产知何似？完美更超共产歌。”《感怀诗》（并序）：1968年12月，我在狱中惊闻少奇同志被永远开除出党，回忆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期间难忘的日日夜夜和谆谆教诲，感念不已，默成诗三首。十年浩劫，八载幽囚，劫后馀生，亲眼看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少奇同志昭雪奇冤，衷心感奋，书此志念。其一云：“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辩诬董狐篇！[27]”其二云：“阜延长途云和月，夜夜北斗照路前[28]。所至‘双减’植路牌，奠基深广开新元[29]。”其三云：“圣母池边说孔丘，日夜翘首百姓安[30]。普罗党性无杂染，坚挺乔松柱人天！

又据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百位湘籍名人手迹》影印本（岳麓书社版）载，吕老有《读王夫之遗稿有噩梦敬跋一首》：“天崩地裂遘九州，江海横溢注（泣）孤忠。遁迹苗瑶同敌忾，改名易姓志恢洪。丹心一片通黄顾，拒秦三户起兵戎。茅舍数椽湘山陂，苍苍衡岳郁英奇。深研苦钻节高亮，为攘鹰犬月三移。究穷理气迈前代，探索天下妙幽思。揭（挈）破程朱非明宋，陆王心学更乖离。论史竭精阐理势，未临堂奥窥藩篱。岂但皇统可禅继，革命改制萌新旨。好个人欲天理章，铮铮诸子谁堪比。千载纲常品从头，龙舟会中别丑美。戒子条条越常规，钢铁斗志垂后起。宿学菁英集星城，雄谈宏论起争鸣。工夫何止传学亚，精粕表里自分明。湘江北去淘沙金，岳色南来变古今。”后署：“船山先生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读遗稿噩梦敬跋，吕振羽。”按：此影印集系岳麓书社2006年12月版，十分难得，弥足珍贵。此诗亦吕老压轴之作，议论精到，书法遒中带秀，文采毕呈，洵精品也。

另据《都梁文钞今编》载：吕老曾题金秤市留念亭门联云：“留是有年，常怀亲恩耿耿；念非一日，勉尽子道殷殷。”原注云：录自《邵阳县志》。1936年10月某日是吕氏太夫人六十寿辰，吕氏兄弟奉慈意停开觞庆，在金秤市溪田村油榨铺大路上建凉亭留念。门额：“留念亭”三字，系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书。东门、西门系吕振羽及其弟吕持平分别书联。

又据《中国楹联报》2000年2月18日载，1938年吕老与其夫人江明途经邵阳市双清亭赋诗二首，诗云：“砥柱屏河岳，长矶速北邮。万山来天际，一石压江流。”其二云：“资上双清合，危亭水上浮。登临同远望，纵目看轻舟。”夫人江明取诗中句题联亭上曰：“万山来天际，一石压江流。”至今此联犹悬亭际云。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注释】

[1] 斜塔，即东塔，亦名泗洲塔，在武冈城东郊二里许。

[2] 俗传神话云，鲁班与其妹相约在一夜之间分别建成东塔、高庙。鲁班建成塔时才半夜，故作鸡鸣给其妹。妹妹一急，便忙将原木搭成两根柱子，故高庙大殿前两柱未刨光。妹后知为鲁班作弄，便一脚将东塔踢斜。故东塔自始是斜的，但不倾倒。

[3] 明清间进士于思成（注者：应为于子仁），《宝庆府志》《武冈州志》均谓其有著作，今无存。

[4] 二邓先生祠，祠在原洞庭中学(今武冈二中)进校门左侧。今无存。作者自注：邓辅纶、邓辅绎兄弟，不事科甲，清政府赠以博学鸿儒，起邓辅绎主两湖书院，《历代名臣言行录》有传。湖南中山图书馆藏有所著《云山读书记》、《白香亭集》、《藻川堂集》，其中并有《云山读书记》手稿本八十七卷。

[5] 两潘，作者自注：明代兄弟举进士之潘应星、潘应斗，亦武冈南乡人，有著作，惜失传。里人称二邓高于二潘。

[6] 宋学，主要指宋儒理学，同汉学相对。汉学专重训诂，宋学以义理为主，亦称理学。《宋史》为周敦颐、朱熹等人特立道学传，故又称道学。后来元、明、清的理学也称宋学。

[7] 王黄，指王夫之和黄宗羲。

[8] 作者自注：抗日战争时，在长沙闻人道及，何键以很小代价从邓氏后人手中买得遗稿不少，以己意篡改后用何名刊印。何键曾赠“所著”线装近二十册予余，惜未翻阅，亦未保存。

[9] 邓口弥，应为邓幼弥，也名邓国献。

[10] 星城，指长沙。

[11] 作者自注：邓辅绎子邓幼弥，为王闿运之婿，湘人称邓癫子，夫妇均能诗，随作随毁。家贫不能常饮，强里人助酒钱。邓辅绎门生不少为达官，共醵金数百元予之。赵恒惕颁布省宪之日，邓手持数百银元在贡院坪乱撒，并口呼：“爱钱的人都来捡钱啊！”

[12] 宝永，指宝庆（今邵阳）和永州（今零陵）地区。[13] 桧构，指南宋宰相投降派代表人物秦桧和南宋高宗赵构。

[14] 王时真（后更名江明），吕振羽夫人，湖南澧县人。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现已离休，寓居北京。

[15] 黉，古代的学校。这里指塘田战时讲学院。

[16] 吕振羽居室。抗战前，吕振羽在北平住东太平北街一号一居民杂院里。“小楼”乃小土堆之一小屋。实为吕氏书房、卧室兼会客之室。所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论著，均撰写于此室内。

[17] 20 世纪 30 年代初，吕振羽执教中国大学等校，与李达、黄松龄等被称为红色教授，而最年轻。他保护进步学生，多次营救我党被捕人员。

[18] 吕振羽偕夫人王时真自长沙去塘田战时讲学院过邵阳登双清亭时作。

[19] 吕振羽之弟昨自海防回到重庆即来石子山探望。

[20] 1942 年，随刘少奇从苏北返回延安道中。

[21] 1945 年“八一五”后，吕振羽离延安赴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其后，分局决定组织以吕振羽为首的工作巡视团，进入围场、经棚、林西一带工作。林西为辽上京故址，尚遗存辽塔等古建筑物。

[22] 头下军州是辽王朝奴隶主政治统治下的一种组织。

[23] 李达号鹤鸣，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也是我党创始人之一。

[24] 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址所在地，李达时任该校校长。

[25] “立雪”，典出“程门立雪”，表达吕振羽对老师的深挚仰慕之情。“担簦”，背着伞。

[26] 时吕振羽正准备践人民出版社之约，动手撰写《近现代中国史》、《近现代中国哲学史》，并补写《中国民族简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书，但由于横遭迫害而中断。此诗反映了他虽身处逆境仍怀壮心。

[27] 吁天：同呼天，无辜受冤，悲愤至极，呼天倾诉。

[28] 1942 年，刘少奇回延安，3 月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12 月 30 日抵延安。长途夜行军，越过了敌寇严密封锁线。途中参加了滨海区、沙区、太岳区三次反日寇扫荡大战。

[29] 刘少奇返延途中经过了鲁南、鲁西、晋东南、太岳、晋西北等各解放区，所至均阐扬党中央减租减息政策。

[30] 行经山东莒南县某山顶一水池，水面浮有血红色泡沫。当地传说孔子诞生于此，其母池中洗孔子，血染池水……刘少奇说，池水可能有某种矿物质。

词道南行

——1976年夏承焘夫妇“避难”长沙的一段往事

陈家书

夏承焘（1900—1986），字瞿髯，浙江温州人。被中国文坛公认为“一代词宗”。胡乔木极为推崇他，曾说：夏老代表了当今中国词学的最高水平，夏老的水平有多高，中国的词学水平就有多高。

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痛苦的一年。那一年的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其波及面之广，危害之大为20世纪世界之最。唐山被夷为平地，在距离唐山150多公里的北京，也被严重波及。首都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搬离住房，躲进了搭在院落、街头的低矮简陋的地震棚。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的夏承焘先生和夫人吴无闻女士也住进了地震棚。那一年，夏老76岁。

1976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到那一年的5月16日为止，“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年了。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中国人民已从最初的热情、冲动、恐惧和迷茫中开始反思，开始探索，我们在做什么？其实，在那年以前，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就已经从“被思索”中慢慢苏醒了。大约在1974年左右，“四人帮”由于忙于抓权，没有像“文革”初期那样把知识分子作为第一打击对象了。这时，一些刚从“牛棚”里放出来被称之为“牛鬼蛇神”的学者名家，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在北京就有这么一个团体，这是一个松散的团体，聚集的都是一些劫后余生的文化大家，按现在的说法那是一群虽不是空前，但可能是绝后的国学大师。他们中有：张伯驹、刘海粟、夏承焘、俞平伯、周汝昌、吴则虞、黄君坦、徐邦达，等等。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文化根底却使得他们仍然精神丰富。他们嘴虽已不能“乱说”，笔也不能“乱写”，但无人能使他们不“乱想”！他们没有学术活动了，他们就自己组织“精神会餐”。但是，谁能来组织这些已被“批倒批臭”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举行“精神会餐”呢？这个组织工作的重任就落到了现在蜚声国学界，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周笃文教授身上。周笃文先生以非凡的远见和勇敢的气魄把这些学者串联起来。他奔波于各位学者之间，从谈经论道，到求医问药；从家庭困难，到学术联谊，他既照顾了那些伟大的国师，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很多营养，继承了很多学问。他会定期召集各位学者到北京西山旅游。他负责借一辆大巴士（那时没有现在的租车业务，但可通过“关系”借公家的车），开到各位学者的家门前接了这些学者到西山旅游，吃饭则实行“AA制”。然后大家登高吟诗作赋，互相唱和。把“文革”中所受的屈辱全都置之度外，只享受兰亭之趣。尽兴之后，周笃文先生又送各位前辈回家。然后再将各位的雅作汇集在一起；复写或油印给大家，作为纪念和交流的资料，俨然成一地下诗社。这些活动若是在“文革”初期和中期都是不可想象的。而到了“文革”后期，一切都有一点松动，“四人帮”和极左派们似乎有一点自顾不暇了。

就这样熬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灾难性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很多北京人都离京去外地亲友家居住。当时在地震棚艰难度日的夏承焘夫妇也想离开北京去外地暂避，可是去哪里呢？他们一时无主意。一方面，他们二位已年迈，需人照料；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像现在可以到处旅行，很容易找住处。那时，出门是件大事，居住大不易。这时，热心的周笃文老师想到了同样热心的远在长沙的陈云章先生。写信问云章先生能否接待夏老夫妇，并给他们设法租一间房居住？曾担任湖南省文史馆名誉馆长的陈云章先生，是吴则虞、周笃文先生的老朋友，曾任职水利部及湖南大学。在“文革”中饱受冲击的陈云章先生在接到周笃文先生的来信后，立刻以他惯有的雷厉风行作风行动起来。一方面他马上回信给周笃文先生，一方面立刻着手找房。他四处奔波，广托朋友，为夏老找住处。朋友们也多方为之出力。很凑巧，李淑一先生的侄子李天任先生住在离云章先生家不远处的高升门，那是淑老的旧宅，他愿意把房腾出来给夏老夫妇住，自己搬到他的单位去住。陈云章先生听后非常高兴，这样大问题就解决了。而且不但淑老和云章先生是世交，而且住在北京的淑老也和夏老认识。这样大家更觉得亲近。李天任先生是积极协助夏老夫妇的第三位热心人。陈云章先生马上将有关安排写信告知周笃文先生，另一方面也积极筹备好接待工作，包括请人照料夏老夫妇的日常生活。而这时，他自己的生活都捉襟见肘，“文革”被扣的工资也还未补发。但他却很担心夏老在地震棚的艰苦生活，同时也期待和夏承焘先生这位文坛大师重逢，期待他为“文革”中被摧残的湖湘文化带来新的生面。与此同时，长沙文史界的一些曾在“文革”中“经风雨，见世面”而幸存的杰出学者，如羊春秋、马积高、杜迈之、严怪愚、蔡季襄、彭靖等都在翘首企盼夏承焘先生的到来。

还蜗居在北京地震棚里的夏老夫妇，得之可以南行之后自然也非常高兴，这

不仅是因为他们因此就可以离开困难的生活环境，而且是因为他们早已有登九嶷，看洞庭，再云游川滇的愿望。接到云章先生的信后，他们马上回复了一封电报，表示即将出发。在买到火车票后，夏老夫妇又给云章先生写了一短信，信中说：

思默先生：（注：云章先生的字）

昨发电报："晓川示尊函，焘定月内叩府，俟行再告车次。"今天已买到27日一次特快票，坐11车箱，28日10时许到长沙。

特此奉报，并颂

大安

夏承焘　吴闻

二十五午

1976年11月28日上午，夏承焘夫妇乘火车如期到达长沙，陈云章先生带了家人和几位学者去车站迎接他们。那种亲切和谐的场面，让一些在场的人至今难忘。夏老夫妇也非常高兴，他们终于到向往已久之地，也开始了他们一生中难忘的三个月客居长沙的日子。

去迎接的人中有后来成为湘潭大学教授的彭靖先生，彭先生曾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受尽磨难。他以前在北京也拜访过夏老，对夏老十分景仰，这次又能在家乡接待夏老，他感到非常荣幸，他也是夏老此行遇见的第四位热心的湖南人。在夏老在湘的这段日子，在这群学者中最年轻的他，几乎是每日陪伴，有求必应。他常到云章先生家里商量有关照料夏老夫妇的一切事宜，也积极组织夏老和湖南各位学者的见面和学术交流。据经历此事的人回忆，彭靖先生在接待夏老的这次活动中是最辛苦的。

夏老夫妇在长沙高升门巷住下了。这是一条古老的街道，坐落在长沙城北。与长沙有名的北正街相连，也与长沙古老而丰富的历史相连。夏老住在这里十分开心，因为在他看来，他是住在历史之中，住在文物之内，住在他仰慕的伟大的历史人物旁边。这种感觉常人是不能体会的。常年住在这里的长沙人也很少有人能感受到。但夏承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作为一位诗人，他的情感是丰富的，他的思维是超时空的。他感到，住在这里离屈原、贾谊、杜甫、辛弃疾更近了，他仿佛更容易和那些伟大的古人对话了。这些情感在他的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夏承焘的这种感触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可以考证的岁月中，长沙北门一带，至少在两百多年以来，是长沙的文化中心，也是湖南的文化中心，是很多文人和高官的住地。

夏承焘先生和他的夫人吴闻女士都是浙江温州人。温州是出读书人的地方，是永嘉学派的诞生地，而永嘉学派从宋朝起就有了。近现代温州杰出的文人也很多，如孙诒让、夏鼐、王季思、周予同等等。而夏承焘当年就学的温州师范，也和我们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一样，是人才辈出、学者云集之地。所以，可以说，至少到夏老他们这一辈，永嘉学派还是存在的。

在中国，自古以来，江浙和湖湘有着扯不断的历史渊源。太多的爱恨恩仇，文化纽带，把浙江和湖南这两个风格迥异的省份联系在一起。浙江的人文似水，其风格就如同富春江水那般秀丽；湖南的人文似火，其特征就好像九嶷南岳那样雄伟。湖南的文人一向被江浙的风景所陶醉。陈云章先生的父亲陈天倪教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游杭州时，就在钱塘江畔的九溪十八涧流连忘返，写下了"省识百流归宿处，此中端合住天倪"的诗句。而夏承焘教授来到长沙时也同样被湖湘文化的刚烈精彩所感动。他们借居的李淑一的房子本身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载体。李淑一先生出自文人世家，她的父亲李肖聃先生是曾任梁启超秘书的大学者，她的先生柳直荀是有胆有识的革命家，毛泽东的"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名句让柳直荀先生为世人所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夏承焘夫妇感到和湖湘文化很亲近，他们把借居的这座小楼命名为"九嶷楼"，在这座小楼里，诗人的心仿佛能在晨曦或夜色之中听到舜的召唤，看到湘妃的彩带。"九嶷楼"离当年辛弃疾的飞虎营驻地很近。作为词人，夏承焘对于"稼轩长短句"无疑感爱至深，现在能住在离飞虎营数百步之处，自然使他诗情难抑。夜来时，他也许仿佛看见辛弃疾在"醉里挑灯看剑"。夜深时，他也似乎感受到"梦回吹角连营"。他似乎已"穿越"到了宋朝，和辛弃疾相会。正如他当时做的《水调歌头》一词中所写的那样：

"飞虎营，听鼓角，晓灯前。问我别来记否，秋水酌瓢泉。"

在长沙期间，他还在陈云章先生和彭靖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贾谊故居。要知道，那时的贾太傅祠还是居民住房，很少人去参观，也有很多人不敢去参观。"文革"中，这些古迹统统属"四旧"。

回到"九嶷楼"，夏老为此行写了《减字花木兰》一词，词的上阕是：

"深灯绀绿，欲挽湘江环画阁。笑覆吟卮，屈贾前头琢小词。"

夏承焘夫妇是在1976年11月28日到长沙的。他们在长沙迎来了1977年元旦，也在长沙和朋友一起度过了那年的春节。那一年，长沙的雪下得特别大。瑞雪似乎在预示着什么，是预示着饱受摧残的中华大地要迎来快乐的春天吗？是要印证学贯中西的湘籍大学者陈述元先生的"冬来春不远，我爱雪莱诗"吗？不管漫天的大雪象征着什么，总之，那一年，长沙的大雪的确给夏承焘先生留下了极深的

印象，他写了一首词《浣溪沙·长沙大雪》来记述那场瑞雪，词中道：

“高枕都望梦有无，疏棂冻雀听歌呼，湘天风雪在江湖。”

虽然在湖湘大地上，已是漫天飞雪，但在稀疏的窗棂上欢叫的雀鸟已在预报着美好的春天的到来了。看来，词人和虽然还在挨冻的小鸟都有同感了。

夏承焘先生填词七十余年，共创作了1200多首词；而在长沙居住的三个多月中，他就作了二十多首词，比他其他年份一年创作的还多，可见当时诗兴之浓。

唱和“天倪庐”

湖南，长沙，自春秋以来，就是独具风格的楚文化的孕育之地。自从屈原、贾谊在这片土地上播下文化种子以后，两千多年来三湘大地文才辈出。特别到了近现代，诗文经史大家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当因“文革”而沉寂十年的湖南文史界获知夏承焘先生来到长沙后，便纷纷奔走相告，前往高升门“九嶷楼”拜访、请益夏老。因为陈云章先生是此次夏老南行的主要接待人，所以陈宅，即如今之三贵街“天倪庐”，自然是夏老夫妇常去之地，因此“天倪庐”也就成了当时一处“文史沙龙”。很多学者在这里交流会晤，唱和词章。他们中间有：羊春秋、马积高、姜国仁、萧艾、严怪愚、何泽翰先生，等等。当然，还有始终为了照顾夏老而忙前忙后的彭靖（岩石）教授。也有很多中青年学者在这里拜会了久仰的夏承焘先生之后，得到指点，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找到了方向。

夏承焘伉俪有时也常来天倪庐吃饭，虽然大家找了人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但热情过人的陈云章先生还是经常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吃饭。对于陈云章先生的夫人刘德芬女士做的菜，夏老夫妇更是赞不绝口。

有一次，夏老写了新词，想找人谱曲，因为一时找不到作曲家，云章先生的儿子就表示愿意试试，在看到这首词作以后，他非常喜欢，并很快为其谱好了曲。这首词就是《望江南·长沙大雪》：

长沙好，好景趁秋来。

灵麓初霜尝美橘，湘江新绿似浮醅。

欲去几低徊。

这首简短、优美，浓缩了词人对长沙的爱又极其细微地描述了长沙特点的小词被谱好曲后，云章先生在一天，请夏承焘和吴闻夫妇及一些朋友来到家中，由两位甚通音律的中学女老师轮流为大家演唱这首《望江南》。当带有江南丝竹风格的优美曲调，在小提琴的伴奏下，悠扬飘出时，夏老夫妇高兴地抚掌叫好。特别是吴闻女士，她那由衷而淳厚的欢笑使人难忘。夏老这位学养、书法极佳的夫人，总能给人一种过去中国学者传统贤内助的感觉。

那时，在长沙那个大雪的寒冬，在天倪庐，在九嶷楼，一群执着的文化人在饱经风霜之后，又相聚在一起了，他们抱团取暖，以诗文会友。在他们围坐的中间，是一盆燃烧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的炭火，他们手里捧着的是一杯杯飘着湖湘文化气息的热茶。有了这些，他们就够了。因为，在低头蜷缩十年后，这些中华文化的杰出继承者居然可以聚首谈文而不担心被批判，他们知足了。

春天，真的不远了！

创办韵文学会

短短的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夏承焘先生北归的时间也快到了。湖南的朋友们都依依不舍，他们还想为夏老此行做点什么。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夏老编印好了两个作品集，这就是《瞿髯词》和《瞿髯诗》的油印本。后来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夏承焘词集》就是在油印本的《瞿髯词》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但他们觉得这还不够，他们还要表达他们自己内心的感想，他们还要为这次夏老的南行留点纪念。

于是，他们将三个月来和夏老的唱和的作品以及为夏老送行的诗词作品也编印成集，并由陈云章先生为之作序。序中曰：

“永嘉夏承焘先生，当今儒硕，以词章雄视海内者殆五十年。多士慕效，川赴海会。”“此间文士于先生将归也，争祖以诗，情谊恳挚，积帙成册。”

云章先生的这几句话精练地记述了当年的故事。

1977年2月，夏承焘夫妇离开长沙，离开“九嶷楼”，回到了北京。

夏承焘先生三个月的长沙行，原是因避地震而起，然而此行对湖南文化带来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也是夏承焘先生、陈云章先生和周笃文先生当初都没想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后来湘潭大学《中国韵文学刊》的创办。

在1984年，中国的国学名家张伯驹、夏承焘、周汝昌等联名上报中央，要求建立中国韵文学会，并得到了中央批准。正是由于夏老1976年至1977年在长沙居留的那三个月，使得湖南的一群杰出学人和北京的国学巨匠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由此，中国韵文学会就设立在湘潭大学内，而且，该学会的刊物《中国韵文学刊》也由湘潭大学主办。而且，在1984年召开的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大会也是在长沙召开的。夏承焘先生特从自己的多年积蓄中拿出四万元人民币捐给这个学会，而这笔钱在当年的中国，绝对是一笔巨款。从此，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一个载体，中国的国学群英们有了一个家。到今天，《中国韵文学刊》已成为湘潭大学和中国学术界一份重要刊物。

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又导致和催生了如今已有两百多万会员的中国诗词学会

的成立，而这两个学会现在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而这一切都与夏承焘先生当年的南行有关，一切都起自长沙那个大雪的冬天。

饮水思源，湖南的文化界、教育界能不感谢为推动湖南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夏承焘先生和陈云章先生吗？

夏承焘先生在生前一直很怀念在长沙的那段岁月，很怀念1976年长沙那个大雪的冬天。甚至还想和陈云章先生一起去九嶷山，去云贵，去四川旅游。因此，当1979年陈云章先生的夫人、刘德芬女士去世时，夏老撰写了充满深情，令人落泪的挽联：

浩荡海山游，何日川滇同短策；

殷勤鸡黍约，永怀风雪客长沙。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原名誉馆长陈云章之子）

SANXIANG RENWU

三湘人物

髡残生平及师友弟子

刘国强

髡残（1612—1673）与弘仁、八大、石涛被并称为清初"四大高僧"，俗姓刘，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县）人，字介丘。为僧后，改名髡残，字石溪。号白秃、一号茧壤（茧即古天字）。别号残道者、白秃翁、庵主行人、电住道人、天壤残道者。晚署石道人、石溪和尚。法名智杲、大杲。"髡"即剃发，是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他取名髡残，这和他削发为僧有关。据《髡残石溪小传》载，髡残母亲生他之前梦见和尚入室，稍长听母说及此事，从此认为自己前身是和尚。他少时聪慧，喜读佛书和临习书画，厌弃举业。父母为其议婚，坚不从命。曾向父母哭泣请求出家，父母不允，母逝后出家之心遂决。关于髡残出家经过，今查有三种文献记载。一是钱澄之《髡残石溪小传》云："师年27岁，自剃其头。""崇祯戊寅，时年27矣。自念居家，难以脱离，一夕大哭才已，遂引刀自剃其头，血流被面，长跪父床前，谢不孝罪。父知其志坚，且业已剃，遂听从之。龙先生闻之大喜，曰：'此乃大丈夫事，不可小就'。教令看话头，有省亟益令游江南参学……"这里的龙先生，指的是髡残同乡龙人俨，号半庵，又号三三居士。是一位学养很深的佛教徒，在家里迎请多尊佛像供奉，髡残最初出家就在龙三三家设立的庵堂里。其二，周亮工《诗画录》记载："一日，其弟为置毡巾御寒，公取戴于首，览镜数四，忽举剪碎之，并剪其发，出门径去，投龙山三家庵中。"（按：常德县既无龙山，也无三家庵。将龙三误写成龙山，讹传300余年，此乃始作俑者，亮公谬矣。）其三，邓显鹤《石溪轶事》记载："师一夕大哭不已，引刀自剃其头，血流被面。"综上所述，髡残出家的情形，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血性汉子，出家时间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初冬，时年27岁。

髡残出家以后，在龙人俨建议下，到江南各地云游，向高僧们参究禅学。髡残云游到南京时，遇一老僧，问他出家始末，髡残便告诉他。老僧觉得与自己的情况很相似。老僧受云栖大师（即高僧株红，别号莲池，杭州云栖寺住持，门徒极多）剃度，于是髡残也请悬挂云栖大师遗像，拈香礼拜为师。老僧为他取法名

智杲，于是髡残就成了云栖派的僧人了。髡残云游回来后，卜居于桃源余仙溪上。龙先生昼夜逼拶，久之，忽有所悟，心地豁然，遂成无事道人。所以钱澄之说髡残为僧没有师承，"所以成就之者，龙先生一人而已"。

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国内大乱，烽烟遍地。心向南明，有爱国热诚的髡残曾参与湖南何腾蛟部的抗清活动。虽无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顾炎武《同楚二沙门小坐栅洪桥下》诗里，可以窥见其中情况。何腾蛟失败后，为逃避抓捕而入桃源深处，藏身荒山野岭3个月。《石溪小传》云："每言甲、乙间（即甲申、乙酉年间），避兵桃源深处，历数山川奇僻，树木古怪，异兽珍禽，魈声鬼影，不可名状；寝处流旁，或在溪间枕石漱水；或在峦巘猿卧蛇委；或以血代饮；或以溺暖足；或藉草豕栏；或避雨虎穴，受诸苦恼三月。"

清顺治十一年（1654），髡残离开湖南来到南京，时年43岁。最初住在城南大报恩寺，有时候住栖霞寺和天龙古院。驻锡于城南大报恩寺时，校刻《大藏经》。顺治十五年（1658），髡残深受大报恩寺和栖霞寺住持觉浪禅师器重，易法名为大杲。后奉觉浪之命，离开大报恩寺，主持祖堂幽栖寺为堂头和尚。祖堂山在牛首山南边，两山相连，原名幽栖山，上有幽栖寺。禅宗四祖道信的门徒唐朝法融禅师曾在这里修行，所以改名祖堂山，为南京名胜之一。1695年，觉浪禅师圆寂于天界寺。按照佛门规矩，觉浪遗命将其法偈及竹如意授髡残，这就意味着把整个宗系托付给他以嗣曹洞宗上法座。但髡残未能继承法嗣。个中原因复杂。原来清初佛教界出现了以明朝遗民为代表的集团势力同得到清朝统治阶级支持的僧侣、新贵之间的斗争。为了巩固清朝统治，清廷不但大兴"文字狱"，迫害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而且对佛门弟子也不轻易放过。顺治九年，清政府利用佛门中的名利之徒，召道忞等人入京说法，培植亲信。道忞（1596—1674），俗姓陈，潮州人，临济宗僧人。曾受顺治皇帝召见。道忞等人仗着皇家的支持，不遗余力地在佛门内打击和排挤与新朝不谐的正派人士。熊开元为觉浪继起弟子，以刚直闻天下，前天童派之争时，曾任调解人。熊开元调解时措词激烈触怒道忞，道忞当即一掌，打得熊开元昏天黑地，双方不欢而散。黄宗羲有诗赠熊开元："尽翻谏草支那述，危举僧条同室仇。脱得朝中朋党辈，法门依旧有干戈。"一针见血地指出佛门中有成见的门户势力斗争。髡残属熊开元一派，自然得不到当权新贵赏识。1659年，髡残主动辞去祖堂幽栖寺主持之职，作行脚僧漫游于吴越间，寻师访友，在黄山住了一年多，领略大自然博大的境界和无限生机，开拓自己的胸襟，为创作山水画杰作奠定了基础。

1660年8月，髡残从黄山回江苏以后，并没有住南京幽栖寺，而是在该寺附

近比较幽僻的牛首山结茆独自幽居，过静心修禅的生活。对此，王士祯《游献花岩祖堂记》中有描述："破扉短篇，高竹万竿，青光鉴人，须眉皆绿。"条件实在太简陋了。当时南京有居士想集资为他造一座新的寺院，被髡残婉言谢绝。他作一偈云："荼蓼平生都吃尽，身心不待死时休。借他两块为棺盖，好事从此一笔勾。"这话是说，他一生吃尽辛苦，心已死了。只是借地为棺，借天作盖而已，任何好事对他都是多余的了。

髡残为人旷达，不拘小节，品性清高，不轻易为人作画，有人虽奉以重金，欲求其一笔而不可得。平日交往，多为前朝遗老或山林隐逸。髡残晚年身染疥癣等痼疾，平日耿直少言，潜心艺事。性情急躁，对弟子动辄责骂，令人难以忍受。他结茆独自幽居十年，其间与程正揆、张怡、周亮工等常有来往。后来祖堂山一场大火，将髡残的佛学经相、文具器物都化为灰烬。髡残写给名僧些庵（郭都贤）的信中说："大火之后，自己依旧是昔时。一丝也无底人，几化异物去矣。"髡残老年多病，尝闭户偃仰，辄经数日。程正揆说他"善病苦不暇息，又不健饭，粒入口者可数也"。他在1670年作的《山水册图》题诗云："十年兵火十年病，消尽平生种种心。老去不能忘放物，云山犹向画中寻。"

髡残一生勤奋，中年时有十年处于兵火之中，老年时又长时间疾病缠身，但他从不消沉懒散，信守"自强不息"的格言，一旦病势稍减，就从事读书绘画。他自题《溪山无尽图卷》云："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不可懒惰。若当得个懒字，便是懒汉，终无用处。如出家人若懒，则佛相不得庄严而于家不能一钵也。神三教同是。残衲时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画数幅或字一两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作一番事业，端教作出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无愧。若忽忽不知，惰而不觉，何异于草木！"髡残题画中，教人勤奋不要懒散的言论很多。如在《报恩寺图》题云："白秃曰：佛不是闲汉，乃至菩萨、圣帝、明王、老、庄、孔子，亦不是闲汉。世间只因闲汉太多，以致家不治，国不治，丛林不治……《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的画功力深厚，气魄伟大，这是和他一生勤奋学习分不开的，成功绝非偶然。

髡残生前遗言遗体火化后投入长江。去世后僧人遵嘱将骨灰装匣沉入长江边燕子矶下。髡残去世后十余年，其再传弟子瞽僧来到燕子矶，请石工在绝壁上刻"石溪禅师沉骨处"数个大字。瞽僧为桐城人，俗姓方，字子安，能文，瞎眼出家，拜髡残弟子山足斧为师。

髡残师友及弟子

髡残"性鲠直若五石弓。寡交识，辄终日不语"。在明虽为布衣士子，蛰居乡村，但他对禅学有很深的修养，得到当时高僧觉浪、继起、檗庵、些庵禅师器重。他品格清高，博学工诗文，得到当时文坛盟主顾炎武、钱谦益、张怡等人的钦佩；而他的山水画自成一家，更受到当时书画家、鉴藏家周亮工、龚贤、陈舒、程正揆、石涛等人的倾倒。他在当时南京佛教界和文艺界具有很高的名声和地位。

觉浪是南京城南大报恩寺和栖霞寺的住持，当时的名僧。那时正校刊《大藏经》，成立藏社，髡残和庐山僧道韶雪藏等担任校刊。觉浪对髡残十分器重，生前曾想付其衣钵，收为门徒。髡残升堂入室，多有机缘。但髡残个性坚强，特立独行，并未成为觉浪的门徒，现在栖霞寺后觉浪墓碑上门徒中就没有他的名字。

高僧弘储号灵岩继起，佛学深邃，是僧人中的遗民。他历住湖南南岳和苏州灵岩等寺，有许多明朝遗老如桂王丞相熊开元、大司农张有誉等都拜他为师。弘储曾写信给髡残，信中指出髡残个性倔强，节烈不屈，不喜世俗的赞誉，是当时僧人中所少有的，欢迎他前往灵岩寺畅谈佛法。字里行间流露出是以髡残门徒自居了。

书画鉴藏家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明崇祯进士，官御史。后仕清，官至户部右侍郎，工古文词，善书。髡残在赠周亮工山水画中题跋："东坡云：书画当以气韵胜人，不可有霸滞之气，有则落流俗之习，安可论画？今栎园居士为当代第一流人物及赏鉴之大方家，常嘱残衲作画，余不敢以能事对。强之再，遂伸毫濡墨作此。自顾位置稍觉安稳，而居士亦抚裳称快，此余之厚幸也。"周氏在《读画录》中为髡残写了小传，当髡残60岁时，他还写诗祝寿。

髡残最知己者为程正揆。既是湖广同乡，又同为佛教徒，都工诗书画。程为明崇祯进士，入清官工部侍郎。他是董其昌的弟子，书画初学董氏，后来自成一格。他在1657年辞官后回到南京，时往栖霞、牛首，和髡残成为好友。程正揆常去山中看他，即使髡残正在坐关，他也排闼而入，常共榻通宵畅谈不倦。有次甚至把髡残拉出关来洗浴，一起扶杖出游，全寺僧人引以为奇事。髡残到南京看病，就住在程氏家中。两人常在一起赏鉴书画，研讨创作，相互题跋，有不少两人合作的书画传世。1666年秋，程正揆又入山访髡残，髡残画了4幅山水相赠，最后一幅题云："丙午深秋，青谿大居士枉驾山中，留榻经旬，静谈禅旨及六法之微。论画精髓者，必多览书史，登山穷源，方能造意……余向尝宿黄山，见朝夕云烟幻景，林木翳然，非人世也。居士遂出端本堂纸四幅，随意属图，聊记风味云耳。居士当喝棒教我。"从这则题记中可知髡残论画主张"多览书史，登山穷源"，引申了董其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说明二人都受董氏影响很深。

程正揆对髡残的人品和画作评价极高。他在题记中说："石公作画如龙行空，

虎踞岩，草木风雷，自生变动，光怪百出，奇哉！”又说：“每以笔墨作佛事，得无碍三昧，有扛鼎移山之力，与子久、叔明驰驱艺苑，未知孰先。”又有诗云：“石公慧业力超乘，三百年来无此灯。入室山樵老黄鹤，同龛独许巨然僧。”他把髡残的艺术成就和巨然、黄公望、王蒙相比，推崇到极高地位。

和髡残交往的名士还有钱澄之、灵公禅师、宋曹等。髡残弟子中有释松啸禅师，楚人，工山水书法。还有释山足斧，再传弟子释瞽僧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髡残在湖南生活了42年，到南京不久，道德、文章、画艺、禅学均达到很高造诣，堪称一流，名重一时。但目前发现的家乡师友中，仅同乡儒生龙人俨一人而已，有关龙氏资料又语焉不详。笔者认为，龙人俨绝非等闲之辈，家学渊源极为深厚。经查阅新编《常德县志》，龙人俨可能是明太常寺卿龙膺的嫡系兄弟或后人（子侄辈）。龙膺为明万历八年（1580）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山西按察司佥事、甘肃参政、太常寺卿。龙膺是当时著名诗人，与袁宏道结为诗友，并同游德山。袁宏道在龙膺家中居住两个多月，写下了不少唱和之作。龙膺为人随和，不拘小节，疏财好义，所得俸禄，大都散给亲朋故旧。龙膺卒后。有《九芝集》等传世。

髡残在中国美术史上是重量级人物，但常德人民对他知之甚少，他的家世和在家乡的活动目前也知之不多，实为憾事。究其原因，一是髡残成名在外，成就不为乡梓所知。髡残传世最早的作品是1657年45岁时作，这是到南京定居后所作，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在家乡留下任何作品。二是髡残参加了复明抗清斗争，在当时属于“满门抄斩”和“株连九族”之罪。这段历史，髡残在南京除对个别心腹之友偶尔闪烁其词地提过以外，对家乡人士秘而不宣，恐遭不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彻底弄清髡残生平及早期活动情况，这是家乡史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在常德县深入调查了解龙膺、龙人俨及其后人情况，求得新的发现，这是进一步揭开髡残在湖南身世之谜的钥匙。髡残俗姓刘，家中至少有胞弟一人，还可查阅常德《刘氏族谱》和调查刘氏群众，进一步了解髡残身世。

熊希龄与维新运动

夏长阳

熊希龄（1870—1937），字秉山，湖南凤凰人，人称熊凤凰。熊希龄自幼聪明，五六岁时已露锋芒。《三字经》和《百家姓》，他只用几天时间就能背熟，对诗文相当精通。1889年，中进士，1891年考中翰林，与张謇同榜。光绪帝在其考卷上批道：“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五大洲杰作也。”1896年，他从北京回到湖南，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创办了湖南时务学堂，并任《时务报》总编辑，后来当上中国第一任内阁总理，1937年病逝于香港。

在袁世凯时代，袁世凯对熊希龄极为器重。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袁世凯举荐熊希龄为东三省盐运使。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由唐绍仪组阁，委任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唐绍仪变更，袁世凯又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

热河地区，在清初时仅设热河厅，后改承德府，设都统，民初改特别区，仍设都统。熊希龄上任后，将热河都统公署改为热河行政公署，迁入避暑山庄办公。

避暑山庄，风景优美，极若西湖，有很多建筑：万壑松风，驯鹿坡，勤政殿，戏楼，文津阁，水榭，观莲所，四知书屋，五代五福堂，水晶宫，万树园，烟雨楼等，与北京宫殿相仿。1913年7月，袁世凯又调熊希龄为国务总理。此时的袁世凯表面上对熊希龄很关注，内心却有阴谋。熊希龄被蒙在鼓里，其实袁世凯暗地派司法总长许世英调查熊希龄送给袁世凯亲信姜桂题乾隆皇帝折扇之事，事情不大，却构成袁世凯挟制熊希龄破坏国会和解散国民党的圈套。1913年10月，袁世凯以军警数千人冒充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议会选举其为正式总统，并立即着手筹划解散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11月3日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商量解散国民党的事情。迫于袁世凯的威慑，熊希龄只好听从袁世凯的摆布，同意解散国民党。熊希龄从国民总理位置下来后，放弃从政，办学从教，做慈善工作，直到去世。

熊希龄从小性格文静孤僻，喜欢沉思默想。虽有山里人的执着和顽强，但不像别的孩子喜欢耍刀弄棍，喜欢打架，喜欢看杀人割耳朵，喜欢跟大人赶着猎狗进山打野猪、豹子、黄鹿和箭猪，看鲜红的血怎样从野兽的伤口流出来，看猎狗

怎样咬断野兽的喉管，更不喜欢爬到凤凰红岩城墙上去看屯丁戍卒怎样在腿上绑沙袋，头朝下脚朝上从城墙上倒栽筋斗练武艺，也不喜欢看苗人格斗时喝鸡血酒与不守妇道的女人沉入深潭等一系列野蛮风俗。他喜欢去看苗族妇女做绣花鞋，织花带，到铁匠铺去看铁匠打制长矛大刀和锄头搭耙，看篾匠破篾编织各种各样工艺品，看木匠做花窗竖木屋，看染匠将白布染成各种颜色，看补鞋匠拿着长锥子缝制的钉子鞋，看人酿烧米酒和瓦匠烧瓦，喜欢听大人讲凤凰苗族英雄的故事，喜欢听外面的新鲜事情。他的幼年教育，得益于本县儒生陈玉如。

陈玉如与他祖母同宗，是一个落第秀才。他仕途虽然不顺，但很想培养出一个金榜题名的学子。他见熊希龄十分聪明，读书也十分用功，便非常喜欢教他。熊希龄7岁那年，父亲见凤凰地偏闭塞，文化落后，对他的教育很不利，便将家迁到沅州府治怀化的芷江城。熊父是一介武夫，擅长射箭舞刀和骑马打仗，但有重文轻武思想，对科举相当神往。他不希望儿子重武轻文，希望他另外寻求飞黄腾达之路。他要熊希龄弃武从文。

芷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早在西汉时就设为元阳县，比凤凰建县早。三国时改为舞阳县，明朝并于沅州，清乾隆年间改为芷江县，为沅州治所。清清的舞水河从城中流过，碧绿的河中有一个洲，过去这洲上有一个用铜铸就的犀牛，给芷江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古老的风雨桥与妈祖庙、文庙会馆，给芷江蒙上神秘文化的面纱。芷江当时是湖南通贵州、云南、四川的必经之道，是调换船只车马的一个大站，因而带来芷江的繁荣，成为五溪大湘西的一个重要古城。

熊府坐落在青龙街，面对舞水河，环境极其幽雅，是一座三进三院的旧式房子，进大门二门后，到了第一个院落，有一口不大的井；第二进也有几间房子，里面也有一口井，比第一口井大。第三进房子才算正屋，敬神祭祖全在这里。正屋大厅中，挂着熊希龄父亲熊兆祥的一排二十支鸟羽铜簇的长箭，使人想起那种划空而过的呼啸声，两边还挂有刀剑长矛之类武器。一些字画装饰其中，显示出熊氏家族是文武双全的家族。

熊希龄到芷江后，父亲带他到城内各处走走，满足了他的好奇心，紧接着便关门开始读书了，每日必须有顺序地练字、绘画、读书。父亲对熊希龄的管教不但非常严厉，而且也很得法。他不仅长了见识，还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过后不久，父亲便将他送到芷江比较有名的塾师龙弼臣、潘大任主持的私塾学校读书。在这里，他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读完了《二十四史》，还学了绘画、对对子，能写洋洋千言八股文，特别是还能作诗吟联。后来给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沅州太守朱其懿。朱太守是江苏宝山人，1883年来芷江任沅州太守。他本人没

有考起进士，但读过大量书籍，研究过不少东西，很有学问。他是承袭先人之职来芷江沅州府任职的。他长得高大，对人却很随和。面对当时的民族危机，他颇有想法，对清政府专制统治十分不满，要求知识界能开议论天下事的风气。为了挽救国家危机，他认为只有变革才有出路，只有兴学培养科技人才，国家才能强盛。熊希龄父亲在朱其懿的影响下，十分重视教育。熊希龄15岁那年，在朱其懿主持的沅州秀水书院和沅水校经堂举行的院试上，名列榜首，被取为第一名秀才。通过这次考试，朱其懿对这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充满着希望，他亲自到熊府接他去沅水校经堂读书。读书期间，先生在课堂上讲述曾国藩击败太平军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迹，还指导他阅读曾国藩家书和左宗棠日记，有意激发他建功立业的愿望。后来，熊希龄把曾、左二人奉为楷模，向他们学习，立志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为熊氏家族争气，为故乡凤凰争光。

1889年，熊希龄19岁参加长沙省试，取得优异成绩。1891年，他参加省城乡试，考中举人，这是他踏入仕途的第一步。1892年，清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试，由礼部主持，应试者必须有举人资格。这次考试，熊希龄很顺利地考中贡士。但他并不满足，在后两年中，他考取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是明清两朝的“储才之地”，掌管编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事。按照清朝规定，庶吉士必须学习三年之后才能考散馆，可熊希龄放弃了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他要求到前方去参战。

清朝光绪政府软弱无能，民族危机空前高涨，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大家认识到这是丧权辱国。爱国有志之士纷纷弹劾李鸿章，并上书清廷，要求毁掉该条约。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改革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出了强烈的救亡吼声。1894年冬天，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趁着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的机会，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指出清政府向日本求和，势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而在目前“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这次上书，虽被拒绝代呈，但却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除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上书外，在这民族灾难深重之际，年轻的熊希龄也几次上书，慷慨陈词，反对甲午战争后向日本妥协投降，渴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以抵御列强的侵略，反对清朝政府的投降政策，认为那是养虎遗患，后患无穷，只有振兴国家，才是根本之法。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他与张謇一起弹劾李鸿章，坚决反对与日本讲和，结果遭到斥责。于是他俩决心从维新变法入手，兴实业，办教育，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从而使人民摆脱贫困，

使国家摆脱外侮。

张謇虽比熊希龄年长17岁，但他的思想却与熊希龄非常接近。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对熊希龄一生的政治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是江苏南通人，16岁考中秀才。1876年在淮军将领吴长庆幕中任文书，1880年随军移往山东登州，1885年中举人，1894年赴京应试，与熊希龄同科。考官是翁同龢，认识了袁世凯。他对张謇期许很高。张謇引经据典，论述精辟，翁同龢看后击节赞赏，挥笔批下几个大字：文气甚志，字亦雅！由于他名望大，考得又好，被录取为一甲头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名次远在熊希龄之前。未等张謇高兴几天，这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了。光绪主战，慈禧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兼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跟翰林院的张謇和熊希龄等人义愤填膺，屡屡在朝廷发表激进言辞批评李鸿章。李鸿章迫于压力，让北洋舰队跟日本人干了几仗，结果吃了大亏。正当朝廷吵得不可开交时，1895年初春，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去通州创办纱厂。张謇很高兴，邀熊希龄一路同行，但熊希龄因有陈宝箴儿子陈三立的邀请而回了湖南，没有去通州。

1895年春天，湘江已经涨上春水，岳麓山上的枯木已经开始发芽，呈现出嫩嫩的绿色。长沙城里早已有了生气，一批有志之士在大街小巷里不停地穿梭着；好像要为死气沉沉的湖南闹出一点气氛来。1896年秋天，熊希龄在陈三立的鼓动下，回到了湖南长沙。那年他26岁，就是这一年，他结识了谭嗣同和唐才常，认识了陈三立的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

在陈三立的联系下，熊希龄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湖南籍的年轻人走到一块来了。谭嗣同和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从小博览群书，并且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鄙视科举，爱好今文经学，特别喜欢王夫之。他幼年丧母，被继母虐待，孤独凄苦，养成了孤高叛逆顽强不屈的性格，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长大后，他在中国大地上度过十年的旅行生涯，瞻仰了故哲先贤的陵墓，接触过很多文化人，深深地体验到历史的兴衰，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产生了强烈的变革现实的愿望。他的博学多识和叛逆性格，使他的见解特别深刻尖锐，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尤其猛烈，成为同时代人中的杰出代表。唐才常与谭嗣同早年同时就读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的门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虽然他只是浏阳一个穷教书匠的儿子，出身不同，却不妨碍唐、谭二人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1892年，唐才常应四川学使瞿鸿禨的聘请，充任瞿的子女业师，后来他成为张之洞办在湖北武昌的两湖书院的高材生，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并参加了总督卫队协统的幕府。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求和，唐才常以愤怒的心情斥之为“奸臣卖国，古今所无”。他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认为不变法不足以图强。1896年，是湖南大旱之年。田野山垄的禾苗像火在燃烧，颗粒无收，饥民塞道，救灾自然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湖南巡抚陈宝箴没有心思开辟新学，实行新政，想方设法筹措大米，救济灾民，动员乡民以柴、煤换米，或种植红薯和土豆，等挺过了这一关，陈宝箴才有时间搞湖南新政。

当陈宝箴上任湖南巡抚抗旱救灾缓一口气下来之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坚持维新的志士与陈宝箴儿了陈三立紧紧地握手在一起了，经常聚在一块探讨湖南新政方案。

思想极其活跃的熊希龄成了陈宝箴衙府的常客，陈宝箴向他详细地阐述了湖南新政的一些想法和方案，以开化湖南为己任，锐意整顿，加速湖南新政步伐。他决定创办和丰火柴公司，招商引资，合伙入股，命名湘善证和丰公司；成立湖南矿务总局，采掘湖南丰富的矿藏资源，积极发展湖南地方民族矿业；设立湖南电报局，架通长沙至湖北蒲圻450多里长的电线，建一个机器制造公司，一个发电公司。陈宝箴的这一系列想法得到了学政江标的支持，并雷厉风行地在教育领域率先进行整顿，要求在生员的初试主课中，加上地理和数学两门科目。对校经书院强调时务和科学，对八股取士予以摈弃。江标还提议创办《湘学报》，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宣扬谨慎的改革纲领。浏阳的谭嗣同和唐才常建成了算学馆，为时务、商务、税务等培养人才，将种桑、养蚕、缫丝等先进方法面授乡民，同时对水利、机械、耕种等科学也有讲求，等经费充裕后再聘教师，购置仪器，讲授地学和化学等知识。这个算学馆的开办，可谓是湖南新学的开端，这对全省的维新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熊希龄很快提出在洞庭湖和湘江发展航运事业，以清政府颁布的《内河航行章程》为依据，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湖南的航运大业。

经过两年的努力，1898年4月，轮船开始在长沙、汉口、湘潭、常德、岳州和湖北沙市等处通航，在湖南内河开创了第一个航线。这是当时湖南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这两年期间，湖南先后建立了湖南武备学堂，创办了时务学堂和《湘报》，成立了南学会，这些动作来自于一批积极推动维新运动的有志之士，他们是：陈三立、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蒋德钧、皮锡瑞、李维格、欧榘甲、梁仁铸、毕永年、樊锥、王铭忠、邹代钧、何来保、戴德成、韩文举、叶觉迈等。

（作者单位：怀化市文联）

民主革命家黄钺

李乔生　黄祖同

黄钺（1869—1943），又名幼蟾，湖南宁乡县东湖塘镇燕山村梽木塝人。其父黄万鹏，清末随左宗棠赴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立功任新疆提督。黄钺从小就有继承父志报效国家的心思，青年时期常读王船山著作，对船山先生的"道随器变"、"天地之化日新"的唯物主义和与时俱进观点非常推崇，他游历各地进行考察。1906年，经黄兴介绍，往上海加入同盟会。1910年间，广州等地举行了新军起义，中国东南部民主革命运动高涨。但中国西北地区，因山川四固，风气未开，民主运动未能发展。为了在中国西北地区点燃革命烈火，黄兴和同盟会会员经过认真研究，特派遣黄钺去甘肃开拓革命阵地，以呼应东南。是年冬，黄钺带领一批湘籍同志冒寒到了兰州。他以故人之子身份拜会清廷驻兰州陕甘总督长庚。长庚命他为甘肃督练公所总参议。他取得这个合法地位后，暗中物色革命同志进行民主革命宣传活动。

1911年10月22日，陕西民军响应武昌起义，在西安宣布独立，建立陕西军政府。长庚在甘肃急忙组织一支三万人的"东征军"开赴陕西前线，妄图扼杀陕西革命政权。黄钺乘机请兵一支，名为去秦州（天水市）布防，堵塞陕西革命军退路，实则图谋起义（因兰州清军势力强大，不便起义），长庚乃准所请。黄钺乃率五个营，驻秦州城郊泰山庙。1912年3月11日凌晨，黄钺率部进攻秦州城，一路攻打游击衙门，游击（武官衔）玉润开枪顽抗，为起义军所击毙；一路袭击州衙，生擒知州张庭武；一路袭击道署，传话要道台向燊合作，向燊同意配合。起义成功后，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选为军政府正都督。军政府成立后，悬挂中华民国新国旗，兴农工，办教育，革除清朝陋习，维护地方治安，做了大量事情，秦州地区人民额手称庆。秦州起义，第一次在甘肃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民主革命政权——甘肃临时军政府，在危急关头，支持了陕西军政府的巩固和建设（秦州起义消息传至陕西前线，东征军见"后院起火"，急忙撤围），收中华民国真正的共和统一一篑之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时，甘肃省还是受清朝势力

统治。）

为领导秦州起义，黄钺碰到许多困难，首先是人地生疏，难于立足；其次是受到兰州官僚顽固分子法司司长彭英甲、警备道赵惟熙的猜忌排挤，导致从此长庚对黄钺不信任，致使"饷械两诎"。但黄钺素具湖南人的"驴子精神"，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坚强决心，实践湖湘文化的坚毅果敢学风，不信邪，身体力行，硬拼到底，最终完成了秦州起义，实现了黄兴同盟会的重托。

就在秦州起义八天之后，即3月19日，兰州赵惟熙见大势已去，投机革命，也在兰州宣布独立，成立了一个"甘肃军政府"。黄钺起义后，首先只向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通电。赵惟熙则于所谓起义的当日，即用快电告北京袁世凯。袁世凯收到赵惟熙的电报时，黄钺所发电报还未到达。所以袁世凯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并根据赵惟熙一面之词，指责黄钺领导的秦州起义是"擅拥甲兵，有害公安，动摇国体"，勒令黄钺取消甘肃临时军政府。至此，黄钺又发扬践行湖湘文化百折不挠的精神，对袁世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历数袁世凯"受赵氏之蒙骗"、"颠倒黑白"、"武断罗织"、"有伤全国共和"、"阻塞豪俊之气"、"违众而发不情之令"、"横逆待人"、"淆乱民国是非"、"凭借权势、帝制自为"、"专为舆论相违"等十大可惜（见《陇右光复记》一书）。在袁世凯居高位而当权的情况下，黄钺能这样直言控诉他，着实是石破天惊之举，具备无穷胆量。秦州起义后，孙中山授予黄钺陆军上将衔，并聘他为总统府政治参议官、军事顾问官。

后来，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企图笼络黄钺，转而对他又发电报："望速来京，以备录用。"黄钺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没有去北京做官，1916年力反"洪宪"，组织军队进行讨伐。

黄钺是民主革命家，是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四个省级都督之一（其余三位是湖南都督焦达峰、继任湖南都督谭延闿、云南都督蔡锷），2009年是黄钺先生诞生140周年，特撰此文，谨表缅怀先贤之意。

辛亥湖南首任都督焦达峰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沈绍尧

焦达峰在他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县被誉为神童，他16岁就组建“革命摇篮”，以推翻清廷为己任；18岁起，两度自费留日，任同盟会联络部长，专司会党联络工作；20岁，和川湘鄂赣同志组建加快革命起义的共进会，任交通部长；22岁，成为湖南会党首领，并以四正社、共进会掌控会党，一呼百应；24岁，力主两湖辛亥起义，制定两省相互响应的“约盟信守”。他成功领导湖南反正，任首任都督，力推新政，迅速光复全省，出兵援鄂；他无私无畏，顺着谭嗣同、禹之谟的足迹，从容赴死，在位仅十天！殉难后被孙中山大总统追赠为“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

少年以身许国

焦达峰，字掬森，号大鹏，1887年1月16日生于长沙府浏阳县焦家桥以北7里的南岭（今浏阳市龙伏镇达峰村）。父亲焦舜卿，崇船山哲学，在家当塾师。达峰4岁随父读《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八九岁吟诗作对，对《水浒》、《三国演义》等爱不释手，常集儿童习战阵。母亲沈葆贞，秀才沈荣全之女，知书达理，生达峰、达人兄弟和5个女儿，不幸早逝。达峰自小照顾弟妹，同情弱者，是个孩子王，农忙插秧、割禾，勤奋自重，惜阴如金。11岁随武术大师江庇佑习武，练就一身硬功夫，小溪、矮墙一跃而过，上山打猎，弹无虚发，机智勇猛。焦舜卿后因事多，聘宿儒黎尚姜为私塾教师。黎自称明代遗民，是浏阳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密友，热衷于反清革命，达峰深受影响。

据焦达峰嗣子焦传统《先父焦达峰传》手稿，及达峰孙辈介绍，达峰祖父添龄，启蒙两年即学制水烟，后在焦家桥开水烟铺，渐置田土500多亩，扩建新宅40余间，常设私塾一所，书室3间，藏书颇丰，有《船山遗书》等不少名著。焦添龄长期在焦家桥经商，见识多，晚年常给孙辈讲岳飞和太平天国的故事。当讲到石达开受剐刑（凌迟）被割一千多刀而不吭一声时，崇敬和仇恨在焦达峰年幼的心灵共生。

当焦达峰渐知清朝以屠杀取天下，以文字狱奴天下，以割地赔款丧天下，成为外国人的朝廷时，内心再也不能平静，常思汤武革命。十多岁时作《书“礼运篇”后》云：“予读《礼运篇》，乃知中国古有天下为公之大同社会，而心向往之。其尧舜禅让之世乎？斯世也，人类平等，土地共有……及禹受舜禅，以位传之子，君主世袭由此始，开天下为私之端。为私则必争，争则必乱，此战争祸乱之所由兴也。从此天下非太平之世也，是为君主专制之封建社会。夫政由君出，君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于是暴政生矣。故夏有桀，商有纣，历代无绝也。若是者何也，君主专制使然也。由是观之，君主专制，暴政之源也。是当革也。”

1900年初，焦达峰与好友周海文等入浏阳南台书院就读。值此“前后谭唐殉忠义，国民千古哭浏阳”之时，达峰壮怀激烈，闻“谭嗣同、唐才常革命流血事，辄义愤填膺，大骂清廷，闻者咋舌”。其民族思想，勃然如春笋，不可复遏。他奉谭唐为楷模，慨然称“吾惟有步谭唐之后尘耳”，发誓以身许国。他认为会党是反清革命的现成力量，应重点关注。

1903年初，焦达峰从南台毕业，经黎尚姜联系，由姜守旦介绍入洪福会，很快与黎先诚等在焦家桥以北9里的黎家大屋设会党秘密机关，取名“革命摇篮”，对外称经馆，以黎尚姜讲学授徒为名，邀集志趣相投的师友、亲朋数十人，开展反清活动。

1904年初，焦达峰17岁生日，在“革命摇篮”开决策大会，阐明观点：“依靠会党在两湖发难，以长沙首义为己任；尽量联络清军中的会党成员，或派员打入清军，伺机里应外合，策动反正；目前会党尚不具领导条件，因此要到日本留学，参加孙文的革命党，争取领导地位，方可胜算。”大家折服，奉为行动纲领。黎先诚、黄小山当即表示愿随之留日，众人纷纷解囊相助。焦达峰大为感动，乘兴赋《咏史诗》一首：

天下英雄启汉邦，留侯百世姓名张。
运筹帷幄赢千里，收拾山河守四方。
楚户虽三兴有杰，秦皇莫继政无良。
致令昼锦还乡客，贻笑猴冠号霸王。

“革命摇篮”风声渐漏，非议流传，权势者甚至逼与焦达峰订娃娃亲的沈菁莪退婚。菁莪坚定地说：“表哥是有道德、有学问、有志气、有作为的人，说他是乱臣贼子，绝不可信！”在周海文等人的撮合下，这对有情人于3月结婚。焦舜卿后妻阎氏说：“这孽子不脱离，终究是祸。”焦舜卿为掩人耳目，当众佯怒，骂儿子“无君无父”，要断绝关系，驱逐出去；暗中卖田筹款，送子外出求学，造成“掬森因后母不好，久不在家”的假象。焦达峰也假意与家庭决裂，声称“革命自家庭始”。时接浏阳会首通知，要他和黎先诚速到长沙。

百折不挠救国

原来，此时黄兴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准备年内联合会党起义，专设“同仇会”作会党联络机关，再设东文讲习所培养人才。焦达峰应召到长沙后，旋入“同仇会”和东文讲习所，受黄兴革命思想影响很深，与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极为友善。1904年9月25日，华兴会在浏阳普迹为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举行盛大的授衔仪式。焦达峰觉得“兵未动而谋已泄，其事必偾”。他救国心切，决心东渡日本，归家向父亲诉说救国情怀。离别家乡前，他有感故居四周“两狮踞岭，一虎下山，古松参天”地势，以自号“大鹏”书联：

大鹏展翅九万里，长松拔地五千年。

焦舜卿逢人就讲：“掬森这孩子变好了，大有希望，我就是把田地屋宇卖光了，也要成全他的志愿。”

1905年春，焦达峰携黎先诚、黄小山到日本。本想学军事，但自费留学生无法进军校，遂就读于东京东亚铁道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和孙文、黄兴取得联系，积极从事反清革命。通过接触，他十分仰慕中山先生的革命气概，孙文也极看重有胆有识的焦达峰。是年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和黎先诚立即加入。

1906年，浏、萍、醴会党酝酿起义，焦达峰接受同盟会“重整会党，共图大举”的任务回国。到长沙与禹之漠等发动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二烈士，随后赴浏阳帮助刘道一等策划起义，任洪江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不意李部声势过大，遭清军突袭，队伍溃散。

焦达峰返长沙，惊悉禹之谟被捕，遭酷刑生命垂危，联想志士沈荩遭杖刑惨死，怒而“狙击端方（湘抚），不成”，搜捕甚急，连夜潜回家中。此时，焦舜卿田地卖光，房子只剩3间；焦添龄最疼爱长孙，爷俩尽力凑些川资。沈菁莪取下手上的两只金戒指交给丈夫，含泪说：“路上作盘缠吧，多多保重！”焦达峰满怀信心地说：“我在外四海之内皆兄弟，革命一定成功！”说罢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1907年初，焦达峰化名冈头樵再度抵日，在东京组织“四正社”（心正、身正、名正、旗正），以期用同盟会纲领统一行动。3月，同盟会新设十部，焦达峰任联络部部长，专职联络各省会党与同盟会合作。8月，他与同在东斌步兵学校学习的四川张百祥、湖北刘公、江西邓文辉等在东京成立共进会，以共同加速起义，焦达峰任交通部长，负责联络事宜。共进会奉孙文为领袖，与同盟会纲领基本相同，主张工作重心转到长江流域。后来黄兴质问“何故立异”，焦达峰回答：“同盟会举止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

1908年6月，焦达峰与黄兴等组织东京大森体育会，借名进行军事训练，为

武装起义做准备。11月，共进会决定派人赴各省运动军队，他与孙武负责两湖工作。归国途中，将沿江各大码头的会党组织起来，接受共进会指挥。

1909年初，焦达峰、孙武抵武汉，与刘公等在汉口法租界设湖北共进会总机关，但经费拮据。恰遇“革命摇篮”故友周海文、刘肯堂贩来大批夏布，将所售布款全额捐作革命经费，解了燃眉之急，并双双加入共进会。为协调长江流域会党各派，焦达峰仿传统方式，以“中华山”名义统一之。

湖北工作就绪后，8月，焦达峰化名左耀国，偕杨任等革命党人回长沙，在太平街，马家巷同福公栈设共进会总机关，将湖南会党统一起来，并筹划运动新军和巡防营，拟于9月举行两湖暴动。不料有的会党擅自行动，导致暴动失败。孙武从此认为会党不可靠，转向新军。焦达峰则毫不气馁，在运动军队的同时，把会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中秋时节，他蓄西式头回浏阳，到处进行宣传发动。于南岭家中，将在南台所做的一副对联写给夫人沈菁莪：

一点心思，做出千秋事业；

两个目的，看破万里乾坤。

他提留声机到发八寺大屋（今名沈家大屋）看望姑母焦爱贞。在姑母所在的师竹堂厅屋，边开留声机，边做反清宣传，使满屋男女老幼，既感到惊奇新鲜，又会意传神。场面热烈，至今传为美谈。

1909年冬，长浏平醴等各地会党龙头30余人，在浏阳沈家大屋举行“开堂”仪式，拥焦达峰为龙头大哥，成为湖南会党总头领。从此，分散的湖南秘密反清团体统归共进会掌控，有人马十万，为辛亥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焦达峰派杨任等组织3000多人，拟乘机发动起义，并电约湖北共进会同时起事。后因反动官绅暗中操纵，起义被迫中止。官府追捕甚急，焦达峰只得避走醴陵。其间困苦至极，好一点的衣服都典了，只留几件破衣轮着换洗。但焦达峰意志弥坚，特书联明志：

达上九霄云路近，峰高五岳众山低。

下半年，焦达峰等一行人转移到长沙湖迹渡李氏墓庐，有时靠扯野菜、打野物充饥。但他们救国心切，生活愈苦，行动愈决，采用多方渗透和个别联系的方法，就近运动新军和巡防营，乃至新军和巡防营的号兵、炊事兵几乎悉为会党成员。焦达峰还和杨任、余昭常赴湘西，以共进会的名义，收编会党队伍数千人。焦达峰只要有空闲，就看书写诗，曾作古风《长歌》：

念世纪大英雄，呼号奔走闹沉沉，一声长叹，泪落纷纷。人何在？国何存？

千思万想暗伤心。拔出三尺剑，驱除异种魂。造我新世界，还我旧乾坤。民国立，土地平，处处歌功颂义军。那时节，借衡门以栖迟，假盘谷以怡情，耳听得，两岸猿啼，四面风声。快哉乐哉吾志成，优哉游哉上天庭。身随赤松子，学得长生不老春。

乐观豪迈气概跃然纸上。并书联一副贴在寝室墙上，表达忍受艰苦、创造新社会的决心：

千年事业方寸内，万里乾坤掌握中。

1911年初，同盟会策划广州起义，长沙革命党人积极响应，被官方侦悉。焦达峰等20多人紧急避难于汉口俄租界一间破房，生活极苦，却激情满怀地与湖北同志策划举义事宜。5月4日，焦达峰、杨任、黎先诚、居正、刘公、孙武等紧急开会，传阅了广州起义失败和“黄兴阵亡”的消息，大家震惊。焦达峰慷慨陈词：“中国假如没有广东，我们就不革命吗？假如克强真死了，我们也不革命吗？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也不要依赖别处了。”会议遂做出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的决定，并订下两省在十日内互相响应起义的“约盟誓守”。

革命党人接着研究了湖南起义，确定西、南、中三路同时发动，举义后成立湖南都督府，以焦达峰任都督。7月，焦达峰回长沙，委托陈作新运动新军，自己主持调集会党、策动巡防营和联络绅、商、学各方面，在太平街孚嘉巷设“四正社”秘密机关，作为领导核心。派同志赴各地活动，设立机关，用同盟会的纲领统一行动。据焦达峰家乡百年来的口口相传和黎先诚孙辈介绍，9月，焦达峰到平浏一带集结力量，准备武器，在黎先诚家中组织绣红旗——铁血十八星旗，即共进会会旗。

10月12日，焦达峰在平江安定桥得到武昌起义消息，立即赶赴长沙，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达峰欲如十日期，众犹豫”。他大声疾呼：“武昌首义多日，我们湖南岂可袖手旁观。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再不动手，更待何时？”10月14日，陈作新约集各界代表30多人开会，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领导起义。10月22日清晨，焦、陈分别率起义新军从东、北两门攻城，在巡防营的内应下，城门很快打开。与此同时，黎先诚、黄小山、刘肯堂等调集湘赣部众两万多人开进长沙。如吴全顺10月21日率两百多人从浏阳金石山（今浏阳市龙伏镇境内）出发，22日清晨赶到长沙，参加了对城门与抚台衙门的攻取，断手负伤。

长沙光复，在同盟会众、新军和巡防营官兵的支持下，焦达峰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都督府新立，焦陈力推新政，除苛税，剪辫放足，

纳才禁烟，接见民众无间晨昏，办公人员生活简朴，一扫封建积习，并迅速光复全省。但焦达峰心中最大的事还是履行“约盟誓守”，出兵援鄂。几天内招兵6万余人，首批援鄂军于28日出发，有力支援了武昌首义。

无私无畏殉国

焦达峰是个平民领袖，年轻轻的一呼百应。他16岁组织“革命摇篮”，除黄小山外，其他成员都比他大几岁至几十岁，包括一些很有名望、很有本事的人，都心悦诚服地听他指挥，其魅力何在？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其精神世界的亮点，也是凝聚人心的魅力所在。被其理想信念所倾倒，为共同事业而毁家纾难的大有人在。如：

黎尚姜，焦达峰的私塾教师，也是“革命摇篮”的义务老师，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将一辈子教书所得悉数捐出。他说：“掬森是当代吕尚，兴汉灭清的革命家”，“老朽甘冒诛族灭门的莫大风险，只要为实现兴汉灭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周海文，焦达峰的总角之交，常对人讲：“掬森11岁就胆识过人，非等闲人物，将来必建大功于祖国，我情愿倾家荡产，帮助他成功！”为支持焦达峰，他将祖田400亩悉数捐出（仅留5亩给母亲养老），还将家里所有商号捐献，最后一贫如洗。

张紫馆，私塾老师，一辈子积蓄仅两亩田，全部捐献革命。

黄和开，张紫馆知己，为捐助革命经费，将仅有的4亩田卖掉，房屋也当了。

黎祝干，木匠，家贫寒，将工钱集起来捐助革命，从不间断，直到焦达峰遇害。

平等、亲民，肝胆相照，是焦达峰精神世界的又一亮点。

建立平等社会，是焦达峰终生追求的目标。他从小看到妹妹裹脚的苦状，认为男女不平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毒瘤，必须革除。当大人要他和表妹菁莪定亲时，他说：“只要不包小脚。”沈菁莪为长沙地区首位天足新娘。

为实现社会平等，焦达峰最先提出将平均人权置于平均地权之先，并赋诗一首：

人地两平权，乾坤一转旋。
九州归禹贡，五族戴尧天。
男女齐参政，耕耘各有田。
智愚千虑得，文武百科全。
治国仕为本，和民礼进先。
去污夷发辫，解厄放金莲。
患难兴华夏，江湖起俊贤。
大同期共进，团结作中坚。

该诗表明了他的社会平等观。他为人胸怀宽广，与人肝胆相照，凡认之为同志者，事无所不容，言无所不听。他扶贫济困，出手大方。为体察穷人生活，曾与叫花子同住破庙，一起讨吃；夏收季节，和农民一起扮禾；在组织洪江会成员承包由长沙至易家湾的铁路接轨工程时，常赤足短衣，与工人共同劳作。劳工经他的言传身教，提高了觉悟，日后大都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骨干。

豁达乐观，永不言败，是焦达峰人格魅力的又一方面。从读私塾、留日、参加同盟会到组织共进会和长沙反正，一直与焦达峰形影相随的黎先诚回忆：达峰在任何艰苦环境中，从无悲观情绪，总是勇往直前。炎热天帮农民劳动累了，就哼“烈日炎炎似火烧，满垄禾稼尽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等诗句消遣；发现同伴有不快表情，就读一读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互勉互慰。

淡泊个人名利，随时准备为国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是焦达峰精神世界的巅峰。

焦达峰从事秘密职业革命8年，所需巨资全靠家庭及周海文等挚友支持，即使当了都督，也未用过公家一文钱（谭延闿曾派人查证）。在得知武昌起义消息，从平江经家乡急赶长沙时，有人扶乩结果是“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认为大不吉利，劝他不要去。焦达峰对着桌子使劲一巴掌，大声说：“哼！流芳百世，遗臭万年，遇便（任意）要做到四个字。”说完，大步流星上路了。到丰裕，与发八寺熟人沈搢笏迎面相遇，互致寒暄，沈问：“以（这）回到长沙又要做么哩大事？”焦答：“流芳百世，遗臭万年，遇便要做到四个字。”年轻的焦达峰是抱着像谭嗣同一样以身殉国的决心进军长沙的。

当谭人凤发现谭延闿等把持湘政、挟制焦陈，力主反击时，焦达峰却说：“身为都督，不便执行。”“谭延闿如此想当都督就让给他吧，我上前线去。”“只要是反清革命，谁来领导都可以，有人接替，我就上前线去。”

正当焦达峰坦率无猜地为民服务时，一个罪恶阴谋悄然袭来。1911年10月31日，管带梅馨率部先计杀陈作新，继而冲进都督府。其时焦达峰正与同志商讨援鄂及解决湘西纠纷问题。有人劝其暂避，他说：“避将焉往……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说罢，凛然步出府门，叛兵蜂拥而上。他向叛军晓以大义，不听，便从容不迫地问：“你们要怎么办？”叛兵说：“要杀你！”焦达峰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就在这！”说完，立正向高悬在都督府前坪的铁血十八星旗（武昌起义次日定为国旗）庄严行礼，旋被恶魔的乱刀捅死。

民国历史上最惨烈、最令人惋惜心痛的悲剧就这样在古城长沙发生了，至今

令人深思！

焦达峰殉难时不到25岁。他用行动兑现了诺言，是步谭唐之后尘英勇牺牲的，是为国为民光荣献身的。他无愧民族英雄光荣称号，孙中山追之为“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

（作者系长沙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

清末民初的一位湖湘名人——陈炳焕

梁小进

在湖湘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曾有一位颇有作为且对湖南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这就是曾任清末湖南咨议局副议长、民初湖南军政府财政司长等职的陈炳焕。

陈炳焕，派名钟淮，字岱青，号树藩，晚号注凡，清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60 年 5 月 11 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界头铺一个农民家庭[1]。曾祖父陈太志、祖父陈任官均以务农为生，父陈正昌“始以商发名”[2]，家世开始发达。兄陈森甲，号建藩，自小攻读诗书，光绪十六年（1890）入县学。陈炳焕则遵父命，少年时在家乡界头铺经办药店。“年十八乃读书，通经史，有大志”。

光绪五年（1879），著名的洋务运动思想家、清朝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辞官回湘。其时，湖南发生守旧排外风潮，于郭嵩焘多方攻讦，但陈炳焕却登门求教。在交往之中，他受到郭的赏识。曾受其委托，协助著名学者王闿运整理《续编沅湘耆旧录》[3]；后又协助湘中大儒王先谦整理郭嵩焘所著《养知书屋遗集》[4]。在与这几位湖湘睿宿的交往中，青年陈炳焕“受益为多，学亦有进，对世界大势渐有识见，志向增高”。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陈炳焕胸怀强烈的爱国精神，徒步千里，奔赴广西前线，参加抗法战争。次年战争结束，他回到家乡，“益肆力于学”。后游学于省城各书院，屡试获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补为廪贡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以“才识出群、自行不苟、好学深思”，被省学政保送入武昌两湖书院。

时国事日非，陈炳焕在两湖书院，常常慷慨陈词，使许多老学先生为之震惊，但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赏。光绪二十八年（1902），经张之洞亲自主考评定为优等，在两湖书院肄业，即以湖北游历官之身份派往日本考察政治[5]。回国后，担任两湖大学堂教习。通过在日本的考察，陈炳焕认为强国需要大批人才，而人

才需要学校培养，从而产生教育强国的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他回湘，受聘于长沙明德学堂，任日文教员，复于次年担任湖南省学务处参议、湘阴中学堂监督、湘阴劝学所总理。他根据清政府颁布的章程，历经艰辛，成立湘阴县学务公所，并以原仰高书院为基础创办了湘阴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又出任新创办的湘阴驻省中学堂监督[6]。这两所学堂均为湘阴县最早的近代新式学校，陈炳焕作为其主要创办人，因而被誉为湘阴新学的始创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炳焕改任湖南省中路师范学堂（今第一师范学院）监督。他本着兴教育、开民智的宗旨，在校内增开“优师班”，并选派优秀生赴日速成留学。这些速成留学的师范生学成归国后，有的直接到学校任教，有的在家乡兴办学堂，均积极从事教育事业，有的则投身于革命。同年秋，因省内留学生人数剧增，湖南提学使按照清政府学部的要求，任命陈炳焕为湖南省游（留）学生监督。其时，我国对于留学生的管理还没有任何章程可循。陈炳焕以其对于西学的了解，将这一复杂艰难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是年，清政府学部成立“日本留学生管理处”，委派他赴日本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

20 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任奉天提学使张鹤龄根据清政府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院的指示，申办奉天图书馆。张鹤龄原任湖南提学使，在湘期间对陈炳焕颇为赏识，乃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及奉天巡抚唐绍仪同意，任命陈炳焕为图书馆兼官书局总理，负责主持筹建图书馆的事务。

陈炳焕回国就任以后，以图书馆对于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全心投入工作。在职两年，他从筹划、设计到主持图书馆修建，直到开馆，全都亲自办理，使建馆开馆事宜顺利完成。在此期间，他曾在上海募集图书 1664 种、1839 册，又亲赴两湖，购买了中国新旧书籍数千种、东文书数千种、西文书数百种，从而奠定了奉天图书馆的藏书基础。其时，清政府尚未颁布图书馆的管理规则，他又为图书馆拟定了管理章程。他还亲自校雠整理古籍，大力收集民间散轶古籍，开办官员和中小学教师外语专修班。陈炳焕为开创我国东北地区第一所近代公共图书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时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颁布上谕，着各省举办咨议局。次年 10 月，湖南省咨议局成立，谭延闿被举为咨议局议长，陈炳焕被选为议员。是月初，他从奉天回湘到职，后选为审议会委员长、常驻议员、副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人物之一。

担任湖南省咨议局副议长，是陈炳焕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

陈炳焕认真研读罗马法典、拿破仑法典等西方各国法典，为省咨议局制定各项法制规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还积极参与省政，关注民生，先后提出和参与提出了“入股法”、“宣讲案”、“慈善案”、“矿务案”、“街道案”、“筹办湘汉航业案”、“商埠划定地址案”、“贫民习艺所案”和关于赈灾、改良监狱、土地外卖等问题的议案。

其时，湖南、湖北水患严重。陈炳焕在议决河道之法的问题时，主张两湖合作疏湖浚江，治理洞庭湖：“一在清源，应请晓谕沿江两岸山种植森林，以固泥土，免致泥沙随雨夹江而下。二在畅流，宜与北省联合购刷沙挖泥机器，分三段疏浚，以荆河口至调关为第一段，以挑兴口至郝穴为第二段，以观音寺至枝江为第三段，同时并举，则荆江上下当无沙壅州垣之患矣。”[7] 为此，湖南省咨议局特派他与议员谢宗海、曾继辉去湖北协商有关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意义的参政议政机构，咨议局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当局发生冲突。陈炳焕与议员们对一些提案的议决努力坚持，尽职尽责。如湖南巡抚提交的“抽收房铺捐充作警费”一案，诸议员均以不能“官可亦可，官否亦否”，即不予通过，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和监督意识。

宣统二年（1910），清廷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欲以粤汉路、川汉路利权举借外债。湖南各界人士群起力争，掀起保路运动，陈炳焕和粟戡时等四人被省咨议局委派赴京请愿。当时，清朝邮传部发出通告：如再有人上京请愿，格杀勿论。议长谭延闿从安全出发，拟让他们推迟进京。但陈炳焕等仍坚持冒死一行，但未能取得结果。陈炳焕自日本归来，即已对革命抱以同情，其子侄陈嘉会、陈嘉祐、陈嘉任等六人，在他的影响下，均加入同盟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而此时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彻底暴露，陈炳焕亦义无反顾，转向革命。1911 年 7 月，他与易宗夔、龙璋等发起成立宪友会湖南支部。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革命党积极响应，于 22 日发动长沙起义。当日，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齐集咨议局，商议大计。陈炳焕当即发表演说：“满清政府腐败，贿赂公行，非亡不可！今日革命，我们还要大大的努力，才能希望真正的革命成功。”[8] 其时，曾有人主张对安源用兵，陈炳焕力言“矿系股份公司，只宜保护，不宜夺取”[9]，保护了安源矿业的发展。不久，长沙发生兵变，军政府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杀，谭延闿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陈炳焕任财政司司长，同时兼任财政部任命的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职务，主持全省财税工作。

民国成立之初，陈炳焕以强烈的爱国情怀，积极参与军政策划，编制都督府治事条规；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保证革命战争的需求，为经

济的恢复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陈炳焕克服种种困难，筹集和调剂军饷粮草，以供革命战争的需要。其时，湖南军政府先后派出湘军四批共 8000 多人北上援鄂，军需供应浩繁。陈炳焕全力以赴，多方筹集，保证了前线的需要。民国初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还要应付各省的需求，只得借债度日。陈炳焕认为湖南虽属贫困省份，但也应当支持中央。在谭延闿的支持下，他筹集白银 30 万两上缴中央，支持南京临时政府渡过难关，受到了孙中山的嘉勉，并授予四等嘉禾勋章。茶业为湖南的主要特产，年产茶在百万担左右，输出额为全国之冠。陈炳焕为方便茶农，令银行派人径入茶区，设庄收购，外运销售[10]，不仅促进了茶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次，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制定新的税收制度。清朝末年，财政金融极端紊乱，一切开支取决厘税、田赋两项。而田赋征收历来为“书征书解”，州县官吏假手“粮书”，流弊日多，为害日甚。陈炳焕大力改革湖南财经制度，废除“粮书制度”，将“地丁”、“屯漕”、“南折”、“私采”、“采买”等前清弊政一律废除，制定《田赋征收改良说帖》及《湖南田赋新章》，“一以正税为衡定纳税额数，使人人皆自知有田几何，税当几何，无能侵匿”，通过省议会予以公布。新税制施行以后，除去中饱，国家增加了收入，官民两利。

再次，为民初湖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筹措经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黄兴号召“振兴实业”，全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谭延闿亦大力鼓吹，发起湖南的实业建设。1912 年 10 月—1913 年 5 月，湖南新办和正在筹办的银行、工厂、公司就有 25 个以上，官办的、商办的、官商合办的，各种招牌到处皆是，包括轮船、炼铁、开矿、纺纱、织布、缫丝、制茶、制革、造玻璃、畜牧业以至土木工程等，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门类之齐备，前所未有。陈炳焕为之实施，百计经营。

民初湖南的教育事业发展甚为迅速。1912 年，湖南各类学校由清末的 739 所猛增至 4078 所，学生由 30119 人增加到 224963 人，年支出经费 2106504 元。都督谭延闿“一以君为办，君处之裕如”。其时，湖南派出的留学欧美生数百人，包括革命先烈后裔及革命元勋子女或奔走革命的有功人员，或高等学堂品学兼优的学生，其中多为公费，而首批享受公费的即有 58 人。1913 年，湖南选送留日学生 496 人、欧美留学生 111 人，“极一时之盛”。其经费之繁，可想而知。陈炳焕对此不遗余力，积极筹措，按时汇寄。

民国成立以后，陈炳焕仍然坚持革命立场。1912 年，他加入同盟会。是年 8 月，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湖南于9月成立国民党支部，谭延闿任支部长，陈炳焕任会计长。1913年3月3日，他与宋教仁、龙璋等发起成立“湖南各团筹边会”[11]。未久，宋教仁在上海被刺，陈炳焕响应孙中山、黄兴号召，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遭到通缉，乃于5月离湘赴沪。

1916年护国运动兴起，陈炳焕从上海返湘，被派任湖南官矿督办、矿务总理。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湖南矿业正处发展的黄金时期。他曾亲自深入湖南各地矿山，改善矿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发展矿业。

民国初期，湖南金融业紊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界强烈呼吁改善金融管理，金融界人士也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管理机构来维护社会金融市场，解决金融业的紊乱状态。早在1912年4月，前清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发行钞票，而民间金融机构亦蓬勃兴起，纷纷开设银行，发行纸币。陈炳焕认为“纸币非病，病在信不立”，乃按照欧美行之有效的办法制定了一套法令与政策。1917年5月20日，湖南省金融维持会在长沙正式成立，有“金融专家”之誉的陈炳焕被推选为会长。他肩此重任，即主持制定金融市场管理规则，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发行有信誉的纸币、证券，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从事金融业的发展工作。

然而，陈炳焕任事不久，北京段祺瑞政府先后派傅良佐、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湖南又陷入北洋军阀统治之下。1917年夏、秋间，陈炳焕再度去职离湘，前往上海，参加孙中山领导发起的“护法运动”。陈炳焕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与谭延闿过从最为密切，与黄兴亦甚友好，“黄克强先生尤礼致君”[12]。1904年，他与黄兴一同任教于长沙明德学堂。1916年湖南驱汤（芗铭）以后，都督由曾继梧暂代，程潜等联名电请黄兴回湘担任都督。黄兴曾复电曾继梧、陈炳焕等，对陈等“苦心谋湘，屡经事变，卒赖维持，深为感佩”，并表示“刻难回湘”，希望在湘诸公“安桑梓，保大局……毅力主持，妥为布置”[13]。此次在沪期间，他曾两次与孙中山、谭延闿等一起，发起召开纪念黄兴的会议[14]。

1920年，张敬尧被驱逐出湘，谭延闿第三次主持省政，陈炳焕亦随之回湘。时湖南大乱初定，急需能人理财。陈炳焕众望所归，出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连年以来，时局动荡，他历尽辛劳，积劳成疾，旋因疾病加剧，于12月1日获准辞职，于12月2日（庚申年十月二十三日）在长沙藩正街寓所去世，享年61岁。1921年1月4日（庚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政府特地举行隆重葬礼，将其遗体安葬于长沙县雷车岭石塘湾（今望城县桥驿下湾村雷冲岭）。

陈炳焕一生多年身居高位，长期主持财政，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没有积

蓄，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公馆。去世后，其所遗六个年幼的子女，只能依靠长子和变卖以抚恤金所购田产抚养。其亮节高风，德高望重，常为人所称道，与谭人凤、刘人熙并称为“湖南三老”。新中国成立以后，程潜还曾称道：“辛亥建元以来，湖南官吏不爱钱，能称好官廉吏，不负革命宗旨者为陈树藩一人，使人人如彼，则湖南以至天下事俱大可有为矣。”[15]

【参考文献】

[1] 民国三十五年修湘阴《陈氏支谱》卷十四“聪公房钧公世系”。

[2] (5) [6] 谭延闿《湖南财政厅厅长陈君碑》，载《长沙文史》第十八辑。

[3]《郭嵩焘日记》第四册“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4] [15] 李沛铭《陈炳焕传略》（未刊稿）。

[6] 湘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湘阴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第二十编教育·科技。

[7] 见《湖南咨议局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 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4页。

[9] 唐乾一：《湘事记》卷一，载《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10]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人物志·陈炳焕传》，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11] [14]《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228、272页。

[13]《黄兴集》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6页。

（作者系长沙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黄兴的武功

黄柏强

瑾武是民主革命家黄兴年轻习武时的名字。作为与孙中山齐名的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的文治武功为世人所熟知，而作为一名武林豪侠，黄兴的武功及在武林的状况，却因少有文字记载而鲜为人知。

《淮南子·兵略训》有“楚地大人众，卒民勇敢，贵人争佩以剑，军民上下崇尚讲武”的记述。《湖南省志·体育志》载，“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鉴湖女侠’秋瑾均先后练过巫家拳”，自然门传人杜心武“为孙中山保镖”，“八拳”第四代传人王润生“在上海击败俄国大力士多维诺夫斯基……”

黄兴，原名轸，字岳生，号谨吾（时人或写廑午、瑾武、庆午等），后改名兴，号克强。黄兴少时从浏阳人李永球学习巫家拳，常常邀乡间儿童到屋后的一块草坪上练拳比武，或者摆开阵式，演习兵操。1902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每日晨起去神乐坂武术会学习射击和武术。由于蓄志反清革命，苦练拳术，技艺大进。著名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在其《革命野史》中对黄兴的武功有如下记载：“黄克强是日本宏文师范的学生，会说日本话，宏文师范的校长是日本最有名的柔术创始人嘉纳治五郎。黄克强在宏文读书的时候极好运动，又生成一副强健的身体，也会些中国的拳术，曾和嘉纳比赛过一次，嘉纳没有得着便宜。在日本人眼光看来，能和嘉纳比赛还了得？嘉纳柔术在日本是九段，所有全日本的柔术家，都是嘉纳的徒子徒孙，寻常五六段的脚色，多轻易不敢和嘉纳交手。嘉纳也把柔术看得很神秘，不肯随便出手……”

“黄克强自和嘉纳治五郎比赛一次武术之后，在留学生当中的声名便很大，就是日本人也争着与他结交，宫崎寅藏、头山满、犬养毅、山本荣治等人，也在这时结识了他……

“宫崎寅藏别号‘白浪滔天’，日本人也称其为‘宫崎滔天’，他和头山满都是日本浪人的领袖，为人似乎有些侠义之气。”

平江不肖生在这里也毫无遮掩地谈了自己的观点：“若论技术，黄克强自然敌不过嘉纳，但嘉纳是一个懂得国民外交的人，他办宏文师范，全收中国学生，就是国民外交的一种措施，他们这种国民外交的目的，是想养成许多亲日派的人，将来主持中国的国政，他们便好实行侵略。”

不论平江不肖生的观点是否正确，黄兴那种武林人的豪气已经扑面而来，从而有了后来黄兴“发动浏醴革命所需用的长短武器，就是由山本荣一（山本荣治兄弟）在日本代为采办的，夹在大石洋行的狮牌牙粉箱内偷运到长沙的”（《革命野史》），后来又有了宫崎寅藏将孙中山和黄兴的两双巨手牵到一起。

关于黄兴的武功，黄曼西在《先祖父黄兴先生革命轶事》中亦提到过，该文载：“记起先父在病中追忆先祖父事……1905年2月，马福益以长沙起义失败……（先祖父）因偕揆一返上海，并会合谢寿祺一道返湘。他们在汉口鹦鹉洲取得原收藏于该地的少数枪支与子弹，密藏船底潜运回湘。不幸在船到沅陵时，为沅陵厘卡搜获。厘卡弁兵乃欲直前将先祖逮捕，没料到先祖父乃是国术好手，一举手即将该弁倒提抛入水中；揆一与寿祺亦与他弁格斗，将其一击倒舱内，其他两弁仓皇逃往附近防营告急，因而先祖父一行得携枪械登岸走避。”

关于黄兴在武林的状况，平江不肖生在其作品《无名之英雄》中记述无名英雄马二时，亦对黄兴有一些文字记载：“为革满清之命，黄克强等一班豪杰之士创设黄汉会，罗致三湘七泽血性男子密谋起义。湖南的风气为之一变。那时黄克强不名黄兴，也不字克强，原名黄轸，字瑾武。论到黄克强三个字，在民国元二年的时候，自然是驰名中外，只是在长沙一部分地方，还不及黄瑾武三个字的妇孺皆知。因黄瑾武从小喜练拳脚，体格更生得强壮，两膀很有些气力，性情又异常勇猛，最喜欢寻着有名的拳教师比赛……‘遇着武艺比我高强的，我无不竭诚交欢他，就是武艺不及我的，也只要这人天性笃厚，胆大心雄，我也一般的做好朋友交结’。”

“黄汉会一成立，所有曾经结识的拳教师都成了黄汉会的会员。每一个拳教师至少也有四五十个徒弟，如最著名的王福全、梁鉴铨、彭少和、林齐青等几个大教师，每人有几百个徒弟。这许多练武的壮年徒弟，由各人的师傅召集拢来，加入黄汉会，齐听黄瑾武一个人的指挥号令……自黄瑾武提倡革命，创设黄汉会，罗致无数拳教师当会员，不但革满清的命，也可算拳术界的大革命。因黄瑾武存心借黄汉会这种结合，革除拳术家历来的门户积习……黄瑾武生性阔达，没一点偏私之见，凡是入了黄汉会的人，无一个不是心悦诚服地推崇黄瑾武。”

“有许多世家弟子，因心中钦慕黄瑾武的缘故，本来无心练武的，也要延聘一个拳教师来家，借练拳为名，谋与黄汉会中人接近联络……乡宦人家想结识黄

瑾武的，办上等酒席敦请黄瑾武吃饭，必须几个拳教师作陪……有时黄瑾武自己高兴起来，也解衣袒出两条粗壮无伦的胳膊，和这些教师较量几手，输赢都不当做一回事。”

华兴会成立后不久，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那是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之夜，黄兴与刘揆一步行到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据罗尊柱在《黄兴二母葬昭山》中载，黄兴与刘揆一刚进入茶园铺矿山，即掉进陷阱，一中年汉子带领五六名彪形大汉将二人从陷阱中拉出，用麻绳捆住，黄兴运足丹田之气，猛喝一声，麻绳齐扎扎地断了。中年汉子十分恼怒，圆睁双眼，右手对准黄兴就是一拳，黄兴稳稳当当地一把接住，大汉抬起左手又是一掌，又被黄兴牢牢抓在手里，大汉的两只手，就像被千斤铁钳夹住，丝毫动弹不得……遂被引入见马福益。马福益与黄兴等在洞中烧火烤鸡、饮酒结盟，归途中，黄兴满怀革命豪情，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此次会晤，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占领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

1903年，黄兴在明德学堂教书时，即与就读经正学堂的“八拳”高手王润生交往甚密，黄兴常与王润生切磋拳术。1905年王润生留学日本，黄兴介绍王润生加入同盟会。王润生与杜心五一道担负起了同盟会的安保工作。曾与王润生交往密切的万天石先生在《武林传奇》中载：有一次，黄兴的哥哥黄牧去浏阳和焦达峰策划革命的事，黄兴请王润生为他哥哥保镖；为劝说友人郭人彰率部起义反正，黄兴曾请王润生只身前往广西桂林。1913年，王润生欲再度赴日留学，黄兴主动予以资助。在日本，黄兴与王润生、向恺然、柳午亭、李肖聃等练武之人交往密切。

黄兴将自家祖田和房屋变卖以筹措革命经费；他领导黄花岗起义，亲率“选锋”（敢死队）冲锋陷阵；汉口战事最吃紧时，他义不容辞地挑起战时总司令的担子，顶住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面对“倒孙”风波，他努力说服党内同志拥护孙中山，维护党内团结；革命胜利后，他“大风歌好不如归”，淡泊名利，超然物外；袁世凯窃国乱政，他为再造共和又浪迹天涯……黄兴一生“无我”、“笃实”，他的侠肝义胆，他的铁血豪情，不能说与其武林经历毫无关系，黄兴成就了“惊人事业”，那些武林志士亦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长沙县委统战部）

叶德辉：一个性格复杂的著名学者

龚笃清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又作焕份，号直山，一字郎园。祖籍江苏吴县。占籍（落户）长沙府属湘潭，遂为湖南湘潭人。少随父学，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名臣言行录》等。因性钝随读随忘，父不喜，光绪四年（1878年），令其辍学从商。年十五，神志忽开，忆父授之书皆能理解，自作文以示父老，均称好，便重新入学。二十岁时考中县学附生。光绪七年，入岳麓书院。十一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报罢，心中郁闷，开始读唐宋律诗绝句。又应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科会试，中式第九名，殿试列二甲进士，朝考二等，授吏部主事。旋请假还乡，以养亲为名，不复出仕。受王先谦启示，专事著述。

叶德辉不乐仕进，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保他为四品京卿，他连谢谢都不说一声，干脆一个不去。张后入军机，保他提学使记名，他亦不理。瞿鸿禨将入军机时，托王先谦捎信，认为他有吏才，劝他出山，至少可保他任道员、知府。王先谦深知叶之个性，替他谢绝，被他视为知己。

叶德辉喜干预地方大小事务。明、清官场有吏部官贵，可与督抚平行的潜规则。叶德辉仗恃其告假在乡之“钦点主事观政吏部，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的身份及其声名，对地方官员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大多数湖南巡抚、官员皆让他几分，有的还言听计从。他的弟兄便仗势作恶，祸害地方。而对那些在上任时不先登门拜访的巡抚、督军，特别是视他为劣绅的人，他便不予理睬，甚至故意刁难。所以他成为长沙城里一霸。

叶德辉风流放荡，妻死不娶，却经常宿妓嫖娼，还好男风。他喜好戏剧，也真懂戏曲，便主办湘剧春台班。由于管理到位，在他手里，戏班子办得红红火火。但他经常玩戏子，侮辱其人格。

他天赋很高，看书多，脑子转得快。伶牙俐齿，出语风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他生性尖酸刻薄，有种你说东、他偏要说西，显得与众不同，唯我独高的霸气。他原本对清廷并不怎么看好，熊希龄还当面指斥他有造反思想。当湖南巡抚陈宝

箴行新政，梁启超等人主时务学堂，申康有为改制之说时，本来就不认同公羊学说，且好抬杠、好出风头、好为人师的叶德辉，便著文斥其为“异端邪说”，鸣鼓而攻，大肆诋毁。直至湖南的维新变法事败，方以胜者姿态歇手。唐才常自立军事败，他搜集康、梁逆迹，辑为《觉迷要录》，作“康梁逆案之定谳”（《觉迷要录》叙）。民国二年（1912年），黄兴返湖南，长沙万民空巷去争睹这位开国元勋的风采。各界人士为纪念黄兴的伟绩，特改德润门为黄兴门，坡子街为黄兴街。谁知这又触犯了叶德辉的拗筋，他于次年写下《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对黄兴进行侮辱嘲讽。

叶德辉有经商才干，善理财。又利用其声望势力，巧取豪夺，故富甲一方。他长期把持长沙坡子街火宫殿事务和坡子街保安团息争公所，被奉为总团总，敲诈勒索，上下其手，大肆敛财。宣统二年（1910），长沙大闹饥荒，他却积谷万石，意欲囤积居奇，不肯出售，加上其他人均行此道，激出饥民抢米，火烧巡抚官衙事件，叶德辉也因此事被清政府革去所有功名与衔头。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一些士绅纷纷避居武汉、上海，叶德辉自恃交际广，门生多，有些还是与共产党人有关系者，如毛泽东就是他门生的学生。他以为过去同地方官吏作对，胜利者总是他，这回也会如此。因此，他不但不走避，反而与农会作对，故伎重演，写了副对联讽刺农民协会：

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

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

横批为：斌尖卡傀

此联首嵌“农会”二字，咒骂农民协会是“一班杂种”，“六畜成群”。横批意为这些人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的家伙。

他又攻击妇女协会，妇女们群起而攻之，在痛斥叶的公开信中有“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的句子。对此，叶德辉又施展其伶牙俐齿打痞子腔，说下流话，颇似今天的黄段子，笑曰：“吾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欲寝吾皮，则吾骨瘦如柴。如欲食吾肉，今愧不及三寸，君等有兴且试一试。”

闻者都笑骂叶德辉尖酸刻薄之性难改，是个“化生子”。叶也自鸣得意，以为又像当年骂黄兴、谭延闿、汤芗铭可大出风头而莫奈他何。但这次他却打错了算盘，共产党是不讲情面的，中共湖南省委密令省农民协会抓捕叶德辉。他闻讯躲在一暗娼家中，终被他的外甥女张琼带人抓获，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公审大会，由郭亮判其死刑，执行枪决。

叶德辉之死在湖南及全国文化名人中引起了巨大震撼。王国维投水自杀，便与叶德辉之死所受惊吓有关。他在遗嘱中所说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

义无再辱”中之“世变”，指的当是此事。1927年4月11日叶德辉被杀，5月1日《北京顺天时报》刊载了《被党军枪决之叶德辉》的通讯，6月2日王国维即投北京昆明湖自尽，从时间上也可看出叶氏之死对他的影响。

据亲自带人从秘密处所抓获叶德辉之叶氏外甥女、中共早期党员张琼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老革命的她见到毛泽东，毛向她问起叶德辉，曾说过叶德辉是不应该被杀的，“可以废物利用”（见张增泰《从叶德辉之死说起》）。

若论学问，叶德辉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他对经学、史学、小学、诸子、金石学无所不通，尤擅版本学、文物、钱币、书画鉴定。小说戏曲、诗词乃至相术、房中术，无一不能。

叶德辉治经学系将东汉许慎、郑玄之书横通贯穿。尤精《说文解字》，称其非字书，乃汉学。“舟车出入必以《说文解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书自随。尝言《说文解字》为治群书之梯航，《四库全书总目》为读群书之向导”（失名《郎园学行记》）。曾手校《说文解字》，密行细字盈满行间。又曾纠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考证议论之错误一百数十条。亦精熟《礼记》、《周礼》、《仪礼》，并独有卓见。湘中经学家，他与王先谦、王闿运并称。

他能识古文奇字，凡钟鼎彝器金玉器铭之字，古刀币秦汉镜瓦铜印之属，一经他审定考释，无不厘然当于人心。其金石题跋及与友人论学之书，大抵曲证旁通，能使读者精神一振，受益良多。出土之甲骨文及古竹简刻书，其文奇古多不可识，他能以古籀递变之形象释之，一经考定，便无以易其说。潘祖荫所藏之盂鼎、陈介琪所藏之毛公鼎，经他之眼，所释与诸家不同，读者服其神悟。吴大澂与端方任湖南巡抚时，以收藏金石著称，每次见面，都要请他鉴赏。他自己说：“吾乏他长，所见古器多，文法字例熟耳！”（失名《郎园学行记》）

叶德辉藏书三十万卷，为近代中国大藏书家之一，中多宋、元、明本及历代名人校抄。他一生致力于古籍之校刊。每得一书，必逐卷校读而后插架。若同一种书有无数刻本，也必重读重校，辨其行字异词是非，或某本有讹脱，某本有增窜，一寓目即终生不忘。外出叫人找书，于家人信中指明该书在某橱某架某行某卷，一一捡出抄寄，百无一误。那些只盖姓名斋堂道号印章之书，他一见即知其人的时代履历。每购一书即有题记，于作者宗旨，刻板源流，一一道及。后辑为《郎园读书志》刊行。故与缪荃孙并称为海内第一版本学家。其笔记体的中国版刻印刷史和版本学著作《书林清话》，是迄今为止任何一本与此类学问有关的专著或论述都无法绕过的。

由于见得多，记得熟，故他对古籍版本的鉴别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据传一

本书到他手中，他无须翻看，只用鼻子一嗅，即可知书之年代和真伪。一次，他从长沙南阳街一家书铺前经过，见有十几本古书堆积于案。他说："这不是明代世德堂的《六子书》吗，为何缺了《老子》？"老板感到不可解，因为此书册数皆全，种数不少，便问他。叶德辉说："这里头有些是配版，并非原刻。"老板更感惊奇，他说："这不难辨，我是从书口露出的墨栏字痕看出的。原刻是双线栏，翻刻为单线栏，一眼即可看出。"又一天，他看见书肆中有《感旧集》十六卷，原为清代大名士王士祯辑，卢见曾于乾隆时补注并刻印的。他说："这书是抽掉钱谦益那卷诗改装的。"检看后果真如此。缪荃孙替张之洞撰写的《书目答问》，姓名错误、书卷缺载之处很多，叶德辉为之随手补正，用朱笔录十多部分送门生。他曾当面与缪荃孙开玩笑："江东若没有我，你就可以独步一时了。"话虽笑谑，却是定论。

叶德辉家藏古名人书画颇富，又有学问，故精鉴别。大名士、国子监祭酒盛昱有唐王维画的《伏生授经图》，绢本方幅，给叶观赏。叶一见便说："这不但不是王维画，连唐人画也不是。"问为什么。他说："画中伏生手持书卷，唐无此式。且汉初犹用竹简，《汉书·艺文志》：尚书家传四十二篇。传者，伏生大传；篇者，竹简。若用帛、纸则称卷。王维再无知，决不至连这都不懂，况线装书并不出于唐制。"听者无不称佩。端方抚湘，邀叶鉴别书画，说："我有唐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晋顾恺之画的洛神长卷。"叶问："天王像是直幅呢，还是横看呢？"端方说："横看。"叶立即说："真的！"展开一看，果如其言。再看顾卷，叶说："假的。这画宋人的临本已入《石渠宝笈》，阮元《石渠随笔》载之。唐以前画龙皆行地上像犬，在云中露一鳞一爪者，都是宋代以后的事了。"端方以收藏名闻天下，听后至为敬佩。有人有晋荀勖山水卷，看过的人多说是假的。叶德辉一见，惊叹说："虽不敢讲它一定是荀勖画的，但确非六朝唐人所作。因其墨气浓厚，笔阵方严，有汉武梁祠石室画遗意，决非近代笔法。"像这种未见书画能定真假，见了不仅辨真伪，又能辨年代的事很多，因此，叶德辉在书画界名气很大。

叶德辉于星历占卜风水之书兼收，多人间秘籍，为人推算星命年运休咎百不失一。民国初他到北京，许多政界要人都经他推算过。他说某某何月不利，何事不吉，都在几个月后一一符应。多少年后人们犹以为神。大学者柯凤荪也精此术，却极推重叶，说他"学通天人"，又称他"学贯中西"。

叶德辉学识广博，能文善诗。其诗记行踪，感物怀旧，设色工丽，宗法韩愈、李商隐、王士祯。善炼句，佳句精言不少。最长七古、七律。论文主文以载道，事理通达，有补于世。认为作文非本源经术，精熟义理，决无佳作。于宋宗朱熹；

明则归有光；清为方苞、姚鼐。他长于骈文，尤精律赋，即便为应酬之文，无不典则高雅。墓志、碑记尤近唐人。叶氏还通戏曲，家藏元、明杂剧数百种，曾著《剧史》一书。又爱篆刻，家中藏印谱及古印甚多。

叶德辉还有一个长处，即喜奖掖后进。他乡居三十年，凡执经问学之人，不管来自穷乡僻壤，是穷是富，一律接待。不受贽礼，也不收束脩，谢绝请吃请喝。你投上制义时文，他马上批改，有问必答。凡收入门下者，还供其宿食，引导他们遍读他所藏之书，分门授学，有教无类。连日本、西洋旅学来湘者都登门求教。他循循善诱，无不学成而去。如日人盐谷温从受金元杂曲，松崎鹤雄从受《说文解字》，法人税务司德秀从读中国传记小说，德国麦令豪从受经学，皆有成就。

叶德辉极爱才，年轻人有一技之长，夸奖不啻己出。遇岁、科两试，学政搜访人才，必就叶询问。叶所推举，多为不识而有才之人。本来湘人不讲摹印之学。沅陵丁可钧初来长沙，叶德辉在装裱店见到他为人所作楹联刻的印，极工整，四处追问方知是丁君所为。便把他请到宾馆，替他到处宣扬，巡抚吴大澂和学政江标也爱才，便把他选为拔贡。吴大澂把家中万多枚秦汉印及古印给他观赏。叶德辉则尽出所藏前人印谱为之指授。于是精于刀法的丁可钧技日精，名日噪，脱颖而出。

叶德辉喜干预地方政务。凡湖南有兴革及巡抚有咨询之事，召集司道及乡绅讨论，叶德辉必侃侃而谈。王先谦、张祖同、孔宪教虽不像叶氏那样伶牙俐齿，却也不甘落后，总要指手画脚。故天下皆知湖南绅权过重，有王、张、叶、孔四大绅把持省政之说。实事求是地说，叶德辉以其才学，在不少问题上所提意见是正确的，维护了湘人利益，并非仅为他们自己谋算。

如唐才常自立军在武汉起事失败，张之洞迫湖南大抓持"富有票"的党人。叶氏便与巡抚俞廉三说，这些书生无非受人诱惑，张之洞此举是欲嫁祸邻省。实际上这些人是张之洞放纵养成的，不必为他火中取栗。俞廉三听了他的话，放了这些人一马。叶本人还亲自解救过一些被牵连逮捕的人。其后湖南革命党起，地方官以杀人邀奖，罗织瓜蔓，不察情伪，遍及各学堂。叶德辉又去官府进言，说士风已坏，非杀人可以挽回。只有修明政教，镇服人心，制止捐输买官，让学生有仕进之途，方才可防止他们革命。否则前伏后起，诛不胜诛。这才是正本清源之论，但当道并不听从。

湖南谷米为出口大宗。因厘局收捐不易，奸商偷运无法禁止，许多人主张阻禁，但总督张之洞又不准。叶德辉与主管官员说，不如寓禁于征，每年可得巨款，积起来为备荒之用，也可调剂丰歉。主管官员立即报告巡抚，经会商通过，便委

官总办。当年即收银一百三十万两，湖北抽走一半，仍可得六十多万两。因此，张之洞也不作梗了。于是便成立了两湖赈粜米捐局专办此事。

这样的事例不少。由此可知，对于叶德辉这样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革命或反革命来辨识。他们受时代、教养、地位的影响，有的更因性格所致，往往会做出许多好的、坏的事情，若只以革命或反革命来评判，就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他的人生。只以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历史人物，会导致评价的偏颇。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叶德辉对图书事业的贡献

陈　树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直山，一号郋园。先世为江苏吴江人，其祖辈因避兵乱，移居湖南，后以湘潭为籍。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然其“不乐仕进，日以搜访旧书、刻书为事，专力于考据之学”（叶启发《郋园读书志跋》）。不久即乞养归里，以藏书治学为业。

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士绅，湖南“三大儒”之一（另二人为治帝王之学、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的王闿运，以及曾任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叶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保守，属于有争议的人物，但在学术上却颇有建树。他的弟子杨树达评论其师的学术地位说：

盖先生之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迹段、王，自标独得。晚岁笃精小学，史籀有疏，读若有考……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郋园全书序》）

这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叶氏之学术成就，叶德辉一生所著、所辑、所刊之书，即在《郋园全书》中已达130余种之多，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书林清话》10卷、《书林余话》2卷、《藏书十约》1卷等，他还编写书目《郋园读书志》、《观古堂藏书目录》，并校刻古代稀见书目15种，成《观古堂书目丛刻》。

一、在藏书方面的成就

以今天的目光看，叶德辉既是一名博学多才的学者，亦是一位爱好广泛的收藏家，这当然与其家境殷实是分不开的。江阴缪荃孙在《书林清话》的序言中称叶“不乐仕进，养亲家居，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词、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凡经籍、金石、书画、陶瓷、钱币，无不罗致”。叶的收藏爱好中，又以藏书为甚，他“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

（一）藏书来源

叶德辉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三：其一为祖上所遗，其祖自吴迁湘时，有“楹书数巨簏”，如顾炎武、惠栋、钱大昕诸遗书，毛晋汲古阁所刊经史残册，唐宋人诗文集，经叶盛、叶树廉收藏旧籍，叶梦得之《家训》及说部等书。这批书数量并不多。

再就是叶历年从市场上及其他藏书家手中所收购。在光绪十二年入京会试时，叶德辉每天到琉璃厂、隆福寺书肆访书而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以后无论乡居湖南还是游览京师抑或行旅吴中，他都随时留心收罗。光绪十二、十三年，湘潭藏书大家袁芳瑛卧雪庐藏书散出，其中的精品多为李盛铎所得。此时，叶德辉的资力无法和李氏竞争，但叶细心收拾残零，所获亦十分可观。以后，叶德辉又在北京购得商丘宋荦纬萧草堂和曲阜孔氏红榈书屋旧藏 20 箱。而光绪十八年叶德辉中进士后不久回到长沙家中，专心以治学藏书为业，十余年间更是收获颇丰。

其三，叶在后期以书会友，结识了一些海内外的藏书家，用所刻书籍与他们互赠互换。这个举措是叶德辉的创举，在丰富其藏书品种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叶德辉非常重视刻书，他在言及张之洞《书目答问》时，对刻书事业进行了高度评价：“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叶德辉用自家观古堂汇刻的丛书换取了许多日本影刻宋元本医药保健类书籍，如古典文学社在 1957 年出版的《古今书刻》所用的明刻版本即为叶德辉接受日本友人馈赠而得。

（二）藏书特点

经过历年的苦心积累，至辛亥年间，叶德辉的藏书单本已有 16 万多卷，若把复本计算在内，则超过 20 万卷，这些书分装在 1368 个书箱中，并有藏书处观古堂、丽楼，可谓海内的藏书大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叶德辉死后，其多年收集的藏书被窃取或散失，而观古堂的藏书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其子叶启倬、叶启慕卖给了日本人山本，现藏于日本。国内今存数量不多的叶德辉藏书，藏于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处。

宣统三年（1911）冬，叶德辉撰《藏书十约》，该书主要从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等十个方面对书籍的收藏、整理工作进行了阐述与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叶在藏书方面的几个特点：一是在版本的朝代方面。当时的藏书家多流行追求宋元旧椠，叶却不赶这个风潮，而以明清精校精刻本为收藏的重点。我们分析，叶的这个收藏取向基于以下原因。首先，他认识到宋元版本流传至清代，多名有其主。坐拥者除非遭重大变故，决不会轻易散出。其次，

在叶德辉看来，向为清代藏书家所忽视的明刻和清刻，其中实不乏珍品。叶认为没必要厚古薄今，“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书籍出版事业，随着社会生产力与文化的发展，今是可以胜昔的。他在《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和卷九《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中指出，明清刻本无论从内容和书品来说并不比宋元刻本逊色。而在《郎园读书志》中，他进一步提出，自康雍乾嘉以来，“累叶承平，民物丰阜，士大夫优游岁月，其著书甚勇，其刻书至精，不独奴视朱明，直可上追天水”。再次，叶德辉是一个大学问家，多本参校参读从来是治学之关捩，叶德辉当然不会放过校、刻皆精的明清本。当然，叶所藏宋元精本也不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宋元本虽不多见，也时有一脔之尝。其中最珍贵的有宋本《南岳总胜集》、《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元刻本《仪礼集注》、大德本《绘图列女传》等。

二是重视异本。“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可见叶收集异本的目的重在比较研究。

三是在版本价值之外，叶德辉还重视建立类目齐全、比例合理的藏书结构，以及所收藏书籍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叶在《藏书十约》的“购置”一项中说：“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从《郎园读书志》看，经部书凡 96 种，史部书凡 97 种，子部书凡 126 种，而集部有 349 种。其藏书门类的丰富，用叶自己的话来讲，是“不至有阅世借人之苦”。

四是重视对藏书的校勘工作。在《藏书十约》“抄校”一项中，叶德辉强调抄书后要细校：“已抄之书，别人校之，人抄之书，则己校之；多一人寓目，必多校出二三处误字脱文。经史更不得草率，一字千金，省后人多少聚讼，岂非绝大功德哉。”而在“校勘”一项中，他认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并指出校勘方法有“死校”与“活校”两种。“死校”为“一点一画，照录而不论，虽有误字，必存原文”，也称作“求古”；“活校”是“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这种方法又称作“求是”。他指明两种方法各有优长，目的都在于存真。应该说，叶的校勘工作对其藏书质量的提高，文献信息的完善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叶德辉过去被认为是刊印、发行黄色书籍的书商，现在看来，似有偏见。唐代以前，我国曾流传过《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房玄子》等房中术著作。这些都是珍贵的古代性学文献，可惜在五代乱后已失传。然而，叶德辉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珍

贵的资料存于东瀛。他分析说：

《隋书·经籍志·子部·医家类》有《素女秘道经》一卷，注云：并《玄女经》又有《素女方》一卷。新旧《唐志》均不著录，惟日本宽平中见在书目有《素女经》一卷，而无《玄女经》、《素女方》，疑其时合为一书，不复分列也。宽平当中国唐昭宗时，其时彼国贡书之使，络绎于道途，故五代乱后亡书，彼国皆有传者。此经虽未有刊本，而载在彼国永观二年丹波康赖所撰《医心方》廿八卷中，首尾贯通，似是完帙。永观二年为宋太宗雍熙元年，去唐未远，其中所采《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并此经皆言房中之事；又载《养阴》、《养阳》诸篇，大抵汉、隋两志中，故书旧文，十得八九。

叶用自己的刻书与日本学者交换，并从中辑录出上述五种古籍，刊印成《双梅景闇丛书》，他在其中的《新刊素女经序》中说："今远西言卫生学者，皆于饮食男女之故，推究隐微，译出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无知之夫诧为鸿宝。殊不知中国圣帝神君之胄，此学已讲求于四千年以前。"从今天看来，此言虽有过之，然叶发掘、保护中国古代性学史料之功亦莫大焉。

二、对版本目录学的贡献

叶德辉在进行一般藏书家所从事的编制藏书目录及撰写读书题跋等工作的同时，还涉及书籍史、古代藏书管理经验以及前人书目刊刻、订正与考证等研究领域。谢国桢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中评价其"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

（一）创作我国首部系统的书籍史

作为文明古国，历代以来，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图书资料，然而千百年来，并无一部系统的书籍史。清光绪年间（1875—1908），叶昌炽作《藏书纪事诗》，记载了北宋至清 1100 多位藏书家的故事，但由于文学形式的限制，该诗只是提供了一些资料，不属于系统的书史。而叶德辉著述的《书林清话》，可称为我国首部系统的书籍史，亦是一部重要的版本学理论著作。该书共 10 卷，写成于清末，经 3 次修改，刊印于民国九年（1920）春。全书以笔记体的形式，提供了关于我国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类知识，不仅叙述了唐宋以来刻板、活板、套色等各种印刷方法的源流，乃至于对历代书籍的规格、纸张材质、用墨、字体、装订工艺、工价、市场、鉴别、保存及宋元明清四代许多著名刻本的掌故均有所介绍。如在《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篇中，叶记载了明以后，刻印工价总体上涨的趋势，以及各地的工价差异：

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五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书，光绪初元，每百字并写刻木版工赀五六十文。中叶以后，渐增至八九十文，元体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隶每字五文，至宣统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叶五百字出入，每钱银直百六十文计，每叶合银叁钱畸零，视明末刻书已增一倍。然此在湖南永州一处则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书刻价每百字仅二三十文。江西、广东亦然。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

在该书卷六"宋印书用椒纸"篇中，叶还记载了宋时一种珍贵的芳香防虫的印书纸："宋时印书纸，有一种椒纸，可以辟蠹。"并描述了其制作工艺与外观："椒纸者，谓以椒染纸，取其可以杀虫，永无蠹蚀之患也。其纸若古金粟笺，但较笺更薄而有光，以手揭之，力颇坚固。"看来，媒体报道过的中国第一本散发香味的书，其实古人早就发明过了。

关于活字印刷，至今历史学主流观点仍认为始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所创的胶泥活字，而叶德辉当时却在书中提出了新观点："活字板印书之制，吾窃疑始于五代。晋天福铜版本载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此铜版殆即铜活字版之名称。"（《书林清话》卷八）

可以说，《书林清话》的这些记载不仅对我们研究中国书籍发展史，以及考订古代典籍真赝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我国古代、近代的经济史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叶德辉还从书籍美学的角度出发，强调书籍出版印刷中的图文并茂，即艺术性与功用性的有机结合。他引用同时代人徐康在《前尘梦影录》中的观点："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而在图文书中，他认为以"明代最为工细"。

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及其读法》一书中，亦评论《书林清话》"论刻书源流及掌故甚好"。

（二）目录学成就

叶德辉目录学研究的代表作是《观古堂藏书目录》。该书的图书分类类目与《四库全书总目》相似，但在"史部"中专门列出了"金石"一类，而在"金石"类下又分"目录"、"图像"、"文字"、"考释"、"义例"等子目。所谓"金

石学”，乃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近似欧洲的铭刻学，研究对象属零星出土文物或传世品，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而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叶这种重视金石学的做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学科发展情况。

此外，叶德辉还对前人的书目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订补的工作。我国古典目录学包括官家、史家以及私家等三种目录。其中私家目录有多种形式，如题跋、按语、解题、注释、序文等。叶德辉将自己为藏书所作的题跋编成《郎园读书志》，共16卷。他在题跋中往往注明作者姓名、籍贯、仕履及著书大概，接着叙述作者学术之源流派别，版本缮刻的异同，还夹杂发挥自己的观感与看法，可以说，叶的一篇题跋既如同现在一本书的提要，又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书评。另外，诸如史部中的野史、外史，小说诸门类所著录的小说、戏曲、演义、传奇等文献，长期以来，既不入官家目录，亦不收入史家目录，而私人藏书，更多的是凭其志趣爱好，没有束缚，故亦常出现官府所无而私藏特有的现象。叶德辉却看到了这些不入官录的文献的收藏与学术研究价值：

唐以来古文义法行，而方言俚语，遂不见于文人记载之书，而或时见于唐宋人小说中，然不能详也。详者惟传奇、杂剧及金元人北曲。

应该说，这种对私家目录的重视也体现了叶德辉独到的学术眼光。

作为清末民初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对古典文献保护与研究的经验，对目录学，特别是私家目录的研究，以及其与海内外交流刻书，以填补空白，促进研究，丰富收藏的做法，对于当今图书馆的各类文献资源的采访、建设，以及古典文献学的发掘与研究，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学术昌明的今天，我们切不可因人废言，致使前修成果淹没。由于学识浅陋，谨陈述管见于上，祈请读者不吝教正。

【参考文献】

[1] 杜迈之、张承宗著：《叶德辉评传》，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2] 叶德辉编：《双梅景闳丛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8 年版。
[3] 叶德辉著，李庆西标校：《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藏书十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4] 谢国桢著：《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5] 刘慧霞：《略论叶德辉对目录学的贡献》，《图书馆界》，2009 年第 1 期。
[6] 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作者系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图书馆馆员）

长沙吊马庄予园公馆的两代名医

刘奇琰

2010年长沙市文物普查中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吊马庄1号予园公馆，系民国名医刘建勋旧居，“予园”是刘建勋因怀念其父刘赍予而名。刘氏父子系醴陵人，都为筹建和建设湖南公医院（今长沙市一医院前身）做出过贡献，并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社会影响成为两代名医。

刘赍予（辅察）（1880—1930）为清末秀才，1904年毕业于湖南将弁学堂。同年8月，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后因体弱而改学医，考入长崎医科大学。留学期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毕业回国，创建红十字队，任湖南举义军军医处长和陆军医院院长。二次革命后再赴日本，重入长崎医科大学习医。一年后回国，在长沙开设诊所。1915年，响应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与湘军领袖密谋举义，并赴四川游说川军将领讨袁，又由川入粤，联络同志策应。1917年护法军攻下长沙，刘任卫戍医院院长。1920年任湖南陆军医院院长，发起留日和留德医学生组织湖南医药学会，并与长沙市各界一起筹建了湖南公医院。这是湖南省第一所由国人创办的西医院。1926年入粤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转战入赣，受老同学程潜委托，只身前往南京，劝说孙传芳反正，并赴上海招抚北洋军毕庶澄部，被孙传芳侦悉而被捕，直到国民革命军攻入南京后才获救出狱。1917年春，受蒋介石委派，刘赍予赴北方与奉军将领协议和平统一，促成奉军出关易帜。返湘后，任湖南陆军医院院长，整饬院务，成绩显著。

刘建勋（卧云）（1900—1995），1921年考入东京医科大学。1925年毕业后，报考并被录取为庚子赔款资助的研究生，分配至长崎医科大学，在角尾教授领导下的第一内科从事临床和研究工作。1929年回国任湖南公医院内科主任。1930年任湖南陆军医院院长。

从1931年起，开办了5期高级看护训练班和五期军医研究班，为抗日战争输送了大批医护人才。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又设立了各拥有1000床位的益阳后方医院和常德后方医院，共收治伤员3500多人，任湖南陆军医院和益阳后方医院、

常德后方医院三院院长，同时兼任湖南公医院院长。1939年湖南陆军医院南迁至广西桂林大圩镇。1940年随湖南公医院迁至湖南茶陵。其间，设在茶陵的湖南第二保育院有70多个孩子染上了麻疹，病重者被送往公医院，刘建勋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孩子无一死亡。随着医疗业务不断发展，湖南公医院工作人员增至近百人，成为抗战后方我省东南地区一所较为完善的综合医院。1943年，派遣医务人员返回长沙旧院址，开展临时门诊工作，还筹建了湖南公医院醴陵分院，成立了湖南公医院湘东巡回医疗队，对缺医少药的民众进行巡回医疗，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

抗战胜利后，刘建勋辞去湖南公医院院长职务，于1946年在长沙开设“卧云医院”，并任长沙市开业医师公会会长。1949年曾利用与陈明仁的关系，积极营救因参加湖南和平起义而被捕的民主人士。同乡和留日老友李明灏将军参与策划湖南和平起义后，来卧云医院治疗关节炎。刘建勋在李明灏的影响下，加之阎子祥市长上门聘请，毅然将卧云医院的全部药品和器械捐赠给长沙市立医院（今市一医院）。后历任长沙市一、三医院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湖南内科分会副理事长，多届当选长沙市人民代表、长沙市政协委员，为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顾问。

（作者系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审）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

——新宁刘氏后裔缀记

李湘树

湖南新宁刘长佑、刘坤一侄叔都是湘军名将、晚清重臣，人称“隔墙两制台”。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湘军实有三支，一为曾国藩、彭玉麟、胡林翼所辖；一为左宗棠所辖；一为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所辖。刘坤一字岘庄，生于新宁“光厚堂”，虽小刘长佑12岁，但是论辈分是刘长佑族叔。他仕途显赫，被赐头品顶戴，官封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两广、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钦差南洋通商大臣。刘长佑字子默，生于新宁“馀庆堂”，历任清朝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云贵总督。他一生仕途坎坷，是一位道德文章均佳的儒将，“馀庆堂”宅门楹联为“移善之家必有馀庆，有福之人方能读书”。的确，近百年来，刘长佑一脉保持了读书的家风，后人中多为学者、名人，堪称湖南的文化家族。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永济是刘长佑嫡孙，字弘度，号诵帚。幼秉家学，爱好文艺。曾在沪上就学于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门下，深得词家三昧。从20世纪20年代始，先后任教于长沙明德学校、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并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度担任代校长。为部聘一级教授、《文学评论》编委。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刘永济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并于同年10月2日含冤辞世。后经武汉大学平反昭雪。

刘永济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为终生至交，治学谨严，博通精微，在屈赋、《文心雕龙》、诗词曲诸研究领域均卓有建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推重。

我国古典建筑研究的开拓者刘敦桢，字士能，是刘长佑堂弟刘长佐的曾孙。刘敦桢先生少时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湖南大学教授。他曾设计了湖南大学办公楼、长沙市天心阁、南京图书馆、中山陵光化亭等著名建筑。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部聘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于1968年4月30日辞世。后有关方面隆

重平反。

刘敦桢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建筑学家，一生从事古建筑研究，与梁思成共同奠定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基础，被建筑界誉为“南刘北梁”。他勤奋治学，著述很多，其中《苏州古典园林》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研究中的经典著作，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国家原高教部副部长刘子载，又名刘仲谦，是刘长佑的曾孙。五四运动后，他投身革命。1921年，刘子载考入湖南一师，认识了毛泽东、李维汉等共产党人。毛泽东很喜欢刘子载，经常要他到省工会工人补习班讲课。1926年，刘子载参加了共产党，后又到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归国后，偕陶铸的第二支队挺进大别山，担任政委，后又领导过军队、工会等工作，解放后，曾任辽东省委副书记，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从1954年起担任高教部副部长，长期主管高教部人事司、学生司、政教司、中专司的工作，主持制定了有关高校干部管理，学生管理以及出国留学生选拔、派出及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他十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2年10月20日，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刘子载含冤离开了人间。后经中共中央平反昭雪。

刘氏后裔中外支亦学者辈出。刘长佐一支有陈贻焮（1924—2000），字一新，北京大学教授，博导，《文学遗产》编委、《文学评论》编委、中国韵文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

陈贻焮教授为人淡泊，致力唐诗研究。他治学兼有新老学者之长，其笃实的学风和杰出的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他在八十年代完成的《杜甫评传》上、中、下三卷，长达108万余字，是目前国内研究杜甫最为详尽深细的一部力作。

刘长佑一支外系则有陈书良教授（1947—），他是刘永济的伯外孙，刘永湘教授的外孙，曾长期担任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现为湖南商学院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文史馆馆员，兼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曾是第六届全国青联委员。

陈书良教授背父所生，幼随外祖父读书，后从吴林伯先生专治汉魏旧籍，一生潜心治学，著述达三十余种。其主编的三卷本110万字《湖南文学史》是全国第一部省区文学史，其六朝文学研究为时人所推重，被誉为“六朝人物”，其中《听涛馆文心雕龙释名》在日本出版，学术界认为是近年难得的朴学著作。其《六朝如梦鸟空啼》等百种专著在大陆出版后，又为台湾买版再印，影响较广。

悲哀的结局

——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归宿

万发真

一、王芃生其人其事简述

“卅载艰贞，千般困阻，孤忠耿耿忘家。南北东西，舟车远及天涯。存韩救赵劳心计，任世人毁誉交加，矢精诚，尽瘁宗邦，暗损年华。无戎睿智勤宵旰，问苍生夜半，沐雨风斜。献替绸缪，誓屠封豕长蛇。而今酬得澄清愿。久自甘，淡饭粗茶。最堪怜，赠策无人，借箸兴嗟。”这是著名的情报专家、中国乃至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在抗战末期听到日本投降后作的一首词。这首词精确地描述了王芃生在抗战中的“报国”心情，也暗含着一丝悲凉的气氛。抗战结束后，日本投降了，王芃生的对日工作即将结束了，他又是怎样打算的呢？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这些疑惑等待着历史的解读。

王芃生（1893—1946），原名大桢，别署曰叟。湖南醴陵人。早年就读于长沙陆军小学。他曾五次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任中国代表团咨议。后历任国民政府驻土耳其、日本大使馆参赞、交通部次长及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一生著述颇多，著有《日本古史辨证》、《日本古史之伪造》、《土耳其论文集》等。对于王芃生其人，曾有人这样评价他，说他专办对日的交涉问题，建树了卓异而传大的成绩，是一位外交家；说他专门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抗战时期敌情分析和关于时局发展趋势的文章，是一位政论家；说他对于日本史特别是日本古史，有独到的研究，是一位历史学家；说他在文学上有较深的根底，鉴赏批评的眼光极高，是一位文学家。这一切都可能是事实，但是我想他最值得人们钦佩的、最让世人关注的是他卓越的胆识和他领导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抗战时期，他和他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真正做到了料事如神的程度，对于抗战中日寇的一举一动，都能洞烛机先，了如指掌。对于日本何时发动七七事变、何时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何时投降等等，他均能事

前将其预测密呈蒋介石，无不灵验。这些成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王芃生与抗战后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造事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也结束了。为了做好日本投降后战后中国的工作，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开始战后的整肃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王芃生感到了对日情报工作已经临近结束的阶段，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之后，王芃生便召集了谢南光、潘世宪等商谈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将来”问题，经过大家的一阵沉默，最后，王芃生提出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以便将来使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单位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人员的认可。此后的几天，王芃生便开始和傅斯年商谈这个问题。但是，在王芃生与傅斯年的多次协商中，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其结果不尽如人之意，傅斯年始终以“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萨”，“不能接受”，以一个难以让人信服的理由拒绝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之事。这样，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的计划便泡汤了。就在此时，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军统局要兼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说法。可见，解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已经非常紧迫了。此后，王冗生便召集了一批科级以上人员二十余人在其家中座谈，开始商讨“日本投降后，我们对日情报研究机构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王芃生首先说明了政局形势，对并入军统局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并以此征求大家的意见。座谈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始终是想法不一，有人提出“解甲归田”，有人说“自谋出路”，有入提出并入中央研究院的问题，也有人提出改隶外交部的建议，还有人提议改为私人的研究团体。座谈会最后没有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后来，国际问题研究所采取了由军委会改隶外交部的设想。但是改隶外交部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机构要缩编、降级，王芃生也不能再继续领导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对此，王芃生表示要以安置机构人员为首要任务。此后，在向国民党侍从室解释改隶的理由时，他讲到日本已经投降，对日的敌情研究应改为平时的对日政治、经济研究，所以国际问题研究所应该改隶外交部。对此，侍从室的批示是“与外交部洽谈改隶事”。随后，王芃生派谢南光去外交部商谈并入问题。在改隶之事上，国际问题研究所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国研所保留原名，只是改由外交部领导，直属于外交部部长的独立研究机构。而外交部的方案是设立一个隶属于该部情报司之下的研究室。从方案看，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想借此继续保留其原有的地位，而外交部则意在压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最后经谢南光与外交部次长甘乃光反复协商，达成了并入外交部的设想，但是隶

属地位问题没能解决。9月初，因战后复员及接受伪满问题，谢南光奔赴南京，组织南京办事处，同外交部的具体谈判便一时被打断。随后，王芃生派潘世宪与外交部就人员安置问题继续谈判。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初衷是要保留一个120人的规模，这样在人员数额上明显超过了外交部原来设立一个研究室的设想，外交部自然不同意。后来，经过几个回合的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商定研究所的并入人数是60人左右，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对此，甘乃光认为，现在先不作肯定，到那时看最高当局的意思，能争取到与司级平行最好，不然就只能隶属在情报司之下了。等到回南京以后再谈。这样，谈判问题便被搁置起来。

三、王芃生的仙逝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结束

1946年初，谢南光被王芃生推荐到驻日代表团工作，邵毓麟和潘世宪也被派任驻韩代表。而在此时，王芃生也有放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的打算，他想去日本主持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对出使日本颇有期望。为此，王芃生也向蒋介石表达了这一意愿，蒋许愿派王芃生去日本处理对日问题。但是由于亲美分子的鼓动，结果蒋介石任命亲美分子侍从室高级参谋朱世明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这样王芃生去日本的希望落空。后来，王芃生表示要返回外交界，也历经挫折。先是应军事代表团邀请赴华府工作未成，而后驻土耳其大使空缺，有人建议亦未能接替。这些政治上的失败，使王芃生从此对政治失去了信心，开始专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改造问题。1946年3月间，王芃生奉命先后赴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处理日侨遣返事务，在此期间，王芃生也遍游国际问题研究所各站征求改造意见。这样，从以上情况粗看，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呈现出一片散伙的景象，整个研究所内部人心惶惶。

王芃生的仙逝加速了国际问题研究所这段时期的惊慌。王芃生本有心脏病，在出访视察期间，病情严重，到南京后发病，到上海时更加严重。此后稍加治疗，飞往北平后，病情又加剧。1946年5月16日飞返南京赴命。17日接待宾朋，撰写报告，晚10时病发去世，享年54岁。临终索笔并书“国研所改组事”，六字。一代哲人、一代爱国人士王芃生就这样结束了生命。1946年5月18日，各大报纸争相登载王芃生去世的消息。南京各界也为王芃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经国际问题研究所同仁与贺耀祖商量，追悼会成立以贺耀祖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这样，王芃生的治丧事宜便顺利地进行了。王芃生的追悼会极为隆重，灵前摆满了各部及各团体的花圈、挽联和祭幛。国民政府也发布褒扬令，表彰了王芃生一生的业绩。蒋介石亲派姚琮为代表致祭，撰祭文并书“荩怀茂绩”以挽。此外，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艺术界名家徐悲鸿、军政大员程潜、覃振、杨杰、刘斐以

及陈布雷和智囊团的张群、吴鼎昌，社会名流张季鸾、胡政之以及苏联顾问约尔克和波兰大使高乐佩等也参加了追悼会。王芃生墓葬南京钟山南麓灵谷寺侧小白龙山，位于著名先贤廖仲恺墓左后。墓志铭由张群撰文、吴稚晖篆额、许世英书丹。墓穴形似墨水瓶，墓标有如笔杆，象征王芃生一生文章报国的志向。

王芃生丧事结束后，蒋介石就下达指示，由唐纵负责处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善后问题”。对此，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有自己的打算。国际问题研究所曾商讨走民办道路：即由第一组副组长留日学法律的潘君约同原上海站徐君领导的小组组员余守中和潘彼得筹建“新亚通讯社”，以收听日本用拉丁语广播的新闻并加以评论，向上海各大报纸发稿。这得到了《大公报》的赞助。但是后来余守中被捕以及电台遭到破坏，“新亚通讯社”开展工作遭受重大影响。此后这条道路便行不通了，这样走民办的道路也失败了。在走民办道路的同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把王芃生去世的消息告知外交部次长甘乃光，请求再改隶外交部。这个请求遭到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拒绝，改隶外交部一项也被否决了。后来唐纵主张将国际问题研究所划归军令部第二厅郑介民处，以便使军统局轻而易举地实现吞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野心。当然，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不愿走回军统之路的。继而国际问题研究所潘世宪提出了“结束、解散”的想法，经与原军统局局长贺耀祖一再协商，侍从室最后同意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结束工作的请求。此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以邵毓麟为首的临时班子来处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项结束事宜，开始把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物资、档案移交外交部及新成立的国防部，人员遣散也相继进行。到1946年10月，全部移交遣散工作结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这段历史便就此结束了。

纪念朱经农先生

李冰封

一

朱经农不是湖南人，但他与湖南关系密切。清朝末年，他的叔祖在常德当过知府，湖南名人熊希龄是他的姑父。他少年时在湖南读过书，以后又在湖南教过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他在湖南当过近十二年教育厅长，对湖南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湖南的老共产党员、知名教育家刘寿祺同志，当过他多年的秘书，在刘老以九十高龄辞世的前一年，曾撰写《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一文（见《刘寿祺教育文集》），1992年3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缕述朱经农事迹甚详。

二

朱经农不但是教育家、学者，而且是著名的大学校长、诗人，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出版家和爱国家。他一生主要经历如下：

朱经农（1887—1951），江苏宝山人，生于浙江浦江。十五岁时，以客籍考入湖南常德府中学堂，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转入国民党。1905年冬自日本返沪，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10年受聘任教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教授英文兼任农业学通译。1916年赴美，先入华盛顿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发生，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大学全体华籍师生在校下半旗志哀、聚会，美籍校长卜舫济下令解散集会，驱散师生。500多名该校大学和附中学生及19名中国籍教师愤然离校，宣誓永远和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张寿镛在一些著名爱国人士支持下，遂创办光华大学，以支持这些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朱经农此时成为张寿镛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得力助手，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主持教务。以后，一直连任历届的光华大学校董会校董。1930年春，蔡元培先生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他兼代常务次长。1931年任齐鲁大学校长。1932年任湖南省教育厅长。1943年任中央大学教育长（校长由蒋介石兼任）。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1945年任光华大学校长，1946年兼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8年11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首席代表，后留在美国。1951年初，因中风客死异国他乡。终年64岁。

刘寿祺同志在《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一文中认为，朱经农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虽在政界漂浮了一段时间，却不是纵横捭阖的政客。他是一位正直无私、忠诚勇敢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位真诚勤劳、立己立人的教育家。刘老这段话，可以视为对朱经农一生较为公正的真诚的评价。

三

1932年，朱经农一到湖南教育厅任上，就对湖南的基础教育状况作了一番考察，发现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太低。当时，湖南人口约三千万，学龄儿童估计三百万，而入学仅80余万，入学率不到30%，学龄儿童失学者约220余万。

二、全省中学及小学、幼儿园分布极不合理，如长沙有小学一千余所，而靖县仅30所，保靖仅20所，学校的发展极不平衡。

三、全省教员数量不足，质量也亟待提高，设备亦须改善和充实。

要着力解决上述三大问题，使全省的基础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后，整个教育事业才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在朱经农的策划下，当时的省教育厅制定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经过六年的努力，到1938年，全省除岳阳、临湘两县情况特殊外，“一乡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的计划基本完成。1936年，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即已达70%，较1932年的入学率，增加了一倍以上。

中、小学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也有所改善。过去，学校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等较发达地区，朱经农力谋调整这种布局，在湘西湘南的边远地区，如芷江、道县等地创设了乡村师范，另外，还创设了衡阳师范。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又在乾城（今吉首）设立特种师范训练班，对各县联立中学也加以切实调整和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增加和提高了各地小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中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朱经农主持湖南教育时期，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150所增加到272所。

此外，关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电化教育、民众识字教育、体育、图书馆……等方面，也都有相应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许多地方兵荒马乱，疮痍满目，但湖南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湖南的教育事业能有这样的发展，实在很不容易。

2006年7月，美国800多位中小学校长及教育官员，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考察，其中有30位成员访问湖南。我们的报纸上说，他们到了“基础教育强省和大省湖南”。在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下，这样说，当然可以。不过，人们可能忘

记了或根本不知道，这个“基础教育的强省和大省”，它的基础，是在六七十年前朱经农于战火弥漫的三湘四水之间，惨淡经营，艰苦努力而建立起来的，朱先生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四

朱经农的教育思想中，有不少可取的精华。1943年，他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思想》（原名《近代教育思潮）》一书，是他的一本关于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可惜现在已不容易找到此书，只能将刘寿祺关于此书的简单介绍，提纲式地摘要叙述如下。限于篇幅，难免语焉不详。

据刘老介绍，此书提出了七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自由和纪律。书中介绍和评论了西方多种教育思潮中的自由主义观点，但作者认为，“自由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中必须有纪律，有纪律才能获得自由”。

第二类问题：个人与国家。作者认为，要充分发展个性教育，因为只有发展个性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社会秩序，才能使国家、民族、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进而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

第三类问题：斗争与互助。他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互助论”，以及与“互助论”对立的“战争论”等等。作者认为，“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互相冲突，人类社会经济之所以要调和，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第四类问题：学校与社会。他认为，学校教育应以适用社会实际需要为目的，学校教育既要使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增进个人知识技能，更要培养个人良好的性情、习惯，以及待人接物的良好道德品质，办学的方针、设施、课程、教材、教法等等，都须随社会发展加以不断的改革，要使儿童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并获得利用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

第五类问题：知识与道德。他认为知识和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知”“行”是合一的。他分析了构成知识的各种因素，分析了认识以及实践在构成知识中的作用。他分析了各种道德观点，介绍了“乐利主义”，其内容是认为人类行为的“善”“恶”，要以增加人类幸福为标准。

他提出“知行合一”，“德”“智”兼修的观点，强调教育者应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在教授学生道德知识的同时，陶冶学生道德行为。

第六类问题：艺术与职业。他认为，无论个人与社会，艺术修养都是很重要的。

个人的性情陶冶，社会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学校教育不能偏重理智的训练，而忽略艺术的陶冶。艺术教育是德育的基础，可开拓人们的胸怀，扩大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感情意境超脱物质世界的局限，创造新的人生美妙境界。

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意义，不只是狭隘的技术训练，使人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同时应使其有文化的欣赏，艺术的修养，促其能创新，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七类问题：科学与宗教。他认为，中国需要科学，也需要宗教。我们需要科学以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等，也需要宗教以维系人心，使心灵有所寄托，灵魂有所归宿，冥冥中得到安慰，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他认为当今人类最大的不幸，就是把宗教信仰一概抹杀，所以才产生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灭绝天理良心的现象。而灭绝天理良心的社会和国家是要毁灭的。

刘寿祺认为，朱经农的这都著作，有它的时代性，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不过其中若干教育思想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可取的。

五

1945年9月，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逝世。朱经农辞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再次回光华大学继任校长，直到1948年11月。他前后两次在光华大学的领导中，体现了他在办大学方面的三个主要特色：

一、特别注意建立一支强大的第一流的师资队伍。从1 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前后，校中文、理、商三个学院，一时群贤毕至，名师云集。胡适、孟宪承、钱基博、吴梅、廖世承、吕思勉、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彭文应、张东荪、李石岑、全增嘏、朱公瑾、蒋维乔、张歆海、钱钟书、余上沅、谢霖、容启兆、郭绍虞、金松岑、孙大雨等各位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及学术界各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都出现在光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繁盛的局面，被侵略战火无情地摧毁了。学校中以商学院为主的一部分，由谢霖副校长率领，西迁成都，留在上海的部分在租界，改校名赁屋上课，教师难免星散。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经农继任校长，又重组教师队伍。1946年秋，我进光华注册时，在办公室楼前的大课表中：吕思勉、蔡尚思、郭绍虞、廖世承、张志让、曹未风、周煦良、徐燕谋、顾廷龙、王遽常等许多当代硕学名流的名字，又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二、提倡和鼓励学术自由。尊重学术自由，是一所有成就的大学的灵魂，光华大学从创办时对此就高度重视。上面列举的名师，各种学术思想倾向的都有。他们在课堂上，都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观点。1927年起，校方每周还邀请各方面的名家来校演讲。据不完全记载，前后有：杨杏佛（杨铨）、鲁迅、邵力子、曾孟朴、林语堂、黄炎培、江问渔、马寅初、王云五、陈布雷、陈立夫、徐悲鸿、陶行知、

陈诚、茅盾、陈鹤琴、孙寒水、何炳松、张静江、林重远、王正廷、郭泰祺、翁照垣等，这些人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法学家、作家、艺术家、教育家、史学家、出版家等等。思想倾向也各异。从而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光华大学的思想开放和学术繁荣。

朱经农虽是国民党员，但他一直反对"党化教育"。1931年2月，他在给他的朋友胡适的信中说："大学中应有讲学之自由，不应为一党所把持；亦不应受一二人之操纵。""现在国民党如果想党化国立大学，也未必有好结果。大学校不是军队，不能不容许学者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若排除异己，则除善于阿谀者外皆不能自安……"所以提倡学术自由，形成了光华大学优良的传统。

三、注重发挥人才的作用。

这是看到老作家施蛰存的一篇散文《知己之感》后想到的。

文章先引《新文学史料》载叶圣陶日记《在上海的三年》中的话。"朱经农来，言拟好办光华大学，邀余与予同（周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一天的日记："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施蛰存看了这两段日记，大为感慨。因为他与朱只是十六年前，朱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施在中国公学兼课时见过面，不料朱就注意了他，后来有人又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看到朱给胡适的一封信里，汇报中国公学的情况，提到郑振铎、孙俍工、李石岑、施蛰存四位"教书"尚可，因之十六年后，还能想起他，拟邀他去光华充实系级的领导力量。有人把《书信选》中的话告诉了施先生。施深受感动，因而生"知己之感"。

由此可见，朱经农注重人才，且不任用私人，不结党营私，完全以办好大学出发来想事做事，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六

朱经农还是一位写旧体诗的高手，但诗作很少公开发表。他去世后，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诗集《爱山庐诗钞》，由他的公子朱文长笺注。可惜此书大陆不容易找到。本文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抄录了。

综观朱先生一生，无论治学与从政，都是值得后人景仰的，智效民在《胡适和他的朋友》一书中，以"诗名应共宦名清"之句为题介绍了朱先生其人。其实这话是朱先生对丁文江的评价，现在用来评价朱先生本人，实在最恰当不过了。

（作者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

首创新教育的斗士——朱剑凡

彭润琪

新中国建立时，毛泽东同志对朱剑凡的小女儿朱仲丽说："如果你父亲还在世，他是最适合的第一任教育部长。"话中充满了怀念之情。

出污泥而不染

朱剑凡出生在一个满清显宦家庭，原名周家纯（祖上为明吉王后裔，为避祸改姓周，辛亥革命后复姓朱）。父亲周达武曾任甘肃提督，大富，在原籍宁乡有田地1万多亩和城堡式豪华庄园，又买下长沙泰安里一处占地80余亩的苏州式园林宅第，名蜕园，作为省城公馆。周达武死后，周家纨绔子弟纵情声色，大肆挥霍，但是"八少爷"周家纯却迥异其趣。他从小酷嗜书史，对湘省前辈名贤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等的著作尤其留心研读。先哲们忧国忧民、励志兴革的精神对他有很大的影响。1900年，他和魏湘若（魏光焘之女）结婚后，即和腐朽的大家庭决裂，另辟门户。

1902年，朱剑凡东渡日本。他认为，办教育，启民智，育人才，应当是兴国之本。于是进弘文书院学师范。在这里，他结识了杨昌济、胡元倓、陈润霖等同学，归国后便成为湖南省创办新教育的一批先行者。胡元倓创办明德，陈润霖创办楚怡，杨昌济执教于第一师范，朱剑凡创办周南……

倾家济世首创女学

1904年，朱剑凡学成归国。1905年，朱剑凡决定兴办女学，说："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当时，清政府禁办女学，湖南查封了几所女校，朱剑凡运用策略应付恶劣的环境。他捐出泰安里部分私宅园林，创办女子学堂，设师范班，附设小学与幼儿园，对外假称"周氏家塾"。

当时风气闭塞，女学初创，入学者寥寥。朱剑凡奔走劝学，师范班学员渐增至100多人。学员每人备一套四书，每遇官府检查，就收起新教材，大读"诗云"、"子曰"，官员去后，继续学习新课。

长沙城一些顽固士绅诋毁朱剑凡办女学，说"周家花园是大观园，周家纯是

贾宝玉”。朱剑凡不屑置辩。他清介自持，举止庄重，还遣嫁了岳母送来的三个丫头。岳母董老夫人从邵阳特地送来一名叫春燕的绝色女子，劝他纳为妾侍。他说：“我兴办女学，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怎能办这种事？”立即将春燕托给一位亲戚老太收养了。社会上流言蜚语渐渐不攻自破。1907 年，禁令渐弛，朱剑凡将女学正式命名为周南女学堂。同年师范第一班毕业，培养出一批优秀教学人才。其中，蒋宝仁、蒋岱孙创办了长沙最老的名校幼幼学校。李宝莲回湘潭创办自得女校。等等。

1908 年，周南增设音乐、体育、缝纫等专科，扩建校舍，增加到 80 多间，设备相当完善。周南声誉鹊起，远近求学者闻风而来，学生增至 600 多人。

朱剑凡将面积为 440 方丈的泰安里私宅花园全部捐献，作为周南永久校址，又将自家田产与长兄换得泰安里另一部分花园，再变卖自家田产，以所得价款购地皮 628 方丈，都用来扩建校舍。总计朱剑凡先后捐献资产价值达 11 万余银元。这件事震动了长沙各界。

学校收费有限，经济上很困难。民国以后，周南受到政府嘉奖，每年补助 4800 元，学校仍然入不敷出，每年亏损近 2000 元。朱剑凡继续典卖田产支持。夫人魏湘若也献出了陪嫁的首饰。朱剑凡又劝说老母捐资，诉说办学的艰难，声泪俱下，长跪不起。老夫人为儿子一片热忱所感动，也把钱一笔笔拿出来助学。

湖南著名的革命元勋黄兴敬重朱剑凡的义举，捐银千两助周南扩建。

朱剑凡专心办学，不仅尽倾家财，对功名权势也视若浮云。20 世纪 20 年代他曾三次代表湖南教育界去北京参加全国性教育会议。范源廉任国务总理时打算任命他做教育总长，他也辞谢了。

改造社会教育之旨

朱剑凡主张教育救国，要培育济世之才，提出“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为社会改革和建设服务”的办学方针。

办学，首先力求良师。他学识渊博，知人善任。初创周南就邀请他的好友徐特立担任教导主任，兼教国文、史地，深受欢迎。他还资助徐特立远去上海、日本考察教育，汲取新知。经过多方罗致，周南群贤毕至，任教的有著名进步人士张唯一、陈章甫、周世钊等，有古典文学专家李肖聃、唐梅村等。湖南缺英文教师，他不惜重金从浙江聘来谢仲仁。期满，为挽留谢竟至下跪恳求。朱剑凡并非容易折腰的人，光复初期，谭延闿任湖南都督，请他出任教育司（厅）长。他恼恨谭氏杀害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的恶行，断然拒绝，可是为挽留一位良师竟不惜下跪，在省内传为佳话。

朱剑凡办周南，力树严谨的校风。校训是：一、自治心（节制整洁）；二、公共心（博爱仁恕）；三、进取心（勤勉耐劳）。教和学都订有严格的规章，坚决执行。他严于责人更严于律己。身任校长还兼教四五门课，自己编讲义、刻印免费发给学生。日本教师上课还去当翻译。三更灯火五更鸡，孜孜不倦。

朱剑凡倡导学生自学、自治，发扬民主。宽敞的图书室储备大量新书报，供学生自由阅读。可以提问题与教师讨论。除规定课程外，还组织学生出游，了解农村，思考问题。学生自治会干部完全由学生选举产生，参加校务会议，与校长教师一道商讨校务。班级、寝室及各类活动园地都由学生管理，教师只加辅导。

朱剑凡长校 20 年，一直以爱国民主思想教育学生，鼓吹思想言论信仰自由，并发动学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07 年，他动员学生罢课；反对清政府所谓“铁路国有”。

1911 年，武昌起义，他带领学生鼓动湖南新军响应。

1913 年，汤芗铭任湘督，捧袁世凯称帝。他又一次动员学生起来反对。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和徐特立发动省城教职工 1200 余人实行总罢教。周南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国货维持会宣传惩办国贼，抵制日货。

同年 10 月，周南学生创办革命周刊《女界钟》，向广大妇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毛泽东同志多次来校鼓励学生办好这个刊物，并为它撰写文章。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会员 70 余人中有 13 个周南的学生和校友。学会常在周南集会活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朱剑凡担任筹款组织负责人。

1926 年，周南校内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北伐军进兵长沙，周南学生在市区、郊区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工农支持北伐。马日事变后，周南女中被反动当局查封。党支部坚持地下工作，书记姚韵梅被捕后壮烈牺牲。朱剑凡自己被国民党通缉。

朱剑凡为振兴中国培育人才的愿望逐步实现。周南毕业的学生中，有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有新中国首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有中外知名的老作家丁玲等等。蔡畅从封建家庭出走，朱剑凡让她进周南读书，免交学费和伙食费，夫人魏湘若待她亲如家人。毕业后留她任体育教员，之后资送她参加勤工俭学去法国，走上革命道路。

丹心铁骨鞠躬尽瘁

朱剑凡后来直接投身革命斗争。1923 年他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成为国民党左派一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顾问和中央政治训练班教务主任。1926 年，随北伐军进入湖南，筹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任常委，又担任长沙市长、公安局长，协助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镇压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和土豪劣绅的反扑。斗争中他与李维汉、王震、夏曦等共产党人成为亲密战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省城举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大会，朱剑凡担任大会主席。马日事变发生，反动军警进周南搜捕朱剑凡。他秘密去武汉会见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思想非常信服。随即带儿子伯深奔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在鄱阳湖遇大风阻隔折回。1928年迁居上海，改名吕还庵，再次东渡日本。

1929年，他回上海，宋庆龄、鲁迅倡议成立"自由大同盟"，他签名成为发起人之一，留在上海参加地下斗争。他把自己寓所作为中共党的秘密通讯开会和休息的据点。1932年又在法租界赖斯菲尔德路和提篮桥开设小酒店，掩护党的活动。经常出入的有李富春、何叔衡、徐特立、柳直荀、谢觉哉、李维汉、萧劲光、张唯一等许多同志。他每天挎着菜篮外出，侦察四周，保护同志们的安全。

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他要求入党。党组织告诉他："暂在党外工作，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他服从组织决定，支持三儿叔平入党去苏区。他的四子二女先后都成为共产党员。女儿仲丽（王稼祥夫人）在上海考入医学院，他在万分拮据的情况下筹措昂贵的学费，每期交90余元。仲丽毕业后奔赴延安，是当时陕甘宁边区少有的医生之一，担任过毛泽东与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建国后任北京中苏友谊医院院长等职。

朱剑凡年近50了，极度的劳累、危险和贫困终于把这名斗士的身体摧毁。1932年，他胃癌扩散，结束了追求真理，坚持奋斗的一生。

1953年，党和政府将朱剑凡的遗骨迁往北京，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徐特立在墓前题了四个大字："浩气长存"。

（作者系湖南教育出版社退休干部）

马宗霍先生传略

萧　培

马宗霍（1897—1976），原名骥，班行名承堃，宗霍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给先生取的名字。马宗霍是衡阳县人。自幼丧父，家境清贫，然而聪颖智慧，出类拔萃，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而维持学业。七岁入衡阳县立小学。十岁入衡清中学，同时就读于船山书院，受业于山长王闿运。十五岁入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深得监督周先稷赏识。周先稷虽无前任监督曾熙名气大，但也是衡阳有名的教育家。1912年学堂改名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5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这在三师的教师中是罕见的。1917年，他以治音韵学被推荐参加教育部办的注音字母讲习班学习，作为湖南三个代表之一前往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卒业后，1919年赴江苏武进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至1927年先后任南京金陵中学、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南京国立暨南大学、私立金陵女子大学等校教师。1927年迁居上海，先后任私立大厦大学、同济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中国公校等校教授，并兼任中国公校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等职。1931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举行高等考试，被聘为襄试委员，参加评阅中文试卷。1931年至1934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参加编辑《中国立法史料》工作，此时还兼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特约讲师。1935年，曾回家参加祖母百岁大寿庆贺活动。1935年至1937年，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审，参加编辑《孙文年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辞职回到衡阳。1939年至1948年，任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1946年至1948年，兼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46年秋，国师从溆浦迁来南岳，许多衡阳籍学生前往就学，在先生指导下学习。1948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9年以后，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同时兼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1956年，又兼任省志编纂委员会委员。1959年，迁居北京。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1年，任中华书局编审。1976年9月24日因脑出血逝世。

马宗霍先生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学问，著作甚丰，成绩斐然。少年时代的

马宗霍曾受业于湘中名儒王闿运，诗赋文章大进，奠定了对文学的爱好和研究的基础。1925年，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学概论》出版，在当时学术界很有影响。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章太炎先生，并以他的年轻和才华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赏识。章太炎主动提出收他为弟子。此后十余年，他一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经学、史学和小学，是章氏弟子中最年轻最好学的一位，师生关系十分亲密。在章太炎先生教导下，马宗霍于1931年写成并出版了《音韵学通论》，1935年写成并出版了《文字学发凡》。这两本书可视为姊妹篇，前者系统地介绍了前人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后者则从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对汉字的来源和结构做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是他研究小学的初步成果。1936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经学史》，该书以大量的史料和科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六经源流，纠正了以往许多误说，较皮锡瑞《经学历史》更为精审，受到学术界一致推崇，并多次再版。此后他用了二十年时间精研《说文》，对许慎所引资料进行了系统分类、整理及考证，于1956年完成了《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通文考》、《说文解字引方音考》四部巨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认为《中国经学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是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并且手稿书法极精美，建议科学出版社影印刊行。该书是马宗霍先生小学研究的总结，为中国传统学术综合性研究提供了榜样。晚年先生除了负责二十四史部分校点工作外，还整理了以往对经籍研究的成果，已刊和未刊的有《淮南旧注参证》、《墨子闲诂参证》、《论衡校读笺识》、《南史校证》、《清史稿校记》、《群经略论》。另外先生的手稿《船山遗书校记》为岳麓书社出版《船山全书》时采用。

马宗霍先生的书法、书学造诣很深。他精通各种书体，篆书多写钟鼎，古朴而苍劲。他的隶书取法汉碑，秀丽典雅。他的行书学习二王，并融篆隶笔法于其中，结构严谨，笔势潇洒，灵动脱俗。马宗霍先生自幼酷爱书法。曾向曾农髯先生问笔法，曾农髯先生是衡阳人，时客寓上海，专事书画，名闻海外。马宗霍在农髯先生处见到许多名贵字画，认识了许多书画名家。从此他遍临名碑帖，从《秦权铭》到《圣教序》，从《瘗鹤铭》到各种北魏石刻，以及《礼器碑》、《夏承碑》、《黑女碑》、《史晨碑》，他都下过工夫。一生中他为人写了许多书法作品，有榜书、小楷，有条幅、对联。在学习书法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书学、整理书学史料。1935年出版了《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是书学史上的巨著，成为后来人们编写书学史、书法家辞典之类著作的样本。此书共收入书法家2817人，引用资料数百种。此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对每个朝代书法有一篇绪论，其评论公允恰当、见解精辟；二是他把湖南和衡阳的一些书法家收进去了，使得家乡和地方文化得到世人承认，

被其他工具书引用、转载，对湖南地方文献工作也是一个贡献。此书原本是线装本，大三十二开，1984年文物出版社用十六开本影印再版。

（作者系九三学社衡阳市委干部，此文由本馆馆员吴容甫先生供稿）

地理学家傅角今及其《湖南地理志》

雷树德

一

傅角今（1896—1965），又名鳌，现代著名地理学家，湖南省醴陵县人。其先世务农，至其父兼营土靛业，家境尚属小康。傅角今10岁之前入私塾，其后入县、省新学，1912年入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当时正值清末废科举大兴新学之时，新学教师多属革命党人，社会影响很大，傅角今由此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中学毕业后，因其父阻拦，未能继续深造，遂回乡任小学教师数年，而好学上进之心不辍。后在族会的资助下，1920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半工半读，受到该校地理学家白眉初教授影响和帮助，并拟出国深造，因国内战争、南北交通中断未能成行，于是执教于长沙市一中、二中，并同时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兼职。

由于傅角今对于地理学的热爱，1934年在德文教师沃尔夫（Wolf.R.）的大力帮助下，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遂于1936—1938年往德国莱比锡大学继续研读地理，深受德国地理学家鲁道夫（Rudophi）、史米赫（Sehmitthener）影响，顺利完成学业及所承担课题，学术大进。归国后，任国民党内政部地政司技正兼科长，升任方域司司长，同时兼任重庆复旦大学地理学教授等职。

解放后，傅角今历任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兼地理系主任，兰州大学兼职教授、西北大学副教务长及地理系主任等职。是九三学社成员。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陕西省地理学会理事长、西安市政协委员。

作为现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傅角今一生主要从事地理教学、研究，并将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运用于早年的行政工作之中，撰写了大量的地理学著作，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专门人才，在地理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傅角今早年在内政部地政司任技正期间，曾发现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所报审地图中，将有关中国和缅甸、中国和印度尖高山以北一段未定界限被英国蓄意错绘，于是不予核准在中国境内发行。1947年在方域司司长任内，亲自领导了中方中缅

边界尖高山至南定河620公里的勘测工作，实测并绘制成1：5000的图件135幅，勘测界桩135座，被当时国内著名的《环球》杂志评为创举性的工作；还领导组织了我国南海部分岛屿的勘测和研究工作，完成了有关南海诸岛地理和琉球群岛地理的研究报告，历数琉球群岛的历史渊源，充分证明了琉球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于此可见其民族正义感非同一般。

在地理教学上，傅角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他不仅精通中国地理，还深谙世界地理，对中外地理科学史和地名均有精深的研究，除通晓英、德、日语外，还自修俄语、法语且进修化学、动植物学有关知识。其教学内容包括世界区域地理、世界自然地理和地史学等课程。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建设中，傅角今积极支持和实施教学改革，从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实验室建设、教材建设、野外装备的配备、教学环节的组合、科学考察活动的开展、毕业生论文的确立、选派优秀学生充实国家科研教学和管理部门，以及研究生培养、教师进修等，都做了全面布局、切实安排，颇具创新。傅角今晚年还多次带领学生外出学习考察，并亲自安排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力图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师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几十年教学滋兰树蕙，桃李满门，对我国地理学科建设贡献卓著。

在地理学论著方面，傅角今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本国地理》，一套四册，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1933年版，先后印刷100余次，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大部分地区使用的地理教材，不仅为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也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地理教本之一。同期还有《地理学通论》、《世界地理志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世界经济地理》，1947年由北京商务印刷馆出版，前后增订4版。《南海诸岛地理志略》，郑资约等参加编写，194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琉球地理志略》，与郑励俭合著，1959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界石油地理》，1959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继1950年美国普拉特(Prattw)和古德(Good.D）的《世界石油地理》（World Geograph ofPetroleum）之后世界出版的第二部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地理学专著，出版后有多国翻译，其突出之处在于对二战以后东西两半球的油田分布、储量和开发现状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中东地区20多年间石油产量大幅增长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分析，资料翔实而新颖，分析深刻而精辟，在当时众多国家和地区对石油资源信息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能收集积累直至1957年以前的如此珍贵而又全新的资料实属不易；五十年代还从事《南极地理》的研究编著，逝世前已完成初稿。五十年代中期，主持编著了自然地理专业各课程的教学大纲，并亲自执笔撰写其中《世界区域自然地理》、《普通地

质与地史》等部分。

二

《湖南地理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长沙湘益印刷公司印刷，全书共五篇约45万字，前有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序。此书为傅角今撰写的关于湖南地理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著作。

《湖南地理志》的出版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大力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提倡新式地理学的影响结果，是年轻的傅角今抱着执着的爱国热情，探求地理学知识以贡献于社会的学术结晶。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新学中，地理学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学科，近代变法领袖、著名学者梁启超在20世纪初撰写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分析和阐述了世界文明发展与地理环境的重要关系；对于傅氏有深刻影响的北京师大地理系教授白眉初呼吁："爱国，学地理之首；建国，学地理之本。"由于社会贤达、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新地理学成为一时显学，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地理学为研究大地与人生关系之学科，在学术上教育上及各种事业上均极重要，是以先进各国，俱设地理科于各大学校以研究之，设地理课程于普通教育以灌输之，又设地理研究所以实用之……法国甚至以地理学与伦理学、体育学相并为普通教育之主要课程，其重视斯学可知矣。"（本书《自序》）

《湖南地理志》的编纂时间与宗旨。根据傅氏生平考证，此书应写于1926—1932年之际，为时六年，其间傅角今已于北京师大地理系毕业后在长沙市一中、二中执教地理，同时在湖南省政府统计室任职，尚未留学德国。之所以要写此书，只因傅氏认为湖南古代地理之作虽有专书，但少有能适合时代发展需要者，而新出的地理著作，多为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所著，深以为耻："然时代既异，需要不同，详简之分，乃令人不无缺望耳。诸书以外，欲求其新出而较周备者，则或译自外人之撰述，或即为原版之西文，纵有国人之著作，其所本盖亦多来自外籍，不能自选其详。反观东瀛，则大异夫是……日人之处心积虑，欲蚕食我也，欲鲸吞我也，故于支那省别全志既成之后，犹倍其力以凿幽缒险，期更有所得。彼既于我之山川形势，地方肥瘠，民情物尚，了如指掌，而我乃懵然木然，如孩提之不知其家之别途曲径，则其来也，岂但无可防之？且将何以御之？事之至危且殆，孰逾如此！"（《自序》）抱着深刻的民族存亡的切肤之痛，傅氏发愤编纂此书以图有补于社会："用是自忘其愚，日孜孜于地理上之资料是求，凡古今载籍之所次，师友之所谈，其足资参考，有补于余之著录者，罔不探原究本，笔而藏之。虽未周览南北名山大川之胜，然平生舟车之所届，得以互相印证，以萦绕于余心者，常若故乡景物，历历在余目焉。此一鳞半爪之所得，其枨触于余怀者。"（《自序》）

于此，其撰述之旨可见一斑。

《湖南地理志》资料来源有以下几项：一是湖南历代地理著作如《湖南通志》、各府州县志、各种山水地记等，此类为历史资料。二是调查资料，分为傅氏自己调查与托友人调查收集拍摄而来的资料，编书之时正值傅氏任职省政府统计室，十分有利于资料的收集。且时任省长何键为作者老乡，对其撰述颇为支持，且以此书作为资政参考，书成何键作序加以推介。三是中外时贤的论述，由于地理学为当时社会各界学者所关心和乐道，而傅氏广收博采，充分吸收了当时的地理学学术研究成果，其中特别是对其师白眉初先生的学术观点，采用引证颇多。五是作者原有编纂资料。此书编纂多年，是在其任教中学地理课所编《湖南地理讲义》原稿上加以整理、补充而成。并且，在此书出版之前三年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东方地学社出版了作者编撰的《湖南地理志要》，因此，《湖南地理志》是此前各种著作的不断完善、精雕细琢之作。傅氏说："于是以前此之原得，部居分类，而订伪正讹，参考之所及，由通行之载籍，而至于世家之藏书，由己之所知，以证他人之笔录，由是而地势之险夷，河流之分合，政教之良窳，物产之虚盈，胥得粗知其本末。他如省内名胜风物之足供观赏者，或曾为履笔之所经，而自摄其影，或为他人之所摄，辗转求而得之，竭六年之功，所采约数百万言……虽所集尚不足以尽湖南大地之文，然亦可觇其梗概。"（《自序》）

《湖南地理志》的编章结构。此书共五编。第一编绪论，论述湖南地理沿革，政治区划，疆域及人口，对于民性及风俗论述尤详。第二编自然概况，论述全省地势全貌，以山水为大系，分别论述全省主要山脉与主要河流情况，兼论全省地质与气候情况。第三编政治概况，重点论述湖南省政府、县政府及地方自治组织情况，省政府民国十九年、二十年行政纲要，并兼及全省教育概况。第四编经济概况，论述全省财政、农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及航空事业等情况。第五编县市志略，为本书重要部分，篇幅占全书二分之一以上，先将全省各县依湘水、资水、沅水、澧水流域及洞庭东北沿岸分为五个部分，再逐一论述各县情况，每县论述大概分为区划沿革、地势、山水、城市概况、物产、交通、财政、名胜古迹及风俗民性等。

《湖南地理志》的历史价值。其一，编纂承先启后。此书是近代论述湖南地理的新式地理著作，在编纂宗旨、编纂体例、编纂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开创之功，对于此后湖南地理学著作的出版有很好的参考作用。其二，资料丰富，考证翔实。傅角今长期从事地理学教学研究，古今中外地理学素养丰富，扬今榷古，颇见功力。其三，图表运用合理。作为地理学著作，素来讲究左图右史，重视图表对志书的

不可替代作用。傅角今同时也是地图专家，出版过多种新式地图。此书图表及照片共达数百幅之多，较好地做到了图文并茂。其四，读者众多，影响深远。作为近代湖南地理著作，此书程度适中，对于普及和提高湖南地理学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湖南地理志》的不足。近百年来，地理学科的发展，不论是人文地理学，还是自然地理学，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其中还产生了许多新兴地理分支学科，关于湖南地理的各种研究也是后出转精，日新月异。因此，今日看七十年前出版的《湖南地理志》，不论在体例、内容、史实考证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不足，这是时代的限制。

【参考文献】

[1] 傅角今：《湖南地理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长沙湘益印刷公司版。

[2] 徐象平、雷明德：《地理学家傅角今教授》，《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2期。

[3] 武佐民、傅力浦：《傅角今教授传略》，《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2期。

[4] 葛懋春、《蒋俊：《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邹华享：《湖南当代人名词典》，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6] 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醴陵市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7] 雷树德：《图书馆学论要》，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系湖南省图书馆副馆长）

曹孟其轶事

刘　磊

一

曹孟其，男，原名惠。1883年生于湖南长沙县椝梨，1950年1月9日病逝。他早年毕业于城南书院，补县学生员。1905年入警官学堂，及卒业，任湖南警官训练所教官。1911年参与湖南光复，任都督府民政司科长。1913年任警兵补习所教员。1914年起主持贫民工艺厂，并在修业学校、长沙县立师范、湖南省立一中兼教国文。后来，先后任湘军第二军军部、湖南省督军署、民政厅、警察厅秘书及广西省政府顾问等职。1926年，北伐军兴，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至宁汉分裂，总指挥唐生智下野，他赴上海政法和大夏大学任教。三年后返湘，任湖南孤儿院院长兼广益、三峰中学校长。同时，创办长沙台田瓷业公司。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他一生以经营湖南孤儿院时间最久，用力最多，20余年孜孜于此，未尝少懈。将自己所有田产房屋全部捐出，以院为家，视孤儿如子女，最为时论所称道，全国慈幼会考绩，以湖南孤儿院成绩最突出。他掌管孤儿院时，将该院所有湖田创办兴庆农场，购置拖拉机，是为湖南有机耕之始；又将孤儿院内余地建“给孤园”，亦为湖南有公园之始。“给孤园”内，艺菊千余种，自号“菊界大王”。

他博学能文，诗亦佳丽，尤善撰挽联。其书法以北碑而参颜意，自创新派，别开生面，时称“童体”。其著述甚多，有《孟父春秋》刊行于世。他的事迹被收入1992年编辑出版的《长沙教育志》“人物传略”栏，与胡元倓、朱剑凡、何炳麟等一道，被列为长沙地区1840年至1990年150年间的77位教育界名人之一。

二

曹孟其曾于1937年至1938年8月出任湖南私立广益中学（今湖南师大附中）董事会的董事长。1914年至1920年1月和1938年9月至他临终（1950年1月），两次兼任该校校长近18年，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也留下了不少感人的故事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一，不支薪俸的校长。

他先后两次出任校长，都是临危受命。1914年，广益面临当局收回已拨的长沙市北门外熙宁街永久校址（1916年退回）和停发津贴的严重困难，他被推为校长，与当时在校任教的教师相约“不计报酬”，先后租赁私宅和湘乡试馆为校舍，艰难维持。1938年8月，罗介夫校长遇难后，学校董事会推他继任校长，也是临危受命。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三迁校址，1938年秋至1945年，广益从熙宁街先后迁至望城沱市、常宁和蓝山办学。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长沙经营湖南孤儿院，因身体欠佳，不能常驻学校，只每个学期到校决策学校经费和延聘教师等大事，日常校务先后由教师喻子贤、李之透任秘书或代理校长主持。虽然如此，他毕竟是一校之长，肩上的责任重大。广益中学的学籍簿（含教职员名册）记载，曹校长不支月薪，只领取少量夫马费。如1939年5月的教职员名册中，曹校长的月薪一栏记载：“不支薪，年支夫马（费）二百元。”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社会，他这种当校长不支薪的社会贤达是罕见的，其奉献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其二，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坚持办学。

1938年秋，他第二次上任伊始，长沙城屡遭日机轰炸，城区中学奉令疏散。他通过数学教师汤执盘联系，将学校迁至汤先生的家乡——望城沱市，借辖神庙、程家和尹家祠堂办学。但沱市距长沙城近在咫尺，被迫提前放假。寒假期间，当时在校任教的校友李之透返常宁度假，向客居在此的学校董事长黄士衡告知学校要再次迁移。黄认为常宁辟处湘南，数十年无兵祸，又有河流通湘江，运输便利，是学校避难的最佳选择，便要李利用当地多种关系，觅得了可作校舍的柏坊大坪尹祠、李祠、义塾等处所。1939年农历正月初三，曹校长召开学校董事会议，讨论再次迁校事宜，他断然指出：“为图学校之生存，并负战时教育之使命，不能不全力以赴”，一致决定学校迁常宁。在那里艰难地办学五年多后，到1944年8月，衡阳失守，常宁告急，当时的代理校长李之透又克服重重困难，将学校辗转迁至兰山。抗战胜利后，曹校长又立即召开董事会议，组成了由董事长黄士衡、名誉董事长王劲修、政界名人余籍传为常委的复员委员会，并恢复校友会，广泛募集经费，在一片废墟的熙宁街原址，修复校舍。1946年3月18日正式复课。之后，学校不断有所发展。

在常宁、蓝山期间，广益中学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历尽艰辛，坚持办学，使这所私立中学得以延续下来，先后主持校务的秘书喻子贤，特别是后期的代理校长李之透，固然立有汗马功劳，但曹校长也是很有贡献的！

其三，一份传为趣谈的电报。

私立学校的校董会至为重要，关系到筹措经费和延聘良师，必须有社会名流牵头。曹校长1938年上任时的董事长是曾留学美国、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和湖南大学校长的黄士衡（直至1951年11月学校由人民政府接收止）。1942年冬，他又凭自己的社交聘请国民党将领王劲修出任名誉董事长。1944年某月的一天，李之透代理校长收到曹校长自长沙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只6个字：“王事妥即同来。”他得知曹校长将陪军界要人、名誉董事长来校视察，立即动员全校，打扫卫生，美化环境，整顿内务，重申纪律，师生们兴高采烈地恭候两位光临。可是等了两个星期，仍不见驾。约莫过了个把月，两位才从容莅临。李代理校长问曹校长：“来电说马上起程，我们天天等您。”曹笑曰：“等什么？电报不是说了么，要等王事办妥之后才能立即动身吧。”原来我们中国的文字有时同一句话，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理解。“王事妥即同来”，可解释为“王将军的事情已办好了，即刻同来学校”；也可以理解为“等到王将军的事情办好后，就立刻同来学校”。而李代理校长是按前者来领会的。此事，既证实了不支薪俸的曹校长的确定期亲临学校商议大事；也是当时，乃至今天的一桩趣事。

其四，珍贵的“童体”墨迹。

1935年，他以广益中学老校长名义，为高中第五班毕业生用自创的“童体”题词勖勉：“作人如撑舟，一篙不到便退一程；求学如绩麻，日见其少，月见其多。”署名“孟其”。在他兼任校长期间，先是用“童体”题写了1929年制定的广益校训：“公勤仁勇”，并署“孟其谨署”，以教育学生。1946年4月12日为广益建校41周年，他用“童体”为校庆特刊题写了“广益中学卌一周年纪念”刊头（封面）。1947年上学期，为纪念学校创始人禹之谟，由师生捐款，修建了一栋两层楼的图书馆，命名“之谟图书馆”。是年冬，他又用“童体”题写了馆牌（之谟图书馆），右边写“建国卅八年冬”，左边落“曹孟其敬署”。上述墨迹都收入了2005年笔者参与编辑出版的《湖南师大附中百年校志》，前三者的原件保存在学校档案室，“之谟图书馆”馆牌珍藏在学校的百年校史馆。说起这块馆牌，还有一个故事。广益中学于1955年改为湖南师院（今师大）附中，从熙宁街迁至岳麓山下的新校区时，尚无图书馆，这块长1.5米、宽0.5米、厚5厘米的馆牌，被“红管家”仪器管理员黄少坤老师收藏到自己的工作室。由于它木质坚硬，黄老师曾把它翻过来做工作台（俗称砍凳）。正是他这一不经意的举动，使这件文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逃过了“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的一劫，得以保存至今。

以上这些，是我所了解的有关曹孟其老校长的故事，也是他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在他逝世60周年的前夕，撰此短文以示怀念。

（作者系湖南师大附中原教导主任）

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陈衡哲教授

李长林

一

陈衡哲（1890—1976），女，1890 年 7 月 12 日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但她祖籍却是湖南衡山，所以在武进当地她家总被称为“衡山陈家”，而不是“常州陈家”，她名字中的“衡”字就是纪念祖籍的，因此有人评论陈衡哲既有湖南人的豪情与坚毅，又兼具江浙人的细微与文雅。

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知名的学者和诗人，常州是她祖母和母亲的故乡，都是望族。陈衡哲自幼即从父母学习诗词歌赋与四书五经，父亲特别器重她，要她加学《尔雅》。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舅父庄蕴宽，他除了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外，还倾慕西方科学文化，锐志于改革，特别注意新式教育，时常给陈衡哲讲历史故事和科学知识。在舅父的教诲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人对命运的态度，他指出人生在世不要“安命”（即随遇而安，听凭命运的摆布），也不要“怨命”（即怨天尤人，心怀不满却无可奈何），而是要“造命”（即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这必须奋斗）。她一直牢记舅父这个教导，并身体力行。陈衡哲 1903 年随舅父去了广州，本想进洋学堂，但因年龄过小，未成，只好听从舅父安排，学新书报新课本为内容的家教。1905 年又趁随舅母回江苏之际，到上海进了一所新学堂（中英女子医学院），读了三年，打下了英文基础。这时，父母安排了她的婚事，衡哲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抗拒了这门婚事。成功后她去了苏州大姑母家，1914 年春，找到了一份家塾工作。同年夏她考取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女生班。1915 年秋入美国瓦沙大学历史系，取名莎菲。1916 年和 1917 年陈衡哲与任鸿隽、胡适相识，从此友情甚笃，书信诗词来往几无虚日。1917 年春她在第 1 期的《留美学生季报》上，用白话文发表了一篇描写美国一所女子大学学生生活的短篇小说《一日》，那时鲁迅的《狂人日记》尚未问世，因此她这篇小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后她又在国内的《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文章。1919 年春她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西洋史和文学，次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又和任鸿隽订立婚约。双双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回国分别任历史系和化学系教授，不久，二人在北大举行婚礼，结为终身伴侣。1921 年受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西洋史》。1923 年末因任鸿隽应东南大学之聘，辞去北大教授职务，举家南下，陈衡哲任教东南大学历史系。1925 年 10 月全家迁居北京，1929 年她第二次被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她在北大历史系讲授西洋史，具有开创意义，在此以前，北大还没有讲授西洋史的教师。她在到北大后一次演讲中说：“我因此知道现在中国的学界对于西洋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有一种十分诚切的要求……但是我看现在中国学界的要求倒是纯粹的历史学，这样的要求极大，供给极小，差不多没有。”[1]

此后，从 1927 年到 1933 年四次出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活动[2]。在 1929 年到日本京都出席会议期间，为了让外国学者了解中国文化，她编辑了一本《中国文化论丛》，1931 年在上海出版。其中有她自己用英文写作的《论中国文化》，指出中国必须在社会、政治、经济几个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革。1935 年任鸿隽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校长，她随丈夫任教川大历史系。其间因她写了揭露四川军阀反动统治的文章而遭排挤，于 1936 年被迫离开川大。1937 年七七事变后，辗转香港与重庆两地。1943 年陈衡哲暂居重庆期间，受到周恩来的邀请，前往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会晤。见到陈衡哲，周恩来非常热情地迎了上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的书。1949 年，她有机会出国，但和丈夫决定留在大陆，定居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做了上海市政协委员。晚年她目疾日益严重，几乎双目失明，所以没有外出活动，以背诵古典诗文为消遣，有时也能看些木版大字本古籍。她所创作的诗文，大多数于十年动乱期间散失，现在留下的著作集子有 1926 年新月书店出版的《小雨点》(1935 年改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衡哲散文集》[3]，还有商务出版的《西洋史》上下册和《文艺复兴小史》，英文著作有《一位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Autab：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1935 年版），这部自传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经历。这部自传已由冯进译成中文，2006 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译者前言评论了这部自传。

1976 年 1 月 7 日因患肺炎，陈衡哲教授病逝于上海，享年八十六岁。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代风云人物，时代精英，走完了她奋斗的人生历程。总其一生，她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第一位力行婚姻自主的现代女性名流，第一批官费留美女生之一，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第一位中国女教授，中国女性中唯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其首创如此之多，不要说各位中国女子，即便一般须眉亦

会举头仰视。哲人已逝，她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本文兹就她的史学成就略加评述。

二

两卷本的《西洋史》（上册于1924年出版，下册于1926年出版），是陈衡哲教授史学代表作，集中反映了她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成就。胡适高度评价此书，认为“是一部带有创作野心的著作，在史料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方面，她确然下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4]。陈教授留学美国期间，在美国史坛上盛行一时的是鲁滨逊新史学。鲁氏在1912年问世的《新史学》一书集中表达了作者所倡导的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一，打破狭隘的政治史研究的传统，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试图在总体上重建人类文明史。第二，用进步的观点来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成长过程。第三，用综合的和多因素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第四，注重历史的社会功用，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5]。陈衡哲在留美期间攻读历史时深受这些理论和方法的熏陶。

陈衡哲所著的《西洋史》一书，充分吸纳了鲁滨逊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内容方面，她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因为我们要研究这个人，所以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行为，和与他有关系的重要事物；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工业、农业、文学、美术、技术、科学、哲学，以及凡曾帮助他，或阻止他向前走的种种势力，我们不但要研究这些势力，并且还要了解他们的原因和效果。”[6]她还注重研究历史的背景与因果，指出：“本书所注重的，一为说明各种史迹的背景，一为史迹的因果，及彼此的相互影响，以求培养读者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若不求因果，但缕述某国某人于某年征服某地，或其他类此的事实，那有什么意思呢？”[7]胡适在评价陈衡哲的《西洋史》时，称赞她“能注重史实的前因后果，使读者在纷繁的事实里面忘不了一个大运动或大趋势的线索”[8]。在史学观点方面，陈氏提倡运用历史主义观点、进步观点考察历史现象。在讲述上古五千年文化成就时，她指出它虽“比于现代一二百年的成绩，似乎远不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上古的人是没有凭藉的，是什么事都要自己创造的，所以他的进步，比近人的进步，看上去要迟缓得多”[9]。在论述历史分期问题时，主张“历史的性质，是贯一的，是连续不断的，他如一条大河，是首尾联接的，是不能分成段落的，但是为了便

利的缘故，我们有时也不能不把他分为几个时期”[10]。关于进化的观点，在《西洋史》中非常明显，尤其是在描述“先史时代”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她先叙述了地球和生物的起源，其次简述了人类始祖人猿的分布与进化，最后是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是怎样萌芽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来，可以答道：‘人类的文化是他的需要和环境交迫出来的。’”[11]陈氏服膺研究历史必须运用综合的多元的观点，指出“历史的材料是无限的，任凭你用哪一个观念，都可以得到一点材料来做凭证。但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们深信历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体的选择历史材料的标准，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12]。

陈氏在1924年与胡适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讨论时，她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影响的一个人。但我确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 unitary（一元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他的唯一工具。”[13]从陈氏这段表白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在五四时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她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她主张用多元的观点来解释历史。

陈衡哲强调历史的实用价值，她认为历史学家要“培养读者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14]。在她写作《西洋史》时，正值中国处于军阀混战、列强纷争之际。她主张用历史学这个工具，去“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以“避免战争”[15]。在国际方面，希望历史学“能帮助青年们，去表达他们的国际观念。俾人类误解的机会，可以减少，人类的谅解和同情，也可以日增一日”[16]。她还特别提出：“我们研究了人类一部分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17]

我们评价陈氏的史学成就时，必须注意到她在进行史学研究时，不囿于吸纳鲁滨逊新史学的一些理念，她还有独到的一些亮点，下面分述之。

陈氏注意运用辩证观点分析历史，例如她在评价古埃及帝国建立的作用时，指出“武力是帝国的重要分子，所以帝国的建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结果，却常常能得到意外的进步，我们须要明白，原动力 cmotives 和意外的结果——又名‘副产品’——（by products）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历史上许多文化事业是万恶原动力的意外结果”。再如她在评介拿破仑的功过时，认为“拿破仑之以法国革命精神宣传于欧洲各国的真正目的，是很难说的，但我们若知道他对于这个精神所索的代价，便觉得有点不能恭维他了。原来他表面虽打着宣传自由平等的旗帜，而其中怀着搜钱刮财及招募军队的目的，俾他的黩武事业，可以靠着各

国人民的血汗而成功，这个代价是何等重大呵！因此法国革命的精神虽曾跟着拿破仑的马蹄走遍了欧洲的大半，但这只可以说是他的穷兵黩武的旁产品，不是他至诚的目的”[18]。陈氏这些论述平易、朴实，但又深刻、敏锐。这个论断，与同时期的其他历史教科书中的论断相比，可谓独树一帜。即使与今天的历史结论相比，亦具有闪光之处，即能公允地分析拿破仑的功过。

摒弃欧洲中心论轻视或否定古代东方历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错误观点，是《西洋史》另一重要倾向。欧洲中心论的史学体系自19世纪形成之后，直到20世纪初仍在流传，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奉行着欧洲中心论，海斯·蒙在《世界史》这一著作中就鼓吹白种人是历史的“主角”，称非白种人是“落后民族”，是“白种人的负担”。陈衡哲在《西洋史》一书中摒弃了这些观点，她在《西洋史》中重视论述古代东方国家历史上的贡献，如阐明了古代埃及几大发明（文字、纸笔、历法、玻璃、测量术和建筑术）的重大成就。在讲述两河流域历史时，也具体说明，苏末人在文化的重大成就。而在分析希腊文化发达情况时，又一再指出它们接受了古代东方的遗产。她还指出，当埃及文化初曙时，欧洲的白人尚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在讲到希腊文化时，她认为，与其说是希腊文化传布于东方，不如说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在互相发生影响。她还指出在说明这一时期希腊人在文化方面的成就时，切不可忽视东方文化给予的影响。陈氏提出埃及和西亚所开的文明之花，后来有许多果子落在欧洲土地上，发育成长起来，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历史，有同等的价值。

注重联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西洋史》一书的另一特点，她本着是为中国读者服务这一宗旨，力图把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相对照，以加深读者的认识。如在论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时，说他的哲学和中国儒家学说，颇有相似之点，他的哲学是入世的，是采取中庸的态度的，是以国家的幸福为人生努力的标鹄的，是以修身致知为达此目的的手段。陈氏研究与论述外国历史时，运用中国的历史资源的方法，值得学习。在下册第十章第四节揭露新帝国主义反动本质时，作者谈到了面对新帝国主义发动的扩张政策，亚洲人民有的已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是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一是因为不肯效法而沦为列强的奴隶。第一类的代表是日本，第二类代表是印度。陈教授认为第二类道路当然不可取，而日本的道路也不可取，因为它的结果是走入了帝国主义行列。我们中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条新的道路——又自尊而又自救的道路，陈教授这些话语，实为洞察历史，以他国历史为鉴的强国之音。

令人欣喜的是，当我们读到《西洋史》一书时，可以发现她文笔的生动，她

常以中国的传统诗词和成语来形象地描述外国的历史。如以“朝为东家奴，夕为西家仆”来形容介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之间古代居民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的艰难处境。用“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比喻，来说明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化的发展。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来形容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了，而罗马文化仍在中世纪各国中继续留存，后来在那里发芽展叶，为近代产生了一个灿烂的文化。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比喻，说明中世纪教皇对意大利的政策。《西洋史》一书中流畅生动的形象，及确切的语句比比皆是。胡适对她的文笔大加称赞，说：“陈女士是喜欢文艺的，所以她作历史的叙述也很有文学的意味。”不仅如此，“叙述夹议论的文字，在白话文还不多见。陈女士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可以给我们开一个新方向”[19]。胡适在引述了《西洋史》下册第三章的两段之后，又说：“这样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可以见作者的见解与天才。历史要这样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西洋史要这样做，方才不算是仅仅抄书，方才可以在记述与判断的方面自己有所贡献。”[20]

《西洋史》是作为教科书来编写的，就这方面而言，也很成功。它有下列一些优点：内容充实（适合中学生的水平）；叙述简明扼要，结构严谨，章节安排恰当，文笔生动。关于简明扼要，陈氏是充分注意到了的，她曾说：“凡是账目式的胪举事实，或是献典式的颂扬战绩，本书一概摒弃，即于人名地名，本书亦力求少用，俾免枉费学生的脑力。”[21] 关于章节安排，陈氏也是下了功夫的，她曾说：“因为一书的章节，是各有各的意义，各有各的个性的；我们决不能为求整齐的缘故，去把史迹的个性牺牲，或把史流的衔接裁断。”[22]《西洋史》作为教科书还有另外两个特点，一为绘制了表和地图。陈氏认为表和地图很重要，“是历史的两只眼目”[23]。书中的插图，以便养成学生看图读书的习惯。至于所附之表却非帝王年表，而是各种历史表（图示），便于帮助读者得到明确的历史观念。这些表不是枯燥的文字叙述，而是将复杂的内容简明化、条理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采用此类表者不多。其二，《西洋史》作为教科书是弹性的，即书中有的内容是用五号字排的，此非注释而略具注释的性质，教者若觉得时间不够，可以省略。编者为使用教科书的教师着想，由此可见一斑。陈氏的《西洋史》作为教科书广为流传，初版后曾再版多次，其中第六版为修订的新版，在这一版中，作者补充了新的内容，订正了个别史实，并对章节安排做了调整。在1944年经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专家评审，《西洋史》在已出版的三十余种外国史教科书中，名列冠首。

三

继《西洋史》之后，1926年陈氏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艺复兴小史》。本来在《西洋史》中已有专节论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但她感到言犹未尽，故将其内容修订补充（增加了五分之二），又写成《文艺复兴小史》。她之所以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情有独钟，一再关注，事出有因。她在《西洋史》一书的导言中曾说："我们深信，历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体的，选择历史的材料的标准，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换一句话说，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凡是推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在这种观点支配下，陈氏重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文艺复兴，是理所当然的了。陈氏所以重视文艺复兴历史，也是与当时五四运动这一历史背景有关的，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十分关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关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借鉴，这是必然的。

《文艺复兴小史》如同《西洋史》一样，不再是编译外国学者的著作，而是由中国学者自己独立撰写的，其中不乏作者精湛的见解。这部著作着重论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件大事：古学的复兴；方言文学的产生；艺术的兴盛；科学的兴起；知识工具的进步。在这五件大事之前有"总论"，其内容包括分析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指出它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大转枢，也是近代文化的总源泉，欧洲中古与近代分界的标记。接着论述文艺复兴的含义，指出意义有二，一是复生，一是新生。前者是指希腊罗马的古文艺和人生观的复活，后者是指欧洲近古文化的先锋，是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陈氏认为大抵文艺复兴初期，其倾向是偏于复古的；后来到了盛极将衰的时期，却又见老树根上到处产生新芽了。陈氏这些论述，基本上是阐发了欧洲学术界近代文艺复兴史奠基人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86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正统观点。在"总论"中，陈氏又明确地分析了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背景及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的原因。《文艺复兴小史》正文之后，作者写有《结论》，在这一部分，陈氏着重说明文艺复兴运动在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所表现的不同特点。在《结论》中，作者还论述了文艺复兴在人类精神上所发生的影响，指出一为以入世观念和审美和谐观念，市民观念为内容的希腊人生观的复活；二为知识及情感的解放；三为文化工具的校正及加添。

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后，欧洲文艺复兴构成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蒋方震写作的《欧洲文艺复兴史》，这部文艺复兴史，篇幅大于陈氏的著作，但就内容与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互相媲美。陈氏写作《文艺复兴小史》的目的之一，是引起一般普通人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趣。《文艺复兴小史》的出版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著名的地理学家侯仁之回忆说：《文艺复兴小史》是他少年时期受益最大的三本书之一，当时读《文艺复兴小史》，感到十分新鲜，对西方文化艺术的视野也是从这里扩大的，《文艺复兴小史》发挥了"启蒙"作用[24]。

陈氏除上述两部史学著作之外，还发表有历史论文多篇，《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写作于1922年5月[25]。当时继"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集会后，在上海成立了与之相对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组织了"非宗教大同盟"。一方认为基督教曾令西方各国富强，文化发达，因此中国也需要它；另一方则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是文化侵略的工具。在两方对垒，争执不下的形势下。陈氏写了此文，运用了历史知识分析了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功过，她说："我这篇文章，既不曾牺牲了历史的事实，来给基督教辩护，我也不曾怀了成见，专去择取基督教在历史上的罪恶，用来做非宗教运动的工具，我是用历史家的公平眼光，去找取历史上的真确事迹，来给大家研究这个问题的材料的。"目的是要借此减少一点感情用事的危险。文章以基督教的发展为线索，描绘了欧洲从上古向中古嬗变的过程，使大家看清，当罗马帝国末年被蛮族欺凌时，基督教起而代替政权执行保护人民，维持秩序，保存残余的古代文化和美术并感化了入侵的蛮族。基督教保护了古代文化，成了当时唯一的知识阶级，既能感化日耳曼人，也就成为征服罗马者的征服者。但是，基督教掌握了政权，便成为有系统的阶级组织，产生了欧洲历史上的怪物——罗马教皇，实行了封建的专制统治。专制的淫威，招致敌对的势力，伊斯兰教兴起同他抗衡，神圣罗马皇帝同他斗法，都没能战胜他。人民终于纷纷起来搞改革，把教会分为新旧两教，最后，科学和他斗争，教会动用了残酷的火刑，牺牲了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这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犯下的大罪。文章的结论是：欧洲的基督教曾是政治化的宗教，它初期的成功，是代替政府尽责，后期的失败，是因为它滥用了政治的权威，政教不分的现象是欧洲历史上的产物，宗教改革以后，它逐渐脱离了政治关系。这篇文章不仅把基督教在历史上的功过大白于世，使当时的争论减少了感情用事，同时也使人们对欧洲古代中世纪有了一条线索可循，更能平心静气地知人论世。时至今日，陈氏这篇文章，仍有参考价值。

陈衡哲教授还写了多篇历史人物传记。在《居里夫人小传》[26]中，陈氏着重评述了居里夫人的身世与人格，称赞她是"一个新女子的模型"。"她所给我们的，不但是一个科学上的伟大贡献，并且是一个更为伟大的人格，一个完美高尚的人

生模型”。当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逝世之际，陈氏又写下了《哀悼居里夫人》一文，此文情文并茂，缅怀了这位“女界伟大光明星座”为科学奋斗的光辉一生。在《亚丹女士小传》和《好尔厅的基本工作——亚丹女士的成绩之一》[27]这两篇文章中，陈氏评述了生活于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期的亚丹女士这位社会活动家伟大平凡而又艰苦奋斗的一生，热情歌颂了她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历数她从事的社会福利工作和和平运动的业绩。陈氏着重指出亚丹女士的社会工作虽有得失，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她的立德的伟大人格却是不朽的。从这篇文章中，也可窥见陈衡哲高尚的思想追求。

《纪念但丁》、《佩脱拉克与文艺复兴》两文是陈氏评述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位著名文学家的传记[28]。前一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但丁这位从中古文化发展到近古文化的过渡人物的贡献，该文特别提示，我们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过渡时代，因此，纪念但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后一篇文章，着重分析了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佩脱拉克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的本质。陈氏提示我们中国青年所以纪念这位文化名人，在于学习他古为今用的精神。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陈氏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意在洋为中用。

四

时光已流逝七十多年，陈衡哲这位五四时期著名的学者、作家，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冷遇，其人其书鲜为人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情况大有改变。由于学人视野的扩大，认识的提高，陈衡哲“走近”了我们，当年风华正茂的陈衡哲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研究她文学和史学成就的论文连续发表，她的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受到出版界的青睐。仅《西洋史》一书，除辽宁教育出版社把它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重印以外，东方出版社在2007年5月加以重印，列入《民国学术经典·西洋史系列丛书》之一出版，中国工人出版社在2007年12月重印。这两种版本都加配了精美的图片和华丽的封面，并且是大十六开本。东方出版社编辑重印《西洋史》时，编者指出：“《西洋史》的特质是突破了近现代中国学人惯常使用的‘以西洋人眼光看西洋史’的视角，彻底实现了‘以中国人眼光看西洋史’的视角转换。”中国工人出版社把《西洋史》列入民国时代最有影响的四本历史教科书之一，称之为“大师给大众的经典历史读物”。陈乐民教授在向大学生推荐《西洋史》一书时，称赞说：“这本书我建议你们好好看，我说句大话，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写的《西洋史》中，我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这本书“文笔非常流利、细腻”[29]。行文至此，想起了陈衡哲教授在《西洋史》原序中写的言简意赅的一段话：“我编辑此书时，有一个重

要的标鹄，便是要置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书人的心中。我既不敢将活的历史，灰埋尘封起来，把他变为死物，复不敢让幻想之神，将历史引诱到他的域内，去做他的恭顺的奴隶。”“我若能藉此引起少年姊妹兄弟们对于历史的一点兴味，若能帮助我们了解一点历史的意义，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30]。时至今日，应该说陈教授的这些目的是圆满地达到了。《西洋史》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众多的读者所重温。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陈教授的史学论著时，仍然感到既新鲜而又亲切，领悟颇多。

最后我谨以下列献词结束此文：

五四运动涌新潮，

莎菲女士竞妖娆。

文艺史学佳篇著，

士林享誉女中豪。

【参考文献】

[1]《陈衡哲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

[2]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活跃在20世纪中叶至50年代后期，以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等问题为关注内容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于1925年成立，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夏威夷、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等国代表参加。

[3]《衡哲散文集》收入发表在《新青年》《独立评论》《努力周刊》等报刊上的文章，分为五部分：通论、妇女问题、教育与青年问题、传记、游记。

[4]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1页。

[5] 关于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史学观点，详见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 陈衡哲：《西洋史·导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陈衡哲：《西洋史·例言》。

[8]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10，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1998第751页。

[9] 陈衡哲《西洋史》第79页。

[10] 陈衡哲：《西洋史·导言》。

[11] 陈衡哲：《西洋史》第17页。

[12] 陈衡哲《西洋史·导言》。
[13]《陈衡哲致胡适（1924 年 5 月 28 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52~253 页。
[14] 陈衡哲：《西洋史·例言》。
[15] 陈衡哲：《西洋史·原序》。
[16] 陈衡哲：《西洋史·导言》。
[17] 陈衡哲：《西洋史·导言》。
[18] 陈衡哲：《西洋史》第 257~258 页。
[19] [20]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版的史学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10，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52 页。
[21] 陈衡哲：《西洋史·例言》。
[22] 陈衡哲：《西洋史·六版序》。
[23] 陈衡哲：《西洋史·例言》。
[24] 侯仁之：《良师益友常相伴》，辑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25] 陈衡哲：《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辑入《衡哲散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26] 陈衡哲：《居里夫人小传》，辑入《衡哲散文集》。
[27] 陈衡哲：《亚丹女士小传》，《好尔厅的基本工作——亚丹女士的成绩之一》辑入，《衡哲散文集》。
[28] 陈衡哲：《纪念但丁》，《佩脱拉克与文艺复兴》，辑入《衡哲散文集》。
[29] 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页。
[30] 陈衡哲：《西洋史·原序》。

（作者系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略谈湖南的一代奇才陈云章先生

周笃文

（根据录音整理）

我是陈云章先生的学生后辈，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云章先生的栽培、关爱，感情很深。我首先非常感谢湖南省委领导同志、文史馆的领导能够为尊敬的云章先生开这么一个追思座谈会，这是非常值得的。云章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学者，我认为他是民主革命的斗士、实业开发的领袖和文献历史的大家。

我和云章先生开始接触是在 1973 年，在这以前我就在有些朋友那里，比如说吴则虞先生、李淑一老人那里，听说过陈云章先生的许多逸事。吴则虞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大家，是一个经史方面的天才人物，也是陈天倪先生的高足。他在湖南开王船山学术研讨会，两天晚上就写了七千字的论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学者。他特别钦佩湖南人，尤其钦佩云章先生。他说陈云章先生是湖南奇才，他说半年时间赤手空拳搞出来一个中原公司，不叫湖南公司，叫中原公司，说明了你们湖南的大气，要纵横中原争夺天下，有这个大气魄。他说这个人你一定要好好看他。那是 1973 年的端午节，我来到云章先生家里，拿了吴则虞先生介绍信，他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他说，你是则虞先生的学生啊，然后我们就谈了。当时正是乱世，“文化大革命”正胡搞。他就跟我讲一点，度厄，在灾难的时候如何对待。度厄有两条，有这么几句话。一个就是说天厄顺其自然，天灾没办法只好随之。人厄处之有道，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孔夫子如何度人厄，孔子在陈绝粮。过宋的时候，微服过宋。这是孔夫子度灾难的态度，是用大智慧来处理。他说现在是个乱世，怎么办，我给你一句话：关门闭户掩柴扉。外面的事情你根本就不要管，关上门来，插上二道门，埋头读你的书。读什么书，要读经书。他就把皮锡瑞的《经史通论》送给我。他说你搞诗词当然好，没有经书就没有根底。自那以后，我就把他的这几句话告诉我的老师张伯驹先生，伯驹老师非常欣赏，用他歪歪斜斜的笔迹写了一首诗赞美。说云章先生的话，我很欣赏。这个原件还保存在天倪堂。这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人。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包括云章先生的耳提面命，

我也写过一首诗，赞美云章先生："两寻愧对陈公榻，三沐曾陪吏部堂。"把他比成韩吏部韩愈三沐而三熏之。他认为一个人成就事业要经过磨砺苦难，要反反复复地淘洗自己。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个方面。

另外，自那以后，三十八年来，凡来长沙，必住三贵街。就和他老人家促膝而谈，他就把他的生平经过，点点滴滴给我讲。印象深刻的大概还有这么几点。一点是他作为实业家，脱颖而出成为湖南实业界的领袖，这还罢了，居然当上了全国实业界的常务理事。全国的工业界只有11个常务理事，湖南的工业界并不突出，他就以新生力量达到那样的高度。因此和杜月笙、卢作孚、李烛尘等一批大家关系非常好。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他是做了突出贡献的。一个当时的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有7个董事，3个在台湾3个在大陆，剩下一个人杜月笙在香港，因此这个中国银行是归到台湾去中华民国还是归到我们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键就在于杜月笙这一票投给谁。因为他和杜月笙有关系，他又特别会雄辩，跑到那里去和杜月笙谈，谈到杜月笙脑袋都发昏了，同意陈云章意见，投了毛泽东一票。从此，中国银行就变成了我们的外交代表单位、情报收集单位、金融商业单位。那个时候外面都封锁了，欧洲、美洲、非洲，都是通过中国银行这个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事情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我是听他讲的，我相信他老人讲的必有根据，请有关单位进一步了解，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是卢作孚的回来。民生公司是不得了的，如果抗战的时候没有卢作孚民生公司的那个船队的运输，那威胁太大了。卢作孚以惊人的毅力，超乎想象的能力，把工业、部队、资源都运到了重庆。这个人解放前也到了香港，回不回来他是很犹豫的。也是云章先生，他说我亲自跟他谈。云章先生极有辩才，极有人格魅力，你跟他谈话，原来你不赞成他的观点，谈了以后也就会赞成他的观点。所以卢作孚先生也很受感动，后来也回来了，带着自己的财产，带着自己的经验搞民生公司。很可惜"三反"的时候整他整得太厉害，他自杀了。他的自杀，对毛主席震动很大，从此有了新的政策。所以云章先生讲，我对不起卢作孚，我害了他啊，我如果不叫他回来他不会死，他是有他的感慨。但是他做这些工作贡献是很大的，功在国家。"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曾经出国访问，以他的思想，以他的影响，以他在美国的故旧之多，大家认为他大概不会回来了，包括我，也是这么想的。半年多一点，他哭着闹着要回来，为什么，美国那套生活方式，那套价值观他并不很欣赏，中华文化，像家书（陈云章先生世子）讲的，那种吸引力那种深入骨髓的魅力使他特别想念，哭着脸又回到了过去整过他几十年的家。这是他的爱国情怀，中国文化的魅力。到台湾去，刚才讲了，我不多说。他在对台湾方面做的工作影响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代替的。

云章先生就是这么可爱，这么顾大局、识大体，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爱国民主人士。

还有一点要讲的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我的老师夏承焘先生到了北京，是我想法子安排他住院。"文革"没有结束，我当时在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当主任，利用我的关系，这个医院住一段那个医院住一段，一直到"文革"结束，就不再揪他了，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他都没有回过老家。他那个房子，原来比较小，为了给他买房子，我给他起草了一个文件，送到耀邦同志那里。耀邦同志就批了，批给薄一波，批给林乎加。当时是用四万五千块钱买了两套大小单元，使夏老安居乐业。但是北京地震的时候，夏老没地方去，身体也不好。想来想去，湖南比较安静，湖南千年没有地震，马王堆出土的那个水上的荷花叶都没动过，是极为稳定的一方，就介绍到这里来。当时，云章先生条件并不好，政策没有落实。但是他知道夏承焘先生的分量。胡乔木讲的当代词宗，中国词学研究的高度，他有多高就有多高。所以，他说，好，我想办法。就做李淑一老人的工作，在营盘街高升门，把李淑一的旧居让出来，接待夏先生。夏先生是1976年11月下旬来的，1977年2月底3月初走的，在这里待了三个月。这三个月，由于云章先生的精心安排，夏先生住得特别愉快。三个月当中他写了诗词20首，他七十年诗词一共才1200首，他在三个月90天内写了20首公开发表，而且还独创了一个调，叫做"昆仑曲"，纪念毛主席的。夏先生一辈子没有创过新调，就在湖南的时候受到这块热土的激荡开创了一个新调"昆仑曲"。夏先生的第一个油印本是在湖南出的，第一个诗词的公开发行本是在湖南出的，所以夏先生在湖南的三个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词学南传。当时像彭靖先生、萧艾先生、马积高先生、羊春秋先生，以及其他大佬，杜迈之、严怪愚、钟叔河那些人。湖南的英才在三贵街的17号都能见到。我这个人出去得太早，不知道湖南还有这么多豪杰。正是由于有云章先生对夏先生的接待，就接通了湖南诗词的词脉，1984年以后，张伯驹先生、夏承焘先生、周汝昌先生上报中央，要求建立中国韵文学会。中国韵文学会，1984年就在这个地方成立（指湖南宾馆）。这是中国现代诗词复兴的起点，这是湖南人的光荣，这个当中有陈云章先生的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成立了中国韵文学会，挂靠在湘潭大学，所以湘潭大学就有一个中国韵文学刊，现在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刊物，在那个上面发表文章，就可以评教授，可以评博导。这就是夏先生在湖南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夏先生还拿自己的钱，当时是四万块钱成立了夏承焘词学基金，这是1984年。

我是北师大毕业的，也认得一些专家大佬。但是没有深入的接触，比如说我刚到北京，1956年的时候就去看黎锦熙先生，黎锦熙是先辈，是毛主席的老师。

黎锦熙先生对我没太多印象。后来云章先生带我去看黎锦熙先生，那就刮目相待了，把未刊的诗稿交给我，还认我为晚辈了。毛主席的《金缕曲》发表以后，到底是写谁的，当时人家要李淑一写文章，李淑一就说你来代我写吧，我就代他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我觉得不像杨开慧，因为他是赠友，杨开慧只能是赠内，把握不住。我问云章先生，云章先生说可能是陶毅，我带你去访问一个人，就带我去南沙沟1号去看易礼容。易礼容一拍桌子，说就是陶毅，和杨开慧没有关系。后来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个观点。陶毅是毛主席的青年恋友，后来终身未嫁，三十几岁就死了。像这样的典故，除了云章先生别人很难找到答案。像这样的典故，除了云章先生别人很难找到答案。

著论驳韩愈《论佛骨表》的郭振墉

王兴国

郭振墉（1870—1943），名本尧，字振墉，号涵斋，乳名增之、增子，以字行。法名宽慧。湖南湘阴人。郭嵩焘之孙，郭庆藩之次子。光绪十五年（1889）县试、府试均列前茅，录取为童生。次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举人。经过礼部考试，授内阁中书。晋升为候补道，五品衔。民国时曾任安徽检察厅厅长。晚年信佛弥笃，在家吃长斋，捐款建庙修塔，还经常向穷人发药施粥。死后遗命以佛家仪式安葬。长子郭道为，又名郭群，字筱涵，曾任湖南省水灾善后委员会职员，省文献委员会编辑组长，主编省志。

李肖聃说："振镛幼习庭闻，长而登第，于其家建寿曾之阁，追慕湘乡公之为人，其志固矫然异乎常人矣。近乃归心释宗，博稽经律，深诋昌黎韩子之陋，其言博辩，儒者不能难之。"郭振墉"追慕湘乡公"（曾国藩）的表现之一，是将曾文正公祠中的曾国藩遗像临摹下来，置于其寿曾阁中。他在遗像旁所写的短序曰："辛酉（1921）四月，摩刻湘乡曾文正公像于寿曾阁上。于是距公祠之废阅十稔矣。"然后是赞词。词曰："道世交丧，五学榛荒。孰燎其毒，监昔则臧。魏魏曾公，友倭师唐。功烁区夏，教施外邦。祠四十年，国典晦亡。褒衣广袖，岳立斯堂。匪惟寿公，树人之纲。彼驾也踅，我轨厥常。大梦奚觉，大昏奚明。乾坤不毁，奉此心香。"

郭氏家史关于郭振墉"晚年信佛弥笃"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因为郭氏信佛的时间可能比较早。据长沙铁炉寺《妙华老和尚事略》记载，郭振墉曾向妙华和尚（1830—1907）请益的故事：

郭涵斋（宽慧）精究内典有年，专心念佛，一日相率访师，有怀疑未吐者师即先锋揭破。涵斋惊省，知师契悟异常，忏悔谢罪曰：弟子学佛有年，疑翳未决，今蒙慈示洗我留碍，嗣后不敢再疑老和尚了，但有一问："'黄檗之棒、临济之喝'，是否能超凡入圣了生成佛？"师即振威一"喝"！问曰："闻否？"曰："闻。"良久师又问："闻否？"曰："不闻。"师曰："喝久声消无故不闻，有此喝时，

有非是有，因无故有；无此喝时，无非是无，因有故无；有无之声是生灭法，闻性不随生灭转，即有即无即入圣道，此喝不作一喝用，有无不及，情解俱忘，到有则纤尘不立，道无则横遍十方，不生不灭，非佛非心！即此一喝能入百千万亿喝，百千万亿喝能入此一喝，是故入圣有余。”如实［是］涵斋惊觉省悟……即请皈依，与大供养。

妙华法师逝世于1907年，即使郭振墉在这一年皈依法师，也还只有37岁多。而此时，郭氏已“精究内典有年”，这说明，他从青年时代就已经精究佛教了。

郭氏自青少年时代即与敬安法师有交往。因为敬安法师的父亲曾是郭振墉家佃户。聂云台居士在《四十年亲历灵感汇记》中说，民国十六年（1927），他偕湘阴郭涵斋居士朝普陀，遂至阿育王寺礼舍利。先至天童寺礼佛，天童寺为有名之古道场，距阿育王寺甚近。清末时，高僧八指头陀住持此庙。八指头陀本农家子弟，其父为郭居士家佃农，居士幼时常共游戏，后其父舍头陀与寺僧为徒，素未读书，在庙学课诵，始略识字。聂云台的这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敬安法师与郭振墉家关系的史料。

郭振墉后来还皈依了虚云大师，并且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与宝生法师等，力促虚云大师继承沩仰宗法脉。因为宝生法师在这年出任大沩山密印寺住持。《虚云老和尚文汇·书问》中载有郭振墉致虚云法师的信两封。

其一：

师尊座下，昨上一笺，谅蒙垂察。湘省近来信佛者多，苦无领导。吾师为宗门山斗，后进楷模，故敢请屈驾回乡，讲经开示，俾末法众生，发生善根，增长慧命，亦息灾救劫之初愿也。瞻望杖锡，毋任迫切。

其二：

师尊座下，久疏笺问，孺慕弥深。敬维杖履康强为祝。南华修造，计必日新。闻寺事正交观本法师，传付得人，道场光大，幸慰无量。广州连被敌机轰炸，摧残达于极点。闻曲江亦时虞不靖，不审南华可安居否？此间居士林同人，拟接法驾还湘暂避。去春曾闻吾师谈及出家后，迄今未回乡。如精神尚健，为桑梓弘法一行，亦是一段大因缘，在四众中莫不馨香祷祝者也。大沩密印寺，粗具规模，一切尚须整理。宝生大师，备函奉请驻锡兹山，出于至诚。山中与外缘隔绝，洵为高年养静之地。于工程经费琐屑之事，决不敢以此上累清修也。禅宗衰替，继续乏人，孤负祖庭，令人增歉。务恳俯允责临，成就众生之愿为荷。如已定局，请即电示，或快函告知，以便由林中寺中公推二人如函前往欢迎也。

弟子郭宽慧顶礼六月十一日

虚云大师在《复郭涵斋宽慧居士》的信中说：

衲为南华建设计画，常时发生种种困难。其间尤以塑佛像事，为难更甚，不得已赴香港作将伯之呼。甫于古历本月初四返寺。案列手书二件，及宝公大札一件，均阅悉。承蒙宝公及诸檀那不弃，以大沩山家风嘱咐，殊不敢当。然藉此可以偿回乡之愿，亦是快事。惟南华功行，至圆满之日尚远。观本监院，今春放戒，另有其他因缘，衲并未将南华寺传与。不过仿福建鼓山旧例，临时开戒一期而已。远道传闻，或有失实。况修造南华，值此进退维谷，万分困难之际。此事既由衲担任，似有全始全终之必要，便不能因困难而退，就此卸责。衲既不能离南华，自难分身于南岳，只得有负雅爱，及宝公盛情。疚歉之处，容后领责。讲经一节，亦姑俟诸将来也。此间荷六祖庇荫，一切甚为安全。敌机虽常过境，并无举动。南华又与市镇远隔，似无其他危险。如风声紧急，请至荒山暂避何如？[1]

虚云大师虽然没有回到沩山密印寺，但是他却同意继承沩仰宗法脉，为沩仰第八代。他在《禅宗五派源流》一文中谈到这种情况时说：

余居南华，甲戌（1934）夏，长沙郭涵斋宽慧居士，南岳宝生长老，与九成了照首座等，相继由大沩山来，恳请兴修大沩。意以此宗居五家之长，惜乏后嗣，致祖庭息焰，现系济宗钟板。此次遭匪焚毁，尽为灰烬，决议改弦更张，恢复沩仰一脉。大众以予寿高腊长，为诸山敬信，请余继振沩仰宗。余因南华未能谢责，情不获已……虚云德清谨识。[2]

郭振墉与印光法师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曾请印光法师校阅华悟栖居士所编的《卫生集》，以便印刷流通。印光法师校阅后写了一篇序。印光法师此序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1）。从这篇序可知，此书是由郭振墉捐资印刷流通的。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郭振墉与张昕、朱寅亮等居士发起在长沙县雷山古唐寺诵《华严经》，半月1期，共10期，期满，于6月间举行华严法会7天，禁屠3日，地方善男信女参加者数百人。

郭振镛的著作很多。有《湘军志平议》一卷、《澧川宦迹》一卷、《老子校注》、《历代遗民文钞》、《郭汾阳奏议纂校》一卷、《管子校注》、《涵斋集》、《清闻山馆经义》、《江忠烈公后集》一卷、《补遗》一卷、《胡文忠公遗文》一卷、《湘军兵制》三卷、《湘军兵法》十卷、《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类编》、《孙子校注》、《芬陀利室杂钞》、《烬馀别稿》二卷，《后汉书郭太傅补注》一卷，《曾文正公语汇》，《郭庆藩行述》一卷，《韩文公论佛骨表纠缪》、《儒门放生》、《释门法戒录》、《居丧念佛通仪》（清稿本，不分卷）。其中有的刊刻了，有的流失了。往下，我们着重介绍一下郭氏所著的《韩文公论佛骨表纠谬》以及他所编的《儒门放生》。

《韩文公论佛骨表纠谬》是郭氏自己所撰写的著作，以清闻山馆名义出版于1931年（辛未），约2.4万字。正文之前有杜本崇和叶尔恺的序。正文之后附有郭氏所写的《韩文公论佛骨表书后》（上、下）、《韩文公与大颠书》、《朱子考韩文公与大颠书》及郭振墉的按语、郭振墉所写的《跋明教大师非韩后》。正文为专驳韩愈的《论佛骨表》，杜序、叶序及郭氏的《书后》等文，则涉及对韩愈的整体评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先看看郭氏是如何纠韩愈《论佛骨表》之缪的。必须指出，郭氏为了避免偏于儒释的某一派的立场，在驳韩愈的观点时，特别注意引用先儒的有关论述作为论据。对此，他特别作了说明："余惧儒家者流，不知有佛，托于韩氏以自蔽也。故于此表，亟引儒先之言驳之（张商英《护法论》、刘谧《三教平心论》多辟韩语，有通行本，故不录），并以质世之党同伐异，与好读韩氏之书者。"[3]

其一，纠韩愈将夷夏对立之谬。韩愈在表中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等，竭力宣扬其夷夏之辨之思想。郭氏引用了许多儒家学者的言论，如刘勰的《灭惑论》，刘克庄《送高上人序》，曾巩《菜园院佛殿记》，叶适《鲍野宗记序》，文天祥《送僧了敬序》等文的言论，论证了韩愈的夷夏之辨的不合理。在驳韩愈"佛本夷狄之人"时，郭氏除了引述《列子》、柳宗元、欧阳守道等人的言论进行批驳外，还引证了韩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所说的"扬子云称，'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吾取以为法焉"后指出："既举在夷狄则进之之言为法，而又数数以夷狄排佛，何也？至所作《韩滂墓志铭》，滂韩氏子，其先仕魏，号安定桓王，考王名茂，昌黎六世祖也。《魏书·韩茂传》，父耆，永兴自赫连屈丐来降，是其祖亦戎狄中人，昌黎何独不讳？"[4]这是说，韩愈既然那样拼力以"夷狄"的原因排佛，为什么不想一想，自己也是"夷狄"的后裔呢？

其二，纠韩愈将儒释对置之谬。韩愈在表中又说：佛"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所谓"法言"，就是合乎礼法的言论。韩氏将儒家的思想当成唯一正确的标准，以此来衡量佛家思想为"非法"。为此，郭振墉引用古代儒家学者肯定佛家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的言论，以证明佛教的合理性。在谈到"法服"时，郭氏引用《孝经·卿大夫章》指出："此章经文法服、法言、法行，专指卿大夫言之，先王并未尝制佛之服饰，昌黎此论，徒见其不明经义而已。"[5]在驳韩愈说佛"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时，郭氏引黄溍《送养直师序》："始吾闻浮屠氏称其道爽然不与孔子异，而世儒恒讥其去尊卑略贵贱，无君臣礼。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内外，郡县所置，主僧之官，辄与角立，凡府署之崇，慊从之盛，往往视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听命承事之有加焉。吾于是知尊卑贵

贱不可卒废，而浮屠氏果无以独异于人也。正法念经，尽忠立孝，济国治家，行谦让之风，履温恭之道。"又引王应麟《广恩崇福寺记》："夫秉彝好德，人之良心，释氏以空寂为教，若外乎伦纪，然其书有《大报恩篇》，言孝与儒合。"[6]

其三，纠韩愈君王信佛求福得祸之谬。韩愈在表中说，在佛教未传入中国时，许多帝王，如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太戊、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穆王寿命都超过或接近百岁，在位时间也很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法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明帝在位就只有十八年，以后到了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梁武帝虽然在位四十八年，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对此，郭振墉首先引金履祥《通鉴前编》说，黄帝时，蚩尤暴虐于天下，兼并诸侯。少昊时九黎乱拂天常，不遵王命。颛顼时有不才子曰杌，帝喾有不才子曰实沈阏伯，而子挚荒淫无度，不修善政，即位九年，为诸侯所废。此见之于史者。他又引证了一些经、史、子书的材料之后说："孟子明言天下未定，何谓因无佛即安乐寿考。"[7]郭氏还针对韩愈所说汉明帝以后诸帝"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事实表明"亦未必然"。周武帝是灭佛的，其崩年也只有36岁；唐武宗也是灭佛的，崩年33岁。所以，郭氏说："是二君者，皆毁灭佛法，而年代亦促，何也？宪宗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宜宪宗斥为狂妄不可赦也。"[8]

其四，纠韩愈说宪宗真心事佛"伤风败俗"之谬。韩愈在表中对于高祖议除佛教的诏书未能贯彻表示十分遗憾，对于宪宗迎佛骨入大内的影响，更是危言耸听，认为既然帝王真心事佛，百姓必然转相仿效，因而会导致伤风败俗。对此，郭氏指出，沙汰僧道虽然是高祖的旨意，而罢此沙汰者则是太宗李世民，因此不能怪当时的群臣"材识不远"。至于所谓转相仿效，"出于百姓之自然信心，何疑为佛所惑？"针对"伤风败俗"之说，郭氏引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是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谓此说，有契理奥。何者？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醇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也。又引王安石《答曾子固书》：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所以郭氏的结论是："佛法为辅助教化之事，风俗有赖焉。"[9]

其五，纠韩愈对佛菩萨大不敬之谬。韩愈将佛指舍利说成"枯朽之骨"，不但不能进入"宫禁"，而且要将它"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对此，郭氏说，韩愈虽然引用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但按程子的说法：人多信鬼神，

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所以，“昌黎于佛，匪惟不信，其不敬莫大焉。”郭氏又引用韩愈《师说》：“孔子师郯子苌宏师襄老聃。”并指出：昌黎固自命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者也，而未尝以孔子师老氏为嫌，殆所谓不耻相师者欤。今于奉佛则引为奇耻，且不得侪于老氏，窃所未解。这说明，韩愈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10]。

郭氏在《〈韩文公论佛骨表〉书后上》指出，有人认为韩愈的“谏佛骨”，是其倔强之性使然，但郭氏认为，这不过是一种韩氏不知儒释异同之故，而惟门户自限，入主出奴，后学承风，往往逞私臆以快一时之口，非好胜之一念误之欤？彼其说曰，口不言先王，不知君臣父子，此岔其外而遗其中者也。庸知所谓“四恩”，非即国王父母师长众生乎？所谓“五戒”，非即与五常异名而同实乎？韩氏之谏佛，匪惟未析其理，即事实亦多歧误。徒以祸福寿夭之词，冀动主听，而于明心见性之荦荦大者，罔有闻焉。唐书·韩愈传》讥其文章纰缪，匪惟其文，其为人之进退无所据甚矣。故曰：谏佛骨非倔强，乃客气耳。不然，何以甫至潮州，即表请哀怜，至陈封禅不经之说，冀谀朝廷而离贬所。此视其主为何如主？而其自视又何如耶？[6]

对于郭振墉的《纠谬》，时人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肯定。杜本崇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就认为此书“广辑事证，旁引理论，于原文句梳字栉，批摘瑕颣，几无完肤，其用心可谓勤矣”[10]。叶尔恺则认为，“涵斋盖深见夫韩氏之文，雄奇卓荦，睥睨今古，硕儒魁士，罔不沉酣其中。虽于义理有不惬处，而盛气陵驾，足使人震磬其言，默夺其气，眩惑后来，良非浅鲜。乃为之援据事实，疏析义绪，其极虑殚精，引证翔实之处，固亦有足补嵩大师所未及者。当此晦盲蔀塞之时，岂特建法门之金汤，亦足开学林之迷雾。”[9] 李肖聃则说：“有名振墉号涵斋者，为侍郎（郭嵩焘）从孙，其弟崑焘意城之后也。以举人治学，晚而奉佛，尝为《韩文公〈谏迎佛骨表〉纠谬》。湘潭孙征君文昱以为涵斋此文可以不作。”[10]

《儒门放生》，为郭振墉所编，1935年（乙亥年季秋月）由公益书局出版。全书约3.8万字。据郭氏在此书序中称，他编此书是受了冯煦的启发。他说：“金坛冯中丞梦华先生尝以放生之说为儒者所不道，拟辑《儒门放生》一书，以解放生始于释氏之惑。见号蒿庵。江苏金坛人。累官至安徽巡抚。入民国纂《江南通志》。“在江南月课膏火所入，集同志为放生之会。其《蒿盦随笔》有曰：‘今何时乎？万方多难，而半菽不饱者，几遍宙合，亦安忍纵口腹之欲耶？’”[10]

郭氏在此序中还论述了其放生思想：

盖人者受命于天，天之心如是，人之心亦当如是也。失其所固有，即失其所以为人矣。若能尽已性以至于尽物之性，尚有何化育之不可赞哉？间尝推论大化之流行，而叹寒暑之所以推迁，人物之所以繁殖者，皆此生生不息之理而已。敬斯理一日壅阏，则戾气所积，其中于人者，即有水旱疾疫偏灾之虞，积之久而杀机启焉，劫运成焉。何也？以其失所受而不思所以救其失，遂足干天怒而召人祸。然其间能自拔于死亡垂尽之余，剥极而得复者，必于人道未尽泯没者也。彼徒见獭祭鱼然后渔于泽，豺祭兽然后猎于田，谓王者不过取之有制，甚者侈引《周礼》膳夫庖人内饔外饔兽人戏鳖人腊人等设官之备，以为天生物以供人用，不如此似于儒之道背而驰焉。不知圣人非教人以饮食害心也，为之礼以等夷之，不得已也。余避乱海上，先生（指冯煦）示随笔，辄心志之，辑斯篇所以成先生之志欤。先生于国运之沦胥，生民之凋丧，其隐痛每于言论间见之。然则欲辑是书之意，又岂徒为放生已乎？[11]

郭振墉的这段话表明，他辑《儒门放生》，并不是为了和佛教争放生权，而是为了说明放生是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而且郭氏宣传放生的思想，与冯煦一样，不止是停留在宗教层面之上，而是具有更深的现实的政治意义，即反对当时侵略者和统治者的战争暴行。《儒门放生》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文”，辑选古代有关放生的诏、疏、碑、铭、记、论、书、引、说、志、文、赋等30多篇。第二部分辑选有关放生的诗100多首。第三部分为附录，辑选历代正史及其他著作中一些人物有关放生的言论数十条。

【参考文献】

[1] 郭道西主编：《湘阴郭氏家族史全书》，长沙求实印刷有限公司2006年印制，第155、458~459页。

[2]《李肖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3] 吕芳文：《曾国藩正立遗像题记刍议》，《船山学刊》2007年第3期。

[4]《杪华老和尚事略》，禅心的博克。

[5] 聂云台：《四十年亲历灵感汇记》。

[6]《虚云老和尚文汇·书问》。

[7] 虚云法师所写的《禅宗五派源流》附于《联芳集》后，此文不仅简述了禅宗五派的源流，而且追述作者自己与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之关系和传承，有利于了解虚云法师身祧五宗及中国禅宗衍变的情况。

[8][9][10] 郭振墉：《韩文公〈论佛骨表〉纠谬》，清闻山馆重光协洽（辛未，1931）仲春月刊。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话说早年的湖南籍“女飞行家”

许 康

一、导语

笔者1947年在武汉读小学，每天必经“陈怀民路”。父亲说，在1938年保卫大武汉的空战中，年轻的飞行员陈怀民飞机着火，机枪炮弹打完，乃驾机撞向日寇飞机，与之同归于尽。英勇无畏的事迹为武汉民众亲眼目睹，后遂将这条马路（属原日本租界区）冠以英烈之名。从此激发我阅读航空书刊较多，20世纪90年代曾撰有文章在《航空史研究》上发表，并当选中国航空史研究会理事，点滴成果还蒙九十岁的姜长英教授在其巨著《中国航空史》中提及。下面的正文，则是介绍20世纪前期被誉为“女飞行家”的两位湘籍女杰，内中有些文字和图片似未见别的文章引载过。附带补说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中的湘女。

二、中国最早乘飞机上天的姑娘张侠魂及其家世

不少读者可能知道，宋庆龄在1923年，曾坐上由广东航空署长黄光锐驾驶、由杨仙逸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架双座侦察机，飞上广州天空，于是被当时各报刊争相报道。其实，更早的1916年，一位泼辣的湘妹子，已经在京畿地区的南苑机场闪亮腾空了。她，就是迄今被各媒体和史料公认的“中国第一位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张振亚（1890—1938），字侠魂，毕业于上海女校，秀外慧中，意气风发，其时正执教于上海神州女学。

张侠魂之弟张元祜（1893—1956）中将，字叔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北京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1949年7月任第一兵团中将高参，8月在长沙随程潜、陈明仁起义。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与省文史馆有很亲密的关系。

张侠魂的夫君是原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1920年他俩喜结连理，月下老人竟是其二姊张昭汉（1883—1965，字漱芳，号涵秋，别署默君，笔名大雄），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的先进，同盟会的女革命家。原来，民国初年已功成名就的张默君，1918年自费前往美国留学，以老大姐身份当选纽约中国留学生总会的主席。她在社会活动中趁机为妹妹择婿，

到波士顿城相中了年少才美、老成持重的研究生竺可桢，促成了这桩婚事。真所谓万里姻缘一线牵，海内外多年传为美谈。

张侠魂的祖父海英公，湘乡景庆乡人，积有军功，同治年间任浙江严州知府。父亲张通典（1859—1915，字伯纯），清光绪年间曾先后入曾国荃、张之洞、刘坤一幕，维新变法时为陈宝箴办实业，与谭嗣同、陈立三、梁启超等人倡南学会，办时务学堂。1900年参加唐才常在上海张园主持的“国会”，决定在湘、鄂、皖数处起义。1905年12月加入同盟会，遭端方、张鸣岐等大吏忌惮、通缉，以致全家屡濒于危，也就陶镕铸炼了儿女们的胆识。1911年春参加广州起义，起了准备、策应、掩护等作用。在辛亥革命时，张通典和张默君、张元祜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宣布独立。辛亥革命后，张通典任内务司长、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张侠魂的母亲何懿生，通今博古，善诗词歌赋，有“海内女师”之称（谭延闿语）。二姐张默君1925年嫁给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代理院长的邵元冲，张默君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三姐张宏楚（1888—1938，字淑嘉），其夫蒋作宾曾任内政部部长、参谋次长，陆军上将。

三、张侠魂巡空时的惊险场面

1916年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交战双方都发现尽管飞机发明虽不过十来年，而用于侦察、投弹、扫射，乃至相互空战却大有成效，于是不惜血本制造飞机，组织空军。中国军方见势迅速跟进，也开始购买军机，开办航校，培训空军。在北京南苑开设的航空学校和机场，就是最早的一所。9月间，侠魂女士来京省姐，且谋发展上海的那所神州女学，争取京中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的支持。即居于蒋宅。不久，南苑航空学校进行飞机表演，对社会开放。参谋总长王士珍、次长蒋作宾以职务上之关系，莅会校阅。蒋夫人张宏楚乃偕侠魂女士来校参观。

她们与众多军民听到马达的轰鸣声，螺旋桨卷起的风涛声，接着是单机、双机银燕滑跑升空，上冲云霄，下扑树梢，左右翻腾，好不快活。心动不如行动，张侠魂竟请求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允许她也乘飞机翱翔。这时天气突变，秦校长以风势甚大力陈不可。以下三段文字，是在场记者所作的记录和评论：

秦校长问道：“女士何必冒险如此？”侠魂女士慷慨言曰：“中国人缺乏冒险性，男界然，女界尤甚，几为万国所承认。今日欣逢贵校演试飞机，无论各技士驾驶之术精敏，万不至有何等危险。脱有不测，吾一弱女子以飞行而伤、而死，亦可为中国女子飞行家开一新纪元，女子冒险历史中放一新曙光，吾国航空历史上留数行纪念文字！其意甚决，敢冒昧以请！”秦校长感其言，且深致钦叹，遂可其请。于是乃令某外籍女士为之更飞行之衣，遂与姚技士乘机飞升。

尔时万人仰首争鼓掌扬巾以壮行色。参观之诸女士欢迎之热度更烈，女士则含笑端坐机上，一鼓直上，没入云际，绕行南苑数回。讵知天意果欲造成女士冒险之历史。忽起疾风从半空中猛扑飞机，轰然一声，飞机中之（发）动机骤中断，姚技士失其控制力。于是此飞机乃陡然下坠，将落屋巅。姚技士心灵手敏，欲减少危险之程度，乃尽力拔转机轮（方向盘），使其斜驶折下，坠于泥坑之中。姚受微伤，女士则昏然伏地，奄奄一息矣。时中、西医士亟趋前检视伤状，用刀剪去外衣，知左腿折断，口齿咬碎，肚腹微肿，鼻口流血。当舁至附近铁路医院。将左腿伤处用机械分开，皮肉以银丝缠住，骨节敷药、封皮用丝缝妥。经过一小时之久，而女士则毅然忍痛受医，不稍作儿女啼哭态。呜乎，壮矣！尤有一语堪为我女界告慰者，则医士云：一月后我侠魂女士即可痊愈，步履如常也。噫，是殆天故欲试侠魂之胆，而施此小小之挫折乎？

呜乎！我知张女士经此一度挫折后，胆必愈壮，冒险之心必更蓬勃。我又愿同胞姐妹闻风与起，易昔之柔弱之性为刚强之质，洗昔之雌伏观念为雄飞思想。则今日仅有张侠魂之乘飞机而上升，他日必有千万之张侠魂自驾飞机而上驶也。呜乎！他日中国果有女飞行家之产出，我敢谓皆受张侠魂之感动所致也。

四、鉴湖女侠的女儿“小侠王灿芝”

湖南第一位到国外学习飞行，回国又在航空部门任过公职的女杰，非秋瑾的女儿王灿芝（1901—1967）莫属。秋瑾被父亲许配给湖南湘潭（今属株洲）的巨商王家之子王廷钧，他后来上京捐了个主事，秋瑾随往。迎上世纪之交维新新政的改良风潮和西学东渐的民主气息，遂与守旧的婆家母子决裂，毅然东渡日本求学，参加同盟会、光复会。回国图谋武装起义，事泄，1907 年在绍兴壮烈牺牲。这些史实众所周知。

秋瑾出国时小灿芝还只两岁多，记忆中对母亲毫无印象。1908 年又遭丧父之痛，孤苦伶仃的她，自幼在王家饱受祖母的冷遇和虐待，激起强烈的反抗封建意识。因曾祖父是曾国藩的表兄弟，她又被安排与曾氏家族后代结了“娃娃亲”，送到长沙进入艺芳女校。校长曾宝荪（曾国藩的曾孙女，基督徒，留学英国）对她管得很严，连往来书信都要受检查。她 15 岁时背着祖母，拜“王大老倌”为师学习武艺，立志要找谋害母亲的刽子手报仇。她后来回忆：“我从小就羡慕侠客那一流人物。我觉得学精了武艺，专为人间抱不平，把那般贪污横暴的人杀一个干净，这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因此，有一个时期，我曾自题一个号叫‘小侠’。”祖母去世，由唯一的亲兄当家，对她也毫无骨肉之情，经济上极尽打压之能事。为了逃出罗网，她设法从账房支取几百元，只身东下武汉、南京、上海，途中被骗，

在上海饥寒交迫，家里也不寄钱来，更加锻炼了她顽强坚忍的性格。

1927 年王灿芝考入大夏大学教育科行政系，恰值母亲挚友徐寄尘让她接任上海竞雄女学（竞雄是秋瑾的字，学校为纪念她而办）校长。其时学校经济已十分困难，她就央求邵元冲写介绍信找国民政府大佬募捐解决问题。因邵妻张默君与秋瑾、何香凝等人都是同盟会女会员，1906 年秋瑾在上海制造炸弹时，张默君曾为之筹措经费。

王灿芝想起母亲的遗诗：“壮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终夜无法安枕，1928 年执意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航空专科学习飞机制造和航空学两年。凭着坚强毅力和体力，系统学习了飞机工程、航空教育、驾驶学、气象学、机械设备、无线电等课程。1930 年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女飞行员，被美国航空界誉为“东方女飞将”。

1930 年 5 月王灿芝到国民政府航空署教育科任职，薪金不高，尚待成家，又赖邵元冲帮助，得以晋升一级。不久调入军政部所辖笕桥航空学校任教官，讲授飞机作战术。1932 年与广东人黄公柱结婚。黄公柱曾留学法国，任过汉阳兵工厂厂长。1935 年王灿芝生了独女王焱华，便相夫教女，飞行事业戛然终止。几年后黄公柱去世。

五、尾声

王灿芝尝大声疾呼：“慨内讧不息，外侮频侵，列强争霸于空中，逞威权于海外，惟望吾侪奋勇直追，当仁不让，雪神州之耻，而慰先总理暨先烈在天之灵，则幸甚矣！”可是岁月不饶人，中年女性驾机作战已力不从心，人们不应苛责“女飞行家”未能坚持久远。1951 年王灿芝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移居香港。两年后去台湾（张默君也去了台湾），撰写《秋瑾革命传》（英译名《伟大的牺牲》）出版，署名秋灿芝。1967 年以脑出血去世。王焱华留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其丈夫教美术，他们生有两子一女。

张侠魂本来婚姻美满，支持竺可桢担当校长重任。1937 年由于日寇入侵，浙江大学西迁。1938 年暑假学校在江西泰和再拟迁往广西宜城，竺可桢风尘仆仆往返张罗，7 月下旬幼子竺衡、张侠魂相继患痢疾，也没能陪伴在侧。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失子丧妻，痛苦异常，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如步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1946年，他们的大女儿竺梅投奔解放区，1948年在华北病逝，没能看到全国解放。

1958年，他们的大儿子竺津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病逝于劳改农场。

总的看来，张侠魂和王灿芝，都是湘军将门之后，辛亥革命的热血女青年或遗孤（女）。上天赋予她们强烈的豪侠气质，思想、言论、行动无不开湖湘女界风气之先，敢于乘长风破万里浪。但时乖命蹇，天厄女英，未能尽展长才，常令今人太息。

六、补白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女飞行员共55人，在北京西郊机场驾驶6架运输机飞上天空，接受朱德总司令检阅。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切接见了她们。14位女飞机驾驶员（其余是空中领航员、无线电员、机械师等）中竟有3位湘妹子，几乎占了1／4。真乃世上新人超旧人。她们是：

周映芝（1931—2009），湘潭人，原是含光女子中学（长沙市13中）的学生会主席，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她放弃燕京大学录取通知，毅然报名参军。她是女飞行学员的排头兵，第一个放单飞，可惜于1954年停飞、转业。

周真明（1931—1984），宁乡人，高中生，父亲是曾留学法国的铁路工程师。她1950年年底在衡阳入伍，1958年转业到中国科技大学。

万婉玲（1931—2006），衡阳人，高中生，1951年初入伍，1963年停飞，1975年转业到湖南化工机械厂。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以悲剧告终的彭寿松

柳克文

辛亥革命福建光复前后，有一位显赫一时，但却以悲剧告终的长沙人彭寿松。

彭寿松（约1886—1918），号岳峰。他父亲是左宗棠部湘军的一位武弁，随军进驻福建后，曾在台湾任过武职，后病死于福州。彭寿松曾留学日本，又捐资得任福建省城保甲局总办。他为人倜傥不羁，好用意气。有一年元旦，在湖南会馆团拜时，竟因细故殴打一位同乡，被藩台参劾革职。他对清廷腐朽卖国强烈不满，渐至仇恨日深，因此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十分向往。随着革命潮流风起云涌，彭寿松苦于一时与革命党人无法联系，便与其他在闽的有志之士，成立反清秘密团体“爱国社”，彭寿松负责联络会党。

辛亥革命前一年，福建留日学生陈不淳毕业回国途中，不幸失足坠海葬身鱼腹。革命派人士把他说成是痛愤国事而蹈海，是位像湖南陈天华那样的烈士，发起和鼓励各界在福州泛船浦广东会馆举行追悼大会。那天，倾城出动，成为一次激扬民气，反对封建专制的壮举。彭寿松撰写了一副挽联，还把辫子剪下，附在挽联一起，悬挂在会场当中台柱上，十分引人注目，他还在灵前当众致了激昂悲壮的悼词。他这一别出心裁的大胆举动，使同盟会员刘通、高鸿等感到惊异和赞赏，于是主动与之接近叙谈。从谈吐中，他们感到彭寿松革命意志坚定，是位难得的同志。便将他引见给同盟会福建分会首领林斯琛。不久，彭寿松移居较僻静的下渡小岭。这时，他与刘通、林斯琛等的联系更加密切。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彭寿松由刘通介绍加入同盟会，在革命关键时刻，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同年6月，同盟会福建分会在福州开会，研究传达了同盟会本部改变斗争策略，决于长江方面起事，通令各省支部积极响应的号召，决定加紧活动。林斯琛往上海和长沙与各埠党人联络。史家麟、潘祖彝等在上海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筹建。福建分会会长郑祖荫则以省咨议局常驻议员的合法身份，通过公开团体“桥南公益社”在社会各界中广泛联系，暗中扩展同盟会组织。彭寿松奉派与李质文往上海与中部总部磋商。事毕，李质

文留下学习制造手掷炸弹，彭寿松则转赴武汉以观形势，然后折返福州。

武昌起义以后，福建官府惊恐万状，社会秩序也很混乱，一夕数惊。福建同盟分会于是全力以赴加紧筹备起义。为建立革命武装，由彭寿松负责在城内另组“福建军警同盟会”机关，专门担负策反军警人员参加革命的任务。

福建过去由湘军驻守，湖南人在军警两界势力很大，彭寿松既是湘军将佐之后，渊源自然很深，加之又是地方官绅，社会关系广泛，所以进展得很顺利，不多久，军警同盟会就发展到近万人。

当时，驻闽清军之主力，是精锐的新建陆军（一般称“新军”）第十镇，但闽浙总督松寿却对这支部队很不放心，特别是在武昌起义后，更觉得是严重的潜在危险，便将该部所有弹药收缴，存于旗界。这样更加深了他与新军的矛盾，无异把新军推向革命派一边，革命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新军将领的策反。10月30日，第二十协协统许崇智在桥南社加入同盟会。11月4日，上海等地光复的消息传到福州，形势急转直下。5日，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也由彭寿松主持加入了同盟会。同日，同盟会在福州城外白泉庵举行军事会议，成立由郑祖荫等组成的总机关部，以桥南公益社为发号施令的总机关，郑祖荫、林斯琛又代表同盟会与新军将领许崇智、林肇民等在台江船上会晤，秘密商讨起义军事方略，决定：

1. 在花巷设立国民军司令部，以许崇智为前敌指挥，节制所有新军。

2. 起义时，先占领城内制高点于山，放火为号，先烧都统、将军二署，后烧旗下街。

3. 留东门不攻，给旗兵一条生路。

4. 起义日期定在11月12日（阴历九月二十二日）。

11月6日，彭寿松又亲往台江会见孙道仁，经过磋商，孙道仁决心率全军起义。

在此之前，李质文已于10月下旬回到福州，借孤儿院制造手掷炸弹。林斯琛电嘱在上海的李恢向中部总部筹借的10万元经费也已汇到。至此，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进入实际发动阶段。

7日下午，咨议局开会，决议所有福建政务，此后由新政府施行。8日，咨议局照会闽浙总督松寿，促其交出政权，缴出旗兵枪械弹药。但松寿置之不理，反而命令所部紧急备战，预备次日直扑桥南公益社（在古榕书院内），还组织了实施种族屠杀的“杀汉队”。面对这种紧急情况，同盟会总机关和起义军司令部不得不决定提前起义。武备学堂和福州各校学生齐集桥南社，分编为炸弹队、洋枪队。炸弹队入城随军攻守，洋枪队负责占领和守卫城内外重要单位。

9日0时，新军出动，迅即将于山占领，沿北面山腹布防，装置大炮。彭寿松亲率先锋队、差遣队前进，到达于山观音阁，在那里设立军警同盟会办事处，作为战时处置临时事务的机构。随后又率炸弹队攀登而上与新军会合。这时，旗兵以法政学堂为中心据点，依托附近民房进行抵抗，又派人四处纵火，企图阻挡革命军的进攻。新军和炸弹队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奋勇前进，旗兵被杀伤数百人后狼狈退却，革命军树起招降大旗，对旗兵的政治瓦解也收到积极的效果。同时，于山新军炮兵阵地的大炮，几次命中将军署。总督松寿闻败，知大势已去，遂吞金自杀。午后，在水部城的旗营挂出上书“将军出走，停战议和”的白旗，革命军以其并非诚意投降，未予理会，继续进攻。入夜，福州将军朴寿派人送来降书请求停战，亦未予置理。

10日黎明，旗营又挂出白旗，上书“请求停战，全部献械乞降”，民军正准备受降，不意数百旗兵蜂拥直扑于山，劫夺大炮，双方短兵相接，鏖战十分激烈。许崇智等将领闻讯，亲临火线组织反击，终将敌人杀退。在清军反扑时，头天晚上求降后逃跑，被炸弹队活捉拘押在司令部的朴寿，趁机逃出，途中再被抓回，被彭寿松即行正法于观音阁下，还处决了趁火打劫的大吉升戏班武丑徐春浦。

11日，同盟会总机关由桥南移入城内，郑祖荫等率新军、学生军和同盟会员列队前往旧督署，沿途商店悬旗，市民夹道欢迎，爆竹争鸣，好一派维新景象。彭寿松骑着高头大马，手持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显得很威风，不料坐骑被红旗所惊，竟将彭寿松掀翻在地，虽未受伤，却着实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同盟会宣布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推举孙道仁为都督，下设参事会，协同都督掌理军民政事，以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黄光弼、李恢、刘通、陈承泽等10人为参事员，由彭寿松任参事会会长，陈承泽为秘书。12月8日，参事会改为政务院，任命彭寿松为政务院总长，林斯琛、郑祖荫为副总长。都督府虽也吸收了一批立宪派人士参加，但实权掌握在同盟会手中，这就避免了像湖南、江西等省光复初期的那种反复。

早在11月21日，福建军警同盟会已经与同盟会福建分会合并，郑祖荫将分会会长一席让与彭寿松。彭寿松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后，踌躇满志，自以为福建光复是他一手缔造，开始骄横跋扈。在同盟会内部，他只依靠原来军警同盟会的那些人。他见自己没掌握军权，便组编两营卫队，由他儿子厚庵统领，分任营长的张煊、刘辅廷都是他的亲信哥老会分子，实际是他的私人武装。又怂恿他侄儿彭荫祥要挟都督府得任建邵道尹，下属3个知府也为其亲信，形成一方割据。起先，他对刘通、郑祖荫、林斯琛三位同盟会元老，尚能虚心接纳，后来也由于受马绛生（前清官僚，彭对之言听计从）以及左右一班眼光短浅、胸襟狭窄之徒的造谣

毁谤，挑拨离间而被他疏远，虚居其位。原来军警同盟会的人，本来就鱼龙混杂，这时也就仗着他的信任和放纵，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弄得民怨沸腾。他为了扼杀舆论，指使部下刺杀了同盟会员蒋筠和黄家宸；封闭报馆，将主笔苏眇公抓去打屁股。这时，他几乎被权势欲驱使得忘乎所以，大权独揽，一意孤行。这样不仅在权力问题上与孙道仁、许崇智发生了深刻的矛盾，而且招致社会上的强烈反对，连在京沪等地的同乡和报界人士也对之愤慨不平，再加上守旧分子暗中推波助澜，他已经把自己推向众矢之的的位置，使得一些力图维护革命政权和同盟会威信的人也为之束手。等到岑春煊入闽，福州各界大概是念其前功，或许也是"敬鬼神而远之"吧，送给他10万元程仪，让他披红挂彩，在吹吹打打中，将他欢送至马江。从此，他再没能回到这块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

彭寿松离开福州后，先是侨居香港，后来到了北京，他不甘寂寞，又奔走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以致谤忌随之而至，于1918年6月14日被北洋政府杀害。

福建的光复，彭寿松是有大功的人，但是他不懂得怎样运作政权，由于个人权势欲的不断膨胀，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糊涂事，不仅给同盟会的威信造成很大损害，而且动摇了革命政权的基础，使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得以乘隙而入，最终连自己也以悲剧告终，原来的那些辉煌业绩，也就被冲刷得黯然无光了。

怀念我在国师读书时的几位老师

吴容甫

1943年上半年我在湘乡霞岭明德中学高中部毕业，并参加了当时全省高中毕业生在南岳举行的会考，因会考成绩优良，被教育部保送到国立师范学院，10月份我来到蓝田报到入学。当时听说教育系名教授最多，于是我选择了教育系。听了几周课之后，我发现有些教授长期留学欧美，在教育科学方面，学有专长，声名卓著，但中文基础并不扎实，课堂上竟然念白字，成语也用错。如把"赵孟频"念成"赵孟桃"，把"刚愎自用"念成"刚复自用"，应该说"凤毛麟角"，却说成"金科玉律"等等，于是我对教育系不感兴趣了。恰好当时学院对一年级各系新生举行一次国文考试，作文题是"仁者必有勇论"，我取得了第三名（第一名是国文系的刘绍东）。历届全校一年级新生的国文普考，前三名一定是国文系学生，但这一次我一个教育系新生却突破了这个规律，这便引起了当时国文系主任马宗霍老师的注意。他把我喊到他的家里，对我说："你的文章做得不错，你为什么读教育系，明年转到国文系来，不要读教育系了，那些人根本不识字。"马先生对我的赏识和表扬，使我非常感奋。马先生要我转到国文系来，也深中我的心怀。马先生说"他们不识字"，是站在一个古文字学专家的立场上讲的，显然有点言重了。我的转系对我毕业后的教书生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后来教中学、教大学都还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称职、比较让学生满意的教师，应该说是在国文系读了四年所收到的良好效果。所以我至今还怀念马先生。

我在蓝田读了一年，因日寇侵略，学院被迫迁往溆浦。在溆浦我转入了国文系。当时骆鸿凯先生为我们开《昭明文选》的专题课，有一次出了一个作文题：《读逸民传后》。我做的那篇文章，受到了骆先生的赏识，他把我喊到他家里，说我文章做得好，根底不错，鼓励我勉力向学，同时还问了一些我的家庭情况。还有一次，我在溆浦结识的一位湘乡同乡一百军军需处副官熊某死了，我作了一副挽联挽他，我将挽联送呈骆先生，请他改定，联如下：

做伴好还乡，怅望浮云频有恨；

逐波成永别，只缘流水太无情。

当时国民党部队一百军驻扎在溆浦，军部就在我们学院附近，军长李天霞喜欢跳舞，常派熊副官来邀请我们学校的男女同学去跳舞，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因为我也是湘乡人，他乡遇故知，所以我和熊某成了很好的朋友。我抽的美国烟，吃的美国罐头，都是我托他买的，或他送给我的。但后来熊某押运军需物资遇大风浪溺水死了，一百军军部开了追悼会，所以我作了挽联送他。

我至今还记得，骆先生看了我的挽联之后，非常高兴地说："做得好，情韵俱佳，窃古人之语，如自己出，聪明伢子。"

骆先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骆先生家走动的时候，看见骆先生抽的是最便宜的最差的中国纸烟，而且一根接着一根，从不间断，而我抽的却是美国的骆驼牌。于是我每次都恭恭敬敬地让他抽我的骆驼牌，谁知这样一来骆先生便视同惯常了。以后进教室上课，第一句话就是："吴容甫来了没有？"我说："来了。""拿点烟来！"于是我赶快送上一包骆驼牌。最令我吃惊的是，有一次，骆先生喊我去，和我谈了一会儿话，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我有八百租，儿子给六百，女儿给两百，你做我的女婿算了，你去问一下你父亲大人的意见。"（骆先生的女儿名式昭，当时读英语系，和我同级。儿子名公望，读中学。）我回答说："我已经订婚了，而且是指腹为婚，我的未婚妻是我的表姐。"骆先生愕然："哦！是这样。算了，算了。"过了一些时候，骆先生发现了我们班上的马积高，骆先生对积高的才学和人品非常赏识，于是要我去做介绍。我在积高面前略露口风，积高回答我："读书期间，就找什么对象。"这样一来，我就不便再提了。毕业以后，1949 年暑假期间，我在湘乡家中接到骆先生一个电报："速来。"我赶到长沙骆先生家中，一进门，发现积高早在，骆先生说他召积高来是要积高整理《文始》这部著作的稿件。他说你们同班同学聚会聚会，也是一乐。骆师母却悄悄对我说，要我来，是希望我起点作用，促进积高和式昭的感情。于是骆师母每天给我银元十块，要我陪积高、式昭去游公园、看电影、上馆子，我住了四五天就回去了。后来出现一个特殊情况，就是长沙解放了，衡阳没有解放，于是积高在骆先生家住了四十多天之久。青年男女，朝夕相处，感情的增进是与时间成正比的，终于衡阳一解放，积高就偕同式昭回衡阳结婚了。他们成为幸福的一对，而骆先生和骆师母也如意了却了一大心愿。骆先生和骆师母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先后仙逝。2002 年积高谢世，2006 年式昭继之，师友凋零，人生长恨，往事历历，犹萦心怀，特写出来以作纪念。

在溆浦，宗子威先生开《诗选及习作》。宗先生须眉皆白，精神矍铄，讲课时声音洪亮，满怀激情，讲到得意处，常常高声诵读，悠扬悦耳，满堂生辉。我

记得第一堂课他就出了一个写作题：《闻家乡沦陷有感》，我作了一首七律，诗如下：

传来胡马满江乡，怅望浮云欲断肠。

一片归心何限恨，几番使酒本非狂。

诗成已报更三点，梦醒空余泪两行。

只恐门前千树竹，婆娑无复旧时妆。

宗先生给我打八十分，改了一个字，将"旧时妆"改为"旧时黄"，并对我说："黄"字好，色泽鲜明，王渔洋《秋柳》诗："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有出处，含意较深也。

又有一次，出了个题目《咏柳》，我的诗如下：

袅袅轻烟锁嫩条，谢娘楼畔最魂销。

台城江草连堤尽，归路王孙入梦遥。

攀折已经行客手，温柔早付舞姬腰。

临风故作婆娑态，勾引春光到画桥。

这首诗，宗先生只给了六十分，并对我说："对仗颇工，用典亦妥，然言浅意豁，无所寄托，入魔道矣，慎之慎之。"

1945 年农历元宵节，学校为了释流离之恨，安学子之心，举办了一次诗钟灯虎晚会。宗子威先生出了一个诗钟题："分咏体：李斯·琴。"一个灯谜："始皇本纪"射一书名。我都作了。诗钟是："断腰犹挂千行泪，挥手如听万壑松。"中了状元。宗子威先生奖了我一册他的诗集《燕游剩草》。灯谜谜底是"吕氏春秋"，也射中了。后来宗子威先生在上课的时候，还特别把我做的诗钟写在黑板上，进行了表扬和分析，他说我这首诗钟诗味最足，对仗最工，扣题最紧，堪称佳作。特别是下联用李白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可称咏琴之绝唱。上联"断腰"切李斯事，然"千行泪"则有凑句之嫌矣。宗子威先生对我的表扬，使我对诗钟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以后我便经常去宗先生家向他请教。后来我才知道宗子威先生不仅是当时诗坛上声名卓著的一流作家，而且也是诗钟圣手。清末民初宗子威先生就曾参加过开封的梁苑诗钟社、北京的寒山诗钟社以及福建的一些诗钟社。他经常参加这些诗钟社的诗钟联吟活动，所作诗钟脍炙人口，辗转相传，群相推许。拿他自己的话说叫"无役不从，每战必捷"（《诗钟小识》）。

宗子威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专谈诗钟的文章，题目叫《诗钟小识》。我到他家向他请教的时候，他不仅给我看了有关诗钟的许多书刊和创作，而且把这篇文

章的手稿给了我。2001年我将这篇手稿整理之后，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纹史拾遗》总第44期上重新发表，后来又收集在我编著的《诗钟嗣响》一书中，而手稿我则寄还给了宗子威先生现在北京的儿子宗之豹兄。

我在文史馆担任诗词研究会会长和《楚风吟草》主编的时候，曾邀请文史馆员、长沙著名诗人举行过两次盛大的诗钟联吟活动，又在《楚风吟草》上连续八年刊登诗钟征联启事，开展对优秀诗钟的评选，参与者极为踊跃。我之所以这样热爱诗钟，大力推行诗钟的普及工作，有两个原因：一是不让诗钟这种高雅的艺术形式趋于绝灭，希望能保存和发展；二是有纪念宗子威先生的意思在内，表示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宗子威先生在溆浦去世了。先生能看到抗战胜利，这是大幸，但未能颐养天年，又令人伤感。当时高我一年的曾仲珊学兄作了一首七言长歌挽他，其中有两句："慷慨悲歌似放翁，输公及见九州同。"这两句为钱基博师所赞许和同学们所传诵。

宗子威先生去世后，在溆浦接任他教我作诗的是彭昺先生。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他为我改了两句诗，我的原诗是这样：

即席赋别同乡诸君子

大地烽烟急，相从类转蓬。

成文终有日，破浪岂无风。

款洽情犹在，切磋愿已空。

举杯无一语，强笑与君同。

彭先生对我说："你的诗，我为你颠倒两个字，就是好诗了。"他把我的颔联改成"文成终有日，浪破岂无风"。这真是点铁成金之笔。

在南岳教我作诗的是刘通叔先生（1892—1963）。刘先生开的是选修课，当时我们班上的同学一共才十五个人，只有五个人选了他的课，还经常到不齐，所以我们总是到他的住房里去上课，教学的方式改变了，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师生之间自由讨论，自由交谈。通常是我们提出问题，刘先生即时作答，有时兴起，他旁征博引，生发开去，把他研究学问的精深奥妙之处，都抖出来了。而我们学生呢，与老师促膝而坐，亲切面对，听得更加清楚，印象也就更加深刻，真有点如沐春风，如啜仙露的味道。当然，有些时候他也作专题讲授。我记得他曾经讲过《古诗十九首》、《秋兴八首》、《圆圆曲》这三个专题。讲《圆圆曲》的时候，他用《长恨歌》作比较。有人说《圆圆曲》句句用典，而《长恨歌》只有"转叫小玉报双成"一句用典，这说明白居易才有余，而吴梅村才不足。他对这个意见，

大不以为然，他说用典的多少，绝不是评判一首诗优劣的标准。在刘先生身边，我听了一年课，获益良多，至今还沾其余溉。

我在国师读了五年，经历了三个地方，蓝田、溆浦、南岳。当时正是青年时期，我的求知欲非常旺盛，我除了听国文系那些名教授的课之外，对外系那些名教授的课只要时间不冲突我都去听。我听过李剑农教授的《中国现代史》，孟宪承教授的《中国教育史》，郭一岑教授的《行为心理学》，储安平教授的《政治学》，皮名举教授的《西洋通史》，周邦式教授的《法学通论》，唐长孺教授的《中国通史》。印象最深的是储安平、皮名举、唐长孺三位教授的课。

储安平教授的《政治学》，讲的是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他将苏联金字塔式的独裁政体与英国两院制的民主政体作了对比，大大地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他写了一本《英国采风录》，在讲课时将英国的民情风俗，渗入其中，使我听得津津有味。他声音不高，但清朗而悦耳，语言幽默而风趣。仪容风度令人可敬而又可亲。但不幸的是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他如何被迫害致死，至今还是一个谜，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第二位是皮名举教授。在所有教过我的大学老师中，皮先生的教学艺术是最高超的、最好的，很难有人再超过他了。他上课从来不用讲稿，手拿两支粉笔，总是早一两分钟站在教室门口，上课铃一响，他便走上讲堂。他声音洪亮，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板书清晰端正，极有条理，至于讲的内容之充实深刻，就更不用说了。他是长沙（善化）大经学家皮锡瑞的孙子，清华高材生，公费保送美国留学八年，专攻西洋史。所以他对西洋历史有关人物事件、地点、时间（年、月、日）都烂熟于心。即使是一些逸闻趣事，掌故细节，他也能如数家珍，而且真知灼见，层见叠出，重点突出，主题明确，令人敬服。他的课最好记笔记，只要你用心记了，用心听了，考试前几乎不用多做准备了。更妙的是他把一块黑板写满，两支粉笔写完，内容刚告一段落，下课铃就响了。他说一句："这堂课到此为止。"微微一点头，就走下讲台。我进国师的时候，皮名举老师是史地系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学院院长，解放后仍在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但1957年他也被打成湖南省的大右派，含恨而终。他晚年的遭遇太惨了，以至他没有来得及写一本著作留下来。

第三位是唐长孺教授。唐长孺教授也许那时还不是教授，而是讲师，我记不清了。他的名气并不大，我去听他的课，是因为他讲《中国通史》，而我素来喜欢历史，文史又相通。史地系的同学听唐老师的课的人并不多，顶多十余人，有时只有几个人，原因是唐老师的教书效果很不好。他高度近视，带一副黑边大眼镜，背微驼，穿一件灰色长袍，讲课时，两手放在背后，身子斜站着，两眼从来不看学生，

只看黑板，对着黑板絮絮叨叨地讲起来，没有什么抑扬顿挫，讲到得意时，自己偶尔笑一笑。他对玄武门事件的真相，甘露之变李训、郑注等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软弱无能，都有很精辟的见解。我发现因为唐长孺老师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他善于从历史的缝隙中引出线索，发现问题，抽丝剥茧，查找真相。他又最善于将一些常见的或不常见的，同类或不同类的历史资料、历史事件，或对照，或组合，加以类比，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唐长孺老师成为历史学界的泰斗，治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权威，为学界同仁所钦敬。

以上所记是我六十年前在国师时的一些学习生活片断。我今年满了八十四。有些事件，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如在目前。我为自己能在青年时代受到这么多名教授的教育感到满足，也为自己能成为国师的学生而感到骄傲。令人伤感的是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那些老师一个都不在了，但我永远怀念他们！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孙立人的湘籍女秘书黄美之

崔述伟

2011年春节后，笔者在拉斯维加斯湖南同乡会会长Y先生家做客。他托我们带一些香港出版的纯文史类杂志给钟武雄先生。我随手翻了翻杂志目录，见有Y先生撰写的介绍钟先生的文章，还有一篇《烽火俪人·黄美之》，这两位都是湘籍名人。我们就是应钟先生的邀请，才赴美观光且客居其旧金山“中国海滩”旁豪宅的；而黄美之女士，几天前我刚好去洛杉矶她家中拜望过她。

黄美之（1930—），原名黄正，原籍湖南沅江，生于长沙，20世纪30年代居长沙历史街巷白果园，与“南北大侠”杜心武为邻。黄美之肄业于金陵女子大学，1949年随其家人赴台湾，任孙立人英文秘书。1950年因“黄氏姐妹共谍案”而蒙冤。出狱后与德裔美籍外交官结婚，离开台湾，至亚非数国随任，后与其夫回美定居，在美国邮局服务十多年后退休，曾任洛杉矶华人作协副主席。2000年“平反”后，以400万新台币之“补偿金”创建了“美国德维文学会”并任会长，编辑出版且资助华人作家出书。如李自健的太太王丹慧的诗，就被她收入过诗作集。其作品《不与红尘结怨》曾在中国内地出版，还著有《我的母亲吴家瑛》、《八千里路云和月》、《伤痕》、《深情》、《欢喜》、《流转》、《沉沙》等。

黄美之冤案，与蒋介石父子有关：是蒋经国一个电话，叫她去台北，被关起来并判了10年刑。其母亲的“老长官”赵恒惕找蒋介石为其求情，蒋说：“判10年嘛，就要坐10年。”“通天”反而如铁板钉钉，结果不仅未能减刑，到了后期竟被“遗忘”在狱中，反而多坐了几个星期。

这冤案，其实也与孙立人无关。黄氏姐妹是1950年被判刑的，而孙将军后来直至1955年8月才被以“阴谋发动政变”罪名革职软禁，成为“张学良之二”。黄美之曾听保安司令部两位处长说：“因为两位长官不和，所以我们受牵连。”那是指蒋经国与孙立人有矛盾。美之的姐姐黄珏曾是孙立人的秘书，而蒋经国苦追其姐未遂。黄珏去孙立人创建的青年大队任少校时，曾陪同孙立人一起接受宋美龄的视察，自恃靠山很硬，没把“小蒋”放在眼里；而继任孙立人秘书的又是

其妹黄正，当年黄家旅居屏东，黄氏“姐妹花”是万人瞩目的对象。孙立人公馆就在屏东，“花”落孙家不仅是地理使然，还因孙立人是在1937年淞沪战役中身先士卒，被击中13枪而幸得生还的抗日名将，是获得过英皇“帝国司令”荣誉勋章，以及罗斯福颁赠“丰功”勋章之“双料”国际名将。自古以来，英雄美女，惺惺相惜，“昏了头”的人又怎会看得起貌似愚憨的“太子”？1950年蒋经国打电话叫黄正去“问话”时，她还以为正好可去台北玩玩。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去不复返，立马被关押判刑。其表面原因是有一名中央社记者被查出是苏联间谍，黄氏姐妹正认识这人，被诬陷“泄露军机”。当这俩美女下到“天牢”桃园感训所时，在保安司令部上下眼中，无异于“活生生的匪谍范本”、“祸水”。真乃“凤凰脱毛不如鸡也”。

家人误解

入狱初期，黄正可谓众叛亲离，就连父母都怨恨她，以为是她连累了姐姐。父亲曾去找过孙立人，希望将军帮他女儿说情。孙立人说：“（蒋）老先生正在气头上，等过一阵子吧！我会找机会告诉他的。”后来，美之听妈妈讲，孙立人向蒋介石说：“黄珏、黄正不是匪谍，我以我的头担保。”老蒋冷冷地说：“哦，你的头就那么值钱吗？”怪不得，火上加油，还给她俩加了刑。其父受到沉重打击，在她俩入狱一年后，营救无门，引发心脏病而无望过世，临终前，不断念叨着姐姐“真可怜”，却一句不曾提及她；妈妈也对她很冷淡。双亲的误解，使年轻的美之雪上加霜，承受莫名委屈，心中苦不堪言，只能号啕痛哭。

究其原因，母亲生她时，已40多岁，因体能不足，流血过多，晕死过很久。黄家原以为其母在连产三女（黄美之排行第四）后，这次会生个儿子，从沅江老家摇着三木船的鸡、鸭、鱼、糍粑、红米、蛋送来长沙。在途中听说又是个女儿，顿时将船队掉头开回沅江了，竟连一个蛋也没留下……因此母亲对她总不喜欢。吴家瑛出身名门，与曾宝荪、向警予同学，是蔡畅母女的老师，当年周南中学的校花。20世纪40年代，中国驻泰国大使，在街上遇见黄氏姐妹，竟停车问道：“你们母亲还那么漂亮么？”吴家瑛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先驱，湖南省首位民选的女议员，坚强、能干的新女性，育有四女一子。红军攻进长沙那年，她一家避居在贫民区。奶妈有次听到枪炮声，带了三位姐姐，抱着黄美之上屋顶的阳台看热闹，因木梯已朽，奶妈踩踏一块梯板，松手掉下美之，眼看她朝楼下麻石坠落，不死即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恰巧楼下住的一位男人出屋，他以为上面掉下一包东西，伸手接住才看清，抬头向上喊道：“你们家毛毛（婴儿）掉下来了！”当时奶妈已吓得呆若木鸡。

豆蔻年华时，当连日暴雨引发山洪之际，黄美之行经木桥见水涨及桥面，竟

不觉危险及脏。她想起自己寄宿的学校洗发不便，就势跪在桥边，弯下脖子在滚滚洪流中痛快地冲洗……惊险得让人捏汗，烂漫得令人莞尔，懵懂得令人气结。

妈妈曾带着她们四姐妹乘木筏过湘江去看住在裕湘纱厂的姨妈。福姨妈神色黯然地念叨着自己失踪多年的儿子。妈妈宽慰福姨妈。稚气的美之在一旁看姨妈在火炉上煎鱼，惊喜地叫道：“呵！有两条鱼。”大姐用脚踢她，她“知错”纠正道：“呵，是一条鱼吧？”大家都不理她，继续着同样的对白。她仍站在一旁，看着吱吱有声的锅里，自言自语道：“但真正是两条鱼呀！”话音未落，油爆了。她也吓了一跳，抬头看时，只见福姨妈从腋下抽出手绢抹泪。母亲喊道：“蜜伢子（其乳名），快过来！莫在那里烦姨妈。”她才不情愿地离开，一边嘀咕：“是一条鱼不啰？”后来，上桌吃饭，她才确认是一条鱼剖成两边煎的。回家途中，她又不知趣地问何时再去看福姨妈？妈妈啼笑皆非地说：“再不带你去了，人家为了生死不明的儿子伤心，你却一条鱼两条鱼的烦人，真不懂事！”

牢中成熟

坐牢头两年，她总想不通，常常号啕大哭，哭得揪心的悲，哭得惊天动地的切，哭得一塌糊涂地让人怜。看守怕她哭，就叫她吃糖，如果还止不住，看守长就会跑来，欲盖住她哭声地大声说：“小黄，二小姐，别哭了。你想吃些什么，快写报告来。我叫人马上帮你买来。”于是，姐姐代她写报告，她抽泣着报上一大串食品名单……姐姐这才发现了为妹妹止哭的妙法。有次，她又躺着哭起来。姐姐正坐在她身边吃妈妈送来的盐水豆，见她刚起腔，连忙塞一把进她嘴里。妹妹从不爱吃豆子花生，但此刻正伤心，又懒得爬起来吐掉，就随便嚼嚼，呜呜咽咽，包口包嘴地咽下。姐姐也就这么“磨豆浆”般地，一把把往她嘴里塞。妹妹张口接着，越嚼越觉得香，哭声渐小渐无。此间，看守在门外看得有趣，自言自语地笑道：“这真有意思，妹妹张嘴要哭了，姐姐就塞一把豆豆儿。姐姐塞豆豆儿，妹妹就不哭了。”姐姐听了那怪腔怪调的四川话，笑得人仰马翻，倒在床上。妹妹却气坏了，一挺身坐起来，恶狠狠地瞪得那看守走开……从此，美之再也不哭了。

桃园感训所那潮湿黑暗的屋角里，盘踞着几只拳头大的黑蜘蛛。姐妹俩既害怕又无奈，也不敢去打。看守哄她俩说是“喜蛛”。她俩幻想提前获释……事后方知是毒蜘蛛，人若被咬即可毙命。弱女子与毒蜘蛛“和平共处”，多年相安无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美之因此而想到，当年若是去打蜘蛛，蜘蛛为了生存，也不会放过她俩。她从中悟出，与人相处也一样，“得饶人处且饶人”。她前30年经历了众多坎坷磨难，而后应从中获取教益，不与红尘结怨，珍惜生命，善待他人。

按常人常理平心而言，黄美之应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但她却淡然表示：“凭良心讲，我谢谢蒋经国先生，他把我拽出来了，不过关太久了。如果关一两年，我感谢万分。10年太多了，不过还是感谢他硬把我拽出来，因为有了感情是很难分离的。”

忘年之恋

对于当年是否真的被当成“匪谍”，黄美之说“是有人要打击孙立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女人生气、报仇，会下毒药。男人生气、报仇，会使坏，使各式各样的坏。”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告诉她，情治单位后来一直担心美国人要营救孙立人，而交代给厨师的一项秘密任务：“只要看到美国人来，就一枪打死孙立人。”

这是2010年7月，黄美之在其《烽火俪人》新书出版发行会上，向记者披露的。

孙立人直到1988年3月，才被解除长达33年的监禁，1990年辞世。又20年后黄美之才在书中描述了这段乱世情缘，原来珍藏在她脑中小小的空间里的陈年往事。她才能冷静写下“我所知道的那位将军的另一面”，并参加了孙将军故居落成暨纪念馆开放仪式。

孙立人这位安徽将领，与湘人缘分之深，不仅表现在他担任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师长时，麾下“湘军”，占了90%的比例。“一将功成万骨枯”，笔者的伯父崔继贤当年就是远征军的上尉电台台长，在野人山战役中“失踪”而尸骨无存。

孙立人1930年在南京教导总队任大队长时，认识了南京汇文女中的校花张晶英，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喜结良缘。但张晶英不能生育，后来更是皈依佛门。在她劝说之下，孙立人1952年又娶了护士张美英。张美英此后多年与孙将军患难与共，为他生了两男两女。而当年负责为孙将军挑选秘书的也是夫人张晶英，同为湘女的张晶英对黄正（出狱后其母才为之改名为黄美之）很满意，对她说：“你若愿意。我可推荐你。”年轻的黄正亲眼见到美军顾问团的女秘书们神气十足，且从姐姐口中听到对这位长官的崇拜，便很爽快地答应了孙夫人。

秘书工作无非是在孙公馆内打印文件，做请柬，整理将军的文件和照片，更使黄正加深了对孙立人的了解和仰慕。宾客来访及餐述时，还得像女主人般搞招待。这种信任和亲切感与日俱增，是外人难以体会的。而情缘的发生似乎就在一瞬间擦出了“火花”。有天，将军与黄正坐在公馆内荷花池边，他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我替你取了一个英文名字，Little，意思是小，音译成中文，里面还含有我的名字（这单词的第一个音节与孙立人的名字同音）。她非常惊讶于一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武将，竟有如此浪漫、细腻的心思，而非常感动。孙立人凝视着她的双眸，

读懂了她的内心，伸出一双手来紧紧握住了她的小手……爱情一点就燃，何况他是位成熟、成功的男人，更令她充满幻想。一天早上她向孙立人说起自己一次失败的骑马经历。将军笑道：“马是十分聪明的！人一骑上去，马就知道此人会不会骑。”说着，他竟跪倒在日式榻榻米上，两手撑地，弯着身子让她骑在自己背上。她在感到突兀之余，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父亲从未对她有此柔情，更无丝毫亲切之举，从小缺乏父爱的姑娘自有恋父情结……然而，将军是有家室的人，且长她30岁，这让她心中总有罪恶感，“清醒了，很难过，觉得不得了，（自己闯祸了！）很矛盾。”她甚至偷偷取出副官的手枪朝自己胸膛扣动了扳机，幸亏子弹没上膛……有时，孙立人会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小小，不要离开我。”她会婉言答道：“我终是要离开你的。”但她怎么也没料到，离别骤然降临，几个月的热恋换来了十年囹圄。在狱中，她固然觉得自己冤枉，但也有对爱的刻骨铭心的眷恋，想起天冷时，即使隔孙立人三四米，她也能感受到他的体温和内心澎湃，但她那时年轻，还不了解他内心的寂寞“竟是千军万马的奔腾！炮火连天的隆隆，使他更能集中心力。但有一方荒寂的心田，从来没有被他自己或任何的外力攻克过”。孙立人曾沮丧地对她说：“国家旧习不改，只怕真是一班亡国之君臣啊！”

1960年，经赵恒惕、曾宝荪、黄少谷三人作保、签字，这对姐妹才得以出狱。黄美之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感悟，“虽未能使我世事洞明，倒也了解了及时行乐”。黄美之每天下班后都要和两三女友去逛街，一直玩到半夜才搭最后一班车回家。她还热衷参加各种聚会，就是想忘却过去的不快，并在聚会中认识了美国外交官傅礼士（Fleischman），1963年与之结婚，而“逃离”台湾。

海外湘女

笔者是从成思危先生的二姐，中国驻联合国使团一秘成幼殊寄来的《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第一次读到黄美之那篇《表舅大人成舍我》的，但觉她文笔活跃，也看得出舍我先生很关爱这位外甥女，对她甚至比对她自己的儿女都宽容和大方（舍老之节俭，在中国新闻出版界是有名的）。黄美之能走上文学之路，与成老的支持和指点是分不开的。

世纪之交，黄美之将其在海外出版的作品寄赠给家乡图书馆，以及笔者本人。直到2005年时，还托人带来书信，我也托人将拙著《我与名人没有约》赠予她。但因自己已退休，便自动疏离了昔日之“工作关系”，停止联络。

2010年年底我赴美观光前，找出了一些名片，颇想看看一些交往过的海外湘籍人士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对“观光”更有兴趣，大概也是个人怀旧积习吧？圣诞前夕，我在旧金山钟武雄先生家给黄美之家拨电话时，心中犹问她“安在否？”

算来她应该是耄耋之年了。电话虽通了，受话者也正是美之本人，但她却没精打采地告知，身体不适，恐难相见。我心中颇感失望，但也理解并尊重这位美籍老人。然时隔两月后，我与同伴“自由行”住在洛杉矶圣盖博的华人家庭旅社时，同伴想去市中心，我又想起要给黄美之试拨电话。“有缘万里可相见，无缘交臂不相逢”，不妨再试一次！我向老板娘借她手机前，正听她跟她老公说：“今天要给我买花回来。”电话通后，我机灵地说：“节日快乐！美之女士……”黄美之高兴地约我去她家，待我放下电话时，同伴首先“发难”：“哎呀，没想到你在咯里还有女朋友，也是长沙的？”同屋的“美漂”们，也随之起哄调侃，我简述了黄美之的情况，众皆肃然。更有东北籍“60 后”汉良君，自告奋勇，驾车送我去黄家，一睹黄美之风韵。

既然是节日，当然要买花，但我却从未送过，更不知道买何花为妥？便向汉良请教，他说：“买蝴蝶兰吧，华人超市有。”他又在途中先带我去一浙江籍姊妹家喝茶。此君离开时方告知：“她家桌上的花，还是我除夕时送的……”怪不得他对花颇在行。

驶达黄宅附近时，离她约定的时间尚有 10 多分钟，我俩又在这优美、安静的高尚社区（法律规定“应保持其历史原貌，不得随意更改”）拍了几张照片，直到差两分钟时，我才敲门。宅门应声而开，健旺且具大家风范的黄美之笑容可掬地将我俩迎入屋内。原来，她早已在窗前伫立等候着。

黄美之指引我俩看她家人照片，告知其女一家要她去纽约长住，但她仍坚守自家，每日阅读、写作。她的新作《烽火俪人》在台湾曾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并列畅销书榜首，惜手头已无此书，待邮购以后，一定补寄给我，她又取出《沉沙》两册，题签并分赠我与汉良。

黄美之晚年生活安定、富裕，每周有政府派给的钟点工为之购物及料理生活。她从不自己做饭，每逢亲友来访，则驱车至附近最好的一家咖啡馆餐叙。“你们也是我的老友、新朋”，亦如是之，态度之亲切，令我们更添敬重。

黄美之湘音未改，说的既非台式国语，又非普通话，而是地道的长沙“塑料普通话”，这更使我惊喜、讶异不已，且忍俊不禁。

中国近代苗族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石启贵传略

伍新福

1933 年春夏之间，当时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委派历史语言研究所凌纯声和芮逸夫研究员，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调查研究，“开垦”这块被称之为民族学“处女地”的“苗疆”。正是两位民族学前辈的这次拓荒之旅，发现和起用了一位十分难得的苗族文化人，中国近代苗族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石启贵。

石启贵（1896—1959），号子荣，又名岩山、竹林居士。苗族。祖籍永绥厅（今花垣县）芷耳寨，清嘉庆年间祖辈逃荒到乾州厅（今吉首市）谋生，后定居于厅城外四里多路的仙镇营。世代务农。幼时就学于汉族私塾，民国创立转入新学。高小毕业之际，父亲病逝，被迫休学。其妻时氏，贤惠明理，积极支持他继续升学读书。后得岳父母和亲友的资助，去省城长沙考入兑泽中学（即今长沙市六中）。中学毕业后又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大学（原为群治法政专修学校）。大学毕业后，他当掉家中 30 担谷的水田，筹资远赴京城和沪、苏等地，考察游学达半年之久。学会了照相、织袜、养蚕等先进技术，购买了照相机、织袜机、卷烟机、纺纱机，还带回安徽水稻良种、苏州蚕校的“阳桑”等。回到家乡后，他演示先进技术，推广外地良种，组织开荒，种植桐茶柑橘，修建碾坊，亲自进行开发山区、发展实业的实践和实验。同时，他先后受聘任乾城县模范小学和第一女子小学教员，并担任教务、事务主任及乾城县教育干事。由他发起和组织了乾城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任常务委员，以谋求苗族文化教育和苗区经济的发展。为此他进行实地调查，多方搜集资料，开始了对苗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

1933 年 3 月，凌纯声、芮逸夫专程来到湘西，深入乾城、凤凰、永绥三县苗区实地调查。为克服语言等方面的障碍，特邀请石启贵等本地苗族人士协助工作，以备随时咨询和沟通。在三个月的调研实践中，凌、芮二位专家发现，石启贵是个“苗族通”，并且汉文知识也相当不错，对苗族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为他们

提供了大量材料。在他们离开湘西时，特将尚未完成的调查任务委托他代为办理，继续调查。同年9月，石启贵正式接受国立中央研究院的聘书，担任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从此，他"不慕浮名不畏难，芒鞋竹杖遍山间"，只身出入各苗乡村寨，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开展调查工作。"为求明了真相，考察时待人诚意，查询无遗"。"经历数年，苦心记载"，就苗族社会历史和文化习俗等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仅用汉语记录和翻译编汇成集的苗巫神辞，就有百余种、数十册之多。这些调查材料都陆续提交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6年春，石启贵调任湖南省政府参议。又先后充任专员、湘西苗族考察兼宣慰员、宣传员等。在此期间，为洞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深入了解苗族同胞的愿望和要求，他继续进行调研工作，并将范围扩大到保靖、古丈、泸溪、麻阳等各县苗区，进一步搜集了许多极富苗族文化特色的第一手资料。为了向世人展示和宣传苗族的历史文化，正确认识和了解苗族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困难处境，引起当政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以改善其政治和经济状况，求得本民族的发展，他将历年来所收集的资料，经精心翻译和整理，于1940年4月编撰成30余万字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一书初稿。此书稿对湘西苗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状况、生产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做了全面、真实的记述。他留下的《编书自感》云："编书不是为邀功，原促改良进大同。汉吏贪婪常见惯，苗官贿赂久成风。提高地位增神爽，救济民生免计穷。惟望贤能持国政，早来开化去沟通。"这正是他从事苗族研究的基本宗旨，充分表达了一位苗族知识分子的心声。后来他又分类整理和编撰了《苗医验方》、《兽医指南》、《龙廷久武术秘传》等书稿。

石启贵作为当时苗族中出现的少数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由于掌握了汉文，有较好的汉文化素养，且又具有某些近代的思想和观念，他主动融入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积极投身时代潮流；同时对自己的民族怀抱着深厚的感情，为争取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权益，为改变苗族状况，求得发展，奔走呼号，竭尽全力。在任省政府参议时，他与湘西专员公署秘书石宏规（苗族）、乾城县长刘佛林，以及苗民代表龙辑五、石达三等，共同磋商起草，代表乾、凤、永、古、保五县苗民，向湖南省政府提出《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要求省政府"关怀边疆"，"以期同跻平等"。经再三努力，得到回应。1936年7月3日，湖南省政府常会审议决定："由义务教育经费项下拨银三万元办理苗疆义务教育及师资培训"，"在合作经费项下拨银五千元，办理苗疆低利贷"。同年8月18日，省教育厅委任石启贵为"湘西苗族教育劝导员"。11月，教育厅根据省府决定在乾城县所里（今湘西自治州首府吉首）抚溪书院旧址，创办特区师资训练所（省立九师和湘西民族师范的前身）。鉴于苗区的特殊情况，12月，他又上书湖南省主席何键，请派"特区干员"协助办理师资训练所提出使用苗、汉"双语"方式教学，并请求去师资训练所任教。在担任教员时，他自编乡土补充教材，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湘西特区师资训练所，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合格的苗族师资，为苗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37年，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大会"。根据"选举总事务所"发布的消息，"国民大会"代表中，为蒙、藏民族设240个名额，指定产生，而将国民党当局自己所称的"苗、夷"等"土著民族"排斥在外，未设置一个名额。于是引起湘西苗族和西南各"土著"民族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增设"土著民族"代表名额。据1937年6月19日《大公报》报道，成千苗民聚集专署门前请愿，要求增设湘西苗族代表名额。乾、凤、永等县苗民还一致推举石启贵为代表，反映民意。6月30日，石启贵即以"快邮代电"呈书国民党中央，"恳请指定土额代表参加大会"。内政部认为"有充分理由"，批转"国大"代表选举总所"核办"。同时，湘西乾城、凤凰、永绥、保靖、古丈、泸溪等六县党部，联名电请中央指定苗族"国大"代表，并一致推举石启贵为代表候选人。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国大"一再延期，"土著民族"代表问题也就搁置下来。

1940—1946年间，石启贵又连续5次致信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社会部长、中央党部秘书长等，从苗族的历史和现状、苗汉关系、民族平等、抗日战局和人民团结等多方面陈情，据理力争，请求"国大"设置"土著民族"代表名额。1946年1月，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大"代表问题进行讨论，决定为云南、贵州、西康（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地区）、四川、广西、湖南各省增设"土著民族"代表10名，按其人口多寡分配，湖南配额一名。同年10月，经湖南省推荐，"国大"遴选代表资格审查提名委员第七次联席会议决定，由石启贵充任湖南"土著民族"代表。至此，蒙、藏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国大"代表问题得到解决。

1946年11月15日，"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石启贵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时，选举主席团。由于主席团候选人中没有"土著民族"代表，贵州"土著民族"代表杨砥中当场提出抗议，要求在主席团内增加一个"土著民族"候选人。石启贵立即起身表示赞同，并在会上大讲了一段"土著民族的历史"。其他"土著民族"代表纷纷支持，会议已失去控制。在场的蒋介石被迫出面，要原候选人张道藩退出，将名额让给"土著民族"。经大会主席孙科征询意见，将杨砥中补为主席团候选人，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在会议中，石启贵与杨砥中等"土著民族代表"联署，提交了"第五十九号提案"，要求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内补充有关"土

著民族”的条文。如：“由滇、川、黔、康、湘、桂六省土著民族按人口比例，配选代表”；“监察”、“省县制度”、“立法”各章，均得增加“土著民族得按人口比例，配选参加之”；关于“教育机会均等”一条，增加“边疆落后之土著民族，应予以机会，俾资扶植，其办法以法律定之”。会议期间，《中央日报》记者丁放怀对石启贵做了专访，以《土著民族代表的愿望》为题发表于 1946 年 11 月 19 日的《中央日报》。在长篇访谈中，石启贵披露了此前鲜为人知的湘西苗族的困难处境，历代在政治上、经济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大声疾呼遵循“国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宪法》中应增补有关“土著民族”条款。由于石启贵等“土著民族”代表的力争、宣传和沟通，引起了大会各界代表对苗、夷等“土著民族”的关注和理解，有些意见最后获得大会采纳，在“国大”制订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相应各章都增加了有关“土著民族”的条款。

1948 年 3 月，石启贵又以“边疆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会上由他牵头数十人联名，先后提出“第 315 号”和“第 316 号”提案，建议“边疆各县”，“民选县长，规定汉、苗正副名额”；设“公职通译人员”，“以利沟通，推动工作”；请设“边疆委员会（或边疆部），以利推行边疆工作”等。

“国大”以后，石启贵回到湖南，继续进行苗族的研究工作。他又编写了 40 余万字的《湖南土著民族风土纪实》，在各报刊发表多篇关于湘西苗族历史、民间文学和如何处理苗、汉民族关系的文章。

1949 年春，解放军渡江南下，逼近长沙。为避战火，他暂时返乡。同年冬，湘西解放。此时他虽身居农村，从事生产劳动，但对民族事业依然十分关注。他努力学习国家新政策，研究现代的新文化，努力为新中国服务。1951 年春，中南区民族访问团来到湘西，他受聘为顾问，积极协助访问团深入苗乡调查访问，提供材料，并计划写一部介绍湘西苗族的书稿，供访问团和人民政府参考。计划尚未实现，家乡土改，他遭到冲击。先被拘押于农会、区政府，又转解县公安局关押“改造”。他虽身处逆境，但仍相信人民政府最终会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关押期间，某负责人令他编写一本《湘西兄弟民族介绍》，他怀着民族感情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立即着手编写，倾尽全力，历时三月，在牢狱中完成了一部 20 多万字的书稿。这是一般人都很难做到的！书稿告成后四个月，当年 11 月 16 日，石启贵却被以一些“莫须有”的“罪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不久被“假释”。回到家里，百感交集。其《自感》诗云：“事与时违不自由，如烧如刺寸心头。家庭破产思归望，儿女饥号长系留。送入公安非暑夏，回来草舍过春秋。虽同共话颜开笑，无有人

家比我愁。”虽说如此，他的思想并没有消沉、停滞，仍勤耕读、勤写作、乐助人，始终怀着一种强烈的要为新中国服务的心愿。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湖南省文化局、湘西自治州和吉首县等有关部门，曾先后登门询访，他均有求必应，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资料。当他得知国家计划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后，异常激动，立即开拓新的领域，转入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短短几年中，先后撰写了《苗汉训诂学》、《苗语初析》、《苗语文法解》、《苗语声韵学》、《苗汉名词会通》、《苗文创制》、《民族速记》等十多部书稿。

在此期间，石启贵本人一再要求人民政府安排工作。鉴于他的研究和创作能力，并且“群众威信很高”，湘西自治州和吉首县也曾考虑给他做适当安排。1957 年开展“整风反右”，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开始了，一切都不了了之。1959 年 5 月 23 日，石启贵抛下未竟事业，带着终生的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

石启贵去世后，他一生所收集编写的书稿和资料，凡保存在家中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家时均洗劫一空，散失无存。仅有留在县公安局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和《湘西兄弟民族介绍》两部书稿，得以侥幸保存下来。经其后人和有关专家整理编辑，将这两部书稿合成一书，定名《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1986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问世后，立即获得各民族干部群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1990 年，吉首市人民法院依法重审“石启贵判刑案”，认定原判有期徒刑四年“属于错判”，宣告“无罪”，政治上沉冤得以昭雪。《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于 2002 年出增订版。2008 年 1 月，又列入《湖湘文库丛书》再次修订出版。这都多少可告慰石启贵先生的在天之灵！更为难得的是，早几年从网上获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典藏着一大批石启贵的手稿资料。这是惊人的发现，这些资料显然就是当年石启贵提交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经 70 多年的风云变迁，居然还能保存下来，实属难能可贵。据了解，这批资料共 101 册，内容主要包括湘西苗族“椎牛”、“椎猪”、“接龙”、“还傩愿”等祭祀典仪的全过程和“巴代”（苗老司）的神辞，以及婚丧礼仪习俗和民间文学等，全系石启贵本人的手稿，在典藏中称之为《湘苗文书》。经协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达成合作协议，台湾方面提供手稿复印本，由石启贵的后人中央民族大学的石建中、麻树兰教授等整理翻译和校注。现定名为《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共分 10 卷，400 多万字，年内即将由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石启贵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

（作者系湖南文史馆馆员）

XUBA SHUPING

序跋书评

《风雨楼诗词》自序

马积高

予自少好读诗，古今中外之作，均喜讽诵。然少年偶作，多为新体。及就读前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师友多作旧体诗词，因稍为之。然志不在作诗人，且性乐疏放，不欲受格律约束，故往往率意为五七言古诗及绝句，律诗及词则罕作。工作以后，忙于他事，殊少逸情，三十年间，几于弃置不为。既不自珍惜，凡旧作皆未尝留稿，今多忘之，偶记断句，亦不足存。

八十年代以后，初为朋友所胁，嗣以稍得余闲，所作视前较多。以才气日减，不复能滔滔汩汩，下笔不能自休，故反以律绝为主。五律简约，便于参用五古句法，七绝可效民歌，杂俗语，尤好为之。既非专攻，不暇计工拙，更无论格调，唯以达情表意为尚。押韵则兼顾南北古今，取其可通而去其绝异，聊便讽诵而已。然素不喜作寻常夸饰之语与无病呻吟之词，故所作或歌或哭，或喜或忧，大抵皆出自当时之真情实感，合而观之，可以略见近二十年来个人心迹之变迁，时世之变化亦或寓焉。因稍录而存之。然一时兴到之作，亦有书之片纸，漫不收拾，久而失之者。本以自玩，未尝概以示人，尤未尝思结集刊行。顾朋友中颇有赏之者，廖君可斌尤最，极力怂恿刊布，因就所存者略加整理，得百余首，命曰《风雨楼晚年诗钞》。

风雨楼者，余一卜余年来之寄庐也。余家旧贫，唯有山村茅屋两间。虽风雨时时入室而无楼。余既工作在外，无所用之，因举以贻吾姊，吾遂无庐，恒寄居所在学校之公寓。虽广狭偶有变易，然均为透风飘雨之平房或卑湿之底层，未尝识楼居之况味。八十年代初由底层迁居二层，始得楼居。然此楼也，虽建造不久，而迅趋窳败，门窗尤多隙，长年仍与风雨为邻。但其地傍麓山，前后颇空旷，多树木，别有佳趣，且可警予勿忘天下之贫贱，故人或不乐，吾独安之。因锡以风雨之名，且以冠吾诗。盖志吾生长在风雨之中，其诗亦多抒栉风沐雨之忧乐也。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岳麓山下风雨楼

《章士钊诗词集》前言

陈书良

一

章士钊（1881—1973），号孤桐，又号秋桐，湖南省长沙县东乡和佳冲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及学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届代表，以及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章士钊一生勤奋，著述极丰，2000 年上海文汇出版社曾出版《章士钊全集》10 卷 466 万余字，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政论、逻辑学、新闻、小说、翻译、诗词等等，博大精深，炫人心魄。我们则将章氏诗词搜集出版，以窥其堂奥。本书计收诗、词 854 首，是目前收录诗词最多的，也是大陆唯一出版的章士钊诗词集。

二

《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文心雕龙》又提出“体性”之说，诗词当然和作者的气质、性格、学养及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谈到章士钊的诗词，我以为，有荦荦大者两点需要考虑。

一为其诗词风云变幻，涵盖极广。“百年大老”章士钊一生跨越中国近现代史三个时代，是亲历五朝的风云人物。这是就时间涵盖而言。章本身就是辛亥弄潮儿，与孙中山、黄兴情谊深厚，孙中山曾说：“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与章太炎则义结金兰，情同生死。他与于右任诗文唱和，至老犹隔海相望。他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的座上宾，也担任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晚清知兵事，岑袁最有名”，他与南方霸主岑春煊更是莫逆之交，是岑的军政府的秘书长。蒋介石则尊其以陆军大学讲席，李宗仁则委其以和谈代表重任。同时，章又与共产党的领袖极为投缘，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20 世纪初就在他主编的《甲寅》杂志共事。他与陈独秀既是战友，又是论敌，而当陈危难之时，他又挺身而出，为其力辩。李大钊与他尽管个性不同，政见不一，但二人却能相

互影响，友情深厚，李大钊就义后，他为其料理后事。他与毛泽东终生保持着特殊的友谊，与周恩来、朱德等都肝胆相照，留下了许多佳话。章士钊一生交友遍天下，不仅与各派政界领袖关系密切，就是三教九流也无所不交。他同沪上闻人杜月笙“一日不得见，问讯不辞烦”，保持着终生之谊。他与大汉奸周佛海也有联系，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律师身份为其辩护。由于章士钊本质上是个文人，因此他与新旧文化名流都过往颇深。他与胡适是朋友，又是论敌，以他二人为代表的文（言）白（话）之争，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一道风景。他与鲁迅之间的行政诉讼，轰动一时，已成历史公案。但直到晚年，他还真诚地期待着，与鲁翁“待地下，笑相语”。此外，诗人柳亚子，通俗小说家张恨水，学者沈尹默、高二适、陈寅恪、刘永济等也与他有着不浅的交谊。这是就空间涵盖而言。

有着如此经历的人物，以其所历所闻所感，发而为诗词，当然风云舒卷，沧桑百景，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二为章士钊是铁杆“之乎者也”派，终生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在1925年《甲寅》的《复刊启事》中就宣称：“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后来，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中将写作白话的人骂成“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随载道行医之业”，“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如饮狂泉”，“智出英仑小儿女之下”。

章士钊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书房里从来找不到一本白话书。终其一生，除了题与胡适合影的一首白话诗外，都用文言写作。无论书信日记时评社论，无论早年的创作小说如《双枰记》，无论晚年百万字的学术著作《柳文指要》，一概“之乎者也”、“呜呼哀哉”。有这样深厚的国学根底，章士钊当然从小就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旧体诗来言志抒情。抗战时期，章士钊到桂林后与一些文化名人常相过从，经柳亚子介绍，认识了当地的朱荫龙（字琴可），并向他学习填词。朱家世居桂林，为南明靖江王之后裔。据说柳亚子五十岁才学填词，教员也是朱荫龙。在朱的指导和帮助下，章在桂林近半年的时间里填了很多词，结集《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后来，章士钊在各个不同时期始终没有放弃填词。

充分考虑以上两点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章士钊的诗词，对其大略当可理解了。其一是数量繁巨。按1941年6月1日，他在《近诗废疾》中云：

《文史杂志》记者以略布近诗为请，吾入蜀两年成诗约四千首，人未遑悉读，吾亦不知所布，或讶吾诗何夥颐乃尔，实乃诗多不啻无诗，毫不足怪。

仅“入蜀两年”，即“成诗约四千首”，那么章士钊享年93个春秋，从现存

1903年8月在《国民日报》发表《哭汪希颜》诗，到1973年4月在生日筵席后所写的诗止，长达70年之久，则保守地估计，他一生应写作了上万首诗歌。

前已叙及，章士钊从游桂开始填词，朱荫龙在《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的跋文中说，该书所收词75阕，但这是作者所有词的十之三四付诸铅椠而已。由此可见，桂游原作当在二百阕以上。以后章士钊还陆续写了一些词，如《入秦草》就收录83首，终其一生，其词作亦应当有四五百首之多。

其二是法有渊源。章士钊诗学老杜，以沉郁精严为追求。潘伯鹰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至友，潘在为章《近诗废疾》作跋云：

（章士钊诗）如杜公壮游昔游之作，乃司马自序之遗……运迁、固之笔于声韵之间，皆沉雄浩瀚之诗史也。

通读章士钊现存诗，无论其内容，抑或其艺术形式，少陵诗法宛存。应该说，潘伯鹰所云是颇有见地的。

章士钊词从朱荫龙，虽自叙朱让其遍诵唐宋诸集，但窃以为他主要还是学辛稼轩，这从他在许多词中标明“辛稼轩体”中可得明证。其词作气韵遒雄，但亦稍有不合律处。

三

据金静庵《孤桐诗稿》总目，章士钊诗词有15本，分别是：

1.《青桐吟稿》 （1902—1926年新辑）
2.《孤桐初稿》 （1927—1938年新辑）
3.《山中诗稿》 （1939年新辑）
4.《山中诗稿》 （1940年新辑）
5.《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 （1941年据刊本补辑）
6.《入秦草》 （1942年刊本）
7.《游泸草》 （1944年刊本）
8.《孤桐入蜀稿》 （1939—1945年新辑）
9.《论近代诗绝句》 （1945年新辑）
10.《章孤桐先生游台诗草》 （1948年新辑）
11.《孤桐诗稿》 （1946—1948年新辑）
12.《北行诗稿》 （1949年新辑）
13.《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 （1957年刊本）
14.《孤桐老人吟稿》 （1950—1973年新辑）
15.《孤桐联存））（新辑）

当然，除《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曾在香港印行外，这些本子都是私家排印本，流传不广，现在大多散佚了。笔者孤陋，只见到过《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长沙章先生词稿》（手抄本）、《入秦草》、《游泸草》（大同印刷社）等集的复印件。前年旅食京华，承刘凤桥先生慨然惠赐《章士钊先生蜀游诗草》、《行严心声》稿本复印本。前者存于金静庵先生《孤桐诗稿》总目，后者检其写作年代，当是从《孤桐老人吟稿》中录出，二者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就是金先生总目所列15本集子也是择要选之，章先生的大部分诗词并未曾结集付印。

章士钊诗词的唯一公开出版物是《章士钊全集》。《全集》共收入诗词397首，散见于第一、四、五、六、七、十卷。但是，《全集》刊载的诗词，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分散置于各卷，夹杂于各类文章之中，体例紊乱而不易检索。

第二，遗漏太多。本来结集的作品只占先生作品的一小部分，现收入《全集》的结集亦有明显遗漏。如1942年刊《入秦草》，共收词83首，《全集》漏收；1944年刊《游泸草》，有诗词63首，《全集》亦漏收。笔者手头的《蜀游诗草》和《行严心声》属复印手稿，当然更为《全集》所漏收了。

第三，字句误讹太多。如卷七《长沙章先生词稿》部分，可能整理者以朱荫龙先生的抄本为底本，而又对行楷辨识能力有限，几乎每首词都有误讹。如《采桑子·咏月》“尺书不寄凭卿语”，误为“只书不寄凭卿语”；《玉漏迟·简旭初》“擫笛听歌几处”，误为“擫留骊歌几处”。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令人有不能卒读之憾。

第四，标点、格式有误。可能整理者囿于国学根底，对于原抄件的点校发生一些常识错误。如《水龙吟·阳叔葆求题尊人“悔庵词钞”……》，误为《水龙吟·阳叔葆求题“尊人悔庵词钞”……》；又如《望江南·南山即事》“绝涧猿身危挂树，残山雁字懒随阳”，误为“绝涧猿身危桂树，残山雁字懒随阳”。究其原因，是因为朱在抄写时用了简体的“挂”字，而整理者误识为“桂”，忽视了这两句必须对仗这一体裁要求。

以上所叙，笔者前年拜访章士钊先生小女章含之女士（亦是《章士钊全集》的主事者）时，曾当面指出过，含之女士十分盼望笔者能整理一部较完善的《章士钊诗词》在章先生的故乡湖南出版。可惜这之后不久，一代才女便撒手人寰，这是令人至为遗憾的！

四

本书以《章士钊全集》为底本（因为这毕竟是目前为止章士钊诗词的唯一公开出版物），进行诗词归类整理。全书依时间分为五辑，每辑内大约先排诗，后排词。

如将章所刻辑集参入，则不改集内诗词排列顺序。

第一辑（1902—1938）　此一时期，章士钊辑有《青桐吟稿》和《孤桐初稿》，然二稿均散佚，辑内各诗系从《全集》和其他文献中搜集。刘凤桥先生提供的《蜀游诗草》稿本，系于此辑之后。

第二辑（1939—1941）　此一时期，章士钊辑有《孤桐寺韵集》、《山中诗稿》，然二稿均散佚。游桂时刊有《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竖行排印，共收词75首。同时还有广西图书馆藏朱荫龙手抄本《长沙章先生词集》，收词97首，大部分与前本相同。《全集》收入而讹误甚多。本书依朱荫龙抄本复印件校对订正，补充了《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所漏收。

第三辑（1942）　此一时期，章士钊辑有《入秦草》，共收词83首。章从桂林回到四川后，不久又有陕甘之行，故有这些词作。《全集》未收，今据上海图书馆藏1942年排印本录入。

第四辑（1943—1944）　此一时期，章士钊有泸州之游，得诗词共63首，学生冉仲虎为其刊印《游泸草》。《全集》未收入。现据湖南图书馆藏大同印刷社本补入，删去了原本后附的潘伯鹰所作20首词。姨母刘茂新女士检出章士钊寄刘永济先生诗词18首，皆为《全集》所未收，依写作年代系于本辑之末。

第五辑（1945—1973）　此一时期，章士钊辑有《孤桐入蜀稿》、《论近代诗绝句》、《章孤桐先生游台诗草》、《孤桐诗稿》、《北行诗稿》、《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孤桐老人吟稿》。现除《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收入《全集》外，余皆不可见。现将北京刘凤桥先生提供的《行严心声》稿本与零碎搜集的本时期章作系于《南游吟草》之末，编为是辑。

以上五辑，合计存诗词854首，当然只占章士钊全部诗词的十分之一。但是，《全集》所收诗词，已经是迄今收录最全的章士钊诗词集了。

五

中国文化非常讲究缘分，细细想来，自己整理《章士钊诗词集》也是有缘所为。

首先，章先生不仅是我的乡先贤，而且与先伯外祖刘永济（宏度）教授是朋友。刘永济先生《诵帚庵词》中屡有提及，如《鹧鸪天·寄怀孤桐重庆》“老去填词韵最娇，嘉陵如画且逍遥。垆边可有人如月？酒里何妨句满瓢”；又《鹧鸪天·孤桐寄示齐天乐词》“云山人望同青眼，烽火相思并白头”，就记叙了他们深厚的情谊。章士钊先生诗词中亦有记录。如《东风齐着力》“六桥何处？红豆也堪嗟！乱后居然邂逅，终不算，诖误烟霞”，“红豆”下注：“谓刘宏度”。姨母刘茂新检出的章寄刘诗词稿，走墨行锋，情思奔注。我现在整理章士钊诗词，摩挲着

尘封的复印件，常常如饮醇酒般进入一种感情微醺的境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受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章士钊卷》，曾到北京搜集资料，在金台路拜访过章的公子章可先生，也在史家胡同受到章含之女士的盛情接待。如今，他们的书信还在，但已人天杳隔，时间一晃又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十年前的 1998 年，因为脑疾，医嘱暂停学术研究，我就写文学作品遣兴。我写的就是文学传记章士钊传，书名《寂寞秋桐》，长春出版社出版，当时上海《文汇报》等还逐日连载，还在全国第十届书市上签名售书。

前年，受《湖湘文库》之委托整理《章士钊诗词集》，我与夏剑钦先生去北京史家胡同章宅拜访章含之女士。含之女士抱病出见，依然风华绝代，对笔者的工作满含热望。以上是我独坐灯阴所回忆的断续前尘缘迹。至于对章士钊诗词本身的评价，我则从略不从详，只引述了潘伯鹰先生的话，而不敢多加置词。我想起了 1987 年，在花气袭人的羊城，华东师大教授、辛亥老人苏渊雷先生对笔者讲的一段话："章行严搞学术，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凯，又讨袁反袁；不加入同盟会，又冲锋在前。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独立精神啊！当时国家多难，读书人多以国事为己任，章太炎、刘师培，包括我自己，都如此，今之学者何能厚非呢？"苏先生当时从口袋中掏出一小瓶酒，呷了一口，用手理了理雪白的头发，感慨地念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这段话曾收录在 1998 年出版的《寂寞秋桐》中，谨以之作为前言之结语。

由于刘凤桥先生提供的稿本复印件，有些行草字迹难辨，兼之笔者学识浅陋，虽勉力为之而不能尽如人意，鲁鱼朱亥之处尚乞读者指正。

此外，本书在材料搜集上得到姨母刘茂新女士、北京刘凤桥先生、湖南商学院丁仕原教授大力帮助，仕原兄近年致力"章学"，惠我良多，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8 年岁暮于长沙听涛馆书寓

南台寺宝昙大法师纪念碑铭（并序）

伏家芬

南台古寺，曹洞祖庭；六朝遗庙，奕代丛林。昔闻梵宇塔婆，今见高僧新冢。盖衡山瑞应峰下，近筑佳城吉壤者，乃我南台寺方丈宝昙大法师，蕴真埋照之所也。师俗姓赵，讳敦煌，字德昌。以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湘乡巴江之荆泉村；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五日在长沙圆寂，享年八十四岁，僧腊七十五秋，戒腊七十一夏。生而鲜衅，夙遭闵凶。岁半慈母见背，七龄伴庙乞斋。九岁，在南岳后山野鸡潭，礼镇宗上人出家。十岁，依白云寺省吾上人剃度。一九三八年在上封寺受具足戒。一九三九年入祝圣寺佛教讲习所读书。于时，日寇侵华，抗战军兴。十六请缨，胜似终军之弱冠，童年投笔，甘当赴敌之汪奇。新中国后，或参加僧尼生产自救，或回乡种田，农禅自励，功用同修，昼则力耕，夜仍礼佛，晏如也。一九五七年，厄逢丁酉，众口铄金，十年浩劫，殃及僧伽，明哲淡定，信念弥坚。一九八二年，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一九八七年，出任南台寺方丈。其后，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任。曾在南台寺两次举行传授三坛大戒盛典，一时海内外前来求戒者，摩肩接踵，盛况空前。一九九四年，应日本佛教界邀请，弘法利生，为中外宗教文化交流，谱写华章。先后在南京栖霞山与南岳讲习所等地讲学。谈经入妙，禅理贯通，四众弟子既得真修，各方信士同沾教泽。一九九九年，其文集《羊肠小道一僧来》出版，阐幽谈玄，深获好评。一生曲折迍邅，爱国爱教，高风亮节，果满行圆。遗训遐宣，微言广被。然其忍辱负重之衷，苦行薰修之德，则非浅人所能喻焉。铭曰：

伏惟上人，起自羊肠，天道酬勤，终履康庄。胜因早植，慧果其偿。传灯飞锡，中外名扬。薪尽火传，妙谛遐昌。衡岳苍苍，湘浦泱泱，千秋风范，山高水长。

《湘雅摭残》序

熊治祁

历代湖湘人士创作的诗歌，自清以来，热心于地方文献的人士编过好几种总集，其中最具文献价值的要数邓显鹤（湘皋）历时二十余年编成的《沅湘耆旧集》。共收录作者2000余人，诗近18000首。但邓氏完成此书在道光二十三年，不收生人之作，故尔后又有若干人士着手编纂该书的续集。醴陵张翰仪的《湘雅摭残》（以下简称《摭残》），即是其中的一种。

《摭残》共收录作者634家，诗近8000首，亦不收生人作品。时间起自清道光末，迄于抗日战争之前，跨度近百年。编者初辑此书时，欲仿效邓氏编例，称为《沅湘耆旧集续编》。后抄稿毁于祖龙，乃拾余烬，易录成集，改称现名。

在这近百年的时间内，湖湘地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群体，即以本书收录的作者而论，就有魏源、贺长龄等积极思变的经世派，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黄兴、宋教仁等辛亥革命人物。这些人才群体及团结在其周围的人士，不但在举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纵横捭阖，在学术文化上也异常活跃，湖湘文化由此获得空前的繁荣。即于文学创作的诗歌一途，也出现了在全国颇具影响的湖湘诗派，涌现出王闿运、易顺鼎、邓辅纶这样的名家和大批的诗人。可以说，这一时期湖湘人士的诗歌创作，是自明以来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流派众多，题材广泛，尤不乏感时伤事、忧国忧民之作。《摭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近百年湖湘诗歌的概貌。

该书编选体例是每位作者系以小传，但不全仿《沅湘耆旧集》。一般是小传在作品之前，亦有在后者。小传极简要，对其人其作亦多有评点，评点有时也写在某诗之后。总之，体例不是很严谨。诗题之前，往往有“喜其”、“其”等字样，题后则均有“云”字。这次出版，均已删去。

从编者《弁言》及书中自叙搜访文献的情况看，编成此书，殊属不易。从所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该书也的确是一部极具文献价值的诗歌总集。

编者特别重视收录散佚之作。如卷一谓“湘潭吴淞……所著之《小山房诗稿》，

今已散佚。丁丑岁余摄篆湘潭，承后嗣子弭参军抄示……”卷二谓常太淳诗文遗稿佚而莫得，“仅由老宿传颂《中秋登石鼓合江亭》”。卷九谓：“丁丑余权湘潭，承邑绅王伯良剡抄其父（王）任之遗诗数十章见示。”卷十六谓：“余权长沙时，遍搜吴雁舟师、章缦仙主事、黄次如侍御遗诗，卒无所获，殊为耿耿。及移守郴江，适长沙粟墨庵丈避倭氛于此，承诵述数章，喜出望外，亟录之以永其传。”类似的情况，编者提到的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引述。总之，《摭残》中相当数量的诗，是赖编者的辛勤搜集才得以保存至今的。

此外，编者不因作者声名显赫而多录其诗，更不因作者名气一般、诗作较佳而吝惜篇幅。如曾国藩仅录12首、彭玉麟仅录7首、贺长龄仅录2首。而岳阳孝廉毛贵铭、长沙进士黄兆枚、湘阴潦倒举人吴淮却分别录入18首、25首、23首，并给以相当高的评价。

上述编者收录作品的做法，继承了邓显鹤编纂《沅湘耆旧集》的主张：一以遗佚而存，一以能诗见录。其用意是既注重保存文献，又注重文献的价值。

除诗以外，《摭残》也收录了一些词。邓显鹤的《资江耆旧集》不收词，《沅湘耆旧集》前编附收了少许，但本编中王船山、张九钺等有词集行世者却又未附。《摭残》不将词列入附录一类，与诗同等对待，有异于邓的编选原则。湖湘地区自宋以来，词学一直不甚发达，晚清时期才产生了一批作者，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王先谦有感于此，乃选《诗馀偶钞六家》，收孙鼎臣、周寿昌、李洽、王闿运、张祖同、杜贵墀六人之词，是湘籍人士词作较有影响的一个选本。张翰仪可能因为有这个选本在前，六家词仅张祖同一人选录了3首，其他如易顺鼎、陈锐、姚肇椿、周家树等亦工于词者，则俱有收录。张氏于词，似偏重豪迈之作，故所选多为此类。其评语亦可见其偏好，如评陈翰词《金陵怀古调寄春从天上来》：“淋漓悲壮，真有洗马对此茫茫之感。芦沟事起，大好国都，又沦于异族，读此益增凄惋。”又如评周家树《临江仙·日本归舟》：“尤见豪宕之气。”又如评陈云鹏《沁园春》：“一气写来，自然豪迈。”可惜全书录词仍不够多，如王以敏、程颂万、程颂藩等有词集刊行者，均未收入其作。

《摭残》对作者和作品的评价虽多溢美之词，但也不乏中肯之论，显示出编者具有较深的诗学修养。如评邓辅纶：“全学《选》体，多拟古之作。王湘绮以为一时罕有其匹，盖与之笙磬同音也。”又曰：“诗皆根底曹、谢，趋步少陵。朴茂沉雄，尚能具体，惟轩爽或有未逮也。”又如评曾国藩：“乾嘉以来，湘中诗人，皆以学杜甫为面目，文正独以山谷倡，骚坛风气，即渐由唐入宋矣。”再如评陈锐：“五古及五律，固奇芬洁旨，抗古探微，近于湘绮一派，而七言律亦

清脆不凡也。其词追摹二晏柳周，入其堂奥。”这些评论，皆非熟玩其作，深谙文坛史实者不能道。

由于《摭残》的编选仅靠一人之力，且时局动荡，兵燹连年，搜讨不易，编者又“浮沉宦海”，故难免有所缺失。

编纂《摭残》这一类的书，除了搜访作品之外，还有一项艰巨的工作，那就是确定选目。从某人几百首甚至几千首诗中，精选几首或几十首，的确是颇费踌躇的事。总的来说，张氏选录作品还较有分寸，多数作者入选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较为得当，但不妥之处也时有所见。如该书选李星沅诗17首、郭嵩焘诗17首、王先谦诗32首（全书入选数最高者）。相比之下，于自称“十年摇笔三千首，赢得人间号海翁”的汤鹏，仅选收10首，于“颜谢风华少陵骨”（王闿运语）的邓辅纶，仅选收7首，于“湖湘诗派”的首领王闿运，也仅选收15首。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说明编者对作者的评判还略有偏差。入选作者的一些代表作，该书也往往漏选。如王闿运的名作《圆明园词》、邓辅纶描写民生疾苦的《述哀》、何绍基“奇思破空，可称杰构”（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的《飞云岩》等，都没有收入该书。

此外，该书对作者的介绍有时也极不全面。如梁焕奎小传：“湘潭梁焕奎孝廉，字辟园，号青郊居士。晚年双目失明，以礼佛吟诗自遣。诗皆授人代录。所著《青郊诗存》，义宁陈散原序，许为声名百代。”梁是湖南卓著声名的实业家，小传却只字未及。又如杨度小传：“杨度字皙子，湘潭人。博学多才，清末由举人官至候补四品京堂。晚年浪迹京沪，抑郁以终。”如此简约，殊不洽杨度其人之身份。

但是总的来说，此书仍是继《沅湘耆旧集》之后，收录湖湘地域诗作最多的一部总集。编者用心之良苦，搜访之辛勤和该书的文献价值，都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现在《湖湘文库》重新编印此书，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到。岳麓书社1988年出版此书的标点本时，后记中有如下一段话：

抄本原署“醴陵张翰仪莼安甫编”。但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有几位同志反映：张氏在《弁言》中提到此书原名《沅湘耆旧集续编》，这与已故湖南大学教授刘善泽（腴深）先生所编的书稿同名；《弁言》中所述的编辑缘起和体例，也都与刘稿的缘起、体例相近似。他们指出：刘稿于抗日战争期间被其友蔡渔春借去后，未及归还，蔡即病故，而蔡、张有同窗之谊，当时亦常有往来，张有可能向蔡转借刘稿，为己之用。又据湖南图书馆同志鉴定：张书抄本，其《弁言》落款和某些卷次下的编者姓名均有挖补痕迹。因此他们怀疑：张氏此书非出自己作，而为了掩饰起见，就在书中故意更改和增补了一些内容，并将书名改为《湘雅摭残》；

至于《弁言》所称原稿毁于长沙大火云云，亦可能系造作之辞。

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对此，章曼纯先生撰有《〈湘雅摭残〉编者考》（载《图书馆》1995年第3期），弘征先生又撰有《〈沅湘耆旧集〉和续编的锺继与劫尘》（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9年第5期），二文根据多种文献资料和湖南省图书所藏《摭残》稿本情况，力辩该书为张翰仪编纂，引证有据，言之凿凿，令人信服，本文不再引述。

张翰仪，字莼安，又字若荪。民国时期曾任长沙、湘潭、衡阳等九县县长，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也在军队中任过职，为南社湘集成员。《南社湘集》载有其诗16首，文8篇。其《英陂道中》云：

一路行经处，霜枫红欲燃。

鸦寒催晚渡，马倦怯吟鞭。

爱国惭无补，忧民幸有年。

采风诗未就，惆怅暮云天。

格调老成，遣句亦属工稳。读此可知其虽身为军人和政府官员，亦确系风雅之士。

前文提到若干湖湘人士都热心编纂过《沅湘耆旧集续集》，除张氏此书之外，其他续集的情况亦关乎湖湘风雅，兹略述如次。

最早编纂续集的是邓显鹤本人，但未完即身故，稿本难考其去向。以后郭嵩焘等人为编续集，专设了“局”。《郭嵩焘日记》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曾记载杜贵墀（仲丹）将收到的诗集交予该局，此“局”可能是相当于现在编委会一类的机构。傅熊湘《钝安脞录》卷一对这个续集有较详细的记载：“《湘沅耆旧集续编》……其事始于郭筠老……未几筠老归道山，（周）铣诒竭其先后数年之力，至乙未岁冬始克竣事。”但此书亦未能刊行。傅氏称曾收得一匿名邮缄，谓续集现存易培基处，约数十巨册。又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谓：“笠樵（周铣诒字）没于辛亥后数年，稿藏未刊，为易寅村所得。”两说相合，当属可信。那么未刊稿究竟现在何方？漆永祥先生有《〈沅湘耆旧诗集续编〉及其编纂者小考》一文（载《文献》2007年第4期），言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曾亲见该续编抄稿本。漆先生认为，此即郭、周所编的本子。据文中所述抄稿概况及漆先生的考证，其说较为合理。至于此抄稿本是否与邓氏续编稿本有关，抑或是在邓氏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笔者认为还可以存疑。《湖湘文库》编委会曾联系东亚图书馆，拟整理出版，终因多种原因而未果。

《钝安脞录》卷一还提到另一续编：“又先师吴称三先生德襄，有道咸同光

四朝诗钞，都十余册，亦名《沅湘耆旧集续编》，盖承筠老之属而为之者。原稿向在余处，惜毁于民国六年七月长沙日报之火。”

至于前引《后记》中提到的刘腴深先生续编稿本，并未毁于长沙大火。先生《天隐庐诗集》卷十有《戊寅九月二十一夜长沙火》一诗，只字未及此事。而以后所作《忆沅湘耆旧集续编》（并序）则明言因“兵燹散失，怆深于怀”。

综上所述，益知《摭残》为海内仅存的一种《沅湘耆旧集》续编本。世易时移，文献流失，抢救传承，今人之责。此书修订再版，诚为幸事也。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谢华与《湘西土司辑略》

伍新福

谢华（1895—1987），原名兹山，号仲池。衡阳南乡六塘（今属衡南县）人。县立中学肄业，靠自学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写作能力。曾在衡阳、长沙、郴州等地创办《护法报》、《湖南时报》、《民言报》等，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1925年在广州考入廖仲恺为所长的宣传员养成所。同年加入共青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在上海、广西、江苏、湖南和西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宣传活动，并三次赴延安。1939年，在延安任留守兵团司令部秘书长。后调入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参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又撰《中国史讲话》，供干部阅读。同时，撰写和发表了《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提纲）》等论文。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志编委会副主任、副总纂，兼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所长、省文史馆馆长。曾主持编写出版《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和《湖南省志·地理志》。在省委统战部任职期间，参加中南民族访问团和中央、省、州关于土家族联合调查组，多次赴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他收集和查阅了大量的史志和谱牒资料。“小辞抄摘之烦”，“汇而辑之”，加以整理，编撰成《湘西土司辑略》一书。晚年还撰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质疑》、《论西周封建》等文。

《湘西土司辑略》，最初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以单行本出版。1989年，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华集》。现重加编校，辑入“湖湘文库”与《楚南苗志》合集，2008年10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全书共设六章，前置“序言”，后作“结语”。第一章，简述“武陵郡”和古代“五溪”的地理范围及唐宋前“蛮”人在这些地域的活动和分布状况。第二章，江西“赤石蛮”、湘西土司之祖彭氏兄弟生平和唐末起兵及入湘归楚的史料。第三章，五代时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溪州之战”的史料和“溪州铜柱”铭文。第四章，彭氏下溪州及所辖二十州和永顺、保靖二司及下属土州、长官司的世系承袭，

和征调攻伐事功。第五章，桑植司和柿溪司及上下二峒长官司的有关史料。第六章，有关土司制度和土司统治状况及改土归流的一些史志和文档资料。

该书以土司世系为经，按朝代编年纪事，首次理清和记述了湘西地区土司的源流和发展的基本线索，使湘西土司史轮廓粗具，在民族史和湖南地方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特别是在资料方面，除检索摘编各代正史有关湘西土司的记载之外，尤着力于收集整理湘西有关各县已刊和未刊的方志，和彭氏土司后裔所纂的谱牒资料，以防“继续失坠的危险”，补正史关于土司事迹记载之不足，“纠史传紊乱之弊”。这更是该书价值之所在。虽然，作者在50多年前所收集和征引的各县已刊、未刊的方志，如永顺、龙山、保靖的府、县志，修承浩的未刊《沅陵县志》等，大多还是流传下来了。但当时尚能见到的彭氏土司宗谱和家谱，后来大多都已遗失无存。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数次赴永顺、龙山、保靖等地调查，就只能找到极少数谱牒残本了。所以在研究有关史事时，常常得助于《湘西土司辑略》所保存的资料。作者利用所搜集的谱牒和方志资料，确实也起到了补遗纠误的作用。如《明史·土司传》记载：明宣德四年（1629），保靖宣慰彭大虫可宜，因杀前宣慰彭药哈俾，事发被逮问，死于狱中，彭勇杰嗣位，再传子彭南木杵。但据志谱记载，保靖宣慰使承袭世系中并无彭勇杰，南木杵也非其子，而是宣慰彭勇烈之幼子、被杀的药哈俾之弟。袭职时间为宣德五年，即大虫可宜死后的一年。药哈俾被害，弑篡者大虫可宜亦死，由药哈俾之弟袭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显然志谱的记载是符合史实的。又如，保靖宣慰彭荩臣卒后，由子守忠袭职。但当年又病卒，而其遗腹子养正还未出生，故由荩臣妻白氏代署司事，历十二年，并以政绩突出获朝廷嘉奖，然正史不载。本书作者据谱牒资料，特于保靖宣慰世系中增列彭白氏，述其事功。这就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此外，本书所辑入的一些铭文、碑刻、抄件等，也颇有价值。如《明溪新寨题名记》、永顺宣慰彭宏海《德政碑》、明洪武皇帝给保靖宣慰彭万里的“敕谕”、南明永历元年（1647）给保靖宣慰彭象乾的“勤王”敕文，以及宣慰彭鼎的《自叙》和《墓志》等，均不失为珍贵的资料。

《湘西土司辑略》，虽以资料的搜集整理为主旨，作者自云“论述未备”，但对某些史载存疑或说法相左的问题，还是进行了必要的考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关于敖骈围赤石，史志中有两说，一是马殷发兵救彭瑊于赤石，彭瑊遂归楚；一说是彭瑊率部由辰州驰援赤石，结果“合门遇害”。经分析比较，作者以前说为是，认为后者不符合历史实际。又如据有溪州的彭氏，从彭瑊到彭士愁只是两代，但《溪州铜柱铭文》却记为“历三四代”。作者依据谱牒记载，认为在彭瑊进入溪州前，

溪州地区的“老蛮头”吴著冲等已延请江西彭氏为“助理”，所说的“三四代”应是包括了彭瑊之前的彭氏“助理”。这一见解，自成一说，颇有启发性。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重刊康熙《岳麓书院志》前言

邓洪波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背负灵麓，前带湘江，左拥凤凰，右揽天马，苍山碧水相映，茂木清泉交织，幽静闲旷，风景独好，诚为湖湘第一书院，天下读书圣地。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976），甫四十年，即以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等规制齐全，山长学行兼善，生徒达至数百，而得宋真皇帝召见山长、赐额、赐书之嘉奖。于是，鼓笥登堂者不绝于途，称名遐迩。又依三舍之法，而居潭州州学、湘西书院之上，以“潭州三学”积分升等之式而确立地方高等教育中心地位。南宋前期，张栻主教，朱熹讲学、更建，更使其成为湖湘学派基地，全国四个学术中心之一，生徒云集，致有“书院一千徒”时彦流传，可谓盛况空前。从此，弦歌相续，学脉绵延，历宋元明清而迄于今，成为举世罕见之千年学府。

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编辑刊刻史志，实乃千年学府优良传统。自明弘治十八年（1505）刊印《岳麓书院诗集》、正德九年（1514）刊刻山长陈论《岳麓书院志》十卷始，历明清两代，近四百年间，院志辑刊，连续不断，计有嘉靖七年（1528）刊知府孙存《岳麓书院图志》一卷，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知府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十卷，崇祯六年（1633）刊山长吴道行《岳麓书院志》十卷，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同知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八卷卷首一卷，同治六年（1867）刊山长丁善庆《续修岳麓书院志》四卷卷首卷终各一卷，同治十二年（1873）刊山长周玉麒《岳麓续志补编》一卷，光绪二十二年（1896）以后刊山长王先谦《岳麓书院记事录存》一卷。

以上所列，弘治诗集和正德、嘉靖、崇祯三志，已不见传本，万历志遂成现存最早版本。此书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实属海内仅存孤本，弥足珍贵。可惜刻似书帕，且字迹模糊不清，间有脱页倒简，难以卒读。其余各志，后出转精，其中尤以康熙志既据崇祯志增删厘正，尽收明志精华，又组织同纂、司辑、参订、考订、参考者百余人广为征辑搜讨，细为雠勘折中，而得称作精品。

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收入《四库全书总目》，题作《岳麓志》八卷，记其成书时间为康熙丁卯（二十六年）。自此，各书著录皆作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刻本，其实不然。今查卷七就收有赵宁自己十七年三月所作《自卑亭记》，故其刊刻时间，至少也得记作康熙二十七年。

康熙岳麓志至少有初刻本、增补重刻本、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刻本三个系列传世。初刻初印本已难觅踪影。今湖南图书馆等处所藏初刻本，又分黄纸本、白纸本两种。黄纸本扉页模糊，顶框上有“丁大中丞鉴定”六字，刊印在前。白纸本扉页清新，顶框无字，以其不再打巡抚丁思孔招牌推测，其刊印时间在后。黄白两本扉页皆标记“镜水堂藏板”，且卷首各序或手书或大字，正文字体细长，版面则多有破损漫漶、模糊难辨者，显然已非初印本。增补重刻本正文字体略显方粗，且卷首各序不再用大字或手写体，而改用正文字重刻，以省篇幅。此本亦分两种，通行者遑且不论，罕见者扉页隶书“岳麓图志”四大字，左侧有“本院藏板”四小字，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咸丰重刻本卷七收有湖南巡抚陆燿乾隆四十九年（1784）《请广书院名额流》，实则以增补本为底本。故世所流传者，大多为增补重刻一系，初刻本已为难得一见之物。

此次整理，以各家所藏康熙志初刻本汇校，采用现代电子技术，清除糊漫，厘正倒脱，挖移配补者数千上万处，虽有数十处初刻本无法配补者，不得不用增补重刻本替代，但就整体而言，已近初刻原貌。此所谓百衲千衲而成善本，若得认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则不惟岳麓之幸，且更为整理者之大幸也！

邓洪波谨记于岳麓书院。时维二〇一〇年三月，岁在上章摄提格嘉月。

MINSU FENGQING

民俗风情

高椅窗棂中的神秘文化

李湘树　杨砚池

在那充满着种种神秘事物的苗疆深处，高椅这座小村落，藏身于雪峰山脉群山之中，凭临巫水而立，纵观天下之变。久月经年，元明清三朝更替，从高椅走出了进士、举人、贡生、千总等文武人才共 293 人，新中国成立前高椅当地三百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余户人家是地主。而这些历史，都静静伏在高椅一座座明清古建筑的窗棂为它所构筑的城堡里。每一扇窗棂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扇窗棂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当我们顺着窗棂的指引走近一座山村一个家族时，可以感觉到历史深处的气息从那些窗棂每一笔雕饰的纹路里升腾起来，在窗棂上斑驳不定的光影中飘浮，几百年来高椅杨氏的记忆，飒然而至，借着那些窗棂还魂，向来人倾吐着高椅杨氏的家族秘密。

高椅杨氏与窗棂文化

高椅属苗疆，这里曾是中国“巫傩文化”盛行的重要地区之一，道教里的重要工具“辰州符”、“辰州砂”的发源地，在高椅附近的高庙，曾出土过 7000 多年前的太阳鸟陶纹，而在高椅当地生活的侗族，很早就有了比较系统的宗教文化，侗族的鸟图腾崇拜在侗族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杨氏得姓于周成王姬诵“剪桐封弟”时，杨氏源姬姓王族，姬姓是黄帝之后，崇龙。我们可以想象，在高椅杨氏还没有迁入此地甚至还没有产生杨氏时，春去秋来，高椅的侗族等少数民族先民就已经在当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崇鸟尚巫，生活自成一体。直到南宋隆兴元年（1143）高椅杨氏的先祖通碧公辞官，走上了为寻一块风水宝地定居的道路，前后五代人花了 124 年光阴直到元代至元四年（1267）选择高椅定居，杨氏与高椅，才开始了命运的相逢，并从此如同一个锅里的锡与铅一样，彼此同化，诞生出了高椅杨氏，和高椅当地神秘的明清建筑群。

高椅杨氏先人，以“意”与“象”结合的思维模式，以易理和阴阳协调的原理，加上他们对杨氏宗族未来的美好期望和当地原产的宗教文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椅窗棂。窗棂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局部处理，高椅杨氏先人都在不断

运用那些他们带来的文化和当地文化结合的产物，强化着窗棂的宗族文化、宗教文化与艺术内涵。

雕刻象征物在窗棂上的原因

高椅杨氏先人希望将鬼神的神力以这些象征物作为“符号”来附在所居住的建筑上，以达到趋吉避凶、化煞、驱虫蛇的作用。能说明高椅杨氏先人雕刻这些象征物的原因的是各教派里的“符”、“咒”、“印”。

符，代表灵界公文和法规，能请神送鬼；咒，通灵的密码和号令，能震慑鬼神；印，就是用手指结阵，五指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能变换出无数阵法。

这三者，都是用象征的手法来达到与鬼神沟通的目的。高椅杨氏先人正是按这个道理，将各种象征物雕刻在窗棂上作为符号来达到自己的意图。



但是，还有些象征物并不涉及鬼神，而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些象征物就不是出于上面那个原因而雕刻在窗棂上了。比如“一鹿蜂猴”这一雕饰，是借谐音来表达希望家里读书子弟能“一路封侯”官运亨通，同时，还能起到心理暗示作用，住在房子里的人出入时都会看到这些提示，让人时刻不忘。能起到同样作用的还有“刀剑笔筒”，象征文武双全，同时又警示后人不要松懈，要加强对自身的修炼。还有象征科考的“连中三元”，象征丰收的各种蔬果等，在表达美好愿望的同时，也起到了类似座右铭的提醒作用。

高椅窗棂中的凤比龙多

我们在高椅当地找到了 22 所保存较完好的明清建筑，从这 22 所建筑里的窗棂上我们统计出凤凰共出现 134 次，而龙仅出现 45 次。而且凤较龙在窗棂中被创作者放在了更加显眼的位置，龙往往起拱卫、衬托凤的作用。这和汉族文化中“龙凤呈祥”的观念是有出入的。

且所有龙都不是汉族古建筑窗棂中常见的龙，而是被当地人称之为“草龙”的蛟龙，在云南东南亚一带叫做蟒龙，在风水上一般来说它的寓意和作用就是两个：求雨和祭祀。当地人将汉族建筑中常用的龙称为“水龙”。



出现在高椅窗棂下方的“南方草龙”



荆州楚墓中有出土的“双凤鼓架



长沙陈家大山楚战国墓“人物龙凤帛画

在高椅窗棂上凤凰出现的频率是龙的三倍以上，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宗教原因。如前面提到的，在高椅附近的高庙就曾出土了有着 7400 多年历史的“太阳鸟”陶纹，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锦衣上绣有“太阳鸟”，在右袖上。在马王堆的帛衣中，两袖右日左月，满身用龙装饰，来衬托日月。月中的图案因为衣物破损无法看清，而日的凤则非常清晰。日和龙的地位在中国文化中自然是日要高，而居于日中的凤的地位自然也因日的地位水涨船高比龙高了，龙在衣服上定位于衬托装饰的地位。



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帛衣

在双凤鼓架中，双凤踏虎，虎是极威猛的动物，战国四川地区的巴人甚至将虎作为图腾来崇拜，可在这里却是凤的脚下降物。而鼓者，礼乐之器，用凤来背，可见凤在楚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长沙子弹库楚战国墓“人物御龙图”

在这幅画中是既有龙又有凤的，可画的中心位置画者却留给了凤，龙又居于被凤驱使的地位（仅出现在画的左边一线，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掉），被描画得身体细小，凤却被描画得华丽有气势。从画者的“偏心”中我们也能看出龙凤两者在当地人心中地位上的差别。

在这幅画中同样也是龙凤一起出现，但在此图中龙成了被御的，也就是拉车被骑的坐骑，而凤却高坐在龙尾处，姿态悠闲。两相比较，龙凤的地位差别不说自明。

从上面几件文物中都可以看出，凤鸟（太阳鸟，又叫金乌，与凤同）都居于主要位置。楚文化崇凤而不崇龙，这些都说明在南方在高椅，凤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高于龙的。而且，文物中的龙都不是北方所绘的那种威猛的龙，而是细长的，作为从属的龙。关于楚文化中龙凤崇拜的差异，林河先生在《中国巫傩史》中作了详尽的论述，但是，林河先生认为楚文化与南方巫傩文化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我认为这个结论有欠考虑。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与后面杨氏到高椅后的文化有重要联系。我认为，楚文化与巫傩文化是被同化与同化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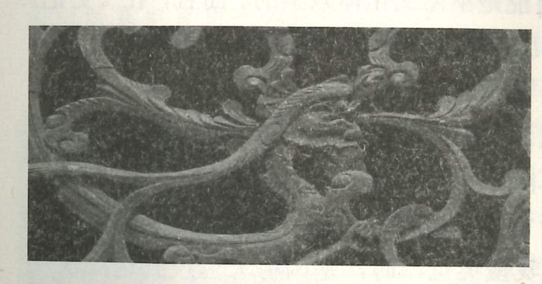
根据《史记·楚世家第十》记载，楚人先祖是高阳，而高阳是黄帝之孙，黄帝是谁？是帮炎帝杀了现在苗疆里的先祖蚩尤的人，蚩尤被典型巫傩文化民族苗族奉为先祖，那么杀蚩尤的黄帝自然不可能是巫傩文化体系里的。而且，在《史记》里记载，黄帝王天下以后，才“南至于江，登熊、湘”，就是说，黄帝是在被尊王后势力才到达湖南一带的，之前江汉平原和湖南都是蚩尤势力的地盘。而在黄帝出生前的距今 7400 多年前，在高椅附近的高庙就已经有了太阳鸟的陶纹，说明凤是从巫傩文化里产生的。而且，楚虽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楚却是从周成王时被封丹阳开始立国的，祖先是黄帝一族的，之后又“子事文王”（像儿子一样侍奉周文王），到号称“我蛮夷也”时，楚国势力也仅到达江汉平原（今荆门地区）。“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所以，按林河先生自己的分法，楚文化的源头应该是北方的龙文化，楚文化之所以会在春秋战国大放异彩，是因为楚势力到达湖南以后，被当地的凤文化渐渐同化，龙文化下降到配角的地位，凤文化取代了龙文化成为主体文化。按现在的说法，汉族是龙的传人，汉文化应该就是龙文化了，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汉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谁知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汉文

化的前身龙文化被少数民族的文化凤文化同化的时候，而且还是大手笔。

同样的，高椅杨氏祖先通碧公来自宋朝廷，宋时汉族文化基本已经成形，龙是居主体地位的，凤是居从属地位的。所以杨氏初到高椅时，是带着汉族文化来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因为当地大多数居民都是苗侗瑶等被汉族驱赶到苗疆的凤文化的遗民，杨氏反而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被当地的侗族同化了。所以，楚文化被凤文化同化的一幕在几千年后的高椅再次重演。高椅杨氏是在元代定居在高椅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明清的建筑，一个朝代的时间，汉族杨氏就成了侗族杨氏，龙主凤从就变成了凤主龙从。正是因为这个变化，今天的我们才能从高椅窗棂上看到在汉族建筑中基本看不到的凤比龙多的现象。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现象。要知道，高椅建筑群的风水布局之精巧，可夺天工。从天上鸟瞰，最外围是渔网状，中间是八卦状，最里面是梅花状。布局之精巧深得《易》理。那么高椅杨氏先人就不可能不知道湖南属南方，八卦里是离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见《说卦传》）。离为雉，雉，能飞的野鸡，公鸡被认为是最阳之物，而野鸡是能飞的鸡，能上天的鸡，在天上的阳就是太阳，所以，太阳鸟的原型可能就是野鸡，即野雉。

而《白虎通义》（汉官方所修，有一定权威性）载：“离为鸾。”鸾者，凤也。俗话说到哪个山头唱哪首山歌，到了南方凤的地盘，多供奉凤，尊崇凤，自然是理所应当的。







从自然环境上来看，是因为高椅是典型的山区农业经济，农业是打理植物的，而对植物生长来说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太阳。离卦的卦德就是明亮美丽，日照万物茁壮而生。而鸟的作息和太阳是紧密联系的，而且鸟可以在天上飞，在先人们看来鸟就是人与太阳间沟通的使者，于是鸟便有了神性，便有了凤凰和凤凰崇拜。

但龙虽比凤少，却也不是没有龙。这就又要提到同化问题了。楚人和高椅杨氏，虽然被当地的凤文化同化了，但其骨子里是龙文化，流的是龙的血，因此虽然被同化崇凤了，但对龙依然不肯轻易舍弃，仍然将龙用在生活里。这就是楚文化、高椅杨氏文化和当地巫傩文化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巫傩文化崇凤，但不崇龙，南方少数民族虽然有崇蛇的，但没有崇龙的，龙崇拜主要存在于长江以北。这种草龙，用在建筑上可以避煞，驱虫蛇。而且，建筑上一般我们只能看到龙的一支角，龙头的方向决定避煞的方向。

同时，从龙口里的纹饰似水纹波浪来看，似乎高椅杨氏仍然保存了北方水龙能兴云吐雨的功能。

在汉族传统文化里，“龙为百虫之长，凤为百禽之长”，所以高椅杨氏的先人们雕刻龙在窗棂上，是认为在气候较炎热湿润的湘西南山区可以让虫蛇看到龙后退避。

湖湘服饰习俗

楚　人

湖湘汉族服饰与其他地区汉人的服饰大致相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样式特征，时间的变异性较大，但仍然有一些传统的样式，尤其是婴幼儿服饰及死者的装殓衣（寿衣）较具特色，其中保留着许多民间俗信的成分。各少数民族的服饰则各具特色，并且有些千百年来变异性不是很大。

一、汉族服饰特色习俗

就像未离母体的胎儿还保留着人类远古进化的遗传密码一样，汉族民间服饰的历史记忆大多保留在婴幼儿的衣着，尤其是在帽子上。例如，全省各地民间都流行一种“狗头帽”，即在帽子的两边饰有狗耳，帽子的前沿钉有“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等字样的银饰，或用五彩丝线绣上类似吉祥字样。此帽男女婴儿均可戴。俗信认为戴上这种帽子可以像狗儿一样“贱”——在民间，“贱”有一种特殊涵义，表示哪怕在最低贱艰辛的环境里都不容易夭折，从而健康成长，灵活敏捷。这是一种特殊的俗信祈福方式，如同后面还要谈到的将儿童拜寄给树木、山石为干儿女一样。类似的帽子还有“老虎帽”，是一种用彩色丝线在帽子上绣出老虎眼眶、睫毛、虎鼻、虎嘴、“王字”并在额头左右缝上两只虎耳的虎形婴儿帽。俗信认为虎为百兽之王，婴儿戴上老虎帽，可以辟百邪、利生长。湘西汉族及侗族则有一种“罗汉帽”，即在帽檐上饰有银制的十八罗汉，认为有十八罗汉护身，鬼神均莫敢接近。此帽的两侧或后面还系有若干根银链或彩绳，末端吊有银铃、方印等具有辟邪寄寓作用的装饰物，小孩活动时，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全省各地还流行一种结构极为简单的儿童连衣裤“蛤蟆衣”。此衣可用一块整布缝合而成，亦可用几块布拼缀。前胸如兜肚，后背空缺，自腰的两侧从后面往对侧的领下斜系带子，下连三角开裆短裤，利于大小便，适合三四岁以下小孩穿用。因穿上形如蛤蟆，故名。又蛤蟆俗称“麻拐”，亦称“麻拐衣”。此服既凉爽，又能护住胸肚不致受凉，为传统夏日童装，至今仍在民间盛行。汉族传统婴儿服装还有“抱裙”等。

因人死俗称“寿终正寝”，故称死后装殓所用之衣服为“寿衣”。这也是一种保持着汉民族历史记忆的服饰。约定俗成，寿衣穿单不穿双，或一条裤子两件衣，或两条裤子三件衣，余依此类推。永州地区在单数中又不穿五件和七件，俗信认为如果穿五件，将导致子孙日后五脸不笑、无情无义；穿七件则会使妻离子散；最好是穿九件。湘中地区最外层的寿衣多为唐代裥衫样式，为蓝色、大襟、斜领、领袖镶白边的长衣。此俗形成的原因，相传是当年清兵入关后，强制汉人薙（剃）发着旗装，违者立斩。汉人不服，但又无法违抗，便采取“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方外（出家）之人不降”的办法对付，以示不忘记祖先是汉人，故死后不分男女均着裥衫，戴唐冠。

旧时民间还有穿红的习俗。据说红色具有辟邪的作用，故男男女女、尤其是被认为容易受到邪害侵袭的妇女和婴儿，大多在贴身处系上红兜肚；妇女还有穿大红外衣、尤其是红棉袄的习俗。近些年来，此俗又在社会复苏和蔓延，多为女性穿红内衣（胸罩）和红内裤，男性穿红内裤。以致家家超市大都设有此类衣裤的专柜。由此事例可以看出传统民间俗信之生命力的顽强。此类俗信显然并无科学依据，但亦无大害，又不妨碍他人，可听之任之。

二、土家族服饰习俗

在土司制度时期，湘西土家族的男女服饰样式区别不大，一般为：头裹刺花巾帕，身穿无领大袖满襟衣和八幅罗裙；衣裙多绣花边。男女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男衣花边较少，女衣花边较多；男裙较短，女裙较长。男女均佩戴首饰，男人左耳戴银耳环，左腕戴玉镯，头巾一端垂右耳后齐肩。

清代“改土归流”后，由于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男女服饰逐渐有别。一般男人穿无领对襟上衣，中间安5至7对布扣，称为“琵琶襟”；下穿青、蓝色加白布裤腰的镶边筒裤；头缠7至9尺的青丝帕或青布帕，包成人字形；足穿白底便鞋；劳动者不大穿袜子，冬天只缠一副青、蓝布裹脚，老人则在冬天穿一双白布袜子；佩戴各种金、银、玉质饰物。

一般女子上穿立领左襟阔袖衣，下着镶边汉式筒裤或八幅罗裙，衣裤均镶有较宽的花边并施以精美的刺绣；系围腰；头帕为精美的“西兰卡普”，缠在头上呈筒状；脚穿绣有各种花草、蝴蝶、蜜蜂等图样的绸面花鞋；劳动妇女也不穿袜子，冬天喜缠一双白布裹脚。姑娘的素装为外套黑布单褂，春秋季节多穿白衣、外套黑褂，因色似鸦鹊，称为“鸦鹊衣”。未婚少女梳辫子，已婚妇女挽髻于脑后。传统银饰有头簪、花插、项圈、手镯、耳环等。

儿童衣裤多不讲究，只是点缀些花卉图案；胸前围有花兜肚；帽子则样式很多，

春季多戴紫金冠，夏季多戴圈圈帽、蛤蟆帽、凉帽，秋冬季节多戴冬瓜帽、风帽、八角帽、凤尾帽等，均以多种彩丝线绣以“喜鹊闹梅”、“凤穿牡丹”等花鸟及“长命富贵”、“易养成人”、“福禄寿喜”等字样，钉以银质“文八仙”、“武八仙”、“十八罗汉”等装饰品；脚穿“粑粑鞋”、“猫头鞋”，均绣五色花卉；颈项戴有项圈，上系银质响铃和“百家锁”等饰品；手脚上戴系有空心银槌、银铃等饰物的银圈。

以上均为土家族传统服饰。新中国成立后，土家人平日着装已与汉人没有多大区别，只有在喜庆节日、隆重集会或边远山村，才有展示传统民族服饰风采的机会。

三、苗族服饰习俗

经数千年的历史大迁徙，苗族形成了如今分布在湘、黔、滇、川、鄂等地与其他民族大杂处小聚居的格局，由此形成了众多的苗民族支系。就服饰样式及色调而言，可以说，苗族有多少个支系，就有多少种服饰。至今人们一直尚未弄清全国苗族的服饰类型究竟有多少。

大致而言，清代之前，湖湘地区苗族男女之间的服饰差别很小，服装的材质均为自织的彩色斑斓布；上穿大筒短袖无领满襟花衣，下着百褶裙，蓄长发，编辫子，包头帕，缠裹腿，穿船形鞋，佩戴各种银饰。清康熙年间，政府指令“服饰宜分男女”。初始男女上衣尚无多大区别，均为无领满襟，袖短而大，系黄、红两色围腰，胸前袖口均滚边绣花，下摆及开叉处绣栏杆、绣花、数纱或挖云钩。直至民国时期，男人才逐步改穿对襟衣，外套小背褂；衣袖长而小，裤脚短而大。妇女服装亦由繁变简，下装由百褶裙改为筒裤，衣裤均镶有花边。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苗胞改着汉装，尤其是男子服装与汉人几无差异。

下面看看湖湘境域内几个具体地区的苗族服饰。湘西花垣县苗族男子均头缠布帕，雅酉一带为花帕，其他地区为青帕，帕长3至9尺，呈多层人字形；身穿对襟衣，袖长而小；裤筒短而大；包青色裹腿。衣料多为自织“家机布”，颜色有花格、全青、全蓝等；以花格衣最具特色。妇女衣着较为复杂，衣服一律满襟，腰大而长，袖大而短，无衣领；裤短而大；腰系围裙；胸前、袖口、围裙、裤脚均滚边、绣花或排纱，并加绣栏杆于其间，五光十色，焯烁眩目；头帕颜色与男子相似，但包法不同，多为折叠式，由前额向后脑延伸，下小上大，成扁圆形，形似古代汉族官妇发髻。雅酉一带妇女喜包花帕，包法又有区别，层层相叠，如峨冠秋菊。夏天，青年男女喜戴羊毛斗笠，脚穿麻板鞋。盛装时多佩戴各种银饰。

与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其历史文化的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的口述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装饰艺术图画来记录，其中尤以苗族服饰的刺

绣图案中所记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最为深厚丰富，并且是最能代表该民族特征的物品。湘西花垣苗族衣服绣花和银饰的题材种类繁多，样式各异。苗家女子多在少女时代就开始绣花，一生绣花的高潮期是在将要出嫁时。绉绣、散绣、堆绣为苗族特有的绣法：绉绣上衣花纹呈浮雕状，装饰效果强烈；散绣花纹精致漂亮；堆绣则指由各色三角绫子堆绣而成，装饰效果奇特而美丽。用这三种绣饰方法制作的上衣均为盛装礼服，称为“花衣”，并须钉上银饰才算最后完成，故又称“银衣”。绣花题材有寓意吉祥如意的“双凤朝阳”、“双狮滚球”、“喜鹊闹梅”等，有反映生产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瓜秧绵绵”等，有歌颂爱情的“鸳鸯戏荷”、“鱼水相怜”、“日下对歌”等。妇女佩戴的首饰也种类繁多、造型美观，有金饰、银饰、铜饰、玉饰之分，以银饰最为普遍。苗家认为银饰不仅可以避邪，更可给人带来吉祥幸福，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故苗家少女全身佩戴的银饰，多的可达数公斤乃至十余公斤；其种类繁多，造型奇特，工艺精致，在中国各民族中首屈一指。银饰有银帽、银盆、凤冠、耳环、项圈、手镯、戒指、牙签、扣绊、银花、银牌、披肩之别；以耳环、项圈、手镯、戒指为常戴之物。各种银饰还有不同造型，如项圈有轮圈、扁圈、盘图等，耳环有瓜子耳环、石榴耳环、梅花针耳环、圆圈耳环、龙头耳环、粑粑耳环等。苗族妇女每当出嫁、串亲、做客、赶集、节日赴会等均佩戴银饰。新中国成立后，湘西苗族服饰习俗逐渐改变，现除吉卫、补抽、雅西、排碧、排料、董马库等乡镇仍然穿苗装者居多外，其余乡镇男女青年衣着基本上与汉族没有多大区别。

比较而言，怀化靖州苗族的服饰则要简朴得多。旧时男女服饰差异不大，上衣环胸镶花边，佩以各种银饰，下穿绣花百褶裙，男女均蓄长发，挽髻或扎辫子。男穿对襟衣，以裤代裙，裹绑腿，头戴花边帕，系围自织花带，足穿绣花鞋；“青衣苗”妇女头戴滚边白帕，着右衽襟衣。青衣苗和白头苗衣着和银饰均较为简单。

四、侗族服饰习俗

唐宋以前就已有侗民定居于湖湘之地。侗族先民很早就用一种手摇纺车织布，开始了原始的纺织业，采用野麻纤维织成布匹缝制衣服。据史料载：靖州等地纺织的斑细布、白练布、白绢等在北宋时早负盛名，有的还成为贡品。服饰历来是侗民追求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侗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因各地生活习惯有所不同，侗族衣着服饰也样式各异。一般而言，湖湘侗民衣着多为青、紫、蓝、白、浅蓝等颜色；男子多穿对襟衣，女子则因地域不同而样式风格迥异。侗族女性服饰分为盛装和便装两种，盛装尤其荟萃了民族工艺的精华，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

怀化靖州寨牙、江东、横江桥、平茶一带侗族服饰为：男子短衣长袖，老人

为右衽襟衣，青年为对襟衣；长裤裤脚筒大而不盖脚面；以长青布包头。衣料多为棉质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有粗纱、细纱之分，现在则用市场销售的机织布料；色为深紫、深蓝、浅蓝、黑青、白色数种。妇女穿着绚丽多姿：未婚姑娘着右衽斜襟上衣，蓝色长裤；已婚妇女穿长裙或蓝长裤。发式头饰为：未婚姑娘梳辫，戴滚边花头帕；已婚妇女挽发髻，插银笄戴项圈、耳环。与苗族杂居之地如藉团乡新街村的侗族姑娘，逢喜庆节日和传统社交活动，则用红、蓝、白三色绒线和头发缠绕织成花辫盘头，辫上插银花、银蝶，前额垂一圈银铃，并戴银手镯、银环、银戒指等，颈项上戴大小不一之四个扁平形的银项圈，胸前佩有银盾牌，身穿斜襟花边衣。儿童一般戴蛤蟆帽、猫头帽，帽前沿有银佛装饰，帽后吊铜钱或银铃，脚穿猫头鞋。

邵阳绥宁、城步等地侗族服装的衣料材质与前述相同，颜色或蓝或青。男子以丈余布匹缠大圆盘青包头；身着对襟衣、大管裤；脚扎青色三角绑腿，惯于赤脚；劳动、行旅喜戴竹斗篷。老年妇女多以二丈长的青丝帕缠头，称“丝包头”；身着大襟衣，衣长过臀；裤脚滚边；足裹脚布或穿布袜，布袜筒外缠三角绑腿，穿钩鼻绣花鞋。年轻女子喜戴短纱帕，衣短裤长，较少穿裙；衣边、衣袖、裤脚多镶梅条花边；冬穿绣花鞋，夏着布凉鞋；喜戴手镯、耳环。发式饰物为：未婚姑娘剪短发或结双辫；已婚妇女留长发，脑后挽髻，髻插银簪，胸前喜缚围裙，裙带多为银链或手织花带。幼儿多戴凉帽、狗头帽、瓜壳帽和罗汉帽等，颈上围一块拼花刺绣的圆形“口水搭”。

侗族首饰多为银质，除手镯、戒指等少数饰物外，大多为妇女佩戴于头颈部的项链、项圈、耳环、头花、银梳、银冠、银簪、银帽等，而以耳垂饰物最有特色：一般呈环形，如钥匙圈大小，不封口，尾部勾着雕刻精美的圆形、扁形或帽形装饰物，多用细银线弯结成果状、花状或绣球状；周围、下方吊有鱼形、桃形、扁长体、菱形、塔状等各种小饰物，上刻细小花纹。有的耳环形似竹根，上涂珐琅；或用一根细银线缠绕在环形圈上，未缠线处涂珐琅花纹。又因使用人和场合不同而有所区别：小女孩、老年妇女所戴较为简单；青年妇女戴者名为“色板”，纹饰丰富，节日盛装时还戴两三对，显示其美丽与富有。侗族男子盛装时亦戴“银帽”，并佩戴银牙签、银烟嘴、银戒指等其他饰物。儿童常佩带银帽、银锁、银项圈、银脚圈等。

五、瑶族服饰习俗

瑶族为中国南方一个比较典型的山地民族。一般认为瑶族先民是秦汉时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亦说源于“五溪蛮”。最初主要生活在湖南北部，后不断向周边尤其是南方的广西、云南、贵州、广东、江西、海南等省区的山区迁徙，区域

分布非常广泛，形成了众多的支系，其自称有“勉”、“门”、“敏”等63种，他称有“盘瑶”、“过山瑶”、“蓝靛瑶”、“红头瑶”、“白头瑶”、“白裤瑶”、“大板瑶”、“平头瑶”、“沙瑶”等390种，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瑶族。因其支系较多、分布较广，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并各自受到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生活习俗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仅仅是服装式样便多达六七十种。实际上，对不同支系的瑶民，主要从其居住习俗和服饰特征等方面进行区分。

蜡染是中国古老的民间传统纺织印染工艺，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瑶族是最早掌握纺织蜡染工艺的民族之一，至迟不晚于南朝时期，故史称此纺织印染工艺品为“瑶斑布”。至今，瑶家的衣服、被单、头巾、腰带、围裙、背袋、花布鞋等，主要材料仍是自家织染的“瑶斑布”。

湘南与湘中地区的瑶族男性服饰基本相同，唯妇女稍有差别，即湘南瑶女穿裤而湘中瑶女穿裙。一般的传统服饰为：男子穿齐领琵琶襟短衣，或右衽铜扣上衣，亦有穿交领花边衣；下穿宽脚长裤；腰缠布带；打绑腿；多蓄发盘髻，扎青头帕，头巾一般为六尺，有的长达两丈，两端绣有花边，在头的左边翘起一节二三寸长的头巾，或在头后留一节四五寸长的头巾披着；出门穿草鞋。妇女穿着样式与男子大致相同，上身为圆领花边对襟或右衽长衣；下着挑花长裤或百褶裙；扎绣花腰带、围裙和绑腿；着绣花鞋；头扎包成尖角形的青帕。未婚姑娘娥冠，冠檐高耸，上绣花鸟图案，两边缀丝绦、珠串之类。妇女喜佩戴金银饰物，臂戴铜钏；未婚则戴银手钏。男子佩腰刀。瑶族男女服装一般都用青布或蓝黑色布制作，喜用黄、蓝、绿、白、红五种颜色点缀，俗称“五色衣”，并运用绣、挑、织、染等技艺加工成各种图案花饰，其中尤以挑花最为精致。瑶族服饰的挑花构图风格独特，整幅图案均为几何纹。其头饰特点更为突出，有“龙盘”形、“A”字形、“飞燕”形等。与其他少数民族比较，瑶族的服饰显得朴实无华。新中国成立后，已有不少瑶胞改着汉装。

土家族服饰

何 阳

土家族自称比兹卡。湖南湘西土家族是由早期濮人（后来的僚、仡佬）为主体，在融合了巴人、楚人及其他族类后，在唐宋以后数百年间形成的。1957年被国家正式确定为土家族。湖南境内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的龙山、永顺、保靖、吉首、凤凰、古丈、泸溪和张家界市的桑植、永定区等县市，以及常德石门县、怀化沅陵、溆浦等县。在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里，土家人虽然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却以独有的聪明才智、丰富深远的审美意识，借以服饰、器物、肢体动作等为载体，镌刻铭记着民族远古的历程。

一、古代土家族的服饰

土家族古老舞蹈“毛古斯”身披的茅草、树叶、棕毛、稻草服饰，以及“摆手歌”中唱述土家先民：“身上捆的芭蕉叶，头上戴的芭茅草”，折射了土家族先民最原始的衣着装扮，印证了土家族经历了一个草秸裹身、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

1978年，龙山里耶发现新石器遗址中的石器、陶片器饰痕纹中，有大量的粗绳纹、网结纹、方格纹等，说明远古的土家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学会了粗放的编织工艺。张家界出土巴人的遗物錞于上的“椎结人头纹”，和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众多玉佩、滑石器耳环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土家先民头饰和佩饰风貌。1986年，张家界出土西汉“三烛青铜烛台西南蛮夷铸像”，头戴编织帽，下身着裙，这便是远古土家先民服饰的缩写。

秦汉之后，土家族先民服饰已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后汉书》中所记述的“武陵蛮”、“五溪蛮”“好五色衣”，表明了土家先民喜“斑斓”服饰的审美倾向。到了南宋，在唐代即已蓬勃兴起的织锦业此时已进入全盛时期，用五彩华美的织锦制作服饰亦自然成为土家人的最爱，南宋《溪蛮丛笑》对此便有描述：“绩五色线为方，文彩斑斓可见。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同治年间《龙山县志》云：土锦“绩五色线为之，色彩斑斓可爱。俗用以为被，或作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岗巾。”土家人崇尚繁丽多姿的服饰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改土归流之前。

清改土归流前，土家服饰仍沿袭旧习：“男女垂发，短衣跣足”，“男女服饰均皆一式，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刺花边”（清乾隆《永顺府志》）。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土家民族形象第一次以描绘草图形式在《皇清职贡图》里清晰呈现：此时永顺、保靖等地区的部分土家男人已开始着裤，上衣为圆领短袍，衣长至大腿，包头巾，系腰带，裹绑腿；女人则“高髻螺鬟”，内穿立领短袍，外套对襟背心，下着过膝百褶裙，以布缠腿。“妇女喜垂耳环，两耳之轮各饰之十饰，项圈手圈足圈，以示富裕”。（清《龙山县志》）

“改土归流”成为土家服饰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清政府派去的流官，不断对土司时期的习俗加以禁止，也包括服饰在内。永顺知府袁承宠在雍正八年（1730）颁布：“服饰宜分男女也”；保靖知县也“限一年，尔民岁时伏腊，婚丧宴会之际，照汉人服色”。从此，土家族服饰男女一式的外观形式得以彻底改变，男性由穿刺花衣裙而改穿满装；妇女则上穿满装，下着汉裙，即八幅罗裙。

这一时期，由于汉人商贾把大批进口“洋布”带入土家地区，洋布质优价廉，逐渐替代了土家人自己纺织的溪布、斑布。织锦除了用于被面、祭祀时的披毯、或孩子的盖裙外，几乎不再用于服饰。据湘鄂渝黔部分土家族聚居地方志记载：土家族服饰“俗尚简朴”，“无一切奢靡之风“，“男女作苦与共，俗不尚衣冠”。此时的土家族服饰已不如以前那样鲜艳，喜好“五色斑衣”的习俗逐渐向“尚简朴”演变，就如土家俗谚所云：“好吃不过茶泡饭，好看不过素打扮。”从此，崇尚俭朴、天然去雕饰的淳朴之美，成为土家服饰的一种朴素审美习惯。

二、当今土家族服饰

（一）头饰

土家男子的服饰虽然受满服的影响，但仍保留了包头帕的习俗。头帕一般为青丝帕或青布帕，有的地方还在左边垂一截过耳，造型随意，朴素大方。头帕长7～9尺，包成“人”字形状。俗话说“裹腿打的人字路，头巾包的人字形”，重点突出一个“人”字，山居生活养成了土家人一种质朴而又善良的民族性格。

土家闺女额发中分梳成长辫，艳红头绳缠绕辫子两端，额前留“刘海”，头上搭挑花方巾，使姑娘平添了几分灵气，微风过处，动静怡然。姑娘出嫁前一天为“戴花日”，娘家人特请儿女双全的贤能妇女给新娘“开脸”，扯去汗毛，修整眉毛，然后“上头”盘髻，插上银簪、拢以莲蓬，最后戴花，完成了由少女到妇人的最美蜕变，同时也成为新郎最甜蜜的期盼：“阿妹头发二尺八，梳个盘龙插鲜花。”

女子的发式一般有三种：一种是将长辫绾成“盘龙髻”，也叫“粑粑髻”，髻心缠红头绳；另一种是将头发编成四条辫子，然后合编成两条折叠缠绕成“麻

花头”，用别簪绾紧；最后一种是将头发分成两股在脑后相交盘成一个圆圈，似阴阳八卦太极图形状，俗称“太极头”。头发盘成后，罩上青丝网头套，包黑布帕或青丝帕，成“锅螺圈”形。丝帕薄如蝉翼，最长达七八米，是妇女终生陪伴之物，过世后必以丝帕缠头下葬。

（二）服装

土家男子上装有三种款式：琵琶襟、右衽大襟（满襟）和对襟。下装裤子宽松肥大，拼接白布裤腰头，并由左向右折叠，以绳系紧，俗称“抛裆裤”。整体结构简单，颜色单纯朴素，多为青、蓝、白色。

改装初始，土家族男子还“耳留垂环，大者如镯，以多为胜”。臂戴铜手镯，均穿右衽琵琶襟上衣。后改为老年男人内穿对襟衣，外罩矮领右衽满襟衣；有些中老年男子喜欢缠腰带，棒棒烟袋斜插其间，烟袋吊有纸媒子、火镰石和用黄鹿子角或虎足做成的烟盒，既实用又美观，突显出土家男人古拙剽悍的特征。青壮年穿对襟衣，未婚男子则捆扎织锦彩带，显得更为英姿勃发。一首土家山歌道出了其中的特殊寓意：“天上起了五彩云，情姐穿了五彩裙，为郎捆起五彩带，五彩带子配罗裙。”

对襟衣有两种款式：一种为素色便装；一种为饰有“如意云勾”的盛装。素色便装为立领，正中钉上七对、九对、或十一对不等量的布扣，俗称“蜈蚣扣”。袖小而长，袖口滚边，是土家男子的日常装。每逢节庆或出门做客，家境富裕的则穿自纺的土蚕丝对襟衣，工艺极其精细和特别：沿领口、门襟、侧缝、延伸至袖侧缝及袖口都镶滚细径，相距一寸之处打结并分开缝合。

“如意云勾”装，为清代时最典型的土家男子盛装。宽衣博袖，衣长掩胯，七朵“如意云勾”镶拼其上，浅色花边、多色嵌条盘绕“如意”，线条流畅而舒展，繁复琐细中富有庄严厚重之感。土家人钟爱“如意”，即使普通人家，也镶贴简单的“如意云勾”于衣摆，以此象征顺遂如意。

每逢“舍巴日”，披甲队的男人们身披五彩斑斓的“西兰卡普”，在咚咚的锣鼓声中跳起欢快的“摆手舞”。他们以锦为披甲，展示着土家族人天性劲勇、雄壮威武的个性，并借由特殊的媒介，祈求幸福和酬报先祖。

夏天穿多耳麻草鞋，秋冬季的布鞋多为高鞋梁、青鞋面、白鞋底的瓦鞋等，不穿袜子缠裹脚。雨雪天穿牛皮钉栓鞋，裹脚布。

土家族女装清新雅致，纯美恬静。上衣款式主要有银钩、大襟、外托肩、满襟便装等诸多式样，大多数为右衽，龙山坡脚、靛坊一带少数上衣为左衽。20世纪50年代前后，大部分土家地区已基本着汉装，唯有少数边远山区的妇女还穿简

单朴实的满襟便装。

银钩也叫云勾。襟缘及底摆两侧开叉处拼接墨色宽边，并镶滚浅色细径、饰以亮丽花边，以此勾勒出云纹的流转灵动。因借由云纹形若如意，以示吉祥。盛装的银钩，多以蓝色系列绸缎和提花锦缎制作，下穿同料的花边宽松裤，脚穿绣花鞋，胸挂缀有银链、银铃、银牙签等饰物的银“扣花”。银色的流光与蓝色的冷艳，使整个装束在华美中又透出宁静和优雅。只是这样的服饰现在已基本消失了。

已婚妇女，夏天穿白布衫套青色坎肩，被称为“喜鹊套白”，常被山歌颂赞：“白布单衫黑背褂，独钟喜鹊自然花。”秋冬季节，习惯在外衣上套一件精美挑花围裙，有银链缠绕颈脖的“挂式”，和布扣连接领口的“扣式”围裙，大小合身，松紧相宜。每逢节庆和走亲做客，挂上一串银质牙签，佩戴耳环首饰，衣襟口系上绣花手巾，显得十分利落俊俏，陡增几许风韵。青年女子盛装时，多罩柳叶式小云肩或“四合如意”式大云肩，乖巧甜美而动人。

土家女子最为讲究的算是“露水衣”，这是女儿出嫁时在路途上穿戴的服饰。上衣为大红色的大襟款、衣身宽博飘逸，在领口、胸襟和袖口处分别用黑色、蓝色布条镶嵌或滚边，以此衬托红衣的艳丽，襟缘金色的铜扣又增添了几分喜气；下裳着大红八幅罗裙，或百褶裙；头戴缀满银宝花的“箍箍帽”，俗称“凤冠”，胸前系一个挂满银链、银牌、银蝴蝶、银石榴等饰物的银扣花，琳琅满目，闪闪发光，相传戴上它们可以驱邪煞，保平安。民间歌谣唱出了露水衣的整套装束：“早早来，早早来，身穿露水衣，脚穿露水鞋，手打露水伞，不为情哥不得来。”不论晴雨天气都得撑开油纸伞，一为遮光避雨，二为遮羞。新娘沿途被送亲姐妹前簇后拥着，花团锦簇，上遮下掩，外人很难看到其娇羞的面容。临进夫家门之前，新娘便要更换衣裳，改穿夫家送来的新衣。露水衣可以代代相传给女儿做嫁衣，但不能拿回娘家存放，忌讳再嫁。家境不宽裕的邻里乡亲也可以借用，婚后归还原主，并送微礼以表谢意。

土家妇女喜穿裙子，款式有八幅罗裙、栏杆裙、百褶裙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八幅罗裙，其多为红色，前后片正中各有一幅马面（镜面），青布绸缎拼接成栏杆，并用镶滚细径和拼贴花边的工艺强调如意云纹，底摆刺有蝴蝶，寄予富贵吉祥；精细的大红褶裥、白布腰头、黑色栏杆，三色相互映衬，显得雍容华贵。另有一款挑花栏杆裙，用传统的数纱挑花装饰裙面，外形上尽管深受汉裙的影响，却在内涵里保留了土家独有的审美精髓，从其可看出文化的变异和创新。

（三）服饰配件

土家族的服饰配饰有绣花鞋、绣花鞋垫、锦绦、香袋、方巾、长巾、筒帕、褡裢等。

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就绣花鞋来说，有船头鞋、气筒鞋、鲇头鞋、圆口鞋、翁鞋、钉钉鞋等。能否做鞋，是衡量一个姑娘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准之一，这正如民谚所说："姑娘长得乖不乖，就看一双绣花鞋。"几乎每一件佩饰，都可以成为传递土家姑娘爱情的信物，绣花鞋垫，是姑娘赠给意中人最珍贵的礼物；锦绦，也即织锦彩带，过去除了用于服饰，同时也是青年男子捆扎的腰带，目前在湘西北土家族中仍在编织，多用于挎包背带，或妇女们的围裙带子。无论是一个绣花小香袋，或是一条挑花方巾，都是土家女子千针万线缝制，针针含心血，线线传真情，凝结着姑娘渴望幸福，期望未来的美好夙愿。

（四）土家童装

土家孩童的服装在清末时与成人的款式差不多，有对襟和右衽大襟两种。两款同时又分别有无领和立领两种式样。男孩多穿胸前饰有硕大如意云勾的对襟衣，女童则穿右衽大襟衣，整体风格古朴素雅，喜欢用黑线在白色的棉布上衣挑绣各种吉祥纹样，有蝴蝶、金瓜、双凤朝阳、狮子滚绣球、五子登科、鲤鱼跳龙门等，即便是彩线绣花，亦多清秀淡雅。20 世纪 60 年代时，这种装束在龙山捞车河一带还非常风行，以后逐渐消失。

土家人最注重的是童帽。传说土家的祖先是以射杀白虎而称著史册，因此，这悠悠古风至今还保留在土家孩童的穿戴习俗上：头戴虎头帽，脚穿虎头鞋。虎头帽有一对竖着的耳朵，帽前额绣有"王"字以避邪壮威，尽显孩子的天真活泼、伶俐威武。婴儿戴棉布缝制的金瓜小帽，年龄稍长，春秋戴"紫金冠"；夏天戴"冬瓜圈"；冬天戴"狗儿帽"、"凤尾帽"等。帽子多以各种银饰做装饰，有"文八仙"、"十八罗汉"、"福、禄、寿、禧"等银字，有的还在帽的两侧及后尾部吊有银铃。无论男孩女孩，颈脖喜戴银项圈，圈系银链，链挂"同心结"或"如意牌"，上面刻有"长命百岁"和"易养成人"；手脚戴挂有响铃银圈。对那些"命相"不佳的小孩，还要按老土司的指点戴"百家锁"、穿百衲衣，故外人说：土家人穿了一身的"讲究"。

婴儿满月时，外婆家会送"台台花"织锦盖裙作为礼物，这是用一米见方的黑色土布或绒布与织锦镶饰而成，它既是包裹婴儿的襁褓；又是遮盖婴儿的披风，出门时，还可以把它盖在窝窝背笼上，俗称"窝窝被"，用于遮风保暖。土家人对于子女十分疼爱，即便一件口水兜，一双"粑粑鞋"、"猫头鞋"，都是经过精工挑绣的，那一幅幅精致的挑花绣品，充满了殷殷母爱。

后 记

今年是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成立 60 周年，作为一甲子的纪念，本书是馆刊《文史拾遗》的又一次结集，也是《湖湘文史丛谈》第一、二、三集的继续。对湖湘文史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工作是没有终点的，我们的设想是"湖湘文史丛谈"能作为系列丛书一直出版下去。

本书书稿的选编和出版工作，由湖南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主任、党组书记熊健和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副主任、副馆长陈伏球主持。省文史研究馆熊治祁、陈书良、陈先枢等几位馆员将《文史拾遗》杂志第 71 ～ 90 期的稿件全部通览了一遍，并依据杂志原有主要栏目"湖湘文化研究""文史述往""三湘人物""序跋书评""民俗风情"等进行了选材分类。入选的篇目经过多次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一、与前三集不同，《文史拾遗》杂志的栏目名称将继续保留在本书里；二、在文稿编排顺序上，为了方便阅读，一般按照文稿所反映的历史时间为序；三、为保持丛书的整体感和一致性，本书在版式和封面设计上参考了之前的三集。

本书出版得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谭乐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读，在此谨致谢忱。本书文稿整理及编校，难免有纰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2013 年 11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文史丛谈. 第4集 /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561-0010-1

I. ①湖… II. ①湖… III. ①文史资料—湖南省 IV. ①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6088号

湖湘文史丛谈（第四集）

编 著 者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责任编辑 文志雄 谭 乐
装帧设计 吴颖辉 康 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3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010-1
定 价 8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